

目 录

第一章 1949年春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	(1)
第一节 1949年春的形势	(1)
一、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1)
二、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8)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计划	(16)
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	(16)
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	(24)
三、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准备	(29)
第三节 中共中央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和 人民解放军的任务	(34)
一、中共中央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	(34)
二、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任务、部署和方针	(39)
第四节 进行进军的各项准备	(46)
一、全军整编	(46)
二、进行政治整训，做好进军的思想准备	(57)
三、调整、完善全军后勤机构，建立各项后勤 规章制度	(64)
第二章 举行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	(69)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江防企图和部署，人民解放军的 渡江决心和部署	(69)
一、国民党军防守长江的企图和部署	(69)
二、人民解放军渡江任务与发起渡江时间的确定	(74)
三、渡江作战的部署	(79)

第二节 渡江作战的准备	(86)
一、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树立必胜信念	(87)
二、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	(94)
三、开展以强渡江河为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	(96)
四、筹集、隐蔽船只，选调、培养水手，团结、教育 地方船工	(99)
五、筹措战争物资，动员人民支前，提高后勤保障 能力	(101)
六、扫除江北国民党军据点，开辟渡江前进基地	(104)
第三节 突破江防，占领南京	(107)
一、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	(107)
二、解放南京	(112)
第四节 追歼南逃之国民党军，控制浙赣铁路	(115)
一、总前委调整第二阶段的任务和部署	(115)
二、郎广围歼战，解放杭州	(116)
三、占领浙赣铁路，切断汤、白两集团的联系	(119)
第五节 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	(123)
一、国民党军防守上海的企图和部署	(123)
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上海的方针和总前委、 第三野战军的部署	(125)
三、上海外围地区作战	(129)
四、攻占市区，解放上海	(132)
第六节 解放武汉。进击闽北、赣中	(137)
一、解放武汉，前出鄂东南	(137)
二、进击闽北，解放南昌	(140)
第三章 进军东南，解放福建、浙江大陆和沿海岛屿	(148)
第一节 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的任务与部署	(148)
一、国民党军防守东南及沿海岛屿的企图与部署	(148)
二、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及沿海岛屿任务的确立	(151)

三、进军福建的准备·····	(153)
第二节 进击闽中，解放福州·····	(159)
一、围歼福州国民党军的部署·····	(160)
二、进击闽中·····	(162)
三、解放福州，围歼逃军·····	(163)
四、解放平潭等岛屿·····	(164)
第三节 进击闽南，解放漳州、厦门·····	(166)
一、进击闽南的部署·····	(166)
二、解放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	(168)
三、解放厦门岛·····	(170)
四、金门战斗·····	(175)
五、攻占东山岛·····	(181)
第四节 进军浙东、浙南，解放舟山群岛·····	(181)
一、进军浙东、浙南，解放浙江大陆·····	(181)
二、解放舟山群岛·····	(184)
第五节 解放青岛、长山列岛·····	(199)
一、解放青岛·····	(199)
二、攻占长山列岛·····	(201)
第四章 攻克太原，解放绥远，肃清华北国民党军	
残部 ·····	(204)
第一节 举行太原战役，全歼阎锡山集团·····	(204)
一、阎锡山防守太原的部署和企图·····	(204)
二、华北军区第1兵团攻击太原的部署·····	(206)
三、战役准备·····	(208)
四、太原外围地区作战·····	(210)
五、围城休整·····	(217)
六、总攻太原·····	(221)
七、和平解放大同·····	(227)
第二节 安新战役·····	(229)

一、攻克安阳·····	(229)
二、和平解放新乡·····	(231)
第三节 和平解放绥远·····	(233)
一、“绥远方式”的提出·····	(233)
二、和平解放绥远的经过·····	(237)
第五章 进军西北，解放陕甘宁青新诸省 ·····	(245)
第一节 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和解放军进军 西北地区的任务与方针·····	(245)
一、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	(245)
二、解放军进军西北地区的任务与方针·····	(247)
三、进军西北的准备·····	(250)
第二节 举行春季战役，打乱胡宗南撤退部署·····	(252)
第三节 连续开展攻势作战，重创胡宗南集团·····	(256)
一、举行陕中战役，解放西安等地·····	(256)
二、粉碎胡马反扑，第 18、第 19 兵团加入西北地区 作战·····	(260)
三、钳马打胡，举行扶眉战役·····	(267)
第四节 钳胡打马，举行兰州战役·····	(276)
一、作战双方的态势及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针·····	(276)
二、进行陇东追击作战，进逼兰州·····	(278)
三、解放兰州、西宁，全歼马步芳集团·····	(281)
四、第 18 兵团策应野战军主力夺取兰州，举行秦岭 战役·····	(291)
第五节 进军宁夏、河西，全歼马鸿逵集团及河西走廊之 国民党军·····	(294)
一、第 19 兵团进军宁夏，解放银川·····	(294)
二、第 1、第 2 兵团举行河西战役，解放 甘肃全境·····	(300)
第六节 新疆和平解放·····	(304)

一、新疆的基本情况，陶峙岳、鲍尔汉领衔起义……	(304)
二、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	(308)
第六章 进军中南，解放鄂湘赣粤桂诸省……	(321)
第一节 中南地区国民党军态势和企图，第四野战军	
进军的任务与部署……	(321)
一、中南地区国民党军态势和企图……	(321)
二、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的任务与准备……	(323)
三、进军中南的部署……	(326)
第二节 第四野战军南渡长江，挺进湘中、赣南……	(328)
一、举行宜沙、湘赣战役，歼宋希濂、白崇禧	
主力……	(328)
二、和平解放长沙……	(338)
三、举行赣西南战役，打开进军广东的道路……	(344)
第三节 各游击纵队开展攻势作战，准备迎接南下	
解放军……	(347)
一、闽粤赣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348)
二、粤赣湘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350)
三、滇桂黔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352)
四、粤桂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355)
五、粤中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356)
六、粤桂湘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357)
七、琼崖纵队的攻势作战……	(358)
第四节 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确立及第四野战军的	
暑期休整……	(359)
一、白崇禧的作战计划……	(359)
二、第四野战军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确立及南进	
部署……	(360)
三、暑期休整与“兵强马壮”运动的开展……	(367)
第五节 举行衡宝战役，重创白崇禧集团……	(371)

一、白崇禧反击第四野战军中路军的企图·····	(371)
二、西路军进击湘西，中路军集结湘中·····	(373)
三、中路军歼灭白崇禧主力4个师·····	(375)
四、西路军解放武冈、宝庆·····	(383)
五、第47军解放大庸、桑植·····	(385)
六、湖南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作战及湖南人民的 踊跃支前·····	(386)
七、衡宝战役的战绩、意义及经验·····	(387)
第六节 举行广东战役，歼灭余汉谋集团主力·····	(390)
一、余汉谋集团防守广东的部署·····	(390)
二、赣州会议及解放广东的部署·····	(391)
三、突入粤北，解放广州·····	(394)
四、阳江围歼战·····	(403)
第七节 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集团·····	(407)
一、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的企图和部署·····	(407)
二、第四野战军进军广西的部署·····	(409)
三、三路大军挺进广西·····	(411)
四、第一次粤桂边境歼灭战·····	(414)
五、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	(418)
六、封闭中越边境，搜剿国民党军残部·····	(420)
七、广西战役的战果、意义及其经验·····	(422)
第八节 举行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	(424)
一、国民党军防守海南岛的企图和部署·····	(425)
二、解放军分批偷渡与主力强渡相结合作战方针 的形成·····	(426)
三、战役准备·····	(433)
四、组织分批偷渡·····	(436)
五、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	(439)
六、琼北围歼战和全岛的解放·····	(442)

七、解放万山群岛·····	(446)
第七章 进军西南，解放云贵川康藏诸省 ·····	(454)
第一节 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和第二野战军 进军西南的任务与方针·····	(454)
一、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	(454)
二、第二野战军的任务与方针·····	(457)
三、进军西南的准备·····	(461)
第二节 解放军进军川鄂黔，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	(463)
一、解放军向川鄂黔进军的部署·····	(463)
二、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防线，解放鄂西、川东·····	(465)
三、突破国民党军黔东防线，占领贵阳、遵义·····	(467)
四、进军川南，解放重庆·····	(468)
五、第18兵团尾击胡宗南部·····	(472)
第三节 刘邓发布四项忠告，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474)
一、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四项忠告·····	(474)
二、昆明起义·····	(475)
三、彭县起义·····	(477)
第四节 举行成都战役，歼灭川境国民党军·····	(479)
一、国民党军“川西决战”计划与解放军进行成都战役 的部署·····	(479)
二、追击包围川境国民党军·····	(481)
三、全歼川境国民党军于成都地区·····	(483)
第五节 举行滇南、西昌战役，肃清西南国民党军 残余·····	(486)
一、昆明保卫战·····	(486)
二、举行滇南战役，追歼汤尧集团·····	(488)
三、举行西昌战役，拔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 最后据点·····	(493)
第六节 挺进昌都，和平解放西藏·····	(495)

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解放西藏的 方针与部署·····	(495)
二、进军西藏的准备·····	(500)
三、举行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	(504)
四、进军西藏·····	(508)
第八章 参加城市接管。清剿土匪·····	(516)
第一节 参加城市接管·····	(516)
一、接管城市的方针和政策·····	(516)
二、参加城市接管的基本情况·····	(524)
第二节 清剿土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535)
一、新解放区的匪情及解放军的剿匪方针和政策·····	(535)
二、解放军剿匪经过·····	(540)
第九章 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改造起义部队·····	(564)
第一节 创建海、空军·····	(564)
一、创建人民海军·····	(564)
二、创建人民空军·····	(571)
第二节 加强特种兵和院校建设·····	(580)
一、加强特种兵建设·····	(580)
二、加强军队院校建设·····	(587)
第三节 调整、组建地方武装·····	(592)
一、东北地区·····	(592)
二、华北地区·····	(593)
三、西北地区·····	(595)
四、华东地区·····	(596)
五、中南地区·····	(597)
六、西南地区·····	(600)
第四节 改造起义、投诚部队·····	(603)
一、改造起义、投诚国民党军的方针和政策·····	(603)
二、改造的基本情况·····	(610)

本卷结语.....	(617)
后 记.....	(630)
附图 (1—6)	

第一章 1949年春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

第一节 1949年春的形势

一、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已濒临绝境。

（一）军事形势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底至1949年2月，经过2年又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虽经不断补充，其总兵力仍由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04万余人。其中，陆军正规军虽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但只有115万余人，非正规军17.5万余人，特种兵13.5万余人，后方勤务部队、机关、学校45万余人；空军10万余人；海军3余万人。上述部队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共146万余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在146万余陆军作战部队中，位于长江下游苏南、皖南、上海、杭州地区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共38.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9个军60个师32.8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2万余人；位于福建地区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

挥的共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8000余人，非正规军2000余人；位于台湾省归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指挥的共2.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1.2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8000余人；位于长江中游武汉、宜昌地区归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共2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2个军37个师约20.8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余人，特种兵2.1万余人；位于湖南、江西地区归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指挥的共3.9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9个师3.3万余人，非正规军4000人，特种兵2000人；位于广东省归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挥的有6.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8个师4.6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特种兵8000余人；位于广西省归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指挥的有1.7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师1.2万人，非正规军5000余人；位于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地区归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指挥的有10.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6个师8.6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人，特种兵8000余人；位于陕西关中及陕南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有19.9万人，其中正规军13个军33个师16.3万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2.4万余人；位于青海、宁夏、甘肃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指挥的有9.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12个师8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1000余人；位于新疆地区归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指挥的有8.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整编师16个旅6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9000余人；位于太原地区归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指挥的有7.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4个师4.2万余人，非正规军2.2万余人，特种兵7000余人；位于绥远西部及陕西榆林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指挥的有5.6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7个师3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位于河南新乡、安阳地区归第12绥靖区司令官李振清指挥的有2.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1个师7000余人，非正规军1.5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

人；位于山东青岛地区归第 11 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指挥的有 5.3 万余人，其中正规军 2 个军 7 个师 3.5 万余人，非正规军 3000 人，特种兵 1.5 万余人。

国民党军不但数量急剧减少，素质也日益下降。在上述陆军作战部队中，除白崇禧、胡宗南集团的个别军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未受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大多是新建的，或者是多次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又多次补充起来的，编制极不充实，人员缺额甚多。按国民党军的编制，1 个军应辖 3 个师 3.5 万人，但除马步芳、马鸿逵部的个别军能基本达到编制数，员额在 3.3 万人左右外，其余各军一般均在 1.5 万人至 2 万人左右，有的甚至不足 1 万人。同时，由于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缴获，部队武器装备特别是重武器严重不足。加之老兵减少，新兵增多，士气低落，缺乏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明显下降。

（二）经济形势

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加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迅速恶化，财政枯竭，通货恶性膨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1948 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 900 万亿元。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再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如 1945 年底发行法币 1.03 万亿元，到 1948 年 8 月，增加到 663.69 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 1948 年 8 月 19 日实行“币制改革”，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规定发行 20 亿元金圆券作为本币在市场上流通，并以 1：300 万的比价收兑法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在市场上流通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按规定的比价限期兑换金圆券；限期登记、管理中国公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和资产；限制物价，规定物价冻结在

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但是，由于整个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些措施除了更加残酷地掠夺劫收人民的财产外，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情况的好转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金圆券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亿元的限额，到11月，金圆券已发行33.94亿元。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1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收回了“限额发行”的成命。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到12月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达到208.22亿元，3月达到1960.60亿元，4月竟达到5.16万亿元。

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得币值急剧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机，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毫无拘束的迅速上涨。以法币100元的购买力为例，1945年可买2个鸡蛋，到1949年只能买1/50万一两大米。在国民党政府执行限价中心的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万倍。桂林市的粮价，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时上涨36万倍，比1945年7月上涨了27亿倍。金圆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方当局，为了减少金圆券的冲击，纷纷自行发行地方券、辅币券，拒用金圆券。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决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海关进口税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谓“关元”为计算单位，货物税中，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规定征收实物，盐税除征收实物外，规定政府“得办理一部分官收官运”；中央政府停止对各省市县财政的补助，将原属中央政府的田赋税三成及烟酒税、特种营业税划归地方；允许银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圆券为本位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不断提高，加上原材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歇业。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

只有 20%，青岛 1000 余家工厂只有 25% 能维持半开工状态，重庆机器制造业 150 家工厂到 1949 年 2 月已停业者达 60 余家。

国民党政府为了满足进行全面内战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对农村实行沉重的田赋征实、专买政策和统购政策，在农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广西省 1949 年的征税率比上年度增加 70%，征兵额由上年度的 6 万名增至 13 万名。在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各种暴政的压迫下，使得广大农民缺少必要的生产资金从事再生产，大批青壮年被抓当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农村劳动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8 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耕畜减少了 15~20%，主要农具减少了 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 20~40%。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产量连年下降，1948 年比 1946 年减产 40% 以上。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呈总崩溃的局面。

（三）政治形势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经济上面临总崩溃局面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其统治区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为了求生存、争自由，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学生、教职员、工人举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继成立了各级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1948 年 11 月 14 日，厦门 9 家报馆的员工实行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 月 3 日，重庆市 1000 余名布业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9 年 2 月，广西柳州铁路机务段和水电厂工人先后 4 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局补发工人的薪金；2 月 16 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业公司等 6 大公用事业公司工人举行全体大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给食米。

各地大、中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纷纷成立各种组织，组织

罢教、罢课。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学教师罢教，25日，又有1.7万余名私立中、小学教员实行总罢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学举行总罢教斗争；11月19日，武汉大学、武昌体育专科学校及华中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举行“活命拍卖会”，忍痛贱卖衣物，武昌体专师生还组成“要命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示威请愿；12月2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军侵驻中国；1949年3月10日，重庆市立各小学教师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政府按实际生活指数发薪，配给实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学、大学的教职员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增加工资，17日，又有4000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增加公费，增加配给；3月30日，广西大学1000余名师生员工高喊着“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包围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桂林分行，迫使银行当场支付了拖欠的工资等款项。

在农村，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斗争的不断深入，各种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也孕育而生。如广西农村组织了贫雇农会、反“三征”小组、“解放同志会”、“革命同盟会”、“逃兵会”、“反三征斗争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兄弟会”、“姐妹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经常伏击国民党保安部队、区乡公所，惩治反动的税收官员、乡保长，抢夺他们的武器、粮食。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间的倾轧愈演愈烈，已呈四分五裂之势。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稳，连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亲信也对前途丧失了信心。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布雷在南京自杀；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最早的“理论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要决策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及总统府国史馆馆长戴季陶在广州自杀。1948年11月16日，刚刚组成不到半年的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国民党政府第一届“行政内阁”，

向蒋介石提出“辞呈”。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许多人看到蒋介石统治的覆灭已不可避免，无人敢接翁文灏的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只好逼迫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并令孙科尽快组织新内阁，但孙科在邀请国民党内一些核心人物担任内阁“阁员”时，一再遭到拒绝，孙科张罗了近1个月后，才于12月20日勉强组阁完毕。12月下旬，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首先向蒋介石发难，逼蒋下台。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会议长等，也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由李宗仁执政。同时，李宗仁、甘介侯也提出蒋介石下野的要求。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承认：“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①“看到在最近数月来他怎样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以及要他退休的希望是如此广泛，实在使人痛心。这种情绪为政府中各级官员多数共有，而在政治觉悟地人民中则几乎是普遍的。”^②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在南京任代总统后，行政院长孙科等一批蒋介石的亲信根本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发布的命令，没有哪一项能够得到执行。1949年2月5日，孙科自行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不久，立法院也随之离开南京，仅少数立法委员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南京、广州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虽然在李宗仁的再三说服下，孙科于2月28日返回南京，但不久即于3月7日提出辞呈。李宗仁几经考虑之后，决定由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但被何拒绝，经李宗仁再三恳请，何才勉强答应出任行政院长之职。整个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页。

^② 同上书，第910页。

二、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的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一）军事形势

在过去两年半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 and 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面积达 261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27%；人口约 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42%；拥有县以上城市 776 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总数的 38%。人民解放军的战线已推进到长江北岸。

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相比，不但在质量上早就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经过三大战役，广大指战员积累了更加丰富的作战经验，士气更加高涨。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 127 万人增加到 358 万余人。其中，野战军达 56 个步兵纵队 180 个师（旅），2 个特种兵纵队，2 个炮兵指挥所，2 个炮兵旅，共 50 个炮兵团，3 个骑兵师共 10 个团，1 个装甲兵指挥所，4 个装甲兵团，1 个工兵指挥所，5 个工兵团，共 218 万余人。

在 218 万野战军中，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北野战军有 7 个步兵纵队 19 个旅，2 个骑兵师共 6 个团，1 个炮兵团，1 个工兵团，共 15.6 万余人；位于河南商丘、漯河地区休整的中原野战军有 9 个步兵纵队 26 个旅，1 个特种兵纵队共 5 个炮兵团、1 个工兵团，共 38.9 万人；位于江苏徐州、海州地区休整的华东野战军有 16 个步兵纵队 49 个师，1 个特种兵纵队共 13 个炮兵团、1 个工兵团、1 个装甲兵团，共 55.1 万余人；位于北平、天津地区休整的东北野战军有 13 个步兵纵队 52 个师，1 个工兵指挥所又 2 个团，1 个高射炮兵指挥所、2 个地面炮兵指挥所，共 23 个炮兵团，1 个装甲兵指挥所共 3 个团，共 81.8 万余人；位于北平、太原地区休整的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有 11 个步兵纵队 34 个旅，2 个炮兵旅共 6 个炮兵团，共 26.5 万余人。

地方部队有5个一级军区,2个二级军区,29个三级军区,110个军分区,共38个步兵师(旅),5个骑兵师共20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计134万余人。其中西北军区9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二级军区、3个三级军区、17个军分区,共5.5万余人;中原军区8个步兵旅61个团、1个骑兵团,1个二级军区、6个三级军区、34个军分区,共22.9万余人;华东军区4个步兵师62个团、1个骑兵团,5个三级军区、26个军分区,共42.7万余人;东北军区11个步兵师63个团、5个骑兵师18个团,6个三级军区、9个军分区,共39.9万余人;华北军区15个步兵师(旅)45个团,9个三级军区、24个军分区,共22.4万余人。

由于不断将缴获的武器装备补充自己,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据1949年1月不完全统计,全军拥有各种火炮2.08万门,其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重型火炮达1934门,高射炮161门,分别比战争第二年底增加1.08万门、955门和103门;火箭筒863具,比第二年底增加356具;各种枪131.6万余枝(挺),其中冲锋枪8.3万枝,轻机枪5.9万余挺,重机枪1万余挺,高射机枪263挺,分别比第二年底增加20.5万余枝(挺)、4.4万余挺、1.3万余挺、3421挺和165挺;坦克313辆,比第二年底增加267辆;装甲车139辆;飞机103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各省的游击武装,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49年1月不完全统计,总兵力已发展到5.3万余人,拥有长短枪3.9万余枝,轻重机枪870余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具体分布情况是:活动于江苏南部和浙江、江苏交界处的有350人;活动于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和苏皖浙边境地区的有2620余人;活动于浙江南部、西部、闽东北、闽中、赣东等地区的有2300余人;活动于闽粤赣边境共24个县的有7000余人;活动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41个县的有1.3万余人;

活动于广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地区共 24 个县的有 8000 余人；活动于以广宁、怀集为中心、西江以北、粤汉铁路以西、桂林以东 80 余个县的有 3000 余人；活动于西江以南地区 11 个县的有 3500 余人；活动于广东南路及桂东南 16 个县的有 4000 人；活动于海南岛地区的有 7200 余人。这些游击武装，在国民党军后方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主力与国民党军举行战略决战期间，纷纷向国民党军发动攻势作战。如海南岛的游击武装，在 1948 年 9 月至 11 月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 626 人，缴获轻重机枪 11 挺，摧毁国民党军据点 42 个。云南南部地区的游击部队，在 1948 年 11 月中旬至 1949 年 1 月中旬的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 3 个半营共 700 余人，缴获六〇炮 3 门，轻重机枪 45 挺，步枪 500 余枝，炮弹千余发，子弹 6 万余发，使原来被分割的滇东南、滇南、滇东 3 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已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力量。

（二）经济形势

与国民党统治区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反，解放区的经济蒸蒸日上，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在农村，《土地法大纲》颁布 1 年来，解放区约有 1 亿以上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到 1948 年底，东北解放区和关内老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也已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废除了统治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真正摆脱了数千年来的封建枷锁，普遍分到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得到了房屋和生产工具，从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鼓励农民劳动致富。确定与巩固农民的财产私有制，实行公平合理的负担政策，制定生产奖励政策，并

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互助合作组、社。据冀中解放区 18 个县的统计，1948 年互助组已发展到 3.5 万个。为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各级民主政府向农民发放大量的贷款，解决农民缺少生产资金的困难，如东北行政委员会 1948 年共向各地发放耕畜、移民、水利和特种作物等项贷款 150 亿元。在农村普遍推广和提倡开垦荒地，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种子。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和措施，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单产和总产量普遍提高。1948 年，东北解放区除原有耕地全部种上庄稼外，还新增开荒地 77 万余亩，超过原计划的 25.6%；兴修水田 9 万余晌，超过原计划的 1 倍，粮食总产量达 1187 万多吨，比 1947 年增加将近 1 倍。

解放区的工商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指导下，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许多工矿企业由盲目生产、分散经营，逐步走上统一领导的有计划的生产经营，并逐步实行企业化与科学化的经营管理。同时，在工厂中设立管理委员会，实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在职工中开展广泛的生产竞赛运动，奖励劳动模范，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所有这些，对解放区的国营工业生产，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48 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对其管辖的工矿企业投资及贷款达 3559 亿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年生产原煤 540 万余吨，完成计划的 108.2%，比 1947 年增长 123%，赤金 5.5 万余两，完成计划的 110%，发电 3.6 亿度，木材 148.5 万立方米，纸张 6598 吨，棉纱 3.7 万余件，棉布 62 万余尺，水泥 1.7 万余吨，食盐 35 万余吨。

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销售业务和销售量不断扩大。1948 年，华北解放区在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领导下，建立华北贸易公司，并在地区内各主要城市、县镇设立了分支机构；东北解放区也成立了东北贸易部，在全区共建立

商业网点 637 个,有职工 3 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1947 年与 1948 年相比,东北贸易部的粮食销售量由 10.9 万吨增加到 25.8 万吨,纱布的销售量由 25.9 万匹增加到 35.5 万匹,煤的销售量由 1.9 万吨增加到 14.7 万吨。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各种合作社,据 1948 年 11 月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共有合作社 2224 个,其中农村供销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有 1845 个。此外,东北解放区对苏联的贸易也有较大的增长,其中出口总值由 1947 年的 285 亿元增加到 1948 年的 656 亿元。

各解放区还十分重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1948 年 11 月,石家庄的私营工商业由解放前的 2296 户增加到 3532 户,其中商业由 1571 户增加到 2136 户,工业由 725 户增加到 1396 户,增加 92%。天津市的私营工厂,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解放后两个月,即有 90%以上开工生产。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财政状况的好转和物价的基本稳定。1948 年,解放区在货币制度方面,初步完成了统一工作。长期以来,由于各解放区处于国民党严重封锁与分割的环境下,在货币制度上不得不采取分区发行,分区流通的方针。随着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迫切需要统一货币制度,但由于各解放区行政、财政统一程度的不同,加之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不可能立即将全国解放区的货币完全统一起来。因此,采取了逐渐统一的步骤,首先在各解放区内部实行货币的统一,即各大解放区的货币,首先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并逐步统一使用一种货币。在东北解放区,长城币和关东币停止发行,3 种货币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并逐步取消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东解放区,华中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币;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币停止发行,以西北农民币为主;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币;华北解放区,停止发行晋察冀边币,晋察冀边币、冀南币混合流通,以冀南币为主。

在上述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各解放区间的贸易,交流物资,

繁荣经济，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11月18日，华北、华东和西北各解放区政府协商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从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作为上述各解放区的本位币，统一流通，原有旧币停止发行，逐步收回。12月24日，华北和中原两区又达成协议，规定从1949年2月15日（实际从3月10日）起，中原解放区也正式发行人民币，停止发行中州市。至此，除东北解放区外，其他各解放区都实现了货币的统一。金融货币的统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经济基础。

随着解放区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兵工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49年3、4月不完全统计，全国各解放区共有兵工企业160家，有员工10.2万余人。其中华北解放区54家，东北解放区49家，华东解放区37家，晋绥解放区14家，中原解放区6家。在上述企业中，有迫击炮弹厂51家，山野榴炮弹厂10家，炮弹附属厂12家，炸药厂19家，枪炮厂7家，子弹雷管厂10家。此外，还有一些为兵工生产服务的原料半成品厂及发电厂等。月产步枪2643枝，轻重机枪130挺，冲锋枪360枝，步兵炮14门，山炮5门，野炮8门，迫击炮1050门，各种迫击炮弹44万余发，复装山炮弹4万发，改造步兵炮弹1.5万发，生产步机枪子弹447.9万发至470万发，手榴弹125万枚。兵工生产的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三）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线和经济战线取得伟大胜利和成就的同时，在政治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已有党员300万余人。经过1948年的整党运动，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民主作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组织上将那些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流氓投机分子清除出党，纯洁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全党进一步团结在中共

中央的周围。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同时，经过接管石家庄、洛阳、济南、徐州、长春、沈阳、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了较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这些，为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西南地区进军，接管新区提供了保证。

解放区的各级政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继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1949年初，中原解放区召开了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邓子恢担任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东北行政区域划为6省4直辖市，即原辽宁、安东省合并为辽东省；原辽北、辽西省合并为辽西省；原嫩江、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原合江、松江省合并为松江省；吉林省和热河省不变。直辖市有沈阳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8年秋季到1949年3月，老解放区普遍召开了乡（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三级政府委员会。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进一步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保证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改善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推动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从1948年秋至1949年1月，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共350余人，陆续进入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对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

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①随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会等，也纷纷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直接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秋到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人民团体的队伍迅速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开始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于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仅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各解放区职工会，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劳动协会，及各地民主工会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了以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的第6届执行委员会。1949年上半年，全国的妇女、青年、学生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先后在北平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这些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一致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330页。

表会议筹备会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议、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家代表会议的发起人会议、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等，也相继在北平举行。上述全国性人民团体的组成和全国性会议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之一，也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打下了群众基础。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计划

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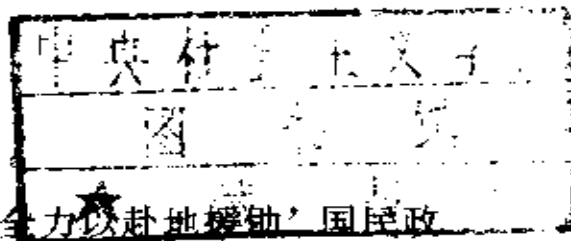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战略决战开始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辽沈战役结束后，美国驻华使馆召开联合军事顾问团和各兵种武官会议，讨论中国内战的军事形势。11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马歇尔，称：“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①12月3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说：“南京的军事力量竟崩溃得这样快，以至于许多权威方面现在相信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是一件已经失败了的事情。”^②美军《关于1948年军事发展的情报总结》中称：“过去一年中特别是最近四个半月的事态发展结果，国民党军队遭到损失之惨重，使其军事地位已下降到没有可能独立恢复的地步。另一方面，同样的事态发展使共产党的地位大大上升，能力大大加强，现已有能力对国民党军队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③

根据中国内战情况，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其对华政策，开始考虑改变政策。1948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了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该文详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历史、资源、社会矛盾，以及国民

① 《中美关系史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2月版，第906页。

② 《人民日报》1949年1月23日。

③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第196页。



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后认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政府不能这样拿美国的声誉和财力去赌博”，“中国目前的局势发展对我们不利，因此我们需要自由改变航向，或者哪怕是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为止。”同时，文件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因素等原因，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标志着他们麻烦的结束，即使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内战可能继续。”并将会遇到诸如管理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工业化，民族问题等等的麻烦和困难。而苏联则不大可能给予很多的帮助。这样，当中国共产党遇到上述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时，特别是与苏联的矛盾加深时，美国的机会就会到来。

基于上述认识，文件认为，美国的“传统目标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项实际政策，在可见的将来指导我们渡过中国的迷津。”据此，文件提出了“在可见的将来的对华政策”，即：

“1. 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

2. 在国民政府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消亡之后，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

3. 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①

当辽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于1949年1月11日提出了对华政策建议书，指出：

“1. 美国的对华目标是，让中国人自己最终发展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国家，以防止由于任何一个外国统治中国而造成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2. 美国应当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看得见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集团都不大可能建立一个美国能接受的统一、稳定和

^①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第452页。

独立的中国。

3. 因此，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当：

(a) 制定相应计划并适时作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

(b) 在先后次序上，把中国排在另外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①

1949年2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了上述两份建议书，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具体措施。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称：美国“目前应该：（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2）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3）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4）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磨擦。”^②

根据上述政策，1948年11月12日，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于11月9日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支援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③等三条要求。1949年1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27日又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出的，并得到50余名参议员支持的关于以15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提议。

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失败

^①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页。

^② 同上书，第196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01、第902页。

已成定局，美国给予再多的援助也将无济于事，因而准备放弃援蒋。在政策上由“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①

但是，美国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决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对中国革命，只是在反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上有些变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②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开始后，魏德迈曾要民社党的负责人之一的蒋匀田带口信给蒋介石，建议国民党政府在徐州失守后，退保中国东南及台、澎地区，守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同时尽可能试守四川。魏德迈并告之，美国海军将固守青岛基地，以支持平津地区的傅作义守军，使之牵制中共军队，延缓其南下，以便国民党政府有时间部署东南地区的防务。为此，美国政府于10月间增调第36特种舰队至青岛，使美国驻青岛的海军实力达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人数增至9700人。11月，美国又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中国。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11月17日说：“美国加派一千二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赴华后，将使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总数达到四千八百五十人。此乃美国海军陆战队现时在外国土地上最大的一个集中力量”。^③ 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美国政府还打算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1948年12月10日，美国西太平洋海军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上海正式宣布，即将以运输舰载送海军陆战队至沪，声言：“在沪市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借口

①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4页。

③ 廖盖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新策略》，《人民日报》1949年1月23日。

“美侨生命财产受威胁”而随时“登陆”上海。^① 1948年12月，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来华访问前夕，美国政府曾举行对华政策的会商，决定“在华南华中扶植军阀制度”。霍夫曼来华后，也就此事多次与司徒雷登和蒋介石进行密谈。

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虽然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和麦卡伦等人继续增加对华援助的要求和提案，但并未完全停止运送“1948年援华法案”剩下的6000万美元的“特别赠款”（即军火）。1948年11月至12月间，美国运交国民党政府的军火，每周达到400万美元。1949年1月底，巴大维、魏德迈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停止向国民党政府运送武器。2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通过一项提案，请总统向国会建议暂停对国民党援助项下的一切军火供应，但杜鲁门总统否决了上述建议和提案，决定“为了不给反共的中国人泄气，不停运军火，但也不采取催运措施”。^② 3月1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杜鲁门的支持下，给康纳利送去一份备忘录，在拒绝麦卡伦关于增加15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建议的同时，指出“美国对于它继续承认的中国政府管辖区域，不应突然停止援助。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政治协商的结果在内，却还不能确定。所以，我们现在考虑请求国会将1948年援华法案的期限予以一定期限的延长。”^③ 1949年4月3日，“援华法案”到期，但尚有5400万美元的款项尚未支付。1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务院要求延长该“法案”的议案，明确表示“国会的新法案授权总统按照他所决定的方式与条件，运用这项经费，对于中国的没有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予以援助。此外，并且使运用这款项的期限延至1950年2月15日以前”。^④

① 廖盖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新策略》，《人民日报》1949年1月23日。
②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78页。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页。

美国政府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同时，加紧进行“换马”活动。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已不是理想的工具，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于美国在华利益来说已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了尽可能地保持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政府准备中途“换马”，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11月15日，美国驻沪总领事致函马歇尔说：“对目前这种绝望的形势，蒋介石要承担责任。他必须走开。”^① 美国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透露，美国政府中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人士认为，蒋介石应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位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还有人向顾维钧透露，美国政府意属李宗仁，正在让人写李宗仁的履历。美国国务院也一再传出消息，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国政府增加援助。

与此同时，美国直接与李宗仁接触，1948年11月下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作了一次长谈。李宗仁表示，蒋介石“继续在位与国家利益是极不利的，也不符合人民的愿望；美国政府的态度对他影响极大。应该告诉他，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为政府和国家的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开辟一条途径，那么他就为他的人民做了件大好事。这个新的领导需要美国毫不含糊的支持。这样，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李宗仁并进一步指出：“如果目前的形势任其发展下去，他将失去任何政治影响”。到时，“除了回广西老家，他将无所作为”。随后，司徒雷登向马歇尔建议美国政府“发表一项澄清对华政策的声明”，表示应毫不含糊地支持新的、但非共产党的政权，这样就能在“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时，还能拯救中国的西南地区，至少使之暂时不滑入铁幕之后，或无论如何也要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和共产党的未

^①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5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版，第224页。

来谈判中加强他们的地位”。^①

12月13日，司徒雷登会见张群时明确表示：“曾和我交谈的多数美国人的印象确实是认为：广大中国民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蒋委员长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12月17日，司徒雷登在与孙科谈话时说：美国处于两难的困境，“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并急于在中国帮助制止此种蔓延；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这样做”，“如果劝告总统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那对于总统是有好处的，要是这是过于难堪的话，则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最少是表达人民的意旨的一小群人。这并不必牵涉到总统辞职的问题，不过权力的委托应该是完全的与真正的。”^②

12月中旬，霍夫曼来华，除了扶植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外，还策动国民党“向人民解放军提出停战议和，因而从胜利者的人民解放军手中夺取主动权，给受创伤的国民党以喘息的机会”。^③12月26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公报》杂志也说：“南京可能组成比较自由主义的政权，从而和共产党谈判和平成立联合政府，这种发展可能平衡共产党的力量，借以防止极端主义的政策，并且保护对我们友好的中国人。”^④12月30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致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蒋介石“非走开不可”，然后组成一个“体面的、得人心的和生机勃勃的政权”，使其“处于更好的讲和的地位”，以“实现某种较好的和平条件。”^⑤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

①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5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版，第226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08、第909页。

③ 廖盖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新策略》，《人民日报》1949年1月23日。

④ 同上。

⑤ 《美国对华关系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第458页。

一篇“求和”的“新年文告”后，司徒雷登对中央社记者说：这是他本人“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①

美国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舆论界，还准备实行“内部破坏”的阴谋，他们设法拉拢一部分与中外反革命势力有联系的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指示他们钻入革命阵营，组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有效的反对派”。1948年12月13日，霍夫曼在上海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如果自由分子和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国可能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11月17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说：“由于某种新的反蒋联合政府不久即将在中国形成，国务院刻正寻求与任何蒋被迫下野后可能出现的新政权交朋友的方法。这种希望更多地集中于那些似乎一定会在任何新政府中显赫起来的军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身上”。被公认为时常反映美国国务院政策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更露骨地说：“中共统治中国，反对派必甚多，反共力量可以东山再起”。12月17日，该报在题为“中国紧张局势的高潮”的评论中说：“美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资选择，只有让事情自然地发展，直到以形式合宜的政府去换掉共产党政府的机会出现为止。……美国应当寻找共产党政权中弱点的迹象，准备帮助中国共产主义的敌人。”^②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无可挽救，其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已无能为力，遂准备放弃援助蒋介石政府。其政策由阻止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调整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另一方面，它又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希望通过“有限的援助”，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尽量帮助国民党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以保持其侵华利益。同时，准备在国民党政府失败后，实施从内部破坏的阴谋，支持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反对中国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09页。

^② 廖盖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新策略》，《人民日报》1949年1月23日。

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

1948年12月中旬，蒋介石曾两次找李宗仁，表示准备“即时引退”，希望李宗仁“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在遭李宗仁拒绝后，蒋介石又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人前去劝说。经再三会谈，李宗仁与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人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这项非正式协议由吴忠信带回给蒋介石，同时由程思远用长途电话告知桂系另一首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当即表示：“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并说，对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子并进一步逼蒋下台，白崇禧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说：“（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

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①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等，也先后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平谈判。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还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②1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李宗仁家，再次要求李宗仁出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蒋直言不讳地对李说：“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这样，“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③1月8日，蒋介石又派张群约黄绍竑自南京飞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蒋引退之事。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也做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姿态，电邀邵力子由上海到南京商谈。1月4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向文化新闻界谈了和谈的有关问题。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1949年1月5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相继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以及《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提出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上述形势下，蒋

①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6、第77、第78、第79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335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545页。

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①随后，蒋介石由南京回到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正式“引退”。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于22日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并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商谈。同时，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全国政治犯；废止特刑庭；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启封停刊报纸。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

与此同时，李宗仁积极筹划和谈事宜。1月23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9日，黄启汉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与叶剑英等人谈话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开了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谈，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4位七旬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

^① 《李宗仁回忆录》，第650页。

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又要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22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谈了对和谈的态度。27日，颜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再次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团成员。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并非真的愿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蒋介石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以借此机会取得喘息的时间，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征集新兵，编组第二线兵团，伺机反扑。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说，他的父亲当年所以决定引退，是因为考虑到下面3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引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① 蒋介石在1949年新年文告中提出和谈的条件是：“神圣”的宪法不受侵犯，“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② 蒋介石在引退前，曾召集陈立夫、谷正纲、彭昭贤等10余人会商，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时间，在江南练出50万军队。并决定由蒋介石保持对“和平”运动的统一领导，受领导者概予保护，不受领导者授权国民党特务机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123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335页。

关中央调查统计局予以“制裁”。3月初，张治中、吴忠信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和谈问题时提出：“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蒋介石表示完全同意，并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①3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战需在和谈开始前实现；国体不容变更；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等5条和谈的基本原则。4月2日，蒋介石命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指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谈判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他上台后要急待处理的要务是，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李宗仁还对刘斐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②李宗仁在同唐生智谈话时也说：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白崇禧也多次对黄启汉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③并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1月14日，白崇禧在武汉招待国民党政政府立法、监察委员和地方绅士时说：“我们必须认清时局的严重性，更须深切了解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仍应各守岗位，各尽其责，提高警觉，不稍懈怠”。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条和平谈判的

① 张治中《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第6页。

② 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3页。

③ 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32页。

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疆而治；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①

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请求美国政府提供 10 亿或至少 5 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

总之，蒋介石、李宗仁所发动的“和平”攻势，都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但蒋介石希望在划江而治后，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新积蓄力量，伺机向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扑，在全中国恢复其反动统治。而李宗仁等人则希冀于在划江而治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巩固桂系的地位，完全取代蒋介石，在江南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三、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准备

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和平”攻势的同时，继续加紧进行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1948 年 12 月 25 日，刚刚当选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吴铁城在招待美国合众社记者时称：新政府唯一目标为继续对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在 1949 年元旦文告中，诬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并声称：“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② 2 月 13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称“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①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3 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1 册，第 335 页。

“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①国共两党决定进行和平谈判后，国民党宣传机构仍继续进行战争叫嚣。3月3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发出宣传指示，声称：“吾人不能承认今日之失败为中国反共斗争之最后失败，”^②必须继续奋斗。

蒋介石在下台前夕，为继续进行战争作了部署，指派其亲信嫡系担任各地的军政要职。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月18日至21日，蒋介石先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警备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命朱绍良为主任，并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命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指定胡宗南负责筹划陕南及川北地区的军事作战，以此加强对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控制，阻止人民解放军向上述地区的进军。同时，蒋介石还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到上海间的长江防务，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

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建立了37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控制党政军大权，使李宗仁发布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一项也实行不了。1月21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给各军军长的命令中称：“总统离京赴杭，事先有计划步骤，政治方面交由李副总统及孙院长负责，军事方面由总长负责，经济军事均有充分准备。共党如无和平诚意，决与作战到底，以求最后胜利。”^③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特别紧急宣传通报》中也说：“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413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336页。

③ 《人民日报》1949年1月31日。

裁地位继续领导本党致力革命。本党同志更须共同精诚接受总统之指示。”关于和平问题必须“研究总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声明，以为言论之基准”。^① 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指示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会后，蒋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26日，蒋介石自奉化致函在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29日，顾祝同给各部队下达了应付时局的密令：应下最大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自救、自卫之战争；军队最近作战重点，在于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要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的战术；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争取在短期内变成劲旅；加紧维护后方治安秩序，肃清地方散匪，取缔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特别注意激励部队士气。

李宗仁上台后不久，即召集国防部有关人员召开江防紧急会议，讨论江防计划。3月31日，即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宋希濂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剿总”各部队严密防范人民解放军南渡，并决定了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同时，考虑到长江以南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会议同意国防部的建议，将驻新疆近10万军队东调。会后，国防部多次电催新疆驻军加速东调。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但从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3月，李宗仁还多次到汤恩伯在上海举办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上讲话，他说，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则没有，共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

^① 《人民日报》1949年2月3日。

地区长久作战，因此，我们要在上海守 6 个月到 1 年是不成问题的。又说，国际局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白崇禧也曾对黄绍竑说：共产党如果逼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1 月间，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所谓“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实施构筑上海地区的现代化防御设施。3 月间在上海举办“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恩伯自兼主任，研讨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2 月 22 日，重庆绥靖公署在重庆召开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及重庆市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 18 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 月 9 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 200 万。

为加紧编练部队，至 1949 年 4 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 14 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组训新兵，企图将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 350 万至 500 万人。

国民党政府不仅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且还继续进行战争活动。国民党空军飞机不断轰炸解放区城镇，据不完全统计，自 1 月上旬至 2 月中旬，国民党空军飞机连续轰炸了济南、徐州、濰溪口、廊坊、北平南苑、朝阳门、天津唐官屯、湖北随县等地。炸毁房屋 300 余间，伤亡和平居民 200 余人。国民党特务也继续进行恐怖活动，镇压爱国民主运动。1949 年 4 月 1 日，南京军警特务向真正要求和平，欢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的中央、金陵等 11 所专科以上院校的 6000 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当场死

2人、重伤11人、轻伤80余人，失踪几十人的惨案。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继续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也意识到依靠其现有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其在大陆的失败已无法挽救，遂作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的准备。企图以台湾为基地，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反攻大陆，重新夺取政权。为此，蒋介石在“引退”前夕，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元运往台湾，并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1948年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加紧撤退的紧急讨论会”，命令京沪、浙赣、粤汉各铁路车辆及招商局轮船加紧撤退人员、物资和文物档案至台湾、广州及华南其他地区。至1949年2月底，国民党政府90%的机关及80%的人员已经撤离南京；国民党的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勤总部的若干部门和大批参谋人员已撤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台湾建立了总部；汉阳兵工厂和南京4个工厂的设备，亦由专轮运往台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国、交通两银行总行，亦在香港、台湾等寻找房屋，准备撤离上海。就连蒋介石本人的大部家庭杂物、文件及3辆“白卡尔”汽车也已运到台湾；何应钦、桂永清、周至柔、陈立夫、徐永昌、汤恩伯、胡宗南、顾祝同等人的眷属也已逃到台湾。位于西安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将其主要物资、文件、军火、军官眷属和后勤机关、医院、兵工厂撤至汉中、成都、贵阳等地，部队也由关中地区逐步向陕中、汉中撤退，并准备退入四川。

总之，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面前，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一次玩弄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企图以此达到“划江而治”。但是，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第三节 中共中央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

一、中共中央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中，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阴谋及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的企图。明确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和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借古代希腊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①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7、第1379页。

内指示。指示分析了全国的战争形势，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人有待我们去消灭，尚有许多地区有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要求“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指示还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美国政府实施“内部破坏”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①

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的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1～第473页。

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报告及会议作出的决议，不仅对夺取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建设新中国，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对于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评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帮助支持下，自1946年7月到今的两年半内，发动反革命内战，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明确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之际，蒋介石提出的和平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因为蒋介石在建议中提出的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条件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还指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

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最后，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要求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①

李宗仁上台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举行和平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了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以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1月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连续接见了李宗仁派出的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向他们表示，希望李宗仁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的电中，要叶剑英转告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②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会见了由李宗仁派出的“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和谈代表人选和谈判地点准予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双方确认，谈判与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国共产党1月14日声明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正式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8、第1389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811页。

始，双方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解放军渡江交换意见，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4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如果南京政府真有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① 评论正告南京政府，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因为无论南京政府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

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协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在此期间，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旦谈判破裂，立即实行战斗渡江，向全国进军。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5、第1446页。

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人民解放军: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遵照上述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江南广大地区和西北的伟大进军。美国政府和国民党的“划江而治”,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企图终于破产。

二、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任务、部署和方针

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了1949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首先,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①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6页。

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①

其次，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要执行工作队的任务，建设新区。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将“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②因此，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身上。对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因为南方乡村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③

第三，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中共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指出：1949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调整或建立军火工业和其他军需工业，确立军械制度，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6、第4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5、第1426、第14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6页。

统一规定各种供给标准，统一分配卫生和通讯器材，作好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确定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中央军委政治部的领导下，总结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建立和恢复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党支部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并制订相应的条例或章程，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军普及。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中共中央在赋予人民解放军1949年任务的同时，还指出了到南方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中国共产党则有极大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和1927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队。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的组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军队的给养在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较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将上述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向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讲清楚，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100多万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但“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①同时，也应注意和学会运用北平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前者就是像对待北平傅作义部那样，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者就是像对待绥远的国民党军那样，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利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的情况，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向南方进军过程中，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中央军委还规定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过程中的政策，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了约法八章：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早在1948年12月中下旬，中央军委即开始酝酿研究这一问题。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提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休整2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1个月至2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

南、平汉路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大约在明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省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东北野战军在平津战役结束后，休整2个月，然后于5月沿平汉路南下，6、7月举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8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省一部，夺取武汉、岳阳、长沙、常德、宝庆、衡阳、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第二步夺取两广。华北军区3个兵团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协力夺取太原，然后以第2、第3兵团夺取绥远、宁夏，与西北野战军会合；第1兵团则早日与西北野战军会合，先肃清兰州、潼关线上及其以南、以北之国民党军，夺取潼关、西安、天水、汉中诸城，然后入川。毛泽东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24日，毛泽东又将上述电文发给林彪、罗荣桓，并明确指出：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全军休整2至3个月，然后以中原、华东野战军出江南，东北野战军出湘鄂赣，西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3个兵团出陕甘川。或可考虑以华北军区3个兵团都出陕甘川，抑或以2个兵团出陕甘川，以1个兵团随东北野战军第一步出湘鄂赣，第二步出两广。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于1月12日致电粟裕、陈士榘和邓小平、张际春，指出：华野、中野休整时间现定2个半月，由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五期。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①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2月12日、15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井泉：华北军区3个兵团应争取于3月中旬解决太原、大同问题，然后休整1个月至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3页。

1个半月，再以3个兵团或2个兵团向西安出动，会同西北野战军彻底解决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集团。3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华东、中原野战军决于4月10日在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发起渡江战役；东北野战军“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①该野战军先头2个军应于2月25日以前出发，主力应于4月1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4月1日至15日的半个月內，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5月31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

5月23日，依据渡江战役的发展情况，中央军委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具体部署：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争取在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明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二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四川、贵州、西康3省（后又加上云南共4省），争取在年底或年底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向福建、浙江进军，负责经营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诸省，并且准备解放台湾；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解放并经营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争取11月或12月底前占领两广。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18、第19兵团（原华北军区第1、第2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18页。

为了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于5月28日发出指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因此，“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①为此，除以第二野战军位浙赣路沿线休整，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对宁、沪进犯的帝国主义武装；以第20兵团（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第四野战军炮兵主力，在秦皇岛、塘沽布防，第19兵团在会合第18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主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集团在陕甘边境的主力后，留在宝鸡、凤翔地区待机，准备增援华北；第三野战军以1个军附必要数量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任青岛守卫，并应加强吴淞、江阴地区的炮台设施；第四野战军以1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华北。

在部署向全国进军过程中，毛泽东还对处理香港、澳门和台湾、西藏问题作了通盘考虑。早在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回答西方记者关于中共对香港问题态度的提问时就指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②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派来中国的代表米高扬会谈中指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

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放它更需要时间。^①

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和部署，在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残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进军。

第四节 进行进军的各项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指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即开始进行向全国进军的全面准备。

一、全军整编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规定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下列各项的统一规定：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

野战部队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不再称旅；地方部队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不再称师；游击部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野战部队自军、师、

^①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1页。

团直到营、连、排、班，地方部队自旅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特殊情况亦可按军辖两师，师（旅）辖两团，团分为大团、小团的临时编制；游击部队的编制则视情况自定。不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还是游击部队，团和军分区以上各部队的正式名称，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2. 野战部队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

依情况需要，军及独立师，或分隶于兵团，或直属于野战军。兵团一般分隶于野战军，但亦得受军委指挥。在必要时，兵团、军或独立师，亦得划归军区指挥。野战军和兵团所辖军、师数目，视需要和可能定之。野战军分为4个，以地区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兵团以现有的8个增至20个，即西北野战军为第1至第2兵团；中原野战军为第3至第6兵团；华东野战军为第7至第11兵团；东北野战军为第12至第17兵团；华北军区野战部队为第18至第20兵团。各兵团的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兵团。军由现有的55个（纵队）168个师（旅），增加至70个军210个师的番号。

按各野战军现有的纵队、师（旅）的数目，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1至第7军，师的番号为第1至第21师；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10至第17军，师的番号为第28师至第51师；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20至第35军，师的番号为第58师至第105师；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38军至第56军，师的番号为第112师至第168师；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整编为第60军至第70军，师的番号为第178师至第210师。剩余的军、师番号，留待以后新建部队使用。

特种兵中的骑兵部队，除直属于步兵师、步兵团的部队外，凡属战略骑兵，一律改称为骑兵师、骑兵团。骑兵师或骑兵团，按需要隶属于军、兵团或野战军，必要时亦可隶属于军区。炮兵部队，属于军以下管辖的部队不另编番号，野战军、兵团或军区直属部队，改称为炮兵师、炮兵团，并按军委规定的序号统一排列。

为利于炮兵部队休整时的集中训练，野战军或军区应设立炮兵司令部；野战军在条件具备时，应组织特种兵纵队，统率直属的炮兵部队、战车部队及工兵部队。

3. 地方部队的建制属于军区系统。

军区分为4级，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一级军区，共有5个，即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与中央分局同级并受其领导的为二级军区；与区（省）党委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三级军区；与地委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军分区。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均以所辖地区命名，如“豫皖苏军区”，“鲁南军区”，“三边军分区”等。地方部队的编制，由各一级军区自行规定，呈报军委批准施行；各警备旅、独立旅和独立团，全军不统一番号，由各一级军区自行排列。

4. 游击部队，不论在新区、在老区的边沿区，各当地军事指挥机关均应依情况需要和可能自行组织，然后向上级报告。

上述《规定》下发后，由于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部队正在与国民党军进行紧张的战略决战，没有时间进行整编，仅东北野战军于辽沈战役结束后在11月12日下达了整编命令，颁布各纵队、师的新番号，但由于紧接着进行平津战役，因此，实际上延至战役结束后才正式启用新番号。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指出：根据战争的发展，去年11月1日关于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合适，决定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指示，各野战军、各大军区于1949年2月开始相继进行整编。整编的具体情况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

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下辖：骑兵第1、第2师；第1军（由第1纵队改称），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辖第1、第2、第3师；第2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震，辖第4、第5、第6师；第3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许光达，辖第7、第8、第9师；第4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辖第10、第11、第12师；第6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辖第16、第17师；第7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彭绍辉，代政治委员孙志远，辖第19、第20师；第8军（由第8纵队改称），军长姚瑛，辖第22、第23师，不久，该军拨归华北军区建制。5月，由晋绥军区部队和华北军区独立第5旅分别组成第18、第21师，分别拨归第6、第7军建制。6月，组建第1、第2兵团，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下辖第1、第2、第7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参谋长张文舟，下辖第2、第3、第6军。兵团组成后，军的领导人相应作了部分调整。郭鹏任第2军军长，王恩茂任政治委员；黄新廷任第3军军长，朱明任政治委员；张达志任第4军军长；罗贵波任第7军政治委员。全野战军共15.5万人。

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副司令员孔从周；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王近山、杜义德，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后勤部部长刘清，辖第10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杜义德（兼），政治委员王维纲，辖第28、第29师；第11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辖第31、第32、第33师；第12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兼政治委员王近山（兼），辖第34、第35、第36师。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后勤部部长赵炳润，后勤部政治委员杨世荣，辖第13军（由第4纵队第10、第13旅及豫西军区部队组成），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辖第37、第38、第39师；第14军（由第4纵队第11、第22旅及淮海战役起义之廖运周师组成），军长李成芳，政治委员雷荣天，辖第40、第41、第42师；第15军（由第9纵队改称），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辖第43、第44、第45师。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政治委员张霖芝，政治部主任甘渭汉，后勤部部长吴机章，辖第16军（由第1纵队第1、第2旅及豫皖苏军区部队一部组成），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辖第46、第47、第48师；第17军（由第11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3旅等部组成），军长王秉璋，政治委员赵健民，辖第49、第50、第51师；第18军（由第1纵队第20旅及豫皖苏军区部队组成），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辖第52、第53、第54师。全野战军共28万余人。6月，将皖北军区独立师改称第30师，拨归第10军建制。

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下辖：教导师；军政干部学校，副政治委员张崇文；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副政治委员刘述周，参谋长叶超，政治部主任喻新华。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参谋长李希迎，辖第21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辖第61、第62、第63师；第22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孙继先，政治委员丁秋生，辖第64、第65、第66师；第23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陶勇，政治委员卢胜，辖第67、第68、第69师；第35军（由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和鲁中南纵队合编组成），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辖第103、第104、第105师。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

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谋长何以祥，辖第24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廖海光，辖第70、第71、第72师；第25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辖第73、第74、第75师；第26军（由第8纵队改称），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辖第76、第77、第78师；第34军（由淮海战役起义的何基沣部和江淮军区第34旅、独立旅合编组成），军长何基沣，政治委员赵启民，辖第100、第101、第102师。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谢有法，辖第20军（由第1纵队改称），军长刘飞，政治委员陈时夫，辖第58、第59、第60师；第27军（由第9纵队改称），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辖第79、第80、第81师；第30军（由第12纵队改称），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88、第89、第90师；第33军（由淮海战役起义的张克侠部和渤海纵队合编组成），军长张克侠，政治委员韩念龙，辖第97、第98、第99师。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辖第28军（由第10纵队改称），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陈美藻，辖第82、第83、第84师；第29军（由第11纵队改称），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辖第85、第86、第87师；第31军（由第13纵队改称），军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陈华堂，辖第91、第92、第93师。两广纵队番号不变，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全野战军共58.1万人。

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副参谋长曹祥仁，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下辖：特种兵司令部（由炮兵司令部改编），司令员萧华，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苏进、贾陶、匡裕民，副政治委员邱创成，参谋长苏进（兼），政治部主任唐凯，辖炮兵第1、第2师，战车师，高射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

参谋长解方。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第38军（由第1纵队改称），军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辖第112、第113、第114、第151师；第39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辖第115、第116、第117、第152师；第40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辖第118、第119、第120、第153师；第41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辖第121、第122、第123、第154师；第42军（由第5纵队改称），军长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辖第124、第125、第126、第155师；第43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辖第127、第128、第129、第156师；第44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辖第130、第131、第132、第157师；第45军（由第8纵队改称），军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邱会作，辖第133、第134、第135、第158师；第46军（由第9纵队改称），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辖第136、第137、第138、第159师；第47军（由第10纵队改称），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辖第139、第140、第141、第160师；第48军（由第11纵队改称），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辖第142、第143、第144、第161师；第49军（由第12纵队改称），军长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辖第145、第146、第147、第162师。野战军另辖骑兵第5师、第165师、整训第5师。全野战军共90万余人。

4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萧克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任副参谋长，同时成立了第13、第14兵团部。并对第12、第13兵团及各军的领导人作了适当调整。其序列是：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辖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第45军，军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邱会作；第46军，领导人不变。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

政治委员萧华，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辖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第49军，军长钟伟，政治委员徐斌洲。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第二副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辖第39军，军长刘震（兼），政治委员吴信泉；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欧阳文；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第二副司令员贺晋年，政治部主任萧向荣，辖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第44军，军长方强，政治委员吴富善；第48军，领导人不变；两广纵队（由第三野战军拨归），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辖第1、第2师。特种兵司令部由万毅任司令员，其余领导人不变。

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分别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辖俘训第1、第2旅；第60军（由第1兵团第8纵队改称），军长兼政治委员王新亭，辖第178、第179、第180师；第61军（由第13纵队改称），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辖第181、第182、第183师；第62军（由第15纵队改称），军长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辖第184、第185、第186师。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副司令员葛晏春，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辖俘训第1、第2旅；第63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辖第187、第188、第189师；第64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辖第190、第191、第192师；第65军（由第2兵团第8纵队改称），军长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193、第194、第195师。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延杰，副政治委员李天焕，政治部主任李志民，辖俘训旅；第66军（由第1纵队改称），军长

萧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辖第196、第198师；第67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韩伟，政治委员旷伏兆，辖第199、第200师；第68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辖第202、第203、第204师。3个兵团共23.8万余人。5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周士第接替徐向前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祖谅任第60军军长。6月初，李志民接替罗瑞卿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

此外，中央军委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拨归军委直辖，并改称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伟，参谋长李寿轩，下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

1949年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后勤部部长陈希云，后勤部政治委员刘海滨。下辖：陇东、黄龙、西府、绥德、关中、三边、延属、榆林等军分区；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兼），政治委员李井泉（兼），辖五寨、离石、雁北、雁南等军分区；绥蒙军区，司令员姚瑛（兼），政治委员高克林；晋南军区，司令员马佩勋，政治委员马明方。

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第一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58军（由桐柏军区部队编成）军长孔庆德，政治委员方正平，辖第172、第173、第174师；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辖独立师（由独立第1、第3旅合编组成），第1、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辖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干，政治委员刘建勋，辖独立第1、第2旅，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治委员汪锋，辖第12旅、第17师，第2、第4军分区（5月，陕南军区划归西北军区建制，第12旅、第17师组成第19军，改称第55、第57师，归第一野战军指挥）；河南军区（3月由豫西军区及豫皖苏军区一

部合并组成)，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李雪峰，辖南阳、确山、许昌、潢川、淮阳、陈留、商丘、郑州、洛阳、陕州等军分区。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舒同，副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副主任唐亮。下辖：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张云逸（兼），副校长余立金、刘清明；警备旅；后备兵团，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戴心宽、王彬，副政治委员龙潜，参谋长李学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辖第1、第2、第3、第4师。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兼），政治委员康生，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第一副政治委员傅秋涛，第二副政治委员向明，政治部主任王集成，辖第32军（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军长谭希林，政治委员彭林，辖第94、第95师；昌潍特区，司令员刘德胜，政治委员王众音；济南警备区，司令员廖谷标，政治委员刘顺元；徐州警备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张北华；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瑜，政治委员赖可可，辖警备第4、第5旅，东海、西海、北海、南海、滨北等军分区；渤海军区，司令员覃士冕，政治委员张晔，辖沧南、涿北、清河、垦利等军分区；鲁中南军区，司令员钱钧，政治委员高克亭，辖泰山、沂蒙、沂山、尼山、台枣、滨海、泰西等军分区。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政治委员肖望东，辖警备第9旅，泰州、扬州、南通、盐城、淮阴等军分区。苏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辖警备第6、第7、第8旅。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希圣，辖警备第1、第2旅，滁县、宿县、巢湖、安庆、六安、阜阳等军分区。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高岗，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陈奇涵，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下辖：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副政治委员吴溉之；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兼），政治委员吴溉之（兼）；工兵学校，校长冯志湘，政治委员李雪炎；

朱瑞炮校，校长贾陶；第50军（由辽沈战役起义的曾泽生部改编），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148、第149、第150、第167师；辽宁军区，司令员边章伍，政治委员张秀山；辽北军区，司令员彭嘉庆，政治委员郭峰；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江华；热河军区，副司令员舒行；锦州军区，副司令员朱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云泽（乌兰夫），辖骑兵第1、第2、第10、第11、第16师；合江、吉林、嫩江、龙江等军事部；第163、第164、第165、第166师；整训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师；警卫师。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参谋长赵尔陆（4月，萧克、赵尔陆调离华北军区到第四野战军工作，由唐延杰接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参谋长王世英，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下辖：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副校长萧克，副政治委员朱良才；炮兵第3、第4师；补训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涌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叶楚平，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旅；第69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周彪，政治委员漆远渥，辖第205、第206、第207师；第70军（由第14纵队改称），政治委员甘渭汉，辖第209、第210师；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辖独立第4、第5、第6旅，五台、交城、太谷等军分区；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俘训旅，津南、保定、平南等军分区；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政治委员吴德，辖第12军分区；冀南军区，司令员王光华，政治委员马国瑞，辖临清、夏津、邯郸、南宫、衡水等军分区；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赵辉楼，副政治委员冷楚，辖独立第7旅，邢台、左权、长治、焦作、漳卫、武安等军分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辖独立第2旅，临河、湖西、豫北、鲁西南、运东、运西、直南、濮范等军分区；太岳军区，司令员曹普，政治委员顾大川，辖岳南、王屋等军分区；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

委员杨耕田，辖俘训旅，雁北、平西、建平、易水、察南、察北、冀察等军分区。

在整编中，全军统一了编制，调整了武器装备，充实了各级领导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全军总兵力达400万人，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向全国进军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活动于南方各省几支较大的游击武装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949年1月先后进行了整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下辖第1、第3、第5总队和独立总队；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平，下辖东江第1、第2、第3支队，北江第1、第2支队，湘南支队，赣南支队；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下辖第1、第2、第4、第7、第8支队；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下辖第1、第2、第3支队，罗盘、滇东南、左江等指挥部；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生，下辖第1、第2、第3支队、闽中支队、浙南第3支队，闽北、闽西北、闽浙边、浙南游击部队等。

二、进行政治整训，做好进军的思想准备

战略决战胜利后，全军大部分指战员已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为期不远，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因而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士气更加高涨，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意志；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玩弄的“和平”伎俩，由于大多数指战员，尤其是各级指挥员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和谈，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真面目，不相信他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而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抗战胜利后及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存在的和平幻想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一定要为解放全中国继续战斗，为人民再立新功。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特别是在整编过程中部队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部队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部队中

也出现了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倾向。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老战士存在轻视国民党军的思想,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解放军都能不断取得胜利,现在解放军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比国民党军占有明显优势,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被消灭,剩下的残兵败将不堪一击,只要解放军一过江,国民党军就会不打自垮,只有举手投降。因此,对领导上关于做好充分准备,抓好练兵工作的指示漠然处之,说:“这是什么时候,还要练兵?”“我们在整训,敌人在加强工事,这样真不合算”,缺乏继续进行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二是有些人特别是解放战士和新入伍的新战士,对进军的困难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估计过高,觉得国民党军还有海空军,还有美国的支持,到南方作战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甚至认为,解放军一过江,与美国的矛盾一定激化,美国会出兵帮助国民党政府,直接同解放军作战,或在华北、东北沿海登陆,进攻解放区,甚至会扔原子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等。三是有少数人对和平谈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国民党政府被解放军打痛了,它们真的要和平了;有人还说,不管怎样,和了就好,和平了可以回家,从而产生了松一口气的思想。四是有少数人产生了右倾情绪,他们眼看解放战争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害怕在这时牺牲了太可惜,过不上幸福生活,因而希望在作战中担任第二梯队,缺乏争当突击队的精神。五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家乡地域观念又有所滋长,不愿离开家乡到南方作战和工作,有的人说“过江虽好,但离家太远了,不能回家”,“在江北怎样都行,我就不订过江的计划”;有的江南籍的指战员,虽然希望早日过江,但也只是认为过江后可以回家。六是在少数人中开始滋长居功骄傲、不思进取,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的开始争地位、要待遇、闹离婚;还有的要求转业地方,调到军管会等条件好的单位工作,不愿继续留在作战部队工作。在上述思想和情绪的支配下,部队中的不良风气有所抬头,以至发生离队逃亡现象。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各战略区、各部队多分散独立作战,使

部队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游击习气和无政府主义，对上级的命令、指示执行不够坚决；管理松懈，违反纪律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由于解放军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对城市不了解，不懂城市政策，缺乏城市工作的经验，对今后接收和管理城市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只看到城市生活比农村好的一面，看不到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等。

上述思想和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既反映了一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还跟不上急剧变化的形势的发展，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的一面；也有对形势任务了解不够，对长江以南地区的情况不熟悉的一面。这些思想问题和不良倾向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和妨碍向全国进军任务的完成。为了纠正和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和不良倾向，保证进军任务的胜利完成，三大战役结束后，各野战军结合整编，进行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

各野战军、各大军区相继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前委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等，传达和学习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和指示，并结合各自的实际，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了今后的具体任务。第一野战军党代表会议决议中提出，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普及和发展新式整军方针，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认真协助地方党政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建设好新区的城市与乡村；必须大量培养干部，加强营团以上干部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必须确定健全党委制度，扩大与健全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必须加强全党全军的统一性与纪律性，坚决克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反对可能产生的苟安、和平享乐思想，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为完成今年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在第二野战军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要求全体指战员认清形势，不管是和是战，人民解放军都要渡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并强调指出，越接近胜利，情况越复杂，任务越繁重，越要立场坚定，不受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第三野战军前委会议决议号召全体指战员，要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轻敌观念和骄傲自满情绪；要警惕和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要警惕和粉碎帝国主义者从内部破坏革命的反动政策；要更加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警惕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捧场；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总纲领；要准备向全国的大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提出了1949年的6项任务，即：坚决与圆满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动与组织新区广大群众，建设人民民主政权与地方武装；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爱护人民利益；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钻研党的政策，强化政治工作，健全党委制度，加强连队党支部工作和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提高军事技术、战术；加强部队内部团结，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克服家乡地域观念，巩固部队，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思想领导，克服一切不良倾向，进一步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第四野战军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朱德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号召全军指战员：下江南去，赢得全国胜利。朱德在讲话中要求第四野战军：必须在干部和战士中作深入的动员解释工作，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进军任务。南下后，全体指战员要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土改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争取知识分子政策和社会政策。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经济纪律，即不抢战利品，一切缴获归公，不搜俘虏腰包；指挥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为此，要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策、纪律教育；各级干部要起模范作用，并严格管理、检查；对违反政策纪律的，必须认真追究，给予批评或处分，对执行政策纪律好

的，必须表扬或奖励。

根据各野战军前委的要求和指示，军以下各级党委和支部也相继召开了会议，具体研究和部署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步骤。各级政治机关相继召开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下发关于整训时期部队政治教育工作指示，编发了政治教育教材。

在各野战军前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军掀起了政治学习和教育的热潮。根据部队人员的不同层次、不同素质，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对营团以上干部，主要采取召开团党委和师党委扩大会议，举办轮训班等方式，反复学习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和指示及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决议，以及各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党代表会议、高级干部会议决议等文件，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防止和克服在胜利形势面前可能产生和已经产生的居功自傲、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思想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能力和自觉性。对连排干部和战士的教育，首先针对部队中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的情况，进行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以及人民军队的本质、宗旨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在此基础上，采取由师一级举办连排干部轮训班和首长作报告、上辅导课等方式，向干部战士介绍全国的战争形势，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战争的阴谋；传达中共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赋予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任务，以及进军过程中的纪律、政策；分析向全国进军和到南方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在教育中，各部队还普遍采取了算血债、挖苦根，忆历史、看前途，比力量、谈胜负，讲任务、说责任等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引导干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使全军广大指战员初步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为向全国进军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首先，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人民军队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向全国进军应采取的方针，增强了革命斗志。一是使广大干部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入伍的新战士进一步认清了两种军队的区别，明确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认识到虽然现在自己和江北的劳动人民已经获得了解放，但江南和西北、西南各族劳动人民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军队的宗旨要求每个指战员要继续战斗，要以解放全国劳苦大众为己任。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才能使全国各族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个人也才能永远过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二是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了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明确了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以及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双重任务。

第二，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树立了以战斗方式向全国进军的思想。通过学习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评论文章，回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程，联系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准备、派飞机轰炸解放区、镇压要求和平的爱国人士等事实，使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动的阶级本性，认识到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目的是为了保持其残余力量，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备，以便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李宗仁任代总统后，虽然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虽然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南方各省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实力派可能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按照北平、绥远方式解放某些省份和地区的可能性增加

了，但国民党政府中的大多数反动分子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他们必然会作垂死挣扎。因此，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战员必须树立以战斗方式向全国进军的思想，认真做好进军的各项准备，这样才能胜利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

第三，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进军过程中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困难，增强了夺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一是使大家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均已超过国民党军，完全有把握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那种过高估计国民党军事力量，缺乏必胜信心的思想情绪是错误的。同时，国民党还有 200 余万军队，其中有的部队还有较强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还必须经过多次、艰苦、激烈的战斗才能全部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轻敌的观念也是不对的。二是使大家认识到由于南方各省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尚未建立人民政权，群众尚未发动，加之风土民情与北方有较大差别，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又是水网地区或山地，这都给人民解放军的行军作战和生活带来许多的困难。每个指战员都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但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曾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老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深厚的感情，又有长期坚持斗争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的活动，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过程中必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支援和游击队的帮助配合，进军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三是使大家认识到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不可怕。中央军委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已作了充分估计，已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作了周密的部署。同时，只要坚决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势力，帝国主义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将愈减少。作为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指战员，要有迎接最大困难、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思想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实施武装干涉，就坚决斗争，彻底打败侵略者。

在教育中，全军各部队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召开民主生活会、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的检查和纠正了一部分干部战士存在的与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错误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的自觉性。大家纷纷表示：“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不灭蒋匪誓不收兵”，“我们要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战士，不做怜悯毒蛇的农夫”，“请毛主席下命令吧，我一定放弃个人打算，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了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愿做胜利前夕的最后一批牺牲者”，“我们要做坚定的革命战士，不做资产阶级‘糖弹’的俘虏”。思想认识提高后，行动也就自觉了。如第二野战军第15军经过整训，在由整训地向长江北岸开进过程中，爬高山，风餐路宿，肃清沿途国民党军保安团队，克服不少困难，行程23天，长驱750余公里，于3月23日按时到达长江北岸指定位置，涌现出无减员、无逃亡连队57个，机关23个，“巩固部队模范营”4个。

三、调整、完善全军后勤机构，建立各项后勤规章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各根据地、各解放区被分割，没有统一的财政，人民解放军只能按照“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组织后勤工作，这一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与向全国进军和大兵团机动作战，及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已不相适应，急需实现全军集中统一的后勤供应体制。

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13日，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领导下，中央军委后勤部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军兵工、军械会议和全军后勤（供给及兵站）会议。各大区后勤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的后勤工作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化建设，迎接新的后勤工作任务。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要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健全全军兵工军械的组织机构，

建立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要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逐步做到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因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军委后勤部的样样工作都要建立起来，要能指挥下层，每个大军区、野战军都要跟这一整体联系起来。军委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要求全军进一步加强兵工生产，加强野战军的军械工作和运输工作，执行全军统一的新供给标准。他还明确了各级后勤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军委后勤部是全军最高后勤机关，负责计划全军后勤工作，指导与调剂各军区军工、军需、军械、卫生、供给、运输工作和生产，制定各种制度并监督执行；各大军区后勤部负责军工、军需、军械、卫生、运输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及检查监督执行，以及野战军的物资保证；野战军的后勤部负责供给部队的各种物资需求，按情况下设分部、大站、分站、兵站；兵团不设各后勤业务组织，只建立精干的指挥机构，负责物资的筹划、调度；军以下各级设后勤部，负责本部队的后勤工作。

会议肯定了过去实行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后勤工作原则；制定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全军统一的供给标准；确定了全军统一的服装样式；决定了1949年的兵工生产任务；讨论了各级后勤的组织形式；在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综合各战略区已有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向全国进军和正规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拟制并讨论了各项规章制度，经修改后颁布了《供给标准制度》、《军需概则》（草案）、《运输工作概则》（草案）、《军械工作条例》（草案）等以及武器弹药的统一名称等业务规章制度。这两个会议为建立全军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制度，实施统一的后勤管理，为军队后勤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对做好保障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和彻底胜利的后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中共中央1949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加强全军后勤建设的指示，全军首先在整编中对各级后勤组织机构作了初步的调整，但由于时间比较短，未能完

全按后勤会议的要求统一全军的后勤组织机构，各野战军和大军区基本上仍是原有的后勤组织机构，没有大的变化。经整编后的军委和各野战军及各大军区的后勤组织情况是：

中央军委后勤部成立于1948年5月，至同年8月，组成了供给、运输、兵工和军械各组。1949年4月23日，军委后勤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合署办公，杨立三任军委后勤部长兼华北军区后勤部长，随后逐步完善了军委后勤部下属的军需、军械、运输、卫生等业务部。

第一野战军设置后勤司令部，刘景范任司令员，方仲如任副司令员。6月改称后勤部，黎化南任部长，方仲如任政治委员，黄静波任副部长，下辖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兵工部、军需部。

第二野战军设后勤司令部，段君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岱峰任副司令员，姚继明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邓存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军械处仍隶属于司令部，各兵团亦设置后勤部。

第三野战军设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喻曼云、李厚坤任副部长，谢胜坤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元培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

第四野战军设后勤部，周纯全任第一部长、李聚奎任第二部长，陈沂任政治委员，罗文任参谋长，潘振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以及6个分部。军需部由杨至成任部长，魏庭槐、张庆孚任副部长，下辖第1、第2、第3局和军需学校。

西北军区设后勤部，陈希云任部长，刘海滨任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副部长。

华东军区设后勤部，宋裕和任部长，邝任农任政治委员，伊文任参谋长，罗应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军械、运输等部。

东北军区设后勤部，朱治理任副部长，下辖经理、军需、军械、军工、卫生等部。

华北军区设后勤司令部，赵尔陆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吴先恩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

在整编中，各野战军和大军区先后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文件，统一思想，并制定了实施细则、补充办法等，使后勤工作更好地保障向全国进军任务的完成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

为了保证全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的物资供应，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0日颁发了《关于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东北、中原解放区负责供应第四野战军；西北解放区及华北解放区的主要部分负责供应第一野战军及第18、第19、第20兵团；华东解放区负责供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不足部分，由中共中央从华北、东北解放区调剂。各野战军在新区及城市缴获的军用物资，于接收后，除必须补充其本身者外，应将其重要部分报告军委，以便调剂。

3月21日，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指出：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公粮制度一时尚不能实行，除以缴获粮及伪政府屯粮拨充军粮外，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粮草供应问题。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地主征借40~50%，富农25~35%，佃富农20%，中农10~15%，贫农一般不借，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少借一点。马草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附加。南下的部队，可以团为单位，在政治部的领导下，由随军的地方工作人员及供给人员组成粮秣工作队，负责筹粮。当地保、甲长及差务处之类的组织，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以民主评议，进行征借。粮秣工作队则一面监督他们，一面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我们的借粮政策和其他各种政策，检查保、甲长或差务处对借粮政策的执行情况。无保、甲长或差务处可资利用者，则由工作队直接办理征借。在新区，应坚持财粮制度，爱护人民的财富，反对

浪费，严禁以粮食换各种物品。粮秣由工作队按规定发给各伙食单位。不经过粮秣工作队，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粮草。为此，最好以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印制统一的借粮证，由粮秣工作队统一填用。粮秣工作队有供给部队粮秣之责，也有检查粮秣开支之权。征借粮秣时，一面要保证部队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顾到当地的能力，并注意了解有无部队征借过及征借多少，据此才能决定征借的数量。粮秣工作队应建立简单的收支帐目，各级政治部门及首长要注意经常检查。同时，要尽可能地分散征借，不要只顾一时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众一次出粮太多，引起反感，并影响后来部队无粮可借。进入城市部队的粮秣供应，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如缴获不敷而又无粮接济，可经过商会向粮商暂时借用或订购短期的粮食，再由商会负责筹款折价偿还。

各野战军为了认真执行中共中央上述的规定，分别下达了补充指示，以加强对筹集粮草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

经过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49年4月初，全军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物资上做好了向全国进军的准备。只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即可向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的追击作战，解放全中国。

第二章 举行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江防企图和部署，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决心和部署

一、国民党军防守长江的企图和部署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军队撤至长江以南地区，在“和谈”掩护下，加紧部署长江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江南半壁山河，等待时机，卷土重来。1949年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人，讨论研究长江的防御问题，决定将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上海至江西湖口间800余公里地段的防线，由汤恩伯率部担任；湖口至湖北宜昌间近千公里地段的防线，由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率部担任。蒋介石的企图是：“用海、空优势，与长江天险之利，拒止匪于长江以北，争取适当时间，重新整备新生战力，企图再举”。^① 蒋介石等人认为：只要坚持半年，国际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到那时，即能在美国政府的支援下举行反攻，消灭人民革命力量，重新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李宗仁上台后，也积极督促加紧组织长江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41页。

防线。

在蒋介石的命令和李宗仁的督促下，汤恩伯、白崇禧积极部署长江防御。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上海至宜昌间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白崇禧集团（时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40个师约25万人。另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15艘、炮艇62艘，分驻于芜湖、南京、镇江、江阴等地江面，支援汤恩伯集团作战；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九江、武汉、宜昌江面，支援白崇禧集团作战。以空军第4军区第1、第3、第5、第8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协助陆海军防守。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历来称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公里，虽河道坡度不大，平时水流平缓，但在4、5月间水位即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厘米，如遇大海潮，则入海地段江水倒流，使航渡更加困难。长江流域广阔，两岸支流甚多，江中沙洲交错，地形复杂，给防守带来一定困难。反之，进攻者则易于寻求空隙或弱点，争取主动。长江两岸土质均为沙土结构，虽容易构筑工事，但抗力不强，尤其是江南雨季，江水泛滥，工事多易崩塌，给攻防双方都增加不少困难。江南地势平坦开阔，铁路、公路发达，交通便利，有利于大部队机动，惟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部队行动。长江芜湖至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成弓字形，并有沪宁、宁芜铁路与之并行，有利于守军横向机动兵力。但也有利于攻方实行钳形突击，切断交通动脉，限制守军机动，迅速达成对南京、芜湖、镇江地区守军的分割包围，并隔绝这些要点的守军与纵深地域机动兵团的联系。

国民党军统帅部“鉴于长江江防过于宽广，处处设防，绝难周全，为保持作战弹性”，决定“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江防之重点，而淞沪地区，又为其核心，以战略持久之方针，在台湾

支援策应下，最后必须坚守淞沪，以为尔后反攻之跳板”。^① 汤恩伯依据上述方针，制定了具体的防御计划：以一部兵力前出长江北岸，控制江北三江营、瓜洲、十二圩、浦镇、浦口、裕溪口、枞阳等主要据点和若干江心洲，作为警戒阵地，阻止人民解放军迫近江岸，掩护南岸主阵地的安全，保障海军舰艇在长江中往来巡弋，并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准备。以主力沿长江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兵力，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配合下，大量杀伤人民解放军于长江江面，或将其消灭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至上海及浙赣铁路线组织新的防御。同时规定，如人民解放军由镇江、南京地段渡江时，以控制于丹阳、句容地区的机动部队，趁其半渡而歼灭之；如未能奏效，守军即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线，迟滞解放军前进，并逐次向上海撤退。如人民解放军由皖南一带渡江时，守军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适时反击，确保江防的完整；如不奏效，则适时向南撤退，确保浙赣铁路；但此时南京以东部队仍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区，不得已时退守上海。如人民解放军由南京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依据上述两项要领，指导作战。海军应避免作放哨式的分散使用，将主力集中于南京两侧地区，以击沉人民解放军渡江之船只，阻止其南渡为主，而以支援北岸桥头堡阵地作战为辅。

汤恩伯集团的具体部署是：以主力 18 个军 54 个师沿长江南岸布防，其中以淞沪防卫司令部石觉部第 37、第 52、第 75 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陈大庆部交通警察第 1、第 5、第 7、第 11、第 18 总队，防守金山卫、吴淞、白茆口段和上海地区；第 1 绥靖区丁治磐所属第 4、第 21、第 52、第 123 军和江阴要塞部队，防守白茆口至镇江以西桥头镇段；第 6 兵团李延年和首都卫戍总部张耀明部第 20、第 28、第 45、第 96 军，防守桥头镇至铜井地段，置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6 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9 年版，第 41 页。

重点于南京地区；第7绥靖区张世希部第66、第88军防守铜井至铜陵段；第8兵团刘汝明部第55、第68军，防守铜陵至湖口段。另以机动部队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句容地区，随时准备支援第1绥靖区作战；第99军位于龙潭、下蜀地区，准备支援第1绥靖区和南京地区的作战；第17兵团第106、第73军集结于泾县、宁国、歙县地区，准备支援第7绥靖区和第8兵团作战。以战车指挥部所辖4个营又1个连计各型战车136辆、155口径榴弹炮20门，控制于上海地区，以炮兵指挥所辖5个团于南京、上海地区，随时准备机动作战。以海军海防第1舰队一部，支援上海地区陆军作战；以海防第2舰队计舰艇52艘，支援第1绥靖区和第6兵团等部作战；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37艘，支援第7绥靖区和第8兵团部队作战。此外，以第12、第18、第67、第73、第74、第85、第87军位于浙赣铁路及其以北地区及浙江东部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

对于汤恩伯的部署，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渡江点，可能先为皖南地区，次为江阴、镇江地区，其他地区则为助渡及佯渡，因此，皖南与南京以东地区同样重要。汤恩伯集团的江防部署，不应过于偏重于南京以东正面，应将上海及宁沪间控制的一部分部队，移往芜湖、安庆间地区，以阻止解放军主力的渡江。但汤恩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认为：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正面，均是解放军渡江地段，国民党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以长久阻止解放军渡江，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部队转移困难，宁、镇地区则较容易组织撤退，这样，则可保存军力，以图后策。因此，其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地区，不愿意抽调南京以东的部队至皖南。经过激烈争吵，汤恩伯才同意将第96军由浦口调青阳，归第8兵团建制；第20军由南京西调芜湖，归第7绥靖区指挥，以加强皖南地区的

防御力量。这一部署，到解放军渡江前夕尚未完全调整好。^①

汤恩伯在确定江防部署的同时，积极构筑江防工事，不断派遣高级将领到江边视察。从1949年2月起，即封锁长江交通，禁止南北通航，在北岸的入江口和港口码头沉船布雷，在镇江、南京、芜湖、铜陵等江面敷设水雷，江滩埋设地雷，并在南岸沿江地段增筑公路，加强部队机动能力。同时，加紧“清剿”江南游击队，以求巩固后方。

汤恩伯集团的部队，除第54、第4军等少数几个军尚未遭解放军歼灭性的打击，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都系被歼后重建或新建的，兵员仅为编制数的1/2，且训练不足，装备残缺不全，战斗力不强。由于防线长，兵力少，汤恩伯只能采取一线式的防御部署，将主要兵力置于沿江一线，纵深十分空虚，在沿江兵力部署中，又只能将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以确保南京、上海地区。对于这种部署，刘伯承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因淮海战役基于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前进配备，同时，因兵力少、江防宽，及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进行后退配备。因此，就只能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好。武汉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火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国民党军战史在检讨江防作战时也承认：由于“各部队均直接配备，缺乏打击兵力，致使匪一旦渡江成功。国军江防全线即告溃决。”^②

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直接担任江防，

^① 参见《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44、第45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84页。

以 13 个师位于长沙、南昌地区。

二、人民解放军渡江任务与发起渡江时间的确定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筹划的战略决策。早在 1947 年 7 月和 1948 年 1 月，中央军委曾两次提出由华东野战军一部渡江南进作战的计划，但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施。1948 年 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在淮海战役（当时的计划是歼灭国民党军第 7 兵团和海州、淮安、淮阴地区的部队）结束后，华东野战军“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① 12 月，辽沈战役早已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平津战役也已开始。根据上述战争形势，中央军委于 12 日就今后作战方针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指出：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② 电报要求总前委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渡江作战计划。12 月下旬，刘伯承、陈毅在赴中央参加政治局会议期间，汇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355、第 1352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382 页。

报了两野战军联合举行渡江作战的初步方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残存的国民党军纷纷退守长江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据此，中央军委于12日电示中原、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粟裕、陈士榘，规定两野战军从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分5期进行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2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并指出：“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如果我们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则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应在占领南京以后举行，这样在国际国内就会产生极好的影响。”东北野战军“主力应争取于三月中旬完成休整”，^①待命出动。

在总前委主持全局的邓小平和陈毅接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文后，于4日回电表示，决定于3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认为，如果东北野战军于3月10日以后出动，则与中原、华东野战军出动会相距1个月以上。这样就会给敌人以抽调武汉兵力转用于南京、上海的机会，不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因此，建议先抽派东北野战军一部提前南下，在中原、华东野战军实施渡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集，第105～第107页。

作战时，及时包围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使其不敢增援，以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渡江和夺取南京、上海等地。

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有关问题，并于当日将讨论结果电告中央军委，建议渡江作战的时间“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那时国民党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部署上，尚在守沿江南岸和宁、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这时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雨少长江水小，更便于作战。虽然准备工作较仓促，但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虽然准备工作方面略较充分，但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渡江作战困难增多。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有利，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并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中野、华野的行动。

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组织指挥和接管江南，中央军委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①12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00页。

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①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决定：由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率第40、第43军和炮兵第1团、后勤部第2分部及2个工兵营共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3月20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牵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之渡江。为此，先遣兵团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3月17日和19日，中央军委分别电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国共谈判决定于4月1日开始，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第二、第三野战军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之作战，“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并规定，总前委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在接到中央军委上述电报后，于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需4至5日才能完成任务，然后又需一周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拖至长江出口处。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16日为宜，3月20日2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可提前于4月2日开始攻占国民党军江北岸据点，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布置船只，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谈判有利。3月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月光通宵，我军渡江作战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至4月15日黄昏发起渡江，因那时正值阴历18日下午9时前，昏夜有利我军渡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03页。

3月27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

至此，实施渡江作战的任务和时间基本确定，即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15日黄昏开始，在湖口至上海段实施渡江作战，消灭汤恩伯集团。以第四野战军一部，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侧翼安全。

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就推迟渡江时间问题与总前委进行了反复磋商。4月10日1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4月10日13时，总前委复电指出：每年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第二、第三野战军首长也向中央军委反映了推迟渡江的各种不利条件，主张按原计划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根据上述情况和谈判进展情况，中央军委于4月11日5时决定：渡江作战推迟一星期，即由15日推迟至22日，并指出，这样做，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4月11日12时，总前委复电表示坚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准备在22日开始渡江作战。同时建议：如能比22日更提前两三天更好。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签署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5、16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你们接到此电后，请立即准备好，于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浦口、浦镇以外的一切北岸据点，22日大举渡江。17日，总前委电告中央军委，提出：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结合，不宜停顿。否则给国民党军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渡江困难。中集团于20日黄昏开始攻击，肃清裕溪口、西梁山一线及江心洲国民党军据点，21日继续向南发展。东、西两集团则于21日发起渡江作战。1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酉）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复电还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①

渡江作战发起时间的最终确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的宽大为怀和仁至义尽，但国民党政府却最后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战争的真面目。

三、渡江作战的部署

（一）总前委的部署

如何进行渡江作战，是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精心筹划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渡江战役总前委全面分析了实施渡江作战的各种困难和有利条件，认为：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课题，参加渡江作战的指战员大部分是北方籍，不习水性，对长江情况了解不多。存有各种思想顾虑；各级指挥员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而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46～第547页。

且又无现代化航渡器材，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在上述情况下，要突破国民党军以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困难将是很大的。但是，总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十分有利，防守长江下游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不强，缺少骨干力量，且战线长，兵力不足，防守漏洞很多；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平稳，利于航渡；南京以西江面较窄，国民党军防御薄弱，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组织渡江；芜湖、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沪宁、宁芜铁路与江平行，利于解放军对南岸的国民党军实施钳形突击，迅速达成对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并在渡江后可立即占领控制铁路线，使国民党军无法利用铁路进行机动。根据上述分析判断，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对渡江作战的部署进行了详细而又周密的研究。在2月9日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即初步确定，以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第二野战军的1个兵团为渡江作战的第一梯队，其中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至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和铜陵至贵池段实施渡江；第二野战军以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地段渡江，其余2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实施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着第一梯队渡江。预定将渡江突破的重点置于芜湖至安庆地段。

3月下旬，总前委在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再次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18时发起渡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①

《纲要》对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成功后，汤恩伯集团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的判断：“（一）收缩兵力于宁、沪、杭三角地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0页。

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 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宁、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至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 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 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宁、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纲要》强调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① 据此，《纲要》规定，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1方案，则应集结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宁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第二野战军之1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第二野战军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2方案，则可改以第二野战军主力出浙赣线，其余同第1方案。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3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之国民党军，第三野战军全力负责解决上海、杭州、无锡地带之国民党军。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4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解决南京，第三野战军解决上海、杭州。在整个作战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如国民党军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0～第131页。

- 《纲要》着重指出，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上述第 1、第 2 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充分估计到东线集团渡江成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西线集团应给以及时有力的支援。“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①

《纲要》预定将战役分为 3 个阶段进行。第 1 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 2 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国民党军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第 3 阶段，分别歼灭包围的国民党军，完成全战役。

《纲要》确定第 1 阶段的作战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 8、第 10 兵团共 8 个军、3 个独立旅 35 万人，由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 2 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组成东突击集团。其中以第 8 兵团指挥之第 34、第 35 军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牵制浦口、浦镇地区的国民党军，并伺机渡江。主力 6 个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及张黄港至龙稍港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当面守军，主力迅速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力求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国民党军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宁杭公路，如国民党军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中突击集团赶到后歼灭之。

以第三野战军第 7、第 9 兵团 7 个军共 30 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野战军第 1 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由裕溪口至姚沟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版，第 131 页。

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渡江。成功后，以足够兵力歼灭当面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截断宁杭公路，完成对宁、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割裂包围，尔后会同东集团歼灭宁、镇地区之国民党军。

为求得中、东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宁、镇地区守军，中、东集团归粟裕、张震统一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9个军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歼灭当面守军外，以1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第三野战军留置部队的任务，歼灭芜湖地区守军，并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

《纲要》最后要求：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为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芜湖地区，有利于东、西集团渡江，以及估计到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总前委随后又决定中集团较东、西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尽快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月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的瑶岗村，统筹全局，指挥整个渡江作战。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17日，总前委根据皖南地区的道路和粮食情况，为便于部队展开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对第二野战军渡江后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2个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1个兵团沿江东进，首先接替第二野战军一部监视包围芜湖地区的任务，尔后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18日，中央军委同意上述调整。根据总前委总的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结合自己和当面守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二）第二野战军的作战计划

第二野战军首长认为，该野战军渡江地段为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结合部，当面守军第8兵团刘汝明部仅3个军7个师4万余人，战斗力较弱，因此决定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间宽约100公里的正面，同时实施渡江，将重点置于安庆东西地区，并于4月8日和4月17日相继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了实施渡江作战的具体安排：

以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第10、第11、第12军。除以第10军以佯攻手段包围安庆守军，并封锁安庆及其东西江面，掩护主力渡江外，主力第11、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段渡江。登陆后以一部兵力巩固滩头阵地，第11军向殷家汇、灌口、吴田铺地区攻击前进，攻占该地区，并以一部经唐田镇出張溪接应第5兵团渡江；第12军向贵池以南前进，接替第7兵团监视并歼灭贵池地区守军的任务。尔后第11军经钓鱼台、黟县、休宁向屯溪攻击前进，割裂、包围并视机歼灭歙县、屯溪守军。第12军经青阳、石埭、太平向歙县攻击前进，并以一部进击绩溪县城，截断徽杭公路。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13军附第14军第41师和第15军为第一梯队，第14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登陆后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监视芜湖守军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指挥第16、第17、第18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16军为第一梯队，第17、第18军为第二梯队。突击登陆后，以一部兵力控制滩头阵地，主力包围并相机歼灭东流、至德两地守军，接应第4兵团渡江。尔后沿浮梁、婺源、景德镇向浙赣线攻击前进，控制衢县、江山段铁路和衢县、歙县段公路，切断守军退路。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40、第43军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共20万人，由萧劲光统一指挥，第一步先遣兵团进至广水、

河口、黄安、中馆驿一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待机；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进至应城地区集结待机。第二步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时，分别进至武汉以东、以北地区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野战军渡江。

（三）第三野战军的作战计划

第三野战军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在渡江作战中的特长，对各兵团的序列临时作了一些调整，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23军和第20军，由中集团第7、第9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8、第10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24、第25军分别调归中集团第7、第9兵团指挥。2月20日，第三野战军即下达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随后，根据总前委的意图，于3月30日下达了《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规定了各部队的部署和任务。

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指挥第21、第22、第24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2团、骑兵团，由枞阳镇（不含）至姚沟段渡江。其中第21、第24军为第一梯队，第22军为第二梯队。登陆突破后，以一部兵力向两翼扩张，攻占铜陵、顺安、大通、观前，扫清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控制有利阵地，接应友邻渡江，另以一部包围并相机歼灭贵池、青阳地区守军。主力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南，泾县、宁国之线以北之间地区迅速向长兴、吴兴、安吉地区挺进，截断宁杭公路，并在该地集结待机，同时派部队向德清、杭州方向搜索。尔后视情况或协同第8、第9、第10兵团歼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或夺取杭州。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4团和第1团1个营，由姚沟（不含）至裕溪口段渡江。除以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王面牵制对岸守军，并视机渡江外，第25、第27军为渡江第一梯队，第30、第33军为第二梯队。登陆后，以一部兵力围歼繁昌、三山街、旧县地区守军，控制有利阵地，接应友邻渡江，另以一部兵力监视芜湖守军，主力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北，经郎溪向溧阳、

宜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堵击南京、镇江地区可能南逃的国民党军。尔后协同第 8、第 10 兵团聚歼守军。并准备在东集团和第 4 兵团攻击南京时，东进无锡地区，对上海方向警戒，待命配合野战军主力夺取上海或单独进占上海。

第 8 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指挥第 20、第 26、第 34、第 35 军及警备第 7 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 3 团和第 1 团 1 个营，除以第 34、第 35 军和警备第 7 旅位于乌衣、全椒、仪征、扬州地区，逐次歼灭浦口、浦镇、瓜洲地区守军，封锁长江江面，牵制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并视机由南京、镇江正面渡江外；第 20、第 26 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首先歼灭扬中、大港等地守军，尔后进至武进、丹阳间，协同友邻兵团围歼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或夺取南京。

第 10 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指挥第 23、第 28、第 29、第 31 军，警备第 6、第 8 旅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 5、第 6 团、第 1 团 1 个营，由龙稍港至张黄港段实施渡江。其中第 23、第 28、第 29 军为第一梯队，第 31 军为第二梯队。登陆后，首先攻歼江阴地区守军，控制沿江阵地。继而第 29 军沿江阴、无锡公路向南挺进，相机夺取无锡，阻击可能由常熟、苏州西援之国民党军；其余各军向宁沪铁路挺进，攻占丹阳、武进段铁路。确实控制江阴、无锡、武进三角地区，坚决歼击国民党军的反击，并视机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无锡段南北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作战。

第二节 渡江作战的准备

渡江作战前，总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已十分有利，但要突破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防守的长江天险，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不仅没有现代化的航渡工具，就连木船也极端缺乏，更缺乏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船工和水手；北方籍战士不懂水性，缺少水上作战的经历；领导干部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大规模强渡江河

的经验；没有海空军的掩护；部队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顾虑，对渡江作战缺乏足够的决心和信心；长江北岸地区大多是新解放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后方补给线长，船只、船工的征集均有很大困难。这些困难和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无法完成渡江作战的任务。因此，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再要求参战各部队，要认真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解决和克服存在的各种困难，消除干部战士的思想顾虑，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参战各部队在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的统一部署下，认真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

1948年初，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关于由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华东野战军派出1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前往皖南，中原局也派出一批干部到安徽的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开展工作。5月，华东野战军又派出由10个营组成的先遣纵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南下，在长江边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详细调查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情况，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还请东北军区代购了一些引擎，将木船改装成机帆船。上述工作，为做好大规模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提供了经验。淮海战役结束后，参战各部队正式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全面准备。

1949年2月底3月初，第二、第三野战军休整结束，先后由河南的漯河、沈丘，安徽的阜阳和江苏的徐州、海州地区南下。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至安徽舒城，尔后又进至桐城；第3兵团进至安庆、望江地区；第4兵团进至太湖、宿松地区；第5兵团进至桐城地区。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进至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第7兵团进至安徽的庐江地区；第9兵团进至无为、含山地区；第8兵团进至江苏扬州、仪征地区；第10兵团进至泰兴、靖江地区。各部队进至长江边后，除以少数兵力监视当面守军外，集中力量从各方面全面地进行渡江作战的直接准备。

一、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树立必胜信念

经过休整期间的政治整训，广大指战员初步树立了将革命进

行到底的思想。但是，由于时间短，工作繁多，教育还不够深入。渡江作战任务下达后，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和顾虑。一方面，一部分人只看到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认为“长江很长，敌人兵力分散”，“各路一齐过，敌人防不胜防”，“我们一占领南京，蒋介石就完蛋了”。有的人存在着侥幸心理，说：“人家能过我也能过”，等等。国共两党开始和平谈判后，部队中又产生了“和平渡江”，“和平接收江南”的思想，因而产生了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的情绪，缺乏克服困难、继续进行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过分强调和估计渡江作战的困难，担心过不了江，对渡江作战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认为：“江南好打，长江难过”，“敌人有飞机、兵舰、水雷封锁”，“江宽不能搭浮桥，乘木船又上有飞机，下有敌人的军舰大炮”。广大北方籍战士对长江和渡江作战存有恐惧心理，怕渡江“途中晕船”，怕“迷失方向”，怕“船到江心被打中漏水沉掉”，“怕水上队伍混乱，掌握困难”，怕“船未靠岸敌人发觉突然开火”，怕“对岸沙滩陷脚”登不上岸，等等。有的甚至传说什么“江猪会吃人，能把船撞翻”，“兵舰能把长江划成一条深沟”。部队由休整地到达长江边后，在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有些家在北方的指战员感到渡江后，越走离家越远，担心回不了家，通信不方便，顾虑到江南后，“饭也吃不惯，话也听不懂”，“江南山多水多打仗不习惯”。有的甚至以讹传讹地渲染江南生活上的困难，如说南方“天气热得喘不过气”，“吃南方大米要拉肚子”，“江南蚊子大得能咬死人”，“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等等。有些人则认为，江南地方好，生活好，大城市多，到江南后可以逛大城市，住洋房。有些家在江南的战士则认为，渡长江后离家近了，可以回家了，存在着急于渡江，准备还乡的情绪。上述思想问题，虽是一些干部战士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的反映，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不了解长江水情和渡江作战存在的困难而引起的。针对上述思想问题，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在

具体解决渡江作战的困难的同时，从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入手，围绕着增强和坚定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中心，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首先，教育干部战士树立战斗渡江的思想，坚定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的决心。针对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存在的“和平渡江”、“和平接收”的思想和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缺乏继续进行艰苦作战思想准备的情绪，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方面向部队指战员指明，在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和谈成功，解放军即可实行和平渡江，用“北平方式”接管江南广大地区和南京、上海等城市。要求部队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如果和谈破裂，解放军将实行战斗渡江，用“天津方式”解决江南国民党军。全军指战员的立足点应放在这一点上，要有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应立足于战斗渡江上。特别是在国共两党和谈开始后，解放军数度推迟发起渡江作战的时间时，中央军委于4月11、16日先后指示总前委：“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①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前委于4月12日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我军推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部署，在此期间内，为了防止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教育，说明下列诸点：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混乱，好战分子将更加孤立，不仅争取了主和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42页。

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字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国民党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上。

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相继下发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进行了具体部署。在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上课，开民主讨论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决心意图传达到每一个干部战士，明确告诉大家，如果能用和平的方式渡江，解放江南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都是有利的，可以减少牺牲和损失，我们对此应该欢迎，要有必要的准备。但是，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任何幻想，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利用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也不会就此承认失败而停止抵抗，必然会作垂死挣扎，解放军还会遇到严重的战斗。全体指战员的立足点应放在这一点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度的战斗意志和充分的战斗准备，反对任何轻敌的侥幸心理，必须作最严重最困难的打算与努力。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围绕“打过去”进行，有了“打过去”的充分准备，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和困难，胜利完成渡江作战的任务。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指战员在渡江作战发起前，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意志，消除和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保证了战役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又为渡江作战发起后，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地完成战役预定的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普遍向指战员介绍长江情况，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以

及解放军的部署、作战规模、打法和有关的作战经验，提高干部战士夺取渡江作战的信心。针对部队中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北方人，不懂水情，不习水性，不了解长江，不了解江南，对渡江和到南方作战存有恐惧心理的情况，各部队请多年在长江中航行、捕鱼的老船工、老渔民介绍长江水情，组织干部战士到长江边去“看水”，到人民群众中去“访水”；请江南籍干部战士介绍江南的风土民情，生活习俗，地形地貌等情况，使广大指战员对长江和江南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长江水的流速没有想象的那样急，浪没有想象的那样高，比黄河还要平稳一些，只要掌握了“水性”，就没有什么可怕的。长江中的江猪（江豚）也没有传说中那样厉害，江南的情况也没有传说中那样糟。从而消除了恐惧心理。

与此同时，各部队还通过回忆解放战争发展历史和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力量消长的情况，对比现在两军力量的优劣情况，使大家认识到，解放军过去既然能在劣势条件下打败国民党军，现在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更有把握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联系当面两军情况，计算两军兵力分布情况，使大家明白，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一线虽有 70 万人，但多数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况且这些部队要防守千余公里正面的长江，兵力显然明显不足，不可能处处都以重兵把守、毫无间隙，而是到处都有漏洞。解放军渡江作战，不是在某个或少数部队在一个或几个点上实施突破，而是百万大军在上千公里的地段上同时实施突破，国民党军将防不胜防。因此，解放军渡江一定能成功。针对一些干部战士害怕军舰、飞机的情况，则对大家说明国民党军的军舰、飞机数量不多，军舰在长江中航行有一定的航线，机动、发射炮火都会受到许多限制。解放军有强大的炮火压制其火力；解放军渡江作战又在夜间，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易发挥作用。因此，国民党军的军舰、飞机并不可怕。有的部队还用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第 27 军侦察营夜渡长江进入江南等事例教育大家，说明长江并不

可怕，只要准备充分，解放军一定能胜利渡过长江。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增强了干部战士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信心。许多战士豪情满怀地说：“长江不可怕，水高浪急，高不过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我们就是要用木船打败敌人的兵舰！”

第三，加强宣传鼓动，开展立功创模运动，进一步激发干部战士的革命意志。为了激励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把大家的思想集中到打好渡江之战，争取为人民立大功上来，中央军委于1949年4月颁发了32条渡江作战鼓动口号。其中供部队渡江前使用的有15条，主要有：“空前伟大的大进军开始了，无敌的英雄们，面向江南！”“坚决勇猛沉着向江南大进军！”“打过长江去，巩固江北解放区！”“打过长江去，解放京沪杭！”“打过长江去，解放大东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听指挥就能胜利，有决心就能过江！英雄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前进就是胜利，后退自找死亡，我们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积极对空，积极拦海，粉碎敌人海陆空联合体系！”“主动配合，互相支援，团结一致战胜敌人！”“争取渡江英雄光荣称号！”“争取进军江南首先胜利！”等。供渡江开始后使用的有17条，主要有：“渡江战役我们胜利了！无敌的英雄们向前再向前！”“扩张战果，迎接友邻部队过江！”“扩张战果，追歼败退敌人！”“扩张战果，恢复一切城镇，占领有利阵地！”“扩张战果，减少人民灾害！”“扩张战果，多缴物资枪炮！”“扩张战果，争取更伟大、更圆满的胜利！”“坚决打败敌人反击，站稳脚跟！”“严格军政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军事上胜利，政治上还要胜利！”“胜利不骄傲，不轻敌，不松懈，不软劲，再接再厉，连续战斗！”等。总前委也颁布了渡江作战动员口号17条，其中主要有：“坚决勇猛打过长江去，实行光荣大进军！”“打过长江去，彻底干脆歼灭蒋匪军！”“打过长江去，解放江南人民！”“不骄傲、不轻敌、不松懈、切实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严守渡江秩序，严密渡江组织！”“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勇猛、顽强、沉着，彻底粉碎敌人的抵抗！”“全军动员起来，争

取渡江歼敌的完满胜利!”“创造渡江英雄，创造渡江英雄部队!”

上述口号下发部队后，各级领导机关都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对广大指战员的要求，及时传达到每个指战员，并召开各种会议，联系部队实际进行阐述，组织大家逐条进行讨论，每次部队集会，都要呼喊这些口号。同时把它写成标语张贴在驻地街头、门口、宿舍的墙壁和连队的板报上，使人人熟知不忘，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有些部队还根据自己的任务提出适宜完成任务的口号，如第三野战军后勤政治部提出了“坚决完成任务，保证前线供应!”“全力为京沪杭战役服务，为人民立功!”“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保护人民利益!”“爱护伤员，爱护粮弹，爱护工具，爱护一切公物!”等口号，激励指战员完成战役的后勤保障任务。

根据总前委提出的“创造渡江英雄部队”的号召，各部队普遍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号召大家向英雄模范单位和个人学习，提出“争取渡江英雄的光荣称号，争取进军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创造渡江英雄班、英雄排、英雄连”，“打过长江去，渡江立大功”，“英雄比英雄，江南立大功”，“争取立下渡江第一功”等。同时，各部队还组织和发动群众，制定立功计划和争取当英雄和英雄单位的计划，开展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立功竞赛和挑战活动，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的士气。

渡江前，各部队还以师、团为单位，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各级首长亲自作战斗动员报告，带领战士们举行庄严的宣誓：我们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士，在党和各级首长的领导下，我们坚决打过长江去，进军江南，消灭一切敌军，解放京沪杭，解放全国人民。接着，举行为突击队献枪授旗的仪式，给突击队员披红戴花，颁发突击队员证书；宣读兄弟部队的祝贺信和挑战书；宣传队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还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带着各种慰问品向誓师大会祝贺

献礼，使广大指战员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崇高的荣誉，纷纷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坚决打过长江去。第一梯队登船出发时，各部队还组织盛大的欢送，在江岸上搭起“英雄门”、“凯旋门”，布置醒目的大标语；军乐队、宣传队在江岸上鸣鼓奏乐，说快板、唱歌、呼口号。在这种热烈的战斗气氛中，战士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

二、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

对长江及江南地形、社会情况和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正确、全面了解，是定下渡江作战决心，进行正确部署的前提。为此，参加渡江作战的各部队，十分重视战前的侦察工作，把它作为渡江作战准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48年，华东野战军即派出部队和人员到长江北岸，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侦察。淮海战役一结束，总前委即指示各部队，为了实施渡江作战，必须加强侦察工作，要求各级指挥员除组织部队实施侦察外，必须亲自参加这项工作，以求熟悉应用，并依侦察勘查结果，修正地图。1月21日，第三野战军在徐州召开了为期8天，有军侦察科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全军侦察工作会议，研究渡江作战的侦察工作。2月4日，下发了渡江侦察工作指示，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地段和侦察内容，要求以兵团为单位统一指挥各军侦察营遂行这项任务，各军侦察营应由副军长或参谋长带领，于2月10日前由现地出发，开赴长江北岸实施侦察。随后，野战军司令部制定下发了具体的侦察工作计划。计划指出，为保证渡江作战之顺利完成，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侦察活动，确实查明国民党军的江防设施、长江及其两岸之地形、社会情况及渡江器材之调查征集等情况，以作为渡江作战决策的基础。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地域和侦察内容、侦察手段。侦察地域划分：第10兵团负责张黄港至三江营地段；第8兵团负责扬州至慈湖镇地段；第9兵团负责采石矶至刘家渡地段；第7兵团负责刘家渡至枞阳镇段。侦察内容：（1）国民党军情况。主要是其布防情形，江防体系，兵力部署，纵深配备，预备队控

制位置，火力配置，炮兵阵地，火力封锁地带，部署的结合部、薄弱点，作战序列，指挥系统及指挥位置；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数量、名称、吨位，武器装备及分布情况；空军活动区域及规律；南北岸桥头堡的位置，坚固程度，要塞位置及设备，江心洲的设防及控制情形，以及其他工事设备构筑情形。(2) 地形情况。主要是，两岸地形特点，对部队登陆作战及运动的影响；河床河幅宽度，水的流速、季候风向，船只往返速度及所需时间，岸边水的深度、土质情形；潮水涨落时间、大小；两岸上下船只的码头及位置、容量；强渡点的选择，何处过江比较有利，何处可实施佯渡；部队集结地，运动道路和船只器材隐蔽地的选择；通江内河、港口的情况；江心洲的大小及地形特点，村落道路等情况。(3) 军用器材及船只的情况。主要是，可用于渡江的船只的分布区域、数量、容载量，集中及开进所需的时间，开进路线；其他渡江器材，如竹、木的分布地点，能征集数及征集所需时间；船工情况等。侦察手段，派侦察人员到侦察地段进行实地勘察，或用望远镜进行了望观察；捕捉俘虏，派遣干部或小部队利用有利天候或夜暗秘密偷渡到江南进行侦察；化装成渔民、商船收集情报；访问居民、渔民、水手及江面来往船只。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侦察工作顺利开展，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要求各兵团要组织渡江侦察委员会，吸收敌工、俘管、通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由兵团参谋长亲自领导，根据野司指示及兵团任务，全盘组织，检查督促这项工作的进行；各军要集中军、师、团三级的侦察分队及侦察干部组成侦察支队，由军侦察科长任支队长，具体执行各项侦察任务。同时，应从部队及机关中选调一部分对长江情况比较熟悉及住沿江地区的干部战士来进行这项工作。

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3月24日下发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中，要求各兵团、各军到达江边后，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

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之基础”。

根据总前委和野战军的指示和统一部署，各兵团、各军也相继召开了渡江侦察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各自的侦察任务，进行具体部署；同时调整健全了各级侦察机构。2月中旬，各侦察支队相继到达长江北岸，他们在沿江地方党和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采用各种方式，展开了全面的侦察活动。大部队到达江边后，又组织广大指战员多方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调查研究。第三野战军第27军组织了10次偷渡，到江心洲和深入江南侦察，捕捉了30多名俘虏，了解到不少重要的情报，特别是派出了由300多人组成的先遣侦察大队，于4月6日由芜湖以西荻港至三山街段隐蔽渡过长江，深入到铜陵、繁昌、南陵三县交界的山区，实施敌后侦察，他们在皖南地方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查明了第9兵团预定渡江地段的国民党军情况及地形状况。第二野战军第16军1个侦察班乘夜暗偷渡至江心洲，一举捕获国民党军官兵8人，其中还有一个作战参谋，经审问，查清了当面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火器配备。中共江南地下党组织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千方百计收集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图》等重要情报，并及时派人送到江北。

经过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和调查研究，基本查清了国民党军的江防体系，兵力部署，指挥系统，指挥位置，火力配置，工事构筑，海军舰艇活动规律；沿江两岸地形，长江水情，潮汐规律，天气变化以及比较理想的起渡点和登陆场。为部队拟定具体的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开展以强渡江河为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

克服长江天险障碍，是夺取渡江作战的关键。针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北方籍多，不习水性，缺乏水上作战的本领和经验等情况，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在总前委和野战军的统一部署下，利用驻地附近的湖泊、河流和控制的江面北侧，展开了大规模的

战前练兵。第一步，进行基本的技术训练。指战员们在“看水”、请老船工“谈水”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熟悉水性，在“学本领，逞英豪，长江边上立功劳”、“练好本领过大江，彻底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冒着早春的寒冷，赤着胳膊，穿着短裤，在冰冷刺骨的水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熟悉水情，练习游泳。特别是来自北方的“旱鸭子”，一下水就被呛得翻白眼，但毫不退缩，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中扑腾；有的抱着一根毛竹，在水里扎猛子。经过百次千次的练习，指战员终于学会了游泳，白“黑旋风”变成“浪里白条”。接着，进行船上训练，大家克服了晕船、呕吐、船只颠簸等困难，日夜苦练上船、下船、乘船、划船、船只操纵、堵漏、水上射击、救护等基本动作，直到掌握规律，行动自如，学会船上生活和一切操作及战斗技能为止。炮兵、通信兵、工程兵等专业技术分队，也根据各自的任务和渡江作战的特点，进行基本的技术训练。

在训练中，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各级党委的号召，广泛开展军事民主，人人献计献策，个个搞发明创造，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明了用竹子、木板、葫芦、稻草、芦苇等制造的“三角救生架”、“竹竿盆”、“担架船”、“稻草圈”、“芦苇圈”等救生器材，解决了水上救护的难题。为了加快船速，缩短船只在江面上航行的时间，各部队还掀起了改造船只和改进航行方法的热潮。第二野战军有个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在大家的帮助下，研究制造出一种木制推进机，这种推进机安装到木船上后，成了既能隐蔽身体，又能增加航速的上轮船，不到20分钟即能渡过长江。这种上轮船经推广后，对渡江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掌握基本技术的基础上，第二步进行战术演练。主要是按照船只的大小、性能，进行编队，保持航渡队形，航渡中的指挥、通讯联络、步炮协同及抢滩登陆等训练，并在与预定登陆地段相似的地形上，进行各分队、各兵种之间的综合模拟演练。第一线部队还利用已控制的江面，利用夜暗隐蔽地在长江中组织夜航。各

级司令部组织干部进行沙盘作业，不断修改作战方案，统一战术思想，并设置各种复杂情况，拟制处置措施。各专业技术分队，根据各自的任务，拟制协同计划。炮兵部队根据火炮的不同种类、性能进行统一编组，明确各自的任务、射击目标、射击方法、与步兵协同的信号及弹药的消耗量、炮火准备时间等，反复演练远距离支援射击、对国民党军军舰射击及船上射击等动作。各级通信部门多次召开通信会议，讨论研究渡江作战通信保障工作的任务、特点，制定组织通信联络的原则、方法及各种规定；补充、扩建了通信分队；配发了一些新的通信装备，整修了原有的通信器材；购置和研制了大量的、多种类型的简易信号通信器材；明确了渡江时南北两岸之间、船与船之间、排连营之间、步炮之间的通信联络方法；集训了司号员、信号观察员、手旗旗手，使之熟识和熟练使用各种通信信号和通信器材。

渡江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必须确立新的战术思想。为此，第二、第三野战军相继下发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等指示，并组织各部队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使指战员牢固地树立新的战术思想：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以强渡为主，船队成一字队形前进，实施宽正面有重点的多点突破；独立自主，有进无退、不怕打乱队形、不怕打乱建制，勇往直前；途中遇国民党军军舰阻拦，由火力船与之进行近战，掩护主力船队航行；不等不靠，先靠岸先登陆，登陆后主动协同友邻迅速巩固和扩大突破地段，建立滩头阵地，接应后续部队登陆；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反击，放胆向指定地点挺进，不为途中小股守军所扣留，贯穿守军纵深，截断其退路而歼之；边打边集结整理部队，如一时找不到直接上级，主动服从友邻上级的指挥等。

经过勤学苦练，广大指战员学会了水上作战本领，解决了渡江作战的技术、战术问题，消除了对渡江作战的恐惧心理，增强了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的决心和信心，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军事基础。

四、筹集、隐蔽船只,选调、培养水手,团结、教育地方船工

要取得渡江作战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渡过长江,在无现代化航渡器材的条件下,收集足够的木船和动员地方船工参战,就成了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国民党军在退守江南之前,对北岸船只进行了破坏,有的被沉入江底、湖底,有的被强行拉到江南;沿江的群众和渔民、船工,因遭受国民党军的压迫,也大多逃往外地。这就给人民解放军征集船只和船工造成了很大困难,而百万大军渡江,所需船只、船工的数量又很大。为此,全军各部队都把筹集船只,动员船工参战作为准备工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早在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即派出干部去苏北等地筹划征集船只。淮海战役期间,开始在苏中、皖北动员与制造船只。1949年1月初,各部队就派出了由政治部主任或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带队的先遣分队,奔赴长江北岸,在地方党的帮助下,负责筹集船只。各参战部队到达江边后,团以上的战斗单位都专门成立船舶筹集、管理机构,负责船只的收集、分配、管理和对船工的教育。这些机构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协助下,四处走访人民群众,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政策,使他们了解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伟大意义,和大军渡江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关系,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江北大部分地区,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所了解。当他们得知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表示要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许多地方提出了“要船有船,要人有人”的口号,不少船主自动把隐藏起来的木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人民解放军;有的帮解放军提供线索,将沉在江底、湖底的船只打捞起来,并修理好;有的为解放军制造新船。许多渔民、船工积极报名参战,出现了许多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报名的热烈场面。有的年轻小伙、姑娘,主动推迟

婚期，报名参加水手队，连 60 岁的老船工，50 多岁的老大娘都不甘落后，积极报名当船工、水手。有的甚至全家带着船一起参加突击队。

有的部队还深入到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和苏北老解放区筹集船只。老解放区的人民表现出更高的觉悟和积极性，他们将所有的海船、河船全部献了出来，用火车运往长江边的湖泊和内河中。全军各部队还选调了一大批识水性、会驾船的指战员充当水手。

经过努力，至 4 月初，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筹集运送部队渡江的船只 9400 余只，第一梯队军平均达 500 至 600 只。第二野战军第一梯队 4 个军从群众中动员的船工和从部队选调的水手共达 4400 余名，第三野战军仅第 7、第 9 兵团就达 7000 余人，基本上满足了航渡的需要。船只和水手集中后，依船只的大小、性能，分别编组为突击、火力（护航）、运输三种船队，分配了水手，配备了军政干部，调整了火器，使每一条船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

人民解放军筹集的船只大多分散隐蔽在内湖、内河，距离长江北岸起渡点一般都在 5 公里左右，为了能在战役发起的前夕把大批船只十分隐蔽地运到起渡点，各级领导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发挥群众智慧，创造出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在不暴露战役意图和不淹溢农田的原则下，在内湖、内河与长江间开凿引河。广大指战员在地方民工的帮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天寒、阴雨、泥泞、工具缺乏等困难，日夜施工，挖掘了数千条引河。如第二野战军工兵部队在 1.5 万名民工的配合下，疏通干涸及浅水河道 150 公里；开挖障碍内河入江的大堤数条；堵筑大小坝 15 道。第三野战军第 9 兵团开挖河道 85 公里，筑坝 37 座，开坝 8 座。船只运抵江边后，为避免船只被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破坏，各部队还构筑了许多隐蔽船坞。仅据第三野战军工兵部队的不完全统计，构筑较大型船坞码头 29 座；第二野战军第 16 军第

47 师构筑小型船坞 220 个。使得船只在渡江前全部隐蔽在江堤后面，做到一声令下，随时即能起渡。

参加渡江作战的地方船工，大部分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但由于渡江作战存在一定的危险，加之他们缺乏军事常识，因而对参战存在不少的思想顾虑，有的担心船只被损坏，有的担心伤亡后家庭生活没有着落，还有的对渡江作战缺乏决心和信心。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的决心和信心，保证渡江作战的胜利，各部队对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入手，以各种生动活泼，船工乐于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使他们了解革命将在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懂得渡江作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意义和同船工本身的切身利益的关系。并通过对比、诉苦、开展立功运动，向他们颁发“渡江船工光荣证”，“船工立功证”等，给船工献旗献花，请会餐，部队首长亲自敬酒，表扬先进事例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荣誉感。广大指战员则以兄弟感情，热情照顾、爱护和团结他们，诚心诚意地拜船工为师，遵守船工的规矩，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使他们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温暖，加深军队与船工的阶级感情，建立同舟共济、胜利渡江的思想基础。以上课、谈心等方式，对船工进行基本军事常识教育，和战士们共同进行实际演练，解决乘船部队与船工的协同配合问题，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研究制定支前参战船工家属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船工伤亡优抚条例，船只损坏赔偿规定，使广大船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和财产有保障。通过这些工作，调动了船工们的参战积极性，他们纷纷表示：“誓把大军送过江去”，“争取渡江第一船”的光荣称号。

五、筹措战争物资，动员人民支前，提高后勤保障能力

百万大军较长时间集结长江北岸准备渡江和渡江作战过程中，需要有数量很大的物资供应作保障，渡江作战中估计将有大量的伤员需要治疗。为此，淮海战役结束后，第二、第三野战军

前委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相继发出了关于渡江战役后勤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后勤部门要认真做好部队集结期间和渡江作战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调整和健全各级后勤工作机构；完成物资补给及粮食筹集供应的准备；做好武器装备的调整配备和弹药的补充、储备；加强运输机构和运输部队的建设，充实运输工具，提高运输能力；调整充实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保证战时能及时收治伤病员；协助地方支前机构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前；有计划地建立和经营军队前进的补给基地。中原局和华东局也相继向地方各级党政系统和支前机构下发了有关指示，对地方支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根据总前委和野战军的统一部署，参加渡江作战的各部队及时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统一全体后勤人员的思想，研究和部署各项后勤工作；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后勤组织机构；组建和充实了辎重部队、担架队、医院。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军区后勤部由新集镇移驻徐州，并以徐州为中心建立运输线，设置后勤仓库，建立了军区的后方基地，负责对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物资供应。第二野战军以舒城为中心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并在合肥、舒城、桐城、太湖地区设置弹药仓库，在安庆以北地区设立给养仓库。同时，在蚌埠至舒城沿线开设了5个中站、11个分站，负责组织铁路、公路的运输。开设了移动的军需物资供应站，保证军需物资随领随发。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负责全军后勤系统的组织指挥，并在安徽合肥和江苏泰州建立了2个后勤基地，分别负责中集团和东集团的后勤保障。同时，组成了中线和东线2个后勤前进指挥所，中线指挥所在合肥、庐江、巢县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负责对中集团的物资补给和伤员救治。东线指挥所在泰州、扬州、高邮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负责对东集团的物资补给与伤员救治。为保证作战物资的顺利前运，2个后勤前进指挥所还分别建立了由合肥、滁县经蚌埠、固镇至徐州及由高邮经淮安、淮阴、新集镇至临沂的2条运输干线。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实施，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补充和储备了大量的物资。为每个指战员配发了1套夏装、2双鞋，补发配齐了米袋、子弹袋、被子、饭碗、炊具、蚊帐、雨衣、雨布等各种装具。储备了每人1套夏装。伤员所需用品，按伤员预计数的50%下发部队医院，其余作为储备，随时下发。武器弹药，第二野战军对各部队补足轻重武器弹药各4个基数；第三野战军规定各级携带的弹药基数为：军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兵团轻武器0.25个、重武器2个基数，野战军后勤部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另外，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在仙女庙、滁县、合肥等仓库储存5至6个基数，华东军区后勤部储存重武器6个、轻武器2个基数，随时准备供应部队。

华东支前司令部及苏北、江淮和皖西地区的政府筹措了能满足全军（包括民工）近5个月生活需要的粮食2.22亿公斤，并在上述地区建立了52个粮站，5条运粮干线，保证粮食等物资随时供应部队；同时，还储备了大量的油、盐、肉等副食品，仅在徐州、蚌埠两地即储存食油75万公斤，食盐285万公斤。部队自身也筹措了一定数量的副食品，如第10兵团携带猪肉5万余公斤，第23军携带食油1.25万公斤，食盐1.55万公斤⁶，猪肉1.25万公斤。

为了及时将各种物资运往前线，动用了各种运输工具。仅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后勤司令部直属第1、第2中站即动用了火车车厢8.15万余节，汽车5074台，马车4949辆，船2371只，手推车2051辆，全战役共运送物资7.6万余吨。

为了使伤员能及时得到治疗，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召开了卫生工作会议，调整了医院的设置。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按照预计收治1.2万名伤员的计划，将原来的1个总医院和7个分医院编为10个分医院。其中第3、第4、第5兵团各配给2个分院，归兵团后勤部指挥，负责收治本兵团的轻伤员；野战军后勤部直接掌握4个分院，负责收治各兵团分院转来的重伤员。华东

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后勤部按照预计收治 10 万名伤员的计划，设立了 12 个野战医院，其中野战军后勤部所属的 8 个野战医院负责收治东集团的伤员；华东军区后勤部所属的 4 个医院负责收治中集团的伤员。

在总前委、中原局、华东局的统一部署下，在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和支前机构的领导下，中原、华东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各地政府除动员了大批船只外，还集中了大量的粮食、柴草和各种副食品；编组了大量的车船运输队和随军担架队、挑运队；参加修复铁路、公路、桥梁等工程，并在军队的统一部署下，协助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疏河、开坝等工程保障工作。据第三野战军不完全统计，全战役共动员民工 223.8 万人，有山东、苏北的 21 个民工团随军服务，随军担架 3 万余副，随军手推车 2.12 万余辆，随军挑子 3.95 万余副，民船 2.5 万余只。山东妇女赶做的布鞋达 200 万双。完全实现了“要人有人，要船给船，要粮给粮”，“部队进到哪里，人民支援到哪里”的口号。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强大的运输力，不仅满足了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需要，而且也为渡江后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作好了物质准备。

六、扫除江北国民党军据点，开辟渡江前进基地

国民党军在组织长江防线时，以正规军约 7 个师和部分保安团队，分别据守安庆、枞阳、裕溪口、浦镇、浦口、仪征、三江营、口岸等江北沿岸 30 处要点，组成江北岸防御警戒阵地，企图控制江北内河出口，阻止人民解放军船只入江，破坏解放军渡江准备，并保障其海军巡弋长江的安全，为进一步巩固江南防御阵地争取时间。人民解放军为配合和平谈判，并控制渡口，开展渡江准备工作；封锁江面，限制国民党海军活动，开辟渡江攻击道路，保证部队顺利渡江，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拔除国民党军江北据点。

3 月 14 日，第三野战军发出关于肃清江北国民党军桥头堡作

战的指示，决定：第7兵团攻歼枞阳至刘家渡的守军；第9兵团攻歼刘家渡至裕溪口段守军；第8兵团攻歼浦口地区守军；第10兵团并指挥苏北军区部队攻歼八圩港、龙稍港、口岸、三江营地段守军。指示要求各兵团在进行上述作战时，一般应使用渡江作战的第二梯队，以保持第一梯队渡江作战时的突击力。对各据点守军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位于解放军主渡地点的国民党军，应采取断其退路，速战速决的手段，坚决将其全歼；对兵力较大，又非解放军主渡地点，对渡江准备工作妨碍不大的据点，则可采取分割围困逐次各个歼灭的方法歼灭之，如不好打，则可改为以小部兵力监视、围困，待主力渡江时再加以歼灭。

遵照野战军的指示，各兵团从3月下旬开始，发起肃清江北国民党军桥头堡的作战。29日，第7兵团第22军首先以5个营的兵力向枞阳镇守军发起攻击，当日下午肃清外围据点，接着攻击守军核心阵地，激战至30日黄昏，全歼守军第55军第29师5个连，计毙伤130余人，俘虏759人，并迫使桐城保安第2团7个连投诚。第24军奉命攻歼安徽无为县土桥镇、刘家渡守军，该地位于第24军渡江地段的两翼，均紧靠长江，有内河出口，并建有小型码头，是解放军的重要起渡场所。土桥镇驻有国民党军第55军第74师1个半营约700人，刘家渡驻有第88军第149师1个加强连。3月31日，第24军第72师第215、第216团各一部采取迂回包围，首先断其退路，尔后实施全面攻击的战术，向土桥镇发起攻击。守军在海军“安东”、“英豪”舰炮火的支援下，拼死抵抗。攻击部队经激烈战斗，至4月2日黄昏，攻占土桥镇，全歼守军，并击伤其海军“英豪”舰。与此同时，第71师一部于4月1日攻克刘家渡，歼守军1个连。至此，第7兵团渡江地段内北岸已无国民党军。4月12日，第24军又趁守军换防之际，以奇袭手段攻占太阳洲，歼守军第88军第149师2个营大部。

第9兵团第25军第75师一部于4月8日晚向无为县雍家镇地区发起攻击，守军第20军第134师1个营于9日拂晓逃跑，攻

击部队发起追击，俘其 120 余人，占领雍家镇、中路码头等地。接着，又于 10 日攻克二坝、杨家坝据点，歼守军 1 个连。4 月 8 日晚，第 27 军以 2 个营的兵力向无为县马头口发起攻击，经 1 小时战斗，全歼守军第 88 军第 149 师 1 个连。与此同时，第 30 军第 90、第 89 师各 2 个团，于 7 日和 8 日分别向位于裕溪口、西梁山的守军第 20 军第 134 师 2 个团发起攻击。经 4 昼夜战斗，攻占上述两地外围阵地。随后，为迷惑国民党军，使其无法判明解放军的主渡点，第 30 军奉令于 11 日停止攻击。

第 8 兵团第 26 军第 78 师一部在苏北军区警备第 7 旅的配合下，于 4 月 7 日晚向仪征守军发起攻击，经 8 小时激战，攻占该城，歼守军第 4 军第 59 师一部。8 日夜，第 20 军第 60 师 1 个团，在 6 倍于守军炮兵火力支援下，向京杭大运河入江口要地三江营发起进攻，于 9 日晨攻占该地，歼守军第 51 军第 41 师 1 个营，并击沉炮艇 1 艘、击伤 2 艘。与此同时，第 20 军侦察营、警卫营、第 60 师 1 个团攻取了扬中县西部的新老洲，歼守军江苏保安第 4 团 1 个营。由于新老洲位于长江之中，对掩护江面航道和南岸阵地均有重要作用。因此，国民党军于 13 日趁解放军第 20 军与第 26 军交接防务之际，以第 54 军第 198 师在 3 艘军舰、4 架飞机的支援配合下，向新老洲反扑。由于解放军对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准备不周，加之交接部署尚未完成，在匆促应战后撤出新老洲。16 日，第 26 军以 1 个团的兵力，再次向新老洲发起攻击，经 2 个多小时的战斗，攻克新老洲，歼守军 1 个保安团。4 月 17 日中午，第 20 军 2 个团在警备第 6 旅的配合下，向永安洲发起攻击，战至 18 日拂晓，攻占该洲，歼守军第 51 军第 41 师 1 个团，俘 900 余人。

至此，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据点已大部被肃清，尚存的安庆、裕溪口、浦口、浦镇等据点，对人民解放军渡江已构不成大的威胁，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不再攻占上述各据点。

人民解放军经过 2 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至 4 月中旬，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只待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即可渡

江南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渡江战役。渡江战役，依据总前委的预定部署及战役实施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南京；第二阶段，在安徽郎溪、广德地区合围歼灭南逃的国民党军，占领杭州及浙赣铁路；第三阶段，攻占上海，解放南昌、武汉等地。

第三节 突破江防，占领南京

一、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

4月20日18时，中集团首先开始渡江作战。第7、第9兵团的第一梯队第21、第24军和第25、第27军，分乘数千只木船，在裕溪口至枞阳镇100余公里的正面上，趁夜幕扬帆起航。时逢西北风，船借风力，劈波斩浪，驶向南岸。先头船距南岸300米时，国民党军才发觉，慌忙开炮拦截。人民解放军炮兵群立即以强大的炮火发起还击，将国民党军炮兵阵地大部摧毁。这时，国民党海军太原、安东、楚同、美孚等4艘军舰及巡防炮艇多艘，分别从芜湖、铜陵等江面向解放军船队进行攻击拦截。人民解放军发扬近战传统，将木船驶近国民党军舰艇，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炸，用炮轰，使国民党舰艇“均负伤，弹痕累累。”“被迫驶向芜湖下游”。^①

21时许，第27军第一梯队在荻港至旧县一线登陆，突破国民党军第88军防线。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1营3连5班所乘木帆船，首先在夏家湖附近登上南岸，成为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

^① 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戡乱》，第262页。

一船”。接着，登陆部队经 2 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旧县、荻港守军 1 个多团 3000 余人，控制了旧县、荻港要点。与此同时，第 81 师攻占黑沙洲，全歼守军第 313 师 1 个团，紧接着于 21 日晨渡过夹江，突破守军南岸防线。第 25 军于 20 日 23 时 30 分在大套沟到鲁港段强渡成功，先后攻占双窑、汪家套、横山桥、铜山等要点，歼国民党军第 20 军一部。第 24 军在起渡后 30 分钟分别登上闻新洲、紫沙洲。经 3 小时激战，全歼守军，俘国民党军第 149 师副师长以下 1500 余人。接着强渡夹江，在铜陵至荻港一线登陆成功。第 21 军在 20 日夜攻占长生洲、余水洲，歼国民党军第 55 军第 29 师 1 个加强营。

至 21 日晨，中突击集团已有 10 个师 28 个团到达长江南岸，并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反击，建立了东西 120 余公里、纵深 20 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拦腰斩断。21 日白天，中集团继续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展进攻。相继攻占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中突击集团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后，引起国民党军全线震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 21 日赶到芜湖组织堵击，并急令位于南京汤山之第 99 军主力前往增援，但已无济于事。当第 99 军主力抵达宣城时，国民党军第 20、第 88、第 55 军等部已放弃江防阵地向南撤退。第 99 军主力也随之南逃。当日晚，人民解放军东突击集团和西突击集团按预定计划，同时发起了强大的渡江作战。

21 日 19 日 30 分，东突击集团第 10 兵团的第一梯队第 23、第 28、第 29 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分别由七圩港至夹港，夹港至八圩港，八圩港至张黄港地段，并肩南渡。国民党军的炮兵不时进行拦截，海军舰艇也向解放军船队进行攻击，空军飞机不断投掷照明弹、汽油弹，支援陆军作战。解放军突击船队在炮火的支援下，冒着守军的枪林弹雨，一面向国民党军的舰艇、飞机还击，一面用铁锹、钢盔协助船工划水，加快船只航行速度。20 时许，第

23军攻占王坍港、天生港、下三圩港、桃花港。第28军攻占徐村、朱家垫、新老沟。第29军攻占石碑港长山北麓。接着各部分别击退守军的多次反扑，巩固了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

22日凌晨3时，中共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率守军7000余人起义，起义人员活捉了要塞司令戴戍光，并掉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守军和江上海军舰艇，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22日，要塞炮台与特种兵纵队炮兵部队共同封锁了长江，击伤国民党海军舰艇19艘，断绝了国民党舰艇东逃的航道。江阴要塞位于江苏省江阴县城附近，东倚上海，西近南京，南临宁沪铁路，北靠长江，以黄山为中心，东起肖山，西至居山，中有狼山、福山、长山，是国民党军经营多年的江防要点。江阴要塞辖炮兵总队、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和工兵营等，并在各山顶构筑有炮兵阵地，山腰、山脚筑有堑壕、地堡，港口敷设有木桩、铁丝网等，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控制着东西约20公里的长江江面，是国民党军南京以东的江防门户。为了争取江阴要塞部队在适当的时机起义，中共盐阜地委、华中工委和第10兵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7年，盐阜地委即派党员至江阴城内建立地下联络站，专门做江阴要塞的争取工作。1948年3月，中共华中工委成立后，加强了对江阴要塞的争取工作，发展了要塞参谋处长等3人为中共党员，地下党组织成立后，即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逐步掌握了要塞司令部、守备总队、工兵营及炮台等要害部门和部队的领导权，为适时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1949年3月，第10兵团遵照野战军的指示，又选派了一些干部打入要塞，加强起义的领导力量。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关键时刻，江阴要塞的起义，减少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伤亡，加快了渡江战役的进程。

东突击集团第10兵团突破国民军江防后，汤恩伯严令第21、第51、第54、第123军等部，自潘墅镇、申港、夏港等地向人民解放军组织反击，企图将人民解放军消灭在滩头阵地或赶到长江里去，恢复江防阵地。从22日凌晨开始，国民党军向人民解放军

发起反扑。人民解放军沉着应战，经激烈战斗，至22日中午，第23军击退了第54军的反扑，击毙第291师师长，击伤其副师长，并攻占圩塘、石庄、徐墅、璜土、百丈镇等地。第28军粉碎了第21、第51军各1个师的进攻，歼其2个团，俘第230师师长以下2500余人，挺进至三河口、秦皇山、南闸一线。第29军打退了第21、第123军各一部的多次反击，歼其1个团，进至南闸、云亭、周庄一线。第31军于21日午夜随第29军南渡，22日攻占江阴。至此，第10兵团已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

东突击集团第8兵团第20军，于21日夜由三江营至龙稍港段向扬中发起渡江突击，经激烈战斗，于22日中午攻占扬中。第35军于21日零时向江浦、浦镇守军发起攻击，牵制南京的国民党军，战至天明，攻占江浦县城，并扫清浦镇外围阵地，全歼、重创守军各1个团。接着，于21日上午向浦镇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第28军顽强抵抗，经10多小时激战，第35军攻取了守军主要阵地，守军害怕被歼，于22日南逃。是日中午，第35军解放浦镇、浦口。第34军于22日攻占瓜洲，并开始由仪征至扬州段渡江，在炮火支援下攻占北新洲等江心洲，准备强渡夹江。第26军也于22日开始渡江。

西突击集团于21日17时集中各型火炮300余门，开始炮火准备，经过1小时的连续炮击，将长江南岸国民党军主要防御阵地大部摧毁。18时许，第3、第4、第5兵团的第一梯队第11、第12、第13、第15、第16军分别由石矾头至前江口，华阳镇至八宝洲，吉阳至埠康圩段登船起航。时逢天降大雨，刮着东北风，在这有利天气的掩护下，船借风势，直驶南岸。国民党守军在海、空军配合下，集中火力向突击船队疯狂射击。突击船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前赴后继，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力争成为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直冲对岸。有的船船工负伤后，战士们立即接替，继续摇橹、掌舵；有的船只被打翻后，战士们纷纷

跃入长江，依凭着救生器材和熟练的游泳技术，一手划水，一手举枪射击。当突击部队接近南岸时，即以船上火力压制守军，掩护突击队登陆，各突击队不等船完全靠岸，就涉水冲向南岸，迅速歼击守军，夺取滩头阵地。先头突击连仅用 15 分钟即强行突破登陆成功。20 时许，西突击集团全线登陆成功。第 3 兵团第 11、第 12 军的第一梯队的 4 个团占领了乌沙闸以西吉阳镇、军城、阜康圩等地，歼守军第 96 军第 212 师 1 个团大部；5 兵团第 16 军 2 个团攻占黄石矶以南高地，歼守军第 96 军第 141 师一部；第 4 兵团第 15 军攻占香山，第 13 军攻占八宝洲，歼守军第 68 军第 143 师一部，接着，由八宝洲至小孤山强渡夹江，抵达南岸。各部队登陆后各以一部横扫沿岸守军，主力则向纵深挺进，后续部队也及时迅速南渡。至 21 时，西突击集团已渡过 16 个团，控制了长江南岸宽 100 余公里、纵深 10 公里的登陆场。22、23 日，西突击集团继续向沿江守军实施攻击，相继攻占彭泽、东流、至德、贵池、马当、高坦、青阳等地；22 日，安庆守军第 46 军第 174 师被迫弃城南撤。第 10 军主力随即进驻安庆，第 10 军第 29 师、第 11 军第 31、第 32 师则迅速发起追击，将第 174 师大部歼灭于吴田铺地区，俘 5200 余人。至此，西突击集团顺利完成了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任务。

在东西突击集团强渡长江的同时，中突击集团主力继续发展攻势。22 日白天占领南陵，歼守军第 88 军大部。第 21 军于 21 日晚由长生洲、余水洲向江南岸守军实施进攻，当晚突破上、下江口守军阵地，占领沿江各要点。22 日，会同第 3 兵团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第 30、第 33 军也于 21 日晚开始南渡，22 日上午全部到达南岸，分别在繁昌、荻港地区集结待命。

第四野战军第 12 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 3 个军区部队，在解放荆门、汉川、浠水、黄梅各县城后，积极向长江北岸挺进，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

二、解放南京

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沿江部队也迅速陷入混乱之中。为逃脱被分割围歼的命运，以图在浙赣铁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22日下午仓卒部署总退却。镇江以东的第21、第51、第54、第123军向上海撤退；镇江以西的第4、第99、第28、第45、第66、第20、第88、第55、第96、第68、第106、第73共12个军分别向杭州、浙赣路撤退。但是，“由于命令传递费时，或通信失灵，联络中断，致使各部队转进发起时间，先后不一”，至23日拂晓，各部才分别开始行动。同时，由于“长江防线过早崩溃，致转进作战，既缺乏预定计划，更无充分准备，第一线各军、师，在匪军强劲压力下，脱离战斗，无统一指挥与管制，致彼此争先恐后，秩序混乱。”又因“各级指挥机构，争先撤离，以致通信联络中断，既无强有力之统一指挥，更未设置第二线阵地，任令大军相互争道，各自为战，终至被匪军各个击破”，“损失重大，其间能安全脱离者甚少。”^①位于南京机场的作战飞机，也于22日分别飞往上海、武汉机场。

为了不给国民党军以喘息的机会，人民解放军于22日，一面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猛烈扩展攻势，一面组织第二梯队继续南渡长江。至23日，东集团主力占领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切断了宁沪铁路；第34军乘胜渡过长江，占领镇江。同日，李宗仁等国民党政府官员逃离南京。当晚，第35军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接应下，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市，24日凌晨，第35军第104师第312团首先进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南京解放后，新华社于24日发表了《庆祝南京解放》的社论，指出：“南京的解放正式地表示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纵然还在广州、台湾、桂林等地苟延残喘于一时，已经再也维持不了一个什么局面了，现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70、第71页。

在匪首蒋介石以及依附匪首蒋介石的反革命死党，他们的末日真正到来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完全的胜利，除了疯子以外谁也不会有丝毫怀疑了。”^① 5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同胞，热烈庆祝南京的解放，贺电指出：“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闻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

23日，中集团第30军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西集团逼近石埭、浮梁。

至此，人民解放军胜利达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除上海附近地区外，已彻底崩溃，国民党反动派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的企图彻底破灭。人民解放军东、中、西3路大军已全部展开于长江以南，且已深入国民党军防御纵深30至70公里，为下一步追歼南逃之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江江面后，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30艘，于南京以东笆斗山江面起义。另有第3机动艇队23艘艇在镇江附近江面起义。为了争取林遵率部起义，中共中央驻上海情报机构和第三野战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48年1月，林遵出任第2舰队司令后，上海情报机构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与林遵联系做争取工作，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积极争取下，林遵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机率部起义。1948年12月13日和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两次电示华东局和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指出：“你们可以派得力干部去与林遵接洽。我们的态度是

^① 《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10月出版，第429页。

欢迎他们起义，为人民立功”，“起义时机，待接洽好后再定”。“最重要的是要林隐忍待机，切勿暴露，免在事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上海情报机构加紧了对林遵的争取工作，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为解放军渡江前夕。2、3月间，第三野战军也派第29军第85师政治委员孙克骥等人赴第2舰队，联系起义事宜。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争取下，林遵终于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率部起义。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的起义，不仅减少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伤亡，也为组建华东海军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朱德称这一起义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在人民解放军举行渡江作战时，英国军舰于20、21日先后2次共4艘，于江阴、镇江段向解放军北岸阵地炮击，致使解放军第202团团团长、政委以下252人伤亡，犯下了严重罪行。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伤其“紫石英”号，迫使其停泊于镇江附近江面（后于7月30日夜乘隙潜逃），其余舰艇缩返上海海面。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4月30日发表声明，严正抗议英国军舰这种干涉行径和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和赔偿。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空、领土，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除充分的政治动员外，在战役指挥上主要是：1. 周密地进行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战役侦察和船只、水手的准备十分充分，从而确保战役一发起，即能按预定计划顺利突过长江。2. 确立力争偷渡，准备强渡的思想，采取助攻与主攻、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并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国民党军，保持了战役发起的突然性。3. 根据长江的地形特点和国民党军的江防特点，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作战部署，使国民党军全线告急，在千里江防上防不胜防。4. 按照江河作战的战术要求编组船队，使各船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并加强船只的起渡和回航的组织指挥，保证后续梯队能及时跟进登陆。

第四节 追歼南逃之国民党军， 控制浙赣铁路

一、总前委调整第二阶段的任务和部署

第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后，总前委于22日中午发出指示，指出：“渡江任务业已完成。我军今后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在皖南沿江敌后撤条件下，我七、九两兵团应迅速向东挺进，不为沿途敌据点所抑留”，以便迅速与东突击集团会师，并规定，从即日起，第7、第9兵团直接归粟裕指挥。23日，总前委又根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调整第二阶段的作战部署，取消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东进参加解放和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第5兵团之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3、第5兵团歼灭浙赣线之敌；以第8兵团部率2个军担任南京、镇江城防和警备任务；以第30军暂时担任芜湖城防，尔后交由第二野战军第10军接管。

遵照总前委的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迅速调整部署。22、23、24日，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连续发出多道命令，令中、东两集团加速向吴兴、长兴地区挺进，截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的退路，完成战役合围，然后合力聚歼之。并对各部的追击路线作了如下规定：第9兵团除以第30军暂任芜湖城防，以待第10军接替外，其余各军沿南陵、宣城、十字铺、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第7兵团以第24军尾第9兵团之后东进，主力迅速将攻击矛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9兵团右侧后成梯次前进，进至宣城、宁国、广德地区集结待命。第8兵团部率第35军迅速进驻南京，第34军进占镇江，分别担任该两地的警备任务，第20、第26军归第10兵团指挥，与第23军共同沿丹阳、金坛、溧阳之线急速南下，尾

追南京、镇江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第10兵团以第29军沿宁沪铁路东进攻占苏州，向上海方向警戒，以第28、第31军沿太湖西侧向长兴、吴兴猛进，与第9兵团会师。同时，命令要求各部应不顾疲劳，不怕饥饿，不为小股国民党军所箝制，勇猛前进。

第二野战军于23日发出向浙赣线进击的部署命令：第3兵团除以第10军主力任芜湖、安庆地区的警备任务，并维护后方交通线之安全外，兵团部率第11、第12军沿贵池、青阳、石埭、太平向徽州前进；第4兵团沿至德、浮梁、德兴、婺源以西向上饶地区挺进；第5兵团沿祁门、浮梁、德兴、婺源及其以东地区向衢县地区前进。并要求全军各部队应排除困难，不怕疲劳，不怕走山路，应按急行军速度前进，猛力追击，先头师团更应轻装疾进，务求抓住敌人而歼灭之。

二、郎广围歼战，解放杭州

第三野战军各部接到命令后，高度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牺牲、不顾疲劳、不为小股国民党军所扣留，冒着风雨，在泥泞道路上以每小时6至8公里，有时甚至10公里的速度日夜兼程，跋山涉水，穷追猛打。有的部队连续四五天急行军，顾不上休息，一天只能吃上一两顿饭，有时甚至吃不上饭，饿着肚子追击国民党军，加上缺乏雨具，衣服淋湿，体力消耗很大，病号不断增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追上敌人，多歼灭一些敌人。沿途的江南人民也热情地支援人民解放军，他们扛着门板、梯子等，在被国民党军破坏的桥梁边，架起一座又一座的新桥；他们抬着米饭、开水，送到急行军战士的手中；他们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地迎送战士们；他们向战士们控诉国民党军的罪行，要求战士们不要让国民党反动派逃掉一个，为他们报仇。江南人民的热情支援和殷切希望，激励着广大指战员，他们的脚步越走越快，越走越有劲，很快追上了溃逃的国民党军。

23日凌晨，中集团第25军渡过青弋江，前卫师进抵芜湖附近的湾址镇附近，与国民党军第20军和第99军一部和1个保安旅

遭遇。第25军前卫师迅速展开，并派部队抢占了桂花山和皂角树两处高地，堵住了国民党第20军等部的逃路。国民党军为夺取桂花山，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集团冲锋。扼守桂花山的解放军指战员，在满是泥泞的战壕里，沉着应战，坚决守住了阵地，后续部队也及时赶到加入战斗，战至下午2时，将国民党军第20军等部压缩于方圆不到两三公里的山洼里，第25军就势发起冲击。战至黄昏，第20军等部除少数漏网外，大部被歼，第20军军长杨干才被击毙，副军长陈亲民以下1.3万人被俘。

第27军于23日下午进到宣城以西的寒亭附近，歼国民党第88军第49师1个团。24日又在宣城歼国民党第99军第92师大部、第88军第149师残部、第20军第134师残部共4000余人。接着，第27军以日行六七十公里的速度向东挺进，连克洪林桥、广德、泗安等城镇，歼国民党军一部。28日凌晨，先头部队在吴兴县虹星桥与先期到达的东集团第28军会师。

东集团第23军于25日夜攻占溧阳县城，并于26日在溧阳城南截歼南逃之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俘9000余人。同日，第20军在溧阳以西的胡桥、南渡和施家桥地区截歼国民党军第28、第45军及联勤总部等各一部，俘1.2万余人。第26军则先后在句容县的天王寺、蔡巷和溧阳县的上兴镇等地，歼国民党军后尾部队近7000余人。第29军沿宁沪铁路攻击前进，于27日晨解放苏州。第28军于25日黄昏攻占宜兴城，27日占领吴兴，沿途俘国民党军7500余人，并于28日凌晨在虹星桥与中集团第27军胜利会师。至此，切断了宁杭公路，封闭了合围口。

由南京、镇江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除第54军先期逃往上海外，其余第28、第45、第4、第66军大部及第51、第99军各一部共约8万余人，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山区，乱成一团，狼狈不堪，成了瓮中之鳖。

根据上述情况，粟裕、张震于28日决定，由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

及第 20、第 28、第 31 军歼灭被围之国民党军。并指示，由于国民党军已溃不成军，毫无战斗力，事实上已用不了 7 个军，因此可根据各部队的疲劳程度和路程远近情况，灵活使用兵力。第 7 兵团指挥第 21、第 22、第 23 军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攻击前进。第 24 军在参加广德附近地区战斗后，即开南京归还第 8 兵团建制，接替第 35 军南京警备；第 35 军交防后即归建第 7 兵团。

第 9 兵团首长依据粟、张指示，立即作出围歼国民党军的部署，指示各军同心协力，不怕打乱建制，实施多路向心突击，猛插猛打，哪里有国民党军就往哪里打，务必彻底全歼被围之国民党军。各军接令后迅速调整部署，实施攻击。第 25 军于 28 日由郎溪向东南方向猛扑，战至 29 日拂晓，俘国民党军 7000 余人。第 33 军于 28 日晨 5 时由广德向虹星桥挺进，在十里沟、步家祠和泗安镇一带同大批国民党军遭遇，各部立即展开，迅速将其压缩至广德至泗安公路以北山区，战至 21 时，先后歼国民党军第 45 军第 102 师、第 66 军第 13 师等部，俘 1.1 万余人。29 日又在独山镇地区俘获溃散之国民党军千余人。第 31 军由宜兴湖、张渚一带向南攻击前进，先后在广德东北小施家、凤凰浦西山、祠山庙、下府村和长兴西天平桥、八里庙、泗安镇等地，歼国民党军第 28、第 45 军各一部。接着，向流洞桥方向发展，会同第 23、第 33 军等部，将溃散之国民党军全歼于独山镇地区。第 31 军共歼国民党第 21、第 4、第 45、第 28、第 66 军各一部计 2 万余人，其中俘第 66 军军长罗贤达、第 45 军副军长陈阵以下 1.6 万余人。第 23 军在归建第 7 兵团的途中在长兴县白岩与国民党军第 4 军一部遭遇，当即发起攻击，俘 3000 余人，随后又在流洞桥地附近歼第 4 军第 90 师等部，俘 5000 余人。第 24 军在泗安附近地区歼国民党第 4 军一部，俘副军长李子亮、军参谋长罗野平以下 7000 余人。至 29 日，郎广围歼战胜利结束，共俘国民党军 6 万余人。

与此同时，第 7 兵团部率第 21、第 22 军向杭州勇猛疾进，第 23 军在郎广围歼战结束后，也立即向杭州挺进。5 月 1 日，第 21

军进占孝丰，2日进占余杭；第23军占领武康。这时，得悉杭州国民党军已开始撤退，并准备炸毁钱塘江大桥，第7兵团当即令各军加速前进。各军受令后，迅速向杭州攻击前进。第21军第62师沿杭州至富阳公路直插钱塘江大桥，3日拂晓，攀登上五云山峰，突然出现在大桥桥畔，发起夺桥战斗，经30分钟激战，击溃了守桥部队，占领大桥，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炸毁大桥的阴谋。至下午1时，第21军占领杭州市区，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同日黄昏，第23军也进抵杭州市，接替第21军杭州防务；第22军抵达武康、安吉一线。第21军继续向南追击，5日解放萧山、富阳两城，7日进抵诸暨，与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一部胜利会师。

三、占领浙赣铁路，切断汤、白两集团的联系

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遵照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在近200公里宽的正面上，以上饶、歙县、贵溪为目标，多路并肩向南追击。在追击的初期，由于对国民党军溃乱的情况认识不足，以至多采取正面平推的战术，同时又为国民党军少数后卫掩护部队所牵制，贻误了战机。刘伯承、邓小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指示部队：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必须实行猛追、猛打、猛冲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的战术，要敢于以少胜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各级党委也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要求全体指战员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大小城镇所阻留，不怕挨饿吃苦，狠追猛打，全歼逃敌。

各部队立即调整部署，改变追击战术。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阴雨连绵、道路崎岖泥泞、雨具缺乏、病号增多的种种困难，每天以50至80公里的速度，翻山越岭，抢占要点，使南逃之国民党

军有的未撤至指定地点即被歼灭；有的刚刚窜入预定地区，喘息未定即受到攻击。至5月1日，第3兵团相继解放石埭、太平、黟县、祁门、歙县、屯溪、休宁等城；第4兵团占领乐平、景德镇等地；第5兵团进至婺源地区。各兵团在追击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第106、第46、第96、第68、第73、第55军各一部，粉碎了国民党军第8、第17兵团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组织防线的企图。

5月1日，毛泽东指示总前委和第二野战军领导人：杭州、上海之国民党军所剩无几，第三野战军不日即可歼灭。第二野战军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国民党军。因三区之国民党军亦不甚多，故二野3个兵团似不需要集中使用，而以分置于三区为适宜，以便在国民党军歼灭之后，即可开辟三区的工作。遵照上述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确定，第3兵团2个军分向建德、兰溪、金华、汤溪、龙游进击，寻歼分散之国民党军，阻止其向东北及东逃窜，兵团直属机关及1个师留在徽州、屯溪地区清剿溃散之国民党军，并协助开展地方工作；第4兵团主力分向开化、衢县、常山、江山、玉山、上饶地区进击，一部留在浮梁、婺源地区清剿溃散之国民党军；第5兵团主力向横峰、弋阳、贵溪、东乡地区进击，一部在乐平、万年、鄱阳地区清剿溃散之国民党军。

各部队按规定的路线和区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利用缴获的各种交通工具，冒雨继续向浙赣铁路挺进，沿途追歼国民党军第68军第119师、第106军第192师、暂编第3师全部，第73军、安徽省保安第5旅大部。

5月4日，第4兵团第13军主力攻占弋阳，守军第68军副军长率第81师投诚，一部占领贵溪，并于次日与由司令员曾镜冰率领的闽浙赣纵队一部会师；第15军第43师攻占德兴，俘第68军第143师副师长以下2400余人，第45师攻占横峰、上饶，俘守军千余；第44师攻占铅山，歼交警第7、第8总队1500余人。第14军于5月5日攻占东乡、鹰潭。至此，控制了浙赣线东乡至横

峰段。

5月6日，第5兵团第16军解放江山，歼第96军第141师2个团等部5000余人；第17军在向衢县挺进途中和攻占衢县的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8兵团司令部、第9编练司令部、第55、第96、第85军各一部共万余人，与第16军共同控制了衢县至玉山段铁路；第18军于5月5日至7日在婺源东北歼安徽省保安司令部及保3旅共7000余人，俘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和保安副司令阮云溪。

第3兵团在解放了皖南及皖浙边境的广大地区后，向浙赣线挺进。第11、第12军主力于5月6日占领金华，一部占领龙游。7日，以第12军第35师利用缴获的火车向东挺进，占领东阳等城，并与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21军会师于诸暨。至此，第二野战军即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400余公里的浙赣线。

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4月28日，先遣兵团归还第四野战军建制。至此，渡江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实施追击作战过程中，坚持敌后各地的游击武装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援。这些游击武装大多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北撤时留下的少数干部和部队发展起来的。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团结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封锁和围剿，坚持国民党统治区的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人民解放军渡江时，仅皖南游击队就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7000余人，活动地区遍及苏、浙、皖、赣的40余个县。人民解放军主力渡江后，各地游击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他们主动侦察报告国民党军的情况，为主力部队送情报、作向导，安置伤员，筹集粮草；协助地方党组织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支援野战军；积极堵截、袭扰、打击国民党军，解放了许多

地方，仅皖南游击队就解放了屯溪、休宁、黟县、泾县等城市，并争取了安徽省保安第5旅1700余人起义。江南游击队为解放江南广大地区作出了贡献。

在第二阶段作战过程中，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各级后勤部门和地方随军支前机构及时跟进，在部队作战沿线迅速设置兵站、医院、仓库，及时供应作战物资，抢救、治疗伤病员。同时，遵循有关新区征借粮草、动用民力等有关规定，依靠群众就地筹措给养，据不完全统计，仅第4兵团在4月23日至5月13日，就筹借和缴获粮食390万余公斤，其中筹借204万公斤；第7兵团筹借36万公斤，缴获132万公斤，另马草23万公斤，烧柴28万余公斤。由江北随军渡江的民兵和担架运输队伍，冒雨随军急进，历尽千辛万苦为部队运送粮弹，转运伤病员，看押俘虏。所有这一切，不仅为部队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广大指战员。

战役第二阶段，第二、第三野战军在郎、广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控制了浙赣铁路，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从而为下一步攻占上海，继续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阶段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役指挥上，总前委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部署，要求东、中突击集团迅速猛力对进，完成对宁、镇地区南逃国民党军的合围，并乘其混乱之机，迅速将其全歼；西突击集团全力向浙赣线挺进，拊国民党军的侧背，阻绝了白崇禧集团可能的东援，使汤恩伯无法按预定计划组织新的防御。在战术上，一是各追击部队采取了穷追猛打，实施跟踪追击、平行追击、超越追击相结合的战法，使国民党军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纷纷就歼。正如第二野战军在《渡江作战经验总结》中指出的：“对溃逃之敌追击时，应分遣若干能独立自主的轻装支队，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的限制，不为辎重及小的俘获所拖累，不为小股敌人所箝制，长驱直入，大胆迂回，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超越追击与跟踪追击同时并用，并求

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二是在大规模的围歼战中，各部队高度发扬积极、主动、灵活的战术，乘国民党军混乱之际，猛插猛打，使国民党军失却靠拢、集结、组织顽抗、组织突围的一切可能，迅速就歼。

第五节 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

一、国民党军防守上海的企图和部署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口，依江临海，三面连水，人口约500万，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近百年来，该市已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猬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人民解放军渡江前，防守该地的国民党军有第37、第52、第75军和交警总队等。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汤恩伯深感上海守备兵力薄弱，乃将位于浙东地区整训之第12军和位于杭州的第99军第99师车运上海，并将江苏保安部队编组成暂编第1军。22日，又令防守镇江以东及宁沪线的第21、第51、第54、第123军向上海撤退。这样，至5月底，退守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已达9个军25个师，连同交警总队、保安部队等共22万人，以及海军第1舰队和第1巡防艇队所辖舰艇24艘，空军5个大队共56架作战飞机。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太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连续召见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和汤恩伯，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石觉等和团以上军官，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蒋介石的企图是，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继续顽抗，以争取时间，一方面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到台湾，另一方面寻机挑起国际事件，促使美国武装干涉。4月底5月初，蒋介石、汤恩伯等人一再叫嚣，目前盟邦美国要求我们给他

们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只要我们能在上海守6个月，美国就会直接出兵援助我们，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当时，美、英等国的军舰停泊在吴淞口，有实施武装干涉的可能。

上海地区地形平坦，郊区村庄稠密，河流沟渠纵横，地下水位高，不便于大兵团机动和进行土工作业构筑阵地。黄浦江由南而北，贯流上海市区，自然形成浦东及浦西两大区域，苏州河横亘浦西，市北吴淞位于长江与黄浦江的交汇点，是上海市区出海的交通咽喉。市区房屋大多为钢筋水泥建筑，高大而坚固，对一般火炮，具有相当的防护力。上海地区的防御工事坚固配套，早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就修筑了不少钢筋水泥碉堡，日军占领上海后，又修筑了一批永久性防御工事。1948年12月开始，国民党再度构筑大量新的钢筋水泥碉堡和配套设施，到1949年4月下旬，已完成了周边长80公里、纵深8至10公里，可供10个军使用的防御阵地，计有42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1万多个野战卫星工事，各碉堡、工事之间由密如蜘蛛网的战壕相连，构成了以子母堡为核心的火力交叉的多道阵地。并在阵地前沿敷设大量的铁丝网、鹿砦、壕沟、地雷区。其整个防御阵地由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三部分组成，以南翔、华漕、七宝、华泾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以川沙县城至北蔡之线为浦东外围阵地。以吴淞以西之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直至黄浦江边之线为浦西主阵地，以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之线为浦东主阵地，并以其中月浦至虹桥及其纵深约3公里地带为防御中重点中的重点，借以屏障吴淞及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以市区国际饭店、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高大建筑构成核心阵地。同时，屯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除各部队按5个携行基数分发外，另储备各型重炮炮弹5万发，山野炮炮弹10万发，八一及八二迫击炮炮弹500万发，六〇炮炮弹10万发，重机枪弹500万发，轻机枪弹1000

万发，冲锋枪弹 200 万发，枪榴弹 50 万发，手榴弹 50 万枚。

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制定了保卫上海的作战方案，确定了“确保淞沪反攻基地，以待新生力量之成熟，及国际情势之有利变化”，“集中适当兵力，利用淞沪坚固工事，确实组织并发挥陆、海、空歼灭性之联合战力，及运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足以抗衡任何强大之攻击，待消耗衰竭匪之攻击力量后，再行转移攻势，击灭犯匪”的作战方针，以及“匪若以主力，分由宝山、浦东两侧进犯时，以三军协力，断行反击，摧毁其攻势于阵地前。”“匪若以主力分沿京沪、沪杭铁路进犯时，应依大纵深阵地之坚强抵抗，与预备兵力之机动转用，歼灭犯匪于阵地前或阵地内”^①的指导要领。其兵力部署是：以 6 个军 20 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约百辆，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即以第 123 军附暂编第 8 师防守太仓、昆山、青浦、嘉兴、平湖、金山卫之线外围阵地，第 52 军防守吴淞、宝山、月浦地区，第 54 军防守大场、真如、北新泾地区，第 75 军防守虹桥、辛庄、龙华地区，第 21 军及第 99 师防守江湾及虬江码头，第 51 军及交警第 2、第 5、第 6、第 11、第 18 总队防守上海市区。以 2 个军 5 个师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即第 37 军位于浦东市区及南汇之线，第 12 军位于高桥、高行地区。另以暂编第 1 军防守崇明岛，海军除以一部维护海上交通外，主力位于长江口外沿海，封锁江面海口，并支援陆军作战；空军以江湾、大场为基地，轰炸宁沪及沪杭铁路、公路和芜湖至广德间解放军的补给线，并支援陆军防守。

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上海的方针和总前委、第三野战军的部署

总前委根据战局的发展，确定战役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攻取上海，并决定由第三野战军来完成这一任务。同时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浙赣线金华、东乡段进行战备休整，监视武汉地区的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6 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9 年版，第 112 页。

白崇禧集团，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安全。

第三野战军根据渡江战役后各部队的位置，确定以第8兵团部率第24、第34军继续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第25军在金坛、句容、溧水、高淳、郎溪、广德等地区开辟工作，清剿溃散的国民党军和土匪，第26军调归第10兵团指挥。第9、第10兵团分别集结于长兴、吴兴、广德地区 and 无锡、苏州、常熟地区整训，待命进攻上海。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常州东移苏州。

鉴于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达到既要消灭国民党军，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今后建设之目的，向总前委、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首长发出了一系列指示。4月27日，中央军委指出：“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此，“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卒进去，陷于被动。”“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致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①28日又指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段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在攻击上海时，“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和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英美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②30日和5月3日，又先后指示“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60页。

^②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49页。

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
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
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①上海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
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5月10日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
计划：一是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由海上退走，
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工作
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二是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20天或1个月再
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
们的命令。在准备工作中，应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当
得悉国民党正加紧抢运上海的物资时，中央军委于5月6日指示：
请粟、张即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
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
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
成为可能。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
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
以不占，则暂不要去占。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
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不要
去占。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
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
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②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
前委抽调了约5000名干部组成各系统的接管机构，拟制了接管计
划和警备措施。并根据南京、杭州等地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经验，相
继下发了《加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版，第56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版，第576页。

《对外交政策及城市纪律的具体规定》、《入城纪律》、《外交纪律》等指示，并组织接管人员和部队学习。同时，针对上海的具体情况，组织全体干部战士以各种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和外交政策的演练，设想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发动群众找答案，定措施，掀起群众性的讲政策、守纪律、互相教育、互相监督的高潮。

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于5月2日赴丹阳向总前委汇报了夺取上海的三种方案：一是实施长困久围。此种战法可以减少部队伤亡，但上海有500多万人口，生活资料全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困久围将使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而国民党军因有海上通道，不一定能将其围死。二是选择汤恩伯集团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种战法，避开了守军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势必受到大的破坏。三是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这一战法可以封锁守军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其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守军为保持其海上退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决战，这样既可达到全歼守军的目的，又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减少对城市的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但吴淞地区是守军防御的重点，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苦的攻坚战，部队要付出较大的伤亡。粟裕认为，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必要的，因此，倾向于采取第三种方案。总前委经反复权衡利弊，确定采取第三方案。

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指出，在攻占吴淞、嘉兴等处的同时，有必要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完全封闭。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以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抢运物资的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

和平解决上海。具体部署是：

第10兵团指挥第28、第29、第26、第33军，附特种兵纵队炮兵第5、第6团、工兵1个营，首先以第28、第29军附炮兵第5、第6团于12日由吴塔市、常熟、支塘地区出动，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如吴淞、宝山一时难于攻克，则暂以一部监视之，而以得力一部配合炮火由吴淞与江湾之间楔入黄浦江边，攻占殷行镇，切实封锁黄浦江口，阻截国民党军船只出海；第26军应于13日控制昆山、安亭镇，策应第28军作战；第33军集结于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尔后各军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9兵团会攻上海。

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附特种兵纵队炮兵第4团，首先以第20军于14日攻占平湖、金山卫地区，待第31军一部接替后，即集结于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地区；第30军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攻歼该地之国民党军，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一切逃路；第31军于15日接替第20军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上海国民党军的南逃退路，主力适时尾第30军之后，加入浦东地区作战；第27军集结嘉善地区，并控制大东浜铁桥，监视并视机进占松江、青浦。尔后各军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10兵团会攻上海。

为使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物尽量不受或少受损失和破坏，第三野战军还规定部队在市区作战时，力争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

三、上海外围地区作战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外围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14日，第9兵团第20军先后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县南桥镇，进至松江以东地区，歼守军1400余人；第27军攻占松江、青浦，歼守军一部，集结在泗泾地区；第30军尾第20军后，攻占奉贤旧城和南汇，歼守军一部，进至川沙县境，直接威胁国民党军海

上通道及浦东防御重点高桥地区，迫使汤恩伯由市区抽调第 51 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第 10 兵团第 26 军于 12 日夜攻占昆山、青阳港、陆家浜车站，歼国民党军第 123 军第 182 师大部，俘 1700 余人；第 28 军攻占太仓、嘉定、罗店等地，歼第 123 军第 308 师大部，俘 3000 余人；第 29 军攻占浏河，歼守军一部。13、14 日，第 28、第 29 军向月浦、杨行、刘行猛攻。该地区位于吴淞西侧，是吴淞、宝山的重要屏障，国民党军为确保其海上通道，以主力第 52 军防守这一地区。第 52 军依靠星罗棋布的钢筋水泥碉堡和绵密的副防御设施，以炽烈的火网封锁人民解放军的攻击道路，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实施反冲击。国民党海军第 1 舰队所属长江、永泰、永嘉、永宁等舰，以猛烈的炮火支援陆军作战，空军第 4 军区亦频频出动飞机助战，仅 14 日即出动 B-24、B-25、B-26、F-51 型飞机 53 架次，猛烈炸射解放军阵地。攻击部队每攻占一点，均需经过多次反复争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有的反复争夺达 7 次之多。15 日，汤恩伯又从市区抽调第 21 军、第 99 师加强该地区的防守，致使战斗更加激烈。攻击部队由于渡江以来没有遇到严重的战斗，产生了轻敌思想，对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时尚有相当战斗力估计不足，对工事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攻坚的思想准备及物质都不足，致使伤亡较大，第 28、第 29 军伤亡达 8000 余人，进展不大，成胶着状态。

总前委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于 15 日指示粟裕、张震、唐亮、钟期光：“敌目前似企图坚守，在我钳形攻势之下，已难逃脱。请你们更明确告知前线军、师、团长，攻沪战役不要性急，我军应立于主动，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去克服敌之钢骨水泥碉堡”。16 日，粟裕、张震下达了《关于敌守备特点及我应采取的对策》的战术指示，指出：目前我作战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肃清守军外围后，对主

阵地攻击，应绵密侦察，选择守军突出部或接合部与较弱的守军攻击，楔入守军之纵深。尔后由守军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撕破守军之防御体系；集中兵力（应是小群动作，群群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压制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守军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的攻击。这样，使守军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守军已测量好之火力封锁；交通壕作业，迫近守军，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将守军歼于阵地内；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守军之反击部队，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根据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首长的指示，攻击部队及时总结了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第10兵团并调整了攻击部署，第29军集中兵力攻月浦，第28军主力攻杨行，调第33军第98师配属第28军作战，第99师配属第29军作战，第85师主力由苏州东进参战。第9兵团则以第30军迅速向川沙、高桥地区攻击前进，力求以炮火封锁黄浦江江面。

从15日起，攻击部队改变战术后，继续向守军发动进攻，进展较快。第10兵团于当日攻入月浦，17日肃清刘行残敌，19日攻下国际无线电台，俘守军1500余人。

第9兵团第30军于15日攻占川沙，并包围守军第51军于白龙港地区，至16日将其全歼，俘该军军长王秉钺以下近8000人。第31军以一部接替第20军之平湖、金山卫防务，主力与第30军并肩攻击，16日攻占周浦，俘守军2500余人。随后，该两军继续向高桥攻击前进，18日进至高行以北杨家楼、朱家木桥之线，将守军第12军压缩于高桥地区，并割裂其与浦东市区第37军的联系。此时，汤恩伯为保障吴淞口的出海通路，又将第75军第95师由上海南郊东调增防高桥。高桥地区濒江依海，三面环水，地下水位高，不便土工作业，攻击部队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守军却

利用这一地形和钢筋水泥碉堡，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向攻击部队频频发起反冲击，战斗异常激烈。战至19日，第30军攻占高桥以东益仓桥、徐家宅等地，第31军攻占高桥以南金家桥和黄浦江边庆宁寺等地，迫使汤恩伯于22日又将第75军全部增防高桥。23日下午，第三野战军特种兵重炮部队进至王家湾及其以西地区，对高桥东北海面的国民党军舰实施猛烈轰击，当即击伤7艘，其余狼狈逃窜。至此，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封锁高桥以东海面的任务。

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第9、第10兵团共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123军和暂编第8师等大部，俘2万余人，占领了守军的外围阵地，并部分突入了守军的主阵地，迫使国民党军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使其市区兵力更加空虚，从而为攻占市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攻占市区，解放上海

当第9、第10兵团在吴淞地区与国民党军处于胶着状态时，总前委于17日电示粟裕、张震并报中央军委：在国民党军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同时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守备较弱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18日，粟裕、张震电报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我们完全同意对淞沪全面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当日，总前委复电指出：“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19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粟、张：“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攻城时应“先歼苏州河以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①20日，中央军委又电示粟、张并告总前委：“接收上海的准备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

^①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59页。

让其从海上逃去。”“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①

第三野战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决定对上海发起全线攻击，并增调第7兵团第23军、第8兵团第25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1、第3团各2个营和第2团、战车团，分别加强和配属第9、第10兵团作战，使攻击总兵力达10个军30个师及特种兵纵队共40万人。5月21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指出：为提早夺取上海，保护物资，以便迅速接管，进行建设，决以第9、第10兵团并第8兵团之第25（其第24军主力应集结宁郊待命参战）、第26军，第7兵团之第23军并特种兵纵队全部逐步攻略上海，首先夺取浦东，封锁黄浦江之交通逃路，威胁上海翼侧，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南之市区，同时攻占吴淞、宝山，完成对敌包围，最后会攻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总攻预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5日前完成全歼浦东地区守军，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国民党军黄浦江交通及海上逃路的任务。为此，第9兵团应以第30、第31军全部和第20军主力迅速攻歼高桥和浦东市区守军，控制黄浦江东岸阵地，组织火力，切实封锁黄浦江面，截阻守军一切退路；第23、第27军和第20军一部完成对苏州河南上海市区的攻击准备，并以炮火封锁机场，以积极动作牵制浦西守军，策应浦东作战。第10兵团指挥第25、第29、第28、第26、第33军完成攻击吴淞、宝山、江湾、大场、真如地区的准备。第二阶段预定于27日开始，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守军的包围。为此，第10兵团应以第25军附第24军山炮团、第29军全力攻占宝山、吴淞，并控制黄浦江沿岸要塞阵地，组织炮火，与黄浦江东岸第30、第31军沟通火力联系，切实封锁吴淞口，截断守军海上交通逃路；第28军首先割歼杨行地区守军，尔后楔入吴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7页。

淞、江湾之间地区，保障第 25、第 29 军攻占吴淞、宝山之侧背安全；第 33 军由刘行向东南攻击前进，楔入杨行至大场及大场至江湾地区；第 26 军由南翔沿铁路向东楔入大场至杨家桥及杨家桥至真如地区，力求与苏州河南之第 27 军打通联系。第 9 兵团应以第 20、第 27、第 33 军全部由黄浦江与苏州河之间地区，由南及西南向东北攻击前进，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浦西区及南市全部，力求楔入守军纵深，分割歼灭守军，尔后除以不超过 2 个师的兵力控制市区外，主力应完成渡苏州河，配合第 10 兵团围歼苏州河以北守军的攻击准备；第 30、第 31 军除加强白龙港一线警戒外，以必要炮火支援黄浦江西岸作战。第三阶段，最后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东岸，以江湾为中心地区之守军，达成攻占上海全区的目的。为此，第 10 兵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宝山、吴淞地区，组织炮火封锁黄浦江口，防止守军东逃及军舰进扰外，集中主力由北向南及由西向东攻击。第 9 兵团除以一部控制浦东地区及苏州河南市区，并组织炮火协同第 10 兵团封锁黄浦江口外，集中主力由南向北及由西南向东北攻击。同时将上述部署上报中央军委。22 日中央军委复示：同意 21 日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23 日，第三野战军侦悉汤恩伯已率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市区仅剩 5 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第三野战军首长判断国民党军将撤离上海，便决定于当晚发起进攻，第一、第二阶段攻击计划同时实施。

5 月 23 日夜，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第 20、第 23、第 27 军和第 26 军分别从东、南、西三面向市区攻击；第 30、第 31 军继续攻歼高桥地区守军；第 25、第 28、第 29、第 33 军继续强攻杨行、月浦地区。24 日，第 20 军攻占浦东市区，守军第 37 军西逃；第 27 军攻占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机场、徐家汇车站；第 23 军进至龙华地区；第 29 军于 23 日夜攻占月浦南郊制高点，次日晨，国民党军集中 4 个营的兵力在 8 辆坦克掩护下，连续 4 次

向第 29 军反扑，均被击退。汤恩伯复将第 75 军第 6 师从高桥抽至月浦地区，加强防御，以保障吴淞口海上通道的安全。

当日，第二野战军最后查明国民党军已开始全面退却，粟裕、张震当即令各军迅速发起追击，大胆楔入守军纵深，截歼逃跑之国民党军。各部接令后，采用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按预定方向攻击前进。

24 日晚，第 27、第 23 军分别由徐家汇附近和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 20 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苏州河以南市区。人民解放军的神速动作，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名传令军官竟开着吉普车将命令送到了第 27 军阵地。至 25 日凌晨，攻击部队基本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并继续向苏州河以北市区发展进攻。第 27 军进到苏州河南岸时，遭到河北守军的阻击。守军依托北岸百老汇大厦等高大建筑和成片厂房，以密集的火网居高临下封锁人民解放军的前进道路，第 27 军突击部队多次攻击，未能奏效，反遭较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指战员情绪激愤，要求使用炮火攻坚。第 27 军军长聂凤智闻讯后，亲至前沿察看，并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统一认识，决定：一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建筑，一律不准使用重武器；二是改变战术，避免正面强攻，待天黑后采取迂回包围战术歼灭守军；三是加强政治攻势，争取守军放下武器。会后，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关系，查到了汤恩伯指定留守上海市区的最高指挥官、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号码，聂军长当即与刘昌义通话，向其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劝其率部放下武器。西北军出身的刘昌义早在 1948 年即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秘密加入了民革。此时他正在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准备放下武器，在接到聂凤智军长的电话后，即于当日 19 时到第 27 军指挥所接洽，26 日凌晨，刘昌义率所属第 21、第 51、第 123 等 3 个军的残部 4 万余人撤至江湾、大场地区放下武器。第 27 军随即进入苏州河以北市区，接着于 26 日下午攻克火车站，歼灭拒不投降

的第37军和交警总队各一部。至27日凌晨，苏州河以北、九龙路以西地区的国民党军全部被肃清。

第20军于26日下午和27日凌晨在绍兴旅沪同乡会、铁路管理局等地接受守军第37军第204师残部等约1500人的投降。与此同时，第23军分别在向造币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真如攻击过程中，歼守军第37军和交警部队各一部，俘和受降9400余人。第26军于26日下午攻占真如车站、国际电台、大场等地，俘和接受投诚3.2万余人后，进至江湾以东地区。

第30、第31军于25日开始会攻高桥，战至26日凌晨，全歼高桥地区守军，俘5000余人。接着，又攻占三岔港、江心洲，完全攻占了浦东地区。

第25、第29、第28、第33军于26日拂晓分别攻占宝山、杨行等地，共俘守军1万余人。接着向吴淞猛扑，在吴淞码头截住尚未来得及逃跑的国民党军一部，并迅速将其全歼，俘8000余人。

27日下午，据守在上海市东北角杨树浦地区的国民党第21军第230师约8000余人，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向第27军放下武器投诚。至此，宣告上海完全解放。

上海解放后，长江口外崇明岛仍被国民党暂编第1军等部盘踞。5月28日，第三野战军令第25军攻取崇明岛。30日下午，第25军由吴淞北渡，从乔鼻港、万安港、葛隆港一带登陆成功，接着迅速向纵深发展。31日下午，暂编第1军第11师副师长率该师1900余人起义。至6月2日，第25军全部攻占该岛，共歼守军3700余人。

在解放上海的作战中，除汤恩伯率第54军等约5万人先期登军舰出海，逃往定海、台湾等地外。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及交警第2、第5、第6、第11、第18总队全部，第12、第21、第75、第123军等大部，和第52军、第99师各一部，共15.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利用上海继续顽抗，挑起国际事端，促使美英等国出兵干涉和守不住就搬空、打烂、炸光

的图谋，将大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战迅速获胜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在战役指挥上采取钳形攻击的部署，首先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对守军的海上退路构成严重威胁，迫使汤恩伯迅速组织撤退；第二是在对守军永久筑城地带的攻击受挫后，迅速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指导思想，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按照城市攻坚战术原则，采取集中优势兵力火力，逐点攻取的战术；第三是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在给予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各种关系，加强政治争取工作，迫使国民党军残军纷纷起义或投诚。

第六节 解放武汉。进击闽北、赣中

一、解放武汉，前出鄂东南

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后，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白崇禧集团，按照国防部的指令，决定除以一部兵力迟滞第四野战军渡江，掩护主力撤退外，武汉地区的部队向南退却，企图依托洞庭湖，在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组织新的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确保湘、赣、粤、桂的安全；宜昌地区的宋希濂部向西撤退，一部在大巴山布防，主力位于恩施地区，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陕门户，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入川。其防御部署是：以第126军担任团风、蕲春间长江防御；以第19兵团第127、第128军担任武昌至嘉鱼间的江防；以第58军担任武汉三镇的城防。

根据战局发展情况，中央军委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放弃武汉南撤，乃于4月28日指示第四野战军，由于接收武汉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先遣兵团和中原局，不要过早逼近武汉，以免武汉国民党军惊慌，撤走太早，引起混乱，并要求先遣兵团和中原局

迅速做好接收武汉的准备，以免国民党军退走后毫无准备，仓卒接收。5月4日，第四野战军首长电示先遣兵团，准备在5月底到达长江边团风、武穴之线，或采取袭抢船只，乘虚渡江的办法立即渡江，迅速插至江南，占领江南岸，并迫退沿江国民党军。同时，应迅速搜集大量船只，以备6月中下旬全军渡江之用。

根据野战军首长的指示，萧劲光于5月6日召集第40、第43军及湖北军区首长举行会议，研究执行办法，提出：第40军由团风至韦源口，第43军由韦源口至龙坪段实施渡江作战，并决定2个军各以1个师先期进至江边进行渡江侦察，收集船只、水手等工作。同时，决定以军、师副职或参谋长率有力侦察分队进逼江边组织侦察站，进行侦察守军情况与收集船只，训练船夫及争取国民党军等工作。5月8日，萧劲光从前线部队报告中得悉汉口国民党军正部署南撤的消息后，即令第40军先头第118师向汉口进逼。并向四野提出建议：立即以接收武汉的部队或以第40军军部率2个师接收汉口，以江汉军区1个旅接收汉阳。其余第43军全部及第40军另2个师，统归第43军指挥，即向浠水方向开进，由鄂城、蕲春地区渡江迂回武昌；或以第40军接收武汉，以第43军由团风至武穴段渡江。同日，林彪、萧克复电指出：如敌尚未退出汉口，则仍不要接收汉口，因我接收人员一时赶不到；如敌已退，则应迅速接收，以免流氓抢劫。如接收汉口，则可以第40军军部率2个较好的师去接，第40军另外2个师归第43军指挥，即向浠水方向开进，由鄂城、蕲春地区渡江。第43军向江边前进时，可采取宽正面的沿江袭击，各路同时突然到达江边抢夺船只，抢得船只后，如对岸空虚则立即乘机渡江。

5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萧克，指出：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情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阳以北与解放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阳以南。因此，第四野战军应准备提前至6月10日左右开始渡江。据此，林彪、萧克于5月10、11日电示先遣兵团及全军各兵团、各军首长：

由于沿江粮食困难和我军须争取今年年底占领两广，因此渡江行动尽量提前，湖北全境之敌较北平之敌所多无几，湘赣两省之敌约等于天津守敌，我军兵力占绝对优势，同时第二、第三野战军皆已南进，对敌威胁甚大，白崇禧已准备逐步南撤。因此，先遣兵团2个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第43军和第40军2个师应于15日在团风、武穴之线渡江；第40军另外2个师应向汉口进逼。林彪、萧克要求先遣兵团，应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并注意采取多路前进、宽正面的袭抢船只的方法和利用国民党军撤退的机会，求得袭渡成功。

遵照林彪、萧克的命令，先遣兵团立即开始行动，向江边挺进。14日拂晓，第43军以突然动作，向长江北岸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当日晚，相继攻占团风、黄冈、兰溪、蕲春、田家镇等地，歼国民党军第126军第304、第305师近2个团，夺取了长江北岸渡江要点，开辟了渡江的通路，控制了西起团风、东至武穴近50公里江北沿江地段，并在团风、堵城渡口夺得木船百余只，为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15日晨，第43军突击部队从兰溪及其东西地区发起渡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登上南岸。驻黄石港、铁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第126军第305师第913、第915团的5个营起义，第43军第128师在起义部队的接应下，于15日15时全部渡过长江；第127、第129、第156师亦分别从黄冈、黄石港、蕲春等地渡过长江。接着第43军继续向南挺进，至17日，相继解放鄂城、黄石、大冶、阳新和江西的瑞昌、九江等地，

与此同时，第40军第118师为策应第43军等部渡江，于15日向武汉发起进攻，肃清了标子湾、刘家庙地区之国民党军，16日拂晓进至滠口附近，发现汉口之国民党军已经南撤，随即向汉口急进，于7时全部占领汉口市区，全歼武汉保警总队及警察局所属武装。同日下午，第120、第153师在配合第43军攻占黄冈、团风一线国民党军江北阵地后，渡过长江。江汉军区独立第1旅

和第58军第172师解放汉阳。17日，第40军第153师进占武昌，至此，武汉三镇宣告解放。18日，第120师主力和第153师一部进抵贺胜桥，并在追击途中歼河南保安第3旅，第40军军直和第119师渡过长江。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过程中，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在中共地下党的长期争取下，于5月15日率第128军3个师和第127军1个师共2.5万余人，在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地区起义，对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迅速解放武汉三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8月1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1军，由张轸任军长，杨春甫任政治委员。

先遣兵团渡江后，中央军委于5月17日18时电示林彪、萧克：南浔线上之国民党军已向南向西撤退，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已出赣西截击。第43军应即向南浔线前进，协同第4兵团歼灭逃跑之国民党军。遵此，第43军即向南浔线进击，5月18日占领瑞安，22日解放德安，24日进至永修、安义，并与第4兵团一部在永修会师。第40军于5月18日进抵贺胜桥，19日解放咸宁，歼守军第127师4个营，23日占领通山，24、25日占领崇阳、通城、蒲圻。至此，先遣兵团渡江作战行动胜利结束，为第四野战军主力渡江南进开辟了前进道路，为下一步向华南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进击闽北，解放南昌

第二野战军进占浙赣线后，主力即位于浙赣线金华、东乡段及其两侧地区休整，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配合第三野战军攻取上海的作战。同时，为扩大战果，以一部兵力分别向闽北、赣中进击。5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各兵团发出关于组织轻装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的指示，要求各兵团分别以轻装师或轻装团附电台继续向南猛追，寻歼逃窜之国民党军，并应发扬近日有些部队日行50公里左右，穷追逃敌的精神。同时规定，第3兵团向永康、武义、遂昌、松阳方向进击，第5兵

团向龙泉、浦城、崇安方向进击，第4兵团向铅山、资溪、金溪、临川方向进击。

按照野战军指示，第3兵团决定以第11军1个师向遂昌、松阳，第12军1个师向永康、武义方向进击。第4兵团决定以第15军2个师向建阳、建瓯，第14军2个师分别向金溪、临川、丰城、樟树等地进击。第5兵团决定以第16军不少于1个师的兵力进占浦城，第17军不少于1个师的兵力向龙泉方向进击。遵照上述部署，各部队立即行动。由于吸取了前一阶段追击战的经验，各部队采取了适时分遣合击，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并利用缴获的汽车等运输工具加速前进。至5月14日，第3兵团先后进占永康、武义、缙云、丽水等地；第5兵团解放浦城、政和、古田等地；第4兵团解放建阳、建瓯、南平、水吉、南城等地。迫近了赣江、闽江。

第4兵团进击赣中后，第二野战军首长和总前委于5月9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在第二野战军完全控制浙赣线，并逼近赣江的情况下，南昌之国民党军可能提前撤退。因此，建议以第4兵团在国民党军撤退时，适时进占南昌。并令第4兵团做好随时进占南昌的准备。10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建议。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开始渡江作战，白崇禧集团开始撤退。16日，刘伯承、邓小平电令陈赓、郭天民等，速以2个军的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争取在赣江西岸截兜南撤之白崇禧部，以配合先遣兵团作战。陈赓、郭天民等应率一部兵力及兵团统率机关，准备在国民党军南撤时，即进驻南昌。

根据上述命令，第4兵团决定以第14军进占樟树、丰城后，西渡赣江，向高安及其以南地区实施突击。以第13军附第43师由大小港口西渡赣江，沿第14军之右侧前进。19日，第14军攻占樟树、新淦，准备西渡赣江。第13军主力向丰城以北疾进，21日拂晓前，先头团在南昌东南的河里绿渡过扶河，向谢埠发起攻击，守军南昌县保安团400余人投降。当前卫营进抵南北安冲一

线时，被南昌守军发觉，守军即组织 2 个师向前卫营发起攻击，企图乘其立足未稳，迫其退回河东。面对 8 倍于己优势之敌，前卫营奋勇抗击，连续击退敌军的 8 次进攻，守住了阵地，并歼敌千余，迫其退回城内。

驻守南昌之国民党军见第 4 兵团和四野先遣兵团已对其形成夹击之势，即于 22 日拂晓前全部撤离，第 13 军一部于 22 日进占南昌。23 日，第 14 军一部在永修与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一部会师。

第二野战军进击闽北、赣中的作战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第三野战军攻取上海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渡江的行动，并为下一步解放福建，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渡江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9 个军部、32 个整师，即第 4、第 20、第 28、第 37、第 45、第 51、第 51（被歼后重建）、第 66、第 106 军军部，第 13、第 41、第 41（被歼后重建）、第 52、第 59、第 80、第 90、第 92、第 97、第 102、第 113、第 113（被歼后重建）、第 132、第 133、第 134、第 141、第 143、第 149、第 174、第 185、第 192、第 202、第 203、第 204、第 209、第 282、第 313、第 318 师，暂编第 3、第 4、第 7、第 8 师；接受起义 1 个军部、5 个师，即第 128 军军部，第 312、第 313、第 314、第 309、第 282 师；接受投诚 1 个军部、9 个师，即第 68 军军部，第 81、第 110、第 145、第 146、第 182、第 230、第 308、第 334 师，暂编第 2 师。加上其他部队共计 43.8 万余人。其中毙伤 2.2 万余人，俘 31.4 万余人，起义 3.4 万余人，投诚 6.7 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3000 余门，坦克、装甲车 123 辆，舰艇 76 艘，以及大量其他军需物资。人民解放军伤亡 4.98 万人，其中牺牲 1.05 万人，负伤 3.54 万人，其他减员 3800 余人。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

昌等县以上城市 210 余座，以及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粉碎了国民党政府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实现划江而治的企图，为下一步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在战役指挥方面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适时确立渡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

首先，在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的情况下，一切工作立足于以战斗方式渡江上。渡江战役前，中国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决定同意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谈。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在一部分指战员中也存在着和平渡江的思想和情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针对这一情况，再三强调，虽然存在着和平渡江的可能，但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战员，要牢固树立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绝对不可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全体指战员要树立战斗渡江的思想，要有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一切准备工作均要立足于这一点上。在国共双方代表团开始和谈后，解放军数度推迟发起渡江作战时间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又反复告诫各部队，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上，立足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上。这样就使全体指战员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树立了战斗渡江的思想，认真做好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在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能立即实施渡江作战，迅速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其次，战役发起后，渡江部队不停顿地一直打下去。为了争取先机，力求保持解放军在战役中的主动地位，剥夺国民党军喘息、收缩、调整部署的一切可能，总前委要求部队在夺取国民党军长江北岸桥头堡和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要停顿，要求各集团于 20 日到

21日发起渡江作战后，必须准备克服国民党军的层层抵抗，以达到占领南岸，尔后更需有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反扑和增援。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正是由于解放军在战役发起后，不停顿地一直打下去，使国民党军完全没有进行喘息整顿、收缩集结所需的时间，处于被各个击破的被动地位。其三，从最困难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渡江战役前，人民解放军已经完全有了胜利的把握，但总前委在部署战役时，仍从最困难处着眼。在制定《作战纲要》时，分析了渡江成功后国民党军可能采取的四种措施，强调解放军的战役准备应能应付国民党军可能依托芜、宁、沪、杭诸要点隔绝渡江部队东中集团的会合，然后依托交通干线迅速集中兵力，或在宁沪地区，或在浙赣线上与渡江部队进行决战这种最困难的情况。同时，从应付这种困难情况出发，在准备工作和部署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而保证了解放军能措置裕余地实现战役的预定目的。

第二，充分利用国民党军的弱点和长江的地形，采取全线展开、重点突击和钳形攻击的部署，对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实行合围和割裂。

长江防线长达一千数百公里，而国民党军由于主力被歼，兵力不足，只能实行一线配备，缺乏纵深，在一线配备中，也不能处处重点设防。人民解放军抓住国民党军的这一防御弱点，在千余公里的地段上采取全线展开，全面牵制江防守军，而有重点的实施突破的部署，使国民党军无法判明人民解放军的主渡地点，而处处陷入被动，一点被突破，即全线震动，来不及和无法组织增援。从而保证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一举成功，迅速摧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同时，充分利用长江镇江、南京段向北突出，芜湖以西逐渐向西南、扬州以东逐渐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地形特点，规定以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配置于扬州以东地段和芜湖以西地段，组成中、东突击集团，形成两个强有力的钳子，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

会师于长兴、吴兴地区。这种部署，既保证了东、中集团能迅速会合，避免被国民党军隔绝，遭各个击破，又实现了迅速达成对宁、镇、芜地区国民党军的合围。同时，以1个军东进苏州，以西突击集团主力直出浙赣线，隔绝了上海守军与宁、镇地区守军及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主力的联系。保证了中、东集团从容、迅速歼灭被围的国民党军，并粉碎了其在浙赣线重新组织防御的企图。

第三，做好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渡江作战，与在陆地作战不同，首要的问题是要保证顺利地渡过宽阔的江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运载人员和武器的工具，以及驾驭运载工具的人员。在无现代化航渡工具的条件下，足够的木船和水手就成为能否实施渡江的关键。因此，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反复要求各部队要认真做好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紧紧抓住保证顺利渡过宽阔江面这个核心环节，做好筹集船只，动员地方船工，培养、训练部队水手等工作。据此，各部队在认真进行思想动员、做好战役战术侦察、筹措物资等准备工作的同时，下大力做好筹集船只、动员船工、训练部队等工作。在沿江船只被国民党军拉往江南或大肆破坏的情况下，专门成立了船只的征集和管理机构，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协助下，广泛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经过努力，终于筹集到足够的船只，动员和教育了万余名地方船工随军参战，部队自身也训练了数千名水手，并加强对突击部队的水上训练，使之熟悉水性，熟悉驾船技术，熟悉上下船动作和船渡编队。从而，解决了实施顺利渡江这个核心问题，为渡江作战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四，针对国民党军的江防特点，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

渡江登陆作战与陆地作战有很大的不同，必须要有一套正确的战术原则。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渡江作战的特

点，经过反复摸索，确立了一套适合渡江作战的战术原则，即：强渡与偷渡相结合，以强渡为主；各级干部要靠前指挥，加强航渡中的组织指挥和通信联络；在航渡中有进无退，勇猛冲击；第一梯队登陆成功后应首先占领和巩固并逐步扩展滩头阵地，主动接应和配合后续部队和左右邻部队；后续部队登陆后首先要协同第一梯队部队粉碎守军的反冲击，然后迅速向两翼和守军纵深发展；组织专业的火力船队对付国民党军的军舰和飞机的骚扰，掩护主力船队安全航渡，等等。正是由于各部队认真贯彻了上述战术原则，保证了一举渡江突破成功，从而为全军迅速向国民党军纵深挺进，完满完成对守军的战役分割和各个歼灭奠定了基础。

第五，战略追击中对国民党军永久筑城地带的攻击，仍应按照城市攻坚战术，组织战斗。

战略追击，总的形势是国民党军一触即逃，战斗力不强。但有时国民党军为达到战役或战略目的，在据守永久坚固的要点或城市时，会作拼死顽抗，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因此，在对上述要点和城市的攻击过程中，仍需按照城市攻坚战术，组织战斗。在攻占上海的过程中，第三野战军开始对这点认识不够，在攻击守军外围筑城地带时，缺乏攻坚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致使部队遭受较大伤亡，进展不大。总前委指示部队，不要性急，充分准备，以有效克服守军之钢骨水泥工事。三野司令部也及时发出战术指示，要求各部加强准备，按照对永久筑城地带攻击的战术原则，慎重周密地组织战斗。攻击部队遵照总前委和野司的指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小群多路、集中优势兵力火力逐点攻击等城市攻坚战术，加快了战斗进程。

第六，加强对国民党军的政治争取工作。

政治争取瓦解敌军，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和优良传统。渡江战役前，国民党军失败的局面已经基本确定，军队士气低落，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寻找出路，准备投向人民，这就给人民解放军争取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提供了更有利的条

件。因此，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中，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毛泽东提出的用三种方式解决残存的国民党军的方针，在中共江南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在展开强大军事攻势的同时，加强了对重要地段国民党军的政治争取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促使了江阴要塞、海军第2舰队、第19兵团、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等一批国民党军陆海空军官兵的起义或投诚。这些起义或投诚，对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加速战役进程，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章 进军东南，解放福建、浙江大陆和沿海岛屿

第一节 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的任务与部署

一、国民党军防守东南及沿海岛屿的企图与部署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江防部队除被歼者和逃到台湾者外，其余大部逃往福建及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其中逃至福建的有第6兵团李延年兵团残部，第8兵团刘汝明部第55、第68、第96军残部，第17兵团侯镜如部第106军残部，第7绥靖区张世希部第20、第88军残部，第9编练司令部张雪中第73、第74、第85军残部；逃至舟山群岛的有第45、第21、第75军残部及暂编第1军残部。蒋介石仍企图依靠这些残部和原在福建的第22兵团、原在浙东地区的第87军等部，重新组织防御，以便控制东南沿海地带及近海岛屿，屏障台湾，待机反攻。

由于上述部队“单位众多，番号庞杂”，均遭受过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部队皆残破，重武器散失殆尽，兵员严重缺额，战力脆弱”，^①且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缺乏统一指挥。为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于1949年5、6月间对上述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整编。

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部

^①《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3页。

队进行整编：所有驻福建部队一律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保留第 6、第 8 兵团番号，撤销第 17 兵团、第 7 绥靖区司令部、第 9 编练司令部番号，上述单位司令官李延年、侯镜如、张世希、张雪中等改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兼第 6 兵团司令官；第 73、第 88 军及第 7 绥靖区直属部队合并为第 73 军，由李天霞任军长，下辖 2 个师；第 74、第 85 军及第 9 编练司令部直属部队合并为第 74 军，由劳冠英任军长，下辖 3 个师；第 17 兵团直属部队并入第 106 军，由王修身任军长，上述 3 个军及第 96 军于兆龙部及原在福建的第 25 军陈士章部共 5 个军归第 6 兵团指挥；第 20 军残部编为 1 个团，开回四川重组第 20 军；第 125 军缩为独立第 37 师；成立福州绥靖公署军官团，由侯镜如任团长，各兵团、各绥靖区、各军、师编余军官一律到该团受训。第 8 兵团刘汝明部第 55、第 68 军，及原在福建地区的第 22 兵团李良荣部第 5、第 9、第 121 军及独立第 50 师暂不整编。这样福建及其沿海地区共有正规军 3 个兵团 10 个军 27 个师约 12 万人，以及保安第 1、第 2 纵队，交通警察第 3、第 4 旅等部。

1949 年 6 月初，国民党军统帅部成立舟山防卫司令部，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兼防卫司令。随后，周岩奉命对浙东和舟山地区的部队进行整编，第 45、第 21 军合并为第 21 军，将保安部队 1500 人补入第 75 军，暂编第 1 军和位于浙东和象山半岛及附近岛屿的第 87 军暂维持现状，整编后浙东和舟山防守部队共有 4 个军 11 个师计 6 余万人。

另以空军第 1、第 4、第 5 大队，海军第 1、第 2 舰队，以台湾、定海等地为基地，执行空中侦察、海上巡逻及支援陆军作战。此外，在山东长山列岛还有一部兵力驻守

蒋介石为了给毫无斗志的部队打气，收揽人心，相继到福建和舟山地区进行巡视。6 月 21 日，蒋介石由马公岛到达福州，在机场办公大楼召开由驻闽部队团以上军官参加的临时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话说：“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

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接着，他严励训斥了高级将领在江防作战中只顾逃命，到福建后又缺乏坚守信心，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竟擅自去台湾的行为。最后，他反复强调福建地位的重要性，他说：“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顿，作保卫福建的准备，用自己热血来巩固台湾，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①

会议研究决定了防御部署、机构调整、部队整编、后勤补给等问题。确定以第6兵团李延年部5个军13个师共6万余人，负责福州周围地区及平潭岛的防务，并以第96军及独立第50师作收复古田的准备，收复后加以固守，以巩固福州外围据点；以第8兵团2个军6个师共3万人，负责漳州地区的防务；以第22兵团3个军8个师共3万人，负责防守泉州、厦门、金门地区；迅速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统一指挥福建、浙江、台湾、海南岛等地区的军政事宜；成立东南区点验整编委员会，对各部队进行点验，核实兵员，然后进行整编，提高战斗力；加紧构筑各地防御工事，所需人力，材料由福建绥署负责征集调配，联勤总部福州补给区，应速将存于台湾高雄的2个师的国械武器装备运闽，补充第6兵团，以资应急；驻闽美械装备部队，速由台湾补给区补足3个基数的弹药，马尾弹药库所存国械弹药，迅速发给闽江以北各军。

^① 李以助：《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35、第136、第137、第138页。

会后，蒋介石又单独召见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及独立第37师师长吉星文、独立第50师师长李以勳等人谈话，再次要求他们死守福州，以巩固台湾外围。他说：“福州过早落在共匪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认为福建失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①

7月1日，国防部东南区点编委员会成立。中旬，点编委员会主任蒋鼎文率福建第1、第2点编组到福建，对驻福建部队再次进行整编：第73、第74军均缩编为2个师，第96、第106军合并为第96军，辖2个师，上述3个军归第6兵团建制；第5、第121军和独立第50师合并为第5军，辖3个师，第9、第25军合并为第25军，辖2个师，上述2个军归第22兵团建制；独立第37师番号撤销，士兵补入第8兵团。这一计划由于人民解放军很快进军福建，未能来得及实施。

6月底，蒋介石在台湾召开了东南军政会议，蒋介石在会上重弹确保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巩固东南各省防务，借以巩固台湾外围屏障的老调。陈诚就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补给等问题作了报告。7月1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王东原、罗卓英为副长官。

二、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及沿海岛屿任务的确立

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第三野战军解放和经营东南诸省的任务，于5月

^① 李以勳：《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册，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46页。

22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依据整个战局观察，国民党军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如此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出动，何时出动，请军委决定，以便上海解放后能迅速调整部署。23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① 据此，第三野战军于5月27日中午电示第10兵团领导人：第10兵团全部立即撤离上海市区，进行入闽准备。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根据福建地区国民党军的情况，以及第10兵团在上海战役中伤亡较大，部队相当疲劳，急需休整补充，调整组织，配备干部，并进行入闽的准备工作等情况，建议推迟1个月开始进军。中共华东局、总前委同意了叶飞的提议，于5月29日报告中央军委：“叶飞第十兵团三个军拟休整一个月，于7月初开动，以便迅速夺取福建全省。”6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② 14日，中央军委又指出：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进军时间延至7月上旬亦可。同时指出：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将初步意见电告。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的情况，第三野战军在攻击上海之前和上海解放后相继决定：以第8兵团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并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散匪；以第7兵团主力担任解放浙东、浙南和舟山群岛的任务，一部担任海防和城市警备；第9兵团任上海市的警备及淞沪地区海防，并准备解放台湾；第10兵团指挥第28、第29、第31军于7月上旬开始进军福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页。

② 同上书，第607页。

建；以山东军区部队解放青岛和长山列岛。

6月13日，奉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领导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其番号仍各自保留。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周骏鸣任副参谋长，唐亮、钟期光、张凯任政治部副主任，邝任农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7月10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机关由上海移至南京，以便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11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对所属部队的任务作了一些调整：除第7、第10兵团的作战任务不变外，撤销第8兵团番号，其兵团部大部编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部，由陈毅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兼任副政治委员，聂凤智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一部与第34军军部合编为南京警备司令部，袁仲贤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第34军主力，担任南京警备任务；第25军直属野战军指挥，第26军调归第9兵团，第24军调归山东军区指挥，与第32军担任山东国防任务；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27军（不久又增加第23军）准备解放台湾，以第33军军部为基础组建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0、第33军及第34军第100师，担任淞沪地区警备任务。

三、进军福建的准备

福建省位于中国大陆东南部，崇山峻岭绵延全境，道路崎岖，村庄分散，人烟稀少，仅福州、泉州、漳州等沿海地区较为平坦。境内较大的河流有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等，水流湍急；境内公路很少，且年久失修，因此交通十分不便。沿海多沙滩礁石，海岸曲折，有马祖、平潭、厦门、金门、东山等1100多个岛屿，地形非常复杂。

第10兵团进军福建，有许多有利条件。渡江战役中，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南、皖南、浙西、闽北、赣东等广大地区，特别是第二野战军一部在闽浙赣纵队的配合下，解放了闽北建瓯、南平、

占田等地，打开了进军福建的北大门。福建有许多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福建人民有优良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坚持斗争的闽浙赣纵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已发展到万余人，成为第10兵团进军福建的一支重要的配合力量。防守福建地区的国民党军大多是渡江战役中溃退下来的败军，士气低落，建制不全、装备缺乏、布防仓促、工事简陋，战斗力不强，且各部队之间矛盾重重，缺乏坚守福建的信心。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不利条件，主要是：福建农业和工商业落后，尤其在国民党长期统治和残酷掠夺下，以及受连年灾荒影响，民穷财尽，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不能为部队提供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境内山多路险，交通不便，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大多是北方籍，长期战斗生活在北方平原地区，缺乏山地行军作战的经验，不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语言不通，对南方的气候水土一时不易适应，且进军时正值炎夏多雨季节，这些都将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第10兵团在上海战役结束后，即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地区，认真进行进军福建的准备工作。部队普遍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渡江战役结束后，部队士气高涨，绝大多数干部战士对继续向福建进军，完成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军队，夺取全国最后胜利充满信心，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在胜利形势下，有的指战员开始满足既得胜利，缺乏继续南进的思想准备，对继续南进不甚积极；有的指战员存在家乡地域观念，有些江南籍战士见家乡解放，不愿继续南进；还有的干部战士开始向往和留恋城市生活，不愿离开苏杭这个“天堂”，要求到地方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指战员对国民党军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有可能以各种手段进行顽抗的情况估计不足，产生了轻敌麻痹情绪和松一口气的思想，缺乏克服困难，继续进行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有的指战员，特别是新入伍的解放战士和新战士，则把进军的困难看得过于严重，存在着害怕困难，畏惧牺牲的情绪。

由于上述思想的存在，部队中出现了对进军准备不感兴趣、不甚积极的倾向，甚至出现了逃亡。针对上述情况，第10兵团政治部于6月中旬相继下发了《关于继续南进部队的思想指导》、《关于南进政治工作指示》等文件。文件号召全体指战员要认清形势，勇于进取，不骄不躁，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物质上充分做好进军准备，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追歼残敌，圆满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光荣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必须根据部队的思想实际，反复进行南进的思想动员，扫除一切思想障碍，造成部队热烈的进军空气与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一切任务的高涨情绪，以饱满、旺盛的士气投入战斗和工作，打好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思想基础。在动员中，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讲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为什么要继续进军；进军中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如何保证完成任务等。在动员和南进中，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将积极的思想教育与严格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积极的思想教育基础上加强行政管理，在严格的行政管理下积极进行思想教育；要反复地对全体指战员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教育与传统教育，通过访苦、诉苦等方式，进一步启发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坚定革命意志，发挥积极性。同时，要使部队生活进一步正规化，切实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开展群众性的团结互助运动。在政治教育中，要联系部队的思想实际，抓住重点，进行富有说服力的解释，解决某些可能的和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防止空洞的说教；要耐心细致，不怕麻烦，反复动员说服；要善于组织干部战士开展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处处注意扶植正气、压倒歪风。同时，文件要求全体指战员在进军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搞好各部队之间，特别是与闽浙赣边游击队的团结，虚心向他们了解福建的情况，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共同研究工作。兵团政治部还下发了《进军福建动员口号》，共23条，主要有：“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抓紧有

利战机，配合兄弟部队，继续向南进军，解放福建，建设福建！”“扫除一切进军思想障碍，坚决执行光荣任务！”“不骄傲轻敌，不松懈麻痹，切实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大胆、机动、勇敢、顽强，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不怕艰苦，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一切任务！”“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学习兄弟部队优良作风，尊重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树立模范的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给福建人民一个很好的见面礼！”“严格执行入城守则，严格遵守约法八章，爱护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学习福建地方党和游击队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战斗英雄，创造英雄部队”等。

各部队按兵团政治部的统一部署，结合上海战役结束后的评功、评政策纪律、评斗志的三评活动，通过下发教材、领导上课、班排讨论、举办墙报、互相谈心等各种形式，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动员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进军的伟大意义、革命利益与个人前途的关系；认清了进军中的有利条件和困难。认识到只有完成进军任务，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才能永远巩固胜利，才能算是真正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只有全国解放了，全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个人和家庭才有前途，生活也才能随之得到改善，革命军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认识到全国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十分有利，国民党政府已趋于全面崩溃，福建地区的国民党军大多是残兵败将，番号虽多，但编制不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福建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基础，广大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经验，拥护人民解放军，有相当数量的游击部队，是配合第10兵团进军福建的重要力量；有中央军委、华东局、第三野战军的正确领导，有华东人民的全力支援。因此，进军福建一定能取得胜利。但是，福建地区的国民党军还有一定的力量，个别部队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定会作垂死挣扎；福建地区交通不便，气候炎热，经济落后，这将给进军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在思想上要有克服困难，进行艰苦作战的精神准备。

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各级政治机关进一步引导大家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同时注意解决指战员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树立和增强了进军福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决心和信心。

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全兵团补充了近4万名解放战士，整顿了各级组织；根据福建地区地形特点，调整部队装备；进行了山地作战的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对山地战的组织指挥、通讯联络、火力协同及射击技术；对福建地区的国民党军、地形、道路、天候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侦察。第三野战军后勤部下发3个月的经费，确定原配属第10兵团的地方支前干部和部分民工、担架，继续随军服务，苏南支前司令部运送150万余公斤大米屯集于江西江山，准备供给过境部队。兵团后勤部拨出一部分新兵，为3个军各组建1500余人、300副担架的担架队，为兵团部组建500人、150副担架的担架队；准备了重武器10个、轻武器4.25个基数的弹药；为每个军临时配备了12辆汽车，在江山、玉山、古田设置了兵站，负责各种物资的转运；为部队补齐了单军衣、布鞋、胶鞋、水壶、米袋、蚊帐、药品、急救器材等物资。6月上旬，兵团统一组织了由400余人组成的先遣队，先期进入闽北建瓯地区，会同当地地方党和游击队，了解情况，筹集粮草，抢修道路。

中共闽浙赣省委和闽浙赣边游击队，为迎接和支援第10兵团进军福建，在物资上也做了积极准备。6月14日，第10兵团先遣队到达福建建瓯与中共闽浙赣省委会师，18日，闽浙赣省委在建瓯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支前供应问题。会上，曾镜冰要求各级干部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政策，积极开展支前工作，切实掌握和执行政策，做好协助先遣队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第10兵团解放全福建，并对支前工作作了具体分工。30日，闽浙赣省委发出《关于大军供应工作指示》，号召中共福建各级党组织和福建人民应以最大的努力，最吃苦的精神来支援解放军，要做到既保证军需，又不致造成混乱，影响民生，坚

决完成任务，并具体规定了筹粮的政策和措施。7月初，闽浙赣省委又专门召开支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闽北支前委员会，曾镜冰兼任主任，各县成立支前分会，负责支前工作的具体落实。在闽浙赣省委的领导和部署下，闽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支前热潮，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五县中心县委，在闽清和罗源成立了支前办事处，下设20多个供应站，组织了3000多人的运输队、担架队，短期内突击修通170余公里长的简易公路，筹集25万余公斤粮食供应部队。永泰游击队发动群众，筹集粮食9000多担，生猪数百头，并在樟溪及其支流架设大型浮桥3座，小桥几十座，以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进军。连罗宁边工委，在10天内发动群众6万余人次，修通古田通往福州大小北岭、总长达150余公里的3条大道。在各级党政机构的领导和努力下，至7月中旬，共筹集大米350万余公斤，柴草450万余公斤，马料65万余公斤，食油5万余公斤，盐5万余公斤。7月下旬，第10兵团各部先后到达南平、建瓯、古田一带后，叶飞、曾镜冰又主持召开了筹粮工作会议，制定了“统一领导，独立自主，大家动手”的筹粮方针，决定由随军南下干部协助当地党政机关组成闽北支前司令部，负责动员民力，筹划粮草。第10兵团还向全军提出“一手打仗、一手支前”的口号，规定自兵团至连队各级均成立筹粮工作队（组），负责筹集和运送粮食的任务。在福建省委和第10兵团的统一部署下，各筹粮工作队（组）在划定的地区与地方干部、游击队员一起筹集粮草，至8月中旬，又筹集大米420万余公斤，柴草850万余公斤，并在闽北各县征集了1100余名民工，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等随军行动。

为了保证进军福建任务的顺利完成，尽快开辟福建工作，中共中央于6月19日决定成立福建省委，由张鼎丞任省委书记。华东局也决定从太行、太岳解放区抽调的原计划分配到苏南的干部中抽调一部分，从山东、江苏、上海抽调一些干部，共600余名，从上海动员招收的2000余名知识青年，随第10兵团南下，充任

福建省委及以下各级党政机构的骨干。7月下旬，张鼎丞率南下工作干部抵达福建建瓯，与闽浙赣省委会合。25日，召开了会师大会，张鼎丞在会上宣布福建省委正式开始办公，闽浙赣省委宣告结束。

第二节 进击闽中，解放福州

第10兵团在完成进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叶飞、韦国清于6月27日发出向福建南平、建瓯地区开进的命令。7月2日，各部开始陆续由浙江嘉兴地区以火车运输至浙江江山和江西上饶，然后徒步南下。兵团部率第31、第28军在下车后，经浦城、建阳向古田、建瓯进发，第29军在上饶下车后，经崇安、建阳、建瓯向南平开进。广大指战员身负40至50公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冒酷暑、顶烈日、沐风雨、爬高山、越峻岭、风餐露宿，体力消耗很大。同时，由于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山区早晚温差大，物资供应不足，不少战士赤足行军，行军中又常常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指战员的营养严重不足，体力严重下降，致使疟疾、痢疾、肠炎等疾病流行，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但由于前阶段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指战员明确了进军福建的伟大意义，因此仍斗志昂扬，士气饱满，高度发扬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营团干部普遍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士，连排干部不但自己背装具，还帮助战士背枪背背包，党员和老战士充分发扬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帮助新战士和体弱的战士，有的党员和老战士1人背三四枝枪。各级政治干部和文工队员还深入连队作宣传鼓动工作。经过全军上下的一致努力，并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地方党和游击队及人民群众的热情帮助支援下，第10兵团各部经200余公里的艰难跋涉，于7月26日顺利到达建瓯、南平、古田地区，兵团部位于建瓯。

第 10 兵团到达集结地域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直接准备。根据福建地区国民党军的部署、地形特点、交通条件及第 10 兵团本身的情况，叶飞、韦国清等兵团首长决定分两个作战阶段完成解放全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守军第 6 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第二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岛屿，求歼第 8、第 22 兵团，解放全省。

一、围歼福州国民党军的部署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位于闽江下游，依山临水，中央低平，闽江横贯市区南部，地势十分险要。国民党军以福州绥署、第 6 兵团李延年所属 5 个军共 6 万余人防守该地区。其中，第 106 军主力扼守福州市区；第 74 军为右翼，防守罗源、连江、澳头一线；第 25 军及独立第 37 师为左翼，防守闽清至福州间闽江两岸地区；第 96 军及独立第 50 师分别配置于雪峰及大、小北岭地区，以加强福州正面的防御；第 73 军防守福清、平潭岛，以刚由台湾运来的第 201 师 1 个团增防福州以东马尾，以确保福（州）马（尾）线及闽江口之通路。其企图是：依托有利地形，阻止人民解放军于闽清、罗源以北，守住福州，如防线被突破，则以逐次抵抗手段掩护部队退踞海岛，或沿福厦公路南撤漳州、厦门。

针对国民党军防守福州的企图和部署，第 10 兵团于 7 月下旬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进攻福州的 2 种方案：一是采取钳形迂回攻击战法，首先攻占福州以东、以南的连江、长门、马尾及永泰、福清、长乐，截断福州守军的海上和沿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并分割福州守军与漳州、厦门守军的联系，尔后围攻福州。执行这一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翻越 200 多公里的崇山峻岭，山多又高，没有公路、大路，只有山间小径，需 5 天时间才能到达福清，又不能携带大口径火炮等重装备，只能轻装；同时，部队冒暑负重长途跋涉，相当艰苦疲惫，而以疲惫之师插入福清、泉州之间，有可能遭到两地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但这一方案可达到全歼福州国民党军的目的。二是以第 28、第 31 军由宁德、罗

源、连江齐头并进，直插马尾，断守军海上退路。执行这一方案对部队来说比较省力，从进攻出发地至马尾仅2天路程；但不能断守军向南的陆上退路，形成正面攻击，迫守军收缩兵力沿福厦公路南逃，不能收到全歼之效。第10兵团首长经反复权衡利弊，决心采取第1方案，实行钳形迂回的攻击部署，争取全歼福州地区的国民党军。

8月4日，叶飞、韦国清发出《攻歼福州守敌的部署命令》。命令指出：为求全歼福州守敌，兵团决心以突然、勇猛、坚决动作攻歼连江、长门、闽安、长乐、福清等地之敌，切断敌人海陆退路，尔后集中全力会攻福州之敌。具体部署如下：第31军为左路，于8月9日从现地开进，于15日黄昏开始攻歼连江、长门、闽安、马尾守军，断其海上退路，尔后由东向西及由东北向西南会同第28、第29军攻歼福州守军。为此，该军第一步除以1个团配合地方武装监视罗源守军并相机歼灭外，集中主力直攻连江、长门、闽安守军，并确实控制该地，封锁闽江口，断守军海上退路；第二步除以一部兵力配属炮兵控制长门、闽安，以炮火封锁闽江口外，主力继续由东北向西南攻歼马尾守军，尔后由东、东北向西及西南会同第28军攻歼福州守军。第29军为右路，于8月7日开始从现地出发，16日黄昏开始首先攻歼福清、长乐守军，切断其向东、向南之海、陆退路及阻击可能由泉州、德化、仙游地区北援之国民党军。尔后以一部兵力会同第28、第31军围歼福州守军。为此，该军第一步应集中全力攻歼福清守军；第二步除以一部兵力控制福清，并择要点构筑工事，向南警戒外，主力继续由西南向东北攻歼长乐、尚干守军，尔后以一部兵力由南向北会同第28、第31军围歼福州守军。第28军配属炮兵第14团全部、第29军山炮团大部为中路，于8月9日开始从现地开进，沿古田至福州公路实施正面突击，准备会同左、右两路围歼福州守军，第一步于15日黄昏开始以主力割裂歼灭大湖、雪峰地区守军，同时以一部攻歼闽清守军；第二步以主力迅速南插仁山、甘蔗，切断福州、

白沙间守军联系，肃清福州外围西北地区守军，尔后视情况发展进攻，如守军固守福州，则集中炮火、兵力由西、西北会同第31、第29军攻歼福州守军；如守军收缩马尾、长乐一线时，则迅速攻占福州，主力分由闽江南岸及南台岛向东直插尚干、长乐，协同第29、第31军歼灭东逃守军；如福州守军增援马尾，向第31军反击时，则乘机向福州攻击，策应第31军作战。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各军处于分散独立作战的状况，因此，兵团要求各军一方面要机断专行，独立自主地寻敌作战，另一方面要在战役上注意协同配合，坚决完成预定任务。与此同时，第7兵团以第21军第63师从闽东北霞浦地区向罗源、宁德等地守军发起进攻，配合第10兵团作战。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实施，第10兵团政治部又相继下发了《关于福厦战役政治工作的原则指示》、《福厦战役动员口号》等文件，号召兵团全体指战员奋勇努力，为圆满完成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这一光荣任务，争取这一伟大胜利而顽强战斗。要求各部在作战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坚决的服从命令，彻底的完成任务”，“坚决的围歼守敌，勇猛的追歼逃敌”，“配合军事作战，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二、进击闽中

国民党军福州绥靖公署得悉解放军即将进攻福州的情报后，急忙将防御罗源、丹阳地区的第74军第216师向连江收缩。第10兵团首长于8月4日发现这一情况后，决定提前发起进攻。从8月6日开始，各部一律轻装，按预定部署，在闽东游击队的引导配合下，翻高山，抄小路，迅速隐蔽地向福州外围开进。右路第29军于8月6日由尤溪、南平、樟湖板地区出发，经5天行军，于11日首先发起战斗，在永泰游击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永泰，歼地方保安团一部，12日继占葛岭，并向宏路、福清疾进。15日拂晓在闽中游击支队的配合、接应下，控制了福厦公路要点东张、宏路。同日，闽清守军撒逃，闽清游击队当即进占该城。16日，第

29军主力攻占福清、长乐，歼守军第73军第238师和地方保安团各一部，另一部进占渔溪。至此，切断了国民党军南逃的陆上退路，并构成对可能自漳州、厦门地区北援之国民党军的抗击态势。

左路第31军于8月8日由古田地区分路开进，13日上午攻占丹阳，14日在孙厝歼灭守军第74军第216师大部，俘其师长以下1000余人。接着继续南进，15日攻占闽安、官溪等要点，控制了福州东北外围一线阵地，歼守军第74军第23师一部。16日下午攻占马尾、连江、长门等地，歼守军第74军第23师大部及独立第50师、第201师各一部，另一部攻占闽江口外围之琅琦岛。至此，完成了控制闽江北岸，封锁闽江，断守军海上逃路之任务。

中路第28军于8月7日由建瓯东南地区出发，14日占领闽江北岸之祥溪口及大坪、双溪、下洋诸点。15日进占大湖、雪峰、闽清，守军第96军先期东逃，仅歼其后尾一部。16日攻占福州北郊屏障大、小北岭，守军独立第50师1个团起义，接着又攻占福州以北之新店、以西之徐家村，逼近福州市区。

至此，第10兵团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

三、解放福州，围歼逃军

第10兵团完成切断福州地区国民党军逃路的任务后，兵团首长于16日发出了围歼福州守军的指示。这时，守军为免遭覆没的命运，于16日晚开始分路南逃，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第73军大部及第74军一部和第201师1个团逃向平潭岛，福州绥署司令部、第6兵团部率第25军主力、第106军、独立第50师各一部沿福厦公路南窜，第96军、第25军第108师及独立第37师等部渡闽江向永泰方向逃窜，企图逃往厦门。

第10兵团首长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令第29军于尚干以南迄福清、宏路东西地区进行坚决阻击；第28、第31军迅速攻占福州市，并尾追南逃之国民党军，力求将其歼灭于乌龙江两岸及福清、永泰以北地区。各部接令后，不顾疲劳，立即行动，17日晨，第28、第31军各一部分别由西、北和由东、东北方向攻入福州市

区，守军第106军第318师师部率1个团起义，另1个团投诚。接着，在南台地区歼灭福州绥署司令部、第25军及独立第50师各一部共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除以一部兵力警备福州外，主力分路堵追围剿南逃国民党军。第28军1个师向永泰方向追击，在永泰以北山区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18日至20日，第29军在福清西北山区及宏路以北公路两侧堵歼国民党军万余人；第31军一部在乌龙江以南清口、透头地区歼守军一部。接着，各部继续搜剿捕歼溃散的国民党军。至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守军除第73军及第201师1个团大部、第74军一部逃往平潭岛，第25、第96军及独立第37师各一部逃往漳州、厦门地区外，其余均被歼于福清、永泰以北，乌龙江以南地区。

福州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俘虏和投诚第25军军长陈士章（俘）以下3万余人。第10兵团伤亡1700余人。至此，第10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在此期间，第21军第63师先后攻克宁德、三都澳、罗源等地，配合了第10兵团的作战。

四、解放平潭等岛屿

福州解放后，国民党军收缩于漳州、厦门等闽南地区及平潭等近海岛屿。第10兵团首长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并为第二阶段实施漳厦战役创造条件，决定以第29、第31军各一部沿福厦公路继续向南发展攻势，以第28军主力攻占平潭等沿海岛屿。从8月底至9月初，第29、第31军在闽中游击队的配合下，相继解放莆田、惠安、泉州、青阳、晋江、安海、南安、水头、围头等重要城镇，守军纷纷逃窜或投诚。9月10日，第29军一部攻占湄洲岛，16日另一部攻占南日岛，歼国民党军地方保安团一部。第28军一部于8月26、27日相继攻占屿头岛、江阴岛，主力集结于福清、龙田、高山、松下地区，进行攻击平潭岛的准备。

平潭岛是福建沿海第一大岛，外围有小练岛、草屿、圻屿、东庠岛、西庠岛等，是福州至厦门的海上交通要道。福州解放后，国

国民党军第 73 军第 15 师及由福州逃窜的第 238 师和第 74 军残部共近万人据守该岛及外围岛屿，加紧构筑工事、公路及平潭县城以南的飞机场，妄图在此继续顽抗，以屏障台湾，并封锁福州至厦门的海上交通。

第 28 军受领攻占平潭岛的任务后，即进行攻岛作战的准备，收集船只，征召船工，训练水手，练习海战登陆。8 月 6 日，军首长下达攻占平潭岛的作战方案：以第 82 师附第 252 团 1 个加强营、炮兵第 14 团 4 个连、军山炮团 2 个营，首先以一部兵力攻占草屿，并相机攻占圻屿，以炮火封锁海面，阻止守军军舰活动，保障师主力进攻平潭本岛的安全。师主力从东翰、大沙寨间渡海突破猫子山、凤姆山守军阵地，然后以 1 个团向观音澳攻击，主力迅速抢占开门山、莲花山诸高地及平潭城东诸港口，切断平潭城守军向东向北的退路，尔后向东北攻击前进，协同第 250 团歼灭坑口守军。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至澳仔、小湾、前娄之间地区，向北及东北警戒，待后续部队登陆后攻击北吉钩及钱便澳；以第 84 师（欠 2 个团）附军山炮团 1 个营，并指挥第 247 团，首先以第 247 团攻占鼓屿、长屿、大小练岛，组织炮火封锁海面，尔后由南前、卫营一带渡海，突破苏澳等地守军防线，迅速抢占苏澳，得手后以一部兵力向东南攻击前进，协同第 250 团歼灭流水、君山地区守军。第 251 团尾第 247 团后跟进，控制大小练岛、长屿、鼓屿、屿头岛，组织炮火封锁守军舰艇，保障第 247 团侧后安全。第 250 团归军部直接指挥，从土库、结屿之间渡海，拦腰截断、分割平潭岛守军，登陆后以一部控制龙头岭、骑虎穴、田中等地，切断平潭城守军向东北退路，团主力迅速攻占流水、坑口，尔后继向君山、溪口方向攻击前进，协同第 247 团歼灭青峰、君山之间地区守军。

参战各部队经半个月的准备，于 9 月 11 日进入进攻出发地，待命攻击，军政治部颁发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打好渡海作战的第一仗，要求参战部队坚决顽强，争取一举登陆成功；大胆积极，

大量歼灭守军有生力量，争取“平潭部队”的光荣称号。12日晚，第247团首先向小练岛守军发起进攻，至13日晨，攻克该岛，俘守军80余人。当晚19时，第245团一部攻占草屿。14日，第247团在攻击大练岛时，突遇台风，仅5个不完整的连登陆成功，登陆部队与岛上约1个团兵力的国民党军激战1昼夜，打退其多次反扑。接着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于15日17时攻占该岛，歼守军800余人。战斗中，该团第8连登陆后大胆勇猛穿插，迅速攻占守军主阵地，在友邻的配合下，打垮守军1个营的反扑，给其重大杀伤，并争取其残部投降，为全歼守军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经第三野战军前委批准，该连被授予“大练岛连”荣誉称号。

15日20时，突击部队向平潭岛发起总攻。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第244团与第245团同时从港丰南北地区登陆成功，守军全线溃乱，分向钱便澳、老爷山、流水溃退。第244团迅速追击，直取平潭城，第245团向钱便澳方向追击。16日2时，第244团攻占平潭城。同时，第247团和第250团相继由小结、苏澳一线登陆。至当日20时，结束战斗，共歼灭守军6000余人，第28军伤亡200余人。9月17日，又攻占东庠、西庠岛和圻屿，俘守军70余人。至此，平潭岛战斗结束，粉碎了国民党军依托平潭，进扰闽中，封锁福、厦间海上交通的企图，并为攻击厦门、金门等岛屿摸索了作战经验。

第三节 进击闽南，解放漳州、厦门

一、进击闽南的部署

福州战役后，为迅速解放福建全省，第10兵团决定除以一部担任新区城市警备及剿匪任务外，兵团主力由司令员叶飞率领，乘胜南下，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歼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

闽南是福建的富饶地区。漳州是福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陆交通枢纽；厦门是著名的海港，与金门并列，拱卫着闽南大陆，

扼海上航行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7月下旬亲自到厦门部署防务。福州战役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重新调整指挥系统，由汤恩伯接替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进驻厦门，统一指挥第8兵团刘汝明部、第22兵团李良荣部，在闽南组织防御。汤恩伯经陈诚同意，决定将从福州逃出的第96军和独立第37师残部归第8兵团建制，并以第8兵团部率第68军3个师、第96军残部及独立第37师，布防于漳州、长泰、南靖、同安地区，拱卫厦门、金门；以第55军3个师防守厦门，并以特务头子毛森任厦门警备司令；第22兵团亦按7月间的整编计划完成了整编，第5、第121军合并为第5军，第25军残部与第9军合并为第25军，并以兵团部率第25军2个师及从台湾调来的第201师2个团布防于大金门，以第5军2个师防守小金门。国民党军除加紧赶修防御工事外，还从台湾等地派出10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闽南这块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如果闽南大陆失守，则退守厦门、金门，凭借海峡天险和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坚固工事，抗击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待机反攻大陆。

第10兵团首长根据闽南地区地形特点和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决心分两步实施漳厦战役：第一步首先夺取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控制攻取厦门、金门的有利阵地；第二步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攻取厦门、金门两岛。具体部署是：以第31军分两路向漳州进攻，一路沿南安、同安、角尾向漳州进攻，一路沿安溪、枫洋、长泰及举溪、南靖向漳州进攻，尔后乘胜向东发展，攻占海澄、港尾、屿仔尾、嵩屿等沿海要点；以第29军主力攻占厦门以北集美、刘五店、澳头等地。以上2个军完成上述任务后，加紧进行攻击厦门岛的准备。第28军以1个加强师进至金井、石井、莲河、永宁地区，进行渡海攻取金门的准备。第二步，以第31军和第29军主力攻取厦门岛；以第28军主力和第29军一部攻取金门岛。

为保证战役的胜利实施，第10兵团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争取战役全胜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全体指战员要保持和提高战斗情绪，力戒轻敌松懈，消除急躁情绪，认真做好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消除渡海作战的思想顾虑，坚定胜利信心，争当海岛作战的英雄模范。

第10兵团后勤部制定了后勤工作计划。中共闽中工委和地方政府也积极部署支前工作，各县相继成立支前会、供应会等支前组织，广大党员和游击队员分赴各地，协助主力部队的筹粮人员，动员群众积极支前，从8月20日至10月20日，协助第10兵团筹粮队共筹集大米335万余公斤，柴草1.1万余担，基本保证了部队的粮秣供应。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还捐送美元8400元、银元9600块、黄金105两，供第10兵团使用。

二、解放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

9月初，第10兵团主力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19日，第29、第31军根据兵团的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击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地区发起进攻。

右翼第31军由南安地区分两路展开进攻。19日上午，第93师第277、第278团在第91师第271团一部策应下，攻占同安县城，歼国民党军3个保安团2000余人。第279团沿同安至漳州公路攻击前进，攻占角尾、石尾，并抢占了九龙江上的江东桥，歼守军1000余人，切断了漳州守军的水上退路，控制了漳州至厦门的水路交通。与此同时，第92师分3路向漳州攻击前进，左路第276团于19日6时攻占长泰后，即向漳州疾进。师部率第274团为中路，经岩溪直插漳州。右路第275团沿南靖至漳州公路攻击，在南靖以北歼国民党军保安团500余人，抢占了漳州通往漳浦的大桥。19日18时进至漳州北郊。这时，守军第68军军部及第81师已撤离漳州，弃城沿九龙江东逃，第92师当即占领该城，并继续向东追击。20日2时许，攻占石码镇，截住东逃的国民党军，经展开政治攻势，国民党军第68军参谋长张星伯率部投降。

第31军在完成解放漳州及其附近地区的任务后，继续向厦门进逼。至22日晚，第93师先后夺占海澄、浮宫、港尾、屿仔尾、镇海等地，沿途追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屿仔尾的攻克，使解放军的炮火可以有效地轰击厦门市，厦门国民党军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国民党军以1个团的兵力在军舰、飞机的掩护下向屿仔尾反扑，一度占领该地。第93师当即组织反击，于24日晚再次夺占屿仔尾，歼国民党军1个加强营。第31军第二梯队第91师随第93师跟进，19日抵灌口、角美地区，20日，在未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以第272团向嵩屿发起进攻，遭国民党军第55军1个加强营在舰炮火力支援下的顽强抵抗，伤亡300余人，进攻受阻。第91师当即停止进攻，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组织战斗，认真进行准备，并集中全师火炮，组成3个炮兵群，支援步兵战斗和压制打击国民党海军舰炮火力。24日晚9时，第272、第273团再次发起攻击，经6小时激战，于25日凌晨3时结束战斗，攻克嵩屿，歼守军1个营大部，其余逃往厦门。

左翼第29军主力沿福厦公路南下，至20日相继攻克新店、澳头、刘五店，歼国民党军第55军第181师和第74师各一部。21日2时，第85师第253团对集美镇发起攻击，该镇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投资兴建的学村。国民党军以1个团的兵力防守该地，并利用镇北高地和镇内的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为保护这座著名的学村，中央军委指示攻击部队，在战斗中不准使用火炮等重武器。遵照这一指示，第253团用轻武器与守军作战，经2昼夜艰苦战斗，于23日拂晓扫清集美外围据点。镇内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逃往厦门，第253团于下午进占该地，学村完好无损。

与此同时，战斗在闽西南的闽粤赣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作战，相继解放了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城，歼国民党军一部。

至9月25日，第10兵团完成了漳厦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

务，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国民党军 1.7 万余人，厦门、金门国民党军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面前。28 日，第 28 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之石井集结。

三、解放厦门岛

9 月 26 日，第 10 兵团在泉州召开有各军、师主要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提出了“金厦并攻”、“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3 个方案，并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认为 3 个方案各有利弊，第 1 方案可以造成国民党军指挥及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船只一时难以解决；第 2 方案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能全歼守军；第 3 方案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但这时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的迹象，先攻金门，厦门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跑，也不能达到全歼的目的。经反复讨论，再三权衡，大家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作固守准备，但已显露出恐慌动摇心理，汤恩伯总部和厦门补给司令部已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办公，技术兵种等撤往台湾。因此，应该趁国民党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最后，会议确定了实施第 1 作战方案，并于 10 月 4 日下达了作战预令：以第 31 军 3 个师、第 29 军 2 个师共 5 个师进攻厦门；以第 28 军 1 个加强师、并指挥第 29 军 2 个团，进攻金门，并将这一方案上报第三野战军首长。

9 月 28 日，兵团政治部发布《关于会攻金厦两岛，争取战役全胜的政治命令》，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 9 月 21 日在北平开幕，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会上已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20 多年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目标，已经实现。今天，我全体指战员必须继续努力，歼灭残敌，以伟大的胜利作为对开国大典的贺礼，巩固和保卫我们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共和国。在即将

进行的攻取金、厦两岛的作战中，决不能被前一阶段的胜利冲昏头脑，产生任何轻敌自满情绪。要认识到残敌必将拼力挣扎，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必须以英勇顽强的战斗去消灭敌人。各参战部队要认真做好准备，周密组织战斗，主动支援友邻；全体指战员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上级指挥，高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为人民立功，争取海岛作战英雄模范的光荣称号。

各参战部队按照兵团的部署和命令，迅速进至南安、同安、石码等沿海地带，进行渡海作战准备。针对部队大部分北方籍指战员不识水性、不懂海情，缺乏海战经验，对如何克服海峡天险心中无数，不同程度地存在恐惧心理等情况，开展战前动员教育。介绍海情，总结平潭岛作战经验，开展军事民主，研究克服海峡天险的办法，增强胜利信心。大力征集船只船工，由于闽中、闽南国民党军在退守厦门、金门时，许多渔民的船只不是被毁坏，就是被拉走，因此船只征集非常困难。为此，各游击队和各参战部队抽出一批得力的干部战士，专门成立船只筹集和管理机构，在当地党政机关的协助下，开展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共征集够7个团使用的船只，并对船队进行了编组训练，同时制做了大量简便的救生漂浮器材；根据渡海作战的特点，进行了海上航渡和指挥、联络、救护、抢滩登陆等战术、技术训练；开展敌前侦察，采取隔岸观察、越海侦察等手段，对国民党守军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侦察。中共厦门地下工委和人民群众也向部队提供了厦门国民党党政军警的详细情报。

第二野战军首长对第10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于10月11日电示第10兵团：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战术要求，最好是按来电同时攻歼金厦两地之敌。但从国民党军的兵力及其内部关系和我方准备程度，尤其是船只的准备情况来考虑，以5个师攻打厦门，同时以2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舰、阻援与截逃，牵制金门守军，首求攻歼

厦门守军。此案比较稳当。究应如何，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总之，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

第10兵团根据这一指示，全面检查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得知第29、第31军各只收集到一次能载运3个团的船只，第28军只有能运载1个团的船只，且大部船只是不平底江船，出海困难，同时攻击厦门、金门，船只显然不够。于是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方案，改取先厦后金的方案；集中所有船只，以第29、第31军首先攻取厦门，并以第28军一部在第29军1个团配合下，攻占大、小嶝岛，保障厦门作战的安全，阻击金门守军可能的增援与截歼由厦门出逃之国民党军。

厦门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面积128平方公里，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1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厦门与金门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历来就是东南海防要地。该岛东南部多山，北部为丘陵，地势开阔。汤恩伯在闽南大陆失守后，即率第8兵团残部和第5军第166师共2个军5个师，及要塞守备部队共3万人，退据厦门岛，妄图凭借海峡天险和岛上既设工事进行顽抗。其部署是：以第55军第74师位于岛西北部的东渡、石湖山、高崎、钟宅地区；第181师位于岛东北部的坂美、五通道；第29师1个团和要塞守备部队、第68军残部约1个师位于厦门市；第166师防守岛东南部的石胃头。国民党军在岛上构筑了以钢筋混凝土永备工事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障碍物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坚固防御阵地，形成要塞式环形防御体系，并有海空军的火力支援。同时以第29师2个团防守鼓浪屿。为给退守厦门的国民党军打气，蒋介石于10月8日率国民党军政要员多人抵厦门巡视。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人则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问题”。

10月9日晚，第29军第87师1个团和第28军第84师1个加强团，按照预定部署，对金门岛以北的大嶝岛发起攻击。攻击

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利用退潮时机涉海迅速登陆成功，至10日晚，占领该岛，歼国民党第25军第45师2个团和刚由广东汕头增援该地之第18军第11师1个团。11日夜，继占小嶝岛，歼守军1个营。15日，第82师一部攻占角屿岛。国民党军误认为解放军将先进攻金门岛，急忙将广东潮汕地区的第12兵团调至金门岛。

10月13日，第10兵团首长下达《攻歼厦门守敌的部署命令》，以第31军第91师及第93师1个加强团，强攻鼓浪屿，得手后向厦门市发展进攻。厦门解放后该军以1个师兵力攻取小金门。以第29军第85、第86师和第31军第92师采用偷渡手段夺取厦门北半部，如偷渡不成，则改为强攻。得手后与第91师等部南北对进，全歼岛上国民党军。同时以第28、第29军各一部位于大、小嶝岛、莲河、围头等地，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待厦门战斗发起后，如大金门守军增援或撤逃时，则立即对大金门发起攻击。如厦门攻占后，大金门守军尚未撤逃，则以第28军4个团并指挥第29军1个师攻击大金门。

10月15日下午，第31军首先对鼓浪屿发起攻击。15时40分，开始实施炮火准备，18时，第91师和第93师各2个营的船队，分别由龙海县的海伦湾、沙坛湾起渡，分两路向鼓浪屿的西南部发起攻击。当船驶入海湾后，东南风突然转为东北风，且越刮越猛。船队在汹涌的波涛中逆风航行，有的帆篷被刮破刮掉，有的桅杆被折断。当距对岸200余米时，又遭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拦阻，部队伤亡甚大，船只除被击毁一部外，大部被风吹回原岸，仅少数船只零星抵滩登陆。23时，第91师又组织3个营的第二梯队起渡，但皆因风浪太大而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顽强抗击优势国民党军的多次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强攻鼓浪屿的战斗虽然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未能完全掌握潮汐、风向等的规律而受挫，但使汤恩伯误以为鼓浪屿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预备队增援，同时又将厦门中部的机动部队南调，这就为解放军在厦门北部海岸偷渡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汤恩伯调动部队之时，第29、第31军主力在厦门岛北部发起偷渡，并迅速接近厦门岛北部的塞上、高崎、钟宅一线海岸，抢滩登陆。在西段，第31军第92师突击部队抵达石湖山寨上地段，适逢低潮，船只搁浅于约千米宽的淤泥滩，指战员立即下船抢滩，被岸上的国民党军发觉，并遭密集火力封锁，第92师突击部队即转为强攻，在第29军登陆部队的策应下，于16日凌晨突破守军防线，占领前沿阵地。在中段，第29军第85师突击部队从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秘密抵滩登陆，并在炮火支援下，经连续爆破，扫除国民党军前沿防御障碍后，主力向高崎发起攻击，激战至16日6时，攻克被国民党军吹嘘为“海上堡垒”的高崎要点，全歼守军。一部攻占高崎机场，歼守军一部，击毁坦克数辆，缴获飞机1架。另一部占领神山。在东段，第29军第86师于钟宅附近国民党军第74师与第181师结合部登陆，突击部队一部利用夜暗攀悬岸上岛后，俘国民党军1个排，占领钟宅。另一部攻占坂美滩头阵地，接着，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反扑，在后续部队策应下，巩固了滩头阵地。

至16日9时，第10兵团突击部队在10公里宽的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厦门岛北部国民党军的第一线防御，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随后，突击部队即向纵深发展进攻，后续梯队也源源不断地从突破口登岸加入战斗。至当日午后，第92、第85、第86师打垮了守军的多次反冲击，进至湖里、塘边、园山、枋湖一线，占领了厦门岛北半部。这时，汤恩伯才醒悟到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岛的北部，乃匆忙组织机动部队向北反扑。解放军迅速抢占厦门岛腰部一线高地，沉着应战，战至当日黄昏，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反扑，并在松柏山歼灭来援之厦门警备司令部特务营。

汤恩伯见大势已去，带一部分守军逃至海滩，并用报话机直呼军舰前来接应，其余残部也向岛南黄厝、曾厝一线溃退，准备下海逃跑。第10兵团首长得此情报后，立即命令各部迅速向南猛插，围歼溃逃之国民党军。各部得令后，迅速行动。第31军第92

师经江头、板尾向厦门市區进攻，第 29 军主力由枋湖、钟宅分别向曾厝、黄厝地区进攻。国民党残余守军在解放军的两路夹击下，溃不成军，除一部逃窜外，其余被歼于厦门大学、曾厝、黄厝等地。

在主力追歼厦门守军的同时，第 31 军第 91 师一部于 17 日晨再次向鼓浪屿发起进攻。此时，因厦门情况危急，鼓浪屿国民党军已开始集结逃窜，攻击部队登陆后将尚未逃窜之守军 1400 余人全部歼灭。当日 8 时，鼓浪屿解放。

10 月 17 日 11 时，厦门战斗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第 8 兵团部、第 55 军全部、第 68、第 96 军残部和要塞守备部队计 2.7 万余人，其中俘 2.5 万余人。第 10 兵团伤亡 3000 余人。

四、金门战斗

金门，位于厦门以东，距大陆最近处约 5.5 海里。大金门岛面积共 124 平方公里，金门县城位于该岛西部；小金门岛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大担、二担等几个小岛。大金门岛状如哑铃，东西长约 16 公里，南北最宽处不到 13 公里，中间蜂腰部南北仅宽 3 公里。该岛东部山高岸陡，多礁石，不易攀登；西部较平坦，其北岸系泥沙滩，较易登陆。

大、小金门岛原有国民党军第 22 兵团主力及第 201 师防守。其中，第 22 兵团部率第 25 军及第 201 师防守大金门；第 5 军第 200 师及第 166 师残部防守小金门。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后，国民党军为加强金门岛的防御力量，将位于广东潮州、汕头地区的第 12 兵团第 11 师增防大金门。解放军攻击厦门岛后，国民党军为屏障台湾安全，仍力图固守金门。为此，将第 12 兵团部率第 18、第 19 军由广东汕头地区撤至金门岛，至 24 日，第 12 兵团大部已抵达大金门岛，后续部队正在陆续靠岸登陆。这样，大、小金门岛的守军兵力已增加到 4 万余人，并调整了大金门岛的防御部署，以第 18 军主力防守岛东部；以第 25 军及第 201 师防守岛西部，并以第 18 军第 118 师为机动部队，控制于琼林地区；以第 19 军第

14 师位于金门县城，第 18 师位于陈坑地区。在此之前，在原有要塞工事的基础上，又在沿岸地区加修了野战工事，敷设了障碍物，埋设了 7000 余颗地雷。

厦门解放后，第 10 兵团部由泉州移驻厦门，兵团领导的主要精力忙于城市的接管工作，第 28 军军长、政治委员又或因做城市工作，或因患病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攻击金门的指挥责任交给了由第 28 军副军长、政治部主任等组成的前线指挥所，并决定以第 28、第 29 军各一部共 7 个团的兵力，由第 28 军前指指挥，攻取大金门；以第 31 军一部攻取小金门。后因船只不够，不能同时攻击大、小金门，第 10 兵团决定免除第 31 军进攻小金门的任务，集中各军所有船只，用于第 28 军攻取大金门。得手后再攻取小金门。

根据兵团指示，第 28 军前指于 10 月 18 日下达了攻击大金门岛的命令：以第 28 军第 82 师第 244、第 245、第 246 团，第 84 师第 251 团，第 29 军第 85 师第 253 团，第 87 师第 259 团共 6 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大金门。得手后，再以第 85 师 2 个团攻取小金门。命令规定，集中全部兵力于一个方向，分数路在湖尾乡、龙口间突破，登陆后首先站稳脚跟，尔后以琼林、陈坑分界阻击东面国民党军的增援，坚决歼灭金门县城之敌，随后主力东向会攻沙美、北太武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具体部署是，以第 244 团、第 251 团、第 253 团为第一梯队，第 245 团、第 246 团、第 259 团为第二梯队。第一梯队以团为单位，分别由大嶝岛、莲河、澳头起渡，第 244 团在龙口和后沙间登陆，迅速攻占后半山、双乳山，控制琼林至沙头一线大金门岛的腰部，向东警戒，掩护第 251、第 253 团进攻金门县城；第 251 团在西保、古宁头之间登陆，迅速攻占湖南和榜林，协同第 253 团攻击金门县城；第 253 团在古宁头登陆，迅速占领林厝、埔头，并攻击金门县城，歼灭西半岛国民党军。尔后会同第二梯队围歼岛东部之国民党军，解放全岛。定于 20 日发起战斗，预计 3 天结束战斗。同时决定由军前线指挥所

负责组织指挥各梯队渡海，由第 82 师首长统一指挥登陆部队作战。

第 28、第 29 军受领进攻金门岛的任务后，认真进行了渡海作战的准备。由于沿海船只大多被国民党军虏走或破坏，船只搜集十分困难。至 20 日，仅搜集到 100 多条木船，有的还需要修理，远不能满足渡海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经兵团同意后，第 28 军将战斗发起时间推迟至 23 日。21 日，第 10 兵团发现国民党军第 12 兵团部已抵达金门湾，其余部队也由潮汕地区开始船运，去向不明。23 日，又获悉国民党第 118 师已抵达金门海域，后续部队正在海运途中，并向蒋介石请示去向（实际上，此时第 12 兵团已大部登上大金门岛）。第 10 兵团首长判断其去向有三种可能：一是替换第 22 兵团防务；二是撤往台湾；三是增防金门。这时，第 28、第 29 军已集中可装载 3 个团的船只，据此，决定乘第 12 兵团尚未全部到达前，攻取金门。第 10 兵团首长预计，当夜第一次运送 3 个团登陆，返航后，再运 2 个团，当夜即可运过 5 个团的兵力，足可巩固阵地，解决岛上国民党军。为了进一步做好准备，决定再延长 1 天时间，于 24 日夜发起战斗。

24 日上午。第 28 军召集各师团首长举行攻击金门前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检查准备工作情况。18 至 19 时，第一梯队 3 个团陆续登上近 300 只木船，待命出发。由于船只不敷应用，各团战斗连队首批运载不完，均留有 1 至 2 个连队等待续运。当晚 20 时，第 244、第 253 团分别由莲河、澳头东北港湾起渡，先向大嶝岛方向航行，以与由该岛起渡的第 251 团在海面会合。24 时，3 个团由大嶝岛海面向大金门进发，当时天空一片漆黑，海面刮起三四级东北风，由于攻击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船只是在下达命令后才临时分配，临时编组，征集的船工又大多来自福州、泉州，他们不熟悉航道，又未与部队进行过演练，互不了解，航渡中协同不力，调度不灵。再加上第 82 师指挥所因船只不足，未能随船队行动，通讯联络不畅，各团均失去上级的指挥。因而船队进发后

不久，即逐渐紊乱，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各团即自行航行，接近岛岸时，适逢落潮，又遭岛上国民党军猛烈炮火的阻拦，造成部分伤亡。25日2时前后，各团在10公里的正面上，开始登陆突破，第244团在兰厝至龙口间分散登陆；第251团先头营在湖尾乡地区顺利登陆，但后续营遭国民党军炮火袭击，伤亡近1/3；253团于古宁头及其以东地区登陆。各团登陆后，不仅没有组织船只返航接运第二梯队，而且除第253团巩固了登陆场外，其余部队均未采取措施巩固登陆场。同时，各团缺乏统一指挥，也未能及时恢复建制，营以上指挥员掌握的部队最多不超过1个连。登岛部队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按既定的作战方向，各自分散作战，向纵深穿插。于拂晓前，进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安岐、埔头一线。

25日凌晨4时，国民党军刚抵金门之第12兵团第18军第118师2个团会同岛上原有守军第201师2个团向解放军发起局部反击，5时30分，又增加第19军第18、第14师，在坦克、炮兵支援下，分3路向解放军实施全线反击。8时，又出动飞机、舰艇轰击解放军阵地及未返航的船只。战斗异常激烈，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军激战竟日，伤亡很大，第244团团团长邢永生身负重伤，仍率领战士们奋勇作战，至中午12时，弹药耗尽，该团人员大部牺牲。第251团团团长刘天祥率主力激战至15时，伤亡近千人，余部冲出重围，至古宁头、林厝与第253团会合；副团长马绍堂率一部苦战近9个小时，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冲击，后率仅剩的2个班，也突围至古宁头与第253团会合。坚守古宁头、林厝地区的部队击退国民党军的多次冲击，战至黄昏，国民党军遭重大杀伤，被迫停止进攻，重新调整部署。

第一梯队所用船只，因无人组织指挥返航，登陆后又适逢落潮而搁浅，遭国民党海空军轰炸，全部损失，致使第二梯队无船航渡增援。第10兵团为解登陆部队之危，下令紧急动员船只。但

攻厦船只，有的损坏不能使用，有的正在搬运战利品，仅收集到装载4个连兵力的船只，当即由第246团长孙玉秀率第246、第259团各2个连前往增援，26日3时，第246团2个连在湖尾乡登陆，经苦战后与古宁头的部队会合，第259团2个连航行中遇大风，船被吹散，仅4个排在古宁头登陆。

26日拂晓，国民党军在坦克、火炮的支援下，向坚守古宁头的解放军再次发起进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第12兵团司令官胡璉也到达金门督战。坚守在古宁头、林厝约1.8平方公里地区的登岛部队在击退抗击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后，于22时利用夜暗向北突围至海边，但未能寻到船只，遂向东南山区转移。27日下午，在双乳山被国民党军发觉包围，血战至28日下午，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进攻金门岛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但解放军两批登岛部队共3个多团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350人），全部损失。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最大的失利战斗。

漳厦金战役从9月19日发起，至10月28日结束，共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解放了闽南大陆和厦门等重要岛屿，为巩固闽南海防，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门战斗后，第10兵团专门向第三野战军前委、华东局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认为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在胜利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急躁，盲目乐观，作战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即不适当地过早转移工作重心，将主要精力用于城市接管工作；指导思想上重厦门轻金门，在攻占厦门岛后，对攻金门岛的困难认识不足，缺乏具体指导；准备工作极不充分，尤其船只准备严重不足；在得悉国民党军第12兵团增防金门的情报后，未及时采取应变措施，片面强调抓战机，仍决定按原计划发起战斗；战斗组织不严密，第一梯队不同建制的3个团没有统一指挥，登陆后未能及时巩固滩头阵地、扩大突破口和组织指挥船队返航续运第二梯队，形成登岛部队各自为战，致使被优势国民党军各个击破，造

成战斗的失利。

10月29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发出了《关于攻击金门失利教训的通报》，通报转发了第三野战军10月28日给第10兵团和福建省委的电报，内称：“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军委同时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①同日，华东局亦致电第10兵团，指出：此次金门失利仅系局部问题，并不能改变全局胜利。希望第10兵团总结这次战斗的积极经验，鼓励士气，积极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再攻金门。

根据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三野前委的指示，第10兵团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对金门战斗作了总结。会议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做再攻金门的准备，待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条件成熟时再攻金门。兵团政治部也发出了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教育的指示，指出：金门战斗虽然失利了，但登陆部队表现极为英勇顽强，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缺粮缺弹的危急情况下，始终坚持苦战，高度地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赤胆忠心，足以留芳千古。全兵团指战员要向他们学习，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为牺牲的同志复仇杀敌，完成他们的未完成的遗志，迅速而周密地投入战斗准备，一定要打下金门，全歼守敌。

第10兵团参加再攻的各部队认真进行了攻金的作战准备，1950年6月，美国的第7舰队侵占台湾海峡，中央军委解除了第10兵团攻占金门岛的任务。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00、第101页。

五、攻占东山岛

东山岛位于福建南部之近海，与广东省汕头毗邻。金门战斗后，国民党军以第12、第22兵团全力防守金门岛，以由编余军官及保安团队组成的第17军2个师约5000人控制东山岛，企图以该岛作为台湾派遣特务，联系大陆匪特，对大陆进行破坏的跳板。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这一企图，解放东山岛，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根据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的指示，决定以第31军指挥该军第91师和第32军第94师，炮兵第14团野炮营、山炮团2个营发起东山岛战斗。

第31军根据东山岛守军战斗力不强，工事薄弱的情况，决定以第91师并指挥第94师第282团由四都港、大梧一线起渡，分别在黄母、新厝、礁头等地登陆突破，成功后第一步攻占官略尾、梧龙、208高地、岱里及西山岩、401高地等地，肃清北半岛守军；第二步再肃清南半岛守军。以第94师主力由三礁、下曾一线起渡，从右港两侧登陆突破后，第一步攻占前后马鞍、张塘、南埔、山前等地，与第91师打通联系；第二步集中主力歼灭东山县城守军。

1950年5月11日晚，第91、第94师登陆部队乘船起渡，21时30分至22时30分第一梯队 in 预定地点顺利登陆，守军稍作抵抗后即纷纷逃窜。攻击部队遂发起追击作战，12日1时第94师一部占领东山县城，守军第58师警卫团投降。至12日凌晨，战斗结束，共歼守军2000余人。

第四节 进军浙东、浙南，解放舟山群岛

一、进军浙东、浙南，解放浙江大陆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后，解放了浙江大部地区，仅有浙东、浙南地区尚被国民党军控制，其中浙东地区驻有第87军等部，浙南地区仅有保安团队防守。

浙南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是红军创建的游击根据地，

浙东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地区组织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的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主力渡江前，浙南游击队已发展到4000余人，整编为浙南游击纵队，下辖3个支队、1个独立大队；成立了浙南人民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南行政公署，以及乐清、玉环、黄乐、青田等县民主政府，并成立了永嘉、瑞安、平阳、大南、泰顺、鼎平、双溪、景宁等县的民主政府筹备委员会。浙东游击队发展到6000余人，整编为浙东第2游击纵队，辖6个支队。人民解放军主力渡江后，这两支游击纵队也积极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势作战，浙南游击纵队，解放了浙南大部分地区，5月1日，浙南游击纵队包围了浙南重要城市温州，并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了国民党军第200师师长兼浙江省第5行政区保安司令叶芳晓率2个团及自卫团、永嘉自卫总队等部共1000余人，于5月4日在温州起义，温州和平解放，浙南游击队于5月7日进驻温州。浙东游击队解放了诸暨、绍兴等地。

第7兵团进驻杭州后，根据第三野战军的统一部署，于5月4日夜研究夺取浙南、浙东的部署，初步决定以第21军向以奉化、溪口为中心进军，并以少部兵力控制宁海、嵊县、象山等地，肃清散匪，协助地方恢复社会秩序；尔后南下进占温州。第22军进占宁波及其周围县城。第23军任杭州地区的警备。

5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并转谭震林、王建安等，指出：第7兵团“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①

5月15日，第7兵团下达了《进占温州、宁波等城市的作战命令》，命令规定：第21军向温州进军，军部率主力控制温州、青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75页。

田，以 1 个师控制瑞安、平阳，并向平阳以南以西扫清山区之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控制乐清，扫清以北山区之国民党军。第 22 军沿钱塘江铁桥、萧山、绍兴、余姚，进至宁波地区。军部率 1 个师控制宁波、慈溪，1 个师控制镇海，并准备向定海进展，另 1 个师先控制宁波以南，准备向奉化、溪口、宁海、象山进军。第 23 军待第 21、第 22 军越过绍兴、诸暨后，即以 1 个师进占萧山、绍兴、诸暨，扫清东西山区之国民党军，以 1 个师控制余杭、海宁，军部率 1 个师警备杭州。第 35 军进入金华、兰溪地区，军部率 1 个师控制金华，以 1 个师控制永康、宣平、缙云、丽水地区，另 1 个师控制兰溪、汤溪、龙游、遂昌地区，清剿溃散的国民党军和土匪，并协助地方政府开辟新区。

5 月 16 日，各部开始行动。第 21 军军部率第 63 师先后由萧山、临浦镇车运金华，后沿金华至温州公路南下，21 日到达缙云，继经丽水、青田，于 25 日抵达温州，与浙南游击队会师。随后，以 1 个团任温州警备，1 个团任瓯江两岸沿海地区海防，1 个团经平阳继续南下，于 6 月 11 日攻占福建省福鼎县城。第 62 师在诸暨、萧山、绍兴一带搜剿溃散之国民党军后，于 6 月 6 日南下，6 月 15 日进至临海、仙居，接收改编了 5 月 29 日起义的国民党军 3000 余人。16 日进占黄岩，23 日在海门东北涂下桥歼国民党浙江行署副主任翁光畅、浙南保安副司令马子俊等以下 1300 余人，25 日进占海门。至此，浙南地区全部解放。第 61 师由萧山南下，经绍兴于 21 日攻占三界镇、章镇、仙岩、浦口等据点，歼国民党军第 200 师一部，22 日解放嵊县、新昌。其后，该师归第 22 军指挥于 24 日进占奉化、溪口。

第 22 军于 5 月 16 日由杭州地区沿甬杭公路东进。此时，汤恩伯为阻止人民解放军东进，以第 87 军指挥 3 个团沿曹娥江布防。19 日，第 22 军进抵曹娥江西岸，准备渡江。20 日晚，突击队偷袭曹娥江成功，守军大部逃窜，21 日拂晓，第 22 军全部渡过曹娥江，向宁波攻击前进，23 日占领余姚，24 日上午解放慈溪，

下午向宁波发起进攻，守军一触即溃，25日拂晓全部占领宁波市。26日占领镇海。接着，第22军并指挥第21军第61师向穿山半岛进击，守军未作大的抵抗，就逃往舟山群岛。在8天的追击作战中，第22军等部共歼国民党军3700余人。这时，国民党军第87军前指率第220、第222师及交警第9总队等部仍盘踞在象山半岛，其中军前指位于半岛东南石浦，第220师位半岛北部胡桥头、西周、象山城等地；第222师驻守半岛南部沥阳、茶院、宁海；交警第9总队位于半岛东北部蛟门至西泽一线。根据上述情况，第22军首长决定，以第65师、第64师1个团和第21军第61师共7个团的兵力，夺取象山半岛；以第66师、第64师主力位于穿山半岛，监视舟山群岛之国民党军。7月3日，第61师由天台向宁海、黄坦进击，第65师由下陈村、崔家村向胡桥头攻击前进；第64师1个团进至穿山半岛南部，搜集船只，准备南渡。7月5日23时，第61师攻入宁海城内，守军大部逃窜，6日，进占茶院、沥阳；第65师则相继进占严家山、胡桥头等地。接着，2个师分别从半岛南、北由西向东乘胜追击。7日晚，第64师1个团由金岙以西渡过象山港，进占珠溪镇。守军无心作战，纷纷逃窜。8日，第65师解放象山城，9日，第61师进占石浦、国昌卫。象山半岛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1000余人。至此，浙江大陆基本解放。

在野战军主力进军浙东、浙南期间，浙南游击纵队和浙东第2游击纵队积极配合主力作战，为解放浙南、浙东地区作出了贡献。

二、解放舟山群岛

(一) 解放军逐岛攻占的作战方案和准备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杭州湾外东海之中，由舟山本岛、岱山、长涂、普陀、桃花、六横、登步、金塘、大树等400多个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200平方公里；其中舟山本岛为最大，面积达523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的重要港口，巨型海轮可自由进出，各水道均有

浮标，更利于航行。亦是海军良好的基地。舟山本岛多山峦，其中以五雷峰、老虎山、茅头尖、竺家尖等山海拔最高，约达 500 米左右，可俯瞰附近海域。舟山群岛扼中国海上航行的要冲，又是沪、宁、杭地区的海上屏障，历来就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日本侵华期间和国民党军先后在此进行了多年的经营，在舟山本岛筑有飞机场及海军基地设施。

1949 年 7 月，浙江大陆解放，国民党军第 87 军退守舟山群岛，使该地总兵力达 13 个师 6 万余人。此外，还有海军第 1 舰队舰艇 50 余艘，空军作战飞机 10 余架。国民党政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后，又在舟山设立指挥所，由郭忏任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舟山地区陆海空军的作战。9 月 5 日，又由石觉接替周岩任舟山防卫司令。

8 月，国民党政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确立了“海上以攻为守，陆上寓攻于守”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制定了《陆海空军保卫舟山群岛联合作战计划》，确定“确保舟、嵎海空军根据地，封锁东海岸各港口，破坏大陆交通及生产，动摇匪区民心、经济。策励匪后游击活动，促使匪共崩溃，掩护力量之形成，待机向大陆反攻”，及“以舟山群岛现有兵团主力，守备定海（舟山本岛）及外围各岛屿。重点保持于本岛西部，及西南外围各岛，发挥陆海空三军联合战力，击灭渡犯之匪；并阻断匪各岛间交通……以达成长期固守，争取待机之目的”的作战方针。为此，“舟山防卫部，负有本群岛防卫之全责；同时并励行整训；发动民众，完成环岛阻绝，内陆要点各坚固据点群工事之构筑与加强，及交通、通信、码头之整修与维护。”“海军以轻型舰艇，经常巡逻舟、嵎群岛周围，及附近大陆沿海，摧毁匪船及沿海交通；以主力分置朱家尖亘登步岛东南，及外洋螺亘册子山西北海湾，如发现匪船集结或匪炮阵地，应即予扑灭之，并与当地守军协同及与防卫司令部切取连系。”“空军经常派机巡逻舟嵎群岛，及周围大陆海岸、内陆河流、公路，摧毁匪船，妨害匪陆上交通，如有发现，应即予摧

毁之。”“由舟山防卫部抽调一部兵力，编成突击队，统一使用，担任海上巡逻，及在匪进攻时，袭击匪后。”“匪如冒险来犯，各守备部队，应竭力固守，以待本部强大战略预备队，协同海、空军，联合歼灭犯匪于海岸，并相机反攻登陆。海上突击队，则袭击匪后，截断其增援与补给。”“加强浙、苏两省匪后游击队之整编，及重新律定指挥系统，并由各队派员前来定海，随时接受指示。”“实行总体战，动员全岛之一切人力、物力，购集作战资材，军民一心，积极完成长期固守舟山。”^①

根据上述方针和指导原则，舟山防卫司令部加紧整编部队，调整部署。相继将 13 个师整编为 7 个师，即撤销了第 45、第 21 军番号，部队编入第 75、第 87 军，将暂编第 1 军缩编为第 71 师。其防御部署是：以第 75 军防守舟山本岛西部及金塘、册子、大榭、大小猫山等岛屿；第 87 军防守舟山本岛东部及梅山、六横、桃花、登步等岛屿；第 71 师防守岱山、衢山及嵎泗列岛；海军第 1 舰队所属舰艇和陆战第 1 师位于定海港及长涂岛；交警第 9 总队位桃花岛。同时，积极收罗海匪和游杂武装，增筑防御工事，扩建机场码头，封锁海上交通，轰炸、袭扰上海、宁波等沿海重要城市和地区，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渡海作战准备，并使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1949 年 5 月 25 日，即上海解放前夕，第三野战军首长指示第 7 兵团：在宁波、镇海将解放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第 87 军有可能撤向舟山，蒋介石企图以舟山作为其残余海空军基地。如让其企图实现，则今后将对沪杭沿海地区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因此，第 7 兵团应乘上海国民党军尚未撤退之前，立即部署，以足够兵力占领舟山本岛及其他重要岛屿。这样，不仅可以阻碍上海国民党军的撤退，而且可以巩固上海、宁波、杭州地区的防务。第 7 兵团首长应迅速前往指挥舟山之作战。28 日，第三野战军首长又根据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7 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9 年版，第 77、第 78、第 79 页。

上海地区国民党军有一部撤往舟山，青岛国民党军亦有撤往舟山的消息等情况，指示第7兵团，暂缓占领舟山，但仍须继续准备，妥为布置，在绝对有把握时再行攻占舟山群岛。

第7兵团根据野战军的指示，一面继续向浙江镇海和象山半岛发动进攻，歼灭浙江大陆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一面开始筹划解放舟山群岛的有关事项，决定由第22军并指挥第21军第61师遂行这一任务。7月24日，第22军在宁波召开了由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第三野战军首长关于解放舟山群岛的有关指示，分析了舟山群岛的地理特点和国民党军的情况及第22军本身执行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困难，认为，第7兵团参加攻击舟山群岛的部队只有4个师4万余人，而且只是步兵和为数不多的炮兵，同岛上国民党军相比，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同时，参战部队均是第1次参加渡海登陆作战，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渡海作战所需的大量船只，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筹集备齐；加之舟山群岛暗礁繁多，水情复杂，更增加了渡海作战的困难。根据这种情况，会议决定采取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即首先逐次攻取金塘、大榭、梅山等外围岛屿，以取得渡海作战的经验，争取时间筹集船只，尔后攻占舟山本岛。并决定争取于8月20日前发起战斗，以策应第10兵团进军福建的行动。

第22军等部受领攻打舟山群岛的任务后，相继进抵镇海至穿山半岛沿海和象山港两侧地区，进行战前准备。7月19日，第22军下达了准备工作指示，要求各参战部队加紧收集船只、水手，进行以渡海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技、战术演练；20日军召开了侦察工作会议，全面布置侦察工作；27日，成立了战勤指挥部。“八一”建军节期间，开展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各团普遍召开了士兵代表大会、英模座谈会，首先在骨干中打通思想，然后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的立功创模的荣誉感和战斗积极性，克服了和平麻痹、斗志松懈的偏向。

在军的统一部署下，各参战部队抽调大量干部从事船只和水手的征集工作，由于国民党军在逃离大陆时，抢走了大批民船，抓走大批水手，加上国民党军海、空军的袭扰和特务分子的破坏，使得有些有船的群众存有顾虑，因此船只征集工作十分困难。从事征集工作的干部紧紧依靠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向人民群众宣传解放舟山群岛的意义，动员他们献船参战，并制定了认真登记，用后归还，损坏赔偿，伤亡优抚等规定和条例。经过努力，至8月中旬，完成了首战大榭岛所需船只和水手的征集工作。

参战部队根据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争分夺秒地进行艰苦的临战训练，当时，正值江南酷暑季节，指战员顶烈日，冒风雨，披星戴月，忍饥挨饿，撑着帆船，架着简便的救生器材，在海中练习游泳、划船、海上射击、救护和航渡编队、抢滩登陆等技术战术动作。有时遇到大风大雨，不能下海练习，他们就几十个人拴在一条绳索上，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承受海浪的冲击，以提高适应能力。为了解决晕船问题，他们在吃饭时也端着饭碗围绕竹竿转圈，锻炼和提高抗晕能力。为克服海滩淤泥的障碍，不少战士白天练习游泳、驾船后，不顾疲劳，夜晚继续在没膝的淤泥中来回跋涉。为了解决缺乏水手的困难，专门成立了“水手大队”、“水手营”，他们的训练更为艰巨刻苦，不少战士在海上训练时，遇到国民党军军舰、飞机和风暴的袭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超强度的艰苦训练，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之部队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生活又十分艰苦，许多指战员患上了营养不良症和疟疾、痢疾等，据统计，有30%左右的人得了夜盲症，50%左右的人患了口腔炎。在内河训练的部队，血吸虫发病率高达50~70%。但是，指战员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炎热和疾病作斗争，坚持刻苦训练，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掌握了渡海登陆作战的本领。

在准备过程中，广大指战员结合训练中遇到的问题，设想渡海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研究渡海登陆的指挥方法和火力掩护，发明了许多方便适用的简便器材。如设计制作了轻便的三角架和迫

击炮垫板，使枪炮在船上或海滩上都能迅速架设和射击。研制了诸如船用炸药发射筒、水上漂雷、长杆炸药投放器、螺旋桨炸药推进器、自炸爆破舟等百余种爆破器材。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得知这一消息后，急电舟山防卫司令部：中共军队近来使用“飞雷”和“加重手榴弹”，爆炸威力大，要小心对付。

(二) 攻取大榭、金塘等外围岛屿，建立夺取舟山本岛的前进基地

经过 1 个多月的准备，第 22 军基本完成攻击外围岛屿的准备。8 月 8 日，第 22 军参谋长赴杭州向第 7 兵团首长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准备首先攻打金塘岛的方案。第 7 兵团首长根据第三野战军的指示，经反复研究后，确定将攻占大榭岛作为解放舟山群岛的第 1 仗。

大榭岛位于穿山半岛以北，舟山本岛西南海域，距舟山本岛不足 4 海里，距大陆只有 0.32 海里，是浙江大陆通向舟山本岛的门户。据守大榭岛的国民党军为第 75 军第 16 师第 48 团，共 1000 余人。守军在滩头敷设了鹿砦、竹签等障碍物，在前沿和纵深地段构筑有与交通壕相连接的地堡群，并可随时得到海空军和其他岛屿的支援和增援。

根据兵团指示和大榭岛国民党军的情况，第 22 军于 12 日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确定了攻取大榭岛的作战方案，决心以 3 个步兵团和 1 个炮兵团的优势兵力，攻取该岛及附近小岛。具体部署是：以第 64 师第 190 团并指挥第 66 师第 196 团第 2 营共 4 个营的兵力为第一梯队；以第 66 师主力为第二梯队，在军属山炮团的火力支援下，攻取大榭岛；另以 1 个团夺取外神马山和穿鼻山岛，以第 61 师部分兵力位于穿山半岛南侧，监视象山半岛港口外梅山岛国民党军的动态。为了利用夜暗的掩护达到战斗的突然性，定于 18 日 18 时 30 分发起战斗，并要求一切准备工作隐蔽进行。

参战部队为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实行了严格的

阵地管制。17日20时，主攻团将隐蔽在河港湾内的200多条船，悄悄地抬运到起渡场，用杂草和芦苇等伪装起来，使绵亘几公里长的船队不露一点痕迹。炮兵团人拉肩扛，将火炮从数公里外的地方秘密运至发射阵地。数千名解放军指战员一夜的紧张行动，国民党军竟毫无察觉。第2天，国民党军的飞机前来侦察、扫射，也未发现一丝痕迹。

18日18时30分，第22军攻岛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大榭岛发起攻击。首先以猛烈炮火轰击守军前沿阵地，炸得守军晕头转向，一片混乱。第一梯队4个突击营分乘100多条民船，扬帆起渡，向大榭岛进发，只用15分钟就在大榭岛南部抢滩登陆突破成功。接着，突击部队分3路向纵深穿插分割，迂回包围，沿途守军纷纷就歼。至当日午夜，包围了七顶山守军指挥部，经激烈战斗，至19日拂晓，将其全歼，击毙守军团长。

19日中午，国民党军第75军第6师第18团，分乘5艘军舰，在5架飞机和舰炮的掩护下，向大榭岛实施反扑，在岛的北部登陆，占领了部分滩头阵地。第22军立即组织反击，并动员刚被俘虏的国民党军炮兵调转炮口轰击增援的国民党军。战至当日午夜，歼其大部，其余登舰逃回舟山本岛。

大榭岛的解放，使驻守梅山岛的国民党军1个团闻风丧胆，逃往六横岛，第61师于25日进占该岛，穿鼻山岛、外神马山岛也同时解放。此战，共歼国民党军1400余人。首战的胜利，为继续攻取其他岛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增强了部队渡海登陆作战的信心。

大榭岛战斗后，第22军再次研究了下一步的攻击目标。26日，军长孙继先赴杭州向兵团领导提出2个方案：一是增加兵力，以2个军采取南北夹击的部署攻取舟山本岛；二是仍采取逐岛攻击的方案，攻取金塘岛。第7兵团领导经慎重研究后，于30日电示第22军，第2仗攻取金塘岛，拔掉国民党军在舟山本岛以西最大的外围据点，以便与大榭岛一起，从西、南两面构成进逼舟山

本岛的态势。并要求于9月20日发起战斗。

金塘岛位于舟山本岛以西海面，是舟山群岛的第3大岛，与浙江大陆相距2.6海里。该岛不仅是舟山本岛西侧的屏障，而且是扼控镇海和甬江口的要冲。国民党守军为第75军第102师和军属炮兵营，共3500余人，其中以2个团位于岛的南部，以1个团位于岛的北部，师指挥所位于岛中部的大象地。大榭岛的解放，震惊了舟山防卫司令部，周岩严令“要死守金塘岛”。守军在前沿阵地和纵深山腰、山顶构筑了大量的明碉暗堡，重要地段每70米就有1个；在岛上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在滩头增设桩砦、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企图守住该岛。

第22军根据兵团指示，认真进行了攻击准备。9月初，军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心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攻取金塘岛，以第66师全部、第64师1个团为登陆突击部队，以第65师1个团为预备队，在军山炮团及炮兵第11、第17团的炮火支援下，利用夜暗渡海强行登陆；以第64师部分兵力配属炮兵一部，对舟山本岛以南诸小岛实施佯攻，封锁金塘岛与舟山本岛之间海面，并用远程炮兵火力压制定海机场，策应金塘岛的作战；以驻防梅山岛的第21军第61师一部兵力佯攻六横岛，并随时准备协同第64师等部作战。

为了保证战斗的顺利实施，第22军党委于9月6日发出《对执行当前战役任务的主要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要克服首战胜利后滋长的盲目自满、急躁轻敌、麻痹松懈、不愿继续学习的思想倾向，进一步做好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船只的收集、修理，要着重研究渡海登陆及登陆后的战术动作。17日，第22军再次召开作战会议，详细检查了准备工作情况，发觉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船只还尚未全部调动至预定位置，火炮也未进入阵地。同时，了解到金塘岛海面潮汐落差较大，岸滩多为坡状淤泥，退潮时船只无法靠岸，在满潮或平潮时才是船只靠岸的最佳时机。而这种时机每月只有6天，每天只有4个小时，20日正值低潮，船只根本不能靠岸。据此，遂向兵团建议推迟战斗发起时间。第7兵

团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同意将攻击时间推迟至10月初。

10月2日，潮汐对船只在金塘岛靠岸十分有利，也是预定战斗发起之日。但这一天浙东沿海下着大雨，海上雨雾茫茫，逆风浪大，船只根本无法航行，战斗只得推迟。第2天上午，天仍未好转，指挥员们焦急万分，因为按潮汐规律和气象特点，如果错过了10月4日的满潮、平潮期，船只将无法靠岸，战斗就要推迟半个月发起，这将影响到舟山群岛解放的进程。为捕捉战机，指挥员一面命令突击部队登船待命；一面请当地有经验的老渔民，共同观察、分析气象变化情况。下午17时30分，刮起东南风，雨停雾散。老渔民认为，这种天气可以保持几个小时。于是，指挥员命令立即发起战斗。此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3天，参战部队在“打好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仗”的口号声中，首先以配置在穿山半岛北岸、齿鳞和大榭岛的49门大口径火炮进行1小时的火力袭击。接着，突击部队乘坐的300多条船分别由三山到老鼠段及太平桥等地起渡，向金塘岛进发。不料途中又降大雨，船队毫不犹豫，继续冒雨疾进，仅75分钟即驶抵岸滩，经激烈战斗，分别在柏塘、大小泥湾、东岙、横兰登陆成功，夺占了滩头阵地。这时，雨下得更大更猛，对纵深战斗带来极大困难。但国民党军定海、岱山机场的飞机也因此无法起飞，军舰也无法航行。登陆部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冒雨迅速向纵深扩大战果，至4日晨，将守军大部歼灭于大浦口、纱驴山、柳港地区，很快占领了岛的南半部。退守北半部的国民党军一再向郭忏、石觉报告“伤亡惨重”，要求“速派海空军增援”。但郭忏等人面对恶劣的天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塘岛守军被歼灭。解放军登岛部队在积水齐胸的条件下奋勇作战，至5日拂晓，攻占了岛西北部渡口沥港镇，歼国民党军500余人。接着于当日下午渡过海峡，攻占大鵬山岛。至此，金塘岛战斗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2400余人，使舟山本岛翼侧暴露，直接处于解放军炮火威胁之下。

大榭、梅山、金塘等岛屿的解放，将舟山本岛的外围防线打

开了一个缺口，国民党军为固守舟山本岛，将位于广东潮汕地区的第12兵团第67军增防舟山本岛，并收缩兵力，10月6日将驻守六横、虾峙等岛守军撤至舟山本岛。解放军第61师当即于7、11日进占该两岛。

金塘岛解放后，第7兵团和第22军决定乘胜攻取桃花岛，并于10月7日将这一任务交给第61师。桃花岛位于舟山本岛以南，离舟山本岛的重要港口沈家门仅6.4海里，驻守该岛的国民党军为交通警察第9总队和第87军第221师1个营，为保住该岛，以屏障舟山本岛，石觉令守军严加防守。于是，岛上守军疯狂地抓壮丁、拉民夫、拆民房、砍树木，昼夜不停地赶修加固工事。

第61师受领任务后，决定以4个营的兵力攻取桃花岛，同时加紧收集船只，进行渡海作战的军事常识教育。刚刚获得解放的虾峙岛人民，也纷纷将埋在海滩上和沉在海中的船只取出来，仅3天就将装配好的70余条船并配齐船工送到部队。军民齐心协力，只用一周即完成了各项战前准备工作。

10月18日下午16时40分，第61师开始炮火准备，18时12分，突击部队在虾峙岛登船完毕，24分起航。经30多分钟的海上航行，分别在桃花岛、小王水和老埠头地区突破登陆，占领滩头阵地，并向纵深勇猛穿插，经一夜战斗，于19日拂晓占领岛北部的2个渡口，截断了守军的退路，并控制了猫山、灶山等守军阵地，歼守军大部，残余守军退守2820高地。11时，攻岛部队向该地发起攻击，并开展政治攻势，迫使守军1个营投降，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歼国民党军1300余人，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战后，第7兵团赞扬这一仗是“抓住战机，大胆突击，果断穿插，速战速决的典范”。接着，为巩固桃花岛的安全，第61师又于20日和23日分别攻占位于桃花岛西南和东北海面的大小双山岛和鹞鹑岛。

（三）进攻登步岛作战

经过2个多月的作战，第22军攻占舟山本岛外围岛屿30余

个，基本形成对舟山本岛的弧形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深感舟山本岛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保往舟山本岛，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桂永清等人于10月中旬赶到舟山视察，策划、调整防务：在舟山设立空军指挥所；将海军第1军区舰艇调至舟山；从台湾抽调工程部队和调运大量器材，加修永备型、半永备型工事及海滩障碍物，并在岱山、长涂两岛修建第2海空军基地。以第75军2个师守备舟山本岛西部及外围册子山、大猫山等岛；以第87军2个师守备舟山本岛东部及登步、朱家尖等岛屿；以第71师仍守备岱山；海军陆战第1师防守长涂岛；第67军3个师位于定海以北为机动部队。

为了进一步完成对舟山本岛的弧形包围，为攻取舟山本岛创造有利条件，第7兵团令第21军第61师攻取登步岛。10月28日，第三野战军针对金门岛战斗失利的教训，就登步岛作战指示第7兵团：攻击兵力，应不少于2个团，同时要组织必要炮火切实遮断、封锁国民党军舰活动；要有保障第一梯队同时起渡登陆，第二梯队连续航行的船只；要切实掌握预定作战地区的敌情、海情、潮水、风向、气候的变化；要严格检查参战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指挥上的粗枝大叶，以求一次攻击奏效。

登步岛，位于舟山本岛东南，全岛面积共18平方公里，北距舟山本岛之沈家门约3.8海里，南距桃花岛仅0.45海里，是舟山本岛东南外围弧形防线中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军为守住该岛，确保舟山本岛向南的海上交通，在桃花岛失守后即令第87军第221师师长率部增援登步岛，使岛上守军增至约1个团又2个营。同时，以位于舟山本岛的第87军1个师和第67军保持机动，随时准备增援该岛。

11月3日22时，解放军第61师第一梯队3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冒着大雨由桃花岛起航。经20多分钟的艰苦航行，有7个半连在登步岛登陆突破，接着，击退了守军的反冲击，迅速向纵深发展，战斗至4日拂晓，歼守军8个连，俘近600人，占领了流

水岩山、大山、周家、炮台山等地，控制了登步岛 3/4 的地区，将守军残余部队压缩于岛北部的鸡冠礁村及沿海一隅。

4 日 7 时，国民党军第 67 军 4 个团在空军支援下，乘军舰向登步岛增援，由于解放军无远程火炮压制、封锁国民党军军舰的航行，加之登陆部队未能占领渡口码头，使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得以顺利登岛。该部登岛后，在海空军火力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分两路向流水岩、炮台山解放军阵地进行反击。解放军与之激战竟日，被迫放弃炮台山等阵地。当晚，第 61 师的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各 1 个营、第一梯队 3 日晚未能登上登步岛的 1 个半连以及师直属队的 3 个连在登步岛登陆，与岛上部队会合共同战斗。战至 5 日晚，第 61 师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反击，并夺回了一部分丢失的阵地，歼国民党军一部，但自己也遭受重大伤亡，战斗呈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第 61 师考虑到岛上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登岛部队处境十分困难，又难于在短时间内继续组织部队登岛参战，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随后，经过周密的组织，携带全部伤员、烈士遗体和 300 余名俘虏，返回桃花岛。

此战，人民解放军虽然未达到攻占该岛的目的，但歼灭了国民党军 3200 余人，并有俘获，然后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反击下安全撤离。登岛部队虽伤亡 1400 余人，却成为一次重要的战役侦察战，证明在当时情况下攻击舟山本岛的条件尚不具备。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主要指挥员思想上轻敌，未能很好研究落实野战军 10 月 28 日指示，战斗准备不充分，第一梯队兵力过少，第二梯队又未能及时跟进登陆加入战斗，致使不能迅速解决战斗，给国民党军增援以可乘之机。同时，由于对国民党军必然增援的情况缺乏预见和准备，以致这种情况出现后无法再组织输送部队登岛参战，使登岛部队终因力量悬殊，战力不济，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四）加紧备战，迫使国民党军撤离舟山群岛

根据前一阶段攻占舟山本岛外围岛屿的情况，第三野战军领

领导人粟裕、唐亮、张震等，于登步岛战斗发起的前两天，即11月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击舟山本岛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第22军全部、第21军5个团、第23军2个师，和炮兵第11、第17团全部、第16团一部及水陆战车15辆、炮艇16艘，由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第7兵团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治委员吉洛统一指挥，于11月20日左右向舟山本岛发起攻击。并提出如下作战方针和指导思想：力戒轻敌骄傲，弱敌当强敌打；充分做好战前准备，打有把握有准备之仗；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举成功，用足先头部队，打乱敌人防御体系；力争偷渡，准备强渡；大胆割裂敌人，猛插纵深，迫敌背水作战，以求全歼敌人。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方案，同时指出：“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① 11月14日，中央军委又致电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指出：“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②

国民党当局对人民解放军未能攻占登步岛和金门失利两次作战大肆渲染，鼓吹“胜利”，借以稳定军心。同时，自11月10日起，又从台湾增调第52军到舟山群岛，积极布置坚守。根据这种情况和解放军的准备工作情况，以及气候等各方面的条件，粟裕于11月22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金门、登步岛两战后，国民党军固守海岛的信心有所增强，加上其海空军尚占优势，能直接配合陆军作战，守备能力有所提高。而解放军还缺乏组织大兵团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又无海空军的配合，收集到的船只不到需要量的3/10，且大部在内河，运抵外海，尚需时日。因此，建议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18页。

^② 同上书，第137页。

对舟山本岛的攻击时间推迟至明年1月或2月，以便准备足够的船只，使攻击部队能在无海空军配合下，一次登陆成功，并有足够兵力，单独进行作战。12月5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建议。同日，粟裕遵照中央军委11月14日的指示，赴浙东召集第7、第9兵团的师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渡海作战的战术和准备工作，并决定第21军全部参加攻舟作战。

在野战军和兵团的统一部署下，参加攻舟的各部队在登步岛战斗后，相继投入战役准备工作。12月1日，第7兵团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定海战役延长准备时间的政治工作指示》，向全体指战员进一步阐明解放舟山群岛的重大意义，说明推迟战役发起时间的原因。要求参战部队要防止和纠正急躁，不愿再拖长时间和因推迟攻击而产生的松懈情绪，使部队继续保持正常、巩固的作战到底的战斗意志，进一步做好思想上、物质上、战术上、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参战部队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不识水性、不明风潮规律及严寒水冷的困难，利用夜暗练习航海、射击及协同动作，在深及腿膝的泥滩上演习登陆突击；各级干部采用召开战术研究会、举办短期集训班等方式，学习航海队形、火力组织、滩头登陆突破等战术指挥。经过勤学苦练，终于使不少指战员掌握了驾船技术、海上潮汐规律及风向，熟悉了航路，成为航海能手；大部分指战员学会了渡海作战的战术动作，明确树立了勇往直前、连续艰苦作战、独立作战的战术思想，并从组织上做好了充分准备；指战员们还创造了水上漂浮爆破法，制造了枪炮夜间瞄准具、射击三角架、领航灯、轻便竹桥等作战器材。

与此同时，在华东局的支持下，第三野战军会同江苏、浙江、山东、皖南、皖北和上海市的党政机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总体战役准备。各地相继成立了支前委员会，浙江省支前委员会动员组织民工26万人，民船2060只，担架786副。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山东省的支前机构也动员了大批

船只和船工南下参战。为避免船只从海上南下遭受国民党海空军的轰炸破坏,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采取了铁路和内河运输的办法,并组织了部队和民工将运河开掘到浙江海宁、乍浦的海堤前。1950年2月,华东沿海机场大部抢修完工,3月,空军航空兵部队进驻上海。4月2日至5月11日,先后在上海、徐州、杭州等地击落国民党军飞机6架,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空中封锁,夺取了江浙沿海的部分制空权。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又于3、4月间从台湾、金门抽调第92师和第19军至舟山群岛,使该地国民党军兵力增至5个军16个师,连同特种兵部队,达12万人。根据国民党军逐步增加,及战役准备工作、气候情况,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首长经中央军委批准,又曾两次推迟发起攻击时间,并相继抽调第24、第20、第26军和部分炮兵参战,使参战总兵力达到6个军10个炮兵团。4月25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召开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会议,决定以第7、第9兵团共6个军组成南北2个作战集团,分别由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指挥,在海空军支援配合下分别由浙东沿海和上海方向对舟山群岛发起攻击。

5月1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海南岛,第三野战军也即将对舟山群岛发起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集中兵力,确保台湾,急令舟山群岛守军紧急秘密撤退。自5日开始,国民党军每天以飞机和炮兵对浙江沿海和已被解放的舟山群岛外围岛屿实施轰炸,制造反攻金塘岛的假象,以掩护其撤退。13日至18日,舟山群岛国民党军乘坐军舰和飞机全部秘密撤往台湾。

5月16日,第三野战军获悉舟山群岛国民党军撤逃后,即令第21、第22、第23军发起进击。当夜,3个军在东起登步岛,西至册子岛的30余海里宽的海面上同时展开。17日,占领舟山本岛。18日,第21军占领普陀山、朱家尖,第22军占领岱山。19日,第22军占领长涂岛。但国民党军除少数零星人员外,均已先期撤逃。至此,舟山群岛全部解放。整个解放舟山群岛行动,前

后共 10 个月，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 8000 余人。21 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表示祝贺，并指出：舟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舟山群岛为基地，对华东实行封锁、轰炸骚扰的计划，为保卫海防安全创造了条件。

1950 年 6 月，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并以海军第 7 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省。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 9 兵团攻击台湾的任务随之解除。

第五节 解放青岛、长山列岛

一、解放青岛

淮海战役结束后，山东全省基本解放，仅青岛地区驻有国民党军第 11 绥靖区刘安琪所部第 32、第 50 军共 6 个师又 4 个独立旅（团）约 9 万人。为免遭被歼的命运，刘安琪按照其统帅部的指令，于 2 月初制定了撤离青岛的计划，决定于 2 月 20 日开始将部队全部撤往上海附近地区，并将撤退决定告知驻青岛的美军负责人白吉尔。白吉尔明确表示：“国军如不撤退，则美军决保留现状，不再作撤离之准备”，如共产党军队进攻时，“美军决不中途撤离青岛，必要时，且愿提供援助。”“今后青岛之军事价值，固决定于美军之去留，然更决定于国军之是否放弃而定，国民政府似不必珍惜此有限兵力，而过早放弃青岛”，“只要有美军一部留青岛，则共军必不敢来犯。”如解放军攻击青岛，美军可“由日本关岛、东京调集援军。”^① 据此，国民党军统帅部又决定先行撤退家属、搬运物资，军队暂时留驻青岛，情况紧急时再行撤退。4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青岛美军被迫离陆登舰，随时准备撤离中国。青岛国民党军见此情形，也急忙部署撤退。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6 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9 年版，第 177 页。

根据上述情况，山东军区于1949年4月25日请示中央军委并华东军区：为迫使青岛美军和国民党军迅速撤走，是否可对青岛国民党军发动威胁性进攻，以便能尽快进入青岛，防止国民党军破坏。28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第一步对国民党军若干据点试行攻击。得手后看情形再决定第二步行动。其目的是迫使国民党军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同时，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派1个军北调山东，参加攻青作战。据此，第三野战军决定第24军和炮兵一部北上山东参战。

山东军区于30日决定，以第32军和警备第4、第5旅等部共12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归山东军区第1副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在县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对青岛守军的威胁性进攻。其中，以第32军向即墨城西北、烟台至青岛公路以西和胶济铁路两侧国民党军主要防御地区攻击，以逐步压缩、分割包围战法逐渐向青岛市推进；以警备第4旅和警备第5旅1个团向即墨城以东至沿海一带国民党军各分散孤立据点进攻，使其无法向铁路沿线增援，保障第32军的侧翼安全，并积极向南发展，扫清青岛市区东北外围守军。

5月3日，警备第4旅首先向位于灵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第32军1个营发起攻击，守军不战而逃，被警4旅追歼于即墨城以南地区。4日，第32军围攻上疃守军，刘安琪即调集7个团的兵力增援，并向解放军发起反击，战至6日夜，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1200余人。10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令青岛守军撤往广州。刘安琪即令外围各部向青岛港口撤退。由于进行撤退准备和等待舰船，国民党军迟至25日才开始行动。山东军区获悉这一情况后，于26日组织部队发起全线进攻，很快占领马山、盟旺山、莲花山、四柱山等地。接着，乘胜分4路展开追击，攻占即墨城及附近据点27处，突破守军第1道防线。27日进占即墨城南之训虎山，歼守军1个营。这时，上海解放，美军军舰也撤离青岛海面。守军

见此已无心恋战，于6月2日登舰逃离青岛，解放军当即解放青岛。

在近1个月的作战中，山东军区部队共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迫使并争取第50军270师第810团、独立旅第1团、保2旅第6团等部投诚或起义。

二、攻占长山列岛^①

长山列岛位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中，散布在长100余公里的海面上，南北长70余公里，有南北长山岛、砣矶岛、大小黑山等17个岛屿组成，共有居民1.5万人，是山东与东北水路交通的必经之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和山东大陆全部解放后，国民党军长山巡防处、海军1个警卫营、陆战第2团率1个营、2个炮兵连，以及4艘运输舰、8艘炮艇，共1500余人驻守长山列岛，并积极加修工事。企图以此为基地，封锁渤海海峡，扼断华北、东北、山东之间的海上交通，袭扰沿海港口、城市。

根据上述情况，山东军区于1949年6月22日报告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便于海上交通，以巩固国防，建设海防，拟以第24军1个师带炮兵团和警备第5旅，采取偷袭或强攻战法，夺取长山列岛。27日，华东军区复电山东军区并报中央军委：夺取长山列岛之作战，由第24军派1个师，协同警4、警5旅攻取，较为稳妥。并应详细侦察岛屿地形及岛上守军布防、工事、航渡水情等情况；在攻击器材准备上，应特别强调船只的组织训练、部队的强渡训练；在作战指导上，一切应作强渡的组织准备，而在战术手段上则应尽量争取偷渡成功，不成功时则继之迅速勇猛的强攻。30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同意关于夺取长山列岛的作战意见，最主要的是详查敌情地形，认真准备强渡强攻的战术和技术，但不放弃争取偷渡。

^① 即庙岛列岛，当时一般文献均称长山列岛，故沿用。

遵照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的指示，山东军区立即组织部队进行渡海作战准备。针对部队存在的顾虑国民党军军舰，对渡海作战信心不足等思想，于7月19日发出《长山岛战役政治动员令》，指出了渡海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困难，要求全体指战员充分认清攻占长山岛的意义，在战斗中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坚决顽强，勇猛迅速的完成战斗任务，发扬各自为战的独胆英雄主义精神，把勇敢与技术结合起来，指挥与群众结合起来，争取战斗的全胜。同时，向指战员介绍渡海作战经验；进行渡海作战训练；侦察敌情；收集船只。

7月25日，山东军区确定了攻击部署：决定采取夜间接敌，实行强攻，以炮火掩护，逐岛攻击，稳步推进的战法。第一步，以第24军第72师附军炮兵团4个连首先攻占南长山岛，尔后再攻北长山岛；以警4旅2个营附第24军炮兵团2个连攻击大、小黑山岛和庙岛；以警5旅2个连攻击大小竹山岛。第二步，以警4旅攻取砣矶岛、猴矶岛、车由岛等岛。以特种兵纵队榴炮团和胶东军区炮兵团一部，在蓬莱阁、黑风台以北占领阵地，支援步兵作战。

8月11日晚，攻击长山岛战斗发起。17时第72师首先由刘家旺登船秘密起渡，至20时，警4、警5旅分别由栾家营、解宋营等地登船起航。12日1时15分至20分警4旅先后顺利登陆大、小黑山岛，警5旅占领大、小竹山岛。第72师因逆流航行，至12日2时才登上南长山岛，守军仓促应战，第72师迅速攻占各要点，至7时，全部占领南长山岛，守军除一部乘舰逃跑外，其余悉数就歼。当日下午北长山岛、庙岛守军撤退，解放军当即进占该两岛。至此，第一步作战结束，准备第二步作战。18日，砣矶岛、大小钦岛、南北隍城岛守军全部撤退。20日，警5旅进占上述各岛。此战，共歼国民党军1400余人。

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第三野战军解放了福建大陆及

其沿海大部岛屿和浙东、浙南地区，以及舟山群岛、长山列岛等地，歼国民党军 10 万余人。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大部分进行的是海岛进攻战役战斗，这些战役战斗，与陆地作战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一是参加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均是陆军，不熟悉海情、海战；二是没有海、空军支援配合，无制空、制海权，只能依靠以木帆船为主的落后的运载工具，而国民党军据守海岛实施环形防御，又有海、空军配合。通过这些战役战斗，取得了海岛进攻作战的经验。主要有：

第一，要进行认真周密的战役准备。特别是要以一次航渡能独立解决战斗的兵力为基本要求，准备足够的、包括后续梯队所需的船只，以保证第一梯队登陆突破后，后续梯队能及时跟进支援，随时准备打守军的增援和反扑；要全面侦察调查，包括预定作战地区沿海的地形，海域的气候、风向、潮汐规律，登陆岛屿守军及地形情况；要选择气候、风向、潮汐有利于航渡的时机发起攻击，选择便于船只出航的港口起渡，便于登陆、便于登陆后向纵深穿插分割包围守军的地段突破。

第二，要严密组织航渡。船只要依据大小、性能分别编组，每船应具有独立战斗的能力；必须组织起渡指挥所，加强对部队登船、起渡的组织指挥，加强航行途中的通信联络，保持船队队形的完整；第二梯队要派人随第一梯队登船，待第一梯队登陆后迅速组织船队返航，及时运送第二梯队；要组织必要的护航火力和对空火力，掩护部队登船、编队和航行中的安全。

第三，要确定适应海岛作战特点的战术。力争偷渡，准备强渡，偷渡与强渡相结合；要树立有进无退，哪里靠岸即在哪里登陆，边打边恢复建制，主动支援友邻等战术思想；各级领导要靠前指挥，特别是上一级领导要随第一梯队行动，及时处理各种意外情况，并迅速组织部队登陆突破，建立、扩大滩头阵地，接应后续梯队登陆，并有依托地向岛的纵深发展进攻，对守军实施穿插分割，力争在守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解决战斗。

第四章 攻克太原，解放绥远， 肃清华北国民党军残部

第一节 举行太原战役， 全歼阎锡山集团

一、阎锡山防守太原的部署和企图

1948年7月晋中战役后，阎锡山残部被压缩于太原孤城。阎锡山一面整饬战力，一面加修防御工事，企图凭坚恃险，负隅顽抗。

太原有人口40余万，位于晋中盆地的北部，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原又是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有钢铁厂、兵工厂等80余座，能制造山炮和多种常规武器。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大规模增修钢筋混凝土等各类碉堡，使太原成为国内少有的坚固设防的城市。其整个防御，由前进阵地、外围要塞阵地、城垣主阵地及核心阵地等四道阵地构成。每道阵地或环制高点，或依村落、集镇，或藉高大建筑物，构成众多坚固的据点。每个据点有众多的子母堡和屯兵所，以及堑壕、交通壕、小坑道、鹿砦、铁丝网、电网等，构成有绵密交叉火力，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在各据点之间相互机动兵力、火力支援的支撑点。守军由这样的点连成线，由线构成面，使整个太原形成一个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据国民党军统计，在北起周家山、关口，南至武宿、小店、西起石千峰，东达罕山的百里防

线内，“共筑有碉堡五千六百余座。控制太原周边全部交通要点，及瞰制地形。”^①此外，阎锡山还修建了环城铁路，以利兵力调动。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撤销原第7、第8兵团及第6、第8集团军司令部，成立第10、第15兵团，以地方团队补充正规军，充实基层战力；组建重机枪师、重迫炮师、飞雷团和冲锋枪团等，以强化火力。第10兵团以王靖国为司令，下辖第19军（辖第68、第277师）、第33军（辖第71、第280、第275师，其中第275师守大同）和第43军（辖第70、第276、第283师）；第15兵团以孙福麟为代司令，下辖第34军（辖第73、第279师）和第61军（辖第66、第69、第72师）。为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面受机宜，并以整编第30师4个团1.1万余人于7月16日至8月2日由西安空运太原（后改番号为第30军）。阎锡山遂以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直接指挥第30军（辖第27师、第30师之第89团）、第274师（即重机枪师）、第278师（即重迫击炮师）、独立第8、第9、第10总队、冲锋枪团、工兵第21团、飞雷团、榴弹炮兵营、列车作战队等。经过编补，阎锡山在太原的兵力计2个兵团6个军16个师共10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600余门。

与此同时，阎锡山制定了如下的防御计划：“（一）方针：为确保华北据点，控制工业区，培植独立与共匪作战之军事、政治力量，彻底击灭来犯之匪；并相机配合其他地区之国军，全面反攻，恢复政权。（二）指导要领：为实施战略守势，战术攻势起见，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期凭藉坚固工事，与炽盛火力，予匪以重大损害。尔后适时运用我机动部队，逐次歼灭局部匪军，以达攻势持久之目的。”（三）兵力部署：第10兵团“担任城东、城南地区。确保杨家堡、椿树园、马庄、淖马、牛驼寨、风[凤]阁梁之线。机动部队，分别控制于双塔寺，卧虎山附近。”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254页。

第15兵团“担任城西、城北地区。确保阳曲镇、栏岗、呼延村、化土头、白家庄（九院北侧）、南堰镇。机动部队分别控制于新城、东社镇附近。”由孙楚直接指挥之各部为总预备队，“在城垣附近，保持机动。”“（四）其他事项。①推行党、政、军一元化，进行总体战；并加强情报及肃谍工作。②实行平民经济：节约消费，提倡生产、增加粮源、以防匪围困；并对空军补给设施，尽力准备与维护。③工事构筑：须兼有骨干及面之配备，并在地下、地面、空中（指碉堡、城墙上、中、下之射孔）之立体设备。在东正面，应注意敌之攻坚，在西正面，应防匪之奇袭。④战斗上之注意：必须用伏枪、伏炮、实行节短势险之战法，增大匪之损害至最大限，减少自己损害至最小限，俾达火海制人海之目的。”①

为死守太原，阎锡山大力加强法西斯统治。8月23日，阎锡山发布《告全体同志书》，命令所属严守阵地，抱定奋斗到底之决心。为此，以梁化之为首的特种宪警指挥处，用特务手段加强控制；在军队实行“连坐法”，防止士兵逃跑和投降；将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的官兵编成“雪耻奋斗团”。阎锡山还为自己做了一口棺材放在门口，并为自己准备了毒药，表示“不成功则成仁”，欺骗部属为他卖命。

二、华北军区第1兵团攻击太原的部署

关于解放太原的方针、部署，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第1兵团首长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就已开始着手研究。鉴于阎锡山主力被歼，太原空虚，中央军委于1948年7月16日致电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要求乘胜夺取太原，并指出：“你们完成对太原之包围后，可派俘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要他迅即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对于全部阎军将领及其眷属，亦可保证不杀。如果可能，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254～第256页。

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①徐向前、周士第鉴于第1兵团在晋中战役中伤亡较大，战后各部队兵员极不充实，难以进行连续作战，遂于7月21日致电中央军委：“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完成下述工作：补充兵员（争取俘虏，我方伤员归队），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拟定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②23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周：“计划甚好。全军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据此，部队立即转入休整补充。

为举行太原战役，中央军委决定第1兵团组成前委，以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统一指挥该兵团第8纵队（辖第22、第23、第24旅）、第13纵队（辖第37、第38、第39旅）、第15纵队（辖第43、第44、第45旅），以及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辖独立第10、第12旅，并指挥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独立第7旅、第3纵队独立第3旅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2旅）。

由于徐向前因病在石家庄住院治疗，兵团前委其他领导人认真研究制定了攻取太原的作战方案，并于9月28日上报中央军委：“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战役。进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因东南地区易于展开兵力，“故主要突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21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761～第762页。

方向拟选于城东南，而以有力一部由东北突击河西、东山北、机场以北地区，以地方部队一部活动配合攻城方向。”在战术要求上，对攻城妨碍不大之据点尽量不打，力求连续攻击，分割包围，乘胜扩大战果，结合政治瓦解，歼灭守军。毛泽东将此作战方案批交徐向前征求意见。徐向前阅后于10月3日复信华北军区并告毛泽东，认为“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①

三、战役准备

为攻打太原，晋中战役后，第1兵团等部即开始了紧张的战役准备，主要工作有：

（一）补充整理部队

由于兵团于1948年5月刚成立，第15纵队也刚由地方武装升级组成，各级领导机构均不健全，部队兵员本来就不够充实，临汾、晋中战役中又有较大伤亡，使各部队兵员严重不足。全兵团1000人以上的团仅有2个，有的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3人，营级干部只剩1人。因此，在休整中加紧补充整理部队，争取改造俘虏、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及伤病员归队；提拔调整干部，健全各级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兵团后勤部；补充调整部队的武器装备，基本达到每连步枪90枝，轻机枪6挺；每营重机枪6挺；每团82迫击炮6门；每旅山炮4门，120重迫击炮6门。每纵队山炮4门，150重迫击炮4门。经过休整补充，至1948年9月底，第1兵团的兵力达7.79万人^②。加归其指挥的其他部队，参加太原战役的兵力计1个兵团、4个纵队、17个步兵旅，1个炮兵旅，共11.5万人。

（二）进行政治整训与军事练兵

在补充整理部队的基础上，针对太原城防坚固的特点和部队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217页。

^② 1948年10月14日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向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所作《九月份实力报告》。

的思想实际，各部队普遍开展形势教育和诉苦教育。通过发动战士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对比敌我双方人力、物力、民心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大家认识到：“敌是死水坑，我是长流水”，阎锡山虽凭坚恃险，不过是困兽犹斗。通过开展诉苦教育，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解放战士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他们揭破阎锡山的种种欺骗，纷纷表示“干解放军”，从而减少了逃亡，巩固了部队。与此同时，部队自8月下旬开始进行军事练兵，结合实际敌情、地形，学习训练攻防战术、爆破和土工作业。经过军事练兵，各纵队约有70%的人学会了爆破，广大指战员从训练中体验到钢筋水泥碉堡能被炸垮，土工作业能避免炮火杀伤，从而提高了打太原的胜利信心。

（三）进行粮弹等物资准备

休整期间，各级后勤部门尽量改善部队生活，恢复战士体力。各纵队均成立了医疗所、休养所和担架队。为攻打太原，华北军区调运弹药400万余公斤，其中，各种炮弹83.5万余发，各种子弹4825万发，手榴弹78.6万枚，黄色炸药41.3万余公斤，黑色炸药6.65万余公斤。部队需粮数很大，仅小米一项每日即需20万公斤。晋中军区支前司令部组织民工民兵向前线运送粮弹，确保了部队的各种需要，并为部队作战准备了大小檩条30万余根、门板32万余块、麻袋30万余条。

（四）侦察敌情

整训开始后，兵团划分了南、北、西3个侦察区，组织部队和各区的侦察部门及城工部、社会部、敌工部的全部力量，对太原进行全面侦察，基本掌握了守军的兵力部署、碉堡分布及地形等情况。东山柳沟村党支部书记赵炳玉，从阎军防区出来，向兵团首长汇报了有关通往牛驼寨秘密小道的情况。兵团即派人侦察，并将此道路确定为战役的突破口。后来，第7纵队就是由此袭占牛驼寨的。

（五）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在进行战役准备的同时，第1兵团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徐向前亲自找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阎锡山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叫他回去劝阎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但赵担心回去被杀。徐向前只好让他写信给阎锡山及其周围的高级将领。华北军区派副参谋长王世英等赴太原前线组成工作组，利用各种关系，试图与阎锡山谈判，以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经过动员，年近八旬的阎锡山的老师，表示为拯救太原黎民百姓免于战火，愿意进城去见阎锡山。然而，阎非但不听劝告，反而把老师给杀了。此后，华北第1兵团即将政治争取工作的重点放在下级官兵身上。

正当解放军进行战役准备之时，阎锡山以攻为守，向南出犯，太原战役因之提前发起。

四、太原外围地区作战

(一) 小店围歼战

受济南战役的震撼，阎锡山为破坏华北军区第1兵团的攻城准备并出外抢粮，从10月1日开始，以7个师分三路向南出犯：左路以第73、第279（原暂40）、第283（原暂49）师和独立第10总队沿同蒲路南下，10月3日进占武宿机场、马连（练）营以东以南地区；中路为暂44、第280（原暂45）师及第72师1个团，10月3日进至小店、南黑窑地区；右路以第69师在汾河以西策应，10月3日亦进至晋源县之庞家寨；其第66师进至小店以北地区，任预备队。

据此，第1兵团首长决心乘阎锡山以主力一部南犯之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将其消灭于坚固工事之外，为攻取太原城创造条件。为此，一面下达作战命令，一面将作战部署于10月3日20时上报中央军委：“我决心全歼该敌，部署如下：八纵、十三纵歼灭四四师、四五师；十三纵先以一个旅插入小店东北切断敌归路；七纵以一个旅自汾河西强渡，切断小店敌退路；八纵、十三纵得手后，再歼七三师、四十师；十五纵留一个旅监视东山之敌，主力歼灭四九师，得手后，插入武宿机场以北，切断敌退路，配合

主力歼灭武宿附近之敌；七纵主力歼灭六九师得手后，相机渡河向东、向北发展。”第7纵队独立第12旅及警2旅于城北“袭占阳曲镇以东之前后李家山，以炮火控制北机场。”“战役定十月五日五时发起。以上计划已在前委通过。”10月6日1时，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你们原定酉巧开始太原战役，现已提前十三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能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势攻城，提早解放太原。”^①

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7纵队东渡汾河，直插小店以北；第15纵队由东向西直插武宿机场以北；第8、第13纵队迅即将驻小店之暂44师及第72师1个团、驻南黑窑地区之第280师及驻南岸之第283师2个营包围。战至6日晨即全歼该部。之后，第1兵团首长决心按照预定计划乘胜扩张战果。6日20时，中央军委致电徐、周、陈：“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向前三日函称，连续一直打下去，在最快期间全歼敌人直至夺取城垣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是中策，旷日持久是下策。此项意见和我们今晨电意见相同。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然后看形势，如我军伤亡甚大，城内敌人尚多，城防尚固，则应略为休息补充，然后攻城。如我军伤亡不大，城内敌人不多，城防不甚坚固，则应乘胜攻城”。^②

小店围歼战后，第13纵队与第15纵队配合，于6日晚准备求歼位于武宿地区之第73、第279、第283师等部。但由于未能确实切断其退路，致使该部得以乘铁甲列车逃脱，仅歼灭第73师1个团及第283师一部。为挽回颓势，阎锡山从7日开始以第30军向南反扑，被第7纵队挫败，进至汾河以西的第69师见势不妙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0页。

亦不战而逃。第1兵团乘胜扩大战果，至13日先后攻占武宿机场，并扫清了大马村、北张及城东南石咀子等据点，以炮火控制了城南王村机场。与此同时，第7纵队独12旅及警2旅等部于5日晨对李家山、凤阁梁高地发起攻击，以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13日攻占凤阁梁，全歼守军。为堵住缺口，阎锡山又将第30军北调，在第68师等部的配合下，于14日夺回了凤阁梁、李家山高地。在以上作战中，第1兵团等部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

（二）攻取东山初期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连续作战的指示，徐向前于10日返回太原前线，遂即召开兵团前委会议，讨论部署下一步作战。会上，徐向前指出：“从太原的自然地理形势和敌人防御重点来看，进攻城区，首先必须攻破城东的群山防线，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点，也就是阎锡山的所谓‘第二道坚固防线’。”历史上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日本侵略者攻打太原，都是先占东山主峰尔后向西攻破城垣的。“阎锡山自己有个比喻，叫做‘太原形势象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是五脏’，那么，攻下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就等于割断了他的咽喉，整个东山就会被我控制，既可以奠定攻取太原的基础，又可以打通后方人民群众支援我军作战的道路，‘土皇帝’就变成‘瓮中鳖’了。”“目前，我军刚刚在城南、城北发起了猛攻，敌人正集中力量在这两处顽抗，我们要乘敌不备，采取突然袭击，坚决夺取牛驼寨，进而一举拿下四大要点。”^①会议结合严冬将临，天寒地冻，不便做工事等情况，决定乘机控制东山，创造攻城之基本条件。

太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30公里，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坐落在东山西麓的顶端，是东山防线的主要阵地，其主峰罗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219～第220页。

俯瞰整个市区，整个山区经由孟家井的公路与太原城相连。阎锡山在东山防线内筑有各类碉堡 3000 余座，并吹嘘其四大要塞“足抵精兵十万”。为攻取东山，第 1 兵团于 10 月 13 日作了如下部署：第 7 纵队全部并指挥晋中军区第 1 军分区 1 个团及 1 个支队，由太原东北榆林坪一线楔入东山纵深，袭取牛驼寨，以炮火控制新城机场，以另一部袭占大北尖，与南面第 15 纵队连接，切断罕山、孟家井守军退路并歼灭之；第 15 纵队由石咀子向淖马攻击，并以一部向大窑头方向攻击，与第 7 纵队一起切断罕山、孟家井阎军退路；第 13 纵队并指挥晋中军区第 2、第 3 军分区部队夺取南坪头、马庄后向双塔寺攻击，得手后向城东南角攻击；晋中军区部队除以一部在汾河西积极活动外，主力位于太原以南，对各据点作牵制性攻击。

10 月 15 日，进攻东山战斗开始。17 日，第 7 纵队主力在柳沟村地下党支部书记赵炳玉带领下，从秘密小道楔入牛驼寨，歼灭第 276 师 1 个团，攻占牛驼寨 8 个阵地，另一部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尖等据点，并以炮火再次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 15 纵 17 日攻占南坪头、千家坟及石咀子全部阵地，18 日攻占石儿梁、道巴沟等地，与第 7 纵队南插之部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守军除“雪耻奋斗”4 个团先期逃回太原外，“雪耻奋斗”第 108 团及保安第 14 团一部被包围于孟家井以东之罕山、张家河地区。10 月 21 日，该部在第 108 团团团长李佩膺率领下投降。至此，东山为解放军大部占领。与此同时，第 13 纵队进攻马庄受阻。晋中军区部队攻占了太原以南的南坞城、南堰。

为夺回牛驼寨，阎锡山从 18 日开始组织部队反扑，连续 10 余次进攻均被击退。21 日，第 30 军及独立第 10 总队，在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牛驼寨。第 7 纵队一部在给阎军重大杀伤后，于当日 13 时弃守牛驼寨。

（三）四大要点争夺战

东山战斗后，阎锡山全力固守四大要点，并以第 30 军及第

279 师等部专任反扑。组织城东一线各炮兵群，集中火力支援。为夺取四大要点，扫清攻城道路，第 1 兵团于 10 月 23 日调整部署如下：第 7 纵队附重炮 30 门攻取牛驼寨，第 8 纵队攻取小窑头，第 15 纵队附重炮 19 门攻取淖马，第 13 纵队附重炮 13 门攻取山头。

10 月 26 日 16 时，争夺四大要点战斗开始。双方均以主力投入战斗。阎锡山部除守备城西山之 3 个师、城南城北 2 个师外，其余部队均投入战斗；第 1 兵团先后投入作战兵力达 27 个半团（仅有 4 个团未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 800 余门。战斗之激烈，为太原战役所空前。

第 15 纵队攻占淖马。淖马距太原城 2 公里多，有淖马主阵地及 1 至 9 号阵地共 10 余个阵地组成，其中以主阵地及 7 号阵地（即炮碉）最为坚固，主阵地修在山顶，四周有 5 层劈坡。守军为第 30 军和独立第 8 总队各一部。26 日 16 时，第 15 纵队以第 43 旅第 128 团全部及第 129 团 2 个营向主阵地攻击，同时以第 44 旅一部及第 129 团 1 个营向主阵地左右两侧攻击，保证主攻部队的侧翼安全，并以第 127 团为预备队。守军在“执法队”威逼下拼命顽抗，第 15 纵队进攻受阻。午夜，攻击部队以爆破手段冲上第 1 层劈坡，但又与守军相持在第 2、第 3 层劈坡之间。拂晓前，第 129 团警卫班以连续爆破突入主阵地，后续部队随乘势发展，于 27 日晨攻占主阵地，后以第 127 团一部坚守该阵地。27、28 日，阎军以第 279 师 1 个团和独立第 8 总队大部共 4000 余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连续反扑 19 次，均被第 127 团击退。31 日至 11 月 1 日，第 44 旅乘胜攻占主阵地以西的 6 个阵地。11 月 10 日，第 127 团又在炮火掩护下以连续爆破、连续突击手段，激战 5 小时攻克炮碉。次日，阎军竟日反扑，均未得逞。当夜，阎锡山以独立第 8 总队司令赵瑞率部作最后反扑。赵则在政治争取之下率 500 余人起义。至此，淖马阵地全部为第 15 纵队占领。

第 7 纵队攻占牛驼寨。牛驼寨位于城东北 5 公里处，可屯兵

5000人，由3个集团阵地构成环形防御，10个主碉为3个集团阵地的支撑点，10号碉（即炮碉）位于阵地的中心和最高点，有11层劈坡，炮碉正北有8、9号碉，西面至南面有1、2、3号碉，正北偏东有5、6、7号碉，东南有4号指挥碉（因与一庙相连，又称庙碉）。守军为独立第10总队主力和第68师。10月26、27日，第7纵队两度进攻失利，遂以独3旅强攻5、6、7号碉，以独12旅袭击10号碉。31日，独3旅迅即攻占7号碉，独12旅以连续爆破顺利攻占3、8、10号碉，逼迫2号碉守军投降，9号碉守军逃窜，接着又攻占了1号碉。11月1日，庙碉守军在“执法队”的威逼下进行了5次反扑，并使用毒气弹，均被独12旅击退。但此时独12旅被5、6号碉守军切断退路，正面又受到猛攻，处境危急。为改变独12旅多面受攻的形势，纵队以警2旅接替独3旅续攻5、6号碉。警2旅经过20个小时激战，始于11月2日攻占5、6号碉。守军千余人麇集庙碉，依托有利地形拼命固守。11月12日，独7旅接替独12旅续攻4号碉。经过9次爆破5次攻击，才于次日占领4号碉。至此，经过10余次激烈的反复争夺，第7纵队终于攻占了牛驼寨。

第13纵队攻占山头。山头位于城东南5公里处，其阵地由主阵地及其以东的大脑山阵地组成，两阵地之间有交通壕连接。主阵地又有1~5号骨干阵地组成，周围有劈坡2~6层，每层高4~6米。守军为独立第9总队全部、第73师1个团、第276师和独立第8总队各1个营。10月26日，第13纵队首先以第38旅发起攻击，至28日该旅连续攻占大脑山3个阵地，接着向主阵地发起进攻。由于将主阵地误认为是次要阵地，因此在31日的进攻中只使用了1个团，致使两次进攻均未奏效。11月1日，第38旅集中2个团攻击山头主阵地再度受挫，此后遂将进攻兵力逐次增加为3个团。此时，兵团正策动黄樵松起义，第38旅奉命停止进攻。在第1兵团猛攻之下，蒋介石担心太原不保，又将整编第10师之第83旅（后改番号为第83师）4500人于11月初由榆林空运太原。

阎锡山遂用该部接替原山头守军的防务。11月9日，黄樵松起义失败后，第38旅3个团对主阵地发起总攻，第112、第114团两次进攻均未得手，仅第113团于当日攻占5号阵地，次日凌晨袭占3号阵地。但在守军第83师的反扑下，3号阵地得而复失，总攻失利。纵队遂以第37旅接替第38旅继续攻击。第37旅第110团出其不意，于当日晚袭占3号阵地，11日2时又经2、3阵地之间的暗道突然袭占2号阵地。1、4号阵地守军在猛攻之下纷纷逃窜。至此，山头主阵地被攻克。

第8纵队攻占小窑头。小窑头位于太原城小东门正东4公里处，阵地建在山岭上，由1~15号阵地组成，其中11~15号阵地位于最高处的支撑点，各阵地均有3~10米劈坡，劈坡上沿和各死角筑有水泥碉堡，整个阵地交错连环。守军为第279师1个团，独立第10总队1个连及保安第6团一部。10月26日，第8纵队以第24旅附第22旅第64团对小窑头发起攻击。至27日下午，全部占领1~6号阵地，28日上午又占领8、13、14、15号阵地。28日中午，阎锡山以第30军2个团及第279师1个团在剪子湾、淳马、双塔寺、黄家坟、东城门等处炮兵群的支援下，发动大规模反扑，并施放毒气弹、燃烧弹。第24旅被迫放弃8、11、13、14、15号阵地。29、30日，第24、第22旅各1个团再次发起攻击，至31日夺回8、15、14号阵地。31日，纵队调第23旅第68团第3营担任夺取13、11号阵地的任务。当日16时30分，该营在炮火掩护下以连续爆破突入13号阵地，全歼守军2个连。11号阵地守军乘隙逃跑。至此，小窑头一线阵地被全部占领。11月9日，第72团一部乘势攻占小窑头北侧的四亩圪洞，俘守军300余人。

争夺四大要点的战斗异常激烈。战后，各主要阵地上焦土1米，草木摧折，手榴弹木柄敷地一层，守军遗尸遍野，战况之惨烈程度，可见一斑。在攻打四大要点的同时，晋中军区部队为配合主力作战，先后攻占了城北的青龙镇、北留、黄塞、周家山、会沟梁，城南之许坛，汾河西岸之南北堰、赵家山等据点。

第1兵团在坚持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其中，为争取黄樵松率部起义做了大量工作。黄樵松时任太原守军第30军军长，原西北军杨虎诚部下。第30军空运太原后，第1兵团即把从平汉战役中起义的原西北军将领高树勋调到太原前线，专做争取黄的工作。高写信给黄，晓以大义，劝其率部起义。黄经过反复考虑，决心弃暗投明，并准备于争夺四大要点战斗开始后举行起义。10月31日，黄派其谍报队长王正中（又名王震宇）和谍报员王玉甲出城与第8纵队接洽，表示愿意交出该部防守的东、北两城门，接应解放军入城。11月3日，王正中、王玉甲第二次来到第8纵队司令部，要求解放军方面派代表进城，与黄共商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兵团经过研究，决定派第8纵队参谋处长晋夫和侦察参谋许翟友，于4日晨随同进城联络，以便里应外合，夺取太原。兵团前委同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4日复电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一）同意你们支辰电所提意见，望按情机断处理。（二）迅速整理部队以便协同动作。”此时，太原城内的情况发生逆转。11月3日，黄将起义计划告诉其第27师师长戴炳南，并叫他向各团长传达，戴却转面向阎锡山告密。当晚，黄樵松被捕。次日晨，王正中、晋夫一行刚进入第30军防地亦即被捕。7日，黄樵松、晋夫、翟许友、王正中、王玉甲被押往南京。黄樵松、晋夫、王震宇被处死刑，英勇就义于雨花台，王玉甲被判无罪，许翟友被“另案处理”。阎锡山以戴炳南告密有功，升其为第30军军长。黄樵松起义虽未成功，但在守军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外围作战中，共有守军5400余人起义或投诚。

五、围城休整

华北军区第1兵团，自10月5日太原战役开始至11月中旬攻克四大要点，共减员2万余人，有的部队元气大伤，急需休整补充，再加上国民党军第83师增援太原，阎锡山趁第1兵团主力在东山鏖战之机，在汾河西之红沟、圪了沟、万柏林、三角村、城

北炼铁厂附近抢修了5个新机场，其外援通道一时难以切断，迅速攻克太原已不可能。据此，兵团首长于11月8日致电中央军委：“为争取早日打下太原，避免旷日持久，增大消耗，特提议在可能条件下增加两个纵队的兵力，以免牛抵角，从敌人弱点上突破，便利防线配合东山主力，迅速解决战斗。”中央军委曾考虑以华北军区第2兵团之第3、第4纵队及第8纵队第24旅参加太原战役，但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从全局出发，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致电徐向前、周士第：“估计到攻克太原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①次日，徐周复电中央军委：“（一）经前委讨论完全同意军委十六日五时电示。（二）我们执行的部署如下：以巩固东山之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要点继续向前推进，再打下数要点，以利有力围困敌人与展开政治攻势。另以晋中军区三个分区部队攻占河西重要阵地，以炮火确实控制机场，我东山部队即准备在东山过冬，加做窑洞并开井修路、运粮克服困难。”19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据此，部队即转入围城休整。

（一）军事围困

四大要点争夺战后，太原战役的方针即转为对守军实施围困瓦解。根据兵团部署，城东的第8、第13、第15纵队于11月下旬先后攻占松庄、淖马9号碉、松树坡等据点。第7纵队于城北攻占苏村、板柏、关口、阳曲镇、兰村等据点，逼迫凤阁梁、李家山守军撤退。城西的晋中军区部队攻占化七头、红沙梁部分阵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8页。

地。为配合晋中军区部队掩护炮兵进入有利阵地，封锁河西诸机场。第13纵队主力于12月1日渡汾河西进，4~5日攻占赵家山、高家河等阵地，使兵团炮兵进入高家河阵地。至此，除红沟机场无法控制外，其他机场已被完全封锁。20日，第13纵队返回河东。阎锡山为确保空中运输，于12月19日至22日以第69、第83师等部，在8辆坦克、2辆装甲车的配合下，对晋中军区部队反扑40余次。晋中军区部队歼其2500余人，击毁坦克2辆。12月26日，第13纵队第37旅再次西渡，夺回西邱沟阵地，保障了炮兵阵地的安全。此后，各部队即对太原守军实行严密的封锁和监视，并以小部队不断袭扰。另外，在前沿的部队中，开展冷枪运动、神枪手运动，不断零星射杀守军。

（二）政治瓦解

从12月底开始，围攻太原的主力部队转入整训，同时对守军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11月12日，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由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第1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负责，专司政治攻心战的组织指导工作。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指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从干部到战士，人人动手，个个开口，从而使政治攻心战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黄樵松事件”后，阎锡山对内部更严加控制，造谣诬蔑“共产党有二十四刑，三十六杀”，“白天不杀黑夜杀，现在不杀将来杀”，欺骗士兵为他誓死卖命。兵团则有针对性地展开工作，共印发各类宣传品40多种50万余份，除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揭破谣言之外，还根据守军的具体情况，写出许多快板式的宣传品。如《逃跑回家分土地》，介绍宣传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晋中各县，土地平分，阎匪官兵，家中照分，男女老少，每人一份，快逃回家，参加平分。”对幻想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官兵则指出：“阎匪快要完蛋，妄想多活几天，又吹美国出兵，又吹世界大战，欺骗你们官兵，替他苟延残喘，当今天下大势，民主力量占先，苏联东欧中国，力量强大无边，帝国主义势力，正

如日落西天，美国纸糊老虎，其实外强中干，本身困难重重，不敢发动大战，蒋贼要求出兵，不敢冒此大险，阎匪信口雌黄，尽是无稽之谈，天下大势如此，再要糊涂完蛋。”对第30军官兵则指出：“胡宗南，恐慌在西安。蒋介石，准备逃台湾。太原城，很快被攻占。三十军，你们怎么办？”对阎锡山逃离太原后则指出：“阎匪固守太原，自知没有几天，老婆孩子黄金，先后搬到台湾，他们决心逃跑，你们做何打算？”这些宣传品在守军内部起了很大作用，不少守军士兵都能背过3首以上，从而粉碎了阎锡山对部下官兵“关前途，断退路”的阴谋，特别是不断释放“雪耻奋斗”团官兵后，消除了守军对二次被俘必杀的顾虑。通过散发传单、战场喊话、动员守军亲属规劝等活动，使大批守军纷纷弃暗投明。至1949年3月底，共瓦解守军1.2万余人。

（三）战场练兵

针对部队在四大要点争夺战中暴露出的侦察不够周密、步炮协同不密切、连续攻击动作不够快、不善于插入守军纵深和切断守军退路及包围迂回等弱点，兵团提出了10个战术原则：充分准备，精心计划；进攻防御，都要精通；军事民主，命令服从；主要方面，力量集中；隐蔽突然，敏捷机动；坚决顽强，果敢勇猛；发挥爆破，步炮协同；插入切断，连续进攻；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全歼敌人，建立战功。据此，各部队对照检查，总结经验，然后有针对性地展开军事练兵。在战术方面，中高级干部主要是在周密侦察的基础上，结合沙盘讨论研究作战方案；部队主要训练连排战术，进行外壕战、登城战、巷战及各种想定训练。在技术方面，连队除80%的人学会爆破外，着重训练外壕爆破和城墙爆破，炮兵训练间接射击。此外，部队还结合战斗任务，以各种形式进行阵地练兵，或以守军阵地为目标演习进攻战斗，或以守军碉堡的枪眼为目标练习射击，并结合冷枪运动、神枪手运动，使学与用充分统一，一举两得。经过100多天的军事练兵，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收效很大。

休整期间，部队政治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鼓舞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使其认清形势，克服贪图享乐等各种错误思想，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确保在太原战役中党的城市政策和各项纪律的严格执行，在部队普遍进行了一次纪律教育与大检查，使广大指战员树立了明确的政策纪律观念。此外，部队还补充了兵员，整理了党支部，大力发展党员，开始试办士兵委员会，使每纵队人数均在2万人以上，党员占1/3以上，部队的三大民主运动得到更好地开展。1949年1、2月间，部队奉命实行整编，第1兵团改称第18兵团，徐向前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该兵团第8、第13、第15纵队依次改称第60、第61、第62军，华北炮兵第1旅改称炮兵第3师，第7纵队改称第7军。总之，经过围城休整部队整编，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并充分做好了最后攻克太原的各种准备。

六、总攻太原

平津战役后，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剩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地及绥远的董其武部。而董其武部正酝酿起义，太原孤立无援。北平解放后，中央军委决调第19、第20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1师西进，与第18兵团等部一起会攻太原。1949年3月上、中旬，第19兵团及第四野战军炮兵第1师经石家庄、娘子关，第20兵团经大同附近分头开进，月底先后到达太原城下。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率第63、第64、第65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天焕，率第66、第67、第68军。这样，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兵力达到3个兵团、10个军、36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2个炮兵师，共32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1150余门。

为统一指挥并协调各部行动，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18、第19、第20兵团，

以第 18 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成立太原战役总前委，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 8 人组成，以徐为书记，罗为第一副书记，周为第二副书记，第 18、第 19、第 20 兵团的前委均受其领导。30 日，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同意第 18 兵团政治部兼太原前线政治部。4 月 2 日，中央军委又批准以徐、罗、周、陈、胡 5 人组成总前委常委，并批准太原市委书记赖若愚参加总前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德怀，在西返途中于 3 月 28 日来到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当时正在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同指挥太原战役。

这时，阎锡山见大势已去，遂将太原守军交由孙楚、王靖国指挥，自己于 1949 年 3 月 29 日乘飞机逃跑。为负隅顽抗，孙楚、王靖国等将独立第 8、第 9、第 10 总队残部，保安团、民卫军等编入正规军，强抓市民、学生组成“铁血师”、“神勇师”、“坚贞师”，使太原守军仍保持近 10 万人，拥有各种火炮 900 门，并以韩步洲指挥之第 33 军防守城北，以温怀光指挥之第 19 军防守城东北，以刘效曾指挥之第 43 军防守城东南，以高倬之指挥之第 34 军防守城南，以赵恭指挥之第 61 军（并指挥“坚贞师”）防守城西，以戴炳南指挥之第 30 军及第 83 师位于城内及城垣附近，任机动部队，以“神勇师”、“铁血师”守备城垣，以所有炮兵组成 10 个炮兵群，分置双塔寺、大东门、黄家坟等处，企图以外围部队节节抵抗，消耗解放军，然后在城郊诸要塞与解放军决战。

根据守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太原战役总前委确定的战役指导方针是：首先集中主力，“割裂太原外围之敌，争取歼灭其一部、大部或全部，占领攻城有利阵地，尔后集中全力攻城。”^① 3 月 30 日，总前委将太原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歼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

^① 1949 年 3 月 31 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陈漫远发布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命令》。

城”。其具体部署：第20兵团及第7军1个师（第19师）由城东北及西北突破，“切断北机场以北之敌而歼灭之”。第19兵团及晋中军区3个旅一路由城西南汾河以西攻击，配合第20兵团“切断河西之敌而歼灭之”，另一路向城西南汾河以东攻击，在第18兵团1个师的配合下，“切断双塔寺与大营盘以南之敌而歼灭之。”第18兵团及第7军主力于城东，“第一步暂不攻击，而以佯动配合南、北、西等区作战，待以上地区攻击得手和被切断之敌基本被消灭时，即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由城东大东门方向，十九兵团由城南首义门方向，二十兵团由城北工厂区三面攻城，晋中部队留河西配合攻城。攻击时间定于四月十五日开始，争取半个月攻下太原城，但仍作一个月之作战准备。以上方案彭总已同意。”^①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周、罗：“（一）同意寅陷电所述太原作战方案。（二）同时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②

此时，国共“和谈”已经开始。4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放，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等语。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进行情形望告。”^③据此，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定派被解放过来的原阎锡山第7集团军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高斌和第33军参谋长曹近谦进城试谈。临行前彭德怀同他们谈话，要他们告诉守军解放军的攻城力量和决心，寄希望美援和坚固工事是靠不住的，如愿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采取长春或北平方式都可以。8日，赵承绶等进入赵恭第61

^①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3月30日致中央军委、华北局及华北军区的电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26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30页。

军防区，与赵恭派来的杜坤就彭德怀的谈话内容谈了1个多小时，并将解放军的信件交杜转达孙楚、王靖国，要求孙、王务于10日12时前作复。11日，中央军委又根据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字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① 根据太原前线的形势，徐、周、罗14日致电军委：“（一）自赵承绶、曹近合〔谦〕与赵恭所派之杜某会面后，敌方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方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现据内线关系出来谈，敌方宣传北平国共和谈已得协议，汉口、京沪国共双方共管，太原敌军由孙楚率领开西安（由我让出一条路）。西北实业公司则有准备交代之说。又今日敌太原广播，其社论仍宣传其坚强意志，奋斗到底之方针，近日调整其部队，加强战备中。（二）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仓库区敌仍固守阵地（城东）。我军作成六条坑道，其中有一条已为敌挖通破坏，估计敌可能发觉，现我正在设法防范。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乘胜攻城，把握是较大的。（三）太原之敌，在我围歼外围敌几个师以后，则可能容易就范。如十六日南京谈判无大结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时间如何？”17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周、罗：“卯寒电悉。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② 据此，太原前线司令部将总攻太原的时间确定为4月20日。

20日，总攻太原开始。解放军十几路部队先后突破守军前沿，继以猛烈向纵深发展，守军城外防御体系顿时土崩瓦解。

在城北，解放军第20兵团及第7军2个师于20日2时分3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35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82～第483页。

路向南攻击。第 68 军及第 7 军第 19 师由城西之兰村沿汾河两岸直插新城、新店、芮城及芮城以东之汾河大桥；第 66 军沿同蒲路南下，先后占领皇后院、七府坟等地；第 67 军及第 7 军第 20 师由城东北之西岭向西攻击，占领丈子头、牛驼寨等地。当日夜即肃清了城北十里铺以北之守军。21 日，3 路部队又攻占城北工厂区及享堂村左右地区。

在城南，第 19 兵团及晋中军区 3 个独立旅亦分 3 路于 20 日 5 时发起攻击。第 64 军及晋中军区部队沿汾河西岸向北突击，攻占大小王村，并迅速进至万柏村地区，与第 7 军第 19 师会合，接着包围歼灭了汾河以西守军，击毙第 61 军军长张恭；第 65 军沿汾河东岸向北攻击，先后攻占杨家堡、老军营、西寇村、大营盘，直逼大小南关；第 63 军及第 62 军第 186 师在城东南肃清了双塔寺以南以东之守军，21 日占领面粉公司、民众市场等地。

在城东，第 18 兵团和第 7 军主力于 20 日下午发起攻击，首先以炮火轰击太原绥靖公署并压制大东门等地守军炮火，18 时部队展开攻击，先后攻占剪子湾、大把沟、郝家沟、黑土港、大东关等地。

至 21 日 18 时，太原周围除双塔寺、黄家坟两点外，其余守军被全部肃清。22 日，第 67 军与第 7 军 20 师攻克黄家坟（卧虎山），第 63 军攻克双塔寺。至此，太原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守军 12 个师。

为减轻对太原市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于 22 日对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守军拒不投降。24 日，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通令缉拿孙楚、王靖国、梁化之、戴炳南等战犯。

24 日 5 时 30 分，攻城部队 1300 余门大炮向太原发起轰击。随后，第 18 兵团及第 7 军主力由城东之大东门、第 19 兵团由城南之首义门、第 20 兵团由城北偏西方向开始攻城。各部队或以连续爆破炸开城墙或城门，或使用云梯登城。至 7 时 40 分，解放军 12 路部队从四面八方攻入太原城。接着，各路部队向守军纵深猛

插，9时将残余守军包围在市中心、太原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一带。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守军纷纷缴械投降。至10时攻克太原，守军无一漏网。除梁化之畏罪自杀外，孙楚、王靖国、戴炳南等先后被俘。至此，太原战役胜利结束。

太原战役期间，华北、晋绥解放区人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直接在前线服务的民工就有17万余人，他们运送弹药等3000万余公斤，粮食、燃料4亿公斤，修补道路600余公里，拿出门板50万副，檩条34万根，麻袋55万条。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确保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开始，至1949年4月24日止，历时6个多月。解放军共歼灭1个绥靖公署，2个兵团部、6个军部、17个师及地方武装共13.5万余人，其中毙伤3.3万余人，生俘9.7万余人，投降5300余人。缴获各种炮6283门，各种机枪6943挺，长短枪3.7784万枝，各种子弹236.5万发，各种炮弹5.4386万发，手榴弹20.5万枚，坦克9辆（以上数不包括军需仓库库存），骡马千匹。解放军伤亡3.2万余人。^①

太原的解放，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血腥统治，使人民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经济恢复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均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拒绝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应有的惩罚，对此后解放大同等地亦有直接作用。

太原战役，是典型的大城市攻坚战。解放军以较小代价全歼太原守军，在战役指挥方面的主要经验是：第一，制定了正确的战役指导方针。在战役初期，解放军采取了围困、瓦解和攻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在围城期间，解放军又采取了围困、瓦解的作战方针。经过太原外围作战和围城斗争，解放军逐批消灭了守军的有生力量，攻占了战役战术要点，瓦解了守军士气，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总攻太原时，解放军在力量对比上占绝对

^① 根据《解放军第18兵团军史战史资料》之《太原战役我伤亡消耗统计》。

优势的情况下，采取了首先分割包围外围守军，争取歼灭其大部或全部，占领攻城阵地，尔后一举攻城的战役指导方针，从而使守军猝不及防，其防线顷刻间崩溃。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正确的。第二，周密部署。根据太原的地理特点和守军的兵力部署，第1兵团首先攻占东山四大要点，扫除攻城的主要障碍，同时控制飞机场，断绝守军的空中外援和逃路，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总攻太原阶段，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火力，四面围攻，多路突破，连续突击，从而一举攻克太原。第三，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守军。太原战役期间，解放军采取各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瓦解工作，使大批守军纷纷弃暗投明，从而加快了战役胜利的进程。

七、和平解放大同

大同地处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汇点，是晋北的军事重镇，一直为阎锡山部据守。1948年5月雁北13县解放后，大同成了一座孤城。守军主要为：田尚志的第275师（原暂编第38师），附1个炮兵营和辎重营；大同军事指挥部的直属工兵连、特务连、骑兵连、雁北支队、坦克车队（12辆坦克）、汽车队（30多辆汽车）；保安司令部的保安1、2、19、20团，宪兵第22团，武警大队、教导总队和几个县大队等，总兵力约1.7万人，统归大同军事指挥官于镇河指挥。国民党大同行署主任孟祥祉则握有该市的党务和行政权。

1948年12月下旬张家口解放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东进，参加解放平、津的作战。为防止大同守军撤退绥远，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3日决定，由第3兵团政治委员李井泉统一指挥晋绥军区第8纵队、北岳军区部队和冀察军区部队，监视大同、归绥（呼和浩特）之国民党军。根据部署，第8纵队主力位于大同以北之集宁、丰镇地区，北岳军区部队位于大同以东之周士庄地区，并以1个团位于大同以西之云冈。1月5日，各部到达以上位置。

守军为逼退解放军并出外抢粮，于1月13日由田尚志率所部3个团向城东进攻，但被解放军歼灭600余人后逃回城内。遭此打击后，守军不敢再轻举妄动。解放军则在监视的同时，对守军展开政治攻势。在争取和瓦解之下，守军小股和零星投诚者日益增多。

1月下旬，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此时在太原前线）派遣被解放过来的国民党第33军军长沈瑞、隰县专员孙海丞及于镇河旧部秦炯、李又唐等，赴大同前线做于镇河等工作。2月间，秦、李二人携带华北军区的信件潜入大同面陈于镇河。阎锡山得知后电令于镇河、孟祥祉，如沈瑞、孙海丞等进城，立即拿获枪决，并将李又唐押解太原。于镇河遂一面为李又唐开脱，一面叫秦、李二人转告沈瑞和孙海丞不要进城。此事说明，于镇河既不敢违抗阎锡山的命令，又不敢得罪共产党。3月间，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征得华北军区同意，动员正在北平上学的于镇河的儿子于澜沧、孟祥祉的弟弟孟祥祚以及于、孟旧部王达三、刘仪亭等7人，携带他的信去大同做于、孟的工作。但此时解放军晋绥第8纵队已北返绥远作战，解放军围城部队仅剩察哈尔军区（1949年1月由北岳军区与冀热察军区合并成立）地方部队6000余人，守军遂对和平解放大同持应付态度。

4月下旬，太原战役进入攻城阶段。大同守军自知顽抗无望，即撤退外围据点，企图分路西逃。为此，解放军第8军（由第8纵队改称）第22师于25日赶至新堂西南榆树林、毫切一线，绥蒙军区和察哈尔军区的其他部队也做好了应战准备。25日晚，守军从南门出逃。当其先头部队到达十里河时，与察哈尔军区骑兵师第1团遭遇。守军惧歼又返回城内。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不成的情况下，守军被迫同意与解放军谈判。经过4月26、27日两次初谈，29日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等到大同城东西坟村，与察哈尔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等举行正式谈判。经过谈判，守军接受了解放军关于放下武器，听

候改编，保证一切物资、仓库、案卷、图表不受破坏，不得转移匿藏，照数移交等条件。5月1日，于镇河率部1万余人缴械，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解放军进入城内，大同宣告解放。至此，山西全境获得解放。

第二节 安新战役

安阳、新乡位于平汉路中段，是豫北的两座重镇，人口均在10万左右。驻守安阳的国民党军为“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及其所辖之保安旅、河南反共自卫军第4路军第9纵队和第40军之第337师，共1.4万余人。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为第40军军部及所辖第106、第264师近2万人。

平津战役后，安阳、新乡成为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除太原、绥远之外的2个孤立据点，并分别被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和第70军监视和包围。1月29日，陈毅、邓小平、李先念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是否可“以陈谢四、九两纵主力进占新乡”。同时指出，这样做的“缺点是妨碍四、九两纵的渡江准备。”31日，中央军委复电陈、邓、李：“新乡、安阳敌人仍照原议将来由东北部队在南下途中附带扫清”，中野部队以“准备南下为好”。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决定由平津地区南下中南途中，以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42、第47军及第38军炮兵团，会同华北军区第70军等部共13万人，发起安新战役，并先由第42军围歼安阳守军，再由跟进的第47军会同第70军攻打新乡。

一、攻克安阳

安阳的防御工事，经过侵华日军的8年经营和国民党军的不断加修，较为坚固。土砖结构的城墙高8米，建有两层射击孔，其4角和主要城门上筑有钢筋混凝土碉堡，可形成交叉火力。城墙之外挖有外壕，宽3.3米，深3.6米。外壕之外有两道护城河，河宽8~10米，深5~7米。外壕与护城河里岸建有200余座暗堡，

并通过地道与城内相通。城外1~2公里纵深内，利用村庄、工厂、寺庙及河流等建立了50余个外围据点，据点之间以露天交通壕连贯，壕内又建有暗堡。整个防御体系完整而复杂。

第42军受领任务后，于1949年4月1日由河北涿州地区出发，15日到达磁县、成安一线。根据初步侦察的情况，第42军决心于16日黄昏前由磁县及临漳、成安地区出发，以奔袭动作，于17日7时前完成对安阳守军的包围，如守军迅速退入城内则紧缩包围，准备攻城，如守军逃窜则追歼之。这一计划得到批准。

16日15时，第42军第155、第124师由磁县出发，直扑安阳西南、西北，第125、第126师由成安县出发直插安阳东南、东北，至17日将安阳守军包围，并抢占外围据点17处，歼灭守军1000余人。18日，各师转入肃清外围作战。在四面攻击、各个击破、逐步压缩、逼近城垣、为攻城作战扫清障碍的方针下，至22日肃清除四关之外的全部外围据点。后经3天准备，于27日攻占四关，肃清全部外围据点，逼近护城河。

从28日开始，第42军转入攻城准备：第一，周密侦察守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及地形，确定大、小西门为攻城的突破口；第二，进行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掘交通壕、爆破坑道、防弹洞、弹药室、救护室及炮兵阵地等；第三，拟定步炮协同的作战计划，并对担任突击、爆破任务的分队，专门进行了步炮协同的战术教育；第四，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和分队，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和当面敌情，进行战术演习；第五，准备了炸药1万公斤，梯子80余个、木桥30余座、充足的枪弹及其他作战器材一批。这时，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为加强攻城力量，第13兵团首长于30日决定，第47军第160师、第38军炮兵团及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2个团归第42军指挥，参加攻城作战。第42军首长遂作出部署：以第124、第125师各加强1个炮兵团，担任主攻，由城西突破；以第126师由城北助攻；以第155师、军警卫团、第47军第160师和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2个团，在城东、城南佯攻，并准备随时参

加登城作战。

为减少破坏和伤亡，第42军奉命向安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守军拒绝投降。5月5日18时，攻城作战开始。第124、第125、第126师共集中迫击炮以上的火炮140门，对小西门、大西门、北门实施了20~30分钟的火力准备，随后部队向护城河与外壕发起攻击。至6日2时，第125、第126师顺利地完成了抢占护城河、外壕及攻城爆破的一切准备。5时许，发起总攻。第126、第125师炸开城墙，冲入城内。第124师在第125师的协助下以梯子登城，投入纵深战斗。守军茫然无措，乱作一团。攻城部队大胆穿插，将守军迅速分割包围成5块。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至8时全歼守军，无一漏网。

二、和平解放新乡

新乡国民党军第40军原为西北军庞炳勋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将其推至内战前线，在平汉战役中被歼，重建后一直驻在新乡，但广大官兵对蒋介石排除异己深为不满。平津战役后，该军军长李振清乘飞机逃往南京，部队由副军长李辰熙指挥。1949年2月下旬，该军第106师第316团团团长庞庆振在华北军区的政治争取之下，率部起义，在第40军广大官兵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军心更加动摇。安阳守军被包围时，新乡守军见大势已去，即向第70军表示了愿经过谈判接受改编的意向。4月17日，程子华致电第70军领导：“目前仍按你们意见，要新乡之敌放下武器，待安阳之敌解决后主力转到新乡时，再考虑用北平方法解决。因目前我力量不占优势，即使用北平方式解决，恐你们力量不够，但与敌保持谈判联系仍属必要。”为争取第40军放下武器，第47军派该军炮兵团长、新乡守军第40军副军长李辰熙的表弟冉影同志，进新乡城做争取李的工作。

4月29日，第47军到达磁县以南，和平解决新乡守军的条件日趋成熟。为此，第13兵团首长致电第70军：“对新乡敌人谈判，目前应坚持要敌人放下武器”，“明确告诉新乡敌人，兵团正指挥

歼灭安阳之敌，须候兵团到后解决新乡问题，并警告敌人，必须保证特务和一切反动武装不逃散一个，保护武器、弹药、物资、建筑等之完整，作兵团到后商谈之基本条件。”^① 同日，程子华向林彪、罗荣桓等转报了冉影关于李辰熙对和平解决新乡问题的意见：愿以和平名义解决，民主原则改编，不愿交出武器；希望快些解决，不愿等包围后再表明态度；该军有历史，编散可惜。根据第13兵团的指示，第70军参谋长高厚良于30日与李辰熙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但未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5月1日，第四野战军首长致电第13兵团：“新乡之敌如能做到放下武器则最好，如不能放下武器，则许可其出城改编。如两者皆无效，则坚决攻歼之。”为对守军增加军事压力，以便和平解决新乡问题。第13兵团首长指示第47军，除留1个师于安阳以南配合第42军作战以外，军部率3个师向新乡前进，并做攻城准备。第47军主力遂于5月1日由安阳地区出发南下，3日进至汲县，逼近新乡。在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之下，新乡守军召开团和独立营以上军官会议，一致认为，以不流血求得和平处理为妥。3日，程子华与守军副军长李辰熙举行谈判，达成了允许国民党军第40军军部率2个师1.7万余人出城改编，地方武装、保安团队放下武器的协议。3日夜，守军中的地方武装1000余人向原阳方向逃跑，当即被迫歼。5日，安阳守军在和平改编协议上签字，6日，出城接受改编（后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独立师）。至此，安新战役胜利结束。

安新战役自1949年4月16日开始至5月6日止，历时20天，歼灭国民党军3.3万余人。其中，俘1.36万余人，毙伤2500余人，改编1.7万余人^②。扫清了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的障碍，打通了平汉路，使华北与中原地区完全连成一片。在这次战役中，第

^① 1949年4月29日程子华、彭明治致甘渭汉、石志本、高厚良的电报。

^②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0年7月编制之《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历次重要战役一览表》。

42 军伤亡 2704 人。

第三节 和平解放绥远

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解放后，华北地区仅剩傅作义原部属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部。对该部，解放军既没有采取战斗方式解决，也没有对其进行军事包围迫其接受和平改编，而是采取了暂时维持现状，等待时机成熟时再促其起义，并将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即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

一、“绥远方式”的提出

张家口解放后，傅作义集团西逃退路被截断，其部属董其武部被压缩于绥远一隅。1949年1月8日，在北平第2次和平谈判中，傅方代表周北峰（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提出平、津、塘、绥一齐解决。次日，中央军委答复林彪、聂荣臻，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先解决平、津问题，后解决塘、绥问题。这是傅方首次提出解决绥远问题。

与此同时，担任监视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之国民党军任务的解放军各部，也提出了如何解决国民党绥远守军的问题。1月15日，李井泉、王平、姚喆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建议在天津攻占后，北平未下前，即抽一个纵队秘密运动，配合八纵急占包头，截断归绥敌西逃道路，以主力控制归绥附近，骑兵控制归绥，因此，监视归绥之敌以待主力到达歼之。”17日，中央军委将此建议转给林、罗（荣桓）及杨成武、李天焕等征求意见。次日，林、罗致电中央军委：“攻北平兵力已足，三纵抽往绥远无影响，但恐很难抓住敌人”。“我军如由东向西歼灭绥远、宁夏等处之敌，敌则节节后退，甚难达到歼敌目的。绥远之敌逃跑的可能尤大，在北平、大同、太原之敌歼灭后，宁夏之敌亦可能西退，即令不退，对我亦无重大威胁。故我们意见，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目前暂时不管，待西安打下后，以我军之某一部配属一千辆

汽车及集中尽可能的骑兵占领兰州，由西向东歼灭宁夏、绥远之敌，然后解决青海、新疆之敌……如由纯粹步兵由东向西近逼，则敌有广大之后方回旋地区，使我军到处扑空，则必收效甚小，愈向西敌之骑兵愈多，非单纯步兵所能解决。”杨成武、李天焕也表示，绥远守军4万之多，即使派1个纵队西去，亦很难不使西逃。据此，19日军委复电林、罗：“同意你们暂不派兵去绥远的意见。”从军事上的利弊得失考虑，中央军委决定对绥远暂不用兵，但究竟以何种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只能视北平能否和平解放及此后绥远守军的态度等情况决定。

21日，傅作义在其军官会议上宣布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22日，时任国民党政府绥远省主席、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的董其武飞抵北平，向傅表示愿意跟随走和平道路。傅表示绥远问题等他见到毛泽东主席之后再定^①。同日，林、罗、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王克俊（原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笔者注）马十三时半给周北峰电转如下：绥远问题须同时和平解决原则林已同意，目前军事上须停止任何大小冲突，先行恢复交通，听候接受新政府之政策制度，请正式提出商谈，如何，电即复。”这表明傅作义于北平和平解放后准备将绥远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鉴于北平和平解放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创造了条件，故中央军委于23日复电林、罗、聂并告李井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②31日，中央军委又命令晋绥第8纵队停止作战行动。由此，中央军委对解决绥远问题有了新的考虑。

平津战役后，中央军委决定华北军区部队攻打太原后以主力

^①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1986年8月第1版，1993年3月第2次印刷，第252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

协同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为此于2月12日致电李井泉并告林、罗、聂及西北局等：“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远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四五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进占五临之后。目前应让其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时任国民党军整编骑兵第12旅旅长——笔者注）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绥，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现在不宜派兵去绥远。”^①这说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决绥远问题采取了一种比“北平方式”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据此，林、罗、聂与傅作义、邓宝珊开始商谈，并将情况于2月19日上报中央军委：“傅、邓对归绥、大同、榆林三处的问题，他们不愿意按现状拖下去，一再要求我方予以解决，且有在北平方面向我让步之后企图在解决归绥、榆林、大同时我略能宽大。本日我们对此问题讨论了一下，特提出以下意见望中央指示。一、归绥问题，将傅之正规军改编为一个建制军，由我方派各级政委及政治工作人员，军队今后归我方调遣，非正规军则解散复员。部队与我军待遇相同，干部及其眷属亦与我军干部待遇相同。二、榆林问题照归绥原则处理。三、大同问题照北平方式处理”^②。建议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来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

^①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05页。

^② 1949年2月1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中央军委电。

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就这次会见情况，中共中央于25日致电林、罗、聂及李井泉等：“傅作义、邓宝珊已到中央谈过，表现尚好。为了争取李、白桂系共同对付蒋系，为了使太原、西安、武汉、南京、上海等处蒋系军队仿照北平方式和平地解决起见，使傅、邓站在我们一边，极为必要。北平二十余万人，傅、邓已完全交给我军，任凭我们处理。绥远傅部则其预定计划是希望我们按照另一方式，即大体上按照吴化文、曾泽生方式解决，而在目前则大体上维持现状。我们已预先估计到了他们这种心理，故不待他们提出即告他们绥远军队及政府暂维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唯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这点我们未作决定，留待林、罗、聂及李井泉和他们商谈解决。”^①通过这次会见，双方进一步交换了意见，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并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②“绥远方式”由此确立。

由上可以看出，“绥远方式”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三大战役后国内形势而提出的。从军事上看，平津战役后解放军对绥远用兵自然不成问题。但这样势必分散解放军一部分主力，并迫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25页。

使绥远国民党军向西逃跑。而三大战役后，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尽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绥远守军不是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并且有经过细致工作后实行起义之极大可能。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能够进一步争取傅作义、邓宝珊完全站到中国共产党方面，这对争取国民党其他派系乃至蒋系将领率部起义均有重要意义。

二、和平解放绥远的经过

根据确定的“绥远方式”，中共中央于3月决定以华北局派出代表为主，在贺龙、李井泉等的参与领导下，与傅作义、董其武谈判绥远问题。3月23日，林彪、罗荣桓、贺龙、李井泉、陶铸在北平饭店与傅作义、邓宝珊会商，确定双方谈判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李井泉、潘纪文（后任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张友渔（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傅方代表为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

经过1个多月谈判，双方就划界、交通、金融、派遣驻绥联络机构及驻军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4月底，傅作义派其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等，携带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去归绥征求董其武的意见。董遂于5月5日派其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带修改意见赴北平。5月28日，双方代表举行草签仪式，由董必武、董其武分别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绥远方面在协议草案上签字（董其武由康保安代表签字）。6月3日，董其武答复同意协议内容。8日，双方正式签订《绥远和平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双方同意以陶卜齐与白塔间之古立板乌素为中点，向南、向北划定界线，停止一切冲突，并尽可能撤退沿线驻军，和平相处；恢复平绥路交通，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对董部之公用运输，在过渡期予以特殊之优待及便利；恢复商业贸易往来，并根据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严禁携带违禁品；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之

辖区内均得自由流通，货币兑换由中国人民银行在绥远设一办事处办理；由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协同执行协议；解放区书刊得在董之辖区内自由流通，董应对所部进行思想改造，应令特务分子停止活动并离绥。当日，毛泽东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就绥远问题进行了交谈。

从6月中旬开始，双方着手履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各项条款。傅作义于6月中旬派王克俊和李竭忠（原华北“剿总”宣传科长）至归绥协助董其武执行协议。董则分别于6月24日和7月8日在高级行政人员和各部队长中宣布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为适应绥远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6月作出决定，将中共绥蒙区党委和绥蒙人民政府改名为中共绥远省委和绥远省人民政府，撤销解放军第8军番号，将第8军与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省军区，以高克林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以杨植霖为省政府主席，以姚喆为省军区司令员，统归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领导。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建立党的归绥工作委员会，以潘纪文为书记；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对内为归绥工委机关，对外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的代表机关；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驻归绥办事处，办理各项贸易工作；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进行各项金融工作；设立铁道部平津区张家口分局平绥路西段办事处，接管白塔至包头段铁路及有关人员；归绥工委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党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通过各项工作，达到对董部的争取、教育、团结的目的。据此，中共绥远省委抽调潘纪文、鲁志浩等20余人组成驻归绥联络处，以潘任联络处处长，鲁任联络处主任。

在实现绥远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时，国民党在绥远的守军计第111军（辖第258、第320、第326师）；独立第7、第319、第310师；整编骑兵第11、第12、第13旅；骑兵第5旅、独3旅、保2旅、保4旅、保6旅等部。

此外，还有原第 22 军军长左协中率第 86 师在榆林起义时由榆林地区东逃并重新组建的第 22 军（辖第 228、第 86 师），共计 6.5 万余人。这些守军成分复杂，番号多变，有的竟形同土匪，他们对待绥远和平问题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等待观望，有的则企图“借水养鱼”。

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1949 年 3 月国民党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董拒绝后，国民党政府遂停发了董部的军费及一切补给，以便给董造成压力。阎锡山也利用绥远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位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中统特务张庆恩至包头，建立中心据点，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等特务组织，与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潘秀仁、张遐民以及部队、地方上的顽固分子勾结在一起，不断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他们又不断制造谣言，组织和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上街游行示威；砸毁宣传进步言论的《奋斗日报》报馆；并阴谋破坏铁路交通等，企图阻挠协议的实现。在此形势下，董部第 111 军军长刘万春扬言，不能宣扬和平协议，否则会引起大乱，并恫吓王克俊不要上街。董其武无奈，于 7 月 1 日致信潘纪文、鲁志浩，请求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暂缓进驻归绥。鲁志浩等驻绥联络处先行人员就此折返丰镇。

针对上述情况，傅作义于 7 月 14 日致信毛泽东：“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归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①。16 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表示：允许绥远守军编 2 个军，绥远 2 个省政府合并。7 月中旬，

^① 董其武《戎马春秋》，第 287 页。

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几经周折进驻归绥，但受到董其武某些部属的百般抵制，无法展开工作。7月24日，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遇害。这时，董部有些部队也开始向解放军防区袭击骚扰。鉴于董其武难以驾驭局势，联络处人员生命安全难以保障，经上级批准，联络处除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等3人继续留下工作外，其余人员暂时撤回丰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接见傅作义时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仍用‘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①30日，聂荣臻、薄一波致电姚喆等：“绥远问题现在作明朗化之解决，唯敌内部不一，加以阎、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笔者注）匪从中勾引破坏，敌有一部积极对我进袭，以达破坏我解决绥远问题。过去所发生敌向我进袭之行为，须具体记录，以作以后提出处理之材料。自己部队与地方政权及群众，均需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如敌来袭时，则坚决击灭之，不要主动出击乌兰花，暂作忍耐，以便彻底解决绥远问题。”

国民党利用绥远一度出现的某种紧张局面大作文章，阴谋在绥远上层制造分裂。7月下旬，蒋介石派政务委员徐永昌和空军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峡坝，约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分别谈话，劝董率部西撤。徐、王飞回广州后，国民党政府即拨给董部黄金1900两，以补发欠饷，任命董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为第9兵团司令，指挥董部所有部队，刘为第9兵团副司令，企图利用矛盾，乘机分化，以封官许愿破坏绥远和平解放。

鉴于绥远和平解放困难多，阻力大，毛泽东决心请傅作义出面加快解决进程。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指出：“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

^① 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79页。

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①为推动绥远起义，中国人民银行拨出现洋 15 万元，傅作义也从其原来部队积蓄的基金中拿出现洋 5 万元，由傅带去绥远，慰问董部官兵。8 月 24 日，在潘纪文的陪同下，傅作义、邓宝珊由北平乘火车赴归绥。

傅于 25 日到归绥后，29 日移住美岱召，9 月 10 日到达包头，对绥远守军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使绥远起义逐步成为现实。9 月 11 日，傅作义致电薄一波、聂荣臻，说明了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今后的意见：“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确指示，逐步实施，军队大致均可掌握，通电日内即可发出。”“经连日分别传见说明，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处理原则：（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善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实施步骤：（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通电发出后，立刻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654～第 655 页。

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①：13日，经毛泽东修改后，聂荣臻、薄一波复电傅作义：“同意来电所提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经过这些步骤，使绥远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使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军。主席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②14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以薄一波、聂荣臻之名致周北峰的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③这些指示对推进绥远起义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至9月中旬，绥远和平起义已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9月15日，徐永昌携带蒋介石、阎锡山等的亲笔信飞抵包头，想说服傅作义、邓宝珊去广州“共商大计”，被傅、邓拒绝。徐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召开，傅必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遂托病住进医院，企图拖着不走，使绥远不便起义。为驱徐离开包头，傅作义、邓宝珊和董其武遂请他领衔起义。徐见势不妙，于19日晨与张庆恩等飞回广州。

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峰将军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宣布率全体官兵6.5万人起义。通电称：“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

① 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0～第292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71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72页。

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崇高的敬礼。”^① 次日，毛泽东、朱德致电董其武及其领导下的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② 至此，华北全境获得解放。

“九一九”起义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

绥远的和平解放，是“绥远方式”的胜利，而“绥远方式”又是解放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一种新的斗争方式。这种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解放军集中力量于主要战场，尽速消灭国民党军残余的主要部分，加快全国解放的步伐。由于解放军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斗争方式，才使第19、第20兵团于平津战役后转攻太原，之后又移兵西北、西南战场，从而加速了祖国大西北、大西南的解放，同时使绥远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平津战役后，1949年4月至9月，华北军区部队和第四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一部，接连攻克了太原、安阳，和平解放了大同、新乡和绥远，肃清了华北国民党军残部，解放了华北全境。其主要经验是：

^① 董其武《戎马春秋》，第301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74页。

第一，从战略全局出发，合理调配使用兵力。战略决战以后，华北地区只剩下太原、安阳、新乡、归绥、大同等国民党军若干个孤立据点，而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尽速消灭国民党军残余的主要部分。从解放军的主要任务出发，中央军委决定第二野战军全力准备渡江南进，安阳、新乡国民党守军由第四野战军在南下途中附带扫清；第19、第20兵团与第18兵团一起会攻太原，之后第18、第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指挥进军西北，直出兰州、银川，切断绥远国民党军的退路；对绥远、大同等国民党守军则以次要兵力和地方部队监视包围，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决。这一战略部署，既保证了解放军主要任务的完成，又兼顾了迅速扫清华北国民党军孤立据点，从而为解放华北全境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一战略部署是十分正确的。

第二，灵活运用三种斗争方式，迅速解决华北国民党孤立守军。“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是战略决战后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残余的三种主要斗争方式。在解决华北国民党孤立守军的过程中，解放军灵活动用这三种斗争方式，即对敢于顽抗的太原、安阳守军，实行“天津方式”，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对大同、新乡守军则实行“北平方式”，将其和平改编；对董其武部则实行“绥远方式”，等待并促其起义，然后将其和平改编，从而迅速解放了华北全境。

第三，制定了周密的作战部署，确保了作战任务的完成。三种斗争方式，在消灭华北国民党军残余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然而，无论哪一种斗争方式，在实行过程中如果考虑不周，都难以顺利实现。解放军在攻克太原、安阳时周密计划，在促成大同、新乡守军接受改编时精心部署，在争取绥远守军起义时耐心等待并讲求策略，从而保证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五章 进军西北，解放陕 甘宁青新诸省

第一节 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和 解放军进军西北地区的任务与方针

一、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省区，面积 320 万平方公里，人口 2300 万。该地区南连湖北、四川、西藏，东邻内蒙古、山西、河南，自西向北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原苏联（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等国接壤，国境线全长 6180 公里。西北地区横跨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平均海拔在 2000 米以上，属高原内陆性气候，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著名的天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祁连山、贺兰山、秦岭、大巴山纵横其间。塔里木、柴达木、腾格里沙漠浩瀚，戈壁辽阔，人烟稀少，交通闭塞。该地区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当时石油蕴藏量和产量均占全国第 1 位，除玉门油田外，当时已探明而尚未开采的还有永昌、柴达木、享堂、乌苏、喀什、库车、阿克苏等油区。此外，煤、铁、盐以及其他贵金属蕴藏量也极为丰富，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经济却十分落后。据当时国民党政府资料统计，在国民经济中，农业占 75%，牧业占 20%，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不到 5%，人民的生活非常穷苦。到 1948 年，该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达百万以上，约占

西北5省人口的4.5%，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本已十分贫穷的人民更如雪上加霜。

1949年春，盘踞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有25个军、61个师（旅）约40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团13个军（第1、第3、第17、第27、第30、第36、第38、第57、第65、第69、第76、第90、第98军），共33个师及若干直属团队，计17万余人，除2个军在四川整补外，其余位于陕中及渭河流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集团及蒋系部队共8个军（第11、第81、第128、第82、第129、第120、第91、第119军），共24个师，计14万余人，驻守甘、青、宁3省；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部3个整编师（整编第42、第78师、整编骑兵第1师）及2个独立骑兵旅，共7万余人，驻守新疆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邓宝珊部1个军（第22军）2个师约1万人，驻守陕西榆林地区。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这支军事力量，继续顽抗。

由于上述部队分属不同派系，因此，各派之间矛盾较深。不仅蒋系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等之间矛盾重重，而且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与青海马步芳等诸马之间，亦因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彼此猜疑，互不合作，各自为谋。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经过近一年的积极作战，不仅解放了渭河以北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1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而且自身在作战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春，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改称第一野战军，下辖7个军共18个师和2个骑兵旅，经过整编，全军达15.5万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已经造成全歼胡马匪军解放大西北更好的条件”。“西北战场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①

^① 《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页。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胡宗南集团根据全国战争形势和西北战场的情况，以及国民党的战略退却部署，开始收缩兵力。企图第一步将主力由关中地区退守三原、高陵、泾阳、咸阳、西安、宝鸡及渭河南岸，以迟滞第一野战军前进，掩护搬运西北地区的物资及撤退机关后方；第二步，依托巴山，主力集中汉中，以一部据守西安、咸阳、宝鸡，依渭水而阵，保持子午谷后方交通，以四川为后方，凭借秦岭、巴山天然屏障设防，与二马集团联结，阻止解放军进攻，以保持西北，屏障西南。

二、解放军进军西北地区的任务与方针

1948年12月，在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正在顺利展开之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在筹划全军今后作战方针时曾设想，华北军区主力首先协同东北野战军夺取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唐山以及太原，然后，以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夺取绥远、宁夏，与西北野战军会合，第1兵团则早日与第一野战军会合，先肃清兰州、潼关线上及其以南、以北诸敌，并夺取潼关、西安、天水、汉中诸城，然后入川。12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胡宗南尚有二十八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又有青海回军（战斗力较强）在陇东配合，胡军退川退鄂亦尚未定。西北我军实力弱于胡军，更弱于胡马联军，因此目前不能切断其退路，即增加徐向前部亦无此可能，只有杨得志、杨成武、徐向前三部齐去才有此可能。蒋介石整个部署亦尚未定，如以胡军调京沪，则四川门户洞开，如以胡军守川，则他将以西安全为第一线，不会轻易放弃西安，故目前不要忙于去包围胡军。”^①并指出，淮海、平津战役及攻克太原后，全军休整2至3个月，然后以西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3个兵团出陕甘川。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确定1949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39页。

是：“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① 据此，毛泽东于2月12日，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三个兵团廿三万人即可全部用于西北，至少徐向前、杨得志两兵团十七万人可以用于西北，并告，“太原、大同可于三月内解决，休整一至两个月，大约在六月徐、杨等部即可协同你部攻西安。”^②

为尽早解决西北地区国民党军，在太原战役行将结束之时，正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于4月23日向毛泽东报告了战役结束后的布置：“十八兵团拟位于徐沟、榆次休整，准备从陕区潼关线渡黄河。十九兵团、七军，拟位于太谷及以南休整，准备从荣河、韩城线入陕。廿兵团（杨成武同志）等希望同往。如三个兵团全部入陕，估计今冬可占南郑、兰州、西宁，相机解决宁夏。明年分两路入川入疆”。并说：“前与李先念同志商定，以鄂西北之刘金轩部约两万人，配合陕作战”，请军委指示。4月2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杨成武兵团需留华北暂不入陕，该兵团如损伤不大可迅开平绥线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准备将来配合西北我军解决绥、宁问题。”^③ 同日，中央军委即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④ 从此，第18、第19兵团即开始做加入西北地区作战的准备。第18、第19兵团共辖6个军25个师，连同第一野战军入陕归建的第7军和第1军第3师、第3军第18师，共20万人，进入西北作战，对取得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作用。

5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和西北局：“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74页。

②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734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88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54页。

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在上述战役期间及战役结束后一个时期内，刘金轩部受彭张赵指挥”。在上述战役完毕之后，“陕南区党政军领导关系应予改变为受西北局、西北政府及西北军区的领导。”^①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确定，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5省，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与第二野战军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3省。

在确定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的同时，根据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中共中央军委还提出了解决西北国民党军的方针。

早在4月28日，毛泽东就曾致电彭德怀：“假如西野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②8月6日，又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还指出：关于“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78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4页。

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①

为了进一步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更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于6月8日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为常委。

三、进军西北的准备

为从各方面做好向西北进军的准备，西北野战军于1月11日至23日，在澄城县武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上，贺龙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彭德怀传达了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和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并作了重要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总结了1948年工作，提出了1949年的任务。他指出，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1949年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稳步前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必须有一套城市政策；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会议过程中，习仲勋、甘泗淇、张宗逊、张德生分别就城市政策，加强部队纪律，加强党委制和地方工作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总决议》，要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4、第655页。

求全军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普及和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发扬坚决、勇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加强学习战术技术，熟练迂回包围、割裂消灭敌人的战法；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必须认真协助地方党政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建设新解放区的城市与乡村，支援解放战争；必须大量培养干部，认真总结军事、政治、地方等各项工作的经验，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进一步健全党委制度，扩大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必须加强全党全军的统一性与纪律性，坚决克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反对可能产生的苟安、和平享乐思想，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而奋斗。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地方群众工作的决议》等文件。

会后，各级党组织都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传达贯彻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精神，讨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检查部队执行新区政策、纪律情况，制定加强党委集体领导的措施。

2月28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富平县常家村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和讨论了部队作战、休整和开展地方工作，建设区乡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等问题。确定部队在整训期间要以政治整训为主，继续深入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要求各军要准备好一套专门接收新解放城市的人员。

4月19日至23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又在澄城的平城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习仲勋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要求全军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大西北。

根据野战军的按排，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整训，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开展了以攻坚战斗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认真学习了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经

过整训，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组织纪律性和执行政策的水平，为夺取进军西北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举行春季战役，打乱胡宗南撤退部署

1949年初，胡宗南集团依照国民党统帅部的战略部署，确定以四川为后方，开始将西安绥靖公署机关、学校及眷属陆续撤往汉中、广元，对部队亦进行了撤退部署，以第18兵团部及第65、第90、第1、第38军分驻富平、阎良、三原、泾阳；第5兵团部及第17军（欠第12师）、骑兵第2旅、第36军（欠第28师）集结咸阳、户县、西安、临潼、渭南、华县，第84师驻潼关；另以第57军沿彬县、永寿、乾县、礼泉线组织防御，第14师一部位位于口头镇负责警戒，企图先确保渭河两岸交通，争取时间撤退物资，然后凭借秦岭、巴山，据渭水而阵，左与青宁二马部队相接，抗击解放军南下或西进。

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彭贺习三同志均能到会”，“如情况许可，西北我军能在你们动身前打一仗，再休整为好，如不可能则不强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打乱胡宗南的退却部署，第一野战军前委于1月24日决定，在2月中旬发起春季战役，“首先攻夺同官，吸引敌增援，求得第一仗在山地歼灭两、三个军”。“如敌一军、六十五军调离关中”，则“先攻蒲城，得手后出富平取耀县。”1月29日，野战军首长发出通令，决定提早结束冬季整训，要求各军于2月8日前完成进攻准备，10日出动，首先攻占蒲城，得手后进攻富平、耀县，孤立同官，然后夺取之。2月1日，彭德怀、张宗逊下达春季攻势的命令：第4军（欠第12师），11日由三里镇取道宜君、苦泉、柳林，于14日或15日首先围歼小丘地区国民党军保安团队，得手后进占兔子镇，协同野战军主力夺取富平、耀县，掩护途中送粮，或围歼口头镇、淳化守军，威胁乾县、礼

泉、咸阳。第1军附骑兵第2旅，由大孔寨、郑家石槽、六井镇地区出发，首先进占十里铺，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从蒲城西南角及西门攻城。第6军由罕井镇、方里、白水城地区出发，从蒲城西北角和东北角攻城。第3军由龙山、韦村、雷村、通道地区出发，从蒲城东门、南门攻城。上述各军于13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14日拂晓完成围城部署和攻城准备。第2军于13日拂晓进至孙镇，14日午前进至蒲城西南之贾曲镇附近地区，完成打援部署。第12师于陈炉镇以东之澄家河地区监视守军行动，防其逃窜。

2月8日，因连降大雪，影响部队行动，彭德怀决定待天晴后出动。同时，向毛泽东报告了春季作战的部署，并说：“如暂无力量增加，西北本年春夏（六月前）我军只作夺取同、耀、蒲、富、大、朝、平、淳^①等八县，收复正宁、山河，打算解决粮食困难（现在粮食只能维持到二月底），增强本身。”2月12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依据你处当面敌情是否有利于即打一仗，如无甚大有利，可以暂时不打，以便你及王震出席二中全会，留张宗逊和赵甘在一起指挥部队继续休整。”

当日晚，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三月无粮，须取数县才能解决吃饭问题。估计攻取蒲城、同官两城比较易得，且可逼敌放弃大荔、朝邑、平民。如我不进攻富平、耀县、三原时，不会引起大战。故我与王震离队，由张赵甘阎指挥，以张为主，不会有问题。”13日2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意见。彭德怀在部署完春季攻势作战后，于2月17日动身前往中央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第一野战军在张宗逊指挥下，按预定计划，发起春季攻势战役。

2月16日拂晓，第4军从黄陵出发，经宣君、苦泉于18日午进至马鞍桥、党家原、龙家原地区，查明国民党军第20师位于王益沟、五里铺、陈炉和1个团驻铜川城的情况后，于19日夜以1

^① 同、耀、蒲、富、大、朝、平、淳，即同官、耀县、蒲城、富平、大荔、朝邑、平民、淳化。

个团在黄堡镇地区担任阻击，以一部兵力监视陈炉守军，主力向田家原、五里铺、王益沟和军台岭发起攻击。20日下午，第11师扫清铜川西原守军外围据点后，攻占白家原；第10师歼守军一部攻占高家原；军台岭、陈炉守军一触即逃，第12师一部在追击中俘其百余人。由铜川逃至耀县的国民党军第20师与驻耀县之第69军南逃三原，第4军顺利解放铜川城及周围地区。21日晨，第4军一部进驻耀县城。

20日晚，第1军进至东加禄、滩尖、石槽、东党地区，第6军进至盘头、南凹、白水城，第3军进至武宜、高石、马湖、附原地区，第2军进至孙镇及其以东地区。原驻墙村、十里铺、兴市、美原、倒贤之国民党军第30、第12师，惧于被歼，于18、19日相继西逃富平、三原。21日黄昏，第3、第6军各一部对蒲城发起攻击，第7、第9师一举突破城东和城南门，至22日2时，全歼守军，俘保安第4旅旅长赵国珍以下千余人。

第一野战军攻占铜川、耀县、蒲城后，胡宗南为保存实力待机反扑，遂将主力后撤，其第1军退至泾河西之北社、阡东、马庄地区，第18兵团部率第65军退至泾阳，第90军撤永乐镇，第69军、第12师、第20师残部退守三原、鲁桥、楼底、西羊镇地区，第30师退至富平及以西。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第一野战军决定对撤退之国民党军发起追击，要求各部队采取大胆深入，迂回包抄，截断敌人退路，寻机歼灭敌主力；对国民党军保安团队据守的城镇，则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速战速决。2月22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向中央军委报告了续歼胡宗南部的部署：以第1、第2、第3、第6军于23日向富平推进，首先歼灭富平地区守军，得手后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以第4军向淳化追击，首先歼灭该地区分散之第14师，得手后威胁西兰路；以骑兵旅活动于下邽、孝义、关山、交口、渭河北岸地区，消灭民团，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2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作战计划，并指示：“依当面情况酌定之”，“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

24日，按照预定部署，第1、第2军进抵阎良地区准备打击援敌和切断富平守军之退路；第4军向淳化展开进攻，守军第14师第40团弃城逃跑，第10师在追击中歼其400余人；第3、第6军向富平推进，守军第30师望风而逃，撤往泾阳，25日晚，第3军第9师攻占富平，歼自卫团400余人。26日，胡宗南急调由铜川南逃之第76军第20师和第14师第40团残部，进入淳化西南之马窑、朱家庄、西凤山和口头镇以西地区布防，以阻止解放军继续南进。28日夜，第4军第10、第11师向铁瓦殿、口头镇攻击，第12师除以一部控制嵯峨山向东警戒外，主力向九顷原、三里村地区攻击，尔后一部配合第11师攻歼口头镇之敌，一部由吊庄、官道畔向云阳方向警戒并断口头镇守军退路。至3月1日，第12师攻占九顷原，第10、第11师先后攻占铁瓦殿、北钟山、刘家岭、口头镇，并在马窑、朱家庄地区全歼第20师全部和第14师第40团残部，俘第20师师长褚静亚以下1500余人。

第一野战军解放铜川、耀县、蒲城、富平、淳化后，胡宗南以第69、第90军、第1军共8个师集结三原、高陵、泾阳和咸阳以北地区；另以第36军防守渭南至华阳线，第84师除以第252团守大荔外，主力驻潼关。鉴于胡宗南部猥集一团，不易分割，第一野战军决定主力以备战姿态，就地休整待机，协助地方开展新区工作；以第6军和骑兵第2旅协助东府分区部队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守军。3月3日，第6军第16师经武家、官子池，第17师经羌白向马坊、石槽攻击，歼第84师第252团1个营。4日，第17师渡过洛河攻克大荔，歼大荔自卫团和第8专署及突击大队全部，当日，东府分区部队攻占朝邑，平民县城，地方武装300余人投降。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

胡宗南集团遭打击后，节节败退，青海马步芳集团害怕胡宗南部继续撤退后，自己陷于孤立状态；而胡宗南为挽救败局亦想利用马步芳部力量牵制第一野战军。双方在互有利用的情况下，达成“胡马联防”协议。马步芳即以第82军4个骑兵团由常宁向淳

化地区展开进攻。胡宗南在马步芳的支援下，3月5日集中第69、第38、第90、第65、第36军和第1军共11个师的兵力向北反扑。

针对胡马联合反扑的情况，第一野战军首长决心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方针。决定主力主动撤出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地，转向黄陵、宜君、白水、澄城和大荔以北地区待机。11日，第4军在淳化以北地区，给马步芳部第82军以沉重打击，毙俘第248师师长马德胜以下1000余人。胡宗南集团进至铜川、美原、蒲城、龙阳地区后不敢再进。历时1个月的春季战役遂告结束。

此役，共歼灭胡宗南集团1个师部、4个整团另1个营（第76军第20师、第14师第40团，第84师第252团1个营），重创马步芳集团第82军248师；歼非正规军陕西省保安第4旅旅部、保安第26团，蒲城、富平、白水、大荔等县自卫团，以及陕西省第8专署突击大队等，共计6900余人。其中，毙伤1600余人，俘4900余人，投诚450余人。缴获迫击炮32门、轻重机枪234挺、长短枪4700余枝、各种炮弹7100余发，电台10部、火车机车2部、车皮33节、粮食373万余斤，毙伤敌骡马456匹，缴获128匹。第一野战军牺牲203人，负伤和失踪795人。

春季作战，因国民党军大多未战即撤，因此未能大量歼敌，但打乱了胡宗南集团的退却部署，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武装，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为尔后的作战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连续开展攻势作战，重创胡宗南集团

一、举行陕中战役，解放西安等地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4月24日，第18、第19、第20兵团在第一野战军第7军及第四野战军炮兵一部的配合下，

攻克华北重镇太原。在此形势下，胡宗南集团更加恐慌不安，“鉴于华北、华中、华东大部陷匪，关中及秦岭东侧已完全暴露，”“为集中兵力巩固西北，”遂决定“放弃淳化、铜川、耀县、富平及蒲城，留一小部于口头、三原任警戒外，主力退守泾、渭两河南岸，左与陇东兵团连系，阻匪南进。另各以一部任秦岭北麓第二线阵地之构筑及东麓各隘口之守备，并控制四个军于宝鸡、永寿、礼泉及咸阳，保持机动。”^①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式。企图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踞四川。

为适时查明胡宗南集团的动向，捕捉歼敌战机，第一野战军决定向南推进。5月3日，第4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1军进至美原、流曲地区，第3军进驻荆姚、倒贤地区，第6军进抵贾曲、龙阳地区，第2军进至交卸、羌白地区。各部队进入指定地区后，都派出侦察部队，侦察敌情。

在晋南和东府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则积极筹措粮食，修路筑桥，以迎接华北第18、第19兵团入陕作战。

5月11日，第一野战军侦悉，胡宗南计划于5月15日开始战略撤退，其部署是：除在西安、宝鸡各留一指挥所外，第38军在高陵以南，第17军位于三原、西安线，第57军于乾礼，第69军位咸阳，掩护第1、第65、第36、第90军等部陆续南撤。张宗逊、赵寿山为在关中地区歼胡宗南集团一部，打乱其撤退计划，以利下一步作战，于1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拟于5月15日出动，“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的；第二步看情况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歼灭以上地区之敌”。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下），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20页。

5月12日晚，三原敌人开始秘密南撤，至14日，其第36军撤至咸阳，第65、第38军撤到乾县、礼泉，第1军车运宝鸡，第57军撤到永寿地区，第69军撤至坝桥、蓝田，第17军仍踞西安，第90军位于泾阳以南，并沿泾河两岸布防。西安绥靖公署已迁汉中。13日晚，第一野战军第2军侦察部队攻占高陵，歼守军300余人；第1军侦察部队进占三原。

5月17日，中央军委复电张宗逊、赵寿山，同意11日电行动计划。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17日晚，野战军司令部在富平谢村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作战部署，以第4军向乾县及其以西地区追歼胡宗南部，并准备打击宁青二马可能之增援；以第1军向临平镇、岐山间穿插；第2军向咸阳、武功以西追击；第6军向西安分路攻击前进；第3军为预备队。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地当渭水之南，秦岭之北，其间有渭、泾、泾、灞、潏、涝、沣、漓诸水流过，有“荡荡兮八川分流”和“八分绕长安”之说，肥沃的土地，形成了著名的八百里秦川。

5月17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第一野战军各部队按预定计划，越过泾河经乾县、关头，第1军向临平、岐山，第2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6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至18日，第2军部队于永乐、泾阳塔和新庄、阎家堡地区歼国民党军第53师大部及骑兵第2旅第4团一部，俘2200余人，接着解放咸阳。19日，又沿咸（阳）扶（风）公路继续西进，解放兴平、武功，20日乘胜进占扶风、岐山和蔡家坡。第4军攻克礼泉、乾县后，20日进占关头、监军镇，歼第215师第643团一部，俘地方保安武装300余人。第3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

第6军于18日配合第2军攻占咸阳后，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当晚，各攻击部队经过周密侦察，摸清了对岸守军布防情况，选好徒涉地

段。20日凌晨，在炮火掩护下，第17师第49团和第16师第47团突破守军渭河防线，全歼暂编第2旅第6团和第48师1个营，直逼西安城下。

上午11时，当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部队顺利进入城区。与此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南门攻入城内，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50团攻占三桥镇后，即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并夺占西安北门。至下午2时，第6军已完全控制了西安城，一部占领了北草滩。至此，古城西安宣告解放。先后歼国民党军第17军第48、第12师各一部、暂编第2旅大部，共2000余人。

在第6军解放西安的同时，第1军进至岐山、横水地区，第4军进占麟游，查明胡宗南部第57军于20日经麟游向凤翔逃窜，当即展开追击。22日上午，两军于凤翔北姚家沟地区将第57军和第30师截住，战至10时许，歼其大部，俘8000余人。第2军为配合第1、第4军行动，于21日12时攻占凤翔城，歼灭千山警备司令部及地方武装1000余人，一部在凤翔北部地区歼灭第57军警卫营和骑兵第2旅第4团一部，俘500余人，在虢镇地区全歼千山自卫团，并夺占胡宗南的兵工厂，当晚第6师一部南渡渭河占领眉县。24日，第2军主力渡过渭河，先后在五丈原、高店镇和辛口子、马绍镇地区，歼灭第36军和秦岭守备司令部及第48师等部2300余人，第48师警卫营等700余人投降。东府军分区部队为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20日由大荔南进渡过渭河，迄24日先后解放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等县城。至此，宝鸡以东渭河两岸之关中广大地区全部解放。

陕中战役，共歼灭国民党第57军第214、第215师和第30、第53师，以及第17、第36军、第90军、第22军各一部和大批地方保安武装，共计2.7万余人。其中，毙伤2200余人，俘2.1万余人，投诚和起义33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迫使胡宗南集团主力退守秦岭，只留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

据守宝鸡。

二、粉碎胡马反扑，第 18、第 19 兵团加入西北地区作战

第一野战军解放关中广大地区后，使陇东地区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面前。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集团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决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遂向国民党统帅部“建议与西安绥署协同反攻，并保证愿出全力。”^①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得悉二马愿为效命，自然喜出望外，遂连电催促胡宗南与二马协商出击，从而打乱了胡宗南继续撤退的计划。遵照国民党政府命令，胡宗南即拟制了作战计划草案，并派专员赴兰州与二马协商，最后达成如下计划：

“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方面

(一) 马继援司令统一指挥陇东、宁夏兵团，于六月上旬集结平凉以东，准备沿西兰公路、泾水两侧，向东南席卷，夺取咸阳，断匪退路，包围匪军而歼灭之。

(二) 第一一九军附一九一师，为陇南兵团，归裴昌会司令指挥，于六月上旬集结于陇县东北地区。

二、西安绥署方面

(一) 第五兵团裴司令指挥第五十七、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九十军、第三十师及陇南兵团，准备沿渭水北岸向兴平攻击前进，协同宁夏、陇东兵团，围歼渭北之匪于咸阳以西，并准备以一部南渡渭水，策应第十八兵团。

(二) 第十八兵团李振司令指挥第三十六、第十七、第六十九、第三军，分路出斜峪关、子午镇、大谷口，歼灭渭南之匪，规复西安，并准备北渡渭水，协助第五兵团。

(三) 第一军由凤县准备向虢镇以南渭水河畔挺进，扫除南岸之匪，掩护第五兵团南侧，并竭力与第三十六军连系。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7 册（下），第 122 页。

(四) 陕保旅及骑二旅，随作战之进展，任第五兵团与陇东兵团之警戒与联络。

攻击发起时间，预定为六月十日。”^①

5月25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太原回到乾县秦家庄野战军司令部。根据青宁二马集结灵台、长武、泾川，陇南兵团集结陇县，胡宗南第18兵团集结宝鸡，第3、第69、第17军据守秦岭的情况，彭德怀等认为：如第一野战军攻击宝鸡时，青宁二马有可能击野战军侧背。据此，彭德怀决定：以第3军集结乾县，第4军位于乾县以西之仪井，第1军位于扶风、岐山，第2军位于武功、绛帐、眉县，第6军驻长安、蓝田、户县。在第18、第19兵团未到关中之前，除情况特别有利外，暂不向国民党军进攻。如其反扑，拟于咸阳、兴平、礼泉、长安地区各个歼灭之。5月26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上述计划。

当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②

根据上述指示，第一野战军决定待第18、第19兵团到来后，再与胡、马两军决战，如其近期向西安反扑，则寻机歼灭之。

6月8日，援陕的宁夏兵团经长武向永寿集中，青马陇东兵团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下），第123、第12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卷，第598页。

向麟游、乾县间地区集结，陇南兵团由千阳、凤翔向岐山开进。6月9日，在马继援的统一指挥下，联合胡宗南5个军共20万余人，分由永寿、彬县、灵台、长武、千阳和宝鸡地区，向第一野战军展开大举反扑。

针对胡马集中兵力大举反扑的严峻形势，彭德怀于6月8日10时致电毛泽东：拟采取“适当引敌深入”的方针，以第2军之第4、第5师位置岐山、阳平镇、扶风地区，第6师置于眉县、周至节节阻击胡宗南部；以第3、第4军集结乾县附近地区，各以一部于唐高宗陵、铁佛寺、仪井线构筑纵深工事，吸引青马；以第1军集结青化、法门寺地区，第6军置于礼泉及以北地区。“准备四个军歼击马匪，待马匪疲劳攻击受阻，粮草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彭德怀认为，“如此役成功，对我很有利。”

9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①

6月10日，彭德怀就在泾渭间作战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报告。他认为，“（一）放弃泾渭之间，撤至西安、户县、三原、泾阳，比较有以下之不利：（1）将来仍须渡河作战，比较难以歼灭敌人。（2）六七月时，暴雨河水时涨，徒涉有困难。（3）咸阳一带工厂、桥梁、铁道重遭破坏，修复需时，将推迟行动。（4）八月下旬即开始雨季，无论进攻平凉、天水、汉中，中途均人烟稀少，大军雨季行军作战不利，保持现在地区集结兵力，可提早半月。（5）渭泾间麦熟正收，现占区可征粮廿余万石，被敌占烧毁，增加困难。（二）在泾渭间作战，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9页。

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上述情况有利我箝制胡匪，打击马匪。……（三）骑兵作战比较不利，敌死守宝鸡、平凉工事，我以一部抗击，付之代价，如能求得歼敌两三个军，减少将来攻坚代价。我六十一军灰晚可全部抵西安，六十军寒可开始由潼关西运，三、八两师文元可归建，七军寒删可到三原，过数日后，我即稍优势，如敌果然凶猛，形势不利于歼敌，我则撤守咸阳、户县、西安，待全力集中再出击，想不致有意外危险。”

6月11日，毛泽东复示彭德怀，“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5月26日，第18兵团开始从太原出发，向陕西开进。6月7日，第61军先头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6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兵团“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第18兵团以每日40公里以上的行程向陕西急进，先头部队由于连续徒步行军，指战员十分疲劳，脚上打泡的占70%以上，但战斗情绪却非常高涨。14、15日，各部相继进抵咸阳、长安、坝桥、临潼地区。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经灵石、霍县、赵城、临汾、河津，于禹门口渡黄河，再经韩城、合阳、蒲城。至7月3日，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6月10日，胡马集团对第一野战军阵地发起联合反扑。由于胡宗南迭遭解放军歼灭性打击，此次又于撤退中转为“反攻”，行动谨慎，而青宁二马过去受解放军打击较少，行动较为积极。当日，陇东兵团沿西兰公路进至永寿、崔木一线，11日，第82军先头进至大小竹杆。宁夏兵团之第11、第128军先头到达监军镇和关头镇地区后，遭第一野战军第6军和第3、第4军迎头痛击，被歼1000余人。与此同时，胡宗南除以第36军（欠第123师）向斜峪关推进外，主力第90、第38军向岐山、蔡家坡地区进攻，于

马家、安华、三庄子、赵家之线遭第2军顽强抗击，被歼800余人。陇南兵团向凤翔缓慢推进。

鉴于胡马集团配合紧密，兵力占据优势，而第18、第19兵团主力还未到达，与胡马决战时机尚不成熟，为争取时间，第一野战军首长决定改变阻胡歼马计划，主动后撤待机。并作出如下部署：第1、第2军南渡渭河，撤至眉县、周至、户县地区；第3、第4军转向三原、云阳、泾阳及其以西地区；第6军转至石桥、王桥地区；以已赶到西安的第18兵团第61军第182师担任西安防务，以第181师和第183师位于咸阳以北及西北地区，构筑工事，阻击由兴平、礼泉方向来犯之国民党军。

6月11日晚，第一野战军各部开始后撤，12日进至指定待机位置。胡马发现第一野战军主力东移后，误认是败退，马继援遂即指挥各部分头向武功、杏林、兴平、监军镇和咸阳方向跟推；胡宗南集团主力则在裴昌会的指挥下，由扶风沿宝成公路向武功推进。其中第36军（欠第123师附第165师）单独由斜峪关沿渭河南岸东进，企图经宁堡、金渠镇向西安前进。11时许，该军进入金渠镇地区，第一野战军第2军迅速抓住战机，于当晚将其右翼之第165师包围，激战至次日2时许，歼其大部，俘师长孙铁英以下2200余人，第36军军部率第28师退入五个堡子转入防御。第2军在续歼其1个辎重营后，因第65、第38军已由眉县附近渡过渭河前来增援，为避免陷入不利地位，第2军主力转至周至哑柏镇、横曲镇地区。

第61军受领任务后，军党委发出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打好仗，以战斗的胜利来答谢西北人民的热情欢迎与华北人民期待捷音”，坚决守住咸阳，确保西安。各部队积极响应军党委的号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12日进入防御阵地后，不顾疲劳，积极加修工事、准备给来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6月13日，马继援率第82军越过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以第248师从东北方向，第100师从正北方向，第190

师从西北方向同时对咸阳发起猛攻，特别是东北和西北方向，青马军以整营的兵力进行连续集团冲击。第61军虽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但由于部队长途行军后，未及休息即投入战斗，在反复冲杀中十分疲劳，加上对青马军骑兵集团的连续冲击缺乏对付的经验，致使前沿阵地大部失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利用残垣断壁作依托，继续奋勇抗击。战斗中，第181师第542团第8连50余人连续击退了青马第248师整营兵力的9次猛攻，歼其200余人，为保障全线右翼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入夜，第61军发起全线反击，经13个小时激烈战斗，收复全部前沿阵地，俘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援退守礼泉一线。第61军伤亡200余人。

14日，胡宗南以第65、第38军及第36军残部沿渭河南岸，以第90军沿渭河北之陇海铁路，陇南兵团沿铁路以北之宝鸡至咸阳公路东犯，在第一野战军第2军部队的节节抗击下，进展迟缓，迄16日，分别进至周至地区之焦家镇、终南镇和兴平之线。

6月15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指出：“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如敌采此战法，你们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或者放弃西安引敌入西安然后歼击，何者为宜。又如马匪占领西安，我一二两军是否能集中歼灭胡匪，首先打开一面的可能。均请电告。”^①当日24时，彭德怀、张宗逊电报中央军委：“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央突破，在十四日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五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七军已集结草滩镇以北，马匪攻咸阳受挫后，北撤十里，骑兵两个团窜扰淳化、口头镇、小丘、方里，威胁耀县、三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11页。

原。寒酉胡匪之八十四师袭击坝桥未成，被我六十军一部击溃，正追击中，十七军由东西涝浴口窜袭户县，歼灭约一个营，至十九日后，我可集结三至四个军寻机歼击胡匪一两个军，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矣。”

第一野战军为吸引和抑留胡马集团于咸阳城外及礼泉、兴平、周至地区，争取时间集结兵力，歼灭胡马主力，于16日，作出如下部署：以第1兵团之第1、第2和第7军（第7军6月13日到达三原、泾阳地区归建），集结庵镇、户县、秦渡镇及其南北地区，在兴平、周至及秦岭配备坚固纵深野战防御，控制主力于户县城东地区。第18兵团仍以第61军主力守备咸阳、西安（各1个师），以1个师于咸阳以南沿渭河南岸配备纵深防御；第60军集结三兆镇、韦曲镇；第62军以一部沿草滩镇至咸阳组织防御，置主力于西安城北和城西地区。第2兵团主力集结泾阳、云阳、石桥、王桥地区，沿泾河左岸布置防御，并尽可能保持泾河右岸之北屯镇、修石渡桥头阵地，随时准备向礼泉、兴平出击，配合主力作战。第19兵团由禹门口渡河后，集结三原附近地区。

6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建国公园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召开会议，会议根据胡马联合反扑的形势，在认真研究分析了战场情况后认为：第一线双方兵力大体相等，胡马3个兵团、11个军、32个师共21.3万人，第一野战军3个兵团、9个军、27个师共24.8万人。因此，守西安并利用西安、咸阳坚城耗敌，集中机动部队寻机打击胡马一路，歼其几个军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等第19兵团到达，集结主力歼胡马于西安附近。彭德怀最后说，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于政治、军事和士气均不利。应利用西安、咸阳坚固据点诱敌深入。对于击胡还是打马，他认为：按目前态势，打马比较理想，但在胡马两军乘我第19兵团未到前，实施联合反扑迫我决战的情况下，也可以先歼击战斗力较弱的胡宗南部，特别是敌威胁到我不能守西安时，须

集中兵力歼敌一两个单位，以迟滞其进攻（即部分决战）。

这时，胡宗南见马继援部遭到沉重打击和发觉第18兵团及第19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安地区后，甚为恐慌，遂全线撤返原防。青宁二马也随即撤向永寿、崔木镇一线。至此，胡马联合反扑西安的企图遂以失败告终。

在此期间，在全国和西北胜利形势的影响下，驻守陕北榆林之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22军军部及所属1个师共4695人，在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下，于6月1日由军长左协中率领宣布起义，榆林和平解放。随后，起义部队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2师。

7月3日，第19兵团第63、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西北战场作战，使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野战军已由原来的15万人，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40万余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钳马打胡，举行扶眉战役

胡马联合反扑西安失败后，胡宗南集团第90军撤至周至以西之哑柏镇、横曲镇地区，第36军（欠第123师）撤至眉县，第18兵团第65、第38军除各以一部活动于武功南北和漆水河以西地区外，主力集结扶风附近地区，另以第1军撤至宝鸡，第17、第69、第57军各一部控制西安以南土地岭至宝鸡一线及秦岭北麓要隘；陇南兵团王治岐部撤至武功至扶风一线。上述各部在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的统一指挥下，转入防御。马继援除以第82军和第129军骑兵部队活动于永寿以东及泾河两岸地区外，主力撤至长武、彬县地区。宁夏兵团之第11、第128军则集结彬县、永寿线及其西侧地区。从青宁二马与胡宗南集团部署中可以看出，青宁二马取的是分散机动配置，有利时可进出

关中，与胡宗南配合作战，坐收渔利，不利时则退守平凉，缩回各自老巢，胡宗南集团则主力猥集于扶眉渭河两岸地区，既便于与青宁二马行南北策应联合作战，又能在情况不利时保守实力。但其主力集中，纵深力量薄弱，中间间隙很大，给第一野战军迂回包围，聚歼其主力造成良好战机。

6月20日，毛泽东根据胡马集团的部署，电示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当你们举行对胡匪三个军作战时，马继援全部及马敦静一部因受我许兵团威胁是不能增援的，但你们应以一部由咸阳向马敦静佯攻，使马敦静完全不能增援。”“在你们歼灭胡匪三个军的作战获得胜利后，只要我军损伤不大，尚有追击的能力，就应以王周两兵团主力迅速向凤、宝、千、陇^①方向前进，以期继歼胡匪余部及甘肃王治岐军并占领凤、宝、千、陇，以利尔后配合许杨向两马作战。”^②

6月22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当面敌情，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一）马匪确有渡泾河攻我泾原企图。胡匪刻正以一军、卅六军、六十五军、卅八军、九十军，沿渭河南岸，陇东兵团沿成宝公路，十七军及八十四师、二五四师依南山，沿子午镇东西，有乘马匪在泾原与我激战时，向西安、咸阳攻击之极大可能。（二）以上情况，我拟以一至三个军（视十九兵团集结程度），位置于三原附近，组织顽强防御，给顽敌青马以重大打击与消耗，以利今后作战。集结三个兵团（若敌很快进攻时，二兵团须留一部于三原地区）于西安附

^① 凤、宝、千、陇，指凤翔、宝鸡、千阳和陇县。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17页。

近，歼灭胡匪进攻的七个军。(三)鄠县(今户县)以西地区，南靠秦岭，北依渭水，正面仅四十至卅里，且多稻田藕塘，利防御不利出击。因此拟诱敌至西安附近，我集一兵团全部，二兵团大部，以至全部(视敌进攻时间与十九兵团集结程度决定)于西安东南，十八兵团以一个军守咸阳、西安城防与维护工事外，可抽两个军集结于西安三桥间，待敌进至西安西南地区时，我以七至八个军，由东向西出击歼灭之。”

当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兵团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①

6月26日，毛泽东又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根据近日情报，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长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全力及许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②

同日，彭德怀就歼击胡马军的部署向毛泽东请示：第19兵团7月4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7月8日开始向敌进攻，拟以第18兵团牵制王治岐部，第19兵团及第1、第2兵团首先围歼马继援部主力，然后以一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三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以第19兵团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0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2页。

位置乾县、礼泉、永寿监视马匪，集中第1、第2、第18兵团围歼胡宗南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宗南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

27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一）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①常宁、南坊、通润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②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午齐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毛泽东还指出，广州国民党政府目前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并说：“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凤、泾、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③，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

^① 乾、永、彬指乾县、永寿、彬县。

^② 长、泾、凉指长武、泾川、平凉。

^③ 甘凉肃三州，即甘肃张掖、武威、酒泉。

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毛泽东请彭德怀“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①

第一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考虑到青宁两马已经远撤旧永寿、彬县、崔木镇地区，并准备继续撤退平凉，且部署分散不易聚歼，而胡宗南集团5个军集结扶眉地区，夹渭河而阵，被天然分割不易配合，两马撤离后，其态势更加孤立，加上其距第一野战军主力较近，极便于我就近将其抓住加以歼灭。据此，野战军决心采取钳马打胡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两马，集中主力歼灭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和陇南兵团之第119军。6月27日，野战军下达了预先号令：第1兵团第1、第2军于28日在原地集结，尔后准备沿渭河南岸消灭第36军，占领眉县，得手后或出宝鸡南，或走斜峪关出凤县，或北渡渭河协同主力作战；第7军28日集结咸阳以西地区。第2兵团28日集结礼泉及其以东地区，准备经王乐镇、临平、法门寺向扶风、益店攻击前进，以1个师于乾县构筑工事，派出侦察警戒，待第19兵团到达接替后归还建制。第18兵团第60、第62军及第61军第183师，28日集结于咸阳、兴平附近地区，准备沿兴平、武功、扶风公路攻击前进，第61军2个师除卫戍西安外，由军率4个团向子午镇、大峪口之线歼灭第12师残部，得手后向东家口挺进。第19兵团先头第65军于28日进至王桥、北屯之线，准备29日进至乾县、铁佛寺及义井镇地区，后续各军继续向乾县、礼泉集结，准备随时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4～第625页。

与马继援部作战。骑2旅位于通润、土桥地区，向常宁、彬县、张洪方向警戒侦察。各部队接令后，即集结部队，进行动员，积极进行战前准备。

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咸阳召开第7次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确定的战役重点是：钳马打胡，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

7月7日，野战军下达了扶眉战役的作战部署：第19兵团并指挥骑兵第2旅，于7月10日进至唐王陵、两马山、铁佛寺、仪井、杨家山之线（置重点于乾县、礼泉之间），构筑工事，积极钳制青宁两马于乾县、永寿地区，确保沿咸阳、凤翔公路作战兵团右侧后之安全。第2兵团于11日隐蔽集结于临平镇以东乾县西南地区，12日向法门寺、益店镇及其南北取平行攻击前进，截断罗局镇以西胡宗南部第38、第65军及第119军之退路，会同第18兵团将胡部上述3个军包围于渭河北岸午井镇、罗局镇地区而全部歼灭之。第18兵团（欠第61军2个师）并指挥第7军，于12日沿咸凤公路及其以北之大王村、牛市沟、吴家堡、王家堡、杏林镇、浪店、刘家堡之线（均舍），向武功及刘家堡以南以西攻击前进，会同第2兵团歼灭被围之胡宗南部。第1兵团（欠第7军），于12日开始各个歼击渭河南岸周至、眉县地区之第90、第36军，得手后向宝鸡南挺进，截断胡宗南部主力的退路并相机策应渭河北岸作战。第61军（欠第183师）仍卫戍西安并各个歼灭西安以南地区子午镇一带之敌。彭德怀还特别告诫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①

^① 《彭德怀传》，第374页。

为了打好这一仗，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于7月1日发出《关于消灭胡马匪军的战役指示》，要求各级指挥员要严密组织并亲自担任战场观察，随时掌握战机，果断指挥；要搞好步炮协同，集中优势火力于主要突击方向，以保证突击成功；要加强侦察警戒，严防国民党军袭击；要坚决执行命令，积极协助友邻作战，加强通讯联络。指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全体指战员发扬光荣传统，团结一致，进行充分的战斗准备，勇敢而顽强的战斗，为彻底歼灭胡马军而奋斗。7月7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根据上述指示，各部队进行了战前战术、技术训练，组织侦察人员对胡宗南集团的部署和战区地形道路等情况进行全面侦察。各级干部在深入部队进行战前动员的同时，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准备工作。

7月10日，扶眉战役开始。担任钳制两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形成对两马展开进攻之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担任卫戍西安的第61军（欠第183师），当晚向子午镇地区胡宗南部第17军12师残部发起攻击，歼其第34团全部、第35团及师直属队各一部，共2000余人。这些作战行动，使胡宗南和两马无法判明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

在第19兵团和第61军先期行动的掩护下，10日晚，隐蔽于礼泉地区的第2兵团渡过漆水河后，从临平镇向西楔入，经一夜强行军，于7月11日拂晓，攻占青化镇、益店镇，尔后猛然由北向南迂回到第38、第65军和第119军侧后，担任穿插任务的第4军，急行军75公里，于12日3时许，攻占罗局镇，7时攻占眉县车站，截断了胡宗南部的西逃退路。

11日，第18兵团（欠第61军2个师）附第7军，由兴平地区兵分三路，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西进。11日拂晓，第60军进至杏林镇，上午于绛帐地区击溃第119军第247师，歼灭第65军第187师主力。第62军12日歼胡部第224师一部，

攻克武功。第7军沿陇海路进至绛帐南大营寨地区。

第1兵团11日由渭河南岸向周至、眉县攻击前进，于子午镇、黑山寺地区歼第36军第123师一部，12日拂晓，又于哑柏镇、横渠镇及以南地区歼灭第24师和第61师第181、第182团全部，俘6000余人，午后攻占眉县及以西地区。

至此，野战军仅以一天多的时间，就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第18兵团部及第65、第38军和第119军等部压缩在罗局镇以东午井镇以南的渭河滩上。

在第一野战军的猛烈攻击下，被围之胡部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决定将残部由向东防御改为向西进攻，妄图撤向宝鸡重新组织防御。为此，他命令第90军一部占领眉县担任掩护，主力转入五丈原；第65军第160师一部沿铁路西进，抢占李家庄西北制高点，主力由李家庄北侧向罗局镇进攻，第187师沿铁路向蔡家坡进攻；第38军除以一部兵力堵击第一野战军外，主力向罗局镇以北地区取进攻姿势退却。

根据国民党军的撤退企图，坚守罗局镇就成为这次战役能否全歼渭河北岸胡宗南部3个军的决定性环节。第2兵团第4军向部队提出了：“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和“堵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决心以顽强的阻击战，不让敌人跑掉。

12日拂晓，胡宗南部第65、第38军集全力向罗局镇突围，向第一野战军阻击阵地连续发起10余次集团式冲击。担任阻击任务的第4军第10、第11师部队顽强阻击，奋力拼杀，打得敌人横尸遍野。第29团第5连打得只剩下5个人，仍坚守着阵地；第30团第3连和第7连，连续击退敌人9次冲击，干部、战士负伤坚持不下火线，干部伤亡后，下级自动代理，失掉联络的连队自动归并，坚持战斗，打出了部队的顽强作风。

12日下午，第2兵团与第18兵团乘国民党军混乱动摇之机，前后夹击，对其发起总攻，将敌第65、第38军、第119军压缩在午井镇以西、罗局镇以东、高王寺以南的渭河河滩上。战至20时，

除第 65 军一部泅渡渭河被河南岸的第 1 兵团俘获外，其余全部就歼于罗局镇地区。13 日晨，第 2 兵团乘胜向西挺进，第 4 军 14 日攻克宝鸡，守军南逃，第 3 军占领凤翔。第 1 兵团沿渭河南岸西追，13 日于马营镇地区歼敌第 53 师一部，14 日攻占益门镇。战役胜利结束。

战役过程中，退守永寿、彬县、崔木地区的青宁两马，在第 19 兵团的严密监视下未敢轻动，在胡宗南求救时，只派出小股骑兵骚扰被歼灭后，旋即后撤泾川、长武、灵台一线。

战役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筹集粮食和物资，支援前线。仅关中新区即送军鞋 55 万双，出担架 9300 副，大车 2700 辆。

扶眉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西北地区进行的一次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战役。战役从 7 月 10 日开始到 14 日结束，由于第一野战军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钳马打胡”的正确方针，在战役部署上又以主力一部迂回守军侧后，迅速截断守军退路，并坚决阻止其向西突围；两翼平行追击和尾追的部队则乘守军混乱之机，大胆插入其纵深，然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敌人。此役，第一野战军共歼胡宗南部 1 个兵团部（第 18 兵团）、3 个军部（第 38、第 65 军、第 119 军）、8 个整师（第 65 军第 160、第 187 师，第 38 军第 55、第 177 师，第 119 军第 191、第 244、第 247 师，第 90 军第 24 师）、1 个师部（第 12 师）和 3 个整团，共计 4.4 万余人。其中，毙伤 1.3 万余人，俘 3.1 万余人。缴获火炮 290 余门，机枪 1160 余挺，长短枪 9000 余枝，汽车 6 辆，电台 26 部。解放县城 8 座和八百里秦川西部广大地区。从此，第一野战军由相对优势，转为绝对优势，完全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作战主动权，为尔后继续歼灭两马集团，解放西北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军的战史在检讨这次战役时认为：“关中会战，主决战方面由陇东沿泾水两侧指向於西安方面，打击匪军侧背，立案颇佳”，“主决战方面包含宁夏、陇东及第五（含陇南兵团）等兵团，

但无统一指挥，不仅未能使打击力统合发挥，且诸马只知拥兵自重，互相猜疑，各自为战，於不愿损耗各自兵力下，迂局部小挫而擅退，影响全局，功亏一篑。”“绥署对匪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增援彭匪一事，以及该两匪军兵团之行动，均毫不知情。故西安绥署既不知宁夏及陇东兵团因小挫而退，又不明匪援军之状况，正如兵法所云：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①

第四节 钳胡打马，举行兰州战役

一、作战双方的态势及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针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残部退守凤县、佛坪、东江口及陇南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解放军南取汉中；青海马步芳集团第129军退至陇县固关镇、张家川线，第82军退守威戎镇和静宁地区，第91军位于天水；宁夏马鸿逵集团除以第81军分守固原至黑城镇和西峰镇至庆阳线外，第11军和第128军退守泾川东西地区和平凉附近地区。

7月13日，第一野战军在扶眉地区歼灭胡宗南主力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使胡宗南余部不致早日退入四川，决定暂时停止对胡宗南部的进攻。第2兵团停止于岐山、横水、彪角镇地区，第18兵团停止于蔡家坡、罗局镇地区，第1兵团集结眉县以西，第19兵团仍于乾县、礼泉线，各部就地休整待机。如青宁两马南进，则将其歼灭于麟游、永寿地区。当日，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部队的部署情况。

7月14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马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一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下），第131、第134页。

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①

7月19日，野战军在虢镇以北的文广村，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扶眉战役的作战经验，讨论和确定下一个作战目标。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把扶眉战役称作是同胡马集团决战的第一个回合，并提出了第二个回合——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他指出，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还有10余万兵力，但分散于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至徽县、成县、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等地，已成惊弓之鸟，短期内已无进攻关中的能力；青宁两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退却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之势，估计两马在未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西北雨季将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推迟则会困难更多。经会议认真研究讨论，决定乘胡、马彼此远离之机，举行陇东战役^②，于平凉、泾川地区歼灭两马主力，为尔后进军兰州解放大西北开辟通路。其部署是：以第18兵团主力位于西安（2个师）宝鸡（4个师）线钳制胡宗南部，相机进占凤县及东江口、咀头镇，集中第1、第2和第19兵团聚歼两马主力。第19兵团附骑兵第2旅，于23日出动，沿西安、兰州公路及西侧攻击前进，26日攻击长武、泾川守军，得手后，向平凉攻击前进。第1兵团25日隐蔽集结在八渡镇、马家湾及以西地区，26日拂晓向陇县、曹家湾、温水店、兴平寺守军攻击，得手后续向华亭、化平及平凉以西之安国镇、杨家湾前进，切断平凉守军退路，并准备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来援之两马部队。第2兵团25日集结在千阳、新兴铺地区，26日沿千阳、陇县公路及其以北向草碧镇相公山、杜阳镇攻击，得手后与第1兵团向陇县，并沿陇县、平凉公路经安口窑、店子岭向平凉方向攻击前进。第62军为战役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3页。

^② 平凉战役又称陇东战役。

预备队，归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20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扶眉战役的情况及举行平凉战役的部署。23日，毛泽东复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①，不必等到明春”。“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②

二、进行陇东追击作战，进逼兰州

平凉，位于甘肃省的东部“蜂腰”处和六盘山麓，居泾河上游，属黄土高原残塬沟壑区，深壑峭壁，关山险要，人烟稀少，气候多变，是东瞰关中，西通新疆，控扼西陲的要冲。因其具有“外阻河塑，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的作用，“关中安定，系于此也”。因此，平凉历史上又称安定。

第一野战军关于陇东作战的命令下达后，各部队均以较短的时间进行了战斗准备和政治动员，特别强调要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回族同胞，并专门制定了《宽待回民俘虏守则》。7月21日至24日，第19兵团和第1、第2兵团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区出发，按部署向预定地区挺进。

青宁两马面对第一野战军的锐利攻势，陷入战退难决的窘境。为保甘宁咽喉平凉，阻止第一野战军沿西安至兰州公路向甘肃、宁夏挺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决心组织平凉会战，并于7月24日派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关陇会战指导腹案计划”到静宁，召开军事会议，协调青宁两马所部，部署平凉决战。其要旨是：以陇县、平凉为战场枢纽，坚工踞守，确保天水、固原，

^①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4～第645页。

于杨家坪、利桥、野牛关、赤沙镇、草碧、天堂、灵台、长武、良平之线形成警戒地带，构成绵密封锁和监视；以徽当、燕子关、三岔山、石庄子、八渡、五郎庙、高岩、崇信、泾川、宁县、西峰等要点为抵抗地带，阻止第一野战军前进。具体部署是：宁马以第128、第11军共6个师和1个骑兵团、2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以平凉为中心，由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线，形成弧形防御地带消耗第一野战军；青马第82、第129军及第91军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待机向华亭、安口窑方向实施突击；胡宗南部适时从秦岭方向出击，协力各个击破第一野战军。

两马虽有会战计划，但都想“保存实力，拥兵自重，不能推诚合作”。^①会战计划一推出，对马步芳早有戒心的马鸿逵立即察觉自己被置于第一线，打头阵。按照这个计划，即使决战获胜，也将耗损宁马的主力，而青马则坐享其成；一旦决战失利，位居六盘山待撤的青马必定乘机逃走，被歼的仍然是宁马；加上马鸿逵见第一野战军置重兵于右翼，更是感到难逃被歼厄运，遂电令总指挥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宁马一撤，青马自感孤立无援，也随即西撤静宁。因此，马步芳的平凉决战计划即告破产。

在此期间，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于24日占领彬县、旬邑，至27日又攻占灵台、长武、泾川、正宁、宁县。第1、第2兵团进至陇县地区。

7月27日，彭德怀根据青宁两马已放弃在平凉地区决战，撤回各自领地以图节节抵抗的情况，决定乘势分割两马，各个歼灭之。令第19兵团继续沿泾川向平凉攻击，得手后向固原、海原方向发展，追歼宁马；第1兵团由陇县经固关镇、马鹿镇向张家川攻击前进，出秦安、天水，准备进占陇西；第2兵团沿张家川向龙山镇、莲花镇攻击，得手后出通渭和马营镇。

28日，各兵团遵照上述部署，分三路向陇东挺进。右路第19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下），第135页。

兵团沿西安至兰州公路两侧地区前进，29日占领崇信，该地国民党保安团队430余人投降，30日解放平凉、镇原；配合第19兵团西进的庆阳军分区部队，28日解放庆阳、长武间的西峰镇、驿马关。马鸿逵为保守宁夏老巢，将第128、第81、第11军等部撤至瓦亭、青石咀及固原以南之任山河地区组织抵抗。31日，第19兵团一部于平凉以北地区击溃其骑兵部队，俘300余人，8月1日，第64军及第63军第188师，骑兵第2旅等部，又于任山河地区击溃第81、第11军等部5个团，歼5000余人，在追击中，2日解放固原，3日解放隆德，6日解放静宁。迄11日，第19兵团进至黑城镇、海原、李旺堡一线，割裂了青宁两马的联系。

左路第1兵团沿天水、宝鸡公路西进，7月28日晨，以第1军及第7军1个师向扼守陇山要隘固关之青马骑兵第14旅等部展开攻击，10时许占领附近据点及两侧高地，守军狼狈逃窜，第7军展开追击，在三桥子以南地区将其大部歼灭，这一仗对马步芳震动极大。29日，第1兵团经马鹿镇、张家川西进，31日解放清水城，8月3日解放天水，俘守军2000余人。至8月10日，又先后解放秦安、甘谷、武山等地，守军第247师骑兵团、第245师1个营、甘肃师管区第3补充团1个营及武山自卫总队等部向第1兵团投诚。

中路第2兵团于28、29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8月3日，进至莲花镇、万家沟、陇城镇地区，4日一部解放庄浪，6日解放通渭。

至8月11日，第一野战军在19天的陇东追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19万人。其中，毙伤2500余人，俘第248师副师长马正魁、伪国防部少将部员杨典克以下5800余人，起义2100余人，投诚1300余人；毙伤战马700余匹，缴获骡马2500余匹，各种火炮65门、轻重机枪227挺、长短枪3900余枝及大批军用物资；解放县城22座及陇东广大地区。

此次作战，由于守军提前撤退，一触即溃，第一野战军未能

歼灭其主力，但严重挫败了青宁两马的锐气，彻底分割了两马的联系，造成第一野战军直逼兰州、西宁、银川的有利态势；为下一步各个歼灭两马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三、解放兰州、西宁，全歼马步芳集团

1949年7、8月，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已分别进军闽浙，前出赣南，挺进湘中，使踞守两广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在西北地区，第一野战军经过扶眉战役和陇东追击作战，重创了胡宗南部，分割了青宁两马的作战联盟。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政府极度恐慌，为保住西南一隅，苟延残喘，企图依靠胡宗南部和青宁两马牵制第一野战军主力，使其不能直越秦岭南下四川。为此，行政院长阎锡山于8月14日在广州紧急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拟制“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马步芳部依托黄河天险和兰州的坚固设防，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集结陇南徽县、成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4个军击第一野战军侧背，切断第一野战军后路，以三路夹击，将第一野战军挫败于兰州外围地区。同时，还策划将新疆警备总部陶峙岳部东移，参加甘、青、宁地区作战。会中，在阎锡山的极力调解和马步芳被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后，两马才开始旦旦信誓，表示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一同乘飞机回兰州共同指挥作战。但在飞机即将起飞时，马鸿逵又以先回宁夏部署兵力援兰为由，先回银川。于是，两马便又各自分飞西北。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麓而得名，古称皋兰，位于甘肃省的中部，它的西北面是河西走廊，东面是广阔富饶的河套平原，据于南北之中，为东西扼塞之处，自古是中原通往西北各地的要冲，因此，历史上军事活动频繁，文人墨客在兰州城留下不少颂扬山川形势及勇士戍边的诗词。清朝张澍的《金城关》诗中称颂兰州为：“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鸾幢影

出冈峦。”金朝邓千江的《望海潮》也把兰州描绘成：“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所在地，也是国民党统治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北是滔滔黄河，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尤其城南郊的南山，系全城的天然屏障，经马步芳的多年经营，修筑了大量的永备工事，主阵地和外围阵地，均构筑了能相互支援和掩护的钢筋水泥碉堡群，在阵地的外斜面还修有6至10米的环形人工峭壁1至2道，峭壁中部修有火力点，峭壁外有1至2道深宽各3至6米的外壕，壕外附设了大量的铁丝网和地雷。马步芳深知兰州决战是他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对坚守兰州进行了认真准备，储备了充足的粮弹，并确定了如下作战方针：“以一部沿洮河、黄河的西岸守备，置主力于兰州附近。如敌来犯，凭天然地障与既设阵地顿挫敌攻势后，适时转移攻势，依西安绥署之协力，一举歼灭犯敌。”^①

8月上旬，马步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带坚守兰州的作战方案到定西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如下部署：以主力第82、第129军及2个骑兵旅等部，共约5万人据守城区，其中以第82军的3个师分守兰州门户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以第91、第120军和马鸿逵部第81军共约3万人，于兰州东北的靖远、景泰及打拉池地区布防，保障兰州的左翼安全，并相机侧击进攻兰州的解放军；以新组建的骑兵军约2万人，以临夏为基地，控制临洮、洮沙地区，以保障兰州右翼安全。

马步芳认为，兰州是他设下的一个陷阱，解放军进入兰州地区后，在他的正面抗击下，宁马与胡宗南两翼出击，可全歼解放军于兰州城下。

根据国民党军的布置情况，彭德怀认为，马步芳在兰州的架式是妄图死守，第一野战军在兰州的作战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

^① 兰州战役敌情资料，第14页，存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把马步芳拖在兰州对第一野战军有利。他对部队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①

8月4日，第一野战军向正在进行陇东追歼战各兵团下达了向兰州、西宁攻击的预备命令：以一部牵制宁夏马鸿逵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甘地区之马步芳部，并准备歼击新疆可能来援之敌。其具体部署是：第1兵团（欠第7军）附第62军为左兵团，取武山、陇西、渭源、临洮，得手后渡洮河经临夏直取西宁，截断青马退路。第7军主力控制天水，与第18兵团打通天（水）宝（鸡）铁路，一部控制陇西，保护左兵团交通运输。第2兵团为中路，由莲花镇经通渭、马营、通安驿、内官镇、新营镇、马莲滩、洮沙（今为临洮县的一部分），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准备以主力于兰州上游渡河后，沿西宁至兰州公路东进，包围兰州守军。如守军先退西宁或北窜，该兵团应即西进，协同第1兵团进攻西宁或尾敌北追。第19兵团（欠第64军）为右路，第65军由隆德经静宁沿西兰公路、第63军由固原经兴隆镇、会宁、定西，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第64军控制固原及其以北，对宁马组织积极防御。第18兵团（欠第62军）任务不变。各部队于8月9日前完成进攻兰州、西宁的一切准备。

8月5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出《解放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党同志及全军指战员、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全军一致，勇往前进，为干净、全部消灭青、甘、宁三省匪军，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要求各部坚决执行命令，克服一切困难，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军；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群众纪律、少数民族政策和俘虏政策。

8月6日，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张宗逊：“预备命令，一般甚好，惟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且经临洮、临夏

^① 《彭德怀传》，第379页。

渡黄河直取西宁，系深入马家老巢，”青马残暴，“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须谨慎将事，大意不得，望以此意告王震为要。”^①

根据野战军的部署，各路大军冒着酷暑，分向预定目标进发。由于长途行军，地广人稀，又逢雨季道路泥泞，粮食、鞋子以及弹药接济不上，给部队带来许多严重困难，而缴获的粮食又没有时间磨面，只好煮麦粒为食，加上部队不适应西北高原气候，长时间露宿荒野、街头，不少人患上感冒、痢疾、疟疾等疾病，在重重困难面前，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在全国胜利大进军的鼓舞下，各路大军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向前挺进。部队所到之处，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纷纷起义和投诚。祖祖辈辈惨遭马氏家族统治的灾难深重的回汉同胞，愤怒控诉马家军的罪行。青年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消灭马家军。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做群众工作，广大回汉人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为部队腾房子、烧开水，送柴送水帮助做饭，并要求给部队带路，支援解放军打胜仗。

8月9日，右路第19兵团率第63、第65军和骑兵第2师，由隆德、静宁地区出发，沿西兰公路西进，第63军12日进占会宁，第65军占领华家岭，16日进至定西以北及西巩驿地区。至19日进至兰州东南25公里之定远、郭家庄地区。中路第2兵团于15日集结新营镇、内官镇，16日解放榆中县城，19日攻占兰州城南20公里的阿干镇后，按计划抵近兰州城西、城南。至8月20日，第2兵团和第19兵团从东、西、南三面逼近兰州。与此同时，向西宁方向进击的左路第1兵团之第1、第62军，16日占领渭源、陇西；第2军16日解放临洮县城后，连夜抢修被国民党军烧毁的洮河桥，渡过洮河，20日解放康乐县城，直逼临夏。为配合主力作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14页。

战，第7军解放西和、礼县。

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鉴于部队只是对兰州完成三面包围，北面黄河铁桥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之下，守军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因此，决定以第19兵团第65、第63军各一部共5个团的兵力对兰州东南之马家山、古城岭发起攻击；以第2兵团之第6、第4军各一部共4个团的兵力向营盘岭、沈家岭和十里山诸要点发起试探性攻击。但因部队由行进状态仓促投入战斗，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激战竟日，守军依托坚固工事拼死顽抗，双方均有不小伤亡，战斗未获进展。

外围战斗受挫后，第一野战军首长当即决定全线暂停攻击，各部队以3天时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侦察敌情、地形，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改进战法，克服轻敌麻痹思想。

经反复侦察，进一步摸清了守军的部署和工事情况。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是马步芳防御体系中的3个主要阵地，以主力第82军之3个师分别把守；第129军新编第1师防守城东之东岗镇；第357师防守七里河；骑兵第8旅位于黄河北岸机动。从守军的部署可以看出：主力控制南山主阵地，东西两翼薄弱，城内无预备队，黄河铁桥是其惟一的退路，因此，攻取南山是攻克兰州的重点，而迂回守军右翼夺取黄河铁桥，则是能否切断守军退路，全歼守军的关键。在确实查明守军部署的同时，各部队认真总结了试探性攻击中的主要教训：攻击部队组织火力不严密；步炮协同脱节，炮火射击不能满足攻击部队的要求；对守军防御工事缺乏细致详尽的侦察，没有依据地形严密组织爆破和冲击。试攻虽受挫折，但摸清了守军的部署、战术特点及工事情况，为下一步全歼马步芳集团打下了基础。

8月21日，野战军司令部针对作战情况，向各兵团发出战术指示，要求各部队对青马军的战斗力要有足够的估计，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进攻时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克服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进攻

中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的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须奏效；同时要做好抗击守军反击的准备，组织歼灭守军反击部队的火力，构筑抗击工事；集中优势的炮火射击一点，得手后再击另一点，密切步炮协同，炮兵须反复精细的侦察守军兵力火力的具体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对守军的外壕、陡壁，须用挖对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来破坏。

8月23日，毛泽东根据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情况，指示彭德怀、张宗逊：“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①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野战军各攻城部队调整了兵力部署，进行了认真的组织和准备。在此期间，担任左路任务的第1兵团，22日占领临夏，马步芳部新编骑兵军未战即溃，一部被歼，大部逃窜，至23日，又先后攻占宁定、和政，歼灭马步芳部1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严重威胁兰州右翼的安全。随后第1兵团于临夏地区一面准备参加攻兰战役，一面调查黄河渡口，修造船筏，准备于永靖、循化北渡黄河。在此情况下，马步芳紧急从兰州抽调骑兵第8旅和第14旅残部回防西宁。

8月24日，彭德怀、张宗逊致电中央军委并告贺龙、习仲勋：“遵照未梗电示，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兵团决从兰州上游渡河迂回兰北。”“宁马出动三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城可能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并周、黄两部共有十三万兵，据守坚城，我即集三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8页。

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不能持久，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部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如未解决青马军，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集结五个军打宁马。”“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二十五日晨开始攻击。”

8月26日1时，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二十四日电悉。（一）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三）如二十五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打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四个军或三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十八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地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援兰州前线的需要。”^①

第一野战军经过两天的充分准备，调整了攻击部署：以第63军一部攻击东岗镇并向响水河沿河警戒；以第65军和第63军一部进攻马家山，得手后向城东关发展；以第6军攻击营盘岭第248师阵地，尔后向城南关发展；以第4军向沈家岭的中狗娃山和下狗娃山攻击，得手后向城西关发展；第3军向七里河攻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于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向十里店进攻。各部队任务明确后，情绪高涨，纷纷争先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60页。

要求担任突击队，机关人员都参加了抬担架和前送粮弹等工作。

8月25日拂晓，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对兰州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第4军攻占被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主阵地，毙伤4700余人。在沈家岭战斗中，第11师第31团团团长王学礼率部连续突破守军两道防线，率先夺占主阵地，在左右邻部队的配合下，击退守军多次疯狂反扑，巩固了阵地。战斗中，王学礼及第30团政治委员李锡贵、第32团副团长马克忠等许多同志光荣牺牲。25日下午，第6军集中全军所有的炮兵，组成2个火力队，对工事最强的皋兰山主峰营盘岭阵地，发动猛烈轰击，将工事大部摧毁，但在守军火力封锁下，部队几次爆破突击削壁均未成功。第17师第50团第7连指导员曹德荣，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抱起炸药包，趁手榴弹爆炸的烟雾，迅速爬到削壁下，手托炸药包将削壁炸开，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开辟了前进的通路。到17时，攻击部队连续突破守军第2、第3道削壁，攻占了三营子和营盘岭。在此期间，第63军和65军经过艰苦的攻坚战斗，于25日午时和黄昏，分别夺占守军豆家山和马家山阵地。

南山诸阵地被攻占后，兰州城便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面前。仓皇逃往西宁的马步芳鉴于兰州屏障已垮，马鸿逵与胡宗南部又未出援，为保存实力，避免西退之路被切断，决定19时之后在夜幕掩护下，全线秘密撤退。其部署是：由第190师担任掩护，按第100、第248师、新编第1师、第357师、第190师顺序，经黄河铁桥西逃青海。

在马步芳部开始秘密撤逃时，被迂回兰州西关的第3军第7师发觉，第7师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机动灵活地迅速发起追击，其第19团第8连最先进到黄河铁桥附近，借助桥上灯光，集中火力封锁桥面，在火力引燃桥上一辆卡车后，堵塞逃敌退路，致使桥上一片混乱，不少国民党军士兵被挤下黄河淹死。在此同时，其他攻击部队迅速向七里河、小西湖、西固地区展开。至26日拂晓，攻击部队完全控制了兰州黄河大桥，各部队迅速攻入城内，与南

山溃入兰州城内之敌展开激烈巷战。战至 26 日中午，肃清城内残余守军，并以一部兵力通过黄河铁桥，攻占桥北白塔山、十里店以北高地，桥北残余守军分向永登、西宁逃窜。被马步芳称之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

在野战军主力攻取兰州的同时，担任牵制任务的第 18 兵团，乘胡宗南集团向西和、宝鸡、虢镇进攻之机，以第 60、第 61 军对其展开猛烈反击，歼其 3700 余人，其余匆忙回撤；第 64 军在海原地区牵制了宁马援兰兵团，使其不敢贸然南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攻克兰州的作战。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守军之凶悍顽强、工事之坚固，以及第一野战军集中兵力之多、火器之强，战斗之激烈，均是西北战场前所未有的。攻击部队每攻占一条壕沟、一道削壁，都要经过艰苦鏖战，反复争夺，多次展开白刃格斗。第一野战军经一天半的连续奋战，歼灭马步芳主力第 82 军 3 个师大部，第 129 军 2 个师一部及 3 个保安团，共 2.7 万余人。其中，毙伤 1.2 万余人，俘 1.37 万人，跳入黄河淹死 2000 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134 门、汽车 40 余辆、骡马 2400 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第一野战军伤亡 8700 余人。兰州战役的胜利，不仅歼灭了马步芳集团主力，而且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为下一步解放青海、宁夏、新疆打下了基础。

彭德怀司令员在战后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战，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 1500 余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英雄们为了人民的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第一野战军在总结兰州战役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攻兰作战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主要是部署正确，指挥坚强有力，战术应用得当，参战部队英勇顽强。在兵力部署上，除以一部兵力担任阻击可能援兰之敌外，集中了 2 个兵团的兵力担任攻城，并以 1 个兵团威胁马步芳西宁老巢，使他无论退守均难逃被歼厄运；在试

攻受挫后，部队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守军防御特点，进行了更加周密地部署和准备；发起突击时，各部队能密切协同，充分发挥火力、爆破、突击三者的整体威力，不攻则已，攻必奏效；担任右翼攻击任务的第3军第7师，发觉守军撤退时，能机动灵活地直插黄河铁桥，并用火力封锁桥面，断其退路。这次战役的主要教训是，开始有轻敌思想，试攻准备不足，致使部队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长期以来，马步芳集团为了反共和巩固反动军队的需要，利用青甘地区历史上民族矛盾，在军队和回族群众中进行欺骗宣传，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污蔑解放军要“杀回灭教”，在群众和军队中造成恐惧。第一野战军针对这种情况，在进军过程中，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部队所到之处，严守群众纪律，不进寺院，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帮助群众做好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被俘的青马军官兵，不杀不辱，有伤有病的给予治疗，并发给路费和证明，释放回家。人民解放军的这些行动，在各少数民族群众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很快消除了对人民解放军的误解和疑惧。临夏解放后，各界人士和群众纷纷写信规劝他们在马步芳军队里的亲友放下武器，投向人民。不少有识之士主动请求人民解放军同意他们组成劝降团，随同解放军一起做马步芳军队官兵的工作。这些，对分化瓦解青马部队起了很好的作用。

兰州解放后，为不给逃入青海之马步芳残部以喘息时间，根据野战军的部署，8月27日，第1兵团之第1军进至永靖黄河渡口，但守军在逃跑时已将铁索桥和船只破坏，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的皮筏，动员了一批水手，于8月28日开始起渡，至9月2日全军渡过黄河，经西马营、古鄯邑、红水店、平戎驿向西宁挺进。第2军于27日解放循化后，守军为阻止人民解放军追击，烧毁了古会郡黄河木桥和义马木庄仅有的2只木船及积存的木料。为迅速渡河，第2军各部队分头搜集木料、绳索，柳

札木排北渡。30日，第14团4个班和军侦察排在炮火掩护下，由草滩坝强渡成功，团主力迅速渡过黄河将守军击溃，全军顺利北渡。从9月2日至5日，第1兵团先后攻占和解放民和、享堂、甘都、平安驿、乐都、化隆等地。马步芳、马继援父子见大势已去，遂携大批黄金、白银先后飞逃香港。9月5日，第1军侦察部队600余人率先进入西宁。6日，第1军主力和第2军前卫师进入西宁时，受到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西宁解放后，逃往西宁尚武庄、大通、三角城（今海晏）、祁连等地的马步芳残部第82军第100、第190、第248师，以及第129军第357师和骑兵第8师等部，共3000余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过临夏劝降团的工作，先后向解放军投降。至此，马步芳集团彻底覆灭，青海除玉树、果洛地区外，其余地区全部解放。从8月12日至9月11日，第1兵团（欠第7军附第62军）在解放陇西、临夏、西宁过程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48万人。

四、第18兵团策应野战军主力夺取兰州，举行秦岭战役

在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集团被迫退守秦岭，为防其过早入川，第一野战军未对其立即进行追歼，胡宗南遂利用天险秦岭，在陕西安康至甘肃天水间地区，破坏通往陕中的道路，构筑工事，控制要点，设置障碍，构成所谓“秦岭防线”，企图利用天险护卫汉中，阻止第一野战军入川。其防御部署是：以第38军（辖第177、第55师）防守观音堂、东河桥、黄牛铺之线及其两侧秦岭主脉阵地；以第1军位于两当、成县及其以南地区，沿天水至双石铺公路两侧组织防御；第36军位于川陕公路以东之嘴头镇、江口镇、旧佛坪地区，并防守斜谷、骆谷两条古道；第5兵团部率第214、第78师和第90军为机动部队，位于凤县、双石铺、留霸地区。

秦岭，西起甘肃、青海交界的西倾山，东至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北连关中平原，南抵岷山、米仓山、大巴山和武当山，东西绵延约1500公里，南北宽100余公里，海拔多在2000米以上。它既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又是我国南北方的重要地

理分界，南北气候迥异，北麓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南麓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岭内山峰高耸，峡谷深切，人烟稀少。川陕公路自宝鸡以南之益山镇进入峡谷，经大散关、二林关，迂回盘旋而上 20 余公里至岭上，形势极为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及”之势。除川陕公路外，只有几条可通行单人的古驿道和樵夫、采药者攀登行走的羊肠小道。实为关中平原南部之天然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扶眉战役结束后，第一野战军主力在向兰州推进的同时，依据中央军委关于解决西北、西南问题的整体部署，除令第 18 兵团之第 62 军为野战军总预备队随主力西进，以第 61 军（欠第 183 师）仍于西安及以南地区整训外，以第 60 军和第 61 军之第 183 师位于宝鸡及外围地区，控制要点，牵制胡宗南部，并相机歼其一部。8 月中旬，野战军决定在主力攻击兰州的同时，由第 18 兵团发起秦岭战役，策应兰州地区的作战。

8 月 15 日，第 18 兵团召开会议，进行具体部署。会后，发出秦岭战役预备命令，以第 60 军和第 61 军 2 个师攻歼东河桥、黄牛铺地区守军，并相机攻占凤县、双石铺。东河桥距宝鸡西南约 50 公里，位于秦岭主脉与川陕公路交汇处，是控扼关中与汉中的门户。

8 月 22 日，第一野战军逼近兰州后，胡宗南为支援兰州马步芳部作战，除令第一线部队积极准备策应外，又将第 27 军从汉中调至两当、双石铺间地区作为预备队，26 日，又令第 18 兵团指挥第 1、第 65 军和第 90 军，由成县、徽县和两当地区，沿公路向天水进犯；第 38、第 36 军及骑兵第 2 旅统归第 38 军军长李振西指挥，分三路向宝鸡进犯。27 日，第 1 军先头进至成县以北之傅家坝、大山坝、大门镇及关峡口地区；第 90 军一部进至徽县北之党家川、观音殿；第 65 军残部及第 167 师则进占西和县城。同日，沿川陕公路进犯的第 177 师附骑兵第 2 旅 1 个团，进至马头镇以南之七里沟地区时，遭解放军阻击，被迫停止前进；沿公路北进

之第55、第123师和第28师1个团，进至荞麦山地区，28日被解放军第61军第181师第541团阻击于高家河、杨家岭地区；沿马峪河向宝鸡以东进犯的第28师被阻击于虢镇以南之白雀寺、小寨子地区。

由于胡宗南部首先发起进攻，第18兵团根据新的情况，遂调整了战役部署，以第60军首先攻歼伸入七里沟地区之第177师及骑兵第2旅等部，尔后向川陕公路咽喉东河桥、黄牛铺地区发展；以第61军2个师并附兵团炮兵团，位于宝鸡、益门镇、虢镇地区暂取守势，准备从正面出击，配合第60军行动。

8月29日14时，第60军向七里沟之胡宗南部第177师展开攻击，30日拂晓，第178师攻占七里沟以西秦岭要点；第180师和179师分别占领汉王丞、狗头寨、隘口、庙儿沟、罗家山。胡部第177师及骑兵第2旅各一部被歼后，即以部分兵力于清风寺地区扼山隘要道节节抵抗，大部向黄牛铺及北星街地区逃窜。第60军遂即沿川陕公路发起追击。至30日晚，各部先后占领东河桥和宽滩、北星街、黄牛铺，一部攻占清风寺和红花铺，胡部第177师继向新厂和老厂方向逃窜。第61军两个师及兵团炮兵团按预定计划，于30日拂晓，对川陕各要点展开攻击，胡部第38军第55师和第36军分别据险抵抗，10时许，第61军先后攻占观音堂和秦岭主峰东河桥隘口，以及大王岭阵地。第38军第55师和第36军除一部被歼外，余部逃往沙霸、进口关。至此，胡宗南精心设置的秦岭防线已为解放军全面突破。

8月31日，第60军和61军部队在东河桥会合后，兵团决定第60军率第179、第178师继续沿川陕公路及公路以西向凤县、双石铺方向追击；第61军指挥第181、第183师和第60军第180师，经河口洞、安河寺、沙坝、甘草沟、天台山，分向核桃坝、进口关、咀头镇方向勇猛追歼逃敌。各追击部队接令后，冒着连绵的秋雨，许多干部战士打着赤脚扛着迫击炮和重机枪，沿着崎岖的山路猛追。由于部队的前进速度很快，后方供应跟不上，很多

部队只能以生马铃薯和生包谷充饥，但在胜利的鼓舞下，全体指战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翻山越岭追歼逃敌。经 10 余小时的连续追击，至 9 月 1 日，追击部队分别进至核桃坝、进口关、王家楞、黄李园、王家台和唐藏以北，一部进至白石铺。2 日，第 60 军 1 个团攻占凤县城北凤凰山后，胡宗南紧急由两当车运第 27 军一部至凤县组织反击，退守王家楞、黄李园、丁家坪的第 36 军在得到支援后，也继续组织顽抗，加之山区严寒已至，后方供应困难，第 18 兵团遂于 9 月 6 日下达停止进攻命令，秦岭战役即告结束。

秦岭战役从 8 月 29 日开始，至 9 月 6 日结束，历时 8 天，共歼胡宗南部 4900 余人。其中，毙伤 1500 余人，俘敌 3300 余人。第 18 兵团伤亡 789 人。秦岭战役，有力地保障了野战军主力在兰州地区的作战，并摧毁了胡宗南集团“秦岭防线”，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门户，为尔后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战中，由于各参战部队在战前针对秦岭的地形特点，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术思想上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使作战预案与实战情况基本相付；在追歼逃敌的过程中，各部队又高度发扬了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顾疲劳、不分昼夜、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9 月 11 日，在中共地下党的政治争取下，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在岷山县率第 173 师、甘肃保安第 2、第 5 团，师管区直属第 1、第 2 大队，补训第 4 团等部共 6000 余人通电起义，归向人民。

第五节 进军宁夏、河西，全歼马鸿逵集团及河西走廊之国民党军

一、第 19 兵团进军宁夏，解放银川

宁夏跨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海拔千米以上，地势南高北

低。其大部为沙漠、黄土和草原履盖，黄河由甘肃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中部地区，使其形成一片绿色的冲积平原，这就是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著名富庶区“河套”西套地区，宁夏首府银川就座落在这里。

兰州战役后，马鸿逵、马鸿宾率部退守宁夏。此时，宁马尚有4个军约7.6万人，其中马鸿逵部3个军约6万人，马鸿宾部1个军1.6万人。宁夏是马鸿宾、马鸿逵的发迹地。二马同出一宗，是叔伯兄弟，两人虽以兄弟相称，但历来关系紧张，宁夏主要被马鸿逵控制，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残杀人民，从来没有做过好事。马鸿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长期受马鸿逵排挤，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鸿宾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地区与傅作义将军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军。1947年4月，其第81军第179团被歼灭后，彭德怀亲自接见了被俘团长马奠邦，并让他带了一封信给马鸿宾，诚恳规劝其再勿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并要其释放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马鸿宾见信后立即释放了关押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一野战军进军甘肃后，马鸿宾深知以其自己现有的力量，是无法抗拒解放军进攻的，因而有起义的意向。

根据对西北国民党军必须采用政治方式和战斗方式相辅的方针，及宁夏两马的情况，毛泽东在8月6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必须给马鸿逵以歼灭性的打击，然后用政治方式解决之，并将进军宁夏的任务交给了第19兵团。9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人，指出：对马鸿逵应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该部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同时指出，请考虑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其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为了争取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通过傅作义、邓宝珊做马鸿逵、马鸿宾的工作。第一野战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安解放后，即派第19兵团联络部长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派马鸿逵原驻西安办事处少将交通处长回宁夏做马

的工作。兰州解放后，中共西北局又请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威望和影响的郭南浦先生（又名郭均三），前往宁夏做争取工作。但马鸿逵拒绝和平解决宁夏，仍想继续顽抗；而马鸿宾则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还存有一定疑虑，尚未定下起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野战军决定在兰州战役结束后，第19兵团稍事休整后即向宁夏进军，给宁夏二马以军事打击，迫使其和平解决宁夏问题。

这时，马鸿逵为保住宁夏，迅速将“援兰兵团”撤至中宁、金积、吴忠堡和灵武地区，并设置了三道防线：以骑兵第20团守同心，第81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1旅守景泰，构成第1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81军主力守中卫，形成第2道防线；以第128军守金积，第11军守灵武，构成最后一道防线。妄图凭借有利地形，采取分区防守、纵深配置、层层抵抗的方法，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

但马鸿逵也深知依其现有力量是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的，因此在9月1日应蒋介石电召飞赴重庆后，再未返回。临行前他将军政大权交给他的儿子马敦静。9月5日，马敦静根据马鸿逵的命令，在吴忠堡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破坏青铜峡公路，占领牛首山阵地，必要时执行放水计划，并部分调整了兵力部署。

9月1日，第19兵团根据野战军进军宁夏的命令，下达进军命令，确定第一步首先截歼中宁守军。其具体部署是：以第63军1个团并附军工兵营和第65军工兵营组成先遣队，于9月2日出发，负责扫清残匪，整修道路，筹集粮秣任务。军主力于7日出发，以4日行程进至靖远以北地区，尔后以一部向北经陡城堡、水泉扫清残敌后，沿公路东进，主力经打拉池向中宁攻击前进，第188师于7日沿黄河北岸，在军左侧向中卫推进；以第65军（欠工兵营）8日经贡马井地区、郭城驿、黑城子、靖远、打拉池，随第63军后跟进；第64军侯兵团主力进至靖远地区后，主力经红

寺堡向中宁东北推进，截断中宁守军退路，协助第 63 军夹击中宁地区国民党军。

9 月 5 日，第 63 军第 187、第 189 师沿黄河南岸，第 188 师沿黄河北岸，成钳形之势向宁夏推进，沿途守军均成惊弓之鸟不战而逃。15 日，第 188 师进占景泰县城，守军新编骑兵第 1 旅旅长张钦武率部千余人投诚，16 日，继向中卫进击；第 187 师冒着狂风暴雨翻过香山，于小炉子、靖远两地区歼守军 700 余人后，又于常乐堡、枣林子地区截歼第 81 军第 294 师第 881 团和第 35 师第 103 团全部，共 2000 余人，当日攻占高家滩渡口，从河南接近中卫。

右翼第 64 军并指挥西北军区独立第 1、第 2 师，从 9 月 10 日起由固原、七营、海原地区北进，行进中独立第 1、第 2 师由于麻痹，在豫旺堡、下马关地区遭第 128 军第 257 师及骑兵第 10 旅等部击袭，受到较大损失；12 日拂晓，第 190 师在击溃守军骑兵第 20 团后，解放同心县城。13 日，第 191 师由同心城向北，通过百余里的荒漠草原，翻过 2000 余米的高山，于 14 日进占中宁以北重镇鸣沙洲和黄旗营、薛旗营，敌贺兰军闻风西逃。14 日中午，第 190 师进占中宁。至此，第 19 兵团突破马鸿逵部第 1 道防线，从黄河南北两岸进入河套地区。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马鸿宾于 9 月 17 日到包头与傅作义详谈，表示只要和平不打，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能使第 81 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并要求解放军先停止作战，以便进一步商谈。9 月 17 日，黄河南岸的第 64 军炮兵团向对岸守军第 81 军的碉堡和公路上往来的汽车发动猛烈的炮火袭击。第 63 军第 188 师进占中卫沙坡头附近的黄家庙、迎水桥地区后，即做好进攻中卫的准备，并利用守军撤退时未及拆除的电话线，劝告第 81 军军长马惇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马惇靖表示愿意起义，并于 18 日派少将师长马培清为代表前往中宁县城，同第 64 军联络部长牛连璧商谈，

草拟了和平起义协定条文。19日，马惇靖到中宁，与第64军军长曾思玉在《和平解决协议》上签字，宣布起义。第81军的起义，使马鸿逵组织的第2道防线宣告瓦解，并沉重打击和孤立了马鸿逵集团。第81军起义后，12月19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该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在起义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马鸿宾，被任命为银川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为挽救败局，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遂将所属的3个军11个师，重新调整部署：将贺兰军（欠保安第1师）和第11军（欠第256师）撤向银川、灵武和宁塑地区，并在黄河以东分4个地区组织防御；以第128军附第256师位于灵武；保安第3师位于吴忠堡；第356师及骑兵第20旅位于金积地区；保安第1师位于金积以西及牛首山、老山地域。

根据上述情况，第19兵团决定首先歼灭金积、灵武地区的第128军。其部署是：以第64军附兵团机械化营、战车队，并指挥第65军第195师、西北军区独立第1、第2师为主攻，歼灭金积、灵武地区守军；第63军和第65军主力由中宁地区北渡黄河，对贺兰军发动攻击，策应第64军在河东作战。第64军的攻击部署是：以第191师首先攻取牛首山，尔后从西、南两个方向向金积攻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守军；第192师指挥兵团野炮营经滚泉，从南和东南两个方向向金积攻击，协同第191师歼灭金积守军；独立第1师及第571团沿豫（旺）灵（武）公路攻击前进，迂回吴忠堡；以第190、第195师为军第二梯队，随主力后跟进。预定攻击发起时间为19日11时。

9月18日晚，第191师第573团袭占东寺，占领并控制了金积、灵武的锁钥之地。19日，第64军按计划发起攻击，12时第191师攻占青铜峡口，至16时又先后占领养马渠南岸、于家桥和黄营，迫使守军退缩金积。20日，第192师击退骑兵第38团的阻击，攻占王家桥、田家桥，逼近金积外围，将第356师围困城内。

接着，第191师和192师除各留一部兵力继续围困金积外，主力转向吴忠堡，第190师兼程向金积推进，接替第191师和192师围困任务。21日6时，第64军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以勇猛动作，由东南门和清水河地域，突破守军防御，于11时攻占吴忠堡，歼保安第3师大部。随后，第192师主力又转向灵武攻击，17时攻占东关和南关并于仁存渡俘守军一部，19时突入灵武城内，守军第256师5000余人缴械投降。金积被围之第356师在援兵无望、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亦全部投降。

金积、灵武作战，歼灭了马鸿逵集团主力第128军，俘73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4门及大批的军用物资，使马鸿逵的防线彻底崩溃，首府银川完全暴露在第19兵团的进攻面前。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见大势已去，遂步其父后尘乘飞机逃离银川，马家军陷入一片混乱。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宁马高级将领进行了紧急磋商，确定由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128军军长卢忠良、第11军军长马光宗等领衔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发出要求停战听候改编的通电。9月21日，彭德怀复电，对宁马诸将领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并令其派代表赶往中宁同第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具体洽谈。23日，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与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分别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1. 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2. 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3. 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4. 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在第19兵团与宁夏方面签定协议期间，驻银川及大小坝地区之第11军、贺兰军相继溃散，散兵游勇在银川城内骚扰滋事，四处抢劫，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在此情况下，马鸿宾紧急致电彭德怀，要求第19兵团迅速派兵进驻宁夏。据此，彭德怀即令第19兵团先派1个师进驻银川城，维持社会秩序，安定民心。23日晚，第64军第191师第572团由仁存渡过黄河，乘宁夏代表带来的40余辆汽车，连夜进驻银川城，控制了市区。24日，第64军军部率第191师主力进入银川，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宁夏战役从9月2日开始，至23日结束，历时22天，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毙伤780人，俘2万余人，起义和投诚2万余人，余者大部自行溃散。第19兵团伤亡700余人。到9月底，全境16个市、县、旗全部获得解放，饱受马氏家族统治的宁夏各族人民从此获得新生。

二、第1、第2兵团举行河西战役，解放甘肃全境

兰州解放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国民党军第91、第120军等部4万余人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逃窜。逃亡中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认为，解放军攻下兰州后，必将转锋南下，进取四川，不会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会立即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他们还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再行反攻。

为防止溃散之军退入新疆，增加进军新疆的困难，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2兵团及第1兵团部率第2军发起河西战役，奋力追歼河西走廊国民党军，打开进军新疆的通道。其部署是：以第2兵团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地区西进，其中第6军为右路，绕乌鞘岭和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第3、第4军附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以第1兵团第2军沿西（宁）张（掖）公路北上，翻越祁连山直取张掖。

河西走廊亦称甘肃走廊，地处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连接地

带，东邻黄土高原，南依祁连山脉，西近塔里木盆地，北靠北山山地，是祁连山脉与北山山地间的狭长地带，因地处黄河以西，形如长廊故名。该地区因是沟通内地与新疆的交通要道，自古为咽喉要地。早在唐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就由这里通过，是中国联系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主要陆上通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

9月4日，第2兵团由兰州附近出发，所到之处国民党军纷纷投诚或逃窜。第3军由享堂、河桥驿向永登西进，先头第9师解放永登后，翻过乌鞘岭，解放安远驿；第4军由安宁堡、沙井驿沿兰新公路向永登推进，8日进占大通堡、大柳树，溃散永登以西之骑兵第8旅第25团残部投诚；第6军由哈家咀、小涝池向松山、大靖推进，部队进占松山时，第91军第191师骑兵团800余人投诚。13日，第2兵团全线出击，第6军沿兰新公路东侧，取道大靖、土门子向武威前进；第3、第4军继续沿兰新公路经古浪向武威挺进。当日，第3军进占古浪，14日，第6军占领大靖。16日，第4军侦察部队于武威以南之李家庄地区击溃第173师骑兵团后，占领武威。17日，第3军第9师先头第25团到达武威，在武威附近地区，第91军骑兵团和第246师骑兵团等部共1700余人投诚。到18日，第2兵团全部集结武威及以北地区。19日，第3军先头部队进占永昌。第4军先头部队经17天急行军行程700余公里，于21日进占山丹，并在山丹以西之东乐镇接受国民党军联勤第8补给区监护营及第173师残部600余人的投诚。接着，为促进酒泉地区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第2兵团决定集中各军骑兵部队组成兵团骑兵支队共800余骑，及兵团战车营和1个步兵营加强6门山炮，分乘20余辆汽车，组成快速部队，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率领，于21日由武威出发，向张掖挺进。

9月10日，第1兵团部率第2军由西宁附近地区开始北进。12日，前卫第5师越过大板山、渡过大通河，14日进入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时，突遇狂风暴雪，因部队缺乏防寒用具，冻死、冻伤200余人，但恶劣的气候未能阻挡奋勇直前的英雄战士，他们

冒着奇寒翻过海拔 5000 余米的祁连山，越过 110 公里的荒芜草原，经 28 小时的连续行军，于 16 日进占俄博。17 日，第 5 师 14 团指挥 2 个营，以突然动作将兰州逃至民乐之骑兵第 15 旅旅部及第 32 团残部包围，经 1 小时战斗将其全歼，俘旅长、团长以下 349 人，毙副旅长以下数十人。民乐距张掖约 50 公里，民乐之战后，逃至张掖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深感危机，立即抽调公署警卫团乘车驰援，妄图配合逃至六坝之第 120 军第 245 师第 735 团阻止第 1 兵团北进。18 日，第 5 师在三堡地区击溃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后，又在追击中于六坝全歼第 245 师第 735 团，俘团长以下 300 余人，毙 200 余人，缴获汽车 6 辆。19 日，第 5 师进至张掖新湾时，得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已经西逃，而沿兰新公路西逃之第 120 军第 245 师 2 个团，正向张掖撤退。第 5 师决心乘其人疲马乏之机发起攻击，经 10 多分钟战斗，即将逃入张掖南关之第 245 师第 733、第 734 团以及保安第 3 团 2 个连全部歼灭，俘 759 人，缴获战马 600 余匹。

第 5 师占领张掖后，切断了后续国民党军西逃之退路。19 日晚，逃至周家庄的第 91 军第 246 师第 736 团共 700 余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降。20 日，第 120 军第 173 师骑兵团亦放下武器投降。9 月 22 日，第 2 兵团快速部队抵达张掖与第 1 兵团第 2 军胜利会师后，继续挥师西进。此时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后勤单位，以及第 91、第 120 军残部，已溃不成军，士气极为低落，进入酒泉地区后，更觉秋阳已淡，退路已至长城尽头，在兵员、物资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内部分崩离析，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日益尖锐。

为争取和平解决河西地区的国民党军，毛泽东于 9 月 21 日致信张治中：“关于周嘉彬、黄祖勋^① 两将军，自向甘、凉、肃州^② 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将军注意与该两将军联络，不

^① 周嘉彬、黄祖勋，分别为国民党军第 120、第 91 军军长。

^② 甘、凉、肃州，即今甘肃张掖、武威、酒泉三地。

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要紧的是，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兰州谈判，表示诚意”。^①张治中接信后，于22日将内容转告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鲍尔汉，在陶峙岳的按排下，酒泉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于当日赶至张掖，向第1兵团王震司令员表明和平解决河西的愿望。当晚，王震令部队暂停发起攻击，并派第5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到高台第246师防地，与正在此间积极组织起义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以及第246师师长沈芝生会谈，并传达了王震司令员关于驻高台、酒泉地区的国民党军原地待命，听候改编，确保玉门油矿安全的命令。彭铭鼎当即同意人民解放军所提条件，并决定乘夜将部队撤至酒泉附近，待命通电起义。在此形势下，周嘉彬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相继乘飞机逃往重庆。黄祖勋率少数亲信经青海逃向西南，后在云南被俘。

9月24日，在彭铭鼎、曾震五及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等人的率领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第91、第120军残部，以及第8补给区司令部、河西警备总司令部、整编第42师第231旅等部，共3万余人在酒泉起义。25日，第2军第5师由高台、张掖等地乘车进入酒泉，受到酒泉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以一部进驻敦煌、安西等地。第3军快速部队在黄新廷军长的率领下，25日进入老君庙顺利接管了玉门油矿。至此，河西走廊地区全部解放。

河西追击作战自9月2日开始，至9月28日结束，历时27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内投诚、起义3.5万人），解放县城16座。河西战役的胜利，不仅解放了河西走廊大片地区，而且为进军新疆开辟了胜利通道。

9月27日，第1、第2兵团在酒泉，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①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776页。

制度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通过阶级教育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后，广大起义官兵绝大多数改造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士，为进军新疆增加了新的有生力量。

第六节 新疆和平解放

一、新疆的基本情况，陶峙岳、鲍尔汉领衔起义

新疆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面积有 160 余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的 1/6，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脉，由于天山横贯中部，又在北部和南部地区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水源奇缺，气候干燥，沙漠的边缘多为戈壁荒漠，盆地的边缘多为草原。新疆的西部、北部和东北部分别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原苏联（现为：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接壤，陆上边界线约占全国的 1/4，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等共 13 个民族，人口 410 万。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新疆一直是一个资源丰富，但经济十分落后的地区，交通闭塞，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手工业也不发达，各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一批共产党人就来到新疆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派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到新疆工作，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44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和苏联的支持下，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爆发了革命，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并在翌年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武装统一整编为民族军。到 1949 年，部队发展到 1.4 万人，武装斗争的区域扩展到南疆阿克苏和北疆的玛纳斯河两岸，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军事行动。

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1、第2兵团在河西战役结束后，于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积极准备向新疆进军。当时新疆国民党军的部署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驻迪化，直属骑兵第4旅辖2个团驻莎车，骑兵第9旅辖2个团驻喀什，独立骑兵第8、第9、第10和第11团分驻迪化、杜温克勒、焉耆、统福寺等地区；整编第42师师部驻疏勒，第65旅驻阿克苏、第128旅驻焉耆；整编第78师师部驻景化，第178旅驻哈密，第179旅驻迪化，第227旅驻绥来；整编骑兵第1师师部驻迪化，第6旅驻吉昌，第7旅驻奇台；总兵力共7万余人。新疆国民党当局在外有重兵压境，孤立无援，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分化成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晋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等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赞成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积极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但却遭到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恕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穆罕默德·伊敏、以及原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省政府秘书长艾沙和阿山公署专员乌斯满、哈密公署专员尧乐博斯等反动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们在美国驻迪化副总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妄图以其掌握的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

中共中央对新疆的局势一直十分关注，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在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争的创伤，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兼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时，指出：“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

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①为促进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的工作,当月,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前往新疆。15日,邓力群抵达伊宁后,即同三区临时政府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等接触,并开设电台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有关情况。

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了张治中将军,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峙岳、鲍尔汉:“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并叮嘱其“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②

因5月份后张治中与陶峙岳、鲍尔汉失去电台联系,9月12日,中共中央将张治中的电文电告邓力群,并要其设法转交陶峙岳。9月15日,邓力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峙岳、鲍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放新疆的态度。陶、鲍二人均表示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款。

17日,陶峙岳、鲍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并说:“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一俟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反动分子离开后,“即由陶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并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力群转呈毛主席。^③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5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页。

^③ 《张治中回忆录》,第584页。

9月19日，鲍尔汉致电毛泽东，表明决意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与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以完成全新疆之和平起义。23日，毛泽东复电鲍尔汉：9月19日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①

此一时期，新疆的爱国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斗争极为尖锐复杂。早在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就鉴于当时的反革命内战所处的不利形势，曾多次电令陶峙岳，除留1个旅于新疆布防外，其余部队全数调至江南，参加长江防御。陶峙岳等爱国进步力量为抵制和搪塞国民党当局的命令，特意编造了一个反动当局根本办不到的800万银元的预算计划，呈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乘机指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核实人马，勘察补给线路，举办军官训练班，调整部署，安排爱国军官和部队进驻安西、镇西和玉门油矿，造成部队东移模样。兰州和西宁相继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挺进河西走廊，直叩新疆大门，新疆的反动首领已成惊弓之鸟。美国驻迪化领事派克斯和副领事马克南公开召集会议，并向反动分子发放枪支弹药，马克南甚至与乌斯满、贾尼木汗等叛乱分子逃入山区，妄图与人民解放军对抗。

在上述形势下，陶峙岳依据中共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团结新疆的爱国人士，争取广大官兵，另一方面向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分析形势，指明前途，劝他们或参加起义，或携自己的财物离开部队，离开新疆。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马呈祥在得悉其家眷已逃至香港后，遂于9月24日与第179旅旅长罗恕人带少数亲信出走，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也于25日晨离开迪化，他们都先后经南疆逃往国外。

25日上午，陶峙岳在警备总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任命莫我若为整编第78师师长、韩有文为整编骑兵第1师代理师长，刘

^① 《毛泽东年谱》，第577页。

抢元、罗汝正、陈俊分别担任第 178、第 179 旅和第 128 旅旅长。会后，由陶峙岳领衔，各师、旅长联名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电起义。通电说：“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①26 日，鲍尔汉也率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为稳定新疆局势，27 日，陶峙岳、鲍尔汉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同心协力自觉维持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保护国家财物。陶峙岳、鲍尔汉的通电起义，宣告新疆和平解放。

9 月 28 日，毛泽东、朱德复电陶峙岳、鲍尔汉，高度赞扬他们真诚的爱国壮举，电报说：“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②

二、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

陶峙岳、鲍尔汉等人通电起义，实现了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新疆和平解放。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民党在新疆军政部门安插有不少的反动分子和特务，他们与在新疆境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竭力破坏和平解放，狂妄地叫嚣要和人民解放军打到底，打不赢时就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政策，绝不让解放军不战而得到新疆，绝不让新疆毫无破坏的落入解放军之手。为此，他们计划乘解放军尚未进疆之际，策动叛乱，企图将新疆从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在他们的策划下，短短的时间内哈密、吐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 587 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 579 页。

鲁番、焉耆、库车等地相继发生多起叛乱和抢劫事件。事实说明，要巩固新疆和平解放的成果，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在人民解放军未进入新疆之前，是不可能的。

为迅速进入新疆，完成改编起义部队、镇压可能发生的叛乱，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命令第1兵团部率第2军和第6军（欠第18师）执行进军新疆的任务。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向第1、第2兵团及第2、第6军党委发出了关于《入新工作指示》，指示指出，“新疆是我国边疆最大的一个行省，油源及其他矿藏极富，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四百余万人民仍处在帝国主义走狗中国反动派的蹂躏之下，全体人民迫切盼望我军迅速进军解放他们。新疆的反动派遭受人民反对及士兵厌战威胁，其上层最反动分子马呈祥、叶成等逃跑，陶峙岳等通电求和，这支七八万军队的士兵，亦热烈盼望早获解放。虽然敌人已经表示投降，但新疆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敌军中尚有反动派，我们仍须充分做战斗准备，以防万一。消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最后残余力量，解放祖国边疆，并开发油源，建筑铁路并与苏联连成一片，对于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一永垂不朽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将很光荣的落在一、二兵团之二、六两军、装甲车营的身上。”指示区分了进军的任务：第2军进军北疆之哈密、奇台、迪化、伊宁；第6军进军南疆之吐鲁番、焉耆、库尔勒、阿克苏、和田、于田。指示还要求除准备各地区之地方干部外，还须准备改造陶峙岳4万军队的政治干部；并在各部队中进行少数民族政策及生活习惯教育，并切实遵行；要求部队进行必要的在沙漠地区行军作战及宿营教育训练。指示还要求1兵团部和第2军及装甲车营，须于10月20日以前准备完毕，第6军于11月1日前准备完毕，待命出发。

第1、第2兵团遵照野战军前委的指示，组织部队认真进行了进疆准备，并提出了力争和平进军新疆，不能放松战斗准备，只有进行战斗准备，才能保证和平进军新疆的胜利。根据进军需要，

第一野战军决定第2兵团第6军转隶第1兵团指挥，第1兵团之第7军改隶第2兵团指挥。

10月4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从兰州到达酒泉，出席第1兵团党委扩大会议，部署进疆工作。会上，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作了关于新疆情况的报告；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就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作了重要讲话；彭德怀司令员对进军新疆的部队提出了四项要求：1. 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搞好与新疆民族军的团结，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团结各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2. 对起义部队采取诚恳、热情的欢迎态度，帮助他们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3. 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加强中苏友谊，学习苏联，建设新疆。4. 发扬解放军爱护人民，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

10月5日晚，陶峙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受到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的热情欢迎。彭德怀在与陶峙岳见面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并说：“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①并希望他带好部队，共同努力，把新疆的工作搞好。

7日，彭德怀、甘泗淇、王震、许光达等与陶峙岳、郝家骏、彭铭鼎、曾震五进行了会谈，陶峙岳汇报了新疆的政治、经济和部队情况，并共同商定了人民解放军的进疆，起义部队的改编，以及各级政府和军区机构的组建等问题。会谈后，彭德怀还请陶峙岳向第1兵团的师以上干部介绍了新疆的情况。鉴于当时新疆形势动荡不安，起义部队中的反动军官不断制造叛乱，陶峙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入疆稳定形势。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峙岳的会谈情况。

进军新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气候复杂、地况艰险，供应困难，加上边疆的冬天已经到来，更给进

^①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387页。

疆部队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酒泉至迪化 1253 公里，由迪化到伊宁 698 公里；从酒泉到喀什 2547 公里，由喀什至和田 514 公里，沿途都要经过浩瀚的戈壁沙漠。新疆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交通工具又非常缺乏，缴获的汽车大都破旧不堪，辎重粮秣尚不能全部运载，入疆部队多数要靠徒步开进。

为胜利完成进军任务，彭德怀对历史上唐玄奘西土取经，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镇守边关，以及左宗棠率部进入新疆的路线，都逐一进行了调查，并作了深入研究。在认真听取了部队指战员的建议后，与王震一起主持拟定了进军新疆的具体方案。决定：进疆部队于 10 月份开始行动，在第二年 3 月底以前完成接防和改编起义部队。其具体部署是：以战车第 5 团率战车营附 1 个加强步兵连组成先遣支队，进军迪化，担任市区和机场防务；将第 2、第 6 军任务对调，由第 2 军分成 2 个梯队由 480 辆汽车轮番向南疆运送，负责接管喀什、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库尔勒、且末、若羌等地防务；第 6 军分由飞机和汽车运输，迅速进入哈密、吐鲁番、奇台、绥来（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和迪化等地，主要负责接管北疆、东疆防务。

与此同时，第 1 兵团抓紧时间进行了进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各级党委都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指战员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将革命进行到底》，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高了对进军新疆战略意义的认识，激发了部队的革命斗志，全军上下掀起了表决心，订立功计划的热潮，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后，更加鼓舞了部队，为进军新疆增添了无穷力量。与此同时，调整了各级组织和一些师团领导干部；从起义部队中选调补充兵员 8500 余人；整顿了一些连队的作风纪律。10 月 5 日，第 1 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宣布了向新疆进军的命令。兵团党委向部队发出了“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战斗口号。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和

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政策，第1兵团政治部还编写和印刷了大量的宣传教育材料，并派第2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带领部分干部，先期进入迪化、焉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开展工作。

准备工作中最重要和最繁重的是物资和运输力量的筹集，需要量极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从东北地区调集皮帽10万顶，皮衣3.5万余件；为保证进疆物资和人员的运送，中共中央向苏联租用运输飞机45架，中央军委先后从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地区抽调汽车400辆，组建了2个汽车团，又从华北军区抽调100余辆，第1兵团也从河西起义部队和新疆筹集到420辆，加上第2军原有的130辆，使汽车达到1000余辆。这些汽车除部分用于西安、兰州及酒泉间的物资转运外，其余全部用于进疆运输。各部队还补充了骡马、骆驼等，组建了骡马大队，修造了大量木轮大车，用作短途运输。为了保证进疆部队的物资供应和使运输工作紧张有序的进行，第1兵团在酒泉成立了甘新物资供应站，成立了运输司令部，由曾震五和张英明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实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酒泉、哈密设立了空运指挥所。

由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两线铁路尚未修通，进疆部队的冬衣仍滞留华北。为不影响部队进军，第1兵团后勤部门利用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军工厂，日夜不停地赶制棉衣。酒泉地区的人民群众也急人民子弟兵之所急，积极帮助部队筹集粮草。经过前后方20多天的共同努力，筹粮3.3万吨、饲料380余吨、饲草80余吨、汽油1600余吨，以及棉衣、棉鞋、皮帽、袜子、水壶等各15万余件，皮衣5万件，帐篷1000顶，基本上保证了进疆部队的需要。根据行军要求，部队规定每人携带4天的熟粮和5天的生粮，沿途设立8个大休息站和2个大补给站，负责途中部队的粮食、草料和油料供应。

经过认真准备之后，进疆部队便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等

方式，开始向新疆进军。10月10日，第2、第6军由1000余人组成的若干支骡马大队，赶着7800余匹骡马，首先从酒泉地区起程，向新疆进发。行前，王震司令员特别指出，“骡马这支力量是我们屯垦和保卫国防的本钱，一定要派得力干部和有经验的饲养员护送，绝不能让牲口受到任何损失。”各骡马大队没有辜负第1兵团首长的期望，历经千辛万苦，穿过茫茫戈壁荒漠，最远的行程达2800余公里，历时2至3个月，分抵哈密、迪化、喀什等各指定位置。

同日，兵团先遣支队率战车营和加强步兵连，先期西出玉门，穿过星星峡，13日进至东疆首邑哈密。哈密驻有起义不久的国民党军第178旅，因指挥权被几个并非真心实意起义的反动分子把持。先遣支队到达后，他们以为该支队人数不多，又经长途跋涉，疲乏劳累，密谋将战车营安排在该旅炮兵团火力控制下的一个河套里，利用宴请支队干部的机会，吃掉这支部队。战车第5团团团长胡鉴在接到他们“邀请”时，就识破其诡计，调整了部署。少数反动分子见先遣支队已有准备，只好作罢。胡鉴团长在宴会上严肃地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并借机重申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从而避免了流血和损失。10月17日，先遣支队继续向西挺进，穿过吐鲁番盆地，于20日下午胜利到达迪化，开始接管城防，控制机场，保障后续部队的顺利到达。在后来的庆功会上，王震司令员曾给予先遣支队战车营以很高的评价，他赞扬这支年轻的装甲部队，从东北打到新疆，昼夜兼程，快速奔袭，抢占玉门关，进军迪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了战功，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立了战功。并希望他们保持荣誉，继续镇压与人民为敌的残匪，为保卫祖国再立新功。同时，授予该营“开路先锋”锦旗一面。

10月12日，第2军按预定计划向南疆开进。13日，第4师前卫第12团车运抵哈密，14日，第4、第5师及军直相继到达。由于担负车运任务的汽车车况太差，加上油料供应困难、修理材料缺乏，损坏严重。遵照兵团首长的指示，集中车况较好的汽车，

一部用于往返转运酒泉至鄯善的部队，一部用于倒运东疆至焉耆的部队，待各部到达上述两地后，除以少量汽车用以载运辎重外，各部即以徒步向各自目的地前进。

23日，第4师到达焉耆后，从26日开始徒步行军。至11月26日，先后进驻巴楚、伽师、岳普湖、喀什等地，行程达970公里至1195公里。30日，又集中运载辎重的汽车，运送第11团进驻莎车。12月1日，第2军军部率第4师主力进驻喀什，与民族军一部胜利会合。第13团于1950年1月底进驻库车。

11月7日，第5师车运吐鲁番后，开始徒步向南疆开进。经697公里的徒步行军，师部率第14团进至温宿和阿克苏。此时，第2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得悉和田出现暴乱苗头，即令第15团迅速进入和田，稳定局势。第15团按照军首长指示，立即组成先遣分队，由团长蒋玉和带领，乘车经喀什、莎车、皮山、墨玉，先行赶赴和田开展工作。团主力则由副政治委员黄诚、副团长贡子云率领于12月5日出发，徒步向南，沿和田河故道，横穿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插和田。塔克拉玛干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沙漠，维吾尔语意是“进去出不来”，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和田河故道由于被流沙埋没，部队在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乌兽绝迹、严重缺水的大沙漠里，顶着风暴和流沙，凭着指南针顽强前进。白天行军，部队头顶烈日，被无边无际的大沙漠蒸烤得酷热难耐；晚上宿营，有时狂风骤起，沙石铺天盖地，寒气袭人，帐篷被刮得无影无踪；部队往往整天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顿饭，嘴唇干裂，饥渴难忍，全体指战员以超人的毅力，勇往直前与风沙奋力搏斗。经过18天艰苦跋涉，斜穿790余公里，终于12月23日胜利到达和田，慑服了妄图暴乱的少数反动分子，稳定了和田形势。25日，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特电嘉奖第15团全体指战员，嘉奖电说：“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第6师除师直率第17团一部和第18团先头进驻焉耆地区进行生产准备外，因汽车运输困难，主力停于玉门至安西一线过冬。1950年3月底，第6师第16、第17团进驻焉耆，第18团进驻库尔勒，1个营进驻轮台。

第2军教导团、炮兵团和卫生部大部、后勤部一部，在吐鲁番、鄯善过冬后，徒步38天行程1653公里，于3月底至4月中旬陆续到达喀什。

由敦煌从新疆南部入疆的部队，在敦煌度过初冬即开始进军。第6师骑兵团于1950年1月6日进驻若羌，第5师骑兵团经若羌，又向西330公里，3月3日进驻且末。

在兵团的直接指挥下，担负北疆修路架桥任务的第2军工兵团，1月底进驻精河、博乐；第5师独立团由迪化车运乌苏后，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向北徒步420公里，于3月中旬进驻北疆边塞重镇承化（今阿勒泰）。

第2军进入南疆后，时值隆冬，边卡道路大都为冰雪所封，不能通行。从1950年3月起，以第13师^①1个加强骑兵连进驻蒲犁，并以蒲犁为基点设立指挥所，负责指挥伙食比、洛甫盖子、明铁克、红吉拉甫、苏布拉克、大布达等边卡的防务；第5师第15团一部进入皮山县通往印度之要点赛图拉，并在赛图拉设立指挥所，负责守卫黑黑孜江干、三十里营房、康西瓦等要点；第4师第11团一部进入叶城县通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要点巴扎大拉。至此，完成了南疆境内的全部接防，开始了终年执勤在祖国海拔5000米以上的千里边防线上。

1949年11月4日，担负进军北疆任务的第6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的率领下，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和车运行动。为保证空运安全，空运之前，各部队均进行编组，点验和登机常识学习。11月5日，第16师和第17师先

^① 1949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下辖第13、第14师及2个骑兵团。

遣队分别乘机抵达哈密和迪化。6日，王震率第1兵团前指由酒泉飞抵迪化，受到新疆临时人民政府领导人和迪化各界人民代表的热烈欢迎。大规模的空运行动至1950年1月20日结束，共出动运输机700余架次，空运进疆部队1.95万余人，运输军用物资12.59万公斤。其中，由酒泉飞往哈密160余架次，空运指战员4185人，运输军用物资4.8万公斤；由哈密飞往迪化543架次，空运指战员1.532万人，运送军用物资7.79万公斤。^①汽车运输从11月4日开始至翌年1月13日止，共运送指战员2.668万余人。其中，由酒泉运哈密1.29万余人，由安西运哈密2540人，由哈密运迪化6550人，由迪化运伊宁2492人，由迪化运绥来2112人。1月3日，第16师大部按部署进驻东疆哈密、镇西、奇台、吐鲁番、鄯善等地。至13日，第6军各部均到达指定地区。

第一野战军各部到达哈密、迪化、阿克苏、喀什、和田、伊犁、阿勒泰等地区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新疆民族军的指示，立即与民族军召开会师大会。随后又与民族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剿匪、肃特和维护地方治安，改造起义部队，发展生产。同时各部队先后抽调1095名干部（其中第2军抽调782名、第6军抽调313名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帮助培训民族干部，建立起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为稳定新疆的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人民解放军进驻南疆和北疆，标志着新疆的真正解放，从此新疆人民开始了新生活。

1949年11月12日，王震从迪化来到伊宁，出席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胜利5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他向三区军民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驻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亲切慰问，对三区革命斗争在新疆和平解放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号召三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为建设新疆、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① 引自《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168页。

11月27日，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抵迪化，会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同陶峙岳、鲍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在与各有关人士进行认真广泛的讨论研究后，主持通过了新疆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新疆目前的施政方针》。

12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震任第1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陶峙岳任第2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3副司令员，张希钦任第1参谋长，曾震五任第2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鲍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

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并任命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为军长，伊斯哈可夫·马尔果夫为副军长兼参谋长，曹达诺夫·扎依尔为副政治委员，奴尔也夫·巴吾东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3、第14师和2个独立骑兵团。1950年1月10日，第5军在伊宁隆重召开大会，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决定，从第1兵团抽调一批久经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和优秀政治工作干部，到第5军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3月，任命顿星云为第5军政治委员，李恽和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军师均建立了党委会，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改编新疆民族军为第5军的同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由陶峙岳兼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饶正锡任副政治委员，陶晋初任参谋长，李铨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9军和骑兵第7、第8师。第9军军长由赵锡光兼任，副军长王根僧、陈德法，参谋长李祖唐（后叛变），下辖第25、第26、第27师。1950年9月25日，第22兵团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会上，王震宣读了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授予陶峙岳司令员。1954年10月，为适应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第22兵团部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为保卫边疆、建设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1兵团第2、第6军进军新疆，历时6个月时间，在严寒的冬季，7万余人的部队以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新疆的解放，结束了千百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统治新疆的历史，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企图，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同时也在新疆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进疆部队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主动为群众挑水、打柴、治病、打扫院子，宁愿露宿野外，也不擅自进入群众的房子，饮具不够用，部队就采取轮流做饭，也不去借用群众的饮具。人民解放军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的行动，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到达各地后，遵照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指示，先后抽调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宣传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建立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权，镇压反革命，并在斗争中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进疆部队除一部分兵力保卫国防、清剿土匪、维持治安外，抽调大部兵力按师团布点就地屯垦，在渺无人烟的亘古荒原上艰苦创业，以辛勤的汗水，把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滩变成块块良田。在进驻新疆的第一年，全军共开垦荒地96万亩，播种83.5万亩，收获粮食3475.8万公斤，棉花37.7万公斤，油菜籽186万公斤，达到粮食全年可自给7个月，油料和蔬菜全部自给，为建设边疆、巩固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作战，是在兵力不占优势、条件十分艰苦、后勤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 10 个月的连续作战，解放了陕甘宁青新 5 个省区，共歼灭国民党军 30 万余人，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其主要经验有：

第一，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

在野战军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适时地利用胡马和青宁两马之间的矛盾，采取钳马打胡、钳胡打马和钳制宁马打击青马的正确方针，精心缜密地组织了两次带战略性的战役，并在战役中形成绝对优势兵力，从而收到迅速各个击破敌人，歼灭胡马主力，使双方兵力对比很快由敌我平衡转变为我优敌劣。在重创胡宗南集团和歼灭马步芳集团主力后，又不失时机地迅速发起长距离的连续追击作战，结合战役战术上的迂回包围，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终将西北国民党军全部歼灭。

第二，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运用政治争取瓦解敌军，是迅速取得进军胜利的有效方法。

在国民党军内部分崩离析，士无斗志的各种情况下，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解决西北国民党军的方针，积极动员原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争取工作。兰州战役后，彭德怀司令员还亲自邀请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座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在上层人士中反响强烈。各部队也以各种手段开展敌军工作，宣布各项优待政策，深入进行策反工作，使野战军不仅在战场上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而且争取了大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和投诚，其人数约占歼敌数的 40% 以上。

第三，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团结各族人民战胜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进军和作战大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情况非常复杂，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推行大汉族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造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和对立，西北地区的地方军阀则

在宗教和民族外衣的掩盖下，煽动少数民族群众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因此，能否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取得进军作战胜利的关键。为此，第一野战军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前，都在部队中进行民族和宗教政策教育；进入民族地区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歧视、不侮辱少数民族俘虏，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第四，西北乃至各战略区的党政军民，积极支援野战军作战。

西北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党组织都把支援主力作战，争取战争的胜利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部队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由于战争的破坏，农作物连年歉收，群众生活非常贫困，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前线，仅1949年就支援部队粮食131.1万余石。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进军西北取得胜利的根本。在进军新疆时，不仅西北地区，而且东北、华北、华东等友邻战略区都积极支援汽车、粮食和棉衣、棉被、皮帽、皮衣等各类御寒物资，为迅速进军新疆作出了贡献。

第五，发扬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西北的大部地区山峦纵横，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气候寒冷，给部队进军作战增加了很多困难。各部队在野战军前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着全体指战员以顽强的意志，战严寒，斗酷暑，爬山涉水，忍饥挨饿，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以常人难以忍受的毅力，创造了世界进军史上的奇迹，胜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第六章 进军中南，解放鄂湘赣粤桂诸省

第一节 中南地区国民党军态势和企图，第四野战军进军的任务与部署

一、中南地区国民党军态势和企图

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尚存的正规军及地方部队共 150 万人，分散于福建、台湾及中南、西南、西北若干省区，处境孤危。然而，蒋介石仍企图依靠这些残余力量负隅顽抗，借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山再起。

盘踞中南地区之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1949 年 8 月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部。解放军占领武汉、九江、南昌之后，中南地区之国民党军加紧整顿部队，调整部署，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

1949 年 5 月下旬，白崇禧对部队进行整编：因张轸率第 19 兵团部及第 128 军起义，原属该兵团建制的第 127 军改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第 8 绥靖区改编为第 10 兵团，由徐启明任司令官，下辖第 46、第 56（在桂林整训）、第 126 军；第 16 绥靖区改编为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部，由霍揆章任司令官，下辖第 97、第 103 军；第 58 军军部扩编为第 11 兵团司令部，由鲁道源任司令官，下辖第 58 军，并暂时指挥第 126 军；第 3 兵团番号不变，由

张淦任司令官，下辖第7、第48军；在宋希濂鄂西绥靖司令部所属部队中新组第20兵团，同时调整原有第14兵团的指挥序列，由钟彬任第14兵团司令官，下辖第15、第79、第122军；由陈克非任第20兵团司令官，下辖第2、第118、第124军；撤销第17绥靖司令部及第29军番号，所部并入第1兵团，由陈明仁任司令官，下辖第14、第71、第100军；南昌指挥所退至赣州，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赣州指挥所，由方天任主任，下辖第4、第12兵团，以沈发藻为第4兵团司令官，下辖第23、第70军；以胡璉为第12兵团司令官，下辖第10、第18军（后第10军撤销，大部编入第67军，一部与潮汕地方部队合编成第19军）。整编后的白崇禧部计22个军50余个师共35万余人。另外，广东地区的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余个师计46万余人。

在整编部队的同时，白崇禧、余汉谋针对第四野战军主力逐渐集结于长江以北之湖北境内、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已进至鄱阳湖以南地区的形势，作出防御部署如下：以方天部担任赣南地区守备，阻止解放军南下；以第10兵团第46军于赣江西岸担任警戒，并执行“诱敌”任务；以第3兵团控制浙赣路西段，保持机动，随时准备与第10兵团协同作战，视机歼击南进较突出之解放军；以第11兵团统一指挥第58、第126军，在武（昌）长（沙）公路正面及其以东之湘鄂边山区，利用地障逐次抗击解放军南进，掩护浙赣路方面的左侧安全；以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部、第11兵团，任粤汉路正面及洞庭湖至石首间的守备，阻止解放军南进，并利用湖沼有利地形，实施持久作战；鄂西绥靖司令部仍担任石首（不含）以西至宜昌、巴东间的江防，阻止解放军渡江；第1兵团仍在湘中地区整训。余汉谋部则以1个军驻守海南岛，以6个军沿粤汉路扼守粤北，屏障广州。

国民党军的企图是，在粤汉路北段正面至宜昌、巴东地区，分别利用湘鄂山川湖沼地障及长江天堑，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集

结有力机动兵团于浙赣路西段（赣江以西），诱解放军深入湘赣山区，予以各个击破，以达到持久作战并予解放军以打击之目的^①。如果作战失利，则宋希濂部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湘鄂西，确保川黔门户；白崇禧主力则退守湘南，与余汉谋部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

然而，在这些国民党部队中，除白崇禧嫡系第7、第48军等少数部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大多是被解放军歼灭或遭受严重打击后重新组建的部队，并且内部派系复杂，湘桂系之间、白崇禧与宋希濂之间矛盾重重，战斗力较弱。

二、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的任务与准备

1948年12月12日，在淮海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央军委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中，曾就东北野战军的任务指出：“东北我军协同华北主力，于明年一二两月完成”平津战役，“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第二步夺取两广。”^②从此开始酝酿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的问题。1949年3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1月18日政治局会议确定的1949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內，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③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渡江作战的胜利，5月，中央军委又将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的任务扩大为进军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6省。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237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83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8页。

中南6省面积1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8;人口1.5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3;大部位于长江以南,属亚热带、热带气候,夏季炎热多雨,秋冬阴凉多雾,空气潮湿,疾病易于流行;丘陵、山地约占全区面积的75%,平原、丘陵地带河流纵横,稻田水网交织,山地则崇山峻岭,森林茂密,道路崎岖,不利于大兵团行动;少数民族多,社会情况与北方有很大差别,各地区语言复杂,与之交往存在不少困难。这些都是解放军进军中南的不利因素,必须经过一个时期的适应才能克服。

然而,中南6省的不少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这些地区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武装长期活动于该区,并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胜利而蓬勃发展。至1949年8月,长江以南地区的人民游击武装先后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滇桂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和粤桂湘边纵队,总兵力约10万人。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扩大游击区域,威胁城市和交通线,牵制了国民党军的部分兵力,是解放军进军中南的一支重要策应力量。

为了完成消灭中南地区之国民党军、解放并经营中南6省的任务,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成立华中局,以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李先念、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萧劲光、刘亚楼、陶铸等为委员。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49年12月称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以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为第二参谋长,谭政为政治部主任,陈光、聂鹤亭为副参谋长,陶铸为政治部副主任。

平津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2月10日起以战备姿态转入整训,并进行向中南进军的各项准备。为搞好这次整训,

野战军于2月5日下达了《两个月整训计划》，提出：全部整训工作，“以政治整训为主，军事教育为辅”，“以准备南渡长江作战，担负发动群众，管理一万万以上人口的地区，将人民政权、人民武装建立起来，使革命在长江以南各省取得胜利为目的。”^① 3月27日至4月5日，野战军在北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解放中南6省的任务，会议作出了《关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根据整训计划和师以上干部会议精神，第四野战军各部队普遍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新区政策教育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组织纪律教育，总结了入关以来行军作战的经验，初步研究了对白崇禧部队作战的战术。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为完成进军中南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和华北局抽调了各级党政干部2万余人，以省、市、专区为单位组成工作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第四野战军还在平津地区吸收了860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南下工作团，开辟新区工作；后勤部门在东北局、华北局的全力支援下，派出野战后勤分部，自平津地区沿平汉、平大（北平至大名）、津浦等交通干线向中原地区布设兵站线，提前补发各种军需物资和医药器材，并根据南方的气候特点，在全军中进行了卫生防疫教育；工兵部队提前出发，抢修黄河铁桥，并在花园口组织漕渡，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黄河。华中局为更有力地支援进军中南的作战，成立了华中支前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任。同时，还成立了江南作战支前司令部，由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一部长周纯全任司令员。

整训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检阅了第四野战军驻平部队，接见了第四野战军参加北平高干会议的与会人员，对进军江南和接管新区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勉励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

^① 1949年2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下达之《两个月的整训计划》。

华北、中原地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在“全力支援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积极展开筹集粮食、修补道路和组织慰问等支前工作，坚持中南地区的各游击纵队，遵照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加紧进行迎接大军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省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遂行渡江战役任务。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3路陆续由平津地区出发，沿平汉路、津浦路及平大（名）公路南下。至5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

为发挥两广纵队的作用，中央军委于3月5日命令，原属华东野战军的两广纵队改隶第四野战军建制。据此，两广纵队于12日由江苏东台出发，经河南商丘、洛阳，于5月下旬到达湖北襄阳地区集结待命。

三、进军中南的部署

在第四野战军南下的过程中，中央军委初步确定了进军中南的基本部署。5月9日，第四野战军领率机关进抵开封，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路后继续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南进。此时，渡江战役正向纵深发展，第二野战军已斩断浙赣路，白崇禧部惧歼，纷纷从江汉地区向长江以南撤退。根据上述形势，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萧克：“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根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如果这七个军七月中旬前后能到攸县、湘乡之线，

则八月中旬或下旬即可集中于郴州区域休整一个月，九月中旬或下旬以后即可向两广前进。”^①

据此，第四野战军命令先遣兵团立即渡江，要求后续部队迅速向长江北岸推进。这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正在策划中南地区的防御部署。中央军委在获悉其4月30日制定的分三路阻止第四野战军南下的部署后，于5月17日致电林彪、萧克指出：国民党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甲、左路鄂西方面受我攻击时，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等语。你们可以三个军由宜沙渡江，以两个军向宝庆推进，留一个军在常德、益阳一带，而以江汉军区及王宏坤部主力位于宜沙地区，以防鄂西敌军出扰。乙、中路粤汉线方面敌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我，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等语。在此方面你们可使用八个军，除留一个军位于武汉、岳州线，一个军位于岳州、株洲线，一个军位于株洲、衡州线外，可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协同西路两个军歼击白崇禧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丙、敌在其右路江西方面，据称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其目的是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等语。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你们可以预定经营江西的两个军向该区前进。此两个军可择各军中战斗力较弱者，而不要使用战力较强者的，如遇作战，可要求陈赓兵团协助之。位于武汉至衡阳线上之三个军，选择两个较弱者、一个较强者可”，“如此部署我军主力可以集中使用，向湘粤桂边境推进之七个军不致分散，利于寻歼白部主力”。但如白部第48、第46军将来由南浔线向大庾岭撤退，“你们可以考虑派一个军，沿赣江尾该敌向大庾岭方向前进，该军即位于大庾、南雄、始兴地区，协同粤赣湘边区游击纵队（区党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林平）在该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0～第581页。

活动，尔后协同主力取广州。如桂系主力确已分散（粤汉路上似只有第七军有顽强战斗力，其余都是很弱的或较弱的），这种部署是可以考虑的。如此，则应使用三个军出江西，其中两个军固定其任务为经营江西，一个军准备尾敌出南、始。经湖南向湘粤桂边境寻歼白部主力者为六个军，而不是七个军。”^①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又指出，四野主力约于6月上中旬可渡长江，其中6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②根据白崇禧可能集中一部分主力在宜春一带寻四野渡江部队作战的情况，中央军委于5月25日决定，“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后路，尔后即待命入川。”^③

第二节 第四野战军南渡长江， 挺进湘中、赣南

一、举行宜沙、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

（一）第四野战军在宜沙、湘赣边的作战计划

根据中央军委5月17日的指示，第四野战军于18日决定：第12兵团由武汉地区沿粤汉路向长沙前进；第13兵团由宜昌、沙市地区渡江，进占澧县、常德，主力准备向宝庆前进；第14兵团除第42军留河南剿匪外，主力在第12兵团后跟进，准备在长沙、衡阳地区与白崇禧部作战；第15兵团之第43军向南浔路前进，受陈赓指挥，其余部队由黄梅、广济地区渡江，沿南浔路向南昌前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第583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6页。

进。

正当第四野战军筹划对白崇禧部发起全面攻击之时，白崇禧按照5月下旬制定的作战计划，决心乘第四野战军只有2个军渡江而主力还远在长江以北的时机，准备调动主力第7军，对位于南浔路以西永修、德安地区较孤立较突出之第43军进行反击。

针对白崇禧在湘赣方向取攻势的作战计划，第四野战军决定将计就计，在湘赣地区捕歼白崇禧集团一部。为此，于24日致电中央军委：“我军应极力吸引敌军于长沙东北与岳州、南昌之间一带，争取在我军主力到达后，以四十、四十三两军及配合陈赓兵团突然切断其退路，至少求得包围其一两个军，以吸引敌其他部队来增援，或迟滞不敢远退，以达到部分歼敌于长沙以东、南昌以西地区，则对我更有利。”“为避免吓退敌人，并诱敌向我前进”。第40、第43军“不再前进”，陈赓兵团“目前暂不渡赣江”。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并于次日致电第二野战军，请通知陈赓兵团照此执行。陈赓兵团渡过赣江的部队遂撤回赣江以东。

与此同时，根据野战军的部署，担负由宜昌、沙市间渡江任务的第13兵团于27日提出了渡江作战方案，准备以奔袭手段首先歼灭江北各点之宋希濂部，夺取沿江船只，然后乘胜渡江。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力求歼灭宋希濂主力，尽可能不使其退入鄂西及湘西山区的指示，于28日致电第13兵团：“应对敌在江北的五个师实行奔袭和渗透迂回的办法”，“尤其应注意首先将当阳之敌退路切断，先包围起来，但切勿歼灭，以便吸引其他敌人，使其他敌人不能断然决心南退，对其他一切离江岸较远的敌人，皆当先行包围而勿歼灭”，待“我乘虚夺取江岸，抢得船只，并以一二个师……插至长江以南，使敌江防瓦解”之后，“再行歼灭已被包围之敌为好。”为此，“宜昌、沙市方面的我地方部队迅即撤离长江百里以外地区活动”，诱敌北进。

29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关于十三兵团向宋希濂部进击及渡江的时机值得考虑，对此问题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不待东

路集中南浔线，中路集中鄂南，十三兵团即向宋部进击并渡江占领常德。其好处是出白崇禧意料之外，突然攻其一路（白崇禧似料我军要待三路到齐然后攻击，而我军目前尚未到齐），可能将宋希濂部大部歼灭；其坏处是我军占领常德后，敌中东两路之侧后已受威胁，可能迅速退至衡州。另一方案，十三兵团暂不向宋部攻击，待我中东两路到齐，或待中路（鄂南）到齐，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攻击。其好处是可能将三路或两路之敌同时歼灭，然后齐头并进向南追击；其坏处是白崇禧看到我军三路都到齐了，可能三路同时撤退，使我失去歼灭敌人的机会。以上两案究以何者为宜，请考虑见复。”^①

这时，进入长江两岸的第四野战军部队遇到了严重的粮食困难。由于连年灾荒和国民党军的征抢，湖北和洞庭湖、鄱阳湖沿岸地区粮食极为缺乏，鄂南地区尤为困难，从华东、华北地区购买粮食又需时日。粮食缺乏直接影响到部队的行军作战。同时，根据先遣兵团的作战经验及南下行军的体验，按东北、华北地区确定的部队编制，尤其是炮兵、运输部队的编制，已不适应南方作战的需要，也需进行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从尔后作战考虑，30日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复电中央军委：“我们考虑大体上应采取两路或三路同时攻击为妥，但十三兵团略可较其他一两路之出发提早数日，以便歼灭江北之敌。目前十三兵团则在汉水以北休整，其他三个兵团则靠近长江休整，各休整一短期和准备粮食（粮食情况非常困难）。以便在渡江后，即迅速前进，中途不再停止”。6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同意上述休整和作战计划，并指出：“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3页。

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息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同时指出：“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①。

从5月上旬至6月上旬的1个月时间内，由于粮食问题和战场形势的变化，第四野战军主力由迅速渡江南进转为暂缓渡江南进，并根据白崇禧5月下旬的作战计划，确定了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

经中央军委批准，第四野战军主力到达襄樊、安陆、孝感、浠水一线后，从6月3日起进行短期休整。第42军留河南执行剿匪和有事增援华北的任务。第50军由东北车运南下。6月18日，华中局及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领导机关进驻汉口，临近前线指挥。

在短期休整期间，第四野战军在华中局的领导下，采取就地筹借、现金购买与远区购运相结合的办法，筹集粮食，使粮食困难逐步得到缓解。并根据江南多山地、河川、湖沼和白崇禧部队富于机动性的特点，吸取先遣兵团在江南作战的初步经验，对炮兵配属和运输部队的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在炮兵编制方面，取消军炮兵团，整编成8个野榴炮大团，其中以4个团配属4个兵团，1个团拨给二野，3个团组成炮兵师，直属野司；军配属2个独立炮兵营，1个山炮营，1个战防炮营；师配属1个由2个连山炮和1个120重迫击炮连组成的炮兵营；团配属1个迫击炮连及1个步兵炮连。“此项变更历时十二日至六月中旬完成”^②。在运输部队方面，除各军的大车仍保留外，师团大车一律改为驮载；军、师、团增设人力运输营、连、排；干部减轻行李。通过以上调整，部队的机动性有所增强，但与实战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此外，部队还进行了山地、河川、稻田地战术的初步训练及渡江作战的其他准备。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5页。

^② 林彪、罗荣桓1949年6月26日给毛泽东主席《四至六月综合报告》。

正当第四野战军主力于长江以北休整和筹集粮食时，宋希濂于6月下旬调动部队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势，企图抢夺粮食、威胁第四野战军的侧翼并取得局部胜利，作为激励士气与夸耀的资本。

针对宋希濂进窥荆、当的企图，第四野战军决定同时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6月28日、7月4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电中央军委：“宋希濂部已由江南转向江北，企图向我荆门、当阳发动攻势，我业已准备诱歼此敌，并乘胜渡江。在荆门、当阳方面我一抓住敌人时，为防万载、宜春敌人退却，届时即开始对此地区敌人突然发动全线攻势。”因白崇禧、宋希濂对侧翼极敏感而对正面较麻痹，“我军作战方法，是以先头部队迂回敌之突出部分，断其退路，围而不攻，以麻痹其后方的敌人。在抓住了敌人突出部分后，以我其他部队，自两侧向敌深后方迂回。整个战役方针，是先完成迂回，然后组织攻击。兵力部署上，使用于当阳、宜昌方面的是十三兵团全部加十四兵团的一个军。在江西方面，首先以我十五兵团之先头军，迂回包围奉新、高安、宜丰等地的敌人。以十二兵团全部出平江以东，准备向萍乡方向前进。以陈赓部向宜春、万载以西前进”，形成战役包围，“以求造成大歼灭战”。即以既定的诱歼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

7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等：“你们的部署很好，但有一点请加注意。估计到江西之敌可能退得很快，你们既以陈赓兵团插至袁州、萍乡之间，则经平江、长寿街南进的我军，似以经浏阳插至萍乡、醴陵之间为宜。敌在醴陵有兵团部并有一部兵力，如袁州敌已退至醴陵，则我军可即包围醴陵之敌。如袁州敌已被陈赓切断，需要增加兵力才能歼灭，则我军由醴陵转向萍乡、袁州，路程亦不远。此点请加斟酌。”

次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电中央军委：“我四三军十一日可在高安、奉新打响。如扑空，则我十二日在长寿街以东（长寿街附

近及其以西之汨罗河不能徒涉)过汨罗河南下的部队,即直插平江、醴陵。如我十五兵团能抓住敌人,则十二兵团行动拟仍大体不变。”

为保证战役的胜利,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指示各参战部队:“此次夏季战役成功的主要关键,在于奔袭前能严守秘密,避免暴露,在奔袭时能迅速猛插和分割迂回,盼各部注意。”^①

(二) 宜沙战役

为诱歼宋希濂部,第四野战军于6月25日部署如下:第47军于6月30日前进至南漳、武安一线,准备直插当阳或当阳与宜都之间;第38军于6月30日进入宜城、钟祥一线隐蔽,准备待宋部进入荆门时或进入半天至1天路程内,即大胆插至荆门以南及西南一带,断其退路,吸引其援军;第49军于6月30日前集结于沙洋以东至旧口一线,待第38军已经或快要插至荆门以南时,即突然西渡汉水,向建阳驿、团林铺之线前进,迂回包围建阳驿;第39军于6月28日前在京山、天门、应城一线集结,准备随第49军之后跟进;湖北军区独立第1、第2师及2个独立团于前哨执行诱敌任务。根据这一部署,第13兵团各军立即进入指定地区,待命行动。

进攻荆门、当阳的宋希濂部湖北保安第4旅于6月29日进占当阳。7月3日,第2、第124军由宜昌地区北进,5日,第2军主力进至宜昌以东鸦雀岭及当阳一线,第124军进至当阳西北之清溪场后,发觉解放军在沙洋、应城方面集结重兵,即对该方面戒备,放慢北进速度,仅以小部队向北进行游击活动,未按原计划向荆门前进,第79军和第15军主力则在江陵、沙市、宜都按兵不动,第118、第112军分别在巴东、石门地区。

为抓住已进入当阳、远安地区之宋部,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决定,不待其进至荆门即发起战役攻击,将其歼灭于宜、当及其以

^①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 1949年6月28日致各兵团、各军和第4兵团首长的电报。

北以东地区。7月5日，林彪、邓子恢发出电令：第47军于11日迂回包围鸦雀岭、龙泉铺、宋家咀3处，第38军于11日到达半月山、白家店，12日赶到鸦雀岭、双莲寺一带，协助第47军作战，第49、第39军照前部署不变。

7月6日，担任迂回任务的第47军由南漳、武安之线出发南进，9、10日，第47军在观音寺、黄土坡与宋部第2、第124军遭遇。由于攻击部队干部思想麻痹，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完成迂回包围，暴露了战役意图。宋希濂发现解放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10日下午令第2、第124军向宜昌撤退。解放军各部立即发起追歼。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于11日在慈化寺、川心店歼灭第2军一部。第47军至12日插至土门垭、双莲寺等地，歼灭第2、第124军一部。第38军9日进占荆门，10日在两河口强渡沮漳河，11日占领半月山，12日赶到鸦雀岭，但第2、第124军军部已乘汽车先期逃往宜昌。至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已开始渡江南逃。

为堵击宋部继续渡江南逃，以便将其围歼于宜昌、沙市、江陵等地，第13兵团根据第四野战军首长意图于12至14日相继作出部署：第49军围攻江陵、沙市；第47军及湖北独立第1、第2师围攻宜昌；第38军搜集船只，由古老背一带渡江南进，迂回宜昌之长江南岸，切断宋希濂的南逃退路；第39军则位于建阳驿一线待机。

第49军遂由十里铺一线南下，15日攻克沙市、江陵，俘1723人。第38军第112师1个连以7条小船于14日23时在临江铺偷渡长江成功，15日2时占领长江南岸之将军帽阵地，随后各师展开渡江。第151师15日下午从白沙璠渡江，占领鸡磨山阵地。第47军至15日占领镇镜山、小溪塔、南津关等宜昌外围据点。宋希濂见宜昌不保，遂于15日晚率部弃城渡江后西逃。第47军于16日占领宜昌，并派兵一部渡江向三斗坪方向追击。第38军于占领宜都、枝江之后，又于18日进占长阳。至此，宜沙战役结束。

随后，第47军留驻宜昌，其他各军向南开进。第49军相继占领公安、澧县、临澧、常德。第38军相继攻占石门、桃源、慈利。第39军由沙市渡江随第49军跟进。

（三）湘赣战役

白崇禧原计划对解放军第43军进行反击，但由于第43军奉命停止南进，第四野战军主力陆续到达长江以北，赣江东岸又有陈赓的第4兵团，未敢轻举妄动，两军形成对峙。这时，白崇禧部各军的位置是：第97军位于岳阳及其以南铁路沿线地区，第58军位于南江桥、平江、浏阳一线，第126军位于官渡、长寿街、铜鼓，第48军位于奉新、高安、上安、宜丰一带，第46军位于清江、新余、分宜、宜春，第7军位于醴陵、萍乡，第103军驻益阳，第23军守吉安。另外，陈明仁的第1兵团位于长沙、湘潭及其以西地区。胡璉的第12兵团南撤闽粤边地区。

为捕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第四野战军前委于6月25日至29日下达如下部署：第15兵团之先头第43军以1个师位于靖安、安义一线，严密监视奉新守军，待军主力插到高安以南地区打响时，该师即以奔袭包围动作抓住奉新守军，军主力插到高安以南后，力求抓住白崇禧部1个师至1个军，并预定7月12日在高安以南地区打响；第44、第48军于6月30日前在九江至武穴一线渡江，向武宁、安义一线前进；第12兵团第40军于通山、通城地区集结隐蔽，第45军由黄冈一带渡江后进至咸宁、大冶以南地区集结，第46军由汉口渡江南下。该兵团在第15兵团打响后，即以第40军由通城直出浏阳、醴陵，以第45军经通山、铜鼓直插萍乡，以第46军1个师沿粤汉路南下，抢占铁路桥梁；第4兵团于第15兵团打响后之次日，即由新淦、樟树、丰城一线西渡赣江直插萍乡。

7月3日，各部按照部署开始行动。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随后，第44军到达星子、德安，第48军到达瑞安一线。

与此同时，第43军除以第128师监视奉新守军外，军部率主

力向武宁、修水、三水前进。8日，先头第129师进抵九仙汤以南地区，准备于次日拂晓奔袭上富守军；第128师开始奔袭包围奉新守军。由此湘赣战役正式发起。

奉新、上富守军第176师惧歼，先后于8日晚至9日拂晓南逃。高安第176师师部率1个团也于9日逃往上高。第43军在奉新、高安两处扑空，遂发起追击，但由于白崇禧部南逃时沿途破坏桥梁，该军前进速度缓慢。

鉴于奉新、高安守军已逃，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判断白崇禧部将全线退却，遂命令第12兵团迅速南下，第4兵团立即西渡赣江，取捷径向萍乡方向前进，以便迎头兜击。这时，白崇禧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命令第48军主力扼守上高、宜丰，第148师由安福、永新向分宜集结，并准备以第7军第171师车运萍乡，以第46军第236师进至马庄附近，支援第48军作战，准备反击。据此，第四野战军领导人认为：“如敌此计划不变和不撤退，则我军仍有包围该敌之可能。”为此，命令第43军停止追击，以免吓跑张淦部。同时，命令“十二兵团出浏阳、醴陵，四兵团向宜春、莲花之线前进，以求包围敌人。”^①第12兵团遂命令各军加快南进速度。第40军于12日占领长寿街，但第45军等部被连日大雨和山洪所阻14日才通过九岭。第4兵团第13军，10日由丰城施船埠渡过赣江，11日占领独城、清江，13日解放新余。第14军11日由新淦、峡江间渡过赣江，12日占领峡江。第15军13日占领吉水、吉安，并在该地渡过赣江。

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13日下令全线向攸县、茶陵地区撤退。其第48军主力于13日经徐家渡、万载南撤。第15兵团主力于14日奔袭上高再次扑空。同日，万载及浙赣线上之白崇禧部先后向攸县撤退，跳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第12兵团第46军于17日占领平江，19日第40军占领浏阳。至

^① 1949年7月11日林彪、邓子恢等致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等的电报。

此，湘赣战役结束。

（四）宜沙、湘赣战役的战绩、意义及经验教训

宜沙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18日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湘赣战役自7月8日开始至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人。

经过宜沙、湘赣战役，先后解放了湘鄂西、湘赣的大片地区，四野主力直指湘中，为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和此后继续进军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宜沙战役，解放军直插湘西，割断了宋希濂与白崇禧部的联系，使白崇禧部的左翼暴露，为尔后集中主力歼该部创造了条件。对此，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战史也写道：宜沙战役开始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此际曾令飭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应以有力之一部，撤守澧水南岸，与在石门整训之第一二二军，重新建立抵抗，拒匪沿沙（市）常（德）公路南犯，巩固湘西，并掩护华中主力军左侧背安全。主力则分别凭藉武陵山、大巴山天险，构成重重抵抗，逐次拒匪西犯，以屏障川东门户，并适时侧击沿沙、常公路南犯之匪，期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唯鄂西绥靖司令部未能贯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之作战指导，将所部全部向西转进，沙市以南空虚，以至匪军得以沿沙、常公路直入湘西。”^①

然而，宜沙、湘赣战役并未达到歼灭宋希濂、白崇禧主力的目的。其主要原因是，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特点了解不够深刻，而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近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法。三大战役特别是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已基本上不再死守城市，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游击战。这一变化，在白崇禧部体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白崇禧力避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再以以往的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求歼其主力，自然难以奏效。此外，部队初到南方，缺乏山地和稻田水网作战的经验，有的还未完成迂回包围即发起攻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39页。

击，有的遇到山洪暴发被河川所阻时即束手无策；装备笨重，行动迟缓。部队的装备虽经缩减，但仍较笨重（炮多、车多、马多）。这种装备进入山区后，因山高路窄，缺少公路，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前进速度；南方酷暑多雨，病员大量增加，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军力。

二、和平解放长沙

（一）和平解放长沙的经过

宜沙、湘赣战役后，解放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1949年8月4日，时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和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部7万余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

程潜，字颂云，曾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是国民党军湘军的重要将领。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交往，与蒋介石及桂系矛盾较深。他曾与李宗仁、孙科等竞选副总统。失败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于1948年6月任命其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借以牵制白崇禧。白崇禧为了巩固“湘桂防线”，表示希望得到程的合作。但程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何去何从，十分矛盾。

陈明仁，字子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是程潜早年的学生和同乡。1947年6月至7月，东北野战军攻击四平时，陈明仁率部守住了四平。蒋介石以守城“有功”，升其为兵团司令官。但由于陈诚排除异己，其兵团司令官职务不久又被撤销。1948年底，白崇禧为了扩大桂系势力，拉陈明仁当了其手下第1兵团司令官。1949年2月，在程潜的精心策划下，将陈明仁所部调驻长沙。

程潜就职后，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争取程潜起义，谋求湖南和平解放。为此，专门成立了由省工委书记周礼领导的工作小组，通过各种渠道，首先积极做争取程潜的工作。陈明仁部调驻长沙后，又积极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先后派时任湖南大学讲师、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与程、陈面谈，宣传

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痛陈和与战的利害关系。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使程潜、陈明仁定下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心。

与此同时，由于蒋介石连年内战，湖南民穷财尽。于是，湖南人民的抗粮、抗丁和反对所谓“币制改革”等斗争遍及三湘七泽。1949年初国共和谈开始后，为争取和平，湖南人民广泛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提出了“湖南人民不需要战争”等口号，要求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各界社会名流印发和平宣言，发动签名运动。为了以民众的和平潮流推动程、陈起义，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发动长沙各界人民进行了“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斗争，使湖南的和平运动达到了高潮。这一切，对程潜、陈明仁起义起了推动作用。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也委托民主人士，其中包括章士钊先生做程、陈的工作，表示对他们走和平道路的殷切希望，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进一步坚定了程、陈起义的决心。1949年6月，程潜首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立即选调华北军大总队长李明灏^①等人前往武汉，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7月4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邓子恢等：“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来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②同日，毛泽东复电（由第四野战军转）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

^① 李明灏早年曾在程潜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1948年11月由香港秘密进入解放区。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7～第628页。

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此间已囑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① 宜沙、湘赣战役开始后，为消除程潜等的误会并与解放军取得配合，中共中央于9日致电中共湖南省工委：“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②

程潜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心情异常激动，决心推动湖南和平早日实现。当时，白崇禧正准备由长沙撤退和彻底破坏长沙。程潜于7月15日晚与陈明仁会商后，16日即与第四野战军派去谈判的干部谈了对起义的想法。中央军委于17日收到第四野战军关于与程潜谈判情况的电报后，次日即复电林彪、邓子恢等：“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内部团结，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6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8页。

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① 据此，第四野战军组成了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该团于7月22日到达平江。

白崇禧察觉程潜准备起义的行动后，从中极力破坏。在白崇禧的压力下，程潜于7月21日去宝庆（邵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由陈明仁代理。在解放军已派出和谈代表团并要程、陈方面也派出代表举行谈判的情况下，陈明仁一面派程星龄（程潜的族弟）、李君九赴平江要求李明灏去长沙谈，一面电邀程潜秘返长沙。29日，程潜返回长沙，李明灏以解放军代表身份也进入长沙城。

当日下午，李明灏会见了陈明仁和程潜。随后就起义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议，主要内容为：1. 关于和平起义通电问题，李明灏提出：通电应以反蒋、反桂、反美为内容，并由中共方面阅后再行发表。程、陈对此表示同意。2. 关于起义部队驻防交接和解放军入城时间等问题，陈明仁同意将其部队从8月1日晚开始由长沙撤至湘潭、宁乡，所留部队以维持治安力量为度，解放军则于4日进城，同时“希望保留兵团司令”，“俾其努力杀贼图功”^②。3.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认为湖南和平起义之事远在解放军渡江之前就开始酝酿进行，因而它不是经过正式谈判即脱离广州政府的，而在形式上又必须谈判，为此，在过渡时期应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作为谈判对象。对于谈判中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第四野战军及时给予答复。8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等：“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③。同日，林彪、邓子恢致电和谈代表团：“同意程、陈所拟通电。”8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程潜：“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85～第386页。

^② 1949年7月31日李明灏致林彪等的电报。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0页。

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①

在李明灏与程、陈商谈的基础上，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要求程、陈派得力人员与代表团再进行协商。8月3日，陈明仁派其参谋主任郑克林、参谋处长罗文浪前往代表团驻地春华山，就解放军接管长沙的有关细节问题进行商谈。双方达成了解放军5日进入长沙的协议。

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率部7.7万人起义，并发表起义通电。5日，解放军第46军第138师进入长沙，宣告长沙和平解放。同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②

长沙和平解放，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对尔后争取国民党军大批起义起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正如毛泽东8月6日致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的电报所指出的：“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③

（二）解放军策应程、陈起义的作战

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后，白崇禧于8月4日下午开始派飞机连续轰炸扫射长沙，并散发传单，以威胁利诱和欺骗等手段，乘起义部队情绪未稳之际进行瓦解。同时，令其第3兵团主力陆续开至邵阳、衡阳之间及其以北地区，接应起义后之叛变部队。在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2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2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3页。

白崇禧的策动之下，至7日止，陈明仁所属第71军军部率第87、第88师，第14军军部率第10、第62师及第63师1个团，第100军第19师大部、第197师1个团，共约4万人叛逃南下。白崇禧以第71、第14军残部和第97军重组第1兵团，以黄杰为司令官。

在内部大量分化叛变的情况下，程潜、陈明仁于8月7日致电林彪，请求出兵援助，以稳定巩固其所部。为此，林彪、邓子恢、萧克等于8、9两日相继作出部署：以第49军第145、第146师向宁乡、湘乡前进，以位于安江之第147师向新化前进；以第46军主力向衡阳前进，以第138师2个团由长沙车运易家湾，向湘潭、湘乡追击；以第40军全部向攸县前进；以第4兵团第18军向茶陵、安仁地区前进。

第46军第137师于10日渡过淞水，11日歼灭淞田以北之白崇禧部，随后进至淞水、永乐江一线。第136师于10日进至筲堂铺一带，但由于轻敌麻痹，侦察部队未能查明桂军情况，结果遭到白崇禧部第48军的多路反击。该师师直和先头团被切成数段，师主力赶到后才将白部击溃。此战共伤亡300余人。随后第136师即跟踪追击，14日占攸县，18日占安仁。第18军第54师于15日占领茶陵，18日与第136师会师于安仁以东地区。第40军在第46军之后进入攸县地区，奉命进行休整。

第49军主力第145、第146师于占领宁乡、湘乡之后，12日向邵阳追击前进。第147师于12日进占新化后，奉命在田心以北地区停止前进。第146师于14日占领永丰后，为截击白崇禧第103、第97军，继向青树坪前进，15日占领青树坪，在界岭与白崇禧第46军第236师遭遇并发生激战。第49军遂以第145师增援。17日，白崇禧以其第7军2个师、第46军1个师和1个加强团，并附以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对第146师发动进攻。激战一日，第146师撤至永丰地区。此战第146师伤亡、损失877人，第145师也伤亡470余人。

鉴于叛军已逃出解放军之包围圈，白崇禧正向衡阳、宝庆

(邵阳)一线集结兵力并开始向湘江以西地区进攻,林彪、邓子恢等遂于8月17日下令各追击部队停止南进,并于19日致电陈明仁,请其率部东渡湘江进行休整。陈部遂于8月下旬撤至浏阳、醴陵地区。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

三、举行赣西南战役,打开进军广东的道路

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部第7、第48、第46军撤至湖南攸县、茶陵地区,江西仅剩方天所率的第23、第70军及保1旅等部。该部在陈赓兵团的连续打击下,放弃吉安、泰和、遂川,撤至赣州附近地区,并准备随时南逃。当时,方天所部共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3万余人,其中第23、第70军5个师约1.5万人,其部署为:第23军位于塘江及其以北地区,第70军位于赣州、江口及其以北一带,保1旅驻兴国,保2旅及赣南游击纵队驻赣州,保3旅驻会昌,独4师驻信丰。

随着国民党军向赣粤边撤退,第四野战军进军广东也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7月17日,中央军委在进军广东的部署中指出:“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①据此,19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电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并第48军首长:“为打开进军广东的前进道路与创造有利的前进基地,并为迅速铺开进军广东的各项准备工作起见,决定十五兵团之四八军全部留于赣南,并要求该军于兵团的先头由南昌向赣州挺进。并以先头师由高安经新喻、吉安、泰和、遂川直插赣江西岸之塘江,断敌西退道路;军主力经泰和、兴国沿赣江东侧向赣州挺进。以迅速敏捷之动作占领赣南广大地区,抢占沿途公路桥梁。如赣州之敌未退,则包围歼灭之,并尽可能将伪江西省主席方天所属之两个军歼灭于赣南地区。如敌已退,即控制赣南信丰、南康、兴国地区,维持交通,剿灭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9页。

匪，保证进军广东之陈、邓两兵团后交之安全。”

遵照野战军指示，第48军决定，以主力第144、第143师分别由南昌、上高沿赣江东岸直插兴国，以第142师由高安出发沿赣江以西南进。7月26日，先头第144师由南昌车运樟树，赣西南战役开始。

8月7日，第144师对保1旅发起奔袭，该旅闻风逃往银坑。18日晨，该师占领兴国。第143师主力进至泰和以东一线。11日，第144师按照军的命令分兵两路，一路经南塘直插江口、赣州，师主力向银坑前进。向赣州前进的一路在南塘与第70军第96师1个团遭遇，歼其10余人。师主力于12日占领银坑，13日占领零都，14日向赣州前进。方天闻风弃城逃跑，第144师于14日解放赣州。与此同时，沿赣江西岸前进的第142师于10日在上犹以北之刀子石歼灭第23军第315师1部，11日进占上犹，12日占领塘江，切断了方天部的西逃退路。方天第23军主力向南逃窜，第142师在追击战中又歼其1部，并于14日占领南康，又切断了方天部向西南撤退的道路，并在塘江以南歼其一部。方天部向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地区逃窜。

第48军占领赣州后，为执行中央军委关于迎接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北上赣州开会的任务和继续追歼南逃之方天部，于14日晚作出部署：以第143师（欠1团）附第144师第431团沿赣（州）信（丰）公路向龙南、虔南、定南主要方向追击；以第142师向大庾（今大余）追击前进；以第144师师部率5个营向瑞金、会昌追歼保1旅并迎接方方等北上。各部按此部署于15日展开行动。

第143师于心峰岗、杨梅树下、王母渡追歼第70军第139师等数部后，于17日占领信丰，歼灭第70军后尾300余人。接着，第143师分兵两路，向安远、龙南方向追击。师主力于18日在羊马凹至铁口一线突破第23军第211师3道防线，击溃其第633团，歼灭“赣南游击纵队”1个大队，19日占领龙南，20日击溃

第 23 军第 315 师残部，21 日占领虔南，23 日在上寒洞歼灭第 23 军第 213 师第 638 团全部，解放定南。至此，三南地区全部解放。向安远方向追击的第 427 团，18 日在古陂歼灭第 70 军第 96 师第 286 团大部，20 日占领安远。21 日，在龙塘、半天堂歼灭其第 288 团及“赣南游击纵队”第 2、第 3 大队等部。25 日，又在安息收降第 96 师第 287 团等部 1200 余人。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方天部大部溃散，第 23、第 70 军残部分别逃往广东翁源和梅县地区。

向大庾方向追击的第 142 师于 18 日到达大庾，但该城已于 16 日被解放军粤赣湘边游击纵队的赣南支队解放，于是两部在此会师。由雩都向会昌前进的第 144 师主力于 29 日占领会昌，23 日占领瑞金，29 日占领宁都。至此赣西南战役结束。9 月 4 日，方方等在解放军闽粤赣边游击纵队 3 个团的护送下到达会昌第 144 师师部。

在赣西南战役期间，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之赣南支队、北江第 1 支队、北江第 2 支队和东江第 2 支队等部，积极配合第 48 军解放赣南的行动。赣南支队之虔南大队，8 月 21 日在虔南县城与第 143 师会师。东江第 2 支队第 6 团于 8 月中旬进抵定南县境后，在三南武工队的配合下，歼灭第 23 军 200 余人，20 日解放定南老城，后于和平岑岗接受国民党江西民众自卫军第 4 师第 5 团 500 余人投诚，23 日与第 48 军的部队在定南县城会师。与此同时，东江第 2 支队第 2 团在定南鹅公歼灭第 70 军残部 250 人，后在寻乌配合第 48 军 1 部歼灭独 4 师 250 多人。

赣西南战役自 1949 年 7 月 26 日开始至 8 月 29 止，历时 34 天。第 48 军在粤赣湘边纵队等部的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解放县城 14 座，为解放军主力进军广东开辟了道路。

第三节 各游击纵队开展攻势作战， 准备迎接南下解放军

战略决战以后，南方各解放军游击纵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准备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中南地区。

194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南方游击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批准建立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桂滇黔边纵队，要求各纵队依据情况采取分散作战或集中作战，要求香港分局（1949年3月后称华南分局）在游击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使根据地日趋巩固与扩大”。并指出：“一九四九年应是南方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广大发展的一年”^①。1949年1月1日，闽粤赣边纵队和粤赣湘边、桂滇黔边纵队成立，并联合发表成立宣言。此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香港分局，南方游击战争应“从现有基础上大大发展，逐步歼敌，迎接大军南下。”^②194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向华南分局发出《关于训练干部准备接管广州及其它大城市的指示》，要求做好接收广州、桂林、昆明等大城市的干部等项准备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香港分局于1949年1月1日向各地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江和准备解放广东的指示信》，要求各地“首先解放粤汉路东的粤闽赣湘数十县及路西二三十县，以包围夺取广州”^③。1949年上半年又发出《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等一系列文电、指示，对各游击纵队建军作战、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部署，并先后又增建了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50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4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第41页。

4个解放军游击纵队，使南方游击战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闽粤赣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中共中央在批准建立闽粤赣边纵队的同时，任命刘永生为司令员，魏金水为政治委员，铁坚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朱曼平为副政治委员，林美南为政治部主任。闽粤赣边纵队成立后，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梅州、潮汕、韩江、闽西、闽南支队依次改为第1、第2、第4、第7、第8支队，纵队直属第1、第5、第7等3个团，全纵队1万人。

闽粤赣边纵队整编后，根据香港分局“必须加强兴、五、丰、梅工作，与林平打成一片，并巩固韩江河东与闽西南之联系”^①的指示，针对国民党地方部队收缩兵力，退守较大城镇及交通要道的有利时机，展开了春季攻势。在1949年1至4月期间，共作战310余次，歼灭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2600余人，解放乡镇50多个，使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大。在此基础上，闽粤赣边和粤赣湘边区党委于4月上旬在陆丰县河田五云洞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两纵队配合作战，打通紫金、五华、兴宁、梅县、丰顺、惠阳等11个县的联系，将之建设成为解放华南的大块战略基地。为此，闽粤赣边纵队于4~5月举行了潮（州）普（宁）惠（来）战役，歼灭国民党地方部队1400余人，解放了两英、惠来、丰顺3座县城及鲤湖、流沙、棉湖、蔡潭等8个乡镇，使潮汕、梅州解放区与粤赣湘边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加强对潮梅解放区的领导，边区党委报请华南分局批准，于4月成立了以林美南为主任的潮梅人民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潮梅17县的地方工作。5月25日，华南（香港）分局由香港迁入闽粤赣边区。

在举行潮普惠战役的同时，华南分局与闽粤赣、粤赣湘边区党委大力开展争取敌军起义的工作。在解放军即将解放华南的形势及政治争取之下，国民党广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高参萧文、广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第41页。

东第9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等，于1949年5月14日发表起义宣言，率部8471人于兴梅（粤东）起义。接着，在闽粤赣边、粤赣湘边纵队的协助下，先后解放了龙川、蕉岭、梅县、兴宁、和平、五华、平远等地。5月14日，闽粤赣边纵队又解放了大浦县城。至此，梅州地区全境解放。6月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吴奇伟等：“接读诸先生五月十四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同时，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将一律不究既往，表示欢迎。”^①之后，起义部队接受改编，其中魏汉新保安第12团改编为闽粤赣边纵队暂编第3支队。

粤东起义后，国民党福建第7行政区（龙岩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汉冲、继任专员练惕生及闽西地方实力派傅伯翠等与中共华南分局和闽粤赣边区党委联系，于1949年5月22日率部4100人通电起义，解放上杭、永安、武平、龙岩4县。闽粤赣边纵队第8支队第4团，于5、6月间乘机连克闽南安溪、永春、德化、大田、漳平、宁洋6县。

在粤东、闽西胜利的同时，赣南寻邬地区的游击战争也得到发展。1949年7、8月间，先后成立了“寻邬人民保安队”和“寻邬人民游击队”，分别隶属闽粤赣边纵队第2、第1支队。

闽粤赣边纵队经过半年作战，歼灭国民党地方部队1.7万余人，解放县城19座，圆满完成了中共华南分局赋予的任务。6月12日，中共华南分局将闽粤赣边和粤赣湘边纵队在粤东、闽西的胜利上报中共中央。24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分局：“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如你们能利用七八两月巩固这些胜利，则在九十两月内你们即可集中主力向广州、韶州、赣州之线的方向举行攻势，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19～第520页。

扩大军队及地区，以迎接第四野战军的到来，并准备于十一月、十二月或一月间占领广州。”^①

6月中、下旬，国民党军第8兵团由闽北撤至漳州、厦门地区，其第55军进驻龙岩。7月初，胡璉兵团（即国民党军第12兵团）3个军由江西南撤兴（宁）梅（州）、闽西地区，并对闽粤赣边纵队发动进攻。胡璉兵团的南下，使闽粤赣边区的形势一度严重起来。闽粤赣边纵队则避其锋芒，继续依托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同时集中兵力相机作战。8月中、下旬，胡璉兵团南撤潮汕地区，闽粤赣边纵队乘胜出击，收复永定、上杭、普宁、蕉岭、梅县，9月上旬解放龙岩、平远。经过艰苦斗争，闽粤赣边纵队终于迎来了配合第三、第四野战军解放福建、广东的胜利局面。

二、粤赣湘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经中共中央批准，粤赣湘边纵队于1949年1月1日宣告成立，以林平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松坚为副司令员，左洪涛为政治部主任。2月20日，中共中央又任命梁威林为副政治委员，严尚民（严奎荣）为参谋长。1月17日，粤赣湘边纵队将江南、粤赣边、江北支队改编为东江第1、第2、第3支队，将北江支队、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改编为北江第1、第2支队。以后又从五岭地区抽调兵力，组建赣南支队和湘南支队。经过整编，全纵队共1.5万余人。

遵照中共香港分局关于“粤赣湘边委应努力建立二大据点：一为粤北九连山与五岭；一为惠海陆紫。前者可迎接大军南下，后者可完成路东数十县之首先解放中心”^②的指示，粤赣湘边纵队随即开展春季攻势，以东江第1支队在东江第2支队1个团的配合下，开辟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边区，以东江第2支队主力在北江第1支队、东江第3支队各一部的配合下开辟新（丰）、连（平）、河（源）、龙（川）边区。经过作战，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39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第41页。

在东江以南开辟占领了惠阳河东区及稔平半岛，解放了陆丰西北重镇河田，使惠（阳）东（莞）宝（安）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并沟通了九连地区与东江以南地区的联系，海陆惠紫金边战略基地初步形成；在东江以北夺占据点40余处，解放了近百万人口的广大农村，将国民党地主武装压缩于孤立据点内，新连河龙边战略基地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东江第3支队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东）江北地区的进攻，北江第2支队至6月解放了南雄、始兴平原地区的大部乡村，坚持在湘南斗争的北上先遣队至6月发展到1253人，湘南支队、赣南支队也大力发展了两区的游击战争。

4月上旬，粤赣湘边和闽粤赣边区党委联席会议后，为将东江、韩江连成一片，粤赣湘边纵队决定，由林平、左洪涛率东江第1支队主力和东江第3支队一部，进入紫金作战，以求解放紫金全境；由黄坚松、梁威林、严尚民率东江第2支队主力，进逼东江上游西岸，夺取交通枢纽老隆，解放龙川全境，从西面打通与闽粤赣兴梅方面之联系。作战开始前，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策动了粤东起义。5月16日，东江第2支队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解放老隆，17日解放东水并接管五华县城，24日解放和平县城。在解放老隆的同时，北江第1支队、东江第2支队第2团在新（丰）连（平）英（德）佛（冈）地区发动攻势。北江第1支队，于5月21日解放佛冈烟岭，30日取得挂牌大捷，歼灭国民党军第39军第91师第272团1个营大部，6月13日解放新丰县城，6月22日接管连平。

与此同时，粤赣湘边纵队主力，于5月23日解放紫金县城，6月上旬解放河源，接着挥师南进，进攻海、陆丰，并于7月中旬一度攻占海丰县城。

粤赣湘边纵队经过2个多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数千人，使东江、韩江连成一片，完成了建立粤东战略基地的任务。粤赣湘边纵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1949年5月以后，又组建了5个独立团，7月将起义的保安第13团改编为边纵第4支队。

与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创建粤东战略基地的同时，赣南、湘南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游击战争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赣南支队自1949年5月成立后，转战赣南各地，此后与北江第2支队一部参加了配合解放军第48军解放赣南的战斗。坚持在湘南地区的北上先遣队，于6月16日解放桂东。北江第2支队一部配合湘南支队于6月25日解放汝城，之后两部协同消灭了“粤赣湘边剿匪总指挥部”中将副总指挥胡风璋部。白崇禧部退守湘南后，湘南支队和北江第2支队一部与其第97军等部周旋于汝、资、桂边境。中共湘南工委于6月20日成立了“粤赣湘边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简称湘游），下辖12个大队和2个中队，设南北2个指挥所，活动于资兴、耒阳、桂阳、桂东地区。8月底，湘南支队及湘游划归湖南省军区管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民武装到1949年春发展到400余人，是年9月成立了中山、顺德、番禺3个独立团及三水独立营。

国民党军胡璉兵团南撤粤东后，粤赣湘边纵队立即展开了艰苦的保卫解放区的斗争。胡璉兵团撤退潮汕后，粤赣湘边纵队又乘机收复失地。8月收复紫金、龙门，9月收复兴宁、五华、连平、河源，九连地区全境解放。之后，粤赣湘边纵队参加了配合第4、第15兵团解放广东的战斗。

三、滇桂黔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9年1月1日，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宣告成立，以庄田为司令员，周楠为政治委员，朱家璧为副司令员，郑敦为副政治委员，杨德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3支队和罗盘、盘北、滇东南（开广）、左江、桂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5个指挥部，共1万余人。

桂滇黔边纵队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在中共桂滇边工委领导下，边区各地、各部队放手发展人民武装，使游击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至8月，在左江地区，已建立了2个主力团和10个县大队，攻占3座县城，游击战争扩展到13个县；

在靖（西）镇（边）区，8月成立了右江上游区指挥部，组建了主力团，解放上游区4县的大部乡镇；在右江地区，先后组建了7个相当于团的支队，解放了50多个乡镇，游击区扩展到22个县境；在罗（平）盘（县）区，人民武装粉碎了桂滇黔3省保安团的联合进攻，解放了罗平全境；在弥（勒）泸（西）地区，人民武装解放泸西全境，攻克弥勒、路南、邱北3座县城，并派主力第12团西出滇越铁路，向滇中、滇南发展；在开广（指文山、广南）地区，组建了2个主力团，解放富宁，打通了开广区与靖镇区的联系；桂滇黔边纵队第1支队攻克高良，打通了罗盘、弥泸、开广三区的通道，保证了桂滇边工委进入罗平与桂滇边工委前委会合，第3支队进军滇北，协助开辟滇北游击根据地。桂滇黔边纵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至4月已超过2万人。

在桂滇黔边纵队发展壮大的同时，由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滇南、滇中、滇西、滇西北等各地的人民武装也迅猛发展。在滇南地区，云南人民讨蒋自卫（救）军第2纵队于1949年2月成立后，以主力一部向红河两岸进军，攻克大兴镇等战略据点，巩固扩大了滇南根据地。同时，向滇西南进军，先后解放普洱、思茅、墨江、宁江、澜沧、镇越、江城等9座县城，使思普根据地扩大到12个县；在滇西北地区，6月建立了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先后解放剑川、兰坪、洱源、丽江、鹤庆、碧江、福贡等县，建立了白族、纳西族、傈僳族、藏族、怒族聚居的11个县的滇西北根据地。在滇西地区，4月组建了滇西人民自卫团，在彝族聚居区的祥云、镇南、弥渡等7个县境建立了滇西根据地。在滇中地区，6月把峨山游击大队扩编为滇中游击支队，解放了新平、峨山2座县城，把滇中根据地扩大到玉溪、昆阳、易门、双柏等县。在滇北地区，在桂滇黔边纵队第3支队的帮助下，组建了3000余人的滇北游击队，建立了寻甸、武定、禄功、安宁、罗茨等9个县境的滇北游击根据地。在滇东北地区，2月组建了永焜支队，经过战斗部队发展到3500余人，使滇东北根据地扩大到10余个县境，与

滇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7月19日中共滇桂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在云南砚山县阿猛召开合并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以林李明为书记，周楠、郑伯克为副书记。同时，将滇桂黔边纵队和滇南、滇东北、滇中、滇西、滇西北、滇北的游击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由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治委员，朱家璧任副司令员，郑伯克任副政治委员，黄景文任参谋长，张子斋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2个支队和2个独立团，全纵共3万余人。

滇桂黔边区党委和纵队成立后，在“全面发展，重点巩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华南”的总方针下，全边区掀起了“迎接野战军，解放滇桂黔”的斗争高潮。蒋介石为了拼凑所谓西南防线，把云南作为其在大陆最后角逐的重要作战地区，一面诱迫卢汉从9月9日开始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制造“九九整肃”事件，一面调集部队围攻滇桂黔边纵队。

9月，国民党军第26、第89、第93、第8、第74军的32个团及滇桂黔三省保安部队共3.6万人，开始对滇桂黔边纵队进攻。同时，国民党特务在思普地区策动地霸武装大规模叛乱。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滇桂黔边纵队于9月上旬将第1、第3支队合编为纵队主力第1支队。区党委和纵队部于9月中旬在师宗石洞村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以反“围剿”迎接野战军的部署：由朱家璧率主力第1支队1个团跳到外线，挺进滇西，调动国民党军，打乱其部署，并在沿途抽调第6、第7、第9等支队的各1个主力团，组成纵队主力第2支队；由庄田、林李明、张子斋率主力第1支队的2个团，南下开广，打通滇桂边境通道，迎接南下野战军；由郑伯克到滇中，组织第9、第10支队和独立第1团，向滇越铁路以西出击，把滇南与滇东南连成一片。在边区党委领导下，边区军民投入了反“围剿”斗争。

由朱家璧率领的西进部队（由纵队主力第1支队的1个团和

第6支队的1个主力团组成)，在剑川与第7支队会师后，迂回保山，破坏了滇缅公路上跨跃澜沧江、怒江的功果桥和惠通桥，切断了国民党军逃往缅甸的国际通道，转战30余县，在景谷县与第9支队会合，对挫败国民党军“围剿”起了重要作用。第9支队在边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平定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在云南的其他各支队以游击战、运动战，抗击国民党军进犯，并乘胜收复失地，解放县城和广大农村。在此期间，左、右江支队主动出击，向隆安、田阳、百色方向和黔桂铁路发展，策应野战军南下。边区军民经过3个多月的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6个军、23个保安团及其地方武装共7万余人，歼灭4000余人，俘500余人，争取起义2000余人，缴获各种炮100余门，轻重机枪180余挺，长短枪1万余枝，解放了滇桂黔1/3的土地和1000万人口，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为配合解放军主力解放中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粤桂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到1948年底，中共粤桂边区党委领导的人民武装已建立了第1、第2、第3等支队。进入1949年，区党委为完成中共香港分局提出的巩固雷州半岛并使十万大山与六万大山的游击区连成一片的任务，以第2支队向雷州半岛发动春季攻势，以第3支队向十万大山地区出击。第2支队至5月即解放了遂溪、徐闻、海康3县的大部圩镇。第3支队于4~6月发动夏季攻势，先后作战29次，解放了除防城、东兴据点以外的防城县全境及钦州大部。与此同时，六万大山、桂中南、茂（名）电（白）信（宜）、粤桂南边等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有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区党委将六万大山地区的游击武装编为第4支队。

1949年6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批准建立解放军粤桂边纵队。8月1日，粤桂边纵队宣告成立，以梁广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才猷为副司令员，杨应彬为参谋长，温焯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支队，共1.3

万余人。10月又组建了第7、第8支队，到1949年冬，全纵队发展到2.5万人。

粤桂边纵队成立后，该区的游击战争向更大规模发展。从6月开始，粤桂边纵队集中第6、第3、第4支队的8个团又1个营，发动了打通粤桂边区走廊（合浦、灵山走廊）的战斗。经过3个月作战，至9月底歼灭国民党军809人，使十万大山与六万大山地区联成一片。与此同时，粤桂边纵队指挥其他各部队展开全面攻势，并粉碎了国民党军第62军对雷州地区的进攻。至10月底，全区广大农村基本解放，为迎接野战军进入边区作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五、粤中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到1948年底，粤中地区的人民武装已经建立了新高鹤总队（活动于新会、鹤山、高明一带）、台开赤总队（活动于台山、开平、赤浮一带的滨海地区）、广阳支队（活动于恩平、阳江、阳春一带）、三罗支队（活动于云浮、罗定、郁南一带）以及主力部队独立第1团，总兵力2340人。

为了把游击区建成大块根据地，并打通西江南北地区的联系，逐步发展控制西江，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广南分委要求各地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同时率独1团，于1949年1~3月进军三罗，5月南下滨海，协助两地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49年上半年，粤中被分割的游击区逐渐连成片，先后建立了皂幕山、大隆洞、天露山、云罗阳（春）边等游击根据地，并在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人民武装发展到6871人。三罗支队和台开赤总队，于1、2月间分别改称第4支队和滨海总队。

7月8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转发中共中央关于批准成立粤中临时区党委和粤中纵队的指示。7月中旬，粤中临时区党委和解放军粤中纵队正式成立。粤中临时区党委以冯燊为书记。粤中纵队以吴有恒为司令员，冯燊为政治委员，欧阳初为副司令员，谢创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2支队（由广阳支队改

称)、第4支队、第6支队(由新高鹤总队改称)、滨海总队和独立第1团。

7月初,余汉谋调集国民党军第62军第154团、第461团、广东保安第2师等部数千人,对粤中根据地发动进攻,粤中军民奋起反抗。经过3个月的作战,终于取得了反抢掠、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至9月底,粤中纵队控制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250万,建立了接应配合野战军进军粤中的巩固阵地。

六、粤桂湘边纵队的建立及游击战争的发展

到1949年1月,粤桂湘边区的人民游击武装已经建立了连江支队、绥贺支队和边区独立团,兵力达3200人。为了完成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提出的解放粤汉路西二三十县的指示,边区人民武装于1949年1~4月举行了春季攻势。部队广泛出击,3个多月作战50余次,逐步恢复了广宁老区,开辟了新区,发展了连县、阳山、英德、德庆等地的工作。

从5月开始,边区独立团与绥贺、连江支队各一部,在粤汉路西由山区向平原发展。至9月底,把山区和平原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与此同时,连江支队主力于4月下旬挺进湘南,逐步开辟了宜章、临武、蓝山、桂阳南部,郴县西部和江华大部地区,帮助建立了700余人的地方人民武装,先后两次解放临武县城,发展了湘南的游击战争。9月中旬,连江支队奉命回师广东,则将发展起来的地方人民武装移交中共湘南工委和湘南支队;绥贺支队主力转战于西江北岸地区,开辟贺江下游地区,联合粤中部队共同控制了西江上游从江口至禄步近百公里的航道,使西江南北地区的游击战争连成一片。

经过半年多的作战,粤桂湘边区游击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部队至7月底发展到7000余人。在此基础上,边区部队于8月1日正式建立了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以梁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连江支队、绥贺支队和独立团。

纵队成立后,部队进一步开展攻势。8月19日,绥贺支队夜

袭广宁县境内的北楼岗，歼灭守军 1 个机炮连又 1 个排。8 月 25 日，国民党广宁县县长古纪辙率 300 余人起义。随后，该县各地的“自卫队”也纷纷起义。粤桂湘边纵队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暂编第 2 团。9 月 3 日，纵队独立团与绥贺支队 1 个团及暂编第 2 团并肩作战，一举攻克广宁县城。与此同时，绥贺支队完全控制了渔捞平原，实现了控制贺江的战略目标。

七、琼崖纵队的攻势作战

琼崖纵队自 1947 年 10 月成立后，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至 1949 年 1 月，已发展到 3 个总队、1 个独立团共 10 个团 1 万余人，以冯白驹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振亚、吴克之为副司令员，马白山为参谋长，李明为政治部主任。

1949 年 3~5 月，琼崖纵队集中 6 个团对琼西发动春季攻势，经过海岸岭、新州、南辰、石碌、东方等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第 64 军第 155 师及地方部队 2200 余人，解放了新州、昌化、感恩 3 座县城以及石碌矿山、广坝电站等 20 座城镇，攻占和逼走国民党军圩镇和据点 87 处，琼崖纵队发展到 1.6 万人。

春季攻势后，为了充实纵队领导，中共中央于 1949 年 5 月 28 日任命马白山为副司令员，黄康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7 月初，琼崖纵队集中 9 个团对琼东北发动夏季攻势，连克龙江、阳江、重兴等据点，扩大了根据地。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第 32 军从青岛撤至琼崖。该军一上岛，便配合原驻岛的第 64 军对琼崖纵队发动进攻。冯白驹遂命令部队停止夏季攻势，撤回原防休整待机。继第 32 军之后，国民党军第 50 军第 36 师及山东省保安旅等部也陆续上岛，在国民党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陈济棠指挥下，参加对琼崖纵队的作战。琼崖纵队在区党委领导下，以广大农村为依托，发动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作战。经过 7、8、9 三个月的反“清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 669 人，拔除和逼退国民党军据点 50 个，并在战斗中扩建了 1 个团。广州解放后，到 10 月中、下旬，国民党军在海南岛的总兵力达 10 万余人，形势更加严重。

琼崖纵队则以分散和集中作战相结合，开展反抢掠、保秋收、保粮食的斗争。12月中旬，第3总队在岭口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第765团，首创琼崖纵队一次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的战例。12月下旬，第5总队在新宁坡歼灭第64军第156师近1个团，击溃该师。经过艰苦奋战，1949年10月至1950年初，琼崖纵队共歼灭国民党军2800余人，攻占和逼走国民党军据点30多个，并新组建了1个独立大队，为配合野战军解放海南岛打下了基础。

1948年冬和1949年春夏，在解放军各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南方游击战争也获得了大发展。到1949年8月，各地的人民游击武装已建立了较正规的游击纵队，而且解放了一批县城集镇，扩大了根据地，为解放军主力进军华南、西南、华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节 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确立及 第四野战军的暑期休整

一、白崇禧的作战计划

宜沙、湘赣战役后，解放军挺进湘中、赣南，白崇禧部则退据以衡阳、宝庆（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宋希濂部逃往鄂西恩施地区，扼守川东门户（其鄂西绥靖司令部改称川湘鄂绥署）；余汉谋部仍据守广东。

白崇禧鉴于湘中危殆，粤北空虚，湘南不稳，部队突围又多有折损，遂对其部队进行整理，并采取了如下整备措施：将起义后又叛逃的部队重组为第1兵团，由黄杰任司令官，移至宝庆地区整补；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部移至宝庆、祁阳地区整补；成立湘西绥靖司令部，以刘嘉树为司令，负责整编泸溪、辰溪、溆浦、怀化、芷江、麻阳、凤凰等地的地方团队，成立暂编第5、第6军；由宋希濂收编湘西地方团队，成立暂1、暂2、暂3军；第11兵

团收编广西地方团队成立第 125 军；以第 3、第 10、第 11 兵团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位于衡阳以北、以东各地，与解放军保持接触伺机反扑，以掩护邵、衡地区的安全及后方部队的整训^①。9 月上旬，白崇禧又撤销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部和湘西绥靖司令部，将之改编为第 17 兵团，以刘嘉树为司令官，下辖第 100、第 103 和暂 5、暂 6 军，兵团部设于芷江东北的榆树湾，负责湘西作战。经过整补，白崇禧部计 5 个兵团 14 个军 30 个师。

白崇禧在整顿部队的同时，制定了“以维护粤、桂、川、黔之安全，并相机打击匪军之目的，即以主力于湘江两岸地区，采取持久，力求创机歼敌，各以一部在湘西及鄂西方面，利用山岳地障，拒匪进犯，并相机策应湘江方面之作战”^②的方针。据此，白崇禧以宋希濂部担负巴东、五峰、渔阳关、慈利、大庸之线的作战，自率主力于宝庆、衡阳地区，企图依托湘江、资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解放军前进。其兵力部署为：第 3、第 10、第 11 兵团部位于衡阳；第 46 军位于乐昌；第 97 军位于郴县、汝城；第 48 军位于耒阳；第 7 军位于衡阳、泉溪；第 58 军位于衡山；第 1 兵团部及第 14 军位于宝庆、新化地区；第 71 军位于宝庆东北之界岭、青树坪一带；第 100 军位于洞口；第 103 军主力位于祁阳西北之文明铺，1 个师位于永丰；第 125 军位于花石以南、衡山以北地区；第 126 军位于零陵；第 56 军位于全州；暂 5、暂 6 军分别位于沅陵、溆浦地区。

二、第四野战军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确立及南进部署

第四野战军自南下作战以来，由于白崇禧极力避免与解放军决战，因而几次战役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如何抓住白崇禧集团并将其全歼，是第四野战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和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6 册，第 303～第 304 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6 册，第 304 页。

第四野战军领导总结了前段作战经验，进一步研究了白崇禧的指挥特点，确立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

湘赣战役后，基于白崇禧主力很可能由攸县、茶陵地区继续南撤，直至退守湘江或退入广西之隘路的判断，7月14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电中央军委：“目前我拟以四兵团两个军改向遂川、桂东、资兴（兴宁）、永兴、郴州前进，以另两个军经莲花向茶陵前进，十五兵团进至分宜、宜春之线，十二兵团进至醴陵、株洲之线”，“如敌在茶陵、攸县地区与我作战，则我以陈赓兵团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攻击，以十二兵团、十五兵团由北向南攻击。如敌不在茶陵、攸县地区与我作战，而退湘江与我对峙或退入广西，则我全军等候宜昌、沙市部队南下，然后以陈赓兵团西进对付桂敌，以十五兵团出赣州、南安入粤，其他各部沿粤汉路两侧入粤，先解决广东，然后再进入广西”。这一作战计划的主旨是，如白崇禧在茶陵、攸县地区作战，则继续使用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求歼其主力，如其不战后撤，则先取广东，再入广西。

对这一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于16日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

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①。

17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毅、饶漱石、粟裕，对16日电补充如下：“（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5～第636页。

贛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们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你们意见如何，望告。”^①由此，中央军委提出了对白崇禧集团作战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及贯彻这一方针的兵力部署设想。

对中央军委的上述意见，第四野战军表示：“同意十七日电示，当遵照该指示指导尔后行动”^②。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也于18日致电中央军委：经讨论后完全同意中央军委17日电部署。“第一，从战略上，陈赓一路由江西出广东经广西并出云南的迂回兜击，在现时全国敌弱我强及双方分布态势下极为必要。第二，在白匪与其两侧之匪分离而不退广东的情况下，如此可以协取广东，早得广东就势出广西，迂回白匪右侧背，而与我北路军协同作战的钳形机动，使白匪无法节节抵抗逃出合围。第三，陈赓就现态势下南下广东极为顺手，既可避免与湘西友军交叉运动磨擦，且减少粮食与道路的困难，并便于四个军刻在吉安、安福地区集合待命”。至此，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最终确立。

根据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于17日确定了如下进军部署：以湖北2个独立师、当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9～第640页。

^② 1949年7月19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致中央军委并刘伯承等的电报。

阳 2 个独立团位于宜昌地区，监视巴东地区之宋希濂部；以留置河南的第 42 军的 1 个师位于襄樊一带清剿土匪；以第 47、第 46、第 49 军留置湖南，其中 1 个军（后为第 47 军）位于常德、沅陵、五峰一带对付宋希濂，以另外 2 个军分别在湘桂路两侧地区（后为第 49 军）和粤汉路以东地区（第 46 军）地方化；以 1 个军（第 48 军）和第 15 兵团的 3 个独立师共 6 个师位于江西并实行地方化；以第 38、第 39、第 40、第 41、第 45 军组成求歼白崇禧集团的北路军；陈赓兵团（南路军）和邓华兵团分两路南下广东；曾生两广纵队于 7 月底 8 月初由河南出发，经江西入粤；伏天过后即开始南下广东和求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21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部署。此外，经中央军委批准，第四野战军决定第 50 军不再去云南而留于宜昌地区对付宋希濂。

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确立之后，中央军委对求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又不断加以补充、修改，从而使之更加完善。根据程潜、陈明仁关于桂系将西撤贵州，解放军“在兵力部署上，应注意在沅陵、芷江方向至少有一支兵准备切击桂匪退入贵州”^①的建议，中央军委于 9 月 1 日致电林彪、邓子恢等：“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②

9 月 9 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就第四野战军等部三路进军中南，求歼白崇禧集团提出构想：“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

^① 1949 年 8 月 26 日萧劲光致第四野战军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663 页。

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罗城、天河、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①

这时,第二野战军主力正向湖南开进,并且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与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的作战密切相关。为此,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林彪、邓子恢等并报中央军委,询问第四野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67~第668页。

军关于防止白崇禧集团向贵阳逃跑的部署等事宜，同时建议第二野战军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第四野战军首长指挥。12日，中央军委复电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等：“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①据此，第二野战军之第5兵团，除第18军外，第16、第17军如遇战事亦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这样，第5兵团成为第四野战军的战役预备队。

根据中央军委三路南进的作战计划，第四野战军相继作出部署：以第4兵团之第13、第14、第15军和第15兵团之第43、第44军共17个师及两广纵队组成东路军，由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进军广东；以第13兵团之第38、第39军8个师组成西路军，由兵团司令程子华指挥，向芷江、黔阳前进，占领靖县、通道，截断白崇禧撤往贵州的道路，尔后准备突然出柳州；以第12兵团之第40、第41、第45军和准备留置湖南的第46、第49军组成中路军，担任进占宝庆和截断湘桂路，歼灭白崇禧第71军等部的任务；第18军在白崇禧部撤退时进占衡阳，尔后继续西进归还建制；第47军集结于湘西永顺、大庸以南地区，协同湖北地方部队监视宋希濂部，保证解放军的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入川前的集结。

在东、西两路军实施大迂回的情况下，中路军的行动对作战影响极大。为此，第四野战军在9月11日的部署中指出：“十二兵团不宜过早进到战役集结位置（湘乡、永丰之线），最好是在本月二十六日出动，二十八日进到战役位置（我向湘乡、永丰集结，敌人一定发觉）”^②。24日，林彪、邓子恢等又致电萧劲光等：我军作战“以右路程子华、左路陈、邓，以大箝形态抄袭敌人，你们（中路）三个军须等待右路已进占芷江、黔阳，左路已到曲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70页。

^② 1949年9月11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第12、第13、第15、第4兵团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

附近，那时中路部队才从湘乡、湘潭、蓝田之线前进。故中路行动不可过早突出南下，你们掌握此要旨指挥具体行动。”“在我右路未到达芷江以前，左路未到达曲江以前，在此期间如白匪自衡阳、耒阳之线西进或沿湘桂路退广西，或沿粤汉路南撤，则你们可依当时具体情况自湘乡、湘潭、蓝田之线提前出动，其前进具体方向依当时敌情再定。”同时，针对白崇禧主力“在衡州、耒阳一带，企图诱我前进，袭击我军”的情况，第四野战军于9月16日指示位于茶陵、安仁地区的第18军：“你们目前仍应在现地监视敌人和进行休整，如敌无大动作，你们亦暂在现地勿动，视白匪尔后行动再规定动作。”

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出发，根据白崇禧部队的作战特点及宜沙、湘赣战役的经验而制定的。这一作战方针的确立，有着重大意义。第一，可不为白崇禧灵活机变的战术所牵制，完全掌握战略主动权。第二，可阻止白崇禧部西向云、贵与西南国民党军会合，迫使其不得不加速向广西撤退，便于将其在广西境内各个歼灭。第三，可加速对湖南、广西的占领，并保障第二野战军11月向西南进军。

三、暑期休整与“兵强马壮”运动的开展

宜沙、湘赣战役期间，正值南方的酷暑多雨季节，北方部队初到南方水土不服，干部缺乏防病防暑经验，又缺少雨具、蚊帐，部队在行军和作战中，经常淋雨、涉水、露营，故大批发生疟疾、痢疾、腹泻、中暑等疾病。由于药品不足，不能有效预防与治疗，加之筹粮困难，营养不良，体力锐减，发病率更高。一般连队的发病率在25%以上，重者超过50%。发病最严重的第43军病号多达3.1万余人，占总人数的73.2%，许多营、连已失去了战斗力。战马的损伤情况也极为严重。以第43军为例，马匹患病、拐腿，占马匹总数的70%。在此情况下，部队一时思想波动，干部、战士开始滋长急躁埋怨情绪。

此外，经过前一阶段的行军、作战，发现了不少急需解决的

问题。在武器装备方面，宜沙、湘赣战役开始前虽进行了初步精简，但由于时间仓促，进行得不够彻底，仍较笨重（炮多、车多、马多），不适合于山地、河川作战，大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使追击部队丧失有利战机。在战术技术方面，部队初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战，对其力避决战，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在战术上善于寻求解放军弱点攻击等作战特点还没有一套对付办法，也不善于根据山地及稻田水网等自然条件组织行军、宿营和作战，因而往往错过有利战机，个别部队甚至遭到袭击、伏击，蒙受损失。在后勤保障方面，不能对部队的各种需要给以及时有力的保证。这说明，部队虽经平津地区休整及各种临战准备，但在思想认识、组织装备、战术技术、后勤保障等方面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环境，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作战。

根据部队的病情状况及暴露出来的问题，林彪、邓子恢等于7月23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部队的疾病情况，并建议停止进军，就地休整。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第四野战军的困难十分关心。7月24日，中央军委批准了第四野战军及陈赓兵团休整的建议。26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邓子恢等：“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①8月26日，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向中央军委转报了第43军关于病号情况的电报。第43军在电报中建议，为保证部队喝开水，烧柴标准应由每人每天2.4斤增至4斤，并保证每人一个水壶或竹筒；应恢复粮食供应制度；由于新区价格昂贵，要求提高菜金标准。中央军委收到此电报后，周恩来于29日在电报上批示：“交杨立三、李涛速向聂请示，拟具体办法商复。”同日，中共中央也致电华中局，询问部队病情，指示采取统一办法克服困难。31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并告华中、华东、西北局及第一、第二、第三野战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38页。

军：“（一）为使行动中不喝或少喝冷水，前线部队可按实际需要增发烧开水的柴火〔禾〕数量。照供应规定，野战军每人应有水壶一个，如无军用水壶可以竹筒代替。以上费用由公家报销。（二）粮食应照供给标准上所规定的供给。菜金每日多少，应使能买到供给标准上所规定的油、盐、菜等足够数量之实物为基准，并依当时当地一般价格计算，以保证前线指战员的营养，以期身体健康。前线部队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以极大努力搞好连队、机关、单位大众的伙食”。“为保证前线部队供给，应准许在新到的地区中使用现洋，同时后勤部门及贸易机关应组织一些轻便物资（如布疋、线类等）输送前方，向农村换取军队必需的日常供应品。”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于7月23日作出休整部署：第12兵团以长沙、萍乡、平江为中心，第13兵团（包括第39军）以常德、桃源、沙市为中心，第15兵团以南昌、宜春为中心，第4兵团以吉安、泰和、安福为中心，从8月1日起先后转入休整。同时，第13兵团以第49军派出先遣师向新化、宝庆逼进，第12兵团以第46军派出先遣师向衡阳、郴州逼进，第4兵团以第18军派出先遣部队向衡阳逼进，压迫白崇禧部向后撤退，以扩大粮源，修复道路，掩护主力休整，以利尔后作战。暑期休整的主要内容为：

（一）开展以治病、防病和恢复体力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

由于非战斗减员相当严重，迅速恢复部队的战斗力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营以上单位成立了临时收容站、休养所和治疗所，将病号分别集中，突击治疗。团成立了马匹治疗所，集中治疗病马。各部队还尽可能改善生活，帮助病员恢复健康。与此同时，在“防病胜于治病”的方针下，对部队普遍进行了一次卫生防疫教育，在配备马匹的单位还进行了爱马的教育。通过教育，消除了部队“到南方必然生病”的盲目恐惧心理，稳定了部队的情绪。之后，

即开展讲卫生评比竞赛，各班、排都制定了卫生公约，有马的单位还制定了爱马公约，从而使人马的发病率大为下降。这一运动的开展，使部队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组织思想整顿

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各军在开展形势与任务教育、军民团结教育、政策纪律教育、与游击队会师教育的同时，把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作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中心环节，教育干部树立尊兵爱兵的观点和意识。休整期间，各连队普遍召开了民主团结会，检查干部，检查工作，检查思想，提倡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通过教育和整顿，沟通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提高了士气，基本克服了厌南思北的思想，坚定了继续南进的信心。与此同时，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伤病员归队工作，使在战役进行期间掉队的伤病员大部分回到了部队，使部队得到巩固和充实。

（三）调整编制装备，改善后勤保障工作

在宜沙、湘赣战役前初步调整、精简的基础上，再进行适度精减。经过精简调整，步兵营之机炮连的重机枪由6挺减为4挺，六〇炮由9门减为4门，战士携带的弹药基数也适当减少；师山炮营由3个连4门制改为3个连3门制，师、团炮兵一律驮载，营以下的火器均以人扛；干部行李进一步减轻，营以下单位减少马匹。

在后勤保障方面，将后勤分部改属兵团建制，各军由兵团直接供应；后勤部门在思想上纠正了对前线作战部队扣得过紧而未能充分保证的缺点；为提高运输能力，加强了汽车运输，取消了军的大车队，增设人力运输分队，军设人力运输营，师设人力运输连，团设人力运输排；平汉路郑州至汉口段铁路自8月1日修复通车后，又将铁路修复至长沙地区；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援下，大量制发了雨具、蚊帐、水壶、医药器材等，水壶不足则以竹筒代替；大力筹集了银元，以供部队使用。

（四）进行战术技术训练

针对白崇禧部队的作战特点及南方地形，从8月中旬起，各部队进行了战术技术的教育训练。在干部中主要进行了如何组织行军、宿营，如何机断行事、争取先机及时掌握战机歼灭敌人，在山地如何先完成迂回包围尔后组织攻击，以及对溃退之敌如何采取多路平行追击和迂回等战术原则的教育，并结合运用这些战术进行了演习。在战士中则主要进行了山地作战的队形和进攻动作的训练，并结合进行了爬山、游泳、划船、使用三角浮板、强渡江河、通过水网地等项练兵活动。

暑期休整从8月1日开始至9月10日止，共40天。经过休整，部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部队健康状况普遍改善，90%以上的病员恢复了健康，战士开始习惯南方生活；一度不正常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得到改善，连队又重新活跃起来，部队恢复了生机。经过整休，部队认真总结了行军作战等各方面的经验，完成了进军中南以来在思想认识、组织装备、战术技术、后勤保障上等一系列重大转变，从而为继续追歼白崇禧集团进而加速解放中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在休整期间，第四野战军还调整了部队建制。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第14兵团部调北平与军委航空局合并组建空军司令部。8月11日，第14兵团部停止办公，其所属第39军改归第13兵团建制，第41军改归第12兵团建制，第42军由第四野战军直接指挥。

第五节 举行衡宝战役，重创白崇禧集团

一、白崇禧反击第四野战军中路军的企图

9月上旬，第四野战军结束休整，准备开始新的作战。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为进军西南，也正由江西、湖北向湖南集结。第5兵团第17军8日进至上高、万载一线，第16军9日进至清

江以西之罗场街。第3兵团第12军10日全部在孝感下车，向湖南开进。

第四、第二野战军云集湘赣，使白崇禧惊恐不安。他认为，不仅第四野战军要加入中南战场作战，而且第二野战军及第三野战军位于浙赣路上的部队也随时有加入中南战场的可能。白崇禧估计，解放军用于中南地区的兵力不下23个军，并将以4个军向湘西进攻，以5个军向永丰、衡山、衡阳、耒阳一线进攻，以11~12个军向永兴、郴州、宜章及粤北进攻，进而判断解放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在衡山至乐昌以东，“似有以一部向赣粤边区进出，牵制我广东方面兵力之转用，而集结其主力，对我华中野战军，实施决战，企图于衡阳地区击灭国军有生力量后，再向粤桂地区进犯，以达成其攻略华南之目的。”为此，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予进攻之解放军“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尔后之作战”^①。

9月10日，白崇禧在衡阳以武定字第2862号令颁布作战计划，确定了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诱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根据这一作战目的，白崇禧准备以第17兵团防守湘黔边境地区，以第103、第100军西调安江、泸溪归建，确保左翼安全；以第1兵团之第14、第71、第97军及第11兵团之第125军担任邵、衡公路及其以北地区的防御，迟滞解放军南进；集中第3、第10、第11兵团的5个军于衡阳至郴州地区，即以第7军位于衡阳，第48军位于耒阳，第58军位于衡阳以东之洣水西岸，第46军位于永兴，56军位于郴州，准备歼击由攸县、茶陵地区西进的解放军第46、第18军；以第126军位于东安地区，任战役预备队。为实施上述作战计划，白崇禧要求：凡参加衡、郴地区作战的部队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郴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13~第314页。

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以弥补炮兵力量之不足；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室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以利作战；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①。

白崇禧基于对解放军要在衡阳地区与之决战的判断，集结主力于衡、郴地区，准备与解放军作战。白崇禧之所以要进行军事冒险，是因为他存在着种种的侥幸心理和幻想。白崇禧认为，湘南地区的地形和作战条件于己有利，解放军在进攻中必然暴露其弱点，因而集中主力于一个方面实施反击的战法能够继续灵验，而只要在衡、郴以东反击成功，即可停止解放军的进攻，达到“持久作战”的目的，并可“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进而得到美国的援助。然而，白崇禧的种种侥幸心理和幻想，随着衡宝战役的开始统统化为乌有。不仅如此，白崇禧的这种“反击”作战方案本身，就使自己陷入了完全被动，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根据上述作战计划，第103、第100军于11日开始西调，但第46、第97、第56等军未能来得及行动，衡宝战役即已开始。

二、西路军进击湘西，中路军集结湘中

担任向湘黔桂边战略迂回任务的第13兵团，以第38军沿湘黔公路和资水分东西两路南进，以第39军分两路跟进。9月13日，第38、第39军分别从常德、桃源和澧县、公安地区出发，衡宝战役开始。

西路第38军第112师，于15日占领三渡水、黄土铺，18日占领沅陵。驻守沅陵的保安第5师西逃辰溪，一部被截歼于沅陵西北山区。第112师又于21日进占泸溪、辰溪，23日占领麻阳东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14～第315页。

北之高村。与此同时，东路第 38 军第 113 师于 19 日占领溆浦。至 28 日，第 38 军各师集结于高村、岩口、五安坪、小龙铺一线，第 39 军第 117、第 152 师集结于溆浦、底庄一线，第 116、第 115 师位于辰溪南北地区。

这时，白崇禧之第 100 军军部抵达洪江，其第 179 师 3 个团分驻安江、洪江、黔阳，其第 19 师位于安江、江口一线。第 103 军军部进抵榆树湾，其第 234 师于 21 日进驻怀化，该师第 700 团于 25 日进至怀化东北之花桥、游家坳地区，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解放军南进。此外，国民党军芷江警备司令部（辖 2 个警卫团）、清剿总队（辖 4 个支队）、联勤总部和国防部第 5 突击总队等部驻芷江，第 17 兵团部驻芷江东北的榆树湾，驻贵州的何绍周第 19 兵团以第 49 军向玉屏、新晃开进。

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 13 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守军和占领江口，并相机歼灭花桥守军，然后再求歼第 103、第 100 军主力。为此于 27 日决定：第 38 军第 112、第 151、第 114 师于 30 日出动，10 月 2 日围攻芷江，第 113 师于 10 月 1 日进击花桥、怀化守军；第 39 军第 117、第 152 师于 30 日出动直奔江口，攻占江口后以一部控制之，主力向安江攻击前进，第 116、第 115 师尾第 113 师南进。

芷江地区守军惧歼，于 30 日前逃跑。第 112 师 29 日占领麻阳，10 月 2 日进占芷江。第 113 师于 10 月 1 日歼灭第 700 团大部，俘 1300 余人，并于当日占领怀化，次日进占榆树湾。第 117 师于 2 日占领江口。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纷纷南逃，西路军各师遂展开追歼。第 113 师 3 日占领黔阳（今黔州）。第 112 师 4 日占领会同，追歼第 103 军一部，缴获汽车 30 余辆，5 日继占靖县。第 117 师于 2 日占领龙塘，并在积木界、大坪追歼第 100 军第 19 师一部。第 116 师于 3 日占安江，4 日占洪江并追歼逃军一部，缴获汽车 22 辆，后强渡沅江向会同追击，于 5 日 2 时在会同东北之岩脚堵截

住正在南逃的伪湖南省政府及第 103、第 100 军各 1 部和第 5 突击队全部。经 5 小时激战，全歼该部，俘 4000 余人，缴获汽车 80 余辆。

西路军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 8600 余人，解放了芷江等 11 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了芷江至靖县一线，突破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

当西路军开始向芷江挺进时，中路军主力乘第二野战军经湖南向贵州西进的机会，隐蔽向预定地区集结。9 月 15 日，第 41 军由金井、平江一带出发，伪装成地方部队沿小路行进，18 日至 22 日经长沙渡过湘江，28 日到达壶天及娄底以北地区。第 45 军于 9 月 21 日由萍乡出发，25 日在湘潭、下摄司西渡湘江，10 月 1 日全部进至湘乡、潭市、虞塘地区。第 40 军在第 46 军的掩护下由攸县出发，于 9 月 30 日在三门、淦田、昭庆渡过湘江，10 月 2 日进至花石、锦石、中路铺一带。为掩护中路军主力集结并策应西路军作战，从 10 月 1 日开始，第 49 军第 145、第 146 师对永丰（今双峰）以东之蒋市街守军第 71 军佯攻，第 147 师对新化守军第 14 军佯攻，第 46 军一部沿洙水向白崇禧部第 58 军佯攻。与此同时，第 46 军、第 18 进抵安仁地区。至 10 月 2 日，中路军完成了战役集结和攻击准备。

三、中路军歼灭白崇禧主力 4 个师

当西路军攻占芷江并乘胜扩张战果时，东路军亦由赣南分路向广东挺进。在此形势下，衡宝地区的白崇禧集团主力并无撤退征候。为此，林彪、邓子恢等于 9 月 28 日决定：第 18 军归第 12 兵团指挥，并于 29 日致电萧劲光、唐天际等：“四一、四五、四十共三个军，仍即直接向宝庆、衡阳之间及其以南前进，设法抓住一股敌人并断其退路。”第 12 兵团据此于 30 日作出部署：第 40 军，“首先奔袭抓住白果寺、新桥、鱼鳞桥之敌，尔后向渣江、赤水铺之敌攻击前进”；第 45 军“首先抓住永丰、蒋市街之敌，尔

后向演陂桥、小岭口攻击前进”；第41军“首先抓住太平桥、青树坪之敌，尔后向黑田铺、宋家塘之敌攻击前进”。“以上三个军完成突破衡宝公路之作战任务后，以主力向祁阳及其东北地区攻击前进，切断敌向广西之退路”；第46军“向耒阳攻击前进”；第18军“向耒阳、郴州之间前进”；第49军除第147师“仍箝制新化之敌”外，“其余两个师为兵团预备队，在四五军后尾跟进”。第四野战军要求各参战部队严格掌握：先完成迂回切断，再进行包围攻击；正面部队须等待迂回部队到达，而不可进得太快；在情况不明时，应大胆渗透迂回切断，而不与国民党军正面相持。第四野战军领导人认为：“如我军能将敌一两个军或一两个师的后路迂回切断，则可能造成在湘南境内歼灭桂军的结果。”^①

10月2日16时，中路军主力从北面分3路展开攻击：右翼第41军4个师向永丰至黑田铺地段突击；中路第45军4个师向永丰至蒋市街地段突击；左翼第40军3个师向新桥、白果市地段突击。至3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国民党军的一线阵地，第45军歼灭守军第71军第88师第262团。接着，中路军主力继续向纵深发展，至5日拂晓，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渣江一线阵地，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与此同时，第46军第136师攻占羊际，出现于守军第58军第226师侧翼，第18军第54师进至安仁西南，与守军第48军第175师对峙，第49军第174师逼近新化县城。

白崇禧看到其北面一线阵地被攻破，并且解放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不在东面而在北面，遂调第7军沿衡宝公路西进，另调驻耒阳的第48军、驻郴州的第97军各一部及驻昌乐的第46军北上，企图仿效青树坪的战法，集中主力对解放军之突出部队实施反击。4日，白崇禧主力13个师先后抵达衡宝一线，与解放军中路军一线兵力大体相等。

5日，白崇禧以第48军第176师、第71军第87、88师为第

^① 1949年10月2日林彪、邓子恢等致萧劲光、唐天际、解方等的电报。

一梯队，以第7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向进至界岭、金仙铺一带的解放军第41军实施反击。失败后，又以第48军第138师和第7军第172师进至渣江以南，阻止解放军南进，以第46军第188师、第97军第33师、第7军第224师、第58军第183师和第126军第304师（该师作战开始后配属第125军）共5个师由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指挥，由东、西两面向位于渣江地区的第40军实施夹击。与此同时，以第46军第174、第236师集结于衡阳作为预备队，将第126军第305师和第97军暂11师西调武冈、新宁，掩护左翼安全，防止解放军西路军东进。

针对上述情况，林彪、邓子恢等认为：“敌正布置在衡宝间与我决战。”^①为此，于4日23时命令中路军各部：“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各部应即在现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候我兵力之集中。”5日10时30分，又命令中路军并各军、师首长：“（一）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二）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三）作战布署大约是：以四一、四五两军及四十、四九军之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四）目前已突过衡宝公路之我军，则应在水东江、宋家塘以南地区集结，在公路以北者暂勿南进。（五）各部皆须作敌向我进、向东或向南撤退以及在原地不动等三种情况的处置，并以机动精神处理情况。”同时命令程子华率西路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命令杨勇率第16、第17军向白果市前进，以集中兵力与白崇禧主力决战。同日12时，林彪、邓子恢等致电中央军委，在报告了情况及上述部署后指出：“今后向广西进军仍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机会而不能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18时，林彪、邓子恢等又指示中路军：“在我兵力未集结前，如敌向我大

^① 1949年10月4日10时林彪、邓子恢等致杨勇、苏振华并告萧劲光、唐天际、解方的电报。

举进攻时，各部队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已插至衡宝公路以南的部队，则可向宝庆东南方向移动。”7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等：“（一）同意五日十二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①

按照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中路军主力停止于衡宝公路以北地区待命。但第45军第135师在前进途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已乘隙越过衡宝公路，于5日12时进至衡宝公路以南的沙坪、灵官殿地区，孤军楔入国民党军的侧后。14时，第135师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向野战军报告了情况。18时，林彪、邓子恢等直接致电丁盛、韦祖珍并第45军、第12兵团首长：“（一）你师明日上午应在现地休息和待命，准备下午向湘桂路前进，于六号十二时左右突然进至洪桥、大营市之线翻毁铁路。（二）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三）目前敌后甚空虚，你们须采取机动灵活的独立行动，袭歼小敌，截击退敌。”鉴于第135师已插到白崇禧部后面，为能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协调各部队的行动，林彪、邓子恢于6日决定，中路军各军暂由野战军首长直接指挥，并命令第18军向常宁、祁阳地区前进，第46军向耒阳前进。

第135师的行动，大大震撼了国民党军，白崇禧急忙以第7军第176师尾击该师。6日拂晓，白部第7军对衡宝公路南侧之孙家湾一带的第135师第405团阵地连续4次猛攻，但均被打退。当日下午第135师向石株桥前进，途中又击退白崇禧部的多次攻击。

白崇禧虽企图在衡宝地区与解放军作战，但鉴于解放军西路军开始由芷江、黔阳、会同地区向武冈东进，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135师已渗透到其侧后，衡宝地区的国民党军处境十分不利，有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危险，遂于6日黄昏下达撤退命令：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0页。

“（一）、本署为避免于不利状况下与匪决战，于七日向武冈、东安、零陵、道县之线转进，并以有力一部，击破武冈、洞口之匪解除左侧威胁，然后诱匪至湘桂边区，相机予以打击之。（二）、第十兵团，指挥郴州附近第九十七军及第四十六军（欠第一七四师），自郴州地区向道县转进。（三）、第十一兵团，并指挥第一七五师（第四十八军）及第三〇四师（第一二六军），自湘江西侧地区，向零陵转进。第十兵团副司令罗活，指挥第一二六军（欠第三〇四师）自东安沿新宁向武冈前进，并以第三〇五师，固守武冈，以待第三兵团之到达。（四）、第三兵团除以第四十六军之第一七四师，继续留置祁阳冷水滩各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掩护我主力西进外，该兵团指挥第七军及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军主力，向东安、武冈间地区前进，迅速向突入武冈附近地区之匪军攻击而歼灭之。（五）、第一兵团，除派出有力部队，继续留置仙槎桥（邵阳东南）、邵阳、三口铺之线担任掩护外，指挥第十四、第七十一军沿塘田市（邵阳以南五十公里）、桃花坪、竹篙塘之线，右与第一七四师连系占领阵地，阻击匪之南进，掩护第三兵团对武冈当面之匪军攻击。当第三兵团实施攻击时，并应以有力部队，向洞口、江口方向攻击，以策应我主力方面之作战。（六）、第十七兵团，指挥所属仍在会同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拒匪南犯。”^①

6日24时许，国民党军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等获悉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于7日5时开始命令第135师于现地坚决堵击、侧击南撤之国民党军，迟滞其后退；令西路军迅速占领武冈一线，堵击退却之第71、第14军；中路军第41军猛攻第71军，第45军尾桂系第48、第7军追击，第40军向洪桥、白地市追击，第49军之第146、第145师向水东江及其以东追击，策应第41、第45军作战；第49军第147师向巨口铺及其以南前进，配合西路军作战；第46军主力渡过湘江向衡阳、耒阳前进；第18军迅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19～第320页。

速向永州方向发展；第5兵团第16、第17军向衡宝路中间地区推进。林、邓要求，“凡遇到敌人一个团或一个师的兵力时，应首先将敌人退路切断，围而不攻，等友军到达后再作有准备有配合的进攻。”“凡未抓住敌人的部队，则应参加包围友邻我军所抓住之敌，或继续猛追求得抓住一部敌人。”^①“必须以三至四倍兵力的对比，去包围和歼灭敌人，如兵力太少，则甚难取胜。”“必须求得在此次追击中歼灭白匪一部，并争取吸引其大部，以便歼灭。”^②“野司根据密息，只能规定各部行动的方向，但各兵团、各军必须以机断专行的精神，加强对各师的具体指挥，不可一切等候我们的指示，以免失掉机会。”^③

第135师主力于7日1时许进至石株桥一线，恰遇白崇禧部4个师正准备由关帝庙、严家殿、黄土铺一带南逃，遂占领有利地形，阻止和吸引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即对该师分割包围，发起猛攻，企图一举歼灭第135师。该师则积极顽强地与优势的国民党军周旋于群山丛林之中。师主力第404团在四水塘、第405团在何公殿抗击国民党军。该师第403团则被分割包围在赤壁岭、神仙洞一带，与师主力失去联络。该团奋力突围，以1个营挡住国民党军1个团的进攻，至8日拂晓与师主力会合。第135师的英勇作战，大大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南撤速度，为中路军主力追上和抓住国民党军赢得了1天时间。

与此同时，中路军主力兼程前进。至8日，第40军第119师进至井头江，直插国民党军右翼；第45军第134师进至赤壁岭，追上桂系第48军第176师；第49军第146师进至灵官殿地区，追上桂系第7军第171师；第18军占领高朗司；第46军一部占领

① 林彪、邓子恢等1949年10月8日14时致第40、第41、第45军（师）各首长的电报。

② 林彪、邓子恢等1949年10月8日22时致第40、第41、第45军（师）各首长的电报。

③ 林彪、邓子恢等1949年10月9日4时致中路军、西路军各兵团各军首长的电报。

耒阳。9日，第46军解放衡阳。

8日下午，第135师奉命由石株桥向黄土铺以南转移，9日拂晓进至鹿门前西北官家咀一带。为阻击南逃之国民党军，该师即以第404团向界岭开进，以第405团一部由杉木冲向南警戒，命令第405团主力集结后也向界岭开进。16时许，桂系第7军军部率第172师经黄土铺南逃，恰好被正在勘察地形的第135师第405团发现。该团即一面发起战斗，一面向上报告。第405团以9个连由杉木冲阵地冲下，直奔桂系第7军军部，第404团则于鹿门前南侧截住了桂系第172师。第405团将桂系第7军军部及直属队分割成数段发起猛攻，但由于第7军是白崇禧的嫡系，战斗力较强，每一高地、房屋、树林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才能得手。激战至20时，第405团将桂系第7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第404团则将桂系第172师压缩于一条山沟内。

在第135师与桂系第7军军部及第172师激战的同时，解放军中路军各部迅速完成了对白崇禧部4个师的包围。至9日20时，第41军主力已进至花桥、驻马桥、黄土铺一带，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退路，并有力地策应了第135师的作战；第40军第119师已进至铁塘桥、李家桥一带，抢占了茅草岭、腊中山阵地，切断了国民党军可能南逃祁阳之路；正面第45军主力及第49军第146师亦逼近铜锣坪、石株桥一线。至此，桂系第7军第171、第172师和第48军第176、第138师共4个师，均被合围在文明铺东北之张家亭、铁栏桥、鹿门前、铜锣坪、严家殿、石株桥地区。其第172、第138师位于黄土铺东南地区，第171师在铁栏桥以西地区，第176师在界岭与严家殿之间。午夜至11日上午，桂系第172师及第138师曾数度向解放军第135师阵地猛攻，桂系第171师曾18次向解放军第119师阵地进攻，企图突围，但均被打垮。解放军第135、第119师封闭了国民党军向南和东南逃退的道路。

白崇禧见其主力4个师被围，企图以撤至祁阳、冷水滩之线的第46军第188师及第7军第224师回援，以接应4个师突围。为此，林彪、谭政、萧克于10日6时致电各军、师首长：“为尽速歼灭已被包围之敌，各部接电之后应立即出发，其任务如下：（一）四十军主力应插到祁阳北之洪桥、乾山坪、白地市一线，阻敌南逃。（二）四十一军主力应即插至文明铺、酃家坪一线，阻敌西逃。为此，一二二师应向秋塘坪急进；一五四师应向甘家嘴、荷塘亭一线急进；一二三师应即在文明铺、沙滩桥、黄家桥一带占领阻击阵地，顽强抗击自祁阳北援之敌，保证围歼战的胜利。（三）四五军、四九军主力应自宝庆东之灵官殿、赤壁岭、石株桥一线向南进攻，紧缩包围圈。（四）四六军应即向洪桥急进，参加会战。（五）围歼敌七军与四八军各两个师的战场指挥由四五军首长统一指挥。（六）卅八、卅九军应即直向白地市、文明铺方向前进，参加大会战。”同时令已到达中路铺、白果市一带的第5兵团第16、第17军向南急进。

解放军中路军各部于10日晨对被包围之国民党军发起总攻。第45军第134、第158师及第49军第146师并肩由北向南对桂系第48军第176师发起攻击。13时，第134师在严家殿南与桂系第176师展开激战。第146师相继夺占铜锣坪、界岭等地，于16时进至江家冲，击溃第176师第527团的防御。第158师突破石株桥国民党军的阵地后，即协同第134师向严家殿攻击。至20时，国民党军北面的防御全部崩溃。

第45军第135师和第41军第121师由西向东对第172师展开攻击。经5小时激战，第135师全歼该师部及2个团。第121师击溃黄土铺南侧之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9、第118、第120师由东向西进攻，摧毁了国民党军东南两面的防御。

在解放军的攻击下，白崇禧部第7、第48军等溃不成军，一部隐匿山林，企图乘雨夜潜逃。解放军遂展开搜剿作战。林彪、谭政、萧克号召部队开展捉俘虏竞赛。“入夜千万个火把，照亮了整

个五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①至11日上午，国民党军4个师除第138师师部率1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余人全部被歼。在五峰山地区，解放军生俘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和参谋长邓达之、第171师参谋长李有金、第176师师长李祖霖和副师长刘克威及参谋长袁纪等。国民党军北援部队见势不妙，未敢北进。衡宝地区的作战，遂告结束。

12日，第四野战军首长致电第40、第41、第49军军、师首长并转全体指战员，表扬他们以积极精神和神速动作歼灭了桂系精锐4个师，其中特别表扬了第119、第135师。毛泽东接电后于次日将此电批转程潜先生阅，并在电报上加了如下批语：“被歼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②白崇禧无可奈何，也只能如此。

四、西路军解放武冈、宝庆

刘嘉树率第17兵团残部南逃后，解放军第38军集结于芷江、榆树湾、黔阳、会同地区，第39军集结于洪江、安江、瓦家塘、江口地区。为配合中路军在衡宝地区作战，第13兵团根据林彪、邓子恢等的指示，于10月5日19时决定，第39、第38军分南北两路经武冈、龙潭铺等地向文明铺、酃家坪地区前进。第38军第114师及第39军第115、第117、第152师于6日出发，第38军第151师留守芷江地区，其余各师于7日或8日出发跟进。

6日，第39军第152师由瓦屋塘出发向武冈急进，第117师由安江出发向洞口前进。7日晨，第152师进至武冈城郊。这时，白崇禧主力自衡宝地区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等于7日6时命令西路军在黄金桥、龙潭铺、武冈之线堵击第71、第14军。同日，

^① 《华中前线记者报道白匪主力被歼经过》，1949年10月13日《长江日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58页。

第39军获悉第7军第171、第172师将西进抢占武冈，遂于18时命令第152师准备8日晨攻占武冈，同时命令北路第117师南进，支援第152师作战。8日中午，西援之第126军第305师已接近武冈。第152师决定暂时放弃攻城，以第455团包围监视城内之国民党军，师主力东进至五里牌一线，阻击西进之第305师。经过激战，打破了第305师与城内国民党军会师的企图。9日8时，第117师主力（2个团）到达武冈。第13兵团命令第117师首长统一指挥第152、第117师作战，确定两师各抽1个团攻城，其余部队抗击第305师西进，尔后再歼灭之。10日8时，第117师第349团与第152师第455团发起攻城战斗。经2小时激战，全歼武冈城内第14军第63师第189团、湖南保安第4团、第14军留守处共2700余人，俘第63师副师长黄范。第305师见势不妙，即乘夜逃跑，第117师第350团在追击中歼其一部。与此同时，北路第117师第351团连克江口、洞口，于9日晨攻占洞口以东之竹篙塘，歼灭第14军第63师一部。位于邵阳地区的第14军率第62、第10师于9日弃城西逃，解放军第49军第145师于11日解放邵阳。

白崇禧鉴于其主力4个师被歼，武冈失守，向解放军西路军实施反击的企图又彻底破灭，解放军各部正向湘南集中，遂决定迅速向广西撤退。11日夜，白崇禧下达全面撤退命令：“（一）、第十七兵团，继续以一部在靖县通道间阻击匪军，主力逐次向三江（桂林西北约八十公里）附近集结整补。（二）、第一兵团以一部在新宁、城步之线，占领阵地，阻止匪之南进，并掩护第三〇五师向黄沙河附近（全县东北，湘桂边界上）转进，主力逐次向全县附近集结整补。（三）、第十兵团，指挥第四十六、第五十六军及一二六军，继续在祁阳及零陵，东安两线，逐次阻击匪军，并掩护第七军之转进，主力逐次向道县附近集结整补。（四）、第三及第十一兵团，即在友军掩护下，向桂林及其以南地区集结整补。

(五)、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指挥所，即于桂林开设。”^①

依据白崇禧的撤退命令，湘南境内国民党军纷纷南逃。12日，国民党军第14军第62师等部撤至石下江地区，企图经武冈地区南逃，但被第117师第351团堵在竹篙塘一带。这时，第38军第114师已进至竹篙塘地区，第39军第115师进至竹篙塘以南之高沙地区，第49军第147师尾追至竹篙塘以东之桃花坪地区。为歼灭该部国民党军于竹篙塘地区，林彪、邓子恢于12日命令第114师“坚决堵击西进之敌”，第147师“由桃花坪向西猛追猛攻”，第115师“由高沙市向竹篙塘东南攻击”。各部按照部署发起战斗，激战至13日，共歼灭国民党军第62师（4个团）等部5000余人，俘第62师师长夏日长。14日，第38军第112师占领城步县城。

五、第47军解放大庸、桑植

衡宝地区的作战刚结束，位于湘西北地区的解放军第47军即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

早在9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及第13兵团赋予第47军的任务是，控制石门、慈利一线，阻击宋希濂部之进援，并掩护湘西开展群众工作，待第二野战军部队到达后，再视情况参加南下作战。9月17至23日，第47军先后进抵石门、慈利、常德、桃源。10月上旬，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向常德地区集结，第47军奉命开辟并经营湘西。

大庸为湘西之北门户，由宋希濂部第122军（辖第217、第345师）驻守。其部署是：军直及第217师师部驻大庸县城，以1个团位于大庸东南之山岔口、老鸦口之线，以1个团位于大庸西北之樵子垭（今教子垭）地区；第345师3个团位于大庸以东之溪口、岩子口、狗子垭、渔浦之线。

为歼灭第122军，控制溪口、大庸、桑植、永顺等地，以开展湘西工作，开辟第二野战军尔后西进通道，第47军决定于17日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23页。

向宋希濂第 122 军发动攻势。其部署是：石门、慈利的防务交由第二野战军接替；第 141 师由石门出发，经九溪向桑植进攻，切断第 122 军的总退路；第 139 师由慈利沿澧水实施正面进攻，首先歼灭溪口、渔浦之线之国民党军，尔后向大庸推进；第 140 师派 1 加强团插至大庸以西，截断第 122 军西逃永顺的道路；其余部队向沅陵、辰溪、芷江、怀化前进，掩护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保障第 13 兵团的后方安全。

14 日下午，第 47 军各部向第 122 军发起攻击。第 139 师第 416、第 417 团于 15 日 4 时抵溪口、渔浦之线，国民党军稍作抵抗即向大庸撤退，第 139 师冒雨猛追。第 141 师主力于 15 日进至桑植，其第 421 团于 16 日进至樵子湾，切断了第 122 军的北逃退路。第 140 师第 418 团由沅陵出发，于 16 日插至大庸以西之东山坪，接着连夜抢渡澧水，进逼大庸县城。至 16 日上午，第 47 军即完成了对大庸的包围。鉴于第 122 军处境危殆，宋希濂电令该军军长率部向永顺突围，但为时已晚。当日下午，第 47 军各部发起总攻，战至 21 时，即全歼第 122 军 5000 余人，生俘该军军长张绍勋、第 217 师师长谢淑周、第 345 师师长黄鼎新。

六、湖南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作战及湖南人民的踊跃支前

衡宝战役期间，湖南各地的游击队在解放军胜利进军湖南的鼓舞下，更加积极地四出打击国民党正规部队及地方武装，主动配合第四野战军主力作战。

湘南游击支队活动于宜章、桂阳、临武、嘉禾一带，在国民党军撤退期间，解放宜章、收复汝城，10 月 13 日解放桂阳，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 900 余人。湘南游击司令部率第 2 大队及警卫大队，于 10 月 4 日在茶陵之界首与第 46 军第 136 师会师，随后配合第 136 师于 10 月 8 日解放耒阳。同日，第 6 大队在桂阳、常宁交界之白沙歼灭保安团 600 余人，警卫大队在华堂铺争取郴县伪县长率部 400 余人投降。湘南游击司令部南区指挥所率第 1、第 3 大队于 10 月 7 日解放郴县。

粤桂湘边纵队连江支队的第7、第10团活动在宜章、临武、蓝山、江华一带，第10团于10月22日解放宜章县城。衡西游击队积极活动在衡宝公路两侧地区，袭击西逃之国民党军，曾配合第四野战军一部歼灭第7军50余人，先后在周尾岭、金溪庙收缴国民党军零星部队各种枪近200枝，六〇炮1门。白崇禧部向广西撤退时，湘南游击第1纵队在衡阳至祁阳间多次截击国民党军，打击地主武装，缴枪800余枝，并解放了祁阳县城。

湘西游击队第10突击队，在解放大庸的战斗中，为第139师侦察情况，担任向导，协助筹粮，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湘中游击队第2支队活动于邵东、邵阳、祁阳一带，积极配合野战军主力追堵国民党军。

衡宝战役期间，湖南北部、东部地区虽刚刚解放，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但湖南新区人民踊跃支前。10月4日，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关于建立各级支前组织的决定”。据此，省、地均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各地（市）专员（市长）、地（市）委书记兼任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解放区各县成立支前指挥部，县长、县委书记任主任、政治委员。各地支前机构积极组织群众为解放军当向导、修路架桥、筹集粮草、开设茶水站、运送伤员和弹药。衡阳专署支前委员会9至12月为解放军筹集粮食4262万斤，稻草1028万斤，木柴1184万斤。稻谷难以晒干，宁乡县人民就将其炒干碾成米再运往前线，10多天内全县运往前线的粮食达3000多担。在战斗最激烈的黄土铺地区，当地人民群众也自动组织了“支前站”。

七、衡宝战役的战绩、意义及经验

衡宝战役从1949年9月13日开始至10月16日结束，历时33天。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第7、第100、第122军军部和第171、第172、第176、第217、第62等5个整师，及第138、第63、第10、第345、第197等师各一部共4.75万余人，俘第122军军长张绍勋、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等10余名将官，缴获各种炮402门，

各种枪 1.3 万余枝，汽车 176 辆，战马 1116 匹，各种枪、炮弹 100 余万发。《长江日报》于 10 月 16 日发表社论，认为这次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前后方闻捷欢腾，实为开国伊始前线指战员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献礼。”

衡宝战役的意义主要是：第一，解放了湘南、湘西的广大地区，为解放军进军广西歼白崇禧部和进军大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第 7、第 48 军主力以及湘系唯一美械装备的第 14 军第 62 师，并使湘系战力最强的第 14 军第 10 师损失过半，沉重打击了白崇禧部的傲气，大大震动了其他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

衡宝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经过暑期休整，部队进行了思想等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之外，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根据桂系部队的作战特点，将大迂回大包围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相结合，是这次战役取胜的关键。尽管白崇禧企图在湘南地区与解放军作战，但如果解放军集中兵力，继续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白崇禧部必然逃跑无疑，这已为湘赣战役的实践所证明。正因为解放军采取了两翼大迂回大包围、正面缓缓推进的作战方针，南进各路间隔距离较大，甚至相隔一省，在白崇禧看来，解放军兵力分散，并且其侧翼暂时不受威胁，才敢于集中兵力对解放军之中路进行反击作战，解放军才有可能抓住并歼灭其主力。因此，衡宝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胜利。与此同时，由于白崇禧不轻易放弃任何可资利用的地形，以争取时间尽量保持地盘，并伺机寻找解放军的弱点攻击，因此，在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同时，又要随时准备同其作战，这就需要将大迂回大包围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相结合。在此次战役中，当白崇禧主力向中路军进行反击时，即以西路军和第 46、第 18 军向其两翼及侧后急进，以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南下，以期歼灭白崇禧部，当白崇禧部撤退时，又以中路军利

用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抓住并歼灭了白崇禧部精锐 4 个师，西路军在东进过程中也截歼其一部。

第二，第四野战军中路军隐蔽渡湘江西进，由北向南攻击，出敌不意，为抓住和歼灭国民党军创造了条件。对此，被俘之第 7 军参谋长邓达之称：“我们认为你们的主攻方向在湘东安仁方面，我们于湘东方向布置了夹击之势，不料你们的主攻方向转到了衡宝线，直至界岭东南狮子山、宝台山失守……才知道你们主攻方向转变，致使我们完全处于不利情况”。国民党军的战史也写道：“当匪军由邵、衡间地区突破时，使用控置于粤汉路方面之打击兵力第三兵团，向渣江反击，企图击灭突进至崇山铺之匪。此一反击虽未能捕歼犯匪，但使匪之攻势稍挫，稳定当时邵衡战局。然而原定于衡、郴决战之构想，完全放弃，作战陷于被动。”^①

第三，善于捕捉战机，适时转入追击。第四野战军首长原计划利用白崇禧部反击的机会，调集兵力，以求造成大的歼灭战。但当发现白部开始撤退后，当即部署各军、师发起追击，并以楔入白部侧后的第 135 师坚决堵击，从而抓住了战机，造成了歼灭白部精锐 4 个师的有利战机。如果当时在指挥上稍有犹豫，白部将全部乘机逃脱。

第四，使用了野战军直接指挥到各军以至各师、临时指定战场指挥员、给部队以适合总意图的机动处置之权三者相结合，而以野战军指挥为主的战役指挥方法。由于白崇禧部行动诡诈，动作迅速，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只有迅速发挥野战军从空中破译所得密息（情报）之作用，并针对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及时协调各部队的行动才能捕歼。在此次战役中，第四野战军使用上述指挥方法，减少指挥层次，使所得密息与战场情况相结合，指挥意图与部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结合，从而取得了战役胜利。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截乱》第 6 册，第 327 页。

第六节 举行广东战役，歼灭 余汉谋集团主力

一、余汉谋集团防守广东的部署

1949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

7、8月间，解放军第四、第二野战军布阵湘、赣，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广州岌岌可危。8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商讨对策，并将余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赋予余汉谋统一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要求他与白崇禧主力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9月7日，蒋介石由重庆电示参谋总长顾祝同：“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而放弃京沪重地，以致江防部队，几遭全部被歼之复辙。故对现驻粤中之第五十、第三十九、第六十三、第一〇九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俾确保革命基地。”^①

当时，余汉谋集团共有11个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5万人。依据国防部“集中兵力，确保广州”的指令，余汉谋集中沈发藻第4兵团和刘安琪第21兵团等部共6个军于韶关至广州地区，阻止解放军南下。其中，第63、第39军防守以曲江（今韶关市）为中心的粤北地区，两军前伸至乐昌和南雄；第21兵团第50军和第32军第266师驻广州周围，第50军军部驻从化；第109军防守东江地区，军部驻增城；第4兵团驻东莞地区，第23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56页。

军军部驻石龙，第70军军部驻虎门；保安第3、第4、第5师分驻博罗、英德、惠阳。另以胡璉第12兵团（辖第18、第19军）位于潮汕地区，策应粤北作战；第64军和第32军主力驻海南岛，第62军驻湛江，以保障其退路。

二、赣州会议及解放广东的部署

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第四野战军决定，以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该兵团第13、第14、第15军，第15兵团第43、第44军及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十分重视。7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及华南分局：“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在攻广州前，应“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①。24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邓并刘伯承、张际春等：第4、第15“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②

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8月1日批准成立新的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受华中局领导，负责解放广东及经营两广的工作。9月3日，叶剑英到达江西赣州，7日即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方、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2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7页。

学智、萧向荣、曾生、雷经天等。8日，叶剑英、陈赓将会议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并林彪、邓子恢。电报说：“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华南（分）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12日，中共中央复电指出：“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瓮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①

9月11日～19日，叶剑英在赣州主持召开了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组成及干部配备、支前工作和接管城市的政策等问题。关于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第4、第15兵团先解决曲江、翁源之国民党军，然后两兵团直下广州。与此同时，两广纵队直下惠州，迂回至东莞、虎门地区，切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在解放军主力解放广东期间，闽粤赣边纵队主力在韩江地区牵制、打击胡璉兵团，待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南下潮汕时，再与之配合作战解放潮汕。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在河源、惠阳间隐蔽，然后会合两广纵队在东江作战，相机进入东莞、虎门地区。粤桂湘边纵队和粤中纵队在解放军主力进占广州期间，在西江两岸地区积极行动，打通由西江到梧州的水路交通，使陈赓兵团得利用水路西上。粤桂边纵队配合广西方面作战。滇桂黔边纵队配合云南方面作战。关于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70页。

支前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号召广东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把支前工作作为当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全力支援野战军入粤作战，保证战役顺利完成。关于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问题，会议指出：“因华南情况复杂，特别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故我一切行动，特别是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的事件切应避免。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因此，在与帝国主义边邻地区（如惠、东、宝之与香港，如中山之与澳门，粤桂边之与越南法帝，如汕、湛之外侨），各地都应派出能掌握政策干部，站稳立场，不上帝国主义及国特挑拨之当，不作群众冲动之尾巴。一切关于外侨处理问题，必须迅速请示分局及中央。”^①

赣州作战会议，特别是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广东作战的指导方针、作战计划、支前工作和城市接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加快广东的解放具有重要作用。9月21日至24日，华南分局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扩大会议精神。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及赣州会议的决定，9月28日叶剑英、陈赓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次日，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将进攻广州的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及第四、第二野战军首长：“（一）以四兵团为右路军，于九月三十日起，先后自桂东、上犹、南雄、始兴地区分路出发，顺路扫歼汝城、乐昌、仁化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翁源地区，除十四军主力沿北江西岸经英德、清远地区直插三水，截断广州敌西退道路外，兵团主力于十月九日拂晓开始从东、西、南三面攻歼曲江之敌，然后迅速南下，协同十五兵团（缺四八军）歼灭英、翁地区之敌，尔后直迫广州。如敌不守曲、英、翁地区，则迅速协同十五兵团，于十月二十日进至三水、高塘圩、归龙市之线，形成对广州西北面之包围。（二）以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于十月一日自南康、信丰地区出发，十月八

^① 叶剑英、方方 1949年9月15日致各区党委并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日进至翁源以东地区，依情况出英德南北之线。如英德敌坚守，则协同右路军合歼之。如敌南撤，则协同右路军迅速南下，于十月二十日进至龙眼洞、车陂之线，形成对广州东北及东面之包围。（三）以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由曾、雷、林（平）统一指挥。两广纵队于十月十日自和平地区出发，粤赣湘纵队自龙川和粤中纵队自高明地区出发，于十月二十日前进至东莞，冲破〔顺〕德、佛山之线，截断广州敌南退道路，等待主力部队歼之。”10月1日，中央军委复电陈、郭、刘并告林彪、邓子恢、叶剑英、方方：“同意你们向广州进攻之部署。”

三、突入粤北，解放广州

9月23日，第15军第45师在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2支队的协助下奔袭南雄，歼灭国民党军第63军第186师一部，于次日解放南雄。同日，在北江第2支队的争取下，国民党始兴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长饶纪绵于23日率部1300余人起义，并歼灭国民党军第39军第91师第271团大部。该军第147师第440团同日重占始兴，25日又弃城逃跑，途中遭起义部队伏击，大部被歼。南雄的解放及始兴自卫队的起义，为右路部队从东北侧进击曲江扫清了道路。

10月2日，解放军按照预定部署向余汉谋集团发起攻击，广东战役开始。第4兵团分3路进击曲江。第14军在粤赣湘边纵队湘南支队的配合下，由汝城奔袭乐昌，直插曲江西南、西北。第13军在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的配合下，由大庾经仁化直插曲江。第15军在北江第2支队的配合下，由始兴向曲江进发。

这时，衡宝战役已经开始，白崇禧将驻郴州的第87军和驻乐昌的第46军北调，“湘粤联合防线”瓦解。国民党军统帅部鉴于芷江失守，衡阳、宝庆难保，解放军将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因而指示余汉谋：“以第二十一兵团（辖第三十九及第五十军）、第四兵团（辖第二十三及七十军）、第六十三军、第一〇九军，先竭力掩护广州政府人员物资之撤离，尔后向西江地区转移。第一期作

战时，应以主力保持于北江以东地区，连系华中方面作逐次抵抗，以雷州半岛为后方，并竭力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争取半年以上之迟滞时间，以待有利之时机到来”^①。据此，余汉谋于10月6日调整部署如下：以胡璉第12兵团配属第109军第321师（欠第963团）继续于潮汕地区起牵制作用；以第109军主力继续在东江地区，掩护第21兵团之右翼安全；以第21兵团辖第50军（欠第270师，另配属第32军第266师）及第39军，各以1个团防守英德、佛冈及良口三点，主力沿滢江口至派潭墟布防；第4兵团所辖第23、第70军向清远、四会地区集结，掩护第21兵团左侧安全；第63军除以第152师第454团及第186师第558团沿阳山、连县之线布防外，主力移至高要、德庆地区，为第二线兵团；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仍在广州，另于高要开设西江指挥所，指挥西江地区地方团队。

10月6日，解放军右路军第14军袭占乐昌，第13军占领仁化。在右路军的打击下，防守曲江的第63军弃城南逃，第15军于7日占领曲江。粤北门户洞开，右路军向南追击，国民党军利用北江的支流和粤汉铁路上的要点节节抵抗。第15军第45师于9日攻占英德车站，歼灭国民党军第39军第91师一部，并以2个连楔入国民党军防御纵深，成功地抢占了横跨潏江上的遥步墟铁桥，保证了军主力的通路。同时，沿北江西岸进攻的第14军占领英德城。10日，第15军第45师攻占连江口车站，中午进抵滢江口。

在右路军发起作战的同时，左路第43军于9月30日由南康出发，经大庾、梅岭关、南雄、始兴，10月6日到达翁源。11日第127师奔袭佛冈，全歼国民党军第39军第103师之全部美械装备的第307团。第44军由龙南出发，经虔南、连平，于10月9日进抵新丰。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57页。

两广纵队于9月30日从赣州附近出发，取道信丰、定南，10月8日进入和平地区。次日，纵队领导人与粤赣湘边纵队领导人在龙川会合，由曾生、雷经天、林平3人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前线委员会，统一指挥南路军的作战行动。

正当广东战役由粤北作战向广州外围作战发展时，衡宝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围绕如何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进军部队各领率机关之间进行了研究探讨。10月10日7时，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致电中央军委：“（一）由衡、宝线南退之敌军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我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战力甚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十三兵团正由芷江东进，但一时赶不到，而我在祁阳以北兵力没有迅速消灭敌之绝对把握。因此祁阳以北战役必须相当时日才能解决。（二）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三）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兵力为主。否则，今后兵力分散各省，而敌兵力反形成集中，则使战局甚为拖延。如何，盼即复。”当日23时，中央军委致电林、邓、谭、萧、赵并告叶剑英、陈赓：“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①

11日10时，林、邓、谭、萧、赵再次致电中央军委，陈述暂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2页。

不攻占广州和陈赓兵团西进的理由：“（一）从多次行动中可以看出白匪的作战方针，是集结其最精锐的主力，采流窜不定的方式，寻求我之弱点攻击。其部队是很有战斗力的，行动甚快。我如不歼灭此敌，则兵力不能分散发动群众和维持交通。如分散则可能被其各个击破；如集中，但兵力不足以歼灭敌主力时，则可能被其围困，并切断我之交通；如广东敌人与该敌会合或靠近配合时，则我更难对付该敌。（二）根据上述情况，欲歼白匪，我方兵力须绝对优势，采取至少由两个或三个方面向敌进攻，造成围剿的形势；同时须设法使广东之敌不能与白匪靠拢，以便分割敌人，各个歼灭。（三）我们意见，为了广东之敌退不回广西，则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之敌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四）如目前我们拿下广东，由于粤汉路沿线桥梁遭受严重破坏，山地桥梁工程浩大，绝非短期内可以恢复交通，则广州煤粮发生严重困难……军事上也要分散我军力量，而促成敌力量之集中。……因此我们建议：陈、邓两兵团皆勿继续南进，而以邓之两个军监视广东敌人，并集中兵力经常歼灭敌之分散部队；陈赓部则西进，参加广西作战。只要广西敌人歼灭，很多敌人皆可争取和平解决（如不愿和平解决，亦易于武力解决）。故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五）祁阳以北之敌主力四个师，大部尚未突围，现正激战中，但敌甚顽强。敌其他各军据密息原拟向北增援，但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我们意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以免促成敌之集中与我之分散。（六）以上意见盼军委即电复。”在同一时间，林、邓、谭、萧、赵致电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并叶剑英、方方和报中央军委：“如目前尚无敌人被你们围住和尚无可靠的抓住敌人的可能时，则陈邓两兵团各部皆应就地停止待命，暂勿南进，但如某部业已围

住敌人或正有把握围住敌人时，则某部可继续前进，其余部队仍停止待命。”

11日13时，叶、方、陈、邓、赖致电林、邓、谭并中央军委：“我们讨论了军委复你们的十日二十三时电，提出下列意见请考虑：（一）我们赞成军委和四野在湘桂边求得歼灭白匪主力的方针。（二）但依目前情况，四兵团前锋已进到清远地区，本日在英德以南六十里之连江口，我先头部队正在围歼敌两个团，十五兵团本日正围歼佛冈敌之一个团。各兵团每日行一百三十里以上向广州前进中。（三）在此情况下，四兵团为了执行断敌后路的任务，如向桂林直线距离有一千三百里，以时间计算不如十八军、四六军及十三兵团来的快。因此我们意见，四兵团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不停留的用水路运输，经梧州直取南宁。（四）广州增加了胡璉兵团，四兵团不参加，仅邓赖兵团的两个军（六个师）、曾雷林平部，则时间拖长了，因此四兵团如立刻向桂林、柳州前进，实际上仍须集结队伍重新动员的时间，则一方面路远赶不上，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当的顾虑。（五）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如何请复示。”

11日晚，衡宝战役已接近尾声。当日21时，林、邓、谭、萧、赵致电中央军委并叶、方、陈、郭、刘，邓、赖、洪：“（一）祁阳以北被我包围之敌四个师（七军一七一、一七二师，四八军之一三八、一七六师），经四日战斗后，已大部被歼，小部突围敌溃散于各山上树林中，我现正在搜山。（二）关于广东战役问题，我们意见已详〔于〕本日十一时电。在广东敌人不与我作正面战斗的情况下，我们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以免促成粤桂敌人之集中。目前只以邓华兵团留广东打运动战，歼灭敌之有生力量。同时，加紧修复韶关至英德之粤汉线，以利收复广州后的运输，解决广州粮煤问题。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

目的。(三)在对粤敌企图未判明前和我军能否抓住敌人未证实以前,陈邓两兵团目前仍继续照原计划向广州前进。”1个小时后,22时林、邓、谭、萧、赵又致电第4、第15兵团首长:“陈邓两兵团目前仍继续向广州前进歼敌。”由上可以看出,由于白崇禧主力并未回头北援,第四野战军首长对陈赓兵团使用方向的想法有了改变。

中央军委对协调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当两个战场指挥员表述了各自的看法后,中央军委于11日24时致电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十一日十时电悉。(一)关于调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接入桂一点,已于今晨答复你们同意这样做,请径令陈兵团执行。(二)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十五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切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十五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三)关于十五兵团是否可以早日去占领德庆、高要一点,请叶方与邓赖商酌电告。(四)曾生林平等部似宜进至新丰、龙门、佛冈一带,不要去惠州以南。”^①同一时间,中央军委又致电叶、陈并告林、邓:“英德佛冈地区集中之敌十一个师现在是否仍在该地处,有无围歼可能。如该敌已退,则退往何处。望告。”

12日,叶剑英、陈赓致电中央军委并报林、邓:“军委十一日二十四时电问粤敌情况谨复如下:1.敌六十三军(两个师)在粤北战后四日由乳源(曲江西)南撤,我十四军在此曾截获汽车十四辆,现下落不明,该军派出南雄一个团被歼一营,始兴一团因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6页。

饶县长起义基本消灭。2. 一〇九军两个师现在增城地区，其三二一师（喻英奇）原驻潮汕，据密息已调广州。3. 五十军二个师在从化到广州线上。4. 三九军在粤汉线上之连江口、佛冈一线，昨被歼两个团。5. 二三军两个师未接触，位置不明。6. 广州敌军的退向据港讯看来是经西江退海南岛，是否准备在广州市郊坚守堡垒与我军打一仗，已电港查复。”

在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原来的主要关注点是求歼白崇禧主力。但当得知白崇禧主力并未北援的消息后，其对战局的发展及陈赓兵团的使用方向开始有了新的考虑。12日3时，毛泽东致电林彪：“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①

毛泽东收到林、邓、谭、萧、赵11日21时的电报后，12日6时又致电林彪并告叶、陈、方、邓、赖及第二野战军首长：“你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8页。

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①

林彪在接到毛泽东上述电报后，12日14时致电毛泽东并告叶、方、陈、郭、刘，邓、赖、洪：“本日二时电示，所考虑的诸点甚为正确。目前由于白匪改变计划，已中途停止未再北进，祁阳以北战斗已结束及陈邓两兵团业已深入广东内地从化一带。在此情况下，陈兵团西移，已无及时堵住白匪后路把握。故昨日下午及夜间，已先后两电要该两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昨日中午曾已电他们，除了已抓住敌人和可能抓住敌人的部队继续南进外，其他部队停止待命）。大约还有六至八天可占广州。如敌未能退得及时，我军仍有可能歼灭敌人。目前则极力争取此种可能。”

12日18时，林、邓、谭、萧、赵致电陈、郭、刘并叶、方、邓、赖、洪等：“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本日六时电所指示的三条。陈邓两兵团行动，应照该电第一条所指示方针执行，望具体部署与指导。”13日10时，叶、陈、方、邓、赖致电林彪并呈毛泽东：“本日分局会议，我们遵照林、邓、谭、萧、赵十二日十八时电，坚决执行毛主席十二日六时电指示方针。现各路正围攻从化、花县（写此电时，已解放）、滘江口之敌，得手后即直趋广州。届时，敌如坚守市郊阵地，则作有准备的进攻。否则，各路不停留的打下去，以便迅速恢复秩序，减少破坏。为了截断粤敌向西退路，我十四军本日到达清远后，将继续占领三水。”

这样，随着湘南战场形势的变化，经过研究讨论，解放军领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0页。

率机关之间在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基本得到了统一。

在解放军领率机关电报往来的同时，第15军于13日占领浈江口后，在源潭击溃国民党军4个团，歼其1000余人。同日，第14军解放清远。第43军第127师于11日占领佛冈，全歼守军第39军1个团，12日第128师在鳌头圩歼灭国民党军第50军第36师第106团第3营大部，13日拂晓占领花县，全歼县保安营。第44军第132师12日向良口、从化前进，13日拂晓占领良口，并在水底附近歼灭国民党军第50军第107师第321团1个营，遂即向广州前进；该军第131师在派潭歼灭1个保安营后，于13日解放增城，14日抢占石滩车站，切断了广（州）九（龙）铁路。

在解放军从北、东两面逐渐逼近广州的形势下，李宗仁于11日召集阎锡山、顾祝同、薛岳、余汉谋等开会，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要求余汉谋指挥部队掩护撤离。至13日，总统府和行政院机关人员撤离完毕。13日凌晨2时30分，参谋总长顾祝同向余汉谋等宣布：“一、中央政府迁移重庆。二、中枢各部院及各地区党政首长，先向海南岛撤退。三、广东省政府先向合浦撤退。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向湛江撤退，余汉谋长官则应先驰往高要西江指挥所，筹策尔后之作战事宜。各首长遵即令知所属，著手撤离之准备。”^①随后，国民党军即向西江地区撤退，14日将珠江上的海珠大桥炸毁。

为迅速攻入广州，抓住歼灭国民党军，第15兵团首长命令第43军以一部攻占白云山等阵地，主力沿广州至花县公路向市区攻击前进，第44军沿广州至增城公路和广九铁路向广州攻击前进。14日17时，第43军第128师第382团进入广州，歼灭了未及撤退的国民党军第50军第107师及联勤部队2000人。第44军第132师第396团亦于21时进入广州。至此，广州宣告解放。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64～第365页。

在第 15 兵团解放广州的同时，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 13 日解放河源，15 日解放惠州，17 日解放东莞，并于龙华墟包围了国民党军第 109 军第 154 师，迫该师副师长郑荫桐于次日率部 3000 余人投诚，19 日继占虎门要塞，截断了国民党军沿珠江南逃的通路。

四、阳江围歼战

当第 15 兵团进攻广州时，第 4 兵团第 15 军先头部队已进至广州西北官窑地区，第 14 军由清远乘船顺北江向三水疾进。这时，国民党军已逃出 100 公里以外。陈赓判断，国民党军由于船只不足，其主力不会向珠江口而会沿佛山、开平循海滨向雷州半岛或经三水、高要向广西逃跑。因而，命令第 4 兵团部队一律不进广州，昼夜兼程向西南追击。15 日，第 15 军进占佛山，第 14 军进占三水及西南镇。陈赓等一面指挥部队追击，一面向上报告：“广州敌已向南及西南撤退。”“右路军（四兵团）不进广州市，继续向南及西南追击。”“此次行动部队甚积极，每日均以一百三十里以上的行程前进。但因山高路险，行动迂回均成困难。”^① 当日 24 时，林、邓、谭、萧、赵致电陈、郭、刘等并报中央军委：“如你们已追不上敌人，则望停止追击。关于广西作战，须作整个的部署与配合，然后再统一行动。”

16 日，第 4 兵团在三水西南镇追上国民党军第 39 军第 103 师，迫该师师长曾三元率部 4000 余人接受和平改编。同日，在四会击溃沈发藻第 4 兵团部，俘 500 人。16 日 19 时，陈赓等将上述情况上报中央军委和第四、第二野战军首长。17 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

^① 陈赓、郭天民、刘志坚 1949 年 15 日 10 时致中央军委、林、邓、谭、萧、赵并第二野战军首长等的电报。

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①18日12时，林、邓、谭、萧、赵致电叶剑英、陈赓并报毛泽东：“四兵团行动，盼按照毛主席十七日电执行。如能追上敌人，则继续猛追歼敌。如确实已无追上可能时，则可勿追击，以免粤敌主力尔后易退南宁与云南（粤敌一部会退海南岛）。”

17日，陈赓获悉国民党军第21兵团由佛山向阳江撤退，第4兵团由高要向阳春撤退，第39军经高明向阳江撤退，第63军沿西江向粤桂边撤退，遂以第14军军长李成芳指挥第14、第13、第15军共6个师追击。当日，追击部队在高明县松柏坑歼灭国民党军第39军第147师第441团全部，在高要东北地区歼灭第70军警卫营，在鹤山县宅梧圩迫使第39军第91师师长刘体仁率部2700余人接受和平改编。

18日，陈赓、郭天民根据李成芳的建议，为争取时间，决定就当时态势，编组部队实施追击：以第14军第42师第125团及第40师第120团为右路，由高要南渡西江，经腰古、新兴向阳春方向追击；以第41师及第40师第118团为中路，由高明及西南地区出发，经新兴、天堂向阳春方向追击；以第15军第43、第44师为左路，由西南地区出发，经鹤山、单水口向阳江方向追击；另以第13军第38师为第2梯队，由清远乘船驶三水，尔后经高明向恩平方向机动。

按照陈、郭的决心，各追击部队立即在李成芳的指挥下奋勇追击。至20日，右路部队进抵腰古，歼灭国民党广东省暂编第3纵队1000余人；中路部队进至新兴以南，歼灭国民党军第63军一部，俘1000余人。这时，国民党军第4兵团主力已向云浮、罗定方向逃跑，解放军第4兵团部队用报话机收听到刘安琪的通话，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8页。

获悉国民党军第 21 兵团等部尚拥滞于开平至恩平东北的圣堂圩地区，解放军的右路与中路部队与其处于平行的位置上。据此，陈赓于 21 日命令已到达新兴的右路部队，必须速出阳春，尔后向东南直逼阳江，协同中路、左路部队聚歼国民党军。当晚，中路部队进至圣堂圩，左路部队进至开平。22 日，陈赓命令各部队坚决将国民党军歼灭于阳江、阳春地区，命令右路部队由阳春取捷径直出程村圩，并在该地占领阵地，迎头拦击包围国民党军。当日，右路部队解放阳春后，即向阳江疾进。

国民党军在逃跑过程中，建制混乱，并未组织掩护和抵抗。22 日，广东保安第 3 师 2000 余人在恩平附近投诚，暂编第 2 纵队 3000 余人在江门投诚。23 日，广东保安第 4 师 2700 余人在台山县那扶圩被迫投诚。同日，第 21 兵团司令官刘安琪率第 50、第 32 军、第 39 军残部及第 70 军 2 个补充团到达阳江白沙圩地区。当日，解放军右路部队已超越追至双捷圩（阳江西北 15 公里），并于当晚以第 125 团插至白沙圩以西的阳江至电白公路北侧，占领有利地形，以第 120 团插至海岸边的旱禾庙，完全控制了国民党军西逃雷州半岛的道路。24 日，解放军中路部队已进抵合山圩，左路部队已进至那扶圩西南，第 38 师已进至阳春以北，从而将国民党军合围于阳江地区。

刘安琪发现被包围，即一面组织向西突围，一面要求余汉谋派军舰至海陵岛从海上撤退。24 日，第 21 兵团开始向西突围。解放军第 125 团与优势的国民党军激战竟日，打退国民党军 6 次进攻。当日，解放军中路部队进占阳江，左路部队占领海边北津港，第 38 师进至阳春以南。25 日 1 时，第 4 兵团将进至阳江地区的各路部队区分为东西两个集团，由东西两面实施攻击。当日上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由白沙圩向西进行了 8 次突围，解放军西集团（右路部队）顽强抗击，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企图。当日 14 时，国民党军鉴于向西突围不成，即向南转向海边，企图由九羌埠乘船逃跑，解放军迅速封锁阻击。第 120 团由旱禾庙向平冈圩追击，

先后俘近 2000 余人。左路部队强渡漠阳江后向平冈圩以南推进，第 38 师第 112 团沿岗头、廉村直插九羌埠。各部队一面攻取海岸要点，一面以炮火封锁海面。向南突围的国民党军除小部乘军舰逃跑外，被击毙和溺死者约万人。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企图，将其合围于平冈圩以北直径不到 7.5 公里的狭长地区内。26 日晨，解放军发起总攻，战至中午即全歼国民党军。

在阳江围歼战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4 万余人，其中生俘 3 万余人，消灭了余汉谋主力。27 日，第四野战军首长通电嘉奖第 4 兵团全体指战员：“庆祝你们全部歼灭由广州向西南逃窜之敌主力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对于解放琼崖和解放广西均有重要意义。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连续十昼夜穷追猛打的精神，特予表扬。”

在阳江围歼战期间，胡璉兵团第 67 军于 10 月上旬撤往舟山，第 18、第 19 军于 10 月上旬开始至 10 月下旬陆续撤至金门。10 月 24 日，闽粤赣边纵队解放汕头。至此，除南澳岛外潮汕地区全部解放。第 15 军第 45 师在粤中纵队配合下，于 10 月 22 日解放江门。国民党军第 4 巡防联合舰队 11 艘舰艇 500 余人，于 25 日在江门以南海上起义。

刘安琪第 21 兵团等部被歼之后，余汉谋企图以第 4 兵团、第 63 军等部固守罗定、信宜、茂名、电白，屏护雷州半岛。解放军第 4 兵团即以第 13 军向粤桂边挺进。至 11 月 4 日，先后解放云浮、罗定、信宜、茂名（今高州）、化州、廉江等县，封闭了白崇禧集团经雷州半岛向海南岛撤退的道路。

在广东战役期间，粤桂湘边纵队协同野战军主力解放了粤汉路以西、西江北岸地区。粤桂边纵队策动了国民党军第 62 军 2 个多营和广东保安第 3 师第 9 团等部起义，解放了除湛江以外的雷州半岛。

在广东战役期间，广东人民踊跃支前。据不完全统计，粤桂湘地区人民支援解放军粮食 47.9 万斤，组织运输队、担架队 1 万

余人；粤赣湘边区支援、筹集粮食 54 万余担，柴草 52 万余担，架桥用木 2.9 万余根，木船 430 艘，动员民工 20 多万；粤中地区筹集粮食 642 万余斤，柴草 790 万斤。另外，还供应了大量的猪肉，蔬菜等副食品，从而保证了南下大军作战的需要。

广东战役从 10 月 2 日开始至 11 月 4 日结束，历时 34 天，歼灭国民党军 6.2 万余人，其中俘 4.2 万余人。解放军伤亡 1700 余人。解放了除钦州、合浦（现属广西）地区及湛江以外的广东大陆，为陈赓兵团下一步进入广西配合第四野战军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东战役，是中央军委对中南地区之国民党军实施大迂回大包围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经验是：第一，在战役部署上，以迂回包围结合正面追击，力争在夺占城市的同时歼灭敌之有生力量。第二，在发现敌不战而逃时，立即组织超越追击、平行追击和尾击，力求抓住，并乘其混乱迅速歼灭。第三，指战员高度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陈赓兵团由粤北打到粤中已很疲劳，但在阳江围歼中，部队再接再厉，忍受最大的疲劳与饥饿，连续 10 昼夜追击，终将余汉谋第 21 兵团等部歼灭于阳江地区。第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大力开展了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了国民党军。

第七节 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集团

一、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的企图和部署

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遭到重创，被迫退入广西。广西是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起家的老巢，他们在此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为与解放军作最后较量，白崇禧于衡宝战役后采取了如下整备措施：迅速恢复被歼部队的番号，以保安队、自卫队等地方部队充实正规军；成立桂北、桂南、桂东、桂西、桂中 5 个军政区，

以每个村1兵1枪为标准招募新兵，除补充部队外，建立了约10万人的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和实施空舍清野。经过整补，白崇禧集团仍保持5个兵团12个军32个师约18万人。

正当白崇禧集团整备之际，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由湘鄂西向川东、黔东发动攻势，开始向西南进军。第4兵团攻占廉江，切断了其经雷州半岛撤往海南岛的道路。在南北两面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白崇禧令其部队逐步南撤。至11月5日，第1兵团（辖第14、第71、第97军共8个师）位于桂林地区并准备撤至柳州周围地区，第10兵团（辖第46、第56军共6个师）退守黄沙河以南地区，第17兵团（辖第100、第103军共5个师）撤至三江附近，第3兵团（辖第7、第48、第126军共8个师）位于柳州地区并准备撤至贵县地区，第11兵团（辖第58、第125军共5个师）位于桂平、平南地区。

面对严峻形势，为策划尔后行动，白崇禧于11月5日在桂林召集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参谋长徐祖贻，副参谋长赖光大，以及5位兵团司令官举行作战会议。会议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向南转移，于广西地区策划持久，不得已时经钦州转运海南岛；二是向西转移，进入黔、滇与西南地区兵力会合，以策后图。第一方案是白崇禧的意见，第二方案是国民党军参谋总部的意见。第1兵团司令官黄杰力主采行第二种方案，他认为进入黔、滇后，不仅可增强西南地区的防卫力量，且可收支援川、康地区作战之效，尤以黔滇地势险要，有利于在战略上采取持久，在战术上形成局部优势，前途大有可为；若向南转移，不仅使大军局促于海南岛弹丸之地，无所作为，而且使川、桂兵力分散，易遭解放军包围，被迫于不利状况下接受决战，有遭覆灭之危险。然而，会议表决的结果，除李品仙、黄杰赞成采行第二方案外，其余均赞成采行第一方案。最后，白崇禧决定“主力准备向南转移，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同时一部入黔。并制定作战计划如下：“本署以持久作战之目的，即以一部固守湘桂边境，拒

匪进犯，另以有力兵团，增援黔中，阻匪深入；并在南路方面采取攻势，与粤境友军协同，先求击破突入南路之匪，以保障我之右翼安全，掩护滇黔，并支援雷、琼方面之作战。”为此，“以第十兵团，固守湘桂边境，拒匪进犯。”“以第一、第十七兵团，分由桂林、三江各附近，向独山、都匀挺进，驰援黔中，拒匪深入。”“以第三、第十一兵团，向玉林、北流、容县、岑溪（均位于桂省东南）地区集中，准备与粤境友军协同，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均在粤省）地区之匪攻击。”“空军使用于桂、柳、邕（南宁）各基地，协同陆军作战。”这一作战计划，“乃以压迫进入南路地区匪军于海岸而歼灭为构想，进而开辟海上通路”^①。

当时，余汉谋集团之第4兵团（辖第23、第70军共4个师）位于博白、陆川地区，第63军（2个师）位于钦州、合浦地区，第62军（3个师）位于湛江，奉命配合白崇禧集团粤桂边地区作战。以上兵力共计3.5万人。

由上可知，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白崇禧自知广西难以固守，遂企图以一部兵力与云、贵、川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集团和宋希濂等部相连接，阻止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同时，以主力与余汉谋残部相配合，击破“孤军深入，兵力分散而薄弱”的陈赓兵团，夺取雷州半岛，开辟海上通道，以便在形势不利时退守海南岛。

二、第四野战军进军广西的部署

广东战役还在进行时，第四野战军首长即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以争取在广西境内歼灭桂系主力的既定部署，筹划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10月18日，林、邓、谭、萧、赵致电叶剑英、陈赓并报毛泽东：“关于广西作战，我们拟待五兵团快进至贵阳或已进至贵阳之后，四野和四兵团发下棉衣之后才开始，准备以围剿和长追的办法，争取歼灭敌人于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90、第395页。

果德、南宁以东地区。目前，桂林、全州以东以北，敌我相互距离已较远，我正面部队估计已甚难抓住和扣留敌人。因此，拟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准备以第13兵团2个军“绕过桂林、柳州直插果德、南宁之线，使两广之敌不易退云南”。次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领导决定以第38、第39、第40、第41、第45军及第4兵团3个军共8个军参加入桂作战，以准备留置湖南的第49军进至永州、桂林、柳州、南宁及两侧地区，掩护交通与筹粮，并要第15兵团准备抽出1个军参加广西作战。

鉴于广西作战多为追击性的运动战，为便于确实掌握白部动向以及时实施战场指挥，由林彪、谭政、萧克组成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于11月1日进到衡阳。

11月4日，林、谭、萧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先以西路军和南路军分路前进，第一步求得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中路军再行动，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其具体部署是：1. 西路军第13兵团2个军首先歼灭通道、靖县之第100、第103军，尔后迅速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今平果）之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的道路。2. 南路军第4兵团先头军10号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白崇禧等部退入雷州半岛，尔后则依情况向南宁前进。如白部有退钦州、北海动向时，则向钦州或廉州前进。其余2个军在后策应。3. 中路军第12兵团第40、第41、第45军，待程子华部及陈赓部先头军超出后再行出动。拟以1个军经道州、永明、恭城、平乐、荔浦前进，1个军沿湘桂路前进，1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第49军3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这一部署是以西路军、南路军首先完成战役迂回和包围，切断白崇禧集团逃跑的道路，尔后以

北路军南下，协同西、南两路大军，聚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中央军委于6日批准了这一作战部署。

根据上述作战部署，林、谭、萧于4日指示第38、第39军及第13兵团：“此次行动多为猛追穷追的性质，故盼部队注意轻装，一切笨重装备与物资可指派部队掩护随后跟进，全军对沿途缺粮、缺宿营地、爬山过水、连续行军皆须有精神准备，并须在克服与忍受这些困难中做出光荣的史迹来。”

三、三路大军挺进广西

11月6日，解放军西路军第38、第39军由武冈、洞口出发，奔袭通道、靖县之国民党军第17兵团，广西战役开始。

此时，第二野战军正向黔东疾进，连下天柱、玉屏、锦屏。白崇禧遂于9日命令第1、第17兵团分别向宜山、南丹和独山、都匀地区前进，驰援黔中。第17兵团即沿三江、从江、榕江向独山前进，第1兵团由桂林地区沿湘桂铁路和桂黔铁路迂回西进。19日，第17兵团先头第100军第19师才到达独山以南之黑石关，第1兵团至20日才移至柳州地区，而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于15日解放贵阳。

西路军于10日占领通道、靖县，由于守军第17兵团先期西撤，仅歼靖县保安队200余人。接着，向黔东南前进，至14日先后进占黎平、从江、榕江，切断了第17兵团的后方联络，15日进入广西境内。

随着第17兵团西进和第1兵团南撤，第10兵团第46军也于10日撤出全县。中路军第41军主力于14日进至东安、新宁、全县一线；第45军移驻东安以东地区；第40军则于6日移驻零陵、道县地区。

南路军遵照四野前指关于“你们第一线部队务须暂在现地停止，迅速补充棉衣，然后在统一配合下西进。目前你们过早西进，

则有可能将全部敌人吓退，使我不能事先切断敌退云南之路”^①的指示，以第13军主力位于茂名地区，第14军主力位于阳江地区，第15军主力位于德庆、罗定地区待机。

白崇禧一面部署第17、第1兵团驰援黔中，一面按11月5日确定的作战计划筹划“南线攻势”，并以第3和第11兵团秘密南移。针对国民党军在粤桂边地区集结重兵而只留少数部队在桂林一带的部署，四野前指判断：白崇禧不是企图阻击与打击第4兵团西进，就是准备由平南、浔州（桂平）之线向雷州半岛及海南岛撤退。因此，12日四野前指致电陈赓、郭天民并中央军委：“四兵团之十四、十五两军应立即迅速向高州前进，以配合十三军首先歼灭博白地区之敌，尔后依情况向南宁西南前进或在博白地区以四兵团全力堵击南下之桂敌。”“十五兵团应即派一个或两个师进至德庆，归你们指挥，配合作战。”

次日，四野前指获悉：白崇禧正以其主力向岑溪、容县地区秘密集中，准备收复并固守廉江，退守雷州半岛及海南岛。根据这一情况，为布置粤桂边地区作战，四野前指遂于13日开始调整整个作战部署：第4兵团主力为防白部退入雷州半岛，应速向信宜、茂名集中，在廉江的部队须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为协助第4兵团对付白部之向南突进，第43军应速向罗定一带前进，至迟15日出发；为加强梧州西南方面之作战兵力，第40军应于15日出发，经道州、江华向钟山、梧州前进；西路军除第38军继续向桂西金城江、百色方向前进，追歼刘嘉树第17兵团，切断其通往云、贵的道路外，第39军则改道向桂中柳州、宜山前进，准备参加郁林、合浦之线的作战与截击由桂林南撤之桂军；北路军第41、第45军于18日先后出动奔袭桂林，将停滞于湘桂线之第10兵团及未南撤的第1兵团截歼于柳州、桂林地区。

根据上述部署，南路军陆续由茂名、阳春、罗定地区向粤桂

^① 林彪、谭政、萧克1949年11月8日致陈赓、郭天民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

边境秘密开进，至 22 日全部到达作战待机地域；第 43 军于 15 日由广州乘船溯西江而上，由德庆下船开罗定，至 23 日在东镇（今信宜县城）及其东北的池洞圩、分界圩地区隐蔽集结。

西路军按照部署向南疾进。第 38 军 18 日进至光冲，20 日解放宜北。第 39 军 18 日攻占古宜，22 日进占融县（今融水）。北路军第 41 军于 20 日占领兴安县城。

白崇禧鉴于驰援黔中计划落空，湘桂方面又受到解放军北路军的攻击，即决定放弃援黔计划，同时放弃桂北地区，退守西江上游之线，以掩护其“南路攻势”，达到“南下钦州，转运海南”的目的。21 日夜，白崇禧对北面作战部署如下：第 10 兵团向西南转移，在转移之前先与第 1 兵团协力击灭向三江方向前进之解放军第 39 军，尔后转向柳州以南地区，最后于苍梧以西濠江、平南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南路军”左侧安全；第 1 兵团先与第 10 兵团于柳城、罗城地区协力作战，掩护桂林、柳州物资向南宁转运，尔后以主力位于来宾、迁江间地区，沿红水河阻止解放军南进，以掩护“南路军”之北侧安全；第 17 兵团即逐次向东兰、万冈地区转移，沿红水河西岸占领阵地，拒止解放军南进，以策应“南路军”作战。但在解放军的打击之下，国民党军溃不成军，纷纷南逃。

解放军西路军第 38 军第 151 师于 24 日占领思恩县城，25 日占领桂黔铁路上的东江、金城江两车站，截获由柳州西逃的火车 1 列、汽车及物资一部。第 39 军第 115 师于 25 日攻占柳州，歼灭守军 2000 余人，缴获汽车 250 余辆及大批军用物资。至此，西路军完全切断了白崇禧部西撤贵州的道路。

北路军第 41 军占领兴安后，桂系第 46 军向南逃跑，仅以第 71 军及暂 1 师节节抵抗。第 41 军接连突破守军防线，于 22 日晨攻占灵川，当日下午解放广西省省会桂林，迫暂 1 师千余人投降。第 40 军于 15 日由零陵、道县一线出发，至 22 日相继进占桂东北的富川、钟山、贺县。

解放军三路大军突入广西腹地，截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南撤雷州半岛的道路，形成了对其三面包围的态势。

四、第一次粤桂边境歼灭战

经过调集兵力，至 21 日，白崇禧的“南路攻势”作战准备基本完成。当日夜，白崇禧下达作战命令：“一、第十一兵团，除以一部占领岑溪及其东北高地之线外，主力由容县向信宜攻击。二、第三兵团，除以一部沿郁林、廉江公路向太平圩攻击，并协力第四兵团攻占廉江外，主力向化县、茂名攻击。三、攻击发起时间，为十一月二十三日拂晓。”^① 据此，第 11 兵团司令官鲁道源以第 125 军一部据守岑溪东北高地，以第 125 军主力及第 58 军攻击信宜；第 3 兵团司令官张淦以第 126 军进攻太平圩，以第 48 军向茂名攻击，以第 7 军向化县攻击。随后，白崇禧又与余汉谋商定，余汉谋之第 4 兵团及第 62、第 63 军在“南路攻势”作战中暂归白崇禧指挥，两军于 24 日拂晓同时发动攻势。白崇禧遂电令第 4 兵团“由博白南下，经凤山、塘蓬，击破石岭圩（廉江以西十五公里）之匪军后，续向廉江攻击前进”，第 63 军向东“支援廉江方面之作战”，第 62 军“即以有力之一部，进占遂溪，策应廉江方面之作战。”^② 白崇禧“南路攻势”作战的企图是以压迫进入南路地区之陈赓兵团于海岸而歼灭，进而开辟海上通路。在解放军已突入广西腹地的情况下，白崇禧此举实际上是孤注一掷。他在动员令中说：“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的关键，胜则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则涂地。”^③

为粉碎白崇禧的“南路攻势”，四野前指于 22 日拟定如下作战部署：以第 14、第 15、第 43 军首先围歼鲁道源兵团于信丰及其以北地区，尔后再歼灭张淦兵团与余汉谋部。为此，第 14 军即进至信宜及其以西 15 公里以内地区隐蔽，准备由南向北攻击；第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6 册，第 395 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6 册，第 396 页。

③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5 页。

15军东移至大城圩、白石圩（信宜东北25公里）隐蔽，准备由东向西攻击；第43军第128师进至界圩、石龙寨（罗境圩以西），第127师后移至怀乡圩（不含）以东10公里以外之塘底屋、路岔坪一带隐蔽，第129师移至石头塘街、龙眼砦一带隐蔽，准备由北向南攻击。另以第13军1个师在廉江抗击余汉谋部，2个师进至壶洞圩、那雾圩、合江圩抗击张淦兵团主力，迟滞其向高州、化县前进和防堵该部向鲁道源增援。四野前指要求各参战部队必须发扬机动作战的精神，在战术上注意集中兵力，重点攻击，各个击破，严戒分散兵力；对已占领阵地和战斗力较强之国民党军，应准备好后再行猛攻，不可零散乱打；对退却之国民党军，则应猛烈追击，使其一乱不可收拾。四野前指指出：“此为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各部须立即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发挥最高度的积极性、勇敢性、坚决性，严戒轻敌松懈。只要此敌歼灭，则解放琼崖、台湾与云南皆属易事。否则，敌退琼崖、台湾或云南，则对尔后作战增加困难。故我全体指战员须奋勇作战，各级指挥员尤须严密细心组织战斗，每个指战员要争取在此次机会立功。”^①为配合南线作战，四野前指命令第38、第39军分向百色、果德前进，第40军进占梧州后向西南直插，第45、第41军向武宣、濠江之线前进。

24日11时，四野前指将上述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当日16时，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十六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

^① 林彪、谭政、萧克1949年11月22日10时致陈赓、郭天民、第43军首长并告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的电报。

汉谋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①

25日,白崇禧部第3兵团第7军2个师进至信宜西南宝圩地区,第11兵团第58军已到达信宜以北之安峨圩、桥头铺、金洞圩地区。根据当时双方态势,陈赓兵团向北歼击第11兵团已来不及,为此四野前指除命令第40军迅速经梧州渡西江南下外,决定陈赓兵团主力“就近首先歼灭敌第七军之两个师”^②,具体部署是,以第13军并指挥第14军1个师抗击白部第48、第126军及第4兵团,第14军主力及第15军全部围歼第7军。同时命令第43军集中兵力,首先歼灭第58军第226师,尔后各个击破第11兵团。这一部署仍然是将重点置于解放军的右翼,集中兵力从国民党军的左翼突破,然后扩张战果,彻底粉碎白崇禧的“南路攻势”。据此,陈赓于26日晨指示第13军于廉江、合江地区堵击国民党军东进,第14军主力秘密移至茂名西北之南塘圩地区,第15军秘密移至信宜西南之仁厚坡、青山岭地区,待白部第7军经南塘圩向茂名前进时而歼灭之。

26日,白崇禧部第3兵团张淦部第7、第48军开始与解放军第4兵团各军先头小部队打响。27日,第7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解放军第14、第15军阵地猛攻,但在解放军的抗击之下,第7军被歼数百人而不得前进进一步。与此同时,第43军于27日上午奉命向安峨圩、桥头铺地区之第11兵团第58军出击,击溃其第226师,第58军主力即向杨梅圩方向逃跑。由于第11兵团向北撤退,致使张淦兵团侧翼暴露,陷入孤军深入的地位。陈赓即抓住时机,以第14、第15军共5个师的兵利于当日下午对第7军实施合围。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6页。

^② 林彪、谭政、萧克1949年11月25日22时30分致陈赓、郭天民的电报。

第7军发觉后，即向陆川方向撤退。张淦见势不妙急令第48、第126军向陆川收缩。至此，白崇禧才发现南路解放军兵力强大，其“南路攻势”作战难以遂行，则决心保存实力，向海南岛撤退。29日，白崇禧命令第1兵团向南宁东西之线撤退，以掩护其长官公署撤往钦州，同时命令第3、第11和第10兵团向钦州、北海地区撤退。

四野前指侦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令南路军各部队乘胜追击，大胆猛插，独立作战，各个歼敌，并要求第43军向郁林堵击第11兵团，陈赓兵团全力抓住张淦兵团。自27日晚开始，解放军南路军各部队发起追歼作战。第43军第129师28日连克容县、北流，歼灭第11兵团部及第58军一部共5000余人，缴获汽车70余辆，击毙兵团副司令官胡若愚。29日第43军攻占郁林，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部及2个团。30日下午，据由博白逃出的群众报告，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中午尚在城内。第43军遂命第127师第379团及第128师第382团向博白前进，并于当日22时将张淦兵团指挥部包围。经30分钟激战，即全歼其兵团部及警卫部队，活捉张淦。

与此同时，第4兵团之第14军于29日在石甬圩、鸟石圩追上桂系第48、第126军，激战至30日，歼灭第48军第175师和第126军第304师各1个团。第15军于29日击溃桂系第7军第171师，进占陆川。第13军第39师进占公馆圩，歼灭第126军一部。桂系第7、第48、第126军在张淦被活捉后，上下联络中断，陷入一片混乱。12月1日，第4兵团与第43军南北夹击，将其包围于博白地区。战至2日，除第126军等少数部队逃跑和溃散于山区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第4兵团西进追歼桂系第3兵团之时，余汉谋集团之第4兵团、第63军乘隙于11月29日进占廉江。陈赓遂令第13军率第37、第38师回师围歼该部。在粤桂边纵队的配合下，第13军于30日发起猛攻。经12小时战斗，歼灭余汉谋部近6000余人，活捉国民党粤桂东边区中将司令兼第321师师长喻英奇。

第一次粤桂边境围歼战于12月2日结束。广西战局急转直下，白崇禧集团的防线彻底崩溃，残余国民党军纷向钦州、南宁间及其以西溃退。

与南路军在粤桂边作战的同时，西路军、北路军对白崇禧部第17、第1、第10兵团发起猛烈追击。西路军第38军在滇桂黔边纵队的配合下，于11月26日解放河池，27日在河池西南长板圩歼灭第17兵团第103军第347师，俘1400余人。接着穷追猛打，在红水河西岸地区重创第103军，并于29日进占东兰县城，12月1日解放万冈（今巴马）。第17兵团部及第103军残部向西逃窜。第39军攻克柳州后，以第117师为左纵队，以第116师为右纵队向南追击。第117师于27至29日在柳州西南土博、南塘圩地区歼灭第1兵团第14军第62师一部，12月1日攻占迁江，歼灭第1兵团第97军第82师及第14军第63师各一部，俘1000余人，缴获汽车300余辆及大批军用物资。第116师于27日占领忻城，12月1日攻占上林县城，2日奔袭宾阳，截歼第11兵团警卫营及第97军第82师残部，俘兵团少将参谋长李致中。

北路军第40军于11月25日攻占梧州，26日南渡浔江，12月1日进抵容县，次日到达郁林地区。第41军于11月23日由桂林南进，先后解放阳朔、荔浦、蒙山，沿途消灭桂系第46军、保安队各一部，30日到达藤县、平南之间的蒙江、丹竹之线，12月1日渡浔江南进。第45军在第41军右侧南进，29日在罗秀遇白部第10兵团第56军第329师，当即展开追歼。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追击，第45军前进100余公里，将其歼灭于武宣以北二塘地区，俘4000余人，并相继解放象县（今象州）、武宣等地。西路军、北路军的行动，有力配合了南路军的作战。

五、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

12月3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由南宁向钦州撤退。白崇禧乘飞机飞抵海南岛，然后乘太仓号军舰于5日中午驶抵涠州岛海面，组织总撤退。第10兵团及第3、第11兵团残部则拚命向

钦州、合浦地区靠拢。

为粉碎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企图，四野前指相继作出部署：南路军第13军由廉州经合浦，第14、第43军由陆川、博白分两路直插钦州，封闭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出海口；北路军第40军由岑溪地区向灵山、石利圩急进，堵截由南宁南撤之桂军，第45军则由贵县向钦州急进，追歼桂系第46军南下；西路军第39军继续向南宁前进，以策应钦州地区的作战，第38军以1个师继续向百色前进，主力改向果德前进；第15、第41军在容县、郁林、陆川地区打扫战场，搜捕溃散的国民党军。

12月2日，解放军开始了以钦州为中心的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南路军第13军由廉江西进，3日占合浦，4日解放北海，6日拂晓进至钦江东岸。第14军5日进至钦江东岸，协同第13军歼灭余汉谋第63军残部，俘少将副军长郭永鏞以下4000余人。6日上午，第13、第14军渡过钦江，包围刚从南宁撤退至钦州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直属队。17时发起攻击，战至次日凌晨，即全歼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的3个炮兵团、2个工兵团、1个警卫团和1个补充团，俘中将炮兵总指挥姚学廉以下1万余人，缴获汽车400余辆，各种炮42门。

与此同时，由玉林西进之第40军第120师于5日在灵山以北百合圩地区截住第11兵团第125军，激战至6日凌晨将其全歼，俘中将军长陈开荣以下近万人。第45军第133师于3日由武宣渡黔江南进，沿途歼灭桂系第48、第46军各一部，当日进占贵县，4日到达横县，5日渡郁江向小董圩前进。第43军于2日由博白地区西进，6日进至大垌圩，与同时追至小董圩、大寺圩地区的第14军第40师、第40军第119师和第45军第133师密切协同，将第10兵团第46军、第11兵团残部和“国防部突击”第1、第2、第3纵队及交警第3纵队共4万人包围在小董地区，激战至7日将其全歼，缴获汽车160余辆。

当南、北两路军在钦州、小董地区进行围歼作战之时，西路

军第38军第151师于4日解放田州（今田阳），5日进占百色，第114师于7日解放田东。白部第17兵团残部逃入云南。第39军第116师于3日越过昆仑关，4日进占南宁，缴获汽车400余辆，5日渡邕江南下，6日在大塘圩地区截歼第11兵团残部和第1兵团第71军第87师，俘4000余人，7日在那晓圩截歼第10兵团第56军1000余人。至此，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结束。

六、封闭中越边境，搜剿国民党军残部

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后，第1兵团等国民党军残部向西逃窜。12月8日，白崇禧电示黄杰等：“一、为保有反攻基地，各部队应各自选择适当地区，暂避决战；轻装分散，化整为零，机动出击，待机反攻。二、第一兵团应即转移至左、右江地区；第十兵团进入十万大山南北地区，分别建立基地，实施匪后游击。”^①但黄杰认为其可战之兵仅剩5个团，解放军正追赶而来，部署游击战已来不及，况且云南卢汉于9日已宣布起义，入滇希望破灭，白崇禧的命令殊难执行。这时，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命令黄杰“并力西进，进入越南，保有根据地，相机行事，无论留越、转台，皆能自如”^②。黄杰遂率部向中越边境地区散逃，以“假道入越，转运台湾”。

早在11月19日，中共中央就指出：“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因此，除程子华兵团着重切断白匪经柳州退贵州，经百色退云南的道路外，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退往越南。”^③据此，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结束时，四野前指即从12月7日21时开始相继作出部署：第13军由钦州向东兴、上思方向追击，第39军由南宁以南地区向龙州、明江进击，第43军由钦州以北地区向思乐追击，其余各军就地打扫战场，搜剿溃散之国民党军。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12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13页。

③ 中共中央1949年11月9日致林彪、陈赓并告叶剑英、方方的电报。

12月8日，第13军3个师分兵两路追击，9日第37师攻占边防重镇东兴，11日第38师进至公安圩，共歼灭第46军等部6000余人。第39军3个师分3路追击，第117师于8日攻占上思，截歼第71军直属队及第88师一部，俘3000余人，11日进至明江，桂系第56军第330师师长秦国祥率部1200余人投降。第115师沿南宁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公路南进，9日于那隆、绥淦（今扶绥）地区截歼第71军军部及第14军第63师残部，俘第71军中将军长熊新民，11日于旭塘歼灭第97军第33师1600余人，12日进占边防重镇镇南关，14日进占龙州。第116师由南宁西进，解放隆安等地，歼灭第46军第236师残部。第43军第129师8日在蓬楼、龙楼地区歼灭第46军第188师2000余人，10日在迁隆冈、思乐地区追歼第11兵团部及第58军第226师1700余人，13日进至边防要镇隘店（今爱店），14日在等浪圩（今峙浪）截歼黄杰兵团第97军残部，俘少将副军长郭文灿以下4000余人。黄杰和鲁道源率2万余人分别由隘店和水口关逃入越南。

在容县、北流、郁林、陆川、横县地区的第15、第41军及第45军，从12月2日开始，分片搜剿溃散之国民党军。第15军经过8天清剿，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在郁林以北罗秀圩活捉第48军中将军长张文鸿。第41军在大容山地区歼灭第7、第48军等残部2000余人，生俘第7军中将军长李本一。第45军第135师于5日在沙村围歼桂中军政区部队，俘中将司令官王景宋以下1500余人，第134师在长垣圩以南粤桂边区歼灭国民党军1900余人，俘湘桂黔护路军中将司令莫德洪等。12月14日，广西战役胜利结束。

在广西战役期间及其以后，解放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国民党军残余。在政治争取之下，1949年12月13日，国民党靖西行政专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赖慧鹏率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国民党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周祖晃率部在百寿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2月27日，国民党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张光玮率

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1950年1月22日，国民党桂西军政区司令官莫树杰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广西战役接近尾声时，余汉谋集团残部开始从雷州半岛向海南岛和台湾撤退。粤桂边纵队相继解放遂溪、徐闻、海康。12月19日，粤桂边纵队配合第43军第128师向湛江进攻，歼灭未及撤退的第62军等部1000余人。至此，中南大陆全部解放。

12月21日，四野前委致电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及陈赓、郭天民并报中央军委：“四兵团从现时起归还二野建制”，“对于四兵团在两广作战中的艰苦与英勇，特致慰问与谢意”。

逃往越南的第17兵团残部7000余人，奉白崇禧的命令于1950年2月5日沿中越边境窜至凭祥以西平而关地区，准备进入十万大山打游击。解放军第45军第134师4个营3000余人当即将其包围，战至7日上午，歼灭第17兵团部和第100军6700余人，其中俘中将兵团司令官刘嘉树以下6000余人。

七、广西战役的战果、意义及其经验

广西战役从1949年11月6日开始，至12月14日止，历时39天。解放军参战兵力为3个兵团9个军31个师及粤桂边、滇桂黔边纵队共40万余人，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万人，其中俘16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78人），缴获各种枪5.3万余枝（挺），火炮1258门，舰艇3艘，汽车1176辆，击落飞机2架，击伤舰艇18艘，击毁汽车134辆，解放了广西全境。解放军伤亡、失踪2477人。

广西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1949年12月11日，林彪、谭政、萧克致信全体参战指战员所说的：华中南大陆的解放，“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并奉为王牌在全国残余反动势力中经常在精神上实力上起支持作用的白匪部队之被歼灭，不但对以后的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有重要意义。”

广西战役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中央军委战略指导上的正

确，战区、战役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参战部队积极、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其主要经验是：

第一，积极贯彻执行了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由于白崇禧集团采取力避决战、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跑的作战方针，歼灭该部必须实行大迂回大包围，这种大迂回大包围有时要超过几个省的范围。战役实践证明，只有运用此种战法，才能置白崇禧集团于死地。对此，国民党方面的战史也写道：“匪军自独山而东，沿溶江、三江、桂东边境，钟山、贺县、德庆、罗定、信宜、茂名、化县、廉江约八百公里战线，以柳州为中心，对国军构成大包围之弧形态势。嗣后，随国军南路攻势作战之开始，匪即南北遥相呼应，以南宁为目标，实施向心合围，迫使我数十万大军，拥塞南宁周边，战既不能，退亦无路，使我若大战力不战而溃，毁于一旦。”^①

同时，由于白崇禧在解放军实施大迂回大包围兵力相对分散的情况下，善于集中其主力攻击解放军之一翼，因而在实施超越一省或数省之大迂回大包围时，解放军的每一路必须保持强大而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否则，将有被其各个击破的危险。在战役发起前，四野前指判断白崇禧集团西撤云贵的可能性为最大，因而以第38、第39军8个师向百色迂回，但当战役开始后发觉白崇禧准备以其主力发动“南路攻势”时，即从广东调第43军西进，加强南翼，同时调整整个作战部署，从而为第一次粤桂边境歼灭战乃至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具有决战性质的第一次粤桂边境歼灭战中，成功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突破一翼的战法。由于白崇禧集中主力进行“南路攻势”作战，从而使第一次粤桂边境歼灭战具有了决战的性质。在这次作战中，国民党军为20个师约11万人，解放军为12个师共15.3万人，从兵力对比上看解放军并不占绝对优势。然而，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26～第427页。

解放军以4个师牵制国民党军右翼13个师，集中8个师从国民党军的左翼连续突破，结果迅速击溃第11兵团，歼灭了第3兵团指挥部，使国民党军主力迅速陷入混乱而形成了全面大溃逃的局面。

第三，参战部队在追击作战中，发扬了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连续1个多月的长距离追击作战，是这次战役的主要作战方式，部队的艰苦疲劳程度超过历次战役。第38、第39军出发最早，路况最差，在1400余公里的崇山峻岭中穿行，有时需用爆破临时开道。第4兵团于广东战役后未得歇息即投入了本次战役，战士体重一般都减轻3至5斤。然而，部队却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按照上级的指示，机动灵活，快速穿插，连续作战，从而保证了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连国民党军的战史也不得不承认，解放军“于追击行动中，能放胆追击，排除一切困难，行动轻捷灵活，乘隙蹈瑕，穿插分割，机动快速，有效迂回，达成拦截之目的。”^①

第八节 举行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面积3.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50余万，位于南海北部，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琼州海峡宽11~27海里（约20~50公里），从雷州半岛起渡，乘木帆船顺流一夜可到海南岛，若顺风顺流5~7小时可抵对岸。琼州海峡的风向规律为，每年12月至翌年3月多刮北风和东北风，4月谷雨节气后以东风和东南风居多。海南岛属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中部为五指山和黎母岭，山高林密；沿海地区多丘陵和平原，村庄稠密，交通便利；沿岸多天然良港，可停泊中型以下舰船；岸滩大部为沙质，便于木帆船登靠。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29页。

一、国民党军防守海南岛的企图和部署

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大部撤至海南岛，企图在此长期盘踞。1949年12月，国民党在海口成立了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以薛岳为总司令，以李扬敬、韩汉英、李玉堂、李铁军、欧震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岛上的陆、海、空三军，准备与解放军作战。国民党军在海南岛的兵力计陆军5个军18个师及装甲旅第4总队第42大队第5中队等部约11万人；海军海防第3舰队及海军第2军区所属陆战第2旅第4团，有军舰、炮艇25艘；空军第1、第3、第10、第20大队，海南空军指挥部直属飞行组及高炮第4团第3营等部，有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5架^①。

薛岳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后，根据“国防部”关于“海南防卫总部，应速加强整备，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匪，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匪之入侵”^②的命令，决定作战计划如下：“本部应把握当前外匪与内匪，尚呈分离之不利态势，依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土共，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匪。”^③ 据此，以海、空军的军舰和飞机大部置于琼北地区，用以封锁琼州海峡，防止解放军渡海进攻。同时，将其所属部队编成第1、第2、第3、第4路军，负责海南岛的“清剿”及防御的双重任务：第1路军由第32军（辖4个师）及琼北要塞（欠秀英炮台）组成，统由李玉堂指挥，担任琼东木栏港至乌石港地段的守备任务；第2路军由第62军（辖3个师）、教导师、暂编第13师、琼北要塞之秀英炮台、宪兵第1团和海口警备司令部组成，统由李铁军指挥，担任琼北木栏港至林诗港地段的守备任务；第3路军由第4军（辖3个师）和第64军（辖3个师）组成，统由容有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44页，第四编第四章插表第10、第11、第12。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48页。

^③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48页。

略指挥，担任琼西林诗港至领头湾地段的守备任务；第4路军由第63军（辖3个师）、宪兵第3团和琼南要塞组成，统由陈骥指挥，担任乌石港至领头湾地段的守备任务。

经过2个多月的整備，国民党军依仗海、空军优势，在海南岛包括琼州海峡在内组织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薛岳以个人字号将之命名为“伯陵防线”，并吹嘘这条防线固若金汤。1950年1月下旬，驻岛的国民党军开始对琼崖纵队发动进攻。

二、解放军分批偷渡与主力强渡相结合作战方针的形成

早在1949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在致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的电报中即指出，第4兵团应乘胜追歼由广州逃跑的国民党军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①。广西战役结束前夕，12月10日，林彪在关于广西战役结束后四野部署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第40、第43军进行短期休整后，即准备攻琼崖的建议。14日，第四野战军前指在致第43军并告第15兵团、第40军领导的电报中指出：“攻海南岛战役，由十五兵团首长担任统一指挥”。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接受任务后，根据从琼崖纵队所了解的帆船利用北风可一夜通过琼州海峡、农历年前为北风季节而年后即转为南风的情况，于15日致电林、谭、萧并中央军委，提出：第40、第43军迅速扫清雷州半岛，然后进行整训和渡海作战准备，争取农历年前开始渡海作战。在进行作战准备的同时，采取以小部队偷渡的办法，先运过一批部队与琼崖纵队会合，以增强岛上的接应力量。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攻取海南岛十分关心和重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收到林彪12月10日关于以2个军准备进攻琼崖的电报后，于12月18日复电林彪，同意“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并根据金门之战失利的经验教训指出：“渡海作战完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8页。

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斗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①据此，第四野战军一面于22日派作战处副处长尹健前往第三野战军调查渡海作战的经验，一面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转给第15兵团。

邓华、赖传珠和洪学智等接到毛泽东关于渡海作战的指示后，结合琼州海峡较宽，国民党军有海、空军配合，解放军无渡海登陆作战经验等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于12月27日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及中央军委：“（一）这一战役能否打好，要看我们准备能否充分。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巨大的组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准备物资，收集船只，进行演习等等。以季节论，在旧历年前动作为有利。以准备工作论，恐时间来不及，且四十军尚在开进途中，四三军亦有许多师未到齐。如延至年后，又恐转刮南风困难增加。故我之方针尽一切努力争取旧历年前动作，但又不为季节所限，而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以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二）这次作战的关键是搜集船只与对付敌人海空问题，尤以敌舰对我渡海妨碍为大。虽然我们正在想办法，但其效果不大。如能派一部空军直接配合，则我之困难便可减少。这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2～第63页。

是最后且比较重要的一个战役，我们应集中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而且是可能的。（三）三野之登陆作战如何准备，何时开始，能否共同进行较为有利。”

毛泽东接到第 15 兵团 27 日的电报后，于 31 日致电林彪：“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①

这时，尹健通过对金门、登步岛作战失利的调查，于 1950 年 1 月 3 日将所得经验教训及对海南岛作战的建议上报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由于国民党军是岛屿防御，在自然条件上造成了一定的优势，而解放军却是远渡海洋，不但无海、空军配合，且无可靠的炮兵掩护登陆，仅可利用的帆船几乎全靠风向、潮汐等条件，这就大大降低了解放军在陆地作战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在双方力量的估计上，如认为国民党军已是残军、败军，进而产生不经过充分准备而急于求成的急躁轻敌思想，是要失败的；负责首长应能专心于作战指导而不被其他工作所牵制。因此，对海南岛作战，第 15 兵团应即组织成指挥所，靠近作战部队；把握战机应以充分准备好为前提。第 15 兵团想利用 2 月东北风季节攻击，但如船只不够，准备工作不充分，则应延期；在船只准备的问题上，企图依靠运送第一梯队的船只返回接第 2 梯队的做法难以成功。因此，所准备船只的数目，应以一次装完部队并能有把握地解决岛上的国民党军为标准，否则，不能发起攻击。

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尹健和第 15 兵团的汇报情况，于 1 月 5 日致电第 15 兵团：“由于敌利用现有诸海岛及台湾对我内地城市、交通进行轰炸，增加我方困难……因此我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歼灭海南岛之敌，这是一个完成革命和使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66 页。

国进行建设与走向繁荣的绝对必须条件。因此这一作战应视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我全体指战员均须明确坚定的建立此种决心，切勿存含糊马虎的观念。”“十五兵团主要领导应将次要工作委托别的同志去代行，兵团主要负责同志应尽心尽力指导与组织海南岛作战之进行，其工作内容除军队训练与作战外，并应具体组织策反工作之进行与对冯白驹之帮助及对后勤方面问题之提出。”“目前尚未进行过一次偷渡。偷渡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有利到什么程度，均尚未发现。故目前必须实行偷渡才能打破此种疑问，才便于更加有把握的确定尔后之作法。”

第15兵团按照第一批以1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的设想进行准备。根据这一设想，则需要能载30人以上的船1000余只。由于国民党军已将雷州半岛地区能渡海（至少能载30人以上）的船只大部带走，第40、第43军所收集的440余只渔船中能载30人的船只仅占半数。为此，第15兵团准备将一部分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以减小风潮对帆船渡海的影响。此外，部队的渡海教育训练、船工水手的组织选拔及对付国民党军军舰方法的研究，都需要相当时间。为此，1月5日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并中央军委：“根据以上情况，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但过旧历年后风向改变，帆船不能使用，如全部改装机器，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且耗费很大。如只改装部分，则又非利用下一个冬季北风不可。究以如何处理，请示。”次日，林彪将第15兵团的这一电报转报毛泽东，并表示：“我们对渡海作战亦全无经验与体验，尚无确定意见，如有指示，盼告。”与此同时，第15兵团派洪学智赴武汉，向第四野战军首长汇报购买一部分发动机和登陆艇以及推迟渡海作战时间的意见。中南局和第四野战军同意推迟渡海作战的时间，但考虑到购买发动机和登陆艇所需外汇很多，遂派洪学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1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

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时间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能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①同时，洪学智到北京后，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听取了汇报，并指示有关部门尽力帮助解决购买发动机和登陆艇的所需款项。

根据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首长于1月12日致电第15兵团：“为了能统一指挥四〇、四三军的偷渡和作战及后勤与教育，我们意见邓华同志应率轻便指挥所去雷州半岛，以便就近研究情况和组织协同动作。”23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本日洪学智由武汉回广州。关于渡海作战问题，我们已面告其如下两点：第一，争取以五、六个月的时间完成渡海的准备。在准备期内，除渡海部队进行筹备船只，训练自己的水手，训练部队不致晕船及海上战术与登陆战术外，并加强策反，对冯白驹部武器弹药、干部的帮助和军政指导，并设法以小部陆续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73～第74页。

进行偷渡，与冯部会合打游击，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登陆。第二，估计台湾的作战需要甚大规模的准备与较长的时间，故拟不等候台湾作战的配合，而准备先攻下海南岛，并争取不让海南岛之敌退至台湾，以求得在海南岛将其歼灭之。（二）为减少我渡海时敌海空军的扰乱及台湾方面敌人以舰船万一向海南岛增援，或将海南岛之敌以舰船撤至台湾防守，增加解放台湾之困难，为了这三个目的，海南岛作战时，须尽力争取我空军的配合，以便封锁敌之海军活动与减少敌之空军活动，盼军委对此有所准备。”

这时，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为接应大军登陆，于1月下旬派参谋长符振中从海南岛偷渡来广州，向华南分局和第15兵团汇报岛上的情况，并转达了冯白驹的两点建设：一是乘国民党军海防部署尚未就绪，先派一部兵力分批偷渡过海，增强岛上琼崖纵队的力量；二是如果偷渡不行，则先送一批弹药接济琼崖纵队。叶剑英和第15兵团首长询问了情况特别是海上情况后一致认为，先派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是可取的。

根据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的指示，第15兵团经过1个多月对情况的了解和研究，初步形成了进攻海南岛的决心和实施方案。1950年2月1日至2日，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在广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第12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以及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战役特点，认为国民党军虽有10万余众，但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并且处于环岛防御和同解放军与琼崖纵队两面作战的情况下，兵力相对分散，短时间内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同解放军作战；解放军在全国胜利的鼓舞下，士气高昂，战斗力很强，并有琼崖纵队的配合接应，岛上有根据地、游击区可以立足，回旋余地大；海南岛海岸线长，登陆点多，国民党军防不胜防，便于解放军偷渡和强渡与琼崖纵队形成里应外合之势。然而，国民党军虽然战斗力弱，却有琼州海峡天险与海、空

军配合作战，具有相当优势，不可轻视；解放军虽战斗力强，却船只不足，无渡海作战的经验，无海、空军配合和对付国民党军飞机、军舰的有力武器，在渡海未登陆之前还形不成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如何乘木帆船渡过琼州海峡并打破国民党军的海、空封锁，即成为海南岛战役成败的关键。围绕这一问题，在会议讨论中，大家觉得，只有夜间大批偷渡，敌人不易发觉，才可使敌机、敌舰无法发挥作用。海南岛比较大，登陆点多，又有琼纵接应，小批偷渡是可以上去的。只要上去几批与琼纵会合，增加岛上力量，就能接应我军主力大规模强行登陆。因此，会议最后确定了渡海作战采用“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会议同时决定：第40、第43军在农历年前争取各渡过1个团，取得经验，以利再战；为加快航速、减小损失和风潮的影响，渡海工具以改装机帆船为主。按一次载运3万人计算，准备改装机帆船600只，修理及购买登陆艇30艘。这一工作须在5月前完成，6月即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由于国民党军白天以飞机轰炸雷州半岛，夜间以军舰巡逻琼州海峡，建议第四野战军增调高射武器和重炮于海峡沿岸地区，掩护船只和部队训练。

会议结束后，第15兵团将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和实施计划上报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43军则准备以1个团先行偷渡。2月10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电中央军委并转毛泽东：“据邓华、赖传珠来谈：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他们建议在此时间内，先行〔以〕偷渡的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并表示：“我们同意四三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并亦同意其他部队寻机陆续渡海”。12日，毛泽东在苏联复电林彪：“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

提早解放海南岛。”^①

三、战役准备

第40、第43军于1949年12月下旬进入雷州半岛，分别于临高以西和以东地区进行渡海作战准备。高炮团位于三塘港、海安港一带，掩护船队和起渡场。加农炮团位于徐闻县以南沿海地区，掩护部队训练。琼崖纵队全力以赴，准备迎接大军渡海作战。广东军区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下设船只筹划、策反工作和物资供应3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领导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

为做好准备工作，第15兵团于12月22、26日发出海南岛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详细规定了战役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征集船只，雇请船工

在广东军区支前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部队与地方共同组织了“船工、船只收管委员会”，在东至珠江口、西至中越边境的沿海地区广泛动员船工，征集船只。广大渔民踊跃献船，积极报名参战。海南岛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部队，也将征集到的170余只木帆船和动员的400多名船工分批送到雷州半岛。经过3个月的努力，共收集、修补大小船2000余只（其中包括攻打涠洲岛夺得的300余只），雇请船工4000余名，保证了部队海上训练和渡海作战的需要。

为了改装机帆船，兵团和地方在广州收集了160余台机器运往前方，但大部分因太旧和马力小而不能使用。修理好的12艘登陆艇在送往前方时也都坏在途中。第四野战军派后勤部政治委员陈沂和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罗文到广州，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到港、澳购买登陆艇，由于财政困难等原因，只买到一些防晕药、罗盘针和救生圈等。针对这一情况，部队自力更生，用汽车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将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两军先后改装机帆船134艘，基本解决了指挥、联络和突击用船。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59页。

（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部队接受任务后，广大指战员为能参加解放中南的最后一战而感到莫大光荣，倍受鼓舞。但一到海边，看到茫茫大海一望无际，木帆船在滔滔海浪中大起大落、时隐时现，以及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耀武扬威的情景，一部分同志对渡海作战产生了顾虑。有的认为，海上“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乘木帆船渡海非葬身鱼腹不可。还有的认为，海上通过困难，弄不好就会革命到“底”（海底）。针对一部分同志因不习水性、没有渡海作战经验而产生的恐惧大海、怕大风大浪、怕晕船和怕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等思想，兵团和各军把增强指战员的信心与勇气，使其敢于下海，敢于同大风大浪搏斗，敢于在海上同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作斗争，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为此，各军以团为单位，按照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的办法，对部队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动员。首先集中干部学习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第四野战军关于渡海作战的指示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等有关文件，解决干部的思想，并就渡海作战的有利条件、困难和解决的办法展开讨论与辩论，把干部的思想集中到完成任务上来。然后从阶级教育入手，结合形势任务教育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解决战士的思想顾虑。为配合思想教育，部队还组织演出了《刘胡兰》、《血泪仇》和《钢骨铁筋》等剧目。通过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明确认识到解放海南岛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既有困难又有解决的办法，激发了部队的高度责任感、荣誉感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干部、战士纷纷表示：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打好解放中南的最后一仗，要像刘胡兰那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与此同时，部队还从丰富渡海作战的战术技术上来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顾虑。为此，兵团和各军提出了“艺高人胆大”的口号，号召干部、战士积极学习海上知识，练战术，练本领，开展“出主意，想办法”的军事民主运动。于是，干部带领战士学习游泳、走浪桥、划桨、摇橹等航海技能，搜集研究古今中外关于渡

海作战的资料和经验，进行防止晕船等各种科学实验。通过实际锻炼和体验，干部、战士逐渐掌握了帆船的性能和航海技术，适应了海上生活，丰富了航海的知识经验，思想顾虑也逐步清除。特别是鲁湘云排用木帆船打跑国民党军军舰^①、2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及第40军第119师攻占涠洲岛的胜利，使部队勇气倍增，战斗情绪空前高涨。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参加第1梯队，争着要打国民党军军舰。到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开始前，部队出现了一个请求作战立动运动的高潮。

在抓好部队教育的同时，各军还用很大力量做了团结教育船工的工作。

（三）进行海上练兵

根据渡海作战的特点，参战部队按先近后远、先昼后夜、先单船后多船的方法进行演练。同时，各军以团为单位挑选干部、战士组成水手队，向老船工学习撑船和看风识浪等航海技术。部队抽调200多名汽车司机学习机帆船驾驶。经过3个多月的海练，部队学会了海上射击、战斗单位和战斗队形的编成等海战战术，同时训练水手7352名。

由于国民党军的军舰是渡海作战的主要障碍，部队在海练中特别注意研究了对付的办法。经过发扬军事民主，群策群力，终于解决了在木帆船上架设火炮的技术问题，造出了“土炮舰”。各军遂将37和57战防炮安装在船上，组成炮舰护船队，专打国民党军军舰，掩护部队渡海。

（四）调查敌情、海情，做好偷渡的准备

为弄清海南岛国民党军的情况，除技术侦察外，中共华南分局和兵团均成立了策反委员会，兵团和2个军都与琼崖纵队直接沟通了电台联络，并于1950年1月16日首次派侦察人员过海与

^① 1950年2月20日，第43军第382团第4连副排长鲁湘云与7名战士在海练中掉队，次日与国民党军舰遭遇。他们沉着冷静，当军舰离木帆船50米左右时，即一齐开火，打得国民党军舰拖着浓烟逃走。

琼崖纵队及岛上沿海各县的组织取得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侦察情况。经过3个月的工作，基本查清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器配备和工事构筑情况。

为掌握风向和潮汐的变化规律，两军各师、团挑选一批干部，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船工参加组成水文气象组，在当地气象台的配合下，以简单设备昼夜不停地对风向、潮水、海流进行测试，从中找出规律，并将每天的测试结果上报两军和兵团前指。

为做好偷渡准备并严密组织与掌握偷渡计划，由兵团、两军和琼崖区党委派人在雷州半岛组成偷运工作委员会，在海南岛北部分设2个小组，配属电台与偷运工作委员会密切联络。

此外，渡海作战兵团还抢修了广州至海康、梧州到廉江和徐闻至各起渡场间的公路，使作战物资和器材及时运到前方。

四、组织分批偷渡

1950年3月初，海南岛国民党军的守岛部署初步完成，除以海、空军封锁琼州海峡，禁止渔船出入，将沿海20公里（陆地和海上各10公里）地区划为封锁区外，还抽调优势兵力“围剿”琼崖纵队，使琼崖根据地被压缩，粮食一部被抢走。在此形势下，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如不速派部队过海支援，琼崖纵队的处境势必更加困难，对以后登陆作战更为不利。为了支援琼崖纵队的斗争，加强岛上的接应力量，摸索渡海作战的经验，为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有利条件，第15兵团首长研究后决定，第40、第43军各组织1个加强营，利用尚有北风的有利时节和国民党军抽调部队“围剿”琼崖纵队、两翼海防薄弱的有利时机，分别向琼西北、琼东北地区实施偷渡。兵团电示两军：登陆点应选择能1夜到达为宜，或于有利天候提早起渡，并须多安桨橹，增加速度，务求拂晓或雾前登陆为有利。琼崖纵队也决定以第1总队和独立团分别在上述两地区负责接应。

3月5日19时，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1个加强营799人，配属2门迫击炮，在师参谋长苟在松的率领下，由琼纵侦察

科长任向导，乘木帆船 13 只，由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渡。战船顺风顺流，向琼西北白马井地区疾驶。当航行至光村西北距海南岛 30 海里的海面时，天亮停风，战船只能靠划桨、摇橹前进。这时，海面有国民党军的几十只帆船在同向行驶，国民党军的巡逻飞机也开始出动。指挥员立即命令船队向国民党军的帆船靠近，并按其联络方法举旗与国民党军的飞机联络，使巡逻飞机无法辨认。6 日 13 时，当船队接近超头市（白马井南 20 里）登陆点时，遭到国民党军的 4 架飞机和 2 艘军舰的俯射和尾追、炮击，岸上的国民党军也开火拦截。部队冒着炮火加速航行，强行靠岸登陆，在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第 1 总队总队长陈球光所率第 8、第 9 团的接应下，击溃国民党军 1 个营，顺利进入根据地。

3 月 10 日 13 时，第 43 军第 128 师第 383 团第 1 营，配属 92 步兵炮连共 1000 余人，在团长徐芳春率领下，乘木帆船 21 只，从湛江东南的硃洲岛起渡，趁乌云密布、能见度差的时机，向琼东北的赤水港行驶。20 时，海面突然风浪大作，帆船在狂风巨浪中颠簸，有的被折断桅杆，有的被打漏，各船均失去联络。但各船指战员不畏艰险，各自奋力前进。11 日 9 时至 24 时，部队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线陆续登陆。在当地群众和琼崖纵队独立团的接应下，加强营于 12 日到达文昌地区，13 日击破国民党军 6 个团的围攻，尔后转入琼东根据地。

与此同时，为解除国民党军对雷州半岛的侧翼威胁并取得渡海作战的经验，第 40 军第 119 师进行了解放涠洲岛的作战。3 月 5 日 19 时 40 分，第 119 师第 356 团全部，配属山炮、重迫击炮各 2 门，在师参谋长夏克率领下，分乘木帆船和机帆船从北海市起渡，当日遇逆风改在北海市东南白虎头集结。6 日 19 时由白虎头出发，7 日 2 时开始登陆。部队迅速包围涠洲湾，3 只机帆船“炮艇”堵住港口，截击国民党军军舰。经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军舰“海硕”号被击伤逃跑，解放军于当日 12 时全部占领涠洲岛，俘 436 人，毙伤 16 人，缴获既大又好的木帆船 300 余只。

偷渡的成功与涠洲岛的解放，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木帆船是能够航渡通过海峡的，国民党军的海岸防御是可以突破的，其军舰是可以对付的，从而解除了部队对渡海作战的顾虑，更加坚定了指战员对渡海作战的信心与勇气。

为阻止解放军继续偷渡，薛岳以海军封锁涠洲岛并昼夜不停地巡逻于景心角至八所港海面，以空军轰炸雷州半岛解放军的船只，命令陆军将所有火炮和重武器集中于沿海一线。

根据第1次偷渡的经验，为进一步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渡海作战创造条件，兵团前指决定，两军再组织1个加强团，以1夜到达为原则，在国民党军正面实施偷渡。同时，电示琼崖纵队和先遣加强营积极做好接应工作。为此，邓华率兵团前指（即渡海作战兵团前方指挥所）于17日离开广州，20日进至雷州半岛，直接指挥渡海作战。

3月26日19时，第40军第118师由第352团第2、第3营和第353团第2营组成的加强团2991人，在第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的率领下，分乘木帆船、机帆船81只，由灯楼角起渡，向琼西北的临高角驶去。船队开出30多分钟后，东北风停止，部队靠划桨、摇橹前进。因潮水东流，下半夜又起大雾，队形难以保持，各船随流东漂，致登陆点距预定计划偏东百余里。27日5时至8时，加强团在玉抱港（主力）至红牌港一线分散登陆。担负接应任务的琼崖纵队第1总队和第40军先遣偷渡营虽未接到加强团，但在临高一带同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吸引国民党军2个师，有力策应了加强团抢占滩头阵地。加强团上岸后，先后击破国民党军第62、第64军10多个营的堵击，尔后进入琼崖根据地。

3月31日22时30分，第43军第127师由第379团和第381团第1营组成的加强团3733人，在师长王保东、政治委员宋维斌率领下，分乘88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起渡，向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驶进。船队行至琼州海峡中流，东北风停止，

尔后与国民党军 3 艘军舰遭遇，队形被打乱。第 379 团第 5、第 8、第 9 连的炮船迅速迎上前去，与之展开近战，并将 1 艘军舰击伤。第 9 连的 3 只炮船穷追猛打，将国民党军舰驱至海口市以北海面。3 只炮船共 45 人虽仅生还 1 人，但确保了主力登陆。事后，毛泽东称赞第 9 连 3 只炮船的作战创造了“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①。4 月 1 日 4 时，加强团在预定地点登陆，随后与琼崖纵队独立团等部会师。第 379 团第 8、第 9 连在完成掩护主力前进的任务后，驶偏了方向，误在海口市以北的白沙门岛登陆，因寡不敌众，血战一昼夜，大部壮烈牺牲。

解放军两批偷渡登陆后，薛岳判断解放军将大举登陆，遂集中力量加强海防，停止了对琼崖纵队的围攻。

五、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

第 1 次偷渡成功后，兵团前指与两军首长对渡海作战已有相当的把握与信心，2 个军征集的船只各运送 2 个师已不成问题，同时还了解到在清明（4 月 5 日）至谷雨（4 月 21 日）期间有东北风、东风、东南风可以利用。根据以上情况，兵团前指与两军首长反复磋商后，报请上级批准，修改了广州会议关于渡海工具以机帆船和登陆艇为主的决定，而改变为以木帆船为主（尽量多改装一些机帆船作炮艇），于谷雨前后提前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为此，在第 40 军加强团偷渡成功后，兵团前指即于 3 月 28 日召集两军首长及炮兵干部在徐闻县赤坎开作战会议，确定两军均向雷州半岛西南集中，做好大举渡海的准备。

第 40、第 43 军各 1 个加强团登陆后，进入海南岛的兵力近 1 个师，加上琼崖纵队已超过 2 万人，岛上接应力量已大大加强。通过分批偷渡，部队取得了渡海作战的经验，从侧翼偷渡到正面突破均获成功。4 月 8 日，邓华致电第四野战军并中央军委：“为争取春夏之间解决琼岛问题”，“第三批决定组织六至七个团的兵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61 页。

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其余部队准备第4批作为大举登陆的第2梯队，于谷雨后迅速登陆。“估计第三、四批登陆后，岛上形势会起基本变化。”一为国民党军可能撤退，这样我可能消灭其一部并争取其一部投降。“一为可能坚守，最近敌传出台湾派军来增援，说装甲部队亦派了人到海岸视察。估计增援可能性太少，但在作战指导上一定要准备敌奉令固守，作垂死挣扎。因此，两军部队应全部过去”，“并再准备好一两个师，必要时立即出动。这种争取我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敌人是必要和有利的。”第四野战军首长同意上述作战计划，以第41军第122师接替第43军第129师在大襟、上下川岛一带的防务，以第44军第131、第132师南下雷州半岛，作为渡海作战的预备队。

4月10日，邓华下达了大举渡海作战的命令：第40军6个团、第43军1~2个团为第1梯队，务于4月13日以前准备完毕，争取于15~18日利用海潮平流期^①实行强渡，具体起渡时间临时下达。两军起渡点以鲤鱼港为界，以西属第40军（含鲤鱼港），以东属第43军；登陆海岸以马袅港为界，以西属第40军，以东属第43军。岛上接应部队由两军根据各自任务，自行布置接应配合。但琼崖纵队第1总队应配合岛上第118师行动，并各以一部积极在儋县、长坡地区活动；第3总队应配合第127师行动，并以1个团与独立团在文昌及海口东南地区积极活动，牵制与迷惑国民党军；第5总队主力应向海口地区积极活动，牵制与阻止国民党军北援或向榆林方向逃窜。两军登陆后应乘守军混乱或来援时而歼灭之，并求得打开一条走廊，以便将两军后续部队于短时间内全部渡过。尔后，第40军主力应速向加来急进，包围守军第64军军部，并以1个团向那大前进，监视该处守军（第3路军及第4路军军部）；第43军应速向澄迈急进，包围守军第62军军部，吸引

^① 海潮平流期，亦称海潮伏流期。琼州海峡每月两次大潮，每次大潮开始前3天称平流期。平流期海水流速甚小，即使风停了，也便于船只划桨、摇橹前进，是乘木帆船渡海登陆的有利时机。

其他守军来援并在运动中歼灭其有生力量。两军将加来、澄迈守军歼灭后，预定第40军即以1个团配合琼纵第5总队主力迅速切断守军第4路军退路，军主力即歼灭那大地区之守军；第43军主力即向海口攻击前进。两军过海船只必须派得力干部负责督促迅速返回，以便第2梯队迅速渡海。邓华要求登陆部队接近岸滩时，即不管国民党军如何抵抗，必须坚决、勇敢、顽强、迅速、不顾一切地打上去，以一部巩固滩头阵地，以一部向纵深发展；岛上接应部队须同时到达，如有把握则消灭岸上的国民党军，控制一段海岸。

4月16日，潮汐平流，下午为东风。兵团前指即下达了起渡命令。

第40军前指率第118师第354团，第353团2个营，第119师全部及第120师第358团共6个团（缺1个营）1.87万人，乘船261只（内机帆船22只，护航炮船16只），于16日19时30分由灯楼角起渡，预定在博鳌港、临高角一线登陆。第43军前指率第128师第382团、第383团2个营及第384团1个营共2个团6968人，乘船96只（内机帆10只，护航炮船8只），于16日19日40分从三塘一带起渡，预定在林诗港至圣眼山一线登陆。

解放军渡海编队刚离岸8海里，便被国民党军飞机发现，遭到轰炸和扫射。国民党军发现解放军大举渡海后，即以“美宏”、“潮安”、“永康”、“海硕”、“中训”号军舰和3艘炮艇拦截，海防第3舰队司令王恩华亲率旗舰“太平”号由海口赶至参战。解放军护航炮船队即与国民党军军舰展开激战，掩护主力渡海登陆。顿时，海面上火光四起，浪花冲天。在激烈的海战中，国民党军的“驱潜”号等舰艇被打伤，旗舰“太平”号被打得拖着浓烟逃走，舰队司令王恩华被击伤。在护航炮船队的掩护下，经过7个多小时的航行，渡海船队突破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在琼崖纵队第1、第3总队和2个军先遣偷渡团的接应下，于17日3时开始，第43军第128师主力在玉抱港、雷公岛一线登陆，第40军主力在新村、

临高角地段登陆。至6时，两军全部登陆完毕。

第40军部队上岸后，击溃国民党军第64军第131师2个团，连克9座地堡群，夺取滩头阵地。与此同时，岛上第118师先遣偷渡团于拂晓占领守军核心阵地临高山（今高山岭），掩护登陆部队集结。第43军第128师主力登陆后，攻占才芳岭、玉抑港、桥头等据点，歼灭守军1200人，并包围了花场港。岛上第127师先遣偷渡团于拂晓进至福山以北地区，与第128师主力会合。

六、琼北围歼战和全岛的解放

蒋介石于1950年3月在台湾复任“总统”后，鉴于自己的残余部队已撤至沿海各岛屿和解放军正准备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形势，决定集中兵力确保台湾，必要时放弃舟山及海南各岛。解放军渡海兵团大举登上海南岛后，薛岳急将暂编第13师自三江车运福山，配合第62军第151师第453团向解放军第43军登陆部队进攻，以第64军第156师及第131、第159师各1个团向临高增援，向解放军第40军登陆部队进攻，企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而歼灭之。

根据国民党军尚准备同解放军在琼北决战的征候，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邓华于4月17日晚电令第40军登陆部队包围美台、加来之国民党军，第43军登陆部队集结于福山、多文地区机动。据此，第43军第127师先遣偷渡团协同第128师主力，于18日在福山以北击溃国民党军暂编第13师等部4个团的进攻，第128师先遣偷渡营趁机占领福山。第40军第118师于19日上午在美台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64军第156师师部及1个团大部，第119师亦于当日占领加来。至此，解放军攻占福山、多文、加来一线，彻底突破“伯陵防线”。

薛岳第一次进攻失败后，又将第32军第252师主力（2个团）由嘉积（今琼海）车运澄迈，将第63军第756团自三亚空运海口，以第62军第151师由屯昌向澄迈前进，以第62军第153师进至澄迈老城及白莲市，以第64军第153师和第131师集中于临

高、美台地区，以第4军第90师集中于那大，继续对解放军实行围攻。

根据上述情况，为便于尔后夺取海口及后续部队继续登陆，邓华于19日16时指示“四十军即向澄迈前进，负责包围歼灭澄迈之敌。四三军即进至美亭东北地区，担任歼灭海口及定安向澄迈增援之敌。”此外，要求第40军以1个营配合琼崖纵队第1、第5总队主力留于西区活动，牵制国民党军第3路军。第43军第128师主力于19日黄昏东进，次日上午即将由定安向澄迈增援的国民党军第252师主力包围于黄竹、美亭地区。第127师先遣登陆团亦于20日8时进至美仁地区，准备打援。

薛岳为解其第252师之围，又急将第62军第163师2个团从琼山车运安仁，以第62军第153师由白莲市向风门岭、茅草山前进，以第252师另1个团向黄竹、美亭前进，对解放军第128师实施反包围，同时命令驻海口的空军出动助战。邓华乃决心将计就计，趁薛岳集中主力围攻第43军登陆部队之机，在美亭、安仁、白莲地区展开一次较大规模的围歼战。于是，命令第43军登陆部队死守阵地，顶住国民党军的进攻，命令第40军不顾疲劳，迅速东进，将进攻第128师的国民党军包围起来。

21日，国民党军第62军等部在飞机的配合下，对平顶山、风门岭、茅草山等第127师阵地发动13次进攻。在琼崖纵队第3总队和独立团的协同下，第127师第379团英勇抗击，该团第1连虽剩10余名伤员，但仍守住了阵地。第128师主力于21日晨攻占黄竹后，即准备歼灭美亭之国民党军第252师主力。当日下午，第40军主力7个团抵达美亭地区，将包围第128师的国民党军包围起来。次日，第40军、第43军的登岛部队和琼崖纵队第3总队及独立团对国民党发动猛攻，国民党军即向海口溃逃。美亭围歼战，全歼国民党军第32军第252师主力，重创第62军等部。接着，第118师一部协同第128师于23日晨在琼山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62军2个师大部，第128师和第127师先遣登陆团于23日

8时占领海口。

海口市解放后，渡海作战兵团第2梯队第43军13个营，于23日19时由三塘港、新地港起渡，次日1至4时在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今新海港）登陆。至此，渡海作战兵团主力全部登上海南岛。

鉴于海南岛战况恶化，为避免主力被歼，台湾“国防部”于18、22日先后电令薛岳组织撤退。薛岳遂于22日午后下达了撤退琼南的命令，要第1路军退集乐会、万宁，第2路军取道定安、嘉积，退集陵水、保亭，第3路军退集北黎、昌江、感恩，第4路军和海军、空军退集榆林、三亚地区。薛岳要求台湾务于26日前派船到达榆林港和三所港等地，接运部队撤离。

渡海作战兵团获悉国民党军向琼南撤退，即于24日16时命令两军不顾疲劳，分3路追击，同时指示琼崖纵队配合主力南进。

东路追击部队由第40军主力及第43军第128师组成，沿环岛公路经嘉积、乐会、万宁、陵水向榆林追击。第118师第354团加强营乘坐汽车于24日黄昏从海口出发，26日13时进至龙滚市，将国民党军第252师残部、教导师等部击溃，俘2000余人。第118师主力同时由海口出发，27日在万宁、和乐、乌场港地区击溃国民党军第32军等部2个师，俘3000余人。第119师自云龙市出发，25日在嘉积击溃国民党军第62军第151师，俘800余人，28日进至陵水。第128师自琼山发出，28日进至陵水，截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29日急行军90公里，途中连打4仗，30日与第119师及琼崖纵队第5总队一起，在榆林、三亚歼灭未及逃跑的国民党军。

西路追击部队为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加强营，该部水陆并进，配合中路追击部队向北黎追击。由于风大浪高、船速慢等原因，当部队赶到北黎港时，该港已为第43军部队解放。

中路追击部队由第43军第129师及第127师第380团组成。该部从天尾港登陆后，25日从美亭出发，经澄迈、那大（今儋

县)向琼西直追,30日至5月1日在小岭、八所、十所、北黎一带全歼国民党军第4军第286师等部。至此,海南岛战役遂告结束。

在解放海南岛的过程中,琼崖人民为解放军筹集粮草,全力支援,军行所至,夹道送茶送水,情景热烈。

海南岛战役从1950年3月5日第1批加强营偷渡开始,到5月1日攻占北黎、八所止,历时57天。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3.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418门,各种枪1.7209万枝,飞机4架,坦克、装甲车7辆,击落飞机2架,击伤军舰5艘、击沉1艘。解放军伤亡、失散4614人。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收容溃散之国民党军1.8万人。

海南岛的解放,拔除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南海的主要基地,对于捍卫祖国领土及海疆,巩固国防,保障祖国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为解放军此后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部分经验。对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战略含义,国民党方面的战史这样写道:“海南岛如在国军掌握中,对华南地区匪军,构成莫大威胁”,而解放军攻占海岛后,“除彻底解除华南威胁外,间接影响粤江口之作战。使粤南群岛之攻略更为容易。”^①

海南岛战役,是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配合部分机帆船为渡海工具,突破国民党陆、海、空军立体防御的一次成功的岛屿进攻作战。其主要经验有以下几下条:

第一,吸取金门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全面加强了战前准备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中央军委对金门作战失利的教训极为重视,认为渡海登陆作战是解放军所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它比陆地作战要复杂得多,要求第四野战军及渡海作战兵团吸取金门作战失利的教训,认真准备,加强指挥,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渡海作战兵团据此进行了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真正做到了“万事俱备,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60页。

只待东风”。在作战指挥方面，邓华率兵团前指赴雷州半岛，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作战，2个加强营及2个加强团的偷渡，都有上一级干部负责具体指挥并一同前进。此外，兵团前指要求渡海部队树立有进无退、独立攻进不靠后援的思想，要求岛上部队做好配合接应。战前准备及作战组织指挥的加强，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第二，正确分析判断形势，充分利用琼崖纵队配合接应这一有利条件，制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大规模强行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国民党军虽有10万余之众，并有海、空配合作战，但由于岛上有琼崖纵队，从而使其处于了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广州会议在正确分析判断形势的基础上，确定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大规模强行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可谓因势而定、克敌制胜的良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的结果，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迅速剿灭琼崖纵队以转兵他用的企图，增强了岛上的接应力量，而且使解放军取得了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了解了国民党军的防御能力，进而改变了渡海工具以机帆船为主和1950年6月才发起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原议，而决定渡海工具以木帆船为主并利用天时提前发起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从而加速了胜利的早日到来。对海南岛之战，国民党军的战史这样写道：“海南岛作战，事先未肃清冯匪白驹部为致败主因”。“冯匪白驹部，盘踞海南岛中央五指山区，造成国军基地不稳固，且反登陆作战纵深受限之不利态势。”“利用冯匪白驹部为内应，乃匪登陆得逞主要原因之一”^①。

七、解放万山群岛

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香港与澳门之间的海面上，由垃圾尾（今桂山）、外伶仃、东澳、三门、大小万山和担杆、佳蓬列岛等48个岛屿组成，控制着香港、澳门的主要航线和珠江的入海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防要地。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459、第464页。

1949年底，由华南大陆溃败的国民党军残部，除大部撤至海南岛外，一部逃往万山群岛等广东沿海岛屿。为把这些岛屿建成反攻大陆的基地，国民党海军总部奉命在垃圾尾岛成立了“粤南群岛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珠江口外和韩江口外各岛屿的作战。其作战方针和部署是：第一，以海军陆战队第4团第1营及护渔纵队之一部，以垃圾尾岛为基地，建立群岛之指挥联络中心。第二，在“粤南群岛指挥部”之下，成立“南山卫巡防处”，基地亦设在垃圾尾岛，负责封锁珠江口、确保台湾至海南岛之海上交通安全。第三，依靠海军优势及游击部队之协力，主动寻求对准备渡海之解放军海军、船队、岸炮进行攻击，突击广东沿海地区，破坏其渡海准备及军事设施，达成固守万山群岛、封锁珠江口之目的^①。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垃圾尾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原驻守海南岛的海军第3舰队调往万山群岛加强防御，并以该舰队代司令齐鸿章任“粤南群岛指挥部”指挥官。这样，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兵力计有：海军第3舰队、南山卫巡防处、海军陆战队第4团第1营，青年军第208师第1营，广东突击军，护渔纵队及由海南岛撤退上岛的4个连等共3000余人，拥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30余艘，总吨位约1万吨。其海军大部分舰艇和陆战队主力驻守垃圾尾岛，一部驻守担杆列岛等岛屿；广东突击军1200余人，分驻担杆列岛、外伶仃、大小万山和东澳岛。

为打破国民党军“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的企图，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决定，由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军区江防司令员洪学智，统一指挥第44军第131师第392、第393团，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珠江军分区炮团，第139师炮兵营，中南军区炮兵100毫米加农炮连，第50军无后坐力炮连，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戡乱》第6册，第449页。

第130师步炮连共1万余人，配属29艘舰船，组成渡海部队，解放万山群岛。根据岛上国民党军大部分是刚从海南岛退下来的，立足未稳，其海军与陆军难以形成统一指挥，陆军中正规军与游杂部队之间各成体系，如早打快打胜算把握较大，若待国民党军立稳脚跟再打，则困难增加的情况，经反复研究，洪学智定下“力求早打快打”的决心。

解放万山群岛战役，是陆、海军协同作战，这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了实施统一指挥，在中山县唐家湾（今属珠海市管辖）成立了陆海联合指挥所，由第131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参谋长张怀礼、政治部主任李长如和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副政治委员黄若萍、参谋长李怀章、政治部主任李楚白组成。联合指挥所分析情况后认为，万山群岛各岛之间距离较近，守岛的国民党军能构成火力联系，如越岛攻击，不仅易受各岛国民党军交叉火力的牵制，且易受其军舰的攻击。为此，确定了稳步前进、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突然奔袭的作战方针。

参战的江防部队装备十分简陋，像样的舰艇只有2艘登陆舰，1艘是“桂山”号，为美国制造，排水量358吨，有40毫米火炮2门，算是江防部队的“旗舰”，1艘是“国楚”号，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制造，其余均为型号不一的小炮艇和小登陆艇。有些炮艇连航海仪器、海图和通信工具都没有，只好用指北针、普通地图和陆军用的报话机代替。尽管如此，参战人员的战斗情绪空前高涨，他们的口号是：“拿下万山群岛，占领南大门，解放整个华南！”

（一）垃圾尾海战

5月25日，万山群岛战役正式打响。当日凌晨2时，广东军区江防部队舰艇16艘和征用的8只民船，载运第131师第392、第393团各1个营、1个山炮连和配属的10余门火炮，组成火力船队和登陆输送船队，由唐家港起渡向万山群岛进发，准备以突袭手段首先攻歼垃圾尾岛守军，同时占领垃圾尾岛外围青洲、三

角山、大头洲、牛头洲、中心洲等各岛。航行中，火力船队与输送船队及火力船之间相继失去联系。5 时许，江防部队炮艇队副队长兼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指挥的“解放”号炮艇，率先冲进垃圾尾岛马湾港，同国民党军 20 多艘舰艇展开激战。“解放”号集中火力向国民党海军第 3 舰队旗舰“太和”号攻击，使该舰中弹起火，舰队代司令齐鸿章手臂被击伤。国民党军舰艇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向港外逃窜。恰值此时，解放军“桂山”号及时赶到，用猛烈炮火进行堵截。经 1 个多小时激战，国民党军“中海”号登陆舰和“永”字号扫雷舰等相继中弹起火，1 艘炮舰被击沉，其他舰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拂晓后，国民党军发现解放军只有 2 艘舰艇，遂组织各舰进行反扑。“解放”号弹痕累累，林文虎中弹牺牲。在全舰 19 名艇员伤亡 13 人的严重情况下，“解放”号冲出火网，安全返航。“桂山”号在激战中弹起火，损伤严重，有沉没的危险，第 392 团副团长兼火力船队队长郭庆隆决定抢滩登陆。“桂山”号拖着滚滚浓烟，在垃圾尾岛钓庭湾抢滩登陆成功。50 多名战士在郭庆隆的指挥下，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战，大部壮烈牺牲。

在“解放”号、“桂山”号与国民党海军第 3 舰队主力激战的同时，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先锋”号、“奋斗”号炮艇，在垃圾尾岛东侧海面分别与国民党军第 25、第 26 号艇遭遇。“先锋”号、“奋斗”号均以近战将其击沉。随后，两艇驰援登陆输送船队，掩护步兵在青洲、三角山岛登陆。国民党海军第 3 舰队遭到沉重打击后，即向外伶仃、三门、担杆岛撤退。第 392 团于 26 日至 28 日相继占领牛头洲、中心洲、垃圾尾、大小蚬洲等岛屿，第 393 团于 27 日占领大头洲。

（二）夺取大小万山

垃圾尾海战后，国民党军为挽回败局，不时派出舰艇炮击解放军已占岛屿，袭击解放军运输船队，企图逼退解放军渡海部队。5 月 30 日，国民党军 4 艘舰艇炮击三角山岛。守岛的第 393 团沉

着应战，待其靠近时，数十门火炮突然猛烈射击，当即击伤3艘，迫其仓皇撤退。第393团乘势于次日凌晨2时进占东澳岛，6月5日至6日攻占大小万山、白沥、贵洲、横洲、竹洲6岛，歼灭守军一部。从此，国民党海军舰艇被限制在外伶仃、三门和担杆岛一带活动，解放军渡海部队掌握了逐岛攻击的主动权。

（三）三门岛伏击战

大小万山岛解放后，国民党军从第1舰队抽调驱逐舰“信阳”号及炮舰“营口”号和“泰安”号增援万山群岛，协助第3舰队作战，并派出舰艇10余艘游弋于外伶仃、三门岛海域，企图诱使解放军渡海部队与其决战。为就近查明外伶仃和三门岛的情况，第392团奉命于6月10日夜袭占隘洲岛。经多方侦察，终于查明三门岛并没有国民党守军，白天到三门岛巡逻的国民党军舰艇，晚上都要返回外伶仃或担杆岛。据此，联合指挥所决定，夜间占领三门岛，然后设伏打击国民党军舰艇，继而攻占外伶仃岛。

6月26日晚11时，“国楚”号、309号登陆艇、“福林”号和“琼林”号（从地方买来的已作商船使用的旧式登陆舰）、1艘趸船（架设100毫米的加农炮），载运第392团2个加强连及炮兵一部，由隘洲启航，次日凌晨1时占领三门岛。27日5时50分，国民党军“永”字号扫雷舰由外伶仃向三门岛行驶。解放军守岛部队立即开炮，将其击伤。同时，趸船上的100毫米加农炮也向外伶仃停泊的国民党军舰艇轰击，击沉炮艇1艘，击伤2艘。国民党军“信阳”号、“营口”号、“太”字号和“永”字号等舰纷纷由外伶仃向南驶出，企图寻机报复。解放军渡海部队岛上和舰上的火炮一齐开火，双方激战达5个多小时。最后，解放军以“国楚”号中弹1发、伤3人的代价，取得了击沉国民党军炮舰1艘，击伤“信阳”号、“永”字号扫雷舰2艘和炮艇2艘的重大胜利。7月1日，第392团一部攻占外伶仃岛。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等部退守担杆岛，不久又丢下游杂部队撤回台湾。8月3日，第392团一部攻占担杆岛，歼灭“广东突击军”一部，4日占领直湾、佳蓬各岛。

至此，万山群岛宣告解放。

万山群岛战役，自1950年5月25日开始，至8月4日止，历时72天，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击沉国民党军舰艇4艘，击伤12艘，缴获艇船11艘。万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封锁，对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均有重要意义。在此次战役中，解放军伤亡300余人。为缅怀渡海作战英雄的光辉业绩，战后中南军区海军在江防部队所在地黄埔岛上建立了林文虎烈士纪念碑。广东人民政府为纪念“桂山”号的英雄们，将垃圾尾岛改名为“桂山岛”。

在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的同时及其以后，第41军等部于1950年1月9日解放海山岛，2月23日解放南澳岛，8月9日解放南澎岛。

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在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配合和华南各游击纵队的策应下，在1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安新、宜沙、湘赣、赣西南、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万山群岛等战役战斗，歼灭了白崇禧、余汉谋等部共43万余人，解放了豫、鄂、湘、赣、粤、桂6省，使中南大陆和两广沿海岛屿，除了香港，澳门，西沙、东沙、中沙、南沙群岛外均获解放。其作战指挥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充分做好进军中南的各项准备。进军中南，第四野战军在部队思想、自然气候、作战地形、作战对手和群众条件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要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进军中南的任务，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尤为重要。为此，平津战役后第四野战军集中2个月时间对部队进行政治整训，使广大指战员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克服了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和组织纪律观念，同时做好南下作战的各种后勤保障工作。部队到达长江边后，根据南方多山及稻田水网的地理特点，初步精简了武器装备，开展了各种适应性军事训练。宜沙、湘赣战役后，

部队又进行了为期40天的休整，开展兵强马壮运动，彻底精简武器装备，针对南方地形和白崇禧部队的作战特点进行军事训练，搞好后勤保障工作。由于在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从而确保了进军中南作战的顺利进行。

第二，实行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战略追击阶段，国民党军采取了牺牲空间，支持时间，以达战略持久的战法，特别是中南地区的白崇禧部，本钱小，极机灵，力避与解放军主力决战。针对国民党军这一新的作战特点，毛泽东提出实行远距离跨省区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这一作战方针是不为白崇禧的临时布阵所迷惑，而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并迫使白崇禧部向预定地区撤退而加以围歼。第四野战军前委坚决执行这一作战方针，以东、中、西三路大军对白崇禧部实行大迂回大包围，迫使其向预定的广西地区撤退；在三路大军作战略上配合的同时，又把大迂回大包围与战役的迂回包围相结合，对当面的国民党军不失时机地分别加以围歼，使其不能作有组织的撤退，并使其逐步受到削弱。由于第四野战军正确实行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使白崇禧部最后被压缩于广西一隅而归于消灭，从而为友邻部队进军创造了条件。

第三，运用了三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是解放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三种主要斗争方式，它深刻体现着战略追击阶段的形势和斗争特点，要求解放军指挥员善于把握形势，因势利导，充分发挥解放军的强大声威和政治优势，迅速消灭和瓦解国民党军，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第四野战军前委正确运用这三种斗争方式，对继续顽抗的白崇禧等部实行“天津方式”，坚决予以消灭；对程潜、陈明仁等部则促其起义；对其他地方武装则晓以大义，或促其起义，或将其改编，从而使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或被消灭或起义投诚，进而迅速解放了中南大陆。

第四，认真抓好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渡海作战，是解放军

在战略追击阶段面临的一个新任务新课题。在没有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条件下，利用木帆船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作为战役指挥员必须慎重从事。在此条件下，要取得渡海作战的胜利，除了正确制定渡海作战的方针，在掌握渡海登陆作战规律基础上实施灵活指挥以外，关键是抓好渡海作战的准备。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兵团遵循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的原则，把渡海作战准备工作做细做好。这里包括征集船只、雇请船工、培养水手、海上练兵、调查敌情以及掌握气象和潮汐规律等等。在此基础上，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兵团一举解放了海南岛，创造了以木帆船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突破国民党陆、海、空军“立体防御”的成功战例，接着又解放了万山群岛。实践证明，只有认真抓好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才能真正做到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才能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第七章 进军西南，解放 云贵川康藏诸省

第一节 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和 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任务与方针

一、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企图与部署

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① 4省及西藏，面积23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4.3%，有汉、彝、苗、藏、白等30多个民族，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国境线长约6750公里。该区地形西高东低，按地形特点可大致分为西藏高原、川康滇峡谷区、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四部分。其中，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大多为崇山峻岭，地形险阻，交通除滇越铁路（昆明至河口）、黔桂铁路（都匀至柳州）及少数公路外，主要靠山间小路通行。因此，川北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贵州亦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该区虽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但除四川盆地等地外，大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很不发达。

该地区由于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各不相同，社会情况复杂，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极力策动“西藏独立”，煽动西藏地方势力多次向西康等地发动进攻，形成

^① 旧省名。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14年设川边特别区，1928年改为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撤销，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金沙江以西之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了连绵十数年的川藏战争，在汉族与藏族之间造成了一定的民族隔阂。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长期经营的一个地区。随着解放军迅速向全国推进，至1949年10月，华北全境、华东大陆及西北、中南地区大部均告解放，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广州迁往重庆。盘踞川康黔一带的国民党军，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从1949年9月24日起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第5、第7、第18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部第14、第15、第16、第19、第20、第22兵团等部，总计34个军85个师约50万人^①。盘踞云南的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部第8兵团等部4个军。以上部队中，除胡宗南部有些战斗力外，其余大多为被歼后重建或新近编成，战斗力较弱。蒋介石企图依靠这些残余力量在西南地区作最后顽抗。

根据国民党军仍据有西南诸省及两广和西北地区一部的形势，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制定了“以持久作战，确保华南、西南大陆及台湾、琼岛，争取时机维持现有战力，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主力机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匪之野战军，准备反攻”^②的战略方针，要求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应以持久作战，确保西南为目的，以四川为核心，争时待机，维持现有战力，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攻为守坚持地区，并将有力兵团机动控制扼要地区，对分头来犯之匪，适时集中局部优势兵力，而各个歼灭之。”^③1949年10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有张群、胡宗南、宋希濂、钱大钧、邓锡侯、杨森、刘文辉、郭汝瑰、罗广文、沈策等人参加的作战会议。蒋介石给部下打气说：“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152页。

^② 1949年11月16日，第四野战军后方司令部关于社会部谍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计划”致林彪、谭政、萧克并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

^③ 1949年11月16日，第四野战军后方司令部关于社会部谍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计划”致林彪、谭政、萧克并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

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①接着，与会人员就解放军从何处进攻及如何配备兵力等问题进行讨论。经过讨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判断：解放军“对西南可能四面进攻（由川鄂路、川湘路、黔路、川北、川东北），以一部绕道玉树进入西康，堵塞西南之侧后门，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由〕湘黔路直趋昆明，切断川桂联系，以囊括西南”^②。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遂决定：以“保卫戡乱基地四川，争取时机，等待国际变化为目的，争取长期持久、机动防御为战略，北面自大巴山、米仓山亘摩天岭之线，利用地形阻歼匪军于境外，进行持久抵抗，并积极向敌后发展游击，东面配合华中友军攻击，力争会歼匪军于湘西地区，不使进入贵宁〔州〕四川一步”^③。为确保西南，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采取了6条措施：“（一）自力更生，粮服军饷自筹，不依靠中央维持，继续作战；（二）积极建立新军；（三）划四川为若干警备区，如二县或三县成立联防指挥部，积极组训民众，动员人力物力肃清土匪，维持后方治安；（四）自川鄂边界起，经武陆、七苟山、大巴山、米仓山、摩天岭之线，实行大规模纵深破坏道路（其长度约当五日行程），控制水源，空室清野，使敌不能通过（长官公署派人监督进行中）；（五）以康滇为后方，不得已时向该两省撤退；（六）限自九月十五日起三个月内肃清云南土共。”^④

根据以上决定，国民党军部署如下：川陕甘绥署胡宗南部第5兵团李文部、第18兵团李振部所辖的第27、第36、第38、第1、第65、第90、第3、第98军，沿秦岭主脉之成县、徽县、留坝、佛坪、镇安构成第一道防线，以新组建的裴昌会第7兵团等部之第17、第30、第69、第76、第57军，沿川陕边之白龙江、

①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365～第366页。

② 1949年11月16日，第四野战军后方司令部关于社会部谍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计划”致林彪、谭政、萧克并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

③ 1949年11月16日，第四野战军后方司令部关于社会部谍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计划”致林彪、谭政、萧克并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

④ 1949年11月16日，第四野战军后方司令部关于社会部谍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计划”致林彪、谭政、萧克并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

米仓山、大巴山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罗广文第 15 兵团所属之第 108、第 110 军，位于川北剑阁地区，准备随时增援川北方向；以郭汝瑰第 22 兵团之第 72、第 44 军于川南宜宾、泸州及綦江、南川一带，保持机动；以川鄂边区绥署孙震部所属孙元良第 16 兵团之第 41、第 47 军及湖北绥靖总部之暂 8、暂 9 军，守护长江以北大巴山巫山一线；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所辖钟彬第 14、陈克非第 20 兵团之第 79、第 122、第 124、第 2、第 15、第 118 军守护川东长江以南地区；以贵州绥靖公署谷正伦部所辖何绍周第 19 兵团之第 49 军，在玉屏至镇远间占领阵地，以保安第 6、第 7、第 9 团编成第 4 旅，守备天柱至榕江的 103 公里正面，并准备沿镇远南北、贵筑（今花溪）至贵阳南北及关索岭、打帮河之线，逐次抵抗；第 19 兵团之第 89 军则于黔西南盘县、晴隆附近地区整训；以位于重庆的空军第 5 军区（辖 B—25 飞机 2 架，F—47 飞机 6 架，AT—6 飞机 2 架），负责支援西南地区作战；以海军江防舰队之武穴、常德、永安、永平、英山、英德等 6 舰，在巴东、巫山、云阳、万县等地，协助陆军扼守川东门户，防止解放军溯江入川^①。此外，以第 20、第 21 军在重庆附近，以第 95 军在成都附近，以第 24 军在雅安附近担任守备，以云南省绥靖公署卢汉部所属第 8、第 26、第 74、第 93 军对付解放军滇桂黔边游击纵队。

以上部署表明，西南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是川陕甘方向，而在鄂川黔边方面的兵力则比较薄弱，这就为解放军以主力由东面突破，进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并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四川盆地提供了条件。

二、第二野战军的任务与方针

第二野战军进军并经营西南诸省的任务，是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渡江战役之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对付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7 册，第 152～第 153 页。

美国于解放军实施渡江作战时可能进行的军事干涉，确定第二野战军“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①。1949年5月23日，渡江战役接近尾声，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相对减小之时，中央军委决定，第二野战军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待上海、宁波、福州、青岛等沿海城市解放，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基本消除后，即准备“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②，届时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南南下川北配合。鉴于白崇禧集团有西逃云南的可能，中央军委于7月16日进一步规定：“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③。10月13日，中央军委又指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④关于进军及经营西藏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于11月下旬“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⑤，1950年1月上旬又“确定由西南局担负”^⑥。至此，第二野战军进军并经营川滇黔康藏5省区的任务最后确定。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从1949年7月开始中共中央即考虑西南局的组成问题。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进一步讨论进军西南问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还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

① 邓小平1949年3月14日致刘伯承、李达的电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第592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6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4页。

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8页。

在規定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及确定组织领导问题的同时，中央军委还确定了进军时间、作战方针和部署。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①6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主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之湖北境内，准备渡江南下。为协调各野战军的行动，中央军委于6月17日致电华东局等：“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较为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②据此，中央军委要求贺龙部“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③针对国民党军力避与解放军主力决战的作战特点，9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④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指出，第18兵团“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第4兵团“大约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⑤10月19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2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15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5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70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页。

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到达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①

由上可见，中央军委上述部署的主要着眼点是将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四川，并使作战与此后的生产建设相结合。为此，要求贺龙部先将胡宗南主力抑留于川陕甘地区，给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由陕入川的错觉，第二野战军主力则以远距离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南，截断其南撤云南之路，然后贺龙部南下，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进，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这一部署则抓住了国民党军部署的弱点并击中其要害。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等于8月3日就进军西南作出规划，8月19日发出《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②。为此，第5兵团之第16、第17、第18军并附特纵炮兵第4团及1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前到达武冈、邵阳、湘潭之线，争取以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以前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1个军留于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主力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0页。

^②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

协同第3兵团作战；第3兵团之第10、第11、第12军并附特纵炮兵第9团及1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前到达常德、江陵之线，争取以10天到半个月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以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留1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牵制涪陵、万县等地之国民党军，主力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泸州至江津地区，协同第5兵团作战；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段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璧山之线，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上述作战部署，已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三、进军西南的准备

进军西南是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其有利条件：全国解放战争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猛发展，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战斗力不强，在西南地区难以形成有效防御；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发展到3万余人，并解放了黔西南、滇西、滇北、滇东南等部分地区，成为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有力助手；云南、四川地下党为迎接解放军进军西南，大力开展工作，西南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罢工、罢课、抗捐、抗税等斗争风起云涌。其不利条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部队由华东向西南进军，近者2000余公里，远者4000余公里，道路崎岖，通行困难，一切补给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后方，就地补给又有一定困难；在进军的过程中，有些地区不仅丛山密林，人烟稀少，而且民族众多，语言不通，给进军带来了一定困难；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广大指战员为第二野战军有了最后落脚点而欢欣鼓舞，但在某些干部中，也开始滋生停滞不前、贪图享乐、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等情绪，这又直接障碍着进军的顺利进行。为保证进军西南任务的完成，第二野战军前委于1949年7月中旬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除研究了少数民族工作等问题外，着重研究了进军作战的具体部署，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加强部队后勤保障等问题。前委决定，在思想教育方面，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加强党的各项政策的教育，各部队以团或以师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

议，切实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在物质保障方面，下大力组织并加强进军的后勤工作，加强新区借粮政策的教育，并开展人强马壮运动。此外，第二野战军前委还要求有关部门，下大力做好争取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部的起义工作。

根据前委的指示，各部队在做好应付美国军事干涉准备的同时，着重进行了二中全会决议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此外，还进行了新区农村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城市政策的教育，反复说明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介绍进军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组织群众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各部队以团或以师（有的以军）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和纠正某些干部的居功自傲、缺乏整体观念，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特别是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普遍提高，从而增强了部队进军西南并建设西南的信心和决心，为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打下了巩固的思想基础。在进行上述动员和思想教育的同时，部队还进行了山地、河川、稻田作战等战术训练，并以团或师为单位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军旗典礼。

在中央军委统一筹划和各大战略区的大力支援下，部队的人员得到补充，炮兵、工兵，特别是后勤领导机构及其运输部队、兵站、卫生等部门大为加强，经费、鞋子、棉衣及其他军用物资及时下发部队。此外，还抽调了县委委员以上干部 800 人，区村干部 4000 余人，在南京、上海等地招收学生、青年职工近万人，随军西进，开辟西南地方工作。

在第二野战军主力进行进军西南准备的同时，第三野战军相继解放了上海、宁波、青岛、福州等沿海城市，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小，并且第三野战军保卫东南沿海的部署已调整就绪。据此，第二野战军主力于 9 月初奉命向西开进。第 3 兵团和野战军领率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等地车运，经徐州、郑州在孝感、武汉等地下车，向常德、江陵之线开进。第 5 兵团则

由上饶经湘潭向邵阳开进。为了迷惑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保证对其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在第二野战军主力向西开进的同时，第18兵团等部于9月底向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动局部攻势，活动在陕南和鄂西北地区之第19军等部，积极佯动，吸引国民党军。同时，野战军领导机关率第3兵团途经郑州时，刘伯承司令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要经陕甘向四川进军。部队通过华中地区时，正值第四野战军主力及陈赓兵团发动衡宝和广东战役，使白崇禧误认为第二野战军主力也要加入中南战场作战，从而造成了国民党军的错觉，为第二野战军主力突然向西从贵州迂回四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第二野战军主力向湘鄂西集结时，贺龙所率的第18兵团之第60、第61、第62军及第一野战军第7军在秦岭战役后，于9月20日起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整训，做好南进的各项准备。在军事教育方面，结合山地作战的特点，进行射击及单兵至连动作的战术技术训练，调整部队编制，裁减不必要的武器装备，使部队轻装灵活。在后勤保障方面，根据大兵团在严冬季节进行山地作战补给困难的特点，准备了帐篷，手套、棉袜，要求每人自带3天干粮，并进行了防寒防冻教育。从11月16日开始，部队进行南下入川作战政治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怕吃苦、怕困难等不良思想，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坚决完成作战任务。经过教育和充分准备，部队情绪高涨，纷纷上书请战，表示坚决打好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仗。

第二节 解放军进军川鄂黔， 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

一、解放军向川鄂黔进军的部署

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加紧在川

鄂黔边组织防御部署。孙震的川鄂边区绥署设于万县，其直属的第 235 师位于巫溪以北；第 16 兵团之第 41 军（辖第 122、第 124、第 301 师）位于官渡口、巫山、奉节地区，第 47 军（辖第 125、第 127、第 302 师）位于镇坪以西地区；湖北绥靖总部的暂 8、暂 9 军（各约 3 个团）位于开江地区；宋希濂的川湘鄂边区绥署设于恩施，其第 14 兵团之第 79 军（辖第 199、第 194、第 98 师）位于五峰地区，第 124 军（辖第 60、第 223 师）位于巴东、野三关地区，第 122 军（辖第 217、第 345 师）3000 余人位于恩施以北石乳关地区；第 20 兵团之第 2 军（辖第 9、第 76、第 164 师）位于宣恩地区，第 15 军（辖第 64、第 169、第 243 师）位于来凤以北地区，第 118 军（辖第 54、第 298 师）位于黔江、酉阳地区，组成“川湘鄂边区防线”。另以第 19 兵团第 49 军（辖第 327、第 249 师）位于镇远及其东北地区，组成黔东防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辖的第 127 军（辖第 309、第 310、第 311 师）位于万县以北的开县，以加强川鄂绥署的防御力量。国民党军企图通过以上部署，沿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至湘黔边境构成一道防线，阻止解放军入川。

1949 年 10 月底，第二野战军第 3、第 5 兵团先后进至湘西地区集结，准备按照预定计划于 11 月初开始向川南实施大迂回。此时，第四野战军为解放鄂西南地区，并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准备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发动对宋希濂集团的作战。

10 月 22 日，第四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第 50 军，湖北军区独立第 1、第 2 师，第 42、第 47 军各 2 个师共 9 个师的兵力，由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干组成的鄂西指挥所统一指挥，于月底发起求歼宋希濂集团的作战。其具体部署是，第 47 军第 139、第 141 师由大庸、桑植一线出发，经来凤迂回恩施，占领利川，截断宋部西退归路，如其未撤，第二步即由西向东进攻；与此同时，独立第 1、第 2 师及第 42 军第 155 师（第 124 师 10 月 29 日才车运孝感，一时难以赶到），由湖北军区参谋长张才

千率领，由秭归渡江向建始、恩施前进；第50军第148、第149、150师由宜昌、秭归间渡江，由东向西经资丘一带向恩施攻击前进。

根据上述情况，第二野战军决定对第四野战军发动的鄂西战役予以配合，立即发起进军西南作战，并于10月29日发出《进军川黔作战的补充命令》：“三兵团应以现在最先头之一个军，全部轻装，沿四十七军主力之右侧，以快速行动，直出彭水、黔江（要点），截击可能逃跑之宋匪，并协助四十七军歼击右侧顽抗之匪军。三兵团主力则依此调整部署，速准原计划，分别出遵义及尾先头军跟进。”第5兵团及第3兵团第10军，“准原计划速出贵州”。

这样，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黔作战与第四野战军发动鄂西战役在作战部署上完全协调并吻合起来。在北面，第50军、湖北军区2个独立师及第42军第155师，构成求歼宋希濂主力的右集团，第47军主力与第3兵团主力第11、第12军，构成求歼宋希濂主力的左集团，两集团以钳形合击，准备歼灭宋希濂主力于黔江、彭水以东地区；在南面，第5兵团及第10军，则乘机直出贵阳、遵义。

10月28日，第四野战军发动鄂西战役。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攻击。

二、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防线，解放鄂西、川东

从10月28日开始，右集团分三路由宜昌、秭归、香秭等地渡江向鄂西南进击，11月3日击破国民党军第124军等部的防线，攻占巴东、绿葱坡、野三关，左集团第47军主力于10月30日从永顺、大庸出发，11月1日进至龙山以南招头寨一带。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从11月1日起，分别由石门、慈利及芷江、黔阳地区西进。

解放军进攻开始后，宋希濂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向永顺方向发

动攻势。为此，他将第122军调至四川忠县地区整补；以第124军阻击解放军右集团；调第118军至龙山、来凤，令第2军由咸丰南下，以第15军进至来凤以北的沙道沟，令第79军西移鹤峰，准备集中4个军于6日起由北向南对第47军发动攻击。与此同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将罗广文第15兵团由川北车运綦江，并将位于该地的第44军归其指挥，准备增援宋希濂集团。

针对宋希濂准备对第47军发动进攻的企图，林彪、谭政、萧克命令第47军在招头寨、洗车一带停止待机，并于5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谢富治等：“无论敌是否按其规定计划进攻永顺，我三兵团盼能抽出两三个师的兵力，迅速进占酉阳向黔江前进，如敌不攻永顺地区，〔则〕由酉阳直出彭水及其东北，断敌退路。”“为统一作战指挥，我四七军两个师应归刘邓陈谢统一指挥与部署”，“在电台未沟通前，由此间负责转报。”第二野战军则以第12军经湘西永绥（今花垣）出秀山、酉阳，然后直出彭水，以第11军向大庸、桑植地区急进，配合第47军作战。双方约定，从10日开始对龙山、来凤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根据统一部署，解放军右集团之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于5日攻占建始，独立第2师于7日占领恩施，左集团第12军先头第36师亦于7日抢占秀山，对宋希濂集团形成南北钳击之势。

宋希濂见其主力将陷入解放军的包围，遂于7日开始令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依托乌江重新组织抵抗。8日晨，来凤、龙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开始西撤，第四野战军遂命令第47军发起追击，并指示右集团每天以百里以上速度南进，同时将情况通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遂于8日19时作出部署：第12军占领酉阳后，速沿乌江两岸进取彭水；第47军应立即经两河口及黔江以南向黔江以西截击；第11军尾第47军跟进；各追击部队均应轻装，排除万难，兼程前进，只要能抓住敌人，即是胜利。林彪、谭政、萧克于10日电告第四野战军参战各部队及第3兵团：此次追击须准备直追至丰都、涪陵一带，在长江与乌江边歼灭全

部敌人。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林、谭、萧：“如王宏坤所部已到恩施，我们意见应令其以一部直向西出，以截断可能经利川北逃敌人之退路。”次日，林、谭、萧复电刘、邓：“我们已令王宏坤令一五五、一五〇两师经恩施、利川向石柱及丰都、涪陵以东地区前进，截击西撤敌人。”

在解放军两翼迂回、截击和尾击之下，宋希濂集团陷入混乱。10日，解放军右集团占领宣恩，并乘胜南下，在咸丰附近地区截住了国民党军第79军第98、第199师，第15军第169师及第124军第60师。12日，陈锡联、谢富治致电林、谭、萧，为不使国民党军这4个师逃跑并借以避免部队拥挤，建议湖北军区2个独立师“就地下网，截歼沙道沟西逃之敌”。林、谭、萧遂命令第50军2个师及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就地歼灭被抑留于川鄂公路以东的国民党军。13日，解放军第50军第148、第149师，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及第11军第33师主力，将国民党军4个师包围于宣恩西之沙道河、高罗、麻阳地区。14日，解放军发起攻击。经6天激战，全歼国民党军，俘第79军副军长萧炳寅。与此同时，第11军先头第31师，于11日在咸丰击溃国民党军第118军第54师，俘1000余人，12日在黔江、彭水间又俘国民党军第2、第15、第118军共3000余人。16日克彭水，接着渡乌江向南川前进。第12军于15日攻占乌江东岸的龚滩，接着渡乌江西进，与国民党军第2军第9师及第15军第243师在马头山遭遇。该军遂调集主力攻击，国民党军则乘隙于20日晨逃跑。第47军于15日由郁山镇向涪陵前进，于18日攻克“二峰关”，20日渡乌江西进。第50军第150师于14日占领利川，接着向川东追击，16日在鱼泉口歼灭国民党军第79军军部及第194师一部。第42军第155师经利川向西南追击，18日克石柱，接着进逼丰都，第124师于11月16日全部进入江北秭归地区，准备向国民党军第127军展开攻击。

三、突破国民党军黔东防线，占领贵阳、遵义

在第3兵团主力、第47军等部歼宋希濂主力的同时，第二野

战军第5兵团及第10军向贵州疾进。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再加上国民党军在撤退时大肆破坏道路桥梁，坚壁清野，使解放军的行动及供应遇到很大困难。然而，各追击部队在“与敌争速度抢时间”的口号下，忍饥挨饿，奋勇前进。第16军于11月4日攻占天柱，6日在长吉、凤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49军第327师一部，并于当日攻克三穗，8日解放施秉、黄平，次日进占重安江，11日攻克炉山城。第17军于11月7日攻占波州、晃县、玉屏，歼灭国民党军第49军第249师一部，8日解放岑巩，次日在施秉以北之王家坪又截歼第249师一部。第10军于11月10日解放湘西凤凰城，接着向西急进。第18军作为第5兵团的第2梯队，于11月3日由邵阳地区西进。第5兵团和第10军经过近10天的作战，彻底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黔东防线。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及第19兵团司令官何绍周见贵阳难保，遂于10日决定弃守贵阳，以其第49军第327师向遵义、息峰撤退，军主力沿鸭池河布防，以第89军在打邦河占领阵地，兵团部撤至毕节。

依据国民党军的部署，第二野战军首长令第5兵团和第10军按原计划由贵阳、遵义迂回川南。据此，第16军于12日由炉山西进，连克贵定、龙里，于15日解放贵阳。第17军分两路于12日至19日连下余庆、开阳、息峰、修文和麻江、都匀、独山，切断了川黔路和黔桂路，此后留于贵阳附近。第10军于13日至15日相继攻占江口、石阡、印江，16日突破乌江夺取思南，19日攻占湄潭，21日解放遵义，22日继占桐梓。第18军则直趋贵阳。

四、进军川南，解放重庆

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和黔东防线后，直逼川南，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整个防御部署。蒋介石见重庆受到威胁，遂急令第16兵团西撤万县至丰都一线防守，以第127军开奉节、巫山，防止解放军沿长江北岸西进；以宋希濂集团向涪陵地区撤退，以第15兵团在綦江、南川地区布防；以第22兵团第72军南开叙永，加

强对贵阳、遵义的正面防守。同时，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并以第1、第3军车运重庆，加强重庆的防御力量。

针对国民党军在重庆周围加紧布防，刘、邓于11月21日致电陈锡联、杨勇等：“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第十等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为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几天为有利”。“等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四七军仍宜继续进到涪陵城，但暂不渡江”。即继续贯彻向川南实施大迂回的战略意图。同时，刘、邓也于22日致电林、谭、萧：“在四七军已渡乌江向南川前进，直接协同二野作战的情况下，我们意见应令五十军之一五〇师及一五五师两师在石柱集〔结〕后改向丰都、涪陵地区集中，待命机动，结合四七军在誓邀之东面作战，以使二野得置重点于西面之迂回。”次日，林、谭、萧复电刘、邓：“依照前电所示，已令一五〇、一五五两师向丰都、涪陵前进。”“我西线所有部队（五十军三个师、四七军两个师、四二军一个师，湖北一个独立师，共七个师）统请你们指挥以便配合。”25日，中央军委致电林、谭、萧并告刘、邓：“如刘邓需要，同意你们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此后，第四野战军之第50军全部、第47军2个师、第42军第124师及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即改由第二野战军指挥。

鉴于胡宗南已开始南撤，27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及贺龙、李井泉：“为协同一致，全歼川康各敌之目的，军委决定贺李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应受刘邓张李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这样，随着战局的发展演变，进军西南的各路解放军则由刘邓统一指挥。

根据部署，第16军于11月21日由贵阳地区出发，向毕节、宜宾方向迂回。第10军于25日起分别由遵义、桐梓出发向泸州前进。第18军于24日到达贵阳后尾第16军跟进。第17军则于11月23日在安顺以西之马官屯，伏歼国民党军第49军第249师1500余人。与此同时，第12、第47、第11军渡过乌江后，向正在撤退的宋希濂集团及第15兵团展开攻击。11月22日，第47军第139师一部在白涛镇渡过乌江，截歼第14兵团一部，俘中将兵团司令官钟彬，第141师于土坝西渡乌江后，截断了宋希濂之第2、第15、第118军的退路。接着，解放军第47、第11、第12军分为东、中、西三路，对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猛烈歼击。25日，第12军一部攻占南川，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退綦江的道路，主力在和顺场、九里漕等地重创第15兵团第108军之第241、第242师。经数天激战，至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解放军俘3万余人，第15兵团被压迫于冷水场、龙潭地区。

鉴于东线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军第15兵团等部西逃已不可能，刘伯承、邓小平遂改变了等第16、第10、第18军迂回到宜宾一带后东线部队再渡江北进的原定计划，决定东线部队于长江南岸歼灭第15兵团后，提早北渡长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并于26日部署如下：第12军速向綦江前进，捕歼第44军，尔后直趋江场，准备渡江，迂回重庆；第11军和第47军协力捕歼正向重庆、木洞逃窜的第15兵团残部，尔后第11军主力出冬洞准备渡江，协同第12军相机解放重庆，第47军即准备由木洞东西及长寿段渡江；第50军向涪陵急进，与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准备在丰都至涪陵段同时渡江。

重庆是西南重镇，抗日战争时是中国的陪都，估计蒋介石可能会调重兵增援，因此，毛泽东于27日致电刘、邓：“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

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①对这一意见，刘邓经过慎重考虑后于当日复电毛泽东：“（一）蒋调第三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下，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了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又可能改变其计划。（二）我十二军及十一军主力，明俭日可能占领綦江及其以北之龙岗场。敌第三军养日始由汉中南开，车运亦难赶到，即使赶到，如没有后续亦无大作为，蒋胡之持久战，似亦不致加调兵力置于此绝地。（三）我西路三个军至迟亥月十号可达泸州、合江江边，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泸州、松山之线，即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永、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沿线。（四）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五）重庆地势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六）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为较妥当。是否有当请核示。”

毛泽东接此电报后，于28日致电刘、邓：“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敌人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这样，经过将帅协谋，解放军确定了提前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的作战计划。

为渡江北进，第12军于27日解放綦江，歼灭第44军一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8页。

第47军于干丰场、木洞场击溃第110军第111师。第15兵团残部约5个团逃向温泉，又遭到第11军的痛击，遂渡江向嘉陵江之线逃跑。解放军进抵长江南岸。

此时，孙震集团已由万县、丰都撤向垫江、大足，第127军在巫山以东也遭到解放军第42军第124师的攻击。蒋介石在重庆的可用之兵只有26日到达的胡宗南部第1军，“国民政府”遂于27日向成都撤退。第1军到达重庆后，以第1师守重庆，以第167师沿长江南岸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以第78师沿长江北岸于江津至重庆布防，作最后抵抗。

29日，第12、第11、第47军按照统一部署，从西起江津东至木洞地带发起渡江作战。国民党军海军江防舰队宣布起义。重庆卫戍司令杨森见重庆不保，于30日下令第1军向璧山撤退。解放军第11、第47军于当日渡过长江，解放重庆。第12军至12月3日解放璧山、荣昌、潼南，切断了成渝公路。担任迂回任务的第5兵团主力和第10军乘势向南川疾进。第16军在叙永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后，于12月5日到达江安、纳溪地区。第10军追歼第72、第44军各1部，至12月7日进至泸县、资中、自贡、荣县地区。第18军向宜宾地区前进。至此，国民党军向黔滇的主要退路已被切断。与此同时，第50军及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渡江北进，解放垫江、大竹、渠县。第42军第124师于12月7日解放万县。国民党军纷纷向西向北撤退。

五、第18兵团尾击胡宗南部

解放军对重庆及南川展开攻击后，位于北线的胡宗南部发觉其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遂于11月19日开始，以第36、第38、第119军作掩护，主力分路向四川及大巴山南麓撤退。至26日，担任掩护任务的第36、第38军亦撤至双石铺、凤县及其以东地区，沿途大肆破坏道路桥梁，埋设地雷，实行空室清野，布置袭扰活动，企图迟滞解放军南进。根据以上情况，贺龙、李井泉等为稳住胡宗南部，提出了如下建议：“我主力一经出动，紧迫敌人，

敌必加速撤退，我军如不前进，敌将有计划的进行撤退，并必加破坏道路桥梁，增加我军前进困难。在秦岭山区已不可能歼击胡匪情况下，我以不迫于压迫敌人及扫清前进道路上之障碍为目的，着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负侦察敌情修路之任务，以作大军前进之准备”^①为宜。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第18兵团在胡部后尾不即不离地缓缓攻进。先头部队于27日至12月2日，解放凤县进至留坝及秦岭主脉上之老君岭、旧佛坪县城。同时，第19军解放旬阳、安康、岚皋、汉阴、紫阳、石泉等县城。12月3日，胡宗南主力进入四川，其掩护部队继续后撤。同日，根据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经渡江占领重庆及胡宗南部撤退的情况，刘、邓致电贺龙、王维舟，指示第18兵团等部加速前进，以形成对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北钳形攻势。据此，贺、李立即部署第60军以第180师为先头沿川陕公路前进，12月3日进占留坝，由于桥梁道路被破坏，部队乃利用多年失修的古栈道前进，6日进占褒城，7日解放汉中，8日进占勉县。第61军以第181师为先头，12月3日由佛坪、华阳、太白山一带出发，翻越秦岭，8日解放洋县，随后进入城固及汉水南岸地区。第62军12月3日由岷县、漳县出动，7日进占西固（今宕昌），歼灭国民党军第119军第247师一部，国民党军第119军副军长蒋云台率该军第244师在武都起义，第62军于10日进占武都，次日占领文县，随后攻占碧口。第7军于5日占领徽县，7日占领成县，随后该军第19师占领略阳。第19军5日解放西乡，8日在汉中与第18兵团会师。至此，陕南、甘南地区全部解放。

解放军进军川鄂黔作战（包括贺李部在陕甘南部地区的作战），从1949年11月初开始，至12月8日止，历时1个多月，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7万余人，解放了鄂西全部及陕南、甘南、贵州大部和四川一部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南

^① 贺龙、李井泉等1949年11月30日致第18兵团各军并报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

北夹击之势，为全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刘邓发布四项忠告， 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一、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四项忠告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军政兼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一些国民党军将领开始为自己的后路考虑，第二野战军在进军西南的过程中，充分把握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开展瓦解敌军工作。

1949年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员按级录用。凡愿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

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四项忠告公布后，在西南国民党军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中国共产党长期耐心争取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率部于12月9日分别在昆明及四川彭县宣布起义。

二、昆明起义

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以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使之成了空头司令。卢对蒋已心怀不满。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2月底卢通过早期共产党员、曾为其部下的宋一痕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致毛泽东、朱德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3月，卢又通过其内弟龙泽汇派人找到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表示愿意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根据卢汉的政治态度，于5月11日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订任何条件，不能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平谈判。与此同时，解放军从东北解放区派遣起义的原滇军军官陆续返回昆明，作卢汉起义的工作。5月6日，卢汉以宋一痕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中央派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北平警备司令、滇籍将领周体仁（傣族）回云南推动卢汉起义。8月底，宋带着中共中央关于“南下大军迫境方可行动”的指示回到昆明。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云南省工委和边纵加强了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边纵于1949年5月和8月，先后两次由边纵副司令朱家璧（曾为卢汉的特务团团团长），与卢的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磨盘寺、路南石林进行会谈，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卢方承诺，其部队不向边纵进攻，并提供军事情报和武器装备的支援。随后，卢汉向边纵输送了一批武器弹药。中共云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也

团结云南地方上层人士，对卢汉开展工作，同时在昆明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桂残余势力入滇、争取云南局部和平的运动。这对争取卢汉，抵制蒋介石部署西南防线的计划，起了积极作用。

8月下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有川、黔、滇、康各省主席及高级军事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电召卢汉赴渝。卢汉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于9月6日到重庆。为拉拢卢汉、拼凑大西南防线，蒋介石允许卢汉将其云南保安部队编为第74、第93军，分别以余建勋、龙泽汇为军长，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所辖第8军、第26军受卢节制。卢汉则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合云南其他部队“清剿”边纵，并由保密局长毛人凤、西南保卫处长徐远举与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9日，卢汉发动“九九整肃”，宣布昆明戒严，解散了省参议会，查封了进步报馆和广播电台，封闭了全部大中学校，逮捕了杨青田等社会进步人士、职工、学生400余人。与此同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萧毅肃到昆明部署国民党军对边纵发动“清剿”。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经中共云南省工委研究，9月中旬边纵副政委郑敦与宋一痕在昆明见面。郑指出：卢汉背弃向我党表示愿意靠拢人民的诺言，进行“整肃”是十分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保证全部被捕人员的安全，到适当时机要全部释放；要有靠拢人民的实际行动，我党在适当时机将派人与卢汉联系。10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边纵，蒋介石为达到完全控制云南的目的还会步步进逼，但蒋卢之间的矛盾不可能消失，到解放军接近云南并在进步分子的影响下，卢汉仍有靠拢人民的可能。因而要继续加强对卢汉的统战工作。

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解放贵阳、重庆，逼近云南，刘伯承、邓小平的四项忠告出现在卢汉的办公桌上。在此形势下，卢汉全部释放了在“九九整肃”中被捕的人员，并通过杨青田找到昆明中共地下党，表示决心起义，要求配合。11月下旬，卢汉令其第

93军集结昆明，第74军由滇西撤至楚雄、禄丰一带，基本完成了准备起义的军事部署。12月2日，卢汉下令昆明戒严，基本控制了整个昆明的形势。5日，卢汉托周体仁去香港找华南分局，8日到达广州，呈交了卢汉致叶剑英转毛泽东、朱德函。7日，蒋介石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赴昆明部署将国防部、陆军总部等首脑机关迁入昆明事宜。情况紧急，卢汉决定立即起义。9日，卢趁张群再次返昆之际，将张群软禁，并借张群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名义，将国民党军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副司令兼西南区指挥官李楚藩、空军第5路军副司令沈延世，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召到卢公馆扣押，迫令他们追随起义。当日晚9时许，卢又命令其部队占领了蒋系控制的据点、机场和交通要道。12时，卢率其第74、第93军，云南宪兵、警察及地方团队4万余人宣布起义。同日，卢汉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①。12月13日，卢汉正式发表起义通电。22日，新华社播发了卢汉起义通电和朱德、周恩来欢迎卢汉起义的复电。

三、彭县起义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是川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他们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行为一直不满，与蒋介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刘、邓、潘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于1949年12月9日毅然举行了反蒋起义。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1990年第3次印刷，第187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王若飞等，就同刘、邓、潘有了接触，周恩来派王少春等于1942年7月到雅安刘文辉部设立了秘密电台。1944年冬，刘、潘二人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1月，周恩来又在南京对刘文辉作了工作。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刘被推为川康分会负责人。是年，张澜、李济深派杜重石带信给刘，要其联络西南各方势力，待机起义。

1949年7月，中共川东地下党在重庆召开会议，根据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军包括刘、邓、潘等地方军的争取工作。8月，王少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作刘文辉的工作。刘终于明确表示愿意起义，并通过王的电台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同月，中共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到南京向邓小平、张际春汇报四川情况。二野情报处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派遣一批敌工人员潜入四川国民党军。黄实（黄隐的侄子）被派到邓锡侯、黄隐处进行策反。9月，又派周超到国民党军第95军工作，并在军直通信营设置电台与二野联系。10月，中共地下党员田一平等又派人做潘文华的工作。10月底，王少春和刘文辉商定了起义的步骤和方法，刘即返成都联络邓、潘共同起义。解放军占领重庆后，蒋介石到成都部署“川西决战”。12月5日，周恩来致电王少春：望告刘文辉，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的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等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四项忠告”。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部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灭。

此时，蒋介石正逼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或以家眷先飞台湾。刘、邓于7日离开成都，8日经龙桥到达彭县龙兴寺。

中共地下党、二野派遣人员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也先后到达龙兴寺，彭县龙兴寺成了起义的指挥中心。刘文辉于7日离开成都时，派人将起义电稿送雅安第24军参谋长杨家桢，并嘱其等待通知，再交王少春发出。10日，潘文华从灌县赶到彭县参加起义领导工作。杨11日才接到刘电，并在原起义电稿上加上潘文华的名字，把发电日期填为9日，交王发出。这样，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国民党军第24、第95军及第235师在彭县通电起义。24日，朱德总司令致电刘、邓、潘，对他们起义慰勉有嘉，指示他们遵守“约法八章”和“四项忠告”，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肃清残敌，建立革命秩序而努力。

在解放军对西南国民党军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形势下，昆明、彭县起义则封闭了四川国民党军向西康、云南逃跑的退路，为解放军全歼西南国民党军主力于成都平原、加速大西南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邓小平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所指出的：“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余万，起义40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第四节 举行成都战役，歼灭川境国民党军

一、国民党军“川西决战”计划与解放军进行成都战役的部署
解放军占领重庆及川南地区后，国民党军纷纷向成都平原及

其附近地区撤退。胡宗南以第7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18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5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16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三台地区，暂8、暂9及第127军撤至渠县。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则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于12月8日将“国民政府”由成都迁往台湾，并以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以胡宗南、杨森为副长官，同时撤销川陕甘绥署及重庆卫戍司令部。蒋介石作出上述安排后，于10日飞往台湾。

为确保川康地区，顾祝同决定集中兵力，实施“川西决战”，首先击破成渝路及其以西地区之解放军，并迅速消灭刘文辉部，夺取雅安及康定，恢复后方联络。为此，制定如下作战计划：“一、以孙元良部（辖第十六兵团、第七十九军之第一九四师、第二十军之第七十九、第一三四师，以及第二三五师），除以一部向遂宁、乐至方向攻击，牵制匪军，并掩护该兵团左侧背安全外，主力即依现态势，兼程向沱江以西，简阳、资阳之线前进，准备参加主战场方面之作战，并与第七兵团（正向保宁院以南集结）切取连系。二、以第十八兵团之第九十军，即向简阳、淮州地区前进，连系孙兵团，侧击简阳匪之右侧背，兵团另以一部控制南部及三台。三、以第十五、第二十兵团余部，截断灌县、彭县、崇宁邓锡侯叛部。”^①顾祝同虽拟制了上述作战计划，但在解放军的猛烈追歼下，国民党军实际上已溃不成军，“川西决战”已根本无实现可能。

在国民党军向成都地区麇集的情况下，第二野战军首长认为，歼灭胡宗南主力作战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②。只有这样，才能协同解放军第18兵团等部聚歼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区。为此，12月1日至6日，刘伯承、邓小平等相继作出部署：第3兵团之第10军和第5兵团之第16军，由第10军军长杜义德、政治委员王维纲统一指挥，自富顺、纳溪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173～第174页。

^② 1949年12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杨勇、潘焱等的电报。

地区略事休息即向西急进，迅速占领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第5兵团之第18军为该两军的预备队，尾第16军前进，占领犍为；第3兵团之第11、第12军西进大足、内江，与第10军策应，准备出成都及其以南地区；第47军控制邻水、广安，第50军及湖北独立第1师控制垫江。为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歼灭胡宗南部，贺龙、李井泉、周士第12月7日亦作出部署：第62军在占领武都后准备向江油、绵阳前进；第7军准备向广元、剑阁、昭化前进；第60军沿川陕公路向梓潼、绵阳前进；第61军经南江、巴中或望苍、阆中之线向盐亭、潼川（三台）前进。

二、追击包围川境国民党军

12月8日，第16军由南溪地区出发，向乐山前进，成都战役开始。9日在板桥坝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同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10日，第19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第49、第80军在贵州普安宣布起义。11日，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郭汝瑰率第72军3个师在宜宾起义。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此形势下，刘伯承、邓小平等判断：胡宗南部“可能经乐山地区向西昌或经雅安向泸定撤退”^①。为此，12月13日至17日又相继作出部署：第16、第10军迅向乐山、眉山之线前进，务于15或16日到达该线，占领乐山后续占眉山、蒲江、洪雅、夹江地区，切断国民党军南撤云南之路；第11、第12军由第11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指挥，自内江、铜梁继续西进，首先攻占彭山、籍田铺等地，尔后第12军占领邛崃、大邑，第11军占领新津及其以东各要点，与第16、第10军一起完全切断国民党军退往康、滇的道路；第3兵团主力的任务是攻占邛崃、大邑、新津诸要点，非有命令不得进成都，接收成都的任务由第18兵团担任；第50军接替第47军（该军开赴湘西剿匪）进至遂宁地区集

^① 刘伯承、邓小平等1949年12月13日致曾绍山、鲍先志等的电报。

结待命。贺龙、李井泉等也于14日作出部署：第62军于27日前进至绵阳、安县地区；第7军于28日前进至梓潼、绵阳之间地区；第60军于27日前进绵阳周围地区；第61军经巴中攻击前进，于1950年1月2日前进至三台地区。在统一部署下，各路解放军向成都地区疾进。

第16军16日攻占乐山，次日控制乐山、夹江、峨眉三角地带，同时抢占洪雅，19日在沙坪追歼宋希濂残部3400余人，并在峨眉县西南之金口河俘宋希濂，缴获汽车30辆、黄金2600两。第10军13日由荣县出发，次日解放井研，15日攻占青神并强渡岷江向西北发展，17日解放丹陵、眉山，迫国民党军第27军第135师投降，19日继占蒲江。第12军15日解放仁寿，17日夜强渡岷江，次日攻占彭山，歼灭国民党军第135师一部。此时，胡宗南部第5兵团已到达新津，第12军遂以第35师控制要点，监视该部，主力于19日袭占邛崃，在王洒营、苏场追歼国民党军7000人，缴获汽车200余辆，20日攻占大邑。第11军14日经乐至西进，次日攻占简阳，随后进至新津东西之借田、普兴场、太平场地区。第18军13日到达宜宾，接收郭汝瑰部起义后继续西进，15日在犍为青水溪地区歼灭宋希濂残部4000余人，随后向乐山、眉山前进。至此，胡宗南等部退往康滇的道路被完全切断。作为战役预备队的第50军于20日也全部进至遂宁、射洪地区。

在第二野战军主力向成都以南迂回的同时，解放军第18兵团及第7军第19师加速向南追击。中路第60军于13日突破国民党军第38军防御，攻克广元北面要塞朝天驿（关），14日攻占川北门户广元城，歼灭第38军1200人，接着又攻占蜀道咽喉剑门关，18日解放剑阁，随后乘胜直追，20日占梓潼，21日解放绵阳。右路第62军于15日攻占碧口后，迅速突破摩天岭，18日占领青川，22日攻占江油、中坝，歼灭国民党军骑兵第3旅等部8000余人。左路第61军15日由汉中出发，翻越大巴山后，19日在南江地区歼灭国民党军3300余人，21日进占巴中，接着沿成（都）巴

(中) 公路向西追击。

在解放军的猛烈追歼下，各路国民党军争相逃命，猬集成都周围。至 21 日，解放军将川境国民党军团团包围于成都地区。至此，追击作战告一段落。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计划落空，即纷纷逃跑。顾祝同于 15 日飞往海南岛，由胡宗南代理西南军政长官，部署部队突围。18 日，原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及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

三、全歼川境国民党军于成都地区

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被包围于成都地区后，胡宗南立即收缩兵力，组织防御：第 5 兵团守新津，第 18 兵团位于新津、成都之间，担任掩护撤退任务的第 7 兵团南撤德阳、三台地区，第 16 兵团位于什邡、广汉地区，第 3 兵团（由湖北绥靖总部改称）位于金堂地区，第 15、第 20 兵团残部位于彭县地区。

为全歼胡宗南等部于成都地区，根据国民党军相当集中并准备突围等情况，刘伯承、邓小平等于 12 月 21 日指示二野各参战部队：“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两兵团共五个军”^①。贺龙、李井泉也要求第 18 兵团各军加速向安县、绵阳、罗江、三台、中江一线集结之后，“恢复体力，鼓励士气与积极准备配合二野会攻成都战役的各种准备工作”，“以及采取一切方法展开政治瓦解工作”^②。

第 3、第 5 兵团各军根据指示，调整部署，整顿组织，研究战

^①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 1949 年 12 月 21 日致各军首长并报贺龙、李井泉及军委的电报。

^② 贺龙、李井泉等 1949 年 12 月 22 日致刘伯承、邓小平并报军委的电报。

术，同时运用战场喊话、广播、遣俘、送信等各种形式，对国民党军进行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在严密的军事包围和有利的政治争取之下，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与第16兵团副司令曾魁元，于21日率第16兵团4万余人在什邡宣布起义，兵团司令官孙元良率警卫部队于24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为避免全军覆没，胡宗南于22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向南突围，并部署如下：第5兵团指挥第1、第3、第36军及第24师向西昌；第18兵团指挥第90、第65军向云南昭通；第7兵团指挥第76、第17军向贵州威宁；第15兵团统一指挥第20兵团，第79、第127、第20军等残部先由成都向东，尔后转向贵州毕节；各部统于23日22时开始行动^①。胡宗南作出上述部署后，即于23日11时率参谋长罗列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部分高级官员由新津机场飞往海南岛。

23日深夜，国民党军按照突围计划开始行动。然而，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与监视下，向滇、黔、康突围谈何容易！次日，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率部分别在郫县、安德宣布起义。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及成都防卫总司令兼第3军军长盛文，害怕突围意图被暴露遂命令各部停止行动，并于24日重新部署如下：第5兵团为中央兵团，率第69、第27军沿新（津）邛（崃）公路向邛崃前进；第18兵团为右兵团，率第65、第90军及第36军之第48师，由双流向邛崃攻击，于邛崃与第5兵团会合后，向雅安前进；第1军残部为左兵团，沿新邛公路以南向蒲江前进，到达蒲江后以一部进占丹棱，掩护左侧兵团前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率第3军及第36军之第165师为左侧兵团，循第1军道路向蒲江以北前进，另留第24师于新津担任掩护；其余原西安绥署之特务团、炮兵团、辎汽团及干训班等部5000人，随第3军跟进^②。24日下午，国民党军开始分路向西突围，并且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179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180页。

其先头部队开始在邛崃以东之高山镇、固驿镇一带与解放军第12军接火。正值此时，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1.8万余人于25日在德阳宣布起义，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率第65军在成都按兵不动。李文只好以其所能指挥的7个军继续向西突围，并以第27、第36、第90、第57等4个军，由成都经崇庆向邛崃进攻，以第1、第3、第69等3个军沿新（津）邛（崃）进攻。

鉴于胡宗南已逃海南，第15、第20兵团等部纷纷起义以及第5兵团等部开始与解放军第12军接火等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判断：“胡匪所部有于日内即行突围逃窜或解体之可能”。为此，要求“各部队应即多方迅速切实查明当前敌人之动态，如其突围时，则应适时适地于野战中捕歼之，如其仍固守顽抗时，则应以各种方法争取瓦解，并速作有效之组织的进攻准备，以便适时受降和诱导起义与多方捕歼可能溃窜之散匪。”^①

杨勇、杜义德根据国民党军向西突围的情况，当即作出部署：扼守大邑之第12军第34师向邛崃与主力靠拢，坚守桑园镇、童桥、高山镇、固驿镇及邛崃东南一带高地，阻止国民党军南逃；第16军由蒲江进至复兴场、寿安场之线，第18军第53师赶至寿安场；第10军占领新津后，以主力出大邑，第11军向双流出击，以求围歼逃跑之国民党军于新邛公路南北地区。

各部队按照部署开始行动。第12军在邛崃地区顽强抗击了国民党军第27、第36、第90军等部的进攻，粉碎了其突围企图。与此同时，第16军于25日在吴山镇截住了国民党军第1、第3、第27军等部，并歼其2000余人。第10军向新邛公路急进，第11军由东向西直趋双流、新津，第18军第53师亦直插新邛公路。26日4时，解放军各部发起全线攻击，经两天激战，至27日即全歼

^① 刘伯承、邓小平等1949年12月25日致杨勇、杜义德及各军首长并报军委，贺龙、李井泉的电报。同时，命令第50军赶赴简阳，在沱江东岸占领阵地，截击可能向简阳突围之国民党军，要求第18兵团速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方向逃窜之国民党军，并准备进占成都。

国民党军第5兵团等部7个军，俘兵团司令官李文以下5万人。

与此同时，第18兵团、第7军第19师及第50军加速向成都地区急进。至25日，第60军进占德阳，第62军进占什邡，第61军渡嘉陵江直插三台，第50军由遂宁地区向成都疾进。在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之下，26日国民党军第20军军长杨汉烈率3个师1.5万人在金堂起义。第127军军长赵子立率4个师1.2万人在巴中起义。27日，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与国民党军第30军军长鲁崇义率第65、第30军共2.4万人在成都起义。同日，解放军解放成都。其他零散之国民党军也纷纷缴械投降。至此，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止，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从而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西南大陆持久顽抗、保持一个反革命基地的迷梦。

第五节 举行滇南、西昌战役， 肃清西南国民党军残余

一、昆明保卫战

卢汉率部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起义后，蒋介石极为恼怒，10日任命第8军副军长曹天戈为该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熙为该军军长，在陆军参谋长汤尧（后为陆军副总司令）统一指挥下，向昆明进攻，企图“救平滇乱”，保持云南一隅，继续顽抗。汤尧决定，以第8军由昭通、宣威、沾益地区，第26军由开远地区向昆明前进。16日，第8、第16军逼近昆明。卢汉一面率部抵抗，一面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请求援助。刘伯承、邓小平对国民党军进攻昆明极为重视，在要求陈赓第4兵团提早入滇的同时，15日致电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委）：“你们

应即令各部就现态势，分头集结兵力，靠近并监视敌二十六军与第八军。如其确实进攻昆明时，则从各方面予进攻者以有力打击（伏击与对侧背袭击尤要），以策应卢汉并通知之。同时乘势将敌退越南的可能的道路，完全控制和截断。”同日，刘、邓又指示在贵阳的第5兵团政治委员苏振华和第17军军长兼政治委员赵健民：“准备一个师到四个团的兵力进入云南适当地区，给第八军以有力的打击，策应卢汉。”作出上述部署后，16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卢汉：“我们已分头派遣部队，向昆明急进。如第八、第二十六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敢于进攻昆明，即请予迎头痛击，并坚持要点，以待我军赶到，协同歼灭之。”^① 据此，卢汉立即率部投入保卫昆明的战斗；边纵各部队立即投入支援起义部队、保卫昆明、阻止国民党军退入越南的战斗；中共昆明市委紧急动员各级组织，支援起义部队抗击国民党军，并成立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第17军，则立即组成军前进指挥所，率第49师于12月19日由安顺、镇宁地区出发，沿黔滇公路西进。

16日，国民党军开始向昆明进攻。在此前后，曾派飞机对昆明大肆轰炸扫射。19日，汤尧以第8军在东面，第26军在南面发动全线进攻。起义部队在昆明市人民的支援下，坚持要点，节节抗击，固守待援。为解昆明之围，边纵滇北独立团、第2支队第4团驰援昆明，朱家璧率边纵西进部队向昆明急进，解放军第17军第49师在边纵第6、第2支队的配合下，20日自贵州进入滇东北地区，23日解放沾益，向昆明迫近。在保卫昆明的过程中，为争取国民党军第8、第26军起义，曾派在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军长李弥、余程万出城劝说。但李弥出城后反水，余程万被其部下挟持。蒋介石则以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以余程万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要求李、余督饬部属，全力协助汤尧向昆明进攻。但国民党军第26军鉴于解放军第49师正向昆明迫近，边纵正向蒙自、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第267页。

建水进击，广西解放军也准备西出云南等情形，于 21 日拂晓向南撤退。次日，曹天戈第 8 军自感孤立，亦向南逃跑。至此，昆明之围遂解。24 日，解放军第 49 师进占曲靖，迫国民党军 2000 余人投降。之后，该师获悉国民党军第 8、第 26 军正向蒙自方向撤退，遂发起追击，在边纵第 2 支队的配合下，于 26 日在陆良天生关地区追歼国民党军第 8 军第 3 师、陆军总部宪兵团、辐汽第 15 团、辐汽第 17 团、警卫团、军官队及炮兵学校等各一部，俘 4000 余人，缴获汽车 250 辆。30 日，朱家璧率边纵西进部队进入昆明。至此，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二、举行滇南战役，追歼汤尧集团

国民党军第 8、第 26 军撤向滇南后，第 26 军位于蒙自、开远、个旧地区，第 8 军位于建水、石屏、曲溪地区。这时，2 个军共 3 万余人，其内部在撤留问题上意见不一。余程万、曹天戈等主张将部队空运海南岛，转运台湾，李弥则主张第 8 军留于滇南，开辟滇西，继续周旋。蒋介石则根据上述意见作出如下部署：“一、第二十六军，即利用蒙自机场撤运海南，尔后船运台湾。第二十六军撤运完毕后，蒙自基地交由第八军接管。二、以第八军为骨干，扩编为第八兵团，继续留驻滇南，并与云南省政府协调，极力向滇西发展，建立新基地。三、第八兵团下辖第八、第九军，调任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为兵团司令，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兼兵团副司令，第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升任第九军军长，仍暂兼任该师师长。四、第二十六军于撤运前，归第八兵团统一指挥。”^① 据此，国民党军第 8、第 26 军在南盘江以南地区占领阵地，并在南盘江北岸建立桥头堡和据点，阻止解放军南进，李弥则派人深入滇西，搜集反动武装，准备最后顽抗。

当国民党军围攻昆明之时，第二野战军第 4 兵团于广西战役后集结于南宁地区休整，准备按预定计划进军云南。1949 年 12 月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 7 册，第 203 页。

11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林彪、陈赓，要求第4兵团提早入滇，策应卢汉起义部队，解放云南。12月21日，第4兵团遵中央军委指示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但由于尚未补充棉衣，一时难于出动。国民党军于22日开始向滇南撤退后，中央军委判断其将向缅甸、越南逃窜，为此于24日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我应出兵一部沿桂南、滇南前进，截断敌人由滇越路逃越之路，配合我滇地方武装和二野入滇部队歼灭该敌于滇南地区。因陈赓兵团尚不能出发，且距离较远，可否由四野住百色附近部队抽调二个师立即出发，担任此项任务。”同日，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复电中央军委，决定以第38军驻百色之第151师和驻思隆（今田东）之第114师经富宁、文山向老开（今河口）、靖边（今屏边）前进，截击国民党军；同时致电第38军首长，指出进击滇南的重要意义，要求第114、第151师全体指战员再鼓一把劲，完成这一光荣任务。25日，军委决定第38军第114、第151师的作战归陈赓指挥。同日，第四野战军决定该2师于26日或27日向河口以北迂回，并且在与第4兵团沟通电台联络之前，两师由第114师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南统一指挥。26日，中央军委根据国民党军撤退情况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并告陈赓、郭天民：“敌廿六军和八军一部正准备集结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一五一师及一一四师应立即由你们下令并指挥他们向老开、靖边前进。在他们与陈赓建立通讯联络并陈赓入滇后即归陈、郭指挥，以免时间上赶不及。”

28日，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在南宁召开会议，就滇南战役及进军云南作出部署：以已穿上棉衣的第13军第37、第38师于1950年1月1日出动，经富宁、文山向开远、蒙自前进，第39师及第14军于3日后尾进，截击向越南逃跑之国民党军；第15军及兵团部于5日后直趋昆明。与此同时，边纵主力一部与卢汉起义部队一部也奉命准备南下参加滇南战役。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对滇南战役也极为关注。1949年12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第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及陈赓等：“顷接毛主席来电：我军可

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早日退入越南。又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迅速进行争取工作，策动该敌起义，云云。望即分别转知前线，本此方针执行。”据此，第二野战军命令边纵及卢汉部参战部队暂缓南进，待第38军等迂回部队到达河口之线后再行南下，配合作战。以后根据战况的发展，第13军第39师及第14军也北上昆明。这样，参加滇南战役的部队主要分三路：第38军主力在边纵第1支队的配合下直插河口、屏边之线，封闭中越边境，切断汤尧集团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第13军主力在边纵第4、第10支队的配合下直奔开远、蒙自，抢占蒙自机场，切断汤尧集团的空中通道；边纵西进部队、主力第2支队第4团、第9支队、独立第1团及卢汉起义部队4个团，集结于元江南北地区，准备实施机动作战，阻止国民党军西逃。

1949年12月27日和1950年1月1日，第38、第13军主力分别由百色、南宁发出，以每日50公里的速度隐蔽西进。1月11日，第114师进占边防重镇河口，16日攻占曼耗渡口，歼灭国民党军1个营，同日第151师攻占屏边。至此，解放军控制了蒙自以南的交通线，封闭了中越边境。与此同时，第13军第37师于15日到达蒙自以东，接着绕过戛龙国民党军第26军警戒部队，于16日晨攻占蒙自机场，歼灭国民党军第26军第193、第93师各1部1500余人，缴获飞机2架。第38师击溃了鸣鹭街之国民党军。

解放军进占河口和蒙自机场，堵死了汤尧集团逃往越南和空运的道路。汤尧急忙下令各军向元江以南撤退，第26军即仓促南撤。17日下午，汤尧又命令第8兵团部及第8军于次日从建水、石屏地区向西撤退，经元江，墨江进入普洱、思茅地区，与李弥组织的反动武装会合。元江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唯一通道是元江城北的铁索桥。根据上述情况，陈赓决心将汤尧集团追歼于元江以东地区，并部署如下：以第37师及第38师一部为中路，除控

制蒙自机场外，主力向建水、石屏追击；以第114、151师为左路，除以一部控制金平外，主力沿红河西进，迂回汤尧集团左翼；以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为右路，乘汽车进至峨山，然后向墨江前进，堵击逃跑之国民党军。

解放军各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于17日展开追歼作战。第37师于当日攻占个旧，歼灭国民党军第26军3000余人。彭佐熙率主力经蛮板南逃，第114师一部及第151师于17日至20日在蛮板地区又歼灭其3000余人。彭佐熙率残部3000余人逃往越南、缅甸。与此同时，第37师由东向西，第114师主力由南向北，边纵和卢汉部由北向南，追歼汤尧第8兵团部及第8军。19日至20日，第114师主力在宜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8军第237师一部，该师师长李彬普等300余人在逃跑时跌入山谷。第8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田仲达鉴于逃跑无望，乃率2000余人在石屏西北地区向边纵投降。21日，第37师在元江以东营盘山与第8军后尾接触。该师第109团第2营以1个连穿戴国民党军衣帽，乘乱直插营盘山隘口，控制了制高点，主力楔入国民党军队形中央，实施穿插分割，歼灭国民党军第8军教导师及第3师1700余人。此时，边纵也到达元江东岸的铁索桥附近，截击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国民党军陷入混乱，其先期逃过铁索桥的第9军第170师害怕被追歼，将桥炸毁。同日下午，汤尧率其第8兵团部、第8军军部及第42师逃到元江东岸。为夺路逃生，当晚抢修铁索桥，被第37师一部粉碎。汤尧见过江无望，乃率部沿元江东岸南逃。第37师与边纵一部即多路迂回追击，至23日将汤尧集团主力包围在红土坡、二塘地区。2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经8小时激战，全歼第8兵团部及第8军残部，计击毙1500余人，俘6000余人，活捉汤尧及曹天戈。

为继续追歼国民党军第170师等残部，不使逃往国外，第13军遵照陈赓关于“敌逃必追，追必到底”的指示，于28日以2个营和4个连分别从元江出发，在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向

西、向南追击。向西追击的部队经 8 昼夜猛追，于 2 月 4 日在镇沅以西板井追上第 170 师主力，迫该师师长孙进贤率部 2400 余人投降。向南追击的部队经普洱、思茅南下，于 2 月 19 日在南峒（今勐遮）追上第 170 师残部，歼其 500 余人，其余逃往国外。解放军相继解放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打洛。至此，滇南战役胜利结束。

与此同时，陈赓率第 4 兵团部于 2 月 20 日进驻昆明，第 14、第 15 军亦于 2 月中旬进驻滇西、滇东北地区，云南全省获得解放。

滇南战役，自 1949 年 12 月 27 日开始至 1950 年 2 月 19 日止，历时 50 余天，解放军追击前进 1800 余公里，越过了无数的山峦荒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歼灭了国民党军 2.7 万人，解放了滇南、滇西的广大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空运计划和妄图建立滇南“反共基地”的梦想。

滇南战役的成功主要经验有三：第一，在实施远距离迂回追击时，作战行动保持了秘密和突然性。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接受任务后，快速隐蔽西进，昼夜兼程，前进 900 余公里，对国民党军迅即形成包围。1950 年 1 月 15 日，第 37 师出现于蒙自机场时，国民党军尚在睡梦之中。解放军隐蔽、突然的作战行动，使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不知所措，从而为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贯彻了“穷追猛打、追必到底、不死不止”的战术思想，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在此次作战中，国民党军丧失斗志，只求逃跑，无心恋战，并且行动迟缓，各部队不能互相协同。解放军各部队则抓住国民党军的弱点，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穷追猛打，使国民党军难以喘息。在追击中，各级指挥员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机断专行，不姑息部队疲劳，敢于以少胜多，不怕远离主力，敢于大胆向国民党军纵深楔入。正由于此，解放军始终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第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在此次追歼作战中，解放军除以军事手段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外，还不失时机地对其进行政治瓦解，争取

了国民党军第8军第3、第170师投降，从而缩短了战斗时间并减少了伤亡。

三、举行西昌战役，拔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据点

西昌位于西康省的东南部，是川滇的交通要冲，周围地区为高山峻岭，并由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环绕，战略地位重要。早在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黔之时，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将其第1军第1师第2团于1949年12月1日由汉中空运西昌，归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指挥，加强防御。成都战役后，国民党军第127、第124、第69、第38、第27、第3、第2军等残部，纷纷撤向西昌南北地区，使国民党军在西昌地区的兵力达到3.5万人^①。为坚持西昌，逃到海南岛的胡宗南于1949年12月28日奉蒋介石之命飞返西昌，企图把西昌地区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胡宗南遂以第127军第310师残部守康定，以第27军第135师残部守泸定，以第335师第1004团及69军残部守富林（今汉源），以第124军残部及第2军第76师守会理，阻止解放军进入西昌地区。

为了拔除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军区（1950年2月22日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于3月3日决定以第14、第15、第62军各1部，配属滇桂黔边纵队一部，共13个团的兵力进行西昌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62军第184师由川西经富林、冕宁南下，以第15军第44师由巧家北上，南北夹击，于4月10日前攻占西昌。与此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军向西逃窜，第14军第119、第124团与滇桂黔边纵队第7支队之第34、第35团由禄丰、宾川北上堵击。

3月12日，第62军第184师由温江出发，23日攻占富林，次日强渡大渡河，追击由富林南逃的国民党军第335师。第186师第556团19日奉命西进，至24日连克泸定、康定，歼灭国民党军第127军残部和第310师各一部。与此同时，第15军第44师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214页。

于12日由曲靖出发，在巧家、会理以南之隆街渡过金沙江，23日攻占会理、宁南，25日攻占德昌，歼灭国民党军第124、第2、第27军残部各一部。第14军的2个团与边纵的2个团，亦于20日由禄丰、宾川出发北上。胡宗南部处于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鉴于情势危急，胡宗南向蒋介石频频发电，请求对策。25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如西昌不能不放弃，吾弟是否仍将领导各部队行游击作战，继续与匪斗争，否则弟离部后，何人可代为领导，速告知。”次日，胡告蒋：“为简化机构，减少目标，便于机动起见，遵于此间留置简单机构，由参谋长罗列负责领导，职率非战斗人员，拟于本月二十六日飞琼转台。”^①这样，胡宗南把挑子撂给罗列，于27日晨与贺国光等乘飞机逃跑。

胡宗南的飞机刚刚起飞，解放军第44师即于27日5时攻占西昌，守军一部被歼，大部逃窜。28日，西南军区命令各参战部队切实查明国民党军的溃散情况，适时追歼，同时命令位于滇东北的第15军第43师派兵一部，出巧家津及雷波配合作战。各部据此立即展开追剿作战。

第62军第184师于28日进占冕宁后，南下泸沽，于4月1日在喜德之甘相营、鸡窑沟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1军第2团残部及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团。第69军、第335师等残部走投无路，向越隽（今越西）小相岭附近逃跑。解放军第184师跟踪追击，至4月5日歼其4000余人。在解放军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纷纷缴械投降。第14军和边纵的4个团，于4月1日解放盐边、盐源，北上配合作战。此时，国民党军第124军、第2军第76师残部2000余人乘隙南渡金沙江，向滇西逃窜。第14军遂以第119团第1营实施追击，同时组织多路堵剿。该营经过7天8夜的连续穷追，至4月13日在盐丰西北之平川街及邓川以东之姜营街全歼逃跑之国民党军。至此，西昌战役结束。解放军经过1个多月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219页。

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 1 万余人，其余溃散。

在 2 个多月的进军西南作战中，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先后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和游杂武装共 90 万人，解放了川、黔、滇、康 4 省，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西南作为其反革命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

第六节 挺进昌都，和平解放西藏

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与部署

西藏（指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包括当时的西藏和西康省金沙江以西的地区）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是青藏高原的主体，人口 120 万（其中 94% 为藏族），面积 120 万平方公里，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长约 4000 公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和横断山脉所环抱，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由于高山缺氧，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给解放军进军西藏带来了不少困难。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制的封建农奴社会，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构成西藏的上层统治集团。在农奴主的残酷统治下，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广大藏族人民生活极为悲惨。

英国自 18 世纪末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并策动西藏反动上层搞“西藏独立”。1949 年 7 月 8 日，以大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1949 年底又准备派出“亲善使团”，分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和北京，以表明“独立”，并由美国合众社公布这一消息。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还设立了由噶伦主管的军饷机构，加征军用粮款，在全区各地征兵，将藏军由原来的 14 个代本（每代本编制 500 人，相当于小团）扩编为 17 个代本，征集地方民兵武装，

加紧军事训练，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

针对中外反动派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新华社于1949年9月2日发表《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①从而表明了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美国合众社公布了西藏地方当局准备派出“亲善使团”的消息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并严正表示，如果拉萨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活动，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坚决斗争，西藏地方赴英、美等国的代表未能成行。

对中外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西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同样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羁留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949年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1950年1月下旬，班禅堪布会议厅又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认为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亲善使团”是“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②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表示，不支持西藏地方政府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在西宁、重庆、兰州等地的西藏

^① 1949年9月3日《人民日报》。

^② 《当代中国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上层人士、藏族人民以及西康、青海等省的藏族爱国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纷纷表示拥护解放军解放西藏，决心为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①

为了粉碎中外反动派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解决西藏问题。

早在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8月6日致电彭德怀等时，就要求“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②11月23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③彭德怀根据调查的情况，于12月30日复电中共中央，认为由青海、新疆入藏交通不便，困难甚大，而由打箭炉（今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麦科，一路经甘孜、昌都入藏则较为容易，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同意了彭德怀的建议，并于1950年1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5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5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4页。

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要求西南局讨论“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规定入藏兵力为“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①。

据此，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经研究于1月6日决定，由第18军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为统一经营西藏的领导工作，西南局于1月18日上报并经中共中央1月24日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为书记，谭冠三（军政治委员）为副书记，王其梅（军副政治委员）、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全国政协委员）为委员。

在确定以第18军担任向西藏进军任务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根据藏军分布，特别是交通十分不便，后方供应困难的情况，于1950年1月上、中旬提出了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4省“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以收协力合击之效，解决粮食与地形的困难。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筹办。据此，除第18军外，西南局还决定第14军一部由云南进军西藏，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确定由第1军派骑兵支队从青海进军西藏，第2军组建骑兵师从新疆进军西藏阿里地区，以配合第18军的进藏行动。

在部署解放军准备向西藏进军的同时，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西藏社会的特点：政教合一，西藏人民普遍信奉喇嘛教；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挑拨，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地方统治集团采取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西藏问题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上层中有分化，达赖喇嘛有某种程度的内向可能；在农奴制度下，西藏劳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8～第69页。

人民极其穷苦，但统治阶级所用的宗教维系力仍很强；地形、气候、粮食对解放军作战有困难，加之中外分裂势力在汉藏民族间制造了一定程度的民族隔阂，西藏人民对中央的政策有一个了解过程。因此，进军西藏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据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可以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① 195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南局并西北局等：“在充实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

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南局于5月27日拟定并经中央6月2日批准，提出了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1.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2. 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 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 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 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 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 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 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

^① 《当代中国西藏（上）》，第136页。

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北局向西藏上层人士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和政治争取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上层关系进入西藏与当权派接触劝说。

二、进军西藏的准备

第18军及其他进藏部队，接受任务后即开始了进藏的各项准备。由于川西土匪猖獗，影响进藏准备工作的进行，西南局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进军西藏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影响进军的各种不利因素有：路途遥远，关山重重，交通十分不便；语言不通，民族隔阂较深；康藏一带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物资难于就地补给。这就使进军的准备工作变得极为艰巨复杂。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进藏部队必须在民族政策、语言等方面加以特殊训练，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做到“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据此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遵此，进藏部队主要进行了如下的准备工作。

第一，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教育部队遵守民族政策，牢固树立长期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思想。

1950年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及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布《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决、勇敢地完成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3月初，第18军在乐山召开了庆功出师大会，各师亦分别召开了出师动员会议，介绍西藏的情况，阐明解放西藏的伟大意义。各级党委还结合部队少数人员中开始滋生的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反复的教育工作。经

过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部队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明确了进军西藏的重要意义，纷纷表示坚决完成进军任务，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为了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部队普遍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和学习，干部带头掀起了学藏文、藏语的群众性运动。部队还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特别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如未经允许不进寺庙，遇到玛尼堆（用刻有经文的石块和石片垒起的石堆），按当地习惯朝左走，不打“神鸟”，不动“神物”等。第一野战军各进藏部队也展开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和民族政策的教育，组织干部学习藏文、藏语。经过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政策观念，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思想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详细了解西藏情况。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交通闭塞，路途遥远，社情特殊，进藏部队对这些情况比较陌生。为此，从中央到进藏部队都十分重视对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央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会。西南局及西南军区多次邀请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士座谈，并指示张国华、谭冠三及中共西藏工委，对西藏问题尤其政教问题必须多方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第18军据此于1950年2月下旬成立了以王其梅为主任的政策研究室。研究室聘请李安宅等西藏问题专家一起工作，很快写出了《西藏社会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注意和准备事项》等一批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掌握藏情、制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调查西藏的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等情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及为主力进军做好准备，第18军组成了以第52师副师长陈子植为司令员、军敌工部长陈竞波为政治委员、军作战处处长薛和为参谋长的先遣支队，率军侦察营、工兵营于2月3日自乐山出发，向甘孜前进。因土匪猖獗，先遣支队12日进抵

雅安即奉命停止前进。为了执行同样的任务，第18军又组成了由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进指挥所，指挥南北两路先遣支队向金沙江东岸进发。北路为第52师第154团，由该师师长吴忠及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于3月29日自乐山出发，4月28日到达甘孜。南路为第53师第157团，由该师副政治委员苗丕一率领，自4月1日由四川名山出发，进抵雅安后参加筑路，8月2日苗丕一率该团1个营进抵巴塘。军前指途经雅安时，陈子植率领的先遣支队并入军前指，侦察营、工兵营参加筑路。先遣支队到甘孜、巴塘后，在后方供应几乎断绝、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进行了了解藏情、兵要地志等许多艰苦的工作，在巴塘中共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不仅完成了军区所赋予的任务，而且大力进行了争取团结西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开办训练班，训练了百余名藏族青年，购买了一批粮草，为后续部队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修筑道路，筹措运输进军物资。面对西藏的特殊情况，不解决道路问题，无充足的物资供应，进军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为此，西南军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并组成了以昌炳桂为司令员、胥光义为政治委员的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在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和工兵司令部的率领下，军区的6个工兵团和第18军的3个步兵团1.8万人投入了抢修雅甘公路的战斗。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603公里长的雅甘公路于1950年8月26日全线贯通，进而在甘孜建立了巩固的前进基地，使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有了保障。10月，雅甘公路从甘孜西北穿过雀尔山延伸至竹庆，公路里程达750公里。

与此同时，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组织军工、民工1.7万人，抢修了大理经丽江至中甸的公路，并使公路由中甸继续向西北延伸。西北军区新疆独立骑兵师组建后，在师长兼政治委员何家产的率领下，于1950年7月集结于田，抢修于田经普鲁通

往西藏阿里地区的道路。驻青海的第1军亦抽调8000余人，自同年5月至10月，抢修了湟源至玛多县黄河沿镇的600公里急造公路，第3军修筑了西宁至享堂、大坡山的公路。公路的修建，大大改善了进藏部队的交通状况，为保障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创造了条件。

随着公路的修建，西南军区组建了2个汽车团又2个汽车连、4个辎重团共汽车853辆、马车295辆、驮马2381匹，担任接力运输。另以2个团担负重庆至新津的运输任务。部队走到哪里，物资就送到哪里。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车运，没有公路的地方用驮马、牦牛驮。河水拦路，就用溜索、牛皮船运。人民空军在设备困难、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出动1个空运师计30架飞机帮助运输。王洪智机组经过数十次试飞，于1950年5月7日突破“空中禁区”，在甘孜、邓柯等地实施空投。至1950年底，汽车部队共运送物资3.5万吨，骡马驮运1800余吨，空投900余吨。部队所需物资的赶制，得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的大力支援。物资的运输则得到了沿途藏族等各族同胞的帮助。云南军区除组织了1800人、2200头牲口的运输队外，还组织了1.9万民工、雇请了5000头牲口的9个马帮大队帮助运输。青海玉树地区称多、玉树两县，调集驮畜4000多头，把物资从黄河沿运送到囊谦、玉树等地。新疆于田地方政府由900多名民工、4500多头毛驴组成9个运输大队，为进藏部队驮运军用物资。西康省德格县的藏族群众，在20天内就集中了3.5万多公斤马草和5万余公斤干柴，用800余头牦牛帮助解放军运输。著名支前模范藏族妇女曲梅巴珍，第1个报名参加运输队，带着自己的2头牛、1匹马，完成运输任务100次，被西康人民政府授予“支援模范、藏族之光”的锦旗。大量军用物资运往前方，为胜利进军提供了物资保障，增强了部队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第四，进行高原行军、作战的适应性训练。为适应高原作战，西南军区通过调拨、赶制，对进藏部队的武器进行了改装，把较

为笨重的重机枪一律换成不需驮载的重机枪，山炮换为无后坐力炮，班、排长及机关工作人员一律配备了轻便的自动武器。第18军抓紧时间，利用剿匪、筑路任务的空隙，对部队进行适应高原作战的各种训练。如雪地战斗、森林战斗、小锅作饭、帐篷露营、负重行军、高原射击等。通过训练，部队在体力、战术技术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等方面，都有了增强和提高，从而使战斗情绪更加饱满。

经过各方面的准备，进藏部队开始向昌都地区开进。1950年7月27日，由王其梅、李觉率领的第18军前指到达甘孜，与吴忠率领的第154团会合。28日，军长张国华率第52师直属队及2个步兵团，由新津、眉山地区分批乘车西进，至10月初集结于邓柯、德格地区。第53师第157团于9月29日到达巴安（今巴塘）。云南的第14军第42师第126团及第125团第3营，于9月28日进抵滇西北之贡山。青海骑兵支队680人，在支队长孙巩、政治委员冀春光的率领下，行程900公里，于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与此同时，新疆独立骑兵师为查明情况，派第1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该团第1连135人组成先遣连，向西藏阿里地区前进。8月23日，先遣连进驻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保。

三、举行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从中央到进藏部队，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对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1月底，中央和青海有关部门派张竞成（藏族）等4人入藏，带信给达赖喇嘛和大扎摄政。2月，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开始，用藏语向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上层人士广播，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部分，呼吁西藏地方当局不要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速派代表来北京谈判。7月中旬和8月上旬，驻甘孜地区的解放军前线指挥员向昌都的噶伦拉鲁·次旺多吉和驻生达的藏军代本牟暇写信，说明进军西藏的目的，宣传十大政策，希望西藏地方当局脱离帝国主义的羁

绊，早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当局虽于1950年2月派出和谈代表团，但这个代表团却绕道南亚，滞留印度，迟迟不来北京。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4月向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说明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和方针，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和代办申健，几次敦促他们赴京谈判。

然而，西藏地方当局在英、美等国的煽动下，却执迷不悟。5月，西北局派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隆多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等组成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代表团行至西藏聂荣宗，即被西藏地方当局阻止。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夏日仓、先灵活佛的行动受到限制，随行4人被押解山南泽当软禁，电台被没收。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洛桑丹增活佛，请求赴拉萨劝和。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谈代表的身份从甘孜白利寺出发，24日抵达昌都，即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其随员被押往拉萨。格达活佛被害，进一步暴露了以大扎为首的分裂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在拒绝和平谈判的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将其总兵力的2/3，计7个代本全部和3个代本一部4500人，以及土兵（西藏的民间武装，归土司头人掌握）、僧兵3500人共8000余人，分布于昌都周围及金沙江以西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总督指挥。其具体部署是：以第8代本全部、第7代本大部及第2、第6代本各一部和噶伦卫队集结于昌都；以第7代本之另一部位于类乌齐；以第3代本和真伯拉代本位于生达地区；以第10代本位于江达地区；以第9代本位于宁静（今茫康）、盐井地区；以第4代本位于丁青地区；其余300名土僧兵配属各代本分散配置于上述地区。

昌都是藏东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解放军进藏的咽喉要道。为了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西南军区决心集中6个团2万余人的兵力发起昌都战役。8月23日，毛泽东致电西南局指出：“如我

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① 据此，西南军区决定发起昌都战役，以歼灭藏军有生力量，促成和平进军西藏。根据藏军在解放军进攻之下，或扼守若干要点进行抵抗，或分散各地扭打游击，或以主力分路撤退，并且其撤退的主要道路是经恩达、类乌齐向西等情况的分析判断，西南军区要求参战部队在兵力部署上，以主力实行两翼迂回，断其退路，将藏军主力歼灭于昌都及其以西的恩达、类乌齐地区。与此同时，对藏军特别是土兵，要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第18军决心将参战部队分为南、北集团，并将主力使用于北线，具体部署是：北线集团由第18军第52师，军炮兵、侦察、工兵营，第54师炮兵连及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由第52师统一指挥，分为左、中、右三路。右路为第52师骑兵连、侦察连、炮兵连、第154团、青海骑兵支队。其中，第154团由邓柯偷渡金沙江，会同由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退路，并准备阻止丁青藏军东援，青海骑兵支队一部直插昌都以南，阻止藏军南窜；中路为第52师师直、第155团、第156团及军炮兵营，由邓柯隐蔽渡江，经生达等地直捣昌都；左路为军侦察营、工兵营及第54师炮兵连，由德格渡江，歼灭同普、江达之藏军，配合中路主力从正面攻击昌都，并以一部迂回昌都以南，歼灭可能南逃之藏军。南线集团由第18军第53师第157团、炮兵连、工兵连及第14军第42师第126团（欠1个营）、第125团第3营组成，由第53师统一指挥，分为左、右两路。右路第157团，由巴塘渡江，围歼宁静地区之藏军，主力出邦达、八宿，切断藏军南退之路；左路第42师所部，由贡山、德钦出动，歼灭盐井、门工、碧土地区的藏军，尔后向西北方向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92页。

佯动。

10月6日，各部队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发起昌都战役。北线集团右路之第154团，6日由邓柯西渡金沙江后，向北绕道玉树巴塘之后，尾青海骑兵支队南下。部队绕过当面藏军，穿越草原，以强行军直插昌都以西。18日，骑兵支队先藏军数小时抢占恩达，第154团攻占类乌齐。19日，骑兵支队主力及第154团一部向昌都以南机动。至此，昌都地区藏军西逃拉萨的道路被完全切断。

担任向昌都正面攻击之北集团左路部队，于7日渡江，向岗托藏军攻击。藏军稍加抵抗即会同江达等地的藏军向昌都撤退。部队即行猛追，16日在觉雍以西歼灭藏军百余人，19日黄昏迫近昌都。

北集团之中路部队，于7至9日在邓柯分批渡江，先后与藏军在国德、生达、小乌拉山展开激战。藏军不支，向昌都撤退。部队发起猛追，并以第156团之轻装先遣营从左翼取捷径前进，19日黄昏进抵昌都近郊。

南集团之第53师所部，于7、8日在巴塘以西分批渡江，以两翼迂回，钳击宁静之藏军。在政治争取之下，藏军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余人于12日起义。15日，部队向邦达、八宿方向疾进，堵击可能由昌都南逃之藏军。

南集团之云南军区部队，5日向门工发起攻击，守军撤退。部队即从左右两翼实施平行追击，11日在碧土以东的杜梁地区追歼400余人。次日，部队又分两路钳击盐井守军，歼灭百余人，随后位于盐井、德钦地区待机。

在解放军迅速迫近昌都的形势下，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即率第2、第4、第3、第7等代本及总署机关、卫队等，于19日放弃昌都，向恩达、类乌齐撤退。当发现其退路已被解放军切断后，又率军南折，向邦达、八宿撤退。但青海骑兵支队已抢占了昌都西南之宗驿山，控制了藏军的撤退道路。这时，解放军第156团先遣营已于19日20时解放昌都，北集团左路主力向南追击南

逃藏军。20日，阿沛·阿旺晋美派人与解放军取得联系，21日下令2700余名藏军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此后，北集团主力转入分区清剿，肃清残余藏军。至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18天，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灭藏军第3、第7、第8、第10等6个代本（第3代本包括噶穷巴及牟暇两代本）全部及第2、第4、第6代本各一部和部分土兵，争取第9代本起义，共计5737人。

在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土兵政策和俘虏政策。在民族政策方面，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住民房，不进喇嘛庙。同时，有计划地对喇嘛、藏官、头人和土兵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返回并帮助解放军修路及组织牦牛运输等工作。对土兵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工作，从而孤立了藏军。在俘虏政策方面，严格执行不杀、不辱、不搜腰包，不动“神诰”的政策，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集中教育即迅速释放，生活给以照顾，一律发给旅费。由于执行了上述各项政策，从而博得了广大群众和多数藏军官兵对解放军的信任和好感。

昌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汉藏的民族团结，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图谋，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方上层内部的分化，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

四、进军西藏

昌都战役的胜利及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之十项条件的公布（新华社于1950年11月10日公布），使西藏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原来不赞成打仗的西藏上层人士，追究在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未赴北京的原因，主张另派代表与解放军谈判。随着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发展，1950年11月1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大扎摄政下台。

然而，英美等国虽无法阻止西藏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潮流，却不愿看到解放军进军西藏的现实。昌都战役结束前夕，印度政府于10月21日致中国备忘录称：“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

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①。28日，印度又照会中国：“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②。对此，中国政府于30日照会印度：“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而已。”^③

大扎下台后，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将十四世达赖于1950年12月19日挟持出拉萨，次年1月2日至亚东，企图逃往国外并寻求国际支持。然而，这时英、美等国已深切感到难以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在西藏内部，以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为代表的上层爱国人士，则鲜明地反对分裂行动，积极主张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在此形势下，经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再敦促，西藏地方政府遂于1951年2月中旬决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及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抵达北京。从29日开始，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正式会谈。经20多天协商，双方于5月21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华关系文集》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华关系文集》第1集，第167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集》第1集，第164～第165页。

议》(简称《十七条协议》)。23日,在朱德副主席主持下,双方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变;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协议正确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及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协议的签订,是西藏人民走向光明的第一步。

为了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前往西藏工作。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土登旦达、凯墨·索安旺堆和桑颇·登增顿珠与张同行。张经武等于6月13日离京,途经香港,绕道印度,于7月14日到达西藏亚东。16日,张经武会见达赖喇嘛,向其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和协议的抄本。达赖喇嘛听了张经武对协议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阐述后,决定返回拉萨。8月8日,张经武等抵达拉萨。随后,达赖喇嘛于17日返回拉萨,并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协议,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欢迎。

根据协议,毛泽东于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就解放军进军西藏作出部署:“(一)西南军区之十八军除留两个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五十二师进军西藏任务不变。该师应以一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缺一个营)进驻丁青、乌所、黎嘉、太

昭地区，师部进驻太昭”。“（二）西南军区之十四军一二六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三）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四）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训令还特别指出：“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轻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①

西南军区进藏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昌都战役后即开始了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至1951年1月底，西南军区为进藏部队准备了过冬烧柴993.5万公斤，饲草119万公斤，征集驮骡、牦牛2.7万头。四川方面至2月初运输粮食、物资350万公斤。云南方面至2月中旬将90万公斤粮食从丽江运至德钦。与此同时，西南军区下大力修筑进藏公路。为了修建甘孜至昌都间的公路，西南军区从5月开始，以工兵第8团从玉隆向西，以第18军第53、第54师从昌都向东、从马尼干戈向西同时修筑。其中，马尼干戈以西、海拔6300米的雀儿山地段为全路的卡脖子工程。为此，9月中旬以第54师机关为主组成了雀儿山工程指挥部，集中5个团艰苦奋斗，于12月28日终于打通了雀儿山。随着公路的延伸，部队的物资供应有了更可靠的保障。

195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据此，西北局于1951年6月7日组建了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以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为委员，范明为书记。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抓紧做好进藏的组织机构、人员、粮食和道路等各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78～第279页。

项工作。至1951年6月底，共采购骡马5200匹、驮牛6000多头，骆驼1600多峰，成立了3个驮运大队，运送粮食300万余公斤。与此同时，新疆军区独立师集中力量修筑新藏公路，为大部队进藏作准备。

在基本上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之后，解放军即分路向西藏进军。

1951年7月，第18军从昌都、甘孜等地向西藏实施梯次进军。7月25日，第18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率领由统战、公安、外事干部及1个步兵连和1个警卫排组成的先遣支队400余人，由昌都出发，经边坝、嘉黎、太昭向拉萨前进，执行先行入藏了解情况，宣传协议，筹集粮草，为后续部队作准备的任务。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土登列门随队同行。先遣支队翻越终年积雪、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经过边坝至太昭之间荒凉艰苦、严重缺粮的“穷八站”，于9月9日进抵拉萨。

第18军主力由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分成两个梯队（军直率第52师第154团为第1梯队，第52师师直率第155团和军炮兵营为第2梯队）西进。7月1日，张国华、谭冠三率军直一部由甘孜出发，经昌都、丁青，与先期由洛隆、边坝地区出发，经嘉黎、太昭到达墨竹工卡的第154团会合，之后继续西进，10月26日进抵拉萨。第154团接着于11月23日进驻日喀则，28日进驻江孜。第2梯队由第52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治委员阴法唐率领，亦由甘孜出发，10月21日继由昌都西进，经边坝、沙丁、嘉黎，于11月7日到达太昭。

由青海进藏的第18军独立支队和班禅行辕1300余人，在范明、慕生忠的率领下，于8月22日从青海省香日德出发，9月8日在黄河沿南渡黄河，接着穿越巴颜喀拉山，抢渡通天河，经沼多、顺达，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聂荣、黑河于11月27日抵达拉萨。

从云南进藏的第14军第42师第126团一部和1个工作队共600人，于8月24日从扎那（门工附近之怒江东岸）出发，在

“一日四季，一山四季”的恶劣气候里，西渡怒江，翻越日秀拉等雪山险隘，闯过瘴疠险区，于30日抵达竹瓦根。之后，团长高建兴率70余人于10月1日进至察隅，该团一部于10日抵达科麦，25日进驻沙马。

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继续派部向阿里进军。1951年5月6日，由该师第2团副团长安志明率领的先遣支队400人，从于田出发，5月28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连胜利会师。此时，先遣连已有59名干部、战士牺牲，被誉为“阿里雄鹰”的李狄三因长期病重，在交出工作日记后溘然长逝。6月7日，两支部队向阿里首府噶尔（噶大克）进军，29日进抵普兰宗（今普兰县），7月27日到达噶尔。同年夏，乌斯满部残匪由新疆且末窜入藏北。7月26日，独立骑兵师派第2团营长贺景福率1个加强连进藏追剿。剿灭叛匪后，该部进驻日土宗。

解放军各进藏部队不仅战胜了大江大河、雪山峻岭、草原沼泽、原始森林以及气候严寒、空气稀薄、雨雪冰雹等重重自然障碍，胜利地完成了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而且模范地宣传和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们每到一地，一律住帐篷，不住民房，不进佛堂，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积极宣传和平协议精神。并通过给藏族群众治病、放映电影、接济饥民、召开土司头人会议和拜访等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增进了民族团结，受到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藏族同胞赞颂解放军是“新汉人”、“菩萨兵”、“藏族人民自己的军队”。

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妄图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怀抱，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促进了中国西南国防的巩固，并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配合下，向西南进军，经过2个多月的作战，先后解放了川、黔、滇、康4省，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和游杂武装共90万人，粉碎了蒋介石把西南作为其反攻基地的图谋。之后，又与第一野战军一部解放了西藏，统一了中国大陆。其主要作战经验是：

第一，贯彻了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进军西南前，国民党军以主力胡宗南部置于川陕甘边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解放军入川，同时准备在形势危急时经云贵南逃。在这种形势下，进军西南的解放军认真贯彻了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第18兵团于川陕甘边地区吸引胡宗南主力，第二野战军主力则由敌兵力薄弱的贵州、鄂西迂回川南，切断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逃的道路，从而将国民党军主力封闭于四川盆地，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全歼了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对此，台湾国民党军的战史作了如下描述：“由于国军判断匪军主力系由秦岭南下，故特加强川北兵力配置，以至川南空虚，匪第五兵团遂得以由贵州长驱直入，而国军已无足够兵力防堵，以致于被围于成都附近地区，数十万大军，终在突围中迅遭覆灭。因敌情判断错误，导致作战指导失策，终使全军覆没之惨痛教训，莫此为甚。”^①

第二，解放军各部密切协同作战。解放军之所以能在川黔鄂地区歼灭宋希濂主力并重创罗广文兵团，则在于第二、第四野战军参战部队的密切协同。第四野战军一部为歼灭宋希濂部解放鄂西而发起鄂西战役，第二野战军则在作战部署上予以配合，从而使宋希濂部腹背受敌，遭到重创。鄂西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又以7个师交第二野战军指挥，从而使第二野战军得置重点于川南地区迂回，使胜算的把握更大。第18兵团为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在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249页。

川黔地区的作战，将胡宗南主力吸引于川陕甘边地区。当胡军开始南撤后，又以不过于压迫胡军避免其迅速撤退并破坏道路而尾其前进，既吻合了川黔地区的作战节奏，又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第二野战军主力向成都以南迂回，迅速切断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逃康滇的道路时，第18兵团则由北向南猛烈追击，从而使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遭到南北夹击，完全处于被动，来不及变更部署即陷入解放军的包围而全部就歼。对此，国民党军的战史又说：“贵州地形复杂，天候变化无常，素有‘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之称，且资源贫乏，匪竟然使用四个军之众于此几乎不毛之地，略取贵州，进出川南，直逼乐山、新津，以截断四川与康、滇之通路；又其第一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暂不攻汉中，仅于秦岭扣留我胡宗南部，尔后再配合其第五兵团之进展，南取成都，协力其第三、第五兵团捕歼国军主力于成都附近地区。故匪军陕南、川东及贵州三方面之策应配合，能达成战略目的与获至预期战果。”^①

第三，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政治工作，大力瓦解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于进军川南的同时，利用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军政兼施，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发布四项公告，促成了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起义，从而使之有力配合了成都战役。胡宗南等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后，第二野战军又抓住国民党军在军事打击下其内部空前分化和动摇的有利时机，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使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或缴械投降，从而减少了流血和破坏，有利于西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7册，第246页。

第八章 参加城市接管。清剿土匪

第一节 参加城市接管

一、接管城市的方针和政策

(一)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接管城市的方针与政策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追击后，相继解放了包括南京、上海、武汉、西安、福州、南昌、长沙、广州、桂林、昆明、成都、重庆、兰州、银川等 100 余座大中城市和 1000 余座县城。这些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对新中国各方面建设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城市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情况十分复杂，接收和管理这些城市，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为了顺利地接收和管理好这些城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发了许多指示，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早在 1948 年 2 月，中央工委就下发了《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随后，中共中央又相继下发了《关于解决新解放城市粮荒问题的指示》、《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中央军委也批转和下发了《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关于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给粟裕等电》，规定了接收管理新解放城市的一些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后，新解放城市日益增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接管城市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1948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军事管制期间的九项任务，即：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接收一切公共机关、

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恢复并维持经常的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和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的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指示指出：必须在上述各项工作以及其他若干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中共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管理，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事管制时期，一般应实行戒严，但戒严的目的是限制一切反动分子及破坏分子的行动自由，保障一切革命分子及革命群众的行动自由，绝不要因为戒严而妨害一切革命工作的进行。戒严也只在必要时临时断绝交通，或临时在夜间断绝交通，而不要经常断绝交通或进行封锁。随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各地军事管制的经验和意见，拟制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条例，规定了军事管制期间的各项政策，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颁布施行。

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东北局常委、东北军区副政委兼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关于《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甚好。陈云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各按系统，就是在军管会下设办公室、政务、财政、经济、后勤等处或委员会及市政府、公安局、卫戍司令部等部门，各按各的系统，对口接收新解放城市原有的各单位、部门；自上而下，就是军管会进城后，即以布告形式责成原有机关的主管人员负责办理移交手续，未办

理手续前，继续履行其职责；原封不动，就是旧机构的原有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代表，政权部门撤换头子，不打乱原有的工作秩序；先接后分，就是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没有占有权和支配权，原有资产、档案等一律不准搬走。陈云在这个报告中，还提出了迅速恢复城市秩序必须要解决的5个关键问题，即：立即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敌警察枪支；办好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并指出，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对入城部队进行良好的纪律教育。后来，中共中央又相继下发了《关于新解放城市对旧保甲人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关于对旧职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城市的一系列政策。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要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约法八章：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速捕，不加侮辱；为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军管会不能经营企业和工厂，故军管会在接收后应迅速将企业、工厂和物资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

的机关管理和经营；应委任解放军人员任税收局长，并由部队人员带领旧税收人员去收税，发给人民政府税收局的收条；应保护私人房屋的所有权，房客应继续交纳房租，租金由房客与房东议定，有纠纷者应由政府或人民法庭调解仲裁解决；每个城市的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与管理机关的争执问题，均须一律经过市总工会及市政府劳动局审查和处理，军管会及党的市委则须派得力干部去指导总工会及劳动局的工作，使其能有效率地解决一切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要求问题，同时并须告戒支部和区委及其他机关，不要不经请示任意处理劳资问题；应发动工人迅速改革官僚资本企业中的官僚机构和人事制度。

为了处理好接管城市过程中的外交问题，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19日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详细规定了接管城市中的外交方针和各项政策，并规定在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设一外交问题研究组，研究有关外国侨民及外交问题的各种情况，并搜集各项材料，负责向中央局作定期报告，提出应请示的问题和意见。

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各项城市政策和纪律，中共中央根据第四野战军进驻北平、天津的经验，于1949年5月5日专门下达了《关于城市驻军纪律问题的决定》，规定：在城市解放初期，卫戍部队应适当分散在市内驻扎，以便保障社会治安与秩序，肃清流散的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但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应驻扎在中外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及公馆等公共场所；部队进驻城市后，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要接家眷来城居住。并重审：去年12月20日“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中“非经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特许，不得设立私人公馆”，“严格禁止一切霸占、争夺、移走、拆毁公共房产家具、设备的行为”，“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不容许有不守纪律及贪污和腐化的现象”等规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解放军入城后，群众进行欢迎慰劳，有计划地组织若干次戏剧、电影是可

以的，但不得过事铺张，不要规定澡堂、理发店、剧团、电影院开放若干天免费慰劳解放军，以及半价优待等，因为这违背了本军买卖公平的原则。

（二）各中央局和野战军所作的有关指示和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各野战军、有关中央局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别下发了有关的指示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军事管制、接收和管理城市的各项政策和做法。华东局在1949年4月1日下发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详细规定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设置、任务；对接管城市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以及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和其他各种公共企业、私人企业及民族工商业、一切反动组织、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人民币的使用、税收、公房、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等一系列的政策，指出：对收复的人口在5万人以上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军管会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肃清反动武装的残余势力，恢复并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正当的权利，建立革命政权，保证城市政策的正确的执行与有秩序地进行各种接管工作，将工人职员、青年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在上述基本任务大体完成，城市秩序安定，一切市政机关建立并经过上级批准以后，始能取消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要有足够的经过专门训练的、纪律良好的、有相当城市知识的专门的警备部队和公安武装，以便看守工厂、仓库、机关、公共建筑物和巡逻街道，防止特务破坏。军管会入城后，应首先注意恢复电力供给，迅速解决金融物价，迅速恢复交通秩序，迅速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

各野战军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各自以往的经验，分别制定了城市纪律守则。如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于1948年12月23日，颁发了《关于入城纪律守则的训令》，规定了17条纪律，即：遵守军管规定，不能越规行动；私人工商财产，绝勿滋扰侵犯；公营企业商店，人民政府接办；电灯公园车站，不准破坏打烂；学校医院教堂，不要驻扎里边；敌人仓库机关，反对乱搬乱翻；采买物资用品，强购必须严禁；逮捕管押人犯，要经专门机关；图书文件档案，不得焚毁撕乱；维护秩序治安，无故打枪严办；城市治安指挥，不得无理抗违；严守军事机密，不得胡说乱吹；注意军容风纪，穿衣戴帽整齐；接触少数民族，尊重他们风俗；爱护本军名誉，不准嫖逛娼妓；注意清洁卫生，不得到处便溺；遵守三大纪律，实行八项注意。

华东局在1949年4月1日下发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指出：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的纪律好坏，特别决定于部队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实执行政策与能否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因此一切部队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一切接管机关从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干部直到勤杂人员，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经验教育。指示规定了一切部队干部和接收人员必须坚决遵守的10项守则，即：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佩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一切接收人员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统一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零件；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

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速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一切入城的机关和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外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办法，严禁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市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和练习射击，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第三野战军于4月1日以命令的形式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作为全军指战员、工作人员进入城市生活行动的准则。三大公约是：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建设；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十项守则是：无故不打枪；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不准车马在街上乱跑；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买卖要公平；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不准在墙上乱写乱画。

5月5日，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接管南京出现的一些问题，下

发了《对外交政策及城市纪律的具体规定》。其中对外交政策的规定是：凡属涉及外国人问题的任何细小事件，一定要事先请示并得前委以上机关批示后，方可去执行；任何人不得进入外国人住宅及使馆；不得向外国人表示有侮辱的言论与行动；负责保护外侨的部队，必须由主要干部率领；敌特在外国人住宅区行凶作恶时，应将其逮捕，以明真相，免被其嫁祸于人；外国人向我攻击时，我可采取自卫手段，但不先打第一枪；不住外国人的房屋和教堂；对奉公守法的外国人，不要干涉其行动自由，不要公开采取监视态度。城市纪律的规定是：凡住城市部队的牲口一律不准入城，必须以师为单位住在郊外，担任一定运输任务；部队不准住民房；对自来水、抽水马桶、电灯、电炉、电扇等采取实地教育办法，组织轮流观看并当面讲解使用、保护方法；组织营房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确立并严格请假制度；演习在街上行进法，成习惯；提倡首长负责，大家监督，遇事注意，及时抓紧等作风，反对互相包庇和目视无睹的现象；提倡遵守纪律的风气；整理军容，提倡礼节，强调军人严肃性；部队入城后一定要听从军管会指挥，尤其房屋、用具、车辆不得各自强占。

第四野战军于5月13日下发了12条入城纪律，要求在进入江南各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进入北平、天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原封不动以待接收。力戒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为此，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城市政策的各项指示，规定了如下的入城纪律：凡市内卫戍勤务、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共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管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藉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各机关部队不得擅自捕人；保护外侨，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

管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尤其要谢绝各阶层人士向军队个别人员所送的礼品和邀请吃饭赴宴；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中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场所，对公共房屋建筑及家俱设备，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宜入城，必要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应出城，在城郊外择地养喂，禁止在市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皮，驻城市的牲口，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市外组织马场喂养；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者，须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整顿军容提倡礼节；部队担任警戒时，应认真履行职责，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关于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和纪律的指示、规定等，使人民解放军参加城市接管有了行动的准则和规范，也为顺利接管城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参加城市接管的基本情况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制定的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和规定的纪律，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协助地方党政人员对解放的县以上城市进行了接管。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战略区和各部队在进入城市前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对将要进入的城市的政治经济状况、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特点

进行调查研究。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军管会的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班子，确定担任城市警备、卫戍任务的部队。预制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政策的布告、通行证、机关招牌、图章等，以便进入城市后能马上办公。制定接管计划和军管会工作要点等。如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早在1949年2月即制定了《准备接收西安的初步计划》，要求城工部继续搜集、调查并编发关于西安各方面情况的材料，编发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政策的决定、指示，各大城市的接收经验、接收情况在内的政策经验汇编材料；确定了军管会的组织分工及组织配备：军管会下设立政务、财政、农林、金融、工商、企业、交通、后勤、文教、公安、秘书等11个处和卫戍司令部、市政府等部门，初步规定了各处、各部门的人员数量；提出要做好对入城干部、警备部队的选调、训练和物资准备等项工作。同时，制定了《西安市军管会各处工作计划要点》，明确规定了各处、各部门的任务和工作职责，其中规定警备司令部的任务是：在军管会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警备区内一切城乡市镇治安与交通，及搜剿残敌散匪，处理俘虏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党政军人员，及首脑机关安全；看管警备区内一切敌伪机关、学校、工厂、公共场所、车站、仓库、飞机场和重要敌特战犯住宅等；戒严期间派队在重要街道警戒及管制交通；纠察制止或依法逮捕一切不遵守纪律之人员及破坏、扰乱治安分子和协同有关机关逮捕敌特、战犯；登记一切民用、军用汽车和制发汽车通行证；协同公安机关管制妓院，检查旅馆、饭店、客栈、公共场所及清查户口；接管国民党军西安警备司令部系统各单位，并将接收情形报告军管会军事处。

各战略区在普遍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基础上，着重对接管人员和部队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和生活常识教育，使全体人员充分明了城市政策和纪律，基本学会城市生活方式，并在自觉的基础上，发动干部战士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计划和措施。担任城市警备、卫戍任务的部队，还进行了城市值勤演练。同时，

针对由长期的农村环境转入城市生活后可能产生的贪图安逸，追求生活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情绪的情况，反复认真地进行了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防止和克服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树立了不仅要占领而且要接管好城市的思想观念，许多部队还开展了比入城纪律、比执行政策、比管理水平的立功竞赛活动，激发干部战士做好接管工作的积极性。此外，各战略区还为即将进入的城市筹集充足的货币和城市人民急需的粮食、煤炭等物资。认真细致的准备，为顺利接管城市打下了良好的组织、思想和物质基础。

各部队进入新解放的城市后，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一般由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和地方党政负责人组成；对以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和平解放的城市，在成立军管会时，还适当吸收在该城市起义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参加，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例如，1949年4月28日成立的南京市军管会，由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5月7日成立的杭州市军管会，由谭震林任主任。5月18日成立的武汉市军管会，由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5月24日成立的西安市军管会，由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5月27日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由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8月17日成立的长沙市军管会，由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8月24日成立的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任主任。8月26日成立的兰州市军管会，由张宗逊任主任。9月8日成立的西宁市军管会，由冼恒汉任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9月26日成立的银川市军管会，由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任副主任。10月21日成立的广州市军管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任副主任。11月22日成立的贵阳市军管会，由苏振华任主任，赵健民任副主任。12月3日成立的重庆市军管会，由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1950年1月1日成立的成都市军管会，由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陶秀峰任副主任。3月4日成立的昆明市军管会，由陈赓任主任，

周保中任副主任。

为维护城市社会治安，打击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在军管会领导下，新解放的城市普遍成立了警备司令部，由军队相当一级的领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如南京警备司令部，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西安市警备司令部，由张经武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武汉市警备司令部，由萧劲光任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兰州市警备司令部，由郭宝珊任司令员，李宗贵任政治委员。西宁市警备司令部，由兴中任司令员、曹光琳任政治委员。银川市警备司令部，由阮平任司令员，杨银生任政治委员。贵阳市警备司令部，由汪乃贵任司令员，胡居华任政治委员。重庆市警备司令部，由王近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都市警备司令部，由张祖谅任司令员，袁子钦任政治委员。

新解放城市的军管会成立后，立即张贴各种布告，召开各界进步人士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方针、政策，稳定人心，并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法和事先确定的分工，对城市中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全面的接管。在接管过程中，各接管人员依靠人民群众，严格执行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反动党团组织和特务机关，明令其一律解散，没收其一切公产、档案，严禁其进行任何活动，并饬令其成员到军管会指定的专管机关进行登记。对国民党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彻底破坏，按其原有系统全部接收的方针，分别接收。对物资、档案等进行清查整理，对旧公务人员，进行登记、审查、组织学习，并根据“清除少数的首要坏分子，改造多数的有用人员”的方针，除对少数劣迹昭著而为群众所不满者加以清洗及依法处理外，一般均给予妥善安置，或教育后留用，或送一定的教育机关去学习，或协助转业、就业，或资遣还乡生产。在接管工商企业

过程中，严格区分了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界限，对民族资本及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坚决给予保护和扶持；对官僚资本，严格执行了不打乱企业原有组织系统的原则，只派军代表去进行监督和领导，但不直接管理生产，对其一切组织、制度、人员、待遇等均暂不变动，企业原有负责人，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并继续愿意服务者，仍令其担任原职务，继续工作，只有在企业负责人已经逃跑，或者劣迹昭著，为大多数人所反对者，才从本企业另选人代理，以保障生产能够继续进行；对一时搞不清其全部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则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的办法处理。对文教卫生部门，除撤换个别坚决反动的负责人，封闭反动的报刊、杂志，禁演内容极其反动的电影、戏剧外，均采取严格保护、暂维现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争取这些部门能尽快出版、复课、演出、开业。

由于各接管部门和人员严格执行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的方针、政策和接管原则、方法，使得接管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一般城市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即完成了城市接管。例如，南京市军管会共接管原国民党行政、立法、司法、党、宪、警等单位749个，原南京市政府及下属单位174个；文教机关、科研、大中学校45所，小学173所；工厂、银行、邮电、交通部门等50个；接管房产994处，代管936处；各种火炮800余门，枪10万枝，子弹2000万发；金圆券715亿元，以及大量的物资。安置、处理旧职员和失业人员12万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属9个局又10个处；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411个，黄金2.46万两，银元36万块等资财；大专院校26个，新闻出版单位58个。国民党军联勤系统116个单位，3.46万人；空军系统12个单位，1220人；民航人员1455人，航空工程师40名；海军系统18个单位，仓库14个，技术人员154人。广州市军管会行政部门共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系统的单位137个；财经部门接管银行、工厂、仓库等78个；交通电讯部门接管电业、工厂等83个；文教

部门接管公立专科以上院校 8 所，中小学校 101 所，以及报馆、通讯社、文化馆、戏院等单位 29 个；军队系统接管医院、仓库等单位 87 个。加上其他单位，共计 534 个。重庆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系统单位 109 个；军事接管委员会接管单位 37 个；公安部门接管单位 24 个；后勤接管委员会接管单位 89 个；财经接管委员会接管单位 69 个；交通接管委员会接管单位 34 个；文教接管委员会接管单位 217 个。总计 579 个。接收黄金 1.09 万两，银元 12.4 万块，飞机 30 架，汽车 2045 辆，各种火炮 480 门，各种枪 1.1 万余枝，以及其他大量物资。

各城市的军管会，在全面系统地进行接管城市的同时，还为维护治安、安定秩序、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更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是打击国民党特务、残余军警以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安定社会秩序。各城市解放后，均存留着大量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警察、帮会组织、惯匪、小偷等，国民党也有计划地留下一批特务。如南京在解放前，国民党 11 个特务系统公开的特务组织就有 22 个单位，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南京前，留下了 3 万以上的特务与散兵游勇，还从监狱中放出 2000 余名悍盗惯窃。上海解放后，国民党留下了 8 个特务组织 3 万余人，流散在社会上的国民党军官兵近 2 万人，还有大量的惯匪、流氓。广州解放后，全市尚有国民党散兵游勇 10 万余人，旧警察和常备自卫队员 1 万余人。国民党特务部门还常将流散到港澳地区的散匪有组织地派往内地，有时一天就达 400 余人。重庆解放时，约有特务 6000 至 1 万人。这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竭力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活动。他们有的公开持枪抢劫；有的公然收罗残兵败将，建立反动武装；有的流窜街头巷尾，纵火、投毒暗杀、袭击哨兵，为非作歹；有的还冒充军管会接管组织和接管人员，到一些单位进行所谓的接管，偷劫财物，制造混乱。一些惯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人员也乘机作恶。据不完全统计，西安市在 1949 年 6

月份即发生抢劫案 70 余起。上海刚解放时，每天发生的各类案件达 500 起左右，其中在上海解放的头 20 天内，发生重大抢劫案 50 余起，还发生了重大的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奸杀外侨案等。广州解放后，抢劫、杀人等案件最多一天达 46 起，并发生国民党特务将炸弹扔进市政府院子中爆炸和袭击叶剑英座车的事件。

根据这种情况，各城市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在成立后，立即张贴布告，饬令一切特务、帮会成员、反动分子停止作恶，解散组织，收缴武器，到军管会或警备司令部指定的地点登记，等候处理。各城市警备部队大力加强各城市的警卫，保卫首脑机关、仓库、重要设施和企事业单位的安全。上海一解放，警备部队即在全市各重要目标和全长约 400 公里的 40 多条街道，设立岗哨 5000 余处。同时，各警备部队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采取武装追捕、秘密侦破和公开搜捕等方法，严厉打击和镇压国民党特务和坏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南京市警备部队和公安机关在刚刚解放的 1 个月内，共破获重大特务案件 124 起，逮捕国民党特务 400 余人，缴获电台 23 部和大批枪支弹药、器材、密码文件。西安市警备部队和公安机关在 7 月份的 20 天内捕获了大批特务，破获抢劫案件 36 起，从 5 月 20 日西安解放至 9 月 30 日的 4 个月间，先后破获了“中国派遣军”、“中国反共抗俄太行突击军”等 9 个反革命阴谋暴乱组织，和 29 个国民党特务潜伏组织，缴获了一批电台、武器和弹药。上海市警备部队在 6、7 两个月内，破获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 1 纵队”、“东南反共救国军”、“青年救国军第 5 纵队”等反动组织 40 余个，收容散兵游勇 3 万人，资助疏散难民 30 万余人。并于 6 月 29 日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国民党特务、盗匪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4000 余人。取缔了以青帮、洪帮为主的一批流氓帮会组织，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基本肃清了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广州市警备部队和公安机关在 1949 年 11、12 两

个月内，共破获抢劫、偷窃等案件 1000 余起，收缴各种枪支 2500 余枝，处理散兵游勇 2 万余人，取缔和解散了冒牌的接管组织，收容这些组织的人员 800 余人，收缴他们私自藏匿的枪械 600 余枝。重庆市军管会在成立后的 1 个半月多的时间内，共破获抢劫、盗窃、贩卖毒品、冒充人民解放军等各种案件 735 起，逮捕继续作恶的、包括 200 余名国民党中统区室主任、军统组长以上在内的 1300 余名特务土匪。成都市军管会在 2 个月时间内，破获重要特务案件 66 起，逮捕继续作恶的国民党特务 141 人，搜缴电台 18 部、短枪 62 枝。同时破获抢劫、盗窃、暗杀等案件 715 件，收容散兵游勇 5700 余人，收缴非法枪械 2600 余枝，各种炮 9 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解放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

二是打击奸商投机，稳定市场物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融投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无法解决的经济“毒瘤”。各城市军管会成立后，即着手解决这一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毒瘤”，加强对金融的管理。首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布告，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市民持有的金元券等国民党时期的货币以一定比价兑换人民币。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但是，一些地下钱庄和金融投机商人却乘机兴风作浪，他们公开散发假情报、假消息，制造谣言，称人民币为伪币，煽动市民拒绝使用人民币，扰乱金融秩序。不少市民听信谣言，同时由于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拿到人民币后又去兑换银元、大米。投机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引起物价迅速上涨。如上海市原本 1 块银元可兑换 100 元人民币，1 星期后就涨到 1400 元。物价几乎失控，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上海工商企业的复工、复业和发展，影响到市民生活，而且影响到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物价的上涨。为了使价格回落，上海市财经委员会于 6 月 5 日向市场抛出 10 万块银元。同时，电台、报刊开展宣传，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自恃资金雄厚，将 10 万块银元一吸而空。6 月 7 日，1 块银元继续涨到兑换 1800 元人民币。南

京市的物价，7月20日物价指数较5月份全月平均上涨647.1%。这种情形，严重威胁经济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针对上述情况，各城市军管会对金融投机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1949年6月10日，在上海市军管会的统一部署下，出动2个营的部队和400余名便衣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查封了奸商和投机分子活动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将250余名主犯一网打尽。此举不仅使上海第二天的1块银元值2000元猛跌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而且震动了江苏、浙江及至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南京市军管会在6月9日前登记1400余名银元贩子的基础上，于6月10日至7月10日又开展了大规模的禁止银元交易的活动，解散了银元交易所，查获违法卖买银元犯1143人。武汉市军管会动员数千工人、学生上街，开展群众性的拒用银元的宣传活动；并抽调250余人组成“便衣金融检查队”，严厉打击金银投机活动，从6月22日至7月8日，逮捕300余名投机商，没收银元1万余块，黄金100余两。广州市军管会于12月5日出动警备部队、公安总局干部和工人纠察队共5000余人，分兵8路，搜查了地下钱庄的大本营——太平南路十三行一带的130余家地下钱庄，和分布在全市各街道的专门贩卖银元外币的街边档铺700余家，拘获进行大规模金融投机活动的老板、柜头1100余人，震慑了奸商。次日，在军管会和市政府的组织下，全市2万名工人、学生，采用花车、秧歌等形式，开展拥护人民币，拒用港币的宣传活动。同时，人民政府派出人员，检查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使用情况。由于采取上述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人民币的信誉、地位迅速上升，物价迅速回落，到12月6日，人民币兑换港币的黑市价格即与公开价格取平。在打击奸商和金融投机分子的同时，各城市的军管会还从老解放区和农村调集大量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并紧缩开支，开办合作社，动员市民储蓄。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得各城市的金融秩序得以迅速恢复，人民币的信誉

日益提高，市场物价日趋稳定，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三是协助人民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国民党残酷压榨和掠夺下，旧中国的工商业基础十分薄弱，发展缓慢，再加上国民党在逃离各城市前，对城市的工商企业和基础设施进行了疯狂的破坏，使得各城市的工商业在解放时已处于解体、瘫痪的状态。上海是旧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但在解放前夕，也已陷入了半解体的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停工80%以上，面粉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10%。面对这种形势，各城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就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他们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迅速恢复电力、交通，保证各工矿企业能尽快开工；没收官僚资本企业为国家所有；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指导方针，积极帮助和扶持私营企业和民族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至1949年底，没收和开工的官僚资本企业，已占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的40%，控制了全国的电力、煤炭、钢铁、水泥、交通运输业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私营工商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各城市军管会派出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到工矿企业担任领导职务或军代表，他们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工人失业问题、劳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部队担任重要工矿企业的警卫任务；清除城市中影响生产的各种障碍；抢修被毁坏的发电厂、钢铁厂、粮食加工厂和被炸毁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通讯设施和其他重要市政设施。这些都对城市的复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警备部队在上海解放后2个月的时间内，排除地雷2.4万余颗，拆除碉堡1800余座。南京警备部队在3个月中，出动干部战士2.3万余人次，与人民群众一起，抢修长江堤岸88公里。参加接管浙赣铁路沿线各城市的第二野战军部队，积极参加了铁路和桥梁的修复工作，并组织了数万军民，抢修了南

昌附近赣江下游江堤。驻陕西的部队与西安地区的人民群众，奋战1个月，抢修了西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军炸断的7座桥梁，抢修了毁坏的西安至临潼、渭南、华县、咸阳的有线电路，保证了交通和通讯的畅通。武汉解放后，军管会即组织部队和民工打捞与抢修被国民党军炸毁与破坏的船舶6000余吨位，抢修平汉铁路郑州到汉口段被破坏的11座桥梁、170余公里的电线。工兵第4团奋战12天，修复了汉口至黄陂公路上2座分别长128米和86米长的桥梁。驻广州的铁道工程第3支队在铁路员工的配合下，奋战6个半月，修复了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炸毁的海珠大桥。

参加城市接管和担任警备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人员和部队，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警惕性，胜利完成了城市接管和警备任务，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了城市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而且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部队入城后，处处为市民利益着想，做到了不入、不住民宅、商店，不扰市民，许多部队露宿街道两旁。骡马均不进城，部队所需物资大部由人工运输，不少部队在市外做饭后，送到在城里值勤的部队，有的甚至在离城10余公里之外向城里部队送饭。没有碗筷，就用报纸打饭，钢盔打菜，用手或树枝等吃饭，也不借用市民的物品。没有柴草烧开水，就喝凉水。在币制改革前，不买物品，没有菜吃，就用盐水拌饭；币制确定后，也不随便购买物品，避免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不接受馈赠，谢绝任何慰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负责工厂、仓库等地警卫任务的部队，秋毫无犯。他们宁愿冒着大雨站岗，也不用仓库中堆满的雨衣、油布；宁可赤着脚放哨巡逻，也不拿仓库、商店中的鞋穿；宁愿挨饿，也不随便动用仓库中的贮粮和一个罐头、一块饼干。驻在少数民族聚居城市的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担任外事机构、外侨较多地区警备任务的部队，严格执行外交政策和外事纪律。对守法的外侨给予保护，对违反人民政府法令，有意进行破坏、挑衅的交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各部队还利用值勤、训

练的间隙，帮助市民群众建设家园，修复被国民党军逃跑和作战时毁坏的房屋、校舍、商店等，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人民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爱戴、拥护和支持，从而为顺利接管城市和建设城市提供了群众条件。

第二节 清剿土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新解放区的匪情及解放军的剿匪方针和政策

（一）新解放区的匪情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他还着重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①事实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追击后，蒋介石预感到其在全国总失败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他在匆匆部署撤退台湾的同时，有计划地进行“应变部署”。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所谓的“战时施政方针”中，提出要“实行军政配合，加强省县职权，发展民众武装，进行敌后游击，贯彻总体战”。^②这里所说的“民众武装”，就是政治土匪；所谓“军政配合”、“敌后游击”、“贯彻总体战”，便是以特务、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65页。

^② 1949年8月6日，新华社社论《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匪与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相勾结，以政治欺骗和武装捣乱相结合，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群众进行袭扰破坏，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为此，他们在南京被解放后，即在四川成都和贵州贵阳举办了多期“游击干部研究班”，先后培训特务骨干 4700 余人。

这些特务骨干在训练结束后，携带大批武器潜入各地，勾结恶霸地主和反动会道门，网罗反动军官、旧官僚，纠集反动地方保安团队、地主武装及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和惯匪，组成“反共救国军”、“自卫军”、“游击总队”之类的土匪、特务武装。这些土匪、特务武装，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和反动军官为领导，以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欺骗和胁迫部分落后群众，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与新生的人民政府相对抗。据 1949 年 7 月份统计，在华东地区共有陆匪 11.3 万人，大部活动在浙江、闽北和安徽大别山地区。在中南地区，解放较早的河南、湖北和江西地区，有股匪 11.7 万余人，主要活动在伏牛山、大别山和赣南地区。解放稍晚的湖南、广东、广西地区，匪情更为严重，1949 年底，有股匪 20 万余人，主要活动在湘西、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和瑶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地区。西南地区刚解放时的匪情更为严重，共有 1000 余股，65.5 万余人，其中四川有 300 余股；在贵州有 541 股，主要活动在瓮安、余庆、湄潭、金沙和石阡地区；云南有 148 股，主要活动在中越边界的蒙自、文山及玉溪、易门、通海等地；西康的雅安、西昌、总岗山及大渡河沿岸也有大量股匪活动。西北地区有较大的股匪 470 余股，约 22 万余人，其中陕西 160 股，3 万余人，主要活动在陕南、关中地区；甘肃 140 余股，3 万余人，分布于临夏、陇东、陇南和河西走廊地区；青海 105 股，1.5 万余人，主要活动于大通、门源、贵德地区；宁夏的贺兰山有股匪 24 股，约 3300 余人；新疆 50 股，5 万人，主要活动在北疆；在青甘新和青甘川交界地区也有股匪活动。

在刚获得解放的地区，土匪特务疯狂地进行暴乱破坏活动，残

杀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袭击地方区乡政权和解放军小分队，破坏交通、毁坏通讯设施，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大别山地区有 14 个县基本被土匪武装所控制，土匪武装还一度占领了福建省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屏南，云南省的新平、牟定和贵州省的正定、道真、沿河、雷山等 30 余座县城。1949 年底，溃散在青海各地的马步芳残部的反动军官，纠集散兵游勇，在大通、门源、湟中一带近 10 个县内发动暴乱。1950 年 1 月，国民党特务在四川、西康地区组织大规模武装暴乱。3 月份前后，广西省就发生土匪袭击基层政权 280 余次，有 68 个乡、5 个区、3 个县的政权被摧毁。湖南、广西、广东三省，发生土匪袭击解放军小分队事件 86 起，被杀害达 800 余人，抓走 1000 余人。湖南邵阳匪首陈光中，亲手杀害了 200 余名无辜群众，奸淫妇女达 400 余人，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至于被一般股匪杀害的贫民百姓更是难以计数。1950 年 1 月，湖北、湖南两省的各交通线发生抢劫货物 136 次，破坏铁路、公路 787 处；广东地区各级政府，在 1950 年第一季度遭匪特袭击近百次，有 2 个县城、6 个区政府被围攻，86 个乡政府被土匪摧毁。仅 1950 年 1 月份，华东地区各级人民政府遭匪特袭击就达 100 余次；在苏南地区有 120 余名干部被匪特杀害。西南刚解放时，成都至重庆、重庆至贵阳公路上的车辆和泸州至重庆的江船屡遭抢劫，水陆交通经常中断，一度造成成都、重庆等城市粮食供应困难，仅 1950 年 1、2 月份，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部队小分队，就损失 3000 余人，其中第 60 军第 179 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成都东北龙潭寺执行任务时，遭土匪袭击，被灭绝人性的匪特挖眼、割舌、掏心；该军的一个司务长被土匪捉住，活活煮死；在仪陇，匪特一次投毒就使 3800 余人严重中毒。在这一时期，云南、贵州有数百名干部被匪特残杀。

严重的匪情使群众难以发动，新生的人民政权难以巩固，政策难以推行，生产和经济工作难以恢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人

民群众强烈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消灭匪特，根除匪患。

（二）解放军剿匪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各地区匪情十分重视，适时作出了坚决剿灭土匪的决策。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在南方，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等，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后来，毛泽东又指出：“当前全国人民的任务是迅速肃清残余反动力量与有步骤的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建设。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①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工作，并作出具体的部署。6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两篇短评。短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解放区的广大乡村，派遣大批特务，勾结当地反革命和地主恶霸分子，利用封建会门，组织土匪，烧杀淫掠，祸害人民，甚至袭击区村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武装，扰乱人民解放军后方的事实。指出：“不彻底肃清这些特务匪徒，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采取坚决的而又谨慎的步骤，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来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捣乱”。^②26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和各前线委员会、省区党委和解放军军师团委、地方地县委及各政府部门、各群众组织中的党组，转发了上述两篇短评，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并特别指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

^① 1949年8月10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关于剿匪政治工作指示》。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43～第344页。

为至盼。”^① 8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的社论，指出：在解脱国民党暴政的压迫之后，特务土匪便是人民当前最主要和最可恶的敌人，而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则成为各界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因此，发动大批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学生下乡，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动员广大农民，肃清土匪特务，推翻反革命恶霸分子的统治，安定秩序，发展生产，并进而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便必然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上，向全军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②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决定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的同时，还确定了剿匪的方针和政策。新华社在6月25日发表的两篇短评中提出：“对于查获的特务匪徒，应按情节轻重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对那些被胁迫参加，真心悔过的分子，可宽大处理，给以自新之路；对那些作恶多端，不知改悔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应该发扬人民民主政权的威权，严加惩办，为民除害。”^③ 新华社在8月6日的社论中，要求各地在剿匪过程中，必须抓紧时机，建立统一领导，有计划地配备力量，确实掌握情况，展开全面的而又有重点的清剿，不怕疲劳，不畏艰苦，长途奔袭，连续追歼，务期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必须发动群众，争取一切社会力量，组织剿匪反恶霸的统一战线，使整个斗争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一切实行剿匪的地区，必须做到肃清潜匪，收尽匪枪，捕尽匪首，瓦解匪众，摧毁匪特指挥机关，打倒通匪窝匪的反动恶霸。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41、第342页。

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44页。

求参加剿匪的部队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必须与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必须城乡结合，全面展开而又有重点的进行，以免土匪特务利用空隙，流窜城市与乡村之间。担任剿匪任务的部队，必须进行短期的政治和政策教育，确立为民除害，为民服务的决心，成为顽强的战斗队和能干的工作队。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确实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打击和瓦解土匪，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对付武装的土匪特务，一定要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予以沉重打击；同时必须展开政治攻势，宣传人民政府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自新土匪和土匪家属，利用各种形式，对土匪进行瓦解争取工作。对于土匪分子，必须区分首从，采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对于作恶多端，死不悔改分子，予以坚决镇压；对于作恶不多的胁从分子，予以自新机会；对立功自赎的分子，则可予以宽大待遇。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①。

二、解放军剿匪经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先后投入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空军各一部，共150万余人，在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在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股匪严重的地区，按照先内地，后边缘；先富裕地区，后贫困偏僻地区的顺序，逐块逐片地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在大股土匪被歼灭后，又对中小股匪展开分兵驻剿，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肃清潜匪，彻底根除匪患。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一）集中兵力，剿灭大股土匪

1949年下半年，各地区剿匪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在各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在这一阶段，各地区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按照先内地后边缘，先富裕地区后贫困偏僻山区的顺序，在周密侦察的基础上，对大股土匪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手段，彻底打乱其建制，摧毁其指挥系统，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此基础上，改重点进剿为分区驻剿。由于经过大规模的重点清剿作战，大股土匪被歼灭和击溃，小股土匪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不敢公开活动和对抗，被迫分散活动，以缩小目标，保存实力。他们或窜入各省边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深山密林、云崖岩洞便于藏身和社会情况复杂的有利条件，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继续顽抗；或乔装打扮，插枪为民，与当地地主恶霸等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秘密串连，发展武装。针对这一情况，各地区剿匪部队改重点进剿为分区驻剿，以分片包干的办法，加强面的控制，使分散的土匪无法集中成股。在驻剿过程中，各剿匪部队还根据不同的地形特点，采取不同的战术。平原地区的驻剿部队，采取与民兵相结合，实行县与县、区与区、村与村之间的联防，一个地方发现匪情，多方组织围追堵截，使土匪无处藏身，纷纷被歼或投降。山区的剿匪部队，则根据山高林密，岩洞众多，土匪又熟悉地形，且多流窜于各省区边沿交界处活动等特点，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成军队、地方联合剿匪指挥机构，采取点面结合，小型合击，反复会剿。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使零星散匪和小股土匪投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剿匪的部队，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揭露土匪的欺骗宣传，使土匪失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这一阶段各地区剿匪的基本情况是：

1. 华东地区。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先后抽调5个军部、19个师、1个旅又15个团以及海军一部参加剿匪作战。

渡江战役结束前后，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即开始抽调部队在新解放地区展开了剿匪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9年7月，苏南、浙江大陆全部解放后，华东局于29日发出剿匪指示。指示要求，凡是有大股国民党匪帮和土匪活动的地区，各军区和军分区应迅速定出全盘清剿计划和部署，指定坚强的军政干部并结合有关部门组成统一剿匪指挥机构，以便协同动作统一步骤，达到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武装的目的，特别是要注意对各地区结合部之山区和湖沼地带的清剿；野战军应以团、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农村进行清剿。指示强调，各地区要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欺骗、谣言，每个干部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是肃清匪患取得剿匪胜利的关键。8月9日，华东军区下达了秋季剿匪命令。决定在进军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第25、第24、第35、第23军和第20军各一部，在各地地方武装配合下，以浙皖边区和皖北、大别山之立煌（今金寨）地区为重点，尔后视情向浙赣边、闽浙赣边地区清剿。其具体部署是：第25军2个师共7个团，在浙江建德、临安军分区和皖南宣城、徽州（今屯溪）军分区的协同下，以杭（州）徽（州）公路两侧地区为重点，负责剿灭浙皖边之宣城、广德、安吉、余杭、桐庐、建德、淳安、歙县、宁国间股匪，尔后视机转向浙赣边清剿；第24军第71师和野战军骑兵团统归皖北军区指挥，协同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重点清剿立煌地区股匪；苏南军区附华东海军炮艇队，以剿灭太湖匪特为重点；第20军抽调部分兵力协助苏州军分区清剿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股匪；第23军抽调部分兵力，协助浙江第1军分区重点清剿嘉兴、吴兴、海宁、海盐、平湖和嘉善地区匪特，并派出1个团控制吴兴、长兴地区，防匪南窜；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剿匪，以第35军为主，由浙江军区统一部署；其他各地土匪由各地方武装负责清剿。

根据上述部署，从8月27日开始，各剿匪部队按预定计划，

在各自责任地区，对大股匪特展开重点清剿。担负进剿大别山股匪任务的第 24 军部队，在湖北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与中南军区各剿匪部队密切配合，从 9 月 5 日开始到 10 月，集中兵力对立煌地区进行重点清剿，先后歼灭股匪 6724 人，其中击毙 128 人，俘获臭名昭著的“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王宪，副司令樊迅、袁雁英以下 1565 人，投降 5031 人。

担负浙皖边地区进剿任务的第 25 军部队，在浙江军区第 4、第 9 军分区和皖南军区宣城、徽州军分区的协同下，采取以部分兵力控制要点，主力部队对股匪老巢采取“拉网合击”战术，全歼主要股匪“皖浙边区游击纵队”，击毙“纵队”司令徐振东，生俘副司令徐建中，并于钱塘江以北地区剿灭股匪洪国顺部。据统计，在 9、10 月的进剿作战中，浙江地区共剿灭股匪 1.58 万余人，苏南地区剿灭股匪 1000 余人，皖南地区歼灭 2800 余人，苏北和山东地区歼灭近 400 人。缴获各种小炮 53 门，掷弹筒和枪榴弹筒 47 具，重机枪 31 挺，轻机枪 287 挺，其他长短枪 1.24 余万枝，炮弹 5793 发，子弹 61 万余发。到 1950 年 1 月，华东地区共歼灭匪特 5.4 万余人，除山东、苏北因解放较早已无大股土匪外，苏南、皖南、皖北和浙江境内主要大股匪特基本被剿灭或击散，社会秩序已趋稳定。

1950 年初，在大股匪特被剿灭以后，华东解放军主力转入解放闽浙沿海岛屿。由于地方政权及武装初建不久，特别是在刚解放地区，地方工作更是比较薄弱，台湾国民党当局趁机向大陆及沿海回派武装特务 155 股，3700 余人。在国民党特务煽动、操纵下，各地土匪利用春旱灾荒，乘势又起，华东股匪迅速发展到 700 余股，5.7 万余人，尤以福建地区最为严重，发展到 200 多股，3.5 万余人。这些股匪，组织爆破队深入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地区，破坏铁路、公路、桥梁、工厂、仓库、机场、码头和军事设施。在宁沪杭地区，交通时遭股匪破坏，仓库被抢劫，地方政府和武装被袭击事件增多。这些股匪还利用大刀会等封建迷信组织进行反

革命暴乱。仅1至3月间，华东各地被抢走公粮1000万公斤，发生反革命暴乱210余起。

针对股匪势力重新回升和活动猖獗的情况，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于3月决定，除加强沿海地区的警备，阻绝股匪陆、海联系外，以闽浙边和闽浙赣边地区为清剿重点，对匪情一般的地区，以地方部队为主开展清剿。同时决定，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并抽调一部分连队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在各省边界地区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统一指挥边界地区的剿匪作战。在3至6月间，华东地区又剿灭了福建的“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漳厦游击司令部”，浙江的“国防部第3纵队”，苏南的“苏皖军区第3纵队”，皖北的“青年反共救国军”等股匪2.7万余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又叫嚣反攻大陆，加紧派遣特务武装窜入大陆，使华东匪特活动又呈猖獗之势，土匪人数又有回升。根据这种情况，华东军区于1950年8月召开剿匪作战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一年来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重申了剿匪的方针、政策，要求各剿匪部队切实做到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剿匪与反霸紧密结合起来；首先打掉主要股匪，然后再消灭边沿地区的土匪，做到剿一地净一地，打一股少一股。为尽速扑灭大股土匪，华东军区决定再抽调第22军第65、第66师分别进驻浙江穿山半岛和象山半岛清剿，第23军第67师进驻天台地区清剿，将福建剿匪兵力由8个团增加到12个团。各清剿部队灵活运用奔袭、合围、伏击、搜捕等战术，积极开展剿匪斗争。1950年10、11月间，第32军第95、第96师部队，在福建闽北地区歼灭“突击司令部特务团”和“闽北自救军第2支队”等重要股匪10余股。第29军第85师第253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连城地区连续进行19天清剿，歼灭“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歼匪400余人，活捉匪首中将总司令唐宗。

为保证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使东南地区

的剿匪牵扯太多的精力，尽早完成剿匪任务，11月17日毛泽东指示陈毅、饶漱石：“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并说：“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①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福建剿匪兵力增加到5个师，并从各部队抽调了1.2万余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乡村宣传发动群众，加强地方武装，扩大民兵队伍，使剿匪和土地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华东地区剿灭大股土匪的斗争，于1951年6月基本结束，共剿灭大股土匪16.85万人。

在捕歼陆匪的同时，华东海军部队在沿海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积极捕歼登陆海匪，攻歼岛屿匪特，解放一批海岛。仅1951年1月，就击溃和歼灭登陆海匪120股，歼匪1500余人。

在此时期，民兵武装发展很快，在剿匪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福建省统计，民兵发展到30万人，先后配合主力作战5829次；单独执行剿匪作战4514次，歼匪1778人；捕获匪首37人。

2. 中南地区。中南地区，因各地解放时间先后不一，匪患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据华中军区1949年6月统计，在已经解放的河南省有土匪424股，约3万人；湖北省有110股，约2万人；江西省有100余股，3.5万人；陕南地区有30余股，1.2万人。解放较晚的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匪情更为严重，据194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土匪20余万人。

华中局和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49年12月分别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从1949年6、7月开始，先后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69页。

调4个兵团部、12个军部、1个纵队（两广纵队）、46个师，以划区包干的办法，对中南地区的土匪展开大规模的清剿。

7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以第42军第125、第155师和第58军第173、第174师1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首先对豫西股匪展开清剿，经2个月的多次合围追剿，第42军部队于卢氏、朱阳镇及崤山以南地区歼灭土匪新1师、保6旅及“黄河”、“绥远”2个特务支队。第58军进剿部队给予土匪新2师和新3师以歼灭性的打击。接着，进剿部队东移伏牛山区开展清剿。至10月，大股土匪被基本歼灭，共歼匪3万余人。

湖北军区于7月27日至8月5日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并作出了具体部署。7月30日，湖北军区奉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指示，在黄冈地区组成鄂豫皖边区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由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任书记兼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皖北军区政治部何柱成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42军第126师、第24军第71师、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安徽警备第1、第2旅3个团，以及各有关军分区地方武装，对大别山股匪展开围剿。9月上旬，进剿部队由商城、罗田、滕家堡地区，以分进合击战术向匪巢金家寨压缩，股匪力避与剿匪部队作战，因此，只歼匪一部，大部逃脱潜伏。9月下旬，剿匪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采取内线控制要点，外线严密封锁，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驻剿；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经反复追歼、搜剿，至1950年3月，全歼大别山地区股匪1.5万余人。与此同时，湖北军区独立第1、第2、第4师等部队分别在兴山、秭归，宜昌以西，通山等地开展剿匪，9、10月间歼灭“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2军直属纵队等股匪。

江西军区于7月7日召开高干会议，具体部署了剿匪工作，确定进剿的重点是：赣东北地区的鄱阳湖和南浔铁路两侧地区，兼顾赣西北地区的云山、赣西的武功山和赣南的翠微峰、井冈山等地区。7月15日，各剿匪部队采取湖内进剿与陆地截击相结合的

战术，先后对盘踞各地的股匪发起进剿。至月底，各剿匪部队先后于幕阜山、棋坪山地区和永新、永丰、泰和等县，歼灭“湘鄂赣边反共自卫军第6纵队”、“赣西绥靖司令部”、“青年救国军”第18、第20支队等股匪1100余人。9月，担负赣南剿匪任务的第48军第144师，经周密侦察，严密部署，对长期盘踞翠微峰地区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股匪展开进剿，全歼土匪1800余人。到1949年底，共歼灭股匪7500余人，活捉主要匪首黄镇中、肖家璧，受到中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湖南剿匪作战开始于1949年8月，湖南军区以收编的方式解决了4.3万余人的游杂武装。10、11月间，第46、第47军部队分赴股匪猖獗的湘西、湘南地区开展重点进剿。经过近1个月的积极进剿，先后歼灭国民党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部“湘南纵队”、保1师谢声隘部和匪首陈光中所率的“湘赣反共救国军”等，共2.1万余人。到1949年底，湖南军区部队共歼灭股匪12.6万余人，其中收编8万余人，歼灭4.6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湘南和湘东北地区的社会秩序，为下一步开展湘西剿匪打下了基础。

中南大陆基本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于12月29日发出《关于1950年上半年剿匪指示》，决定从1950年1月起，所属各部队开展剿匪斗争。要求各军区根据当地匪情及本军区的兵力，制定剿匪的任务、计划和步骤。1950年3月上旬，中南军区又召开了高级干部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全区剿灭股匪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政军工作配合不力和松劲情绪。会议强调指出，剿匪斗争是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逾越的一步，必须把剿匪当作一项战略任务去完成。会议决定，各剿匪部队划地区包干清剿和打破省、地界限，组织边沿区会剿。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对端正剿匪指导思想，开展剿匪新局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月29日，中央军委向各大军区转发了中南军区清匪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并告诫各地区“要防止大股土匪剿灭之后，轻视散匪、潜匪并满足于一时平静现象的麻痹思想生长。”

根据中南军区指示，中南各省在1950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至3月，湖北军区剿匪部队在川陕鄂边、兴山、房县、巴东地区及鄂西长江以北大巴山以东地区歼灭“川陕鄂游击纵队”、湖北绥靖第1师、第18旅等股匪近万人。基本肃清了湖北境内的大股土匪。

1950年1月，湖南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剿灭股匪的斗争，在半年内歼灭全部匪特武装。会议以后，湖南军区集中第46、第47军和第38军第114师等部队及各地方武装，共20万余人，先后对八面山、长田湾、芷（江）怀（化）黔（阳）边区、麻阳、古丈、兴隆场、大（庸）永（顺）桑（植）边、江垭、武岗之股匪展开多次大规模合围作战。经过3个月的进剿，歼灭股匪2.2万余人，解放湘西8座县城及广大农村。4月上旬，根据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精神，湖南军区又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剿匪工作，决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地区的进剿，以湘西的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等为下一阶段的剿匪重点地区。会后，第47军等部再次对湘西地区的股匪进行了大规模会剿，至6月底，相继剿灭暂编第2、第4师等股匪1.5万余人，活捉暂编第1军军长陈子贤等匪首，基本肃清湘西中心区的股匪。接着，在湖北、四川、贵州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在湘鄂川黔桂边缘区及湘南地区的股匪展开会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湘鄂川反共救国军”和“华南反共救国军”等股匪2.3万余人，捣毁“湘鄂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湘南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第46军等部对湘南地区的股匪展开了重点清剿，歼灭“交警东南办事处”、“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新编第8军等股匪1.2万余人，俘中将办事处主任王春晖、中将司令陈光中等匪首。至此，湖南地区的大股股匪基本被剿灭。

1949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党代表会议，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要把剿匪肃特、巩固治安作为广东当

前军事工作的重要任务。12月12日，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联合发出《剿匪指示》，明确规定了剿匪第一阶段，以军事进剿为主，配合政治争取，对土匪开展分化瓦解工作的方针。1950年1月20日，广东军区又下发了《1950年剿匪计划》。遵照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的部署，第41、第43、第44军和第48军剿匪部队，在10万民兵的配合下，从1949年12月份开始，集中兵力，先后对西江、北江、东江及潮汕等匪情严重地区，展开重点会剿。到1950年5月，相继剿灭“交警教导第2纵队”、“西江反共救国军”、“粤中师管区第1纵队”、“粤南工作站”、“粤西忠义救国军第7支队”等股匪共5万余人，基本平息了广东地区的匪患。

广西是中南地区解放最晚、匪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3日，中共广西省委和省军区下发《关于肃清匪特的指示》，明确规定“搜剿匪特，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为全省工作的重点”。29日，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决定抽调第45、第49军和第38、第39军各一部担负广西境内剿匪任务。广西军区随即作出了剿匪的部署，从1950年1月起，各部队对盘踞各地的股匪展开全面进剿，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至4月，共歼灭国民党军残余武装1.5万人，收降国民党残余武装20余股1.4万余人。5至7月，广西军区又集中第45军及5个军分区部队对桂东南的大容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天堂山等地的股匪进行重点清剿。但由于没有正确运用“奔袭合围”、“匪变我变”，进剿与驻剿相结合的战术，结果未能给股匪以歼灭性的打击。

广西军区在这一阶段的剿匪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广西军区和剿匪部队对中南军区1950年3月高级干部会议精神理解不够深透，贯彻不力，以致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对土匪过于宽大，甚至出现了五擒五纵的情况。同时由于对匪情掌握和研究不够，过早地将主力用于守备城市周围及交通线两侧地区，形成分兵把口，分散守备之势。使得一些匪首得以喘息，重聚匪众，助长凶焰，组织暴乱，进行全面反扑。在桂北地区，不到1个月

的时间，土匪就疯狂地杀害区村干部和群众数百人，烧毁民房1000余间。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1月14日致电叶剑英和中共广西省委，严肃指出：“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要求广西省委“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并“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南局和中南军区要求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应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一切工作皆应服从剿匪的利益和要求。为加强广西地区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11月中旬，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达广西帮助工作，随后，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也到达广西指导工作。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为落实毛泽东和中南军区的指示精神，召开了第3次剿匪工作会议，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深刻检讨了广西剿匪工作中的失误，决定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全力以赴，首先消灭十万大山、大容山、大瑶山地区股匪。为加强广西地区剿匪力量，11月27日，中南军区决定抽调第21兵团由湖南前往广西剿匪，使广西剿匪兵力达到15个师、12个独立团，共约20万人。1950年12月至次年5月，广西军区剿匪部队经过艰苦努力，先后于大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和灵山、永淳、钦州等重点进剿地区歼灭“粤桂边反共救国军”、“两广反共救国军”、“广西游击联军”等股匪33万余人，胜利完成了剿灭股匪的任务，得到了毛泽东的嘉勉。

在此期间，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剿匪部队，在歼灭股匪的作战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中南全区共歼灭股匪47.8万余人。

3. 西南地区。西南地区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地区。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除大部被歼外，尚有一小部分溃散为匪，使得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59页。

西南地区的匪情更加严重。成都战役后，国民党特务土匪武装在四川、贵州、西康、云南地区，疯狂举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妄图建立所谓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进行军事破坏活动。

为迅速平息匪患，西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调集第3、第4、第5、第18兵团和西北军区第2兵团第7军，共13个军部、37个师另2个团的兵力，采取划地区包干办法，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具体部署是：第18兵团负责进剿川西、川北和西康地区之匪；第3兵团负责清剿川东、川南地区股匪；第4兵团及桂滇黔边纵队负责进剿云南地区；第5兵团除第18军担负进军西藏任务外，其余部队进剿贵州股匪。各进剿部队从1950年1月下旬开始，在各自地区对股匪展开围剿，到2月初，歼灭股匪2.3万余人。

1950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邓小平总结了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以来的情况，提出了今后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会议认为，剿匪已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剿匪生产”；剿匪工作应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剿匪部署上，会议确定，加强对各主要交通干线的守备，采取分段包干办法，集中兵力首先歼灭平原富庶地区大股土匪，尔后再逐步向边沿山区扩展；迅速净化四川腹地，以保证春耕生产，不误农时。会议以后，西南军区根据会议精神，对各进剿部队进一步明确了清剿重点。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根据指示要求，各军区和军分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各级剿匪委员会，并将一定数量的野战部队改为地方武装，大力开展地方工作。从1950年3月起，各进剿部队按部署对各地股匪展开重点进剿。

在川东，军区部队首先集中兵力围剿了涪陵、巴县、南川地

区的股匪，在1个月的作战中，歼灭股匪2.3万余人。接着又对武隆、彭水以南地区和贵州桐梓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对黔江、彭水、荣昌、永川、泸州等地组织了会剿。到7月底，川东清剿部队共歼灭股匪9.5万余人。9月以后，川东部队主力转向黔东北地区清剿，在各分区部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对川黔边区的道真、正安、务川、德江、沿河和印江、思南、江口、铜仁、松桃及梵净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和会剿，歼灭“黔东北人民自卫军”、“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和“西南剿共总指挥部”等股匪3.2万余人。在追剿作战中，由于粮食供应困难，部队经常吃不饱饭，没有鞋袜，就用草捆脚或干脆赤足爬山涉水，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到1950年底，共歼灭匪特19.3万余人，基本肃清川东股匪。

在川南，1950年3月，川南军区集中兵力对兜子山、螺观山、古楼山和桐子林、马边股匪展开重点清剿，经过1个月的积极作战，歼灭匪特1.6万余人。接着，又经过半年的作战，共歼灭股匪14万余人。从9月上旬开始，川南军区与调入泸州至宜宾线的第15军部队，联合对川康黔滇边的股匪展开清剿，歼匪2万余人。到12月底，川南地区共歼灭股匪29.3万余人。

在川西，剿匪部队于4月间镇压了龙潭寺、西板滩地区的两次大规模的匪特暴乱，歼灭匪特1.9万余人。随后，又对邛崃、大邑、总岗山区和双流地区股匪组织了多次围剿作战，至7月底，共歼灭股匪5万余人。8月以后，川西剿匪部队转向汶（川）灌（县）彭（县）边和川康边的羊儿岗、天台山以及懋功、抚边、绥靖（今丹巴）地区清剿，歼灭股匪2.6万余人。到12月底，川西军区全年共歼股匪8.3万余人。

在川北，军区进剿部队在三四月份歼灭股匪9305人，基本平息川北腹地的匪乱，但北部地区的匪情仍较严重。5月以后，川北军区采取分区包干清剿，经过3个月积极作战，歼灭股匪1万余人。到1950年底，川北大股土匪被全部剿灭，共歼灭匪特8万余

人。

在西康，西昌战役后，军区部队便集中兵力对雅安、西昌、康定地区采用分区包干办法清剿。各清剿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任务，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在1950年的剿匪作战中，西康军区部队共剿灭股匪1.5万余人。

在贵州，由于军区所辖范围宽广，兵力不足，又未能集中兵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清剿，因而开始阶段剿匪成效不大。3月，军区召开剿匪会议，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决定主动撤出27个县，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及经济富庶地区的股匪。4月份即歼灭股匪1.08万余人，取得较好成绩，到5月底，共歼灭匪特3.9万余人。从7月开始，贵州军区剿匪部队对盘踞石阡、雷山和黔南长顺、紫云、惠水地区的股匪展开合围，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和“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川黔湘反共自救军”、“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等主要股匪。在全年的剿匪作战中，共歼灭股匪19万余人。

在云南，由于云南是采取和平方式解放的，开始由于对土匪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加上起义部队不断发生叛乱，致使土匪数量迅速增加。楚雄地区的新平、易门、牟定、广通县城先后被股匪占领，玉溪地区的征粮工作被迫停止，蒙自、文山以及滇缅公路两侧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据5月份统计，云南地区的股匪人数已达4.5万余人。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云南军区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分片包干的办法，以第13军9个团，第15军第43师和第14军第42师等部，分别对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股匪展开重点围剿。各进剿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在积极开展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进行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部。到1950年底，全省共剿灭股匪6.2万余人，收复被股匪占领的县城10余座。残存土匪大部转向省县边沿和国境线附近地区活动。

西南地区军民，经过1950年的积极清剿，共剿灭股匪85万余人，社会秩序和人民生产、生活趋于正常。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非常高兴，于1951年1月28日复电说：“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①

4. 西北地区。为剿灭西北地区的土匪，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多次召开会议和下发指示，部署剿匪事宜，规定了剿匪方针和政策，先后调集了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和1个旅、3个团共10万余人，开展大规模地剿匪作战。

在陕西，1949年5月，西北军区召开了关中6个分区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部署剿匪。接着各分区部队对各地股匪开展清剿。至12月，共歼匪4000余人。1949年12月23日，第19军奉命对陕南川北股匪发起进剿。28日，第55师2个团以长途奔袭手段，突然包围通江、万源两城，守匪不战而降。1950年1月，第55师又兵分多路，先后对平溪坝、长坪、苦草坝、鸡背梁股匪展开搜剿，歼灭国民党残余及股匪8300余人，其中生俘“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以下6485人，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等1800余人被迫投降。21日，第55师又于南江官路口地区，歼灭国民党第127军第301师1700余人。与此同时，第19军第57师和汉中、安康军分区部队，先后于孙家坪、黄官岭、元木沟地区歼灭股匪“西安绥靖公署第3纵队”、“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保安第4旅等匪部共1.7万余人。陕南进剿部队在清剿作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遵照第一野战军前委的指示，采取军政兼施，区别对待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先后剿灭“忠义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等股匪，并争取6000余名匪徒投降。到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1950年8月，陕南股匪被基本肃清，先后歼灭匪特3.3万余人。与此同时，陕北军区于1949年下半年调集3个团，在各地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主要股匪高怀雄、段宝珊、张世华部展开3次连续清剿，至1950年6月，终于将上述股匪歼灭于内蒙古东乌审地区。至此，陕西地区除川陕甘边尚有小部股匪活动外，主要股匪基本被肃清。

在甘肃，该省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区，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民族仇杀事件。甘肃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特务勾结惯匪武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组织“反共民团”，疯狂围攻县乡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第4军第11、第12师及骑兵团于1949年12月中旬进入匪患严重的临夏地区，以分进合击和穷追堵击战术，于土墩、牛头墩地区歼灭马保、马八娃、马英贵股匪千余人。1950年5月，匪首马云山受胡宗南、马继援指使，由四川窜回平凉，在化平（今泾源）、固原、西吉、海原地区纠集地主恶霸和惯匪，拼凑起2个旅、19个团，加上被裹胁的群众，共1.3万余人，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于5月8日在平凉、西吉、海原同时举行暴动。为迅速平息匪徒暴乱，西北军区于5月23日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进剿部队在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应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特别应注意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并指示各进剿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甘肃省委和甘肃军区组成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骑兵旅、回族骑兵团和警备第2团等部，进至平凉地区清剿。至7月底，将叛乱股匪歼灭，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以下1200余人。在此期间，第4军平息了临夏股匪的暴乱，歼灭股匪2000余人。进入河西走廊地区的第3军，对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股匪发起9次围剿，剿灭匪特2100余人。

在宁夏，1950年初，宁夏军区独立第1师、骑兵第6师一部，

在三边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同心县西南的武当、麻黄沟、惠安堡一带作恶的“贺兰剿共总部”、“仁义军”等股匪展开进剿。至3月下旬，将其全部歼灭，活捉匪首张廷芝。3月，宁夏军区又集中3个多团，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深入贺兰山区对股匪郭栓子部展开围剿。经过艰苦奋战，于11月将宁夏地区危害最大的股匪全歼，生俘自称“贺兰王”的匪首郭栓子。

在青海，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残部逃往青海，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和西宁地区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形成几股较大土匪，共约6万人，成为西北地区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第1军平息了西宁周围地区股匪的暴乱，歼匪4000余人。1950年初，原马步芳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纠集20余名反动军官，在化隆成立“新编第82军”，马忠义自任军长，与民和县匪首马希统、马中福匪部遥相呼应组织暴乱。第1军和第4军一部奉命对股匪展开围剿。从2月下旬开始至7月，各进剿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终将股匪剿灭，匪首马忠义、马全彪、韩进禄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1000余人被迫投降。1951年5月，贵德昂拉地区藏民千户项谦在国民党特务操纵下，纠集匪特2000人，裹胁群众6700余人，公开与人民为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加错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但项谦执迷不悟，不断袭击解放军武装工作队，包围解放军驻地，并阴谋发动更大暴乱。1952年4月10日，西北军区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昂拉项谦匪部，自青海解放以来我即进行政治争取，迄今两年余毫无效果，近派喜饶副主席前去劝说，仍执迷如故，并且不断四出抢劫骚扰人民，袭击我军，更形猖狂。为防匪蔓延，巩固地方治安，同意一军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以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围剿项匪之方案，立即进行充分准备，争取于五月初完成全歼项匪之任务。”13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军区抽调了5个团、8个营和1个大队的兵

力，从5月开始，经17天的连续追剿，歼灭股匪1595人，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将股匪剿灭。7月11日，匪首项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

在新疆，新疆和平解放后，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勾结反动军官和惯匪，纠集匪徒6000余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5万余人，在新疆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暴乱。这些股匪长于奔袭，善骑射，有一定战斗力。在股匪骚乱严重的迪化、哈密地区，有11个县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心惶惶。1950年3月叛匪围攻伊吾县委机关，破坏道路、桥梁，阻击解放军支援部队，残杀干部战士27人，抢走长短枪28枝，严重威胁着政权机关和执勤部队的安全。3月13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坚决消灭乌斯满匪徒。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疆军区成立了以王震为总指挥，赛福鼎为副总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在北疆成立了由罗元发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抽调第2、第5、第6、第9军各一部与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共计1.5万余人，从4月份开始发起剿匪作战。在向大小红柳峡和前山子进剿作战中，歼灭股匪1000余人。5月中旬，清剿部队发起第2次进剿，在2个多月的追歼作战中，歼灭乌斯满匪部主力，毙俘股匪2700余人，生俘贾尼木汗匪首30余人，投降1.7万余人，解救哈萨克群众8.6万余人，取得剿匪作战的初步胜利。

1950年7月中旬，北疆景化、绥来、迪化地区先后发生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暴乱，土匪裹胁16个部落的哈萨克群众2万余人，成立“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根据匪乱情况，立即抽调第5、第6、第9军和骑兵第7师各一部，对股匪展开大规模清剿。至11月下旬，进剿部队转战8000余公里，歼股匪近7000人，解救全部被土匪裹胁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匪首乌拉孜拜、司迪克等被迫投降。从1951年9月至1952年9月，新疆剿匪部队还在奇台、迪化、木垒、孚远地区追歼谢尔德曼、哈通拜克、季奎、哈依沙、剃尼牙孜等6股土匪。至此，新

疆清剿大股土匪工作基本结束，共歼匪特 4.8 万余人，解救被裹胁群众约 11 万人。

（二）再接再厉，肃清残匪

经过大规模的进剿和分区驻剿，残存的匪特已为数不多，他们或占据海岛，继续进行顽抗破坏，或潜入深山密林，或钻入地洞，或逃往邻省邻县隐伏，伺机东山再起。针对这一情况，各部队除派出一批主力，对漏网的土匪组织清剿外，并派出大批工作队，结合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检举揭发和肃清隐藏很深的潜匪，彻底根除匪患。这一阶段各地区剿匪的基本情况是：

1. 华东地区。1951 年 1 月，全区结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区内残匪进行了有力地清剿，到 5 月底，又歼灭土匪 3.5 万余人，其中匪首 1570 余人。至此，整个剿匪工作已由集中兵力剿灭股匪，进入肃清散匪、潜匪时期。6 月，华东军区确定清匪工作主要由地方武装、公安部队和民兵承担，主力部队转入整训，并下达了《深入贯彻肃清散匪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清剿部队必须坚持长期作战思想，克服松劲情绪；各地党组织应加强对清匪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地方武装与公安部队、民兵的密切协同，实施有效地搜捕挖根；认真发动群众，坚决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做好匪属工作，订立清匪公约，组织好清匪联防，杜绝匪特赖以寄生之点。指示还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的整训，纯洁内部，不断提高战斗力。

在清剿散匪的斗争中，各地区清剿部队采取分区包干和区间联防的办法，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情报网，组成“飞行组”和武工队，配合公安部门对残匪进行追踪缉捕。并从各部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在福建地区，部队先后抽调 1 万余名干部参加地方工作；驻浙江部队则帮助地方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建立了 316 个武工队。由于组织严密，打击有力，无论土匪流窜到哪里，都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到 1953 年底，华

东地区的陆匪被全部肃清。

与此同时，华东地区还进行了清剿海匪的作战。由于该地区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历史上就是海匪盘踞的地方。这些海匪，专以在海上及沿海地区抢掠为生，大陆解放后由于受条件限制，解放军未能立即进驻，许多大陆逃亡的地主、恶霸，漏网的土匪和国民党军散兵游勇乘虚进入，勾结岛上的海匪继续作恶。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将这些岛屿和海匪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和武装力量，对他们加紧进行编组和训练，不断进行海上袭扰和登陆破坏。据 1951 年统计，浙闽沿海尚有海匪 1 万多人，占据大小 31 个岛屿，抢走渔船 110 艘，抓走渔民 800 余人，给渔业生产、海上运输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针对海匪活动的情况，华东军区指示沿海各地区部队，把清剿陆匪与消灭海匪结合起来，采取分区包歼登陆窜扰之匪。在各自防区内，以海防警备部队为骨干，地方武装和公安部门与民兵相配合，仅在 1951 年 1 月间，全区就歼灭登陆海匪 120 股，1500 余人。在歼灭登陆海匪的同时，海军舰艇部队和海防巡逻部队还积极开展海上斗争。在 1951 年上半年，部队先后在海上与海匪作战 33 次，歼灭海匪 300 余人，缴获匪船 26 艘、步机枪 170 余（挺）枝。海军舰艇部队进行海战 56 次，歼灭海匪 246 人，击沉、击伤和缴获海匪船只 52 艘。到 1953 年底，剿匪部队共解放沿海大小岛屿 50 多个，歼灭海匪 7800 余人，为巩固海防、发展渔业生产和海上运输做出了贡献。据华东水产部门 1951 年统计，1951 年上半年捕渔量达到 30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产 27.2%。

2. 中南地区。大股土匪被剿灭后，中南军区于 1951 年 5 月 1 日发出《关于今后清匪肃特的指示》指出：大股土匪被消灭后，对潜伏残余匪特的斗争仍然是一件艰苦复杂的工作，全体指战员必须深刻认识匪特和反动封建会门的阶级性，在土改未完成前，应时刻警惕匪特再起，防止麻痹思想的产生。指示还要求清剿部队继续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瓦解匪众，保证土改工作的

顺利进行，在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认真贯彻一元化的领导，对流窜边沿区的散匪，认真组织会剿，要主动配合公安部门深入了解与掌握匪特的活动情况，有准备的对阴谋暴乱之匪进行有力的打击。

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从6月份开始，中南各省清剿部队先后抽调了2.7万名干部和3000名老战士，组成若干精干工作队，深入各地区，进行发动群众，开展全面清匪反霸斗争。同时，组织若干“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捕捉匪首、散匪。对潜入深山密林中的散匪，各清剿部队结合政治攻势进行有重点的搜山清剿，将他们歼灭在封锁圈内，并争取部分胁从分子缴械投降。一些通匪、资匪的落后群众，在中国共政策感召下，主动协助捕捉潜匪，规劝土匪亲属向人民政府自首。通过群众性的清匪反霸斗争，歼灭和捕捉了大批的散匪和匪首。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3月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歼灭土匪11万余人，毙俘重要匪首190人。在搜捕作战中，各省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捕捉任务，独立作战2900余次，捉拿潜伏匪首2500余人。清剿散匪作战结束后，在各地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普遍成立了以地方武装和公安机关为骨干的“清匪治安委员会”，结合土改镇反开展清匪肃特运动，巩固剿匪成果。

3. 西南地区。到1950年底，主要股匪被歼灭以后，大量残匪流窜在省县结合部山区和滇缅（甸）边境地区。在四川西北、大小凉山及云南边沿少数民族地区，溃散土匪利用边区地形险要交通不便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潜伏，以伺机建立新的反动组织。他们挑拨民族关系，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有的还混入人民政府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据川东地区统计，在此期间，新发现反革命组织59个，破获反革命暴乱50余起，发生暗杀解放军人员及地方干部157次，投毒223起，纵火事件316次。各地土匪在扩充实力的同时，还极力与台湾联系，争取空投补给，妄图在四川边沿山区建立所谓“陆上台湾”。在1952年内，他们就接

受台湾空投 10 次，除补给物资外，空投特务 14 人，电台 13 部。活动于黑水地区的傅秉勋和川甘青边之马良匪部，在此时期均发展到数千人。这些土匪四处骚扰破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重建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匪情变化。1951 年 2 月 25 日，毛泽东看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后批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 3 月 15 日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剿匪部队认真学习川西军区的经验，普遍成立各级清匪组织和捕捉队，追捕匪特。并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地方武装，加强对重要点线和城市的守备，保证党在各地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1 年上半年，贵州军区协同云南、广西部队，对黔桂滇边、黔桂边组织了会剿；西康军区围剿了盐边、盐源地区的土匪；云南军区对滇西南之镇康、耿马、双江和滇南之红河地区进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战中，各军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联剿，在 1 至 4 月份的清剿作战中，歼灭土匪 7 万余人。到 1951 年底，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匪特 20 余万人。从 1952 年至 1953 年，剿匪部队在大力剿灭散匪的同时，还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会剿股匪战斗。1952 年 7 至 9 月间，剿匪部队继在川西北歼灭懋功地区股匪后，又以 9 个多团的兵力发起黑水剿匪战斗，剿灭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和接济的傅秉勋股匪 3600 余人，毙俘匪首傅秉勋和黑水地区反动大头人苏永和等人。6 月 20 日至 9 月底，云南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0 页。

区用3个多团，对滇越（南）边花龙地区股匪周光禄部展开清剿，全歼该匪2200余人。

1953年3月至5月间，西南军区除以4个多团兵力配合西北军区剿灭草地股匪马良部外，还争取阿坝大土官华尔功成烈交出窝藏流窜于川康甘青地区的“川康反共救国军”第3路中将总指挥、军统特务周迅予，中统特务何本初，“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总指挥”、军统特务王旭夫等匪首。经过1951年至1953年的清剿斗争，西南军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土匪24万余人，基本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土匪。

4. 西北地区。1952年底，大部股匪基本被歼灭以后，为彻底肃清西北边沿地区残匪，西北军区于12月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对甘肃、青海、四川边界地区残存土匪马良、马元祥部发起清剿作战。1953年1月21日，西北军区成立了以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并建立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调集了骑兵第1师、骑兵第1、第2团、甘肃军区和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第2团以及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伊尔—12型运输机5架），共计126个连，约1.9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又1个营的配合下，对残匪发动围剿。

1953年3月20日，甘青剿匪指挥部下达进剿命令：以骑兵第1师并指挥第32团为中央纵队，以骑兵第1团和公安第11团为左纵队，以骑兵第2团、果洛支队为右纵队。3月23日，各进剿部队按计划向预定地区挺进，27日，各部到达预定位置后，马良匪部窜向唐昆地区与刘华初股匪会合，马元祥部逃至巧料地区。28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根据过去剿匪经验：我剿匪部队应以驻剿、清剿与追剿相结合；加强各部之间通讯联络，驻剿部队（主要是步兵）应适当分布，占领城镇要点，构筑工事，防匪侵袭，并派出必要部队，向周围清剿散匪。追击部队（以骑兵组成），跟寻匪踪、猛追、奔袭，反复合围，不怕行军，不怕扑空，不使匪得到瞬息之喘息。在敌山穷水尽时方被我瓦解歼灭。”中央军委还

特别指出：“望教育部队要作长期打算，不全歼匪部决不休兵，并特别注意搞好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下层群众，争取中上层分子，并通过中、上层分子进行工作，这些都是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关键。”据此，西北军区于29日调整了剿匪部署。从3月29日至4月19日，各进剿部队在追击中歼灭股匪348人，击毙匪首马虎山。5月7日，骑兵第2团、青海独立团在得苦乎沟地区歼灭马元祥股匪大部，击毙匪首马步祥、马希贤、马全彪等69人，俘台湾空投特务程毓杰、匪首马寿山以下43人，马元祥在逃窜中被击毙。5月18日，骑兵第1师追剿部队在郎木寺东南石穴中活捉匪首马良，击毙台湾空投特务高尚俭。至5月23日，清剿部队经过58天的积极追剿，歼灭股匪1300余人，基本肃清边沿地区的股匪。

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西北军区、西北局并告西南军区、西南局：“此次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参加剿匪的全体同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积极作战，不顾饥饿疲劳，昼夜追击搜剿，已击毙匪首马元祥，活捉屡次叛乱之匪首马良，并将各股土匪基本消灭，获得很大胜利，甚感快慰。”

全国剿灭匪特的斗争，先后历时4年时间，歼灭匪特共计260万余人。在4年多剿匪斗争中，由于各地区正确地贯彻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地执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各地党组织一元化的领导下，各进剿部队坚持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广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在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采取猛打猛追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给匪特以任何喘息之机，克服种种困难，终将匪特基本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我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全国剿匪斗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

第九章 加强人民军队建设。 改造起义部队

第一节 创建海、空军

一、创建人民海军

海军是一个主权国家保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益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中国濒临浩瀚的西太平洋，有黄海、渤海、东海、南海的广大的海区，海岸线蜿蜒曲折，长达 1.8 万余公里。沿海岛屿星罗棋布、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就有 6500 余个。这样辽阔的海洋和众多的岛屿，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注意建设和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建立了有相当规模的海军，这支军队在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清代后期，清政府虽然也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的压力，奉行投降主义政策，结果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遭到惨败，使美丽富饶的海洋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通道。从 1840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英、美、法、俄、德等国及意大利、葡萄牙、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炮舰，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达 470 余次之多，从海上打开了侵略中国的门户，然后争先恐后地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的许多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香港、澳门、台湾和澎湖列岛相继被侵占，胶州湾、

旅顺、大连、九龙、广州先后以租借之名被列强控制，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控制的港口和沿海城市向中国内地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开始在原清朝末年海军破残基础上建立海军，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已建成了有120艘舰艇，共5万吨位的海军。这支海军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3个月内就损失殆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利用接收的一些日军舰艇，在美国、英国的援助下，又重建海军，至1948年，建成了总计428艘舰艇共19.43万吨，约4万人的海军。这支海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成了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工具。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切认识到建立人民海军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相继在苏中、苏北和浙东成立了海防纵队、海防团和海防大队，八路军在山东组建了“八路军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在沿海和近海地区为部队运送物资、打击日伪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的三支海防部队合并，组成了新的海防纵队。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的大部人员挺进东北，留在山东的部分人员成立了“山东胶东军区教导队”。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追歼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解放沿海岛屿；粉碎国民党军对大陆的封锁、袭扰，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卫即将成立的新生的人民政权；应付和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进行的侵略，巩固国防，在1949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就提出：应争取在1949年建立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电报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①9月21日和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

^①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40页。

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① 新中国“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② 不久，毛泽东在给初建的华东军区海军所作的题词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③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即着手建设海军。

1949年4月23日，根据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在长江下游起义的情况，华东军区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由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部644人为基础组成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3个办公厅。接着，为接收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和第5巡防艇队、第1机动巡防艇队，在南京成立了办事处；为接管上海的国民党海军机构和设施，成立了以张爱萍兼任主任的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8、9、11月，中央军委又先后任命林遵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袁也烈为第2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赵启民为副政治委员，康志强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华东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第四野战军成立了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处。12月15日，以海军接管处和两广纵队第2师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由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1950年12月成立了中南军区海军领导机构，由方强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仁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吴罡任政治部主任。后来，中南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9页。

海军南海舰队”。

1950年4月，以第四野战军后勤第2分部部分人员和第12兵团部分机构为基础组成海军青岛基地筹备委员会，赵一萍任主任，许培仁任副主任。9月9日，与第二野战军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合并，正式成立海军青岛基地，易耀彩任司令员，段德彰任政治委员，赵一萍、郑国仲任副司令员，杨国宇任参谋长，胥治中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在青岛海军基地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

为统一指挥管理各军区的人民海军，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发出电令，抽调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组建军委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30日，第12兵团机关和第四野战军后勤第2分部部分机构和人员调至北京。4月14日，海军领导机构正式组成，萧劲光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刘道生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任参谋长。海军领导机构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在组建海军领导机构的同时，即开始组建海军部队。部队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陆军部队选调，这是人民海军建设的基础。在海军建设初期，先后有第12兵团部，第10、第11、第30、第35、第44军等5个军部和直属队，第30、第129、第131、第138、第173师、炮兵第6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等共11个师级单位和28个团级单位拨归海军建制。二是吸收原国民党海军军官和士兵。从1949年2月至12月，共有3300余名国民党海军官兵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又在全国各地招收了约700余名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此外，还从全国各地和大中学校招收了一大批青年学生，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著名高校招聘了数十名讲师和教授。

海军的舰艇主要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国民党海军起义、投

诚和遗弃的舰艇，据统计共有 183 艘，4.3 万余吨；二是接收、征用地方有关单位的一部分商船、渔船。其中华东海军在上海接收了上海招商局、上海水产公司、上海公用局、上海海运局等单位可改装为军舰的船只计 79 艘；中南军区海军在华南各地接收各有关单位的船只 41 艘；海军青岛基地在华北地区征用了塘沽水上公安局和山东水产公司等单位的船只。加上在其他地区接收、征用的船只，海军在全国各地共接收各类船只计 169 艘，6.4 万余吨。此外，人民海军还打捞了早年沉船 6 艘，1715 吨；在香港购买了旧船 48 艘共 1.5 万余吨。

上述各类舰船性能落后，许多陈旧不堪。其中最老的有清朝购自日本的“楚”字号，有清末开始在江南造船所建造、民国初年下水的“永绩”号炮舰。还有来自美、英、日、法、德、加、荷、澳等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战中下水的舰艇。舰船型号庞杂，主辅机机型多达 355 种，机器使用太久，磨损严重，多数配件无来源。这些舰艇，航速慢，有些甚至无法正常航行。舰艇的火炮也产自苏、美、英、法、日等国，种类达 30 多种，许多舰艇还没有装配火炮。

为了使这些舰船能够早日形成战斗力，保卫祖国的海边防。各军区海军利用接收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并被其严重破坏的修船厂，对现有舰船进行修理和改装。如华东军区为接管和修理舰船装备，成立了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先后接收了大小修造船厂 8 个，其中江南造船所是最大的，也是被国民党军破坏最严重的。造船所的全体员工在接收工作人员的领导下，一面抢修机器设备，一面修理改装舰艇，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克服了缺乏设备器材、图纸资料等各种困难，想方设法改造利用废旧器材，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抢修改装了大批舰艇。据统计，从 1949 年 9 月至 1950 年 5 月，共抢修改装舰艇 130 余艘次，保证了部队作战和训练的需要。

有了一定数量的舰艇、人员，人民海军即着手组建舰艇部队。

1949年4月，在华东海军领导机构成立的同时，抽调教导师第3团及炮兵营、野战军司令部侦察营、苏北军区海防纵队等共4000余人，作为建设海军的基础，将苏北军区海防纵队更名为华东海军第1纵队。11月，正式组建了第1支护卫舰部队，即第1舰大队和第2舰大队。1950年4月23日，在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为检阅海上战斗力，鼓舞部队增强建设海军的信心，在南京草鞋峡江面举行了隆重的舰艇命名典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军委海军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参加了这一典礼。典礼对134艘舰艇进行了命名，其中护卫舰以省城命名，如“西安”舰、“长沙”舰；炮舰以具有革命历史的县城命名，如“兴国”舰、“瑞金”舰；扫雷舰以解放区的著名村镇命名，如“张店”舰、“枣庄”舰；大型坦克登陆舰以革命根据地的山岭命名，如“井冈山”舰、“大别山”舰；中型登陆舰以河流命名，如“辽河”舰、“淮河”舰；小型登陆舰以华东地区的小集镇命名，如“陈集”舰、“车桥”舰；其他辅助船只和小艇则以数码编号命名。这种命名方法在全海军范围内沿用了多年。

在命名典礼上，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将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命名状、军旗、舰长旗、舰首旗等，授予各舰艇，并带领全体舰员庄严宣誓：“我们是中国人民的海上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今天，蒙受中央人民政府颁给我们庄严的旗帜、光荣的称号，我们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我们宣誓：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完成人民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我们要具有人民解放军的团结一致、努力学习、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艰苦朴素、英勇顽强的优良作风；我们要具有熟练的航海技术、准确的舰炮射击技术、勇敢的损伤管制技术；我们要爱护军舰，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要随时准备作战，只要进军号令一响，便勇往直前，配合陆、空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解放台湾，彻底歼灭残敌，解放全中国，保卫祖国的海防，

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称号光荣，我们的旗帜辉煌，我们要在渡海作战中争取光辉的英雄称号。我们要把中国人民海军胜利的旗帜插遍祖国的海洋。我们保卫这光荣的旗帜和称号，永远像保卫祖国的尊严一样。”^①这表达了全体海军指战员的坚强决心。

1950年8月，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召开了建军会议。会议听取了华东军区海军和有关单位一年来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了形势、任务和发展前景，制定了海军建设的方针，会议根据当时海军主要由陆军抽调人员和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组成的情况，规定了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即：“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应该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并制定了一条比较切合实际的海军建设的具体实施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②会议还制定了海军建设的三年计划。

这次建军会议认为，建设一支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应该包括进行协同作战所必须的诸兵种，即：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这些兵种部队的建设，初期又以海军航空兵、潜艇、鱼雷艇部队为主，其他兵种相应发展。这样一支轻型海上战斗力量，舰艇吨位较小，费用相对比较经济，建设时间可以相对缩短。其主要用于近海作战，建成后，不仅能配合陆军进行登陆与抗登陆作战，而且能单独执行任务，主要是：海上反封锁，保障海上航道运输安全；保护渔业生产；打击敌人的海上骚扰活动，必要时破

^① 《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5页。

^② 《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3、第41页。

坏或封锁敌人的港口，阻截敌海上交通线；进行扫雷、布雷；维护海防设施等。

根据建军会议的精神，人民海军在已建立第一支护卫舰部队的基础上，又相继建立了鱼雷艇部队、驱逐舰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部队，以及侦察、观察、通信、工程、航海保障、水文气象、防险救生、防化兵、后勤供应、修理等各种专业勤务部队。人民海军建设已初具规模，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支重要的海上武装力量，并为尔后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创建人民空军

空军是一个主权国家反对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既是强大的空中突击力量，又是有效的防空力量；既能消灭战场上的敌人，又能突击敌方的后方战略目标，直接破坏其战争潜力；既能协同其他军兵种作战，又能独立执行战略、战役任务。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空军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1924年5月和1925年7月，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先后选派刘云、王翱、常乾坤、徐介藩等共产党员到由孙中山创办的广州大沙头航空学校学习，并先后被派往苏联继续深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继续培养航空人才，于1927年9月和1935年9月从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中选调19人转入苏联空军航校学习。这些人员是中国共产党中掌握航空技术的先驱者，有的人后来成为创立和建设人民空军的领导骨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又选调了43名学员，于1938年3月派往新疆乌鲁木齐，到由国民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办的航空训练班学习飞行和机械。这批学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学习中的各种困难，至1942年4月毕业，飞行班的学员，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300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平，机械班的学员，已能熟练地掌握4种飞

机的维护技术。1942年9月，盛世才转向反共，将在航空训练班学习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共产党员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与盛世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组织起来复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以待日后为人民空军的创建作出贡献。1946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这些人得到释放，并于7月11日顺利回到延安。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也布置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共产党员报考国民党空军的航空学校，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航校培养共产党的航空人才。并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军空军航校和工厂的进步青年航空技术人员参加革命队伍。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于1941年3月10日在陕北安塞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培养航空机械工程技术人才。后改组为工程队。1943年工程队撤销后，于1944年5月，在第18集团军参谋部成立了航空组，担负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处理有关事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8、9月间，王弼、常乾坤等30余名航空技术干部分两批从延安出发，于12月抵达辽宁阜新会合，后又到达海龙。这批人到达东北后，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从辽阳、营口、鞍山、大石桥等地搜集了10余架飞机和一些器材，并接受了1个日军航空大队的投降，成立了航空队。11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组成了以伍修权为主任的航空委员会，以加强东北地区航空工作的领导。1946年1月，航空队改编为航空总队。在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和航空总队的努力下，搜集到各型破旧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以及其他一些航空器材，并在群众的帮助下，将这些飞机、器材和油料运到了通化。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1949年5月，这所航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到1949年7月，该校共培养各种航空技术人才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

领航员 24 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 88 名。从而为创建人民空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对国民党空军人员的争取工作。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空军第 8 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率机组人员驾驶 B-24 型轰炸机起义，由成都飞抵延安，给一切不愿参加内战的爱国的国民党军人提供了榜样。刘善本等人起义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到延安来。朱德也鼓励他们说：我们很快就要建立空军。你们还年轻，今后大有用武之地。在延安军民召开的欢迎大会上，朱德又在致词中指出：刘善本上尉退出内战的义举，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的高潮。1948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李克农在给中共中央情报部门驻上海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组织空军起义，扩大我军声威，加速蒋匪内部崩溃，减少对人民的危害。未暴露的空军人员愿驾机飞来我区，在目前是有很大作用。”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 1948 年 9 月至 1950 年 1 月期间，国民党空军系统共有 25 架飞机、62 名空地勤人员驾机或随机起义，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汉口、南京、上海、杭州、青岛、西安等地，一架接一架地飞向解放区，投入人民的怀抱。并有国民党空军南京大校场机场 431 电台和指挥塔台 20 余人、伞兵第 3 团 2500 余人、雷达研究所 100 余人等技术人员起义。这些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人员，为人民空军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创建人民空军的技术力量和骨干，有些人成了人民空军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提出了要在 1949 年至 1950 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3 月 8 日，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地召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他们对航校所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开始酝酿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3 月

17日，中央军委决定从东北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新中国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同日，航空局在北平开始办公，下设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5月，又增设航行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扩编到172人。军委航空局建立后，一方面加强组织建设，开展航空业务工作；另一方面抽调干部组成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在此基础上，1949年8月15日，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军委航空局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下辖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1个地勤分队。装备P—51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10月又增调P—51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轰炸机各2架，使飞行中队的实力大增。这个飞行中队成立后，即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以及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等任务。10月1日下午，这个飞行中队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组成空中机群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7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争形势发展，为了打破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大陆的封锁，解放海南岛、台湾等岛，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7月1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信中指出：“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①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②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

7月11日，中央军委召见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其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

^① 远方，即苏联。

^② 《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版，第35页。

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7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生长，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拟以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空军领率机关。中央军委同意了刘亚楼的建议。8月19日，第14兵团机关2515人由武汉抵达北平，10月下旬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11月11日，中央军委又任命常乾坤为副司令员，王弼为副政治委员。下设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干部部等6个部门。

在酝酿、组建军委空军领导机构的同时，各大军区亦相继组建了空军领导机构。东北军区于1948年10月，东北航校在沈阳建立了办事处。1950年1月，将办事处扩建为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王海青任处长。8月，由航空处和辽东军区、辽西军区、陆军第171师师部合并组成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由段苏权任司令员，胡奇才任副司令员，王德贵任副政治委员，欧阳家祥任参谋长，赵正洪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央军委调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

华北军区于1949年4月1日，在北平成立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方华任处长。1950年10月，以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抽调陆军第205师师部机关大部和华北军区机关部分人员，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徐德操任司令员，漆远澍任政治委员，油江任参谋长，李克如任政治部主任。

华东军区于1949年4月29日，第二野战军在南京成立军管会空军部。同年5月29日，第三野战军在上海成立军管会空军部。为了统一华东地区的航空接管工作，9月1日，在上海成立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蒋天然任处长，王集成任政治委员。1950年8月1日，在南京将航空处扩大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由聂凤智

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蒋天然任参谋长。

西北军区于1949年11月，以中央军委航空局派出干部组成的西安航空办事处为基础，组成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赵光远任处长兼政治委员。1951年12月，将航空处与陆军第6军军部合并，在兰州成立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由罗元发任司令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赵光远任副政治委员，陈海涵任参谋长，张孝德任政治部主任。

中南军区于1949年7月，由中央军委航空局派出成员在武汉成立华中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张孔修任主任，程启光任政治委员。1950年2月，组成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黄炜华任处长，程启光任政治委员。9月24日，航空处与陆军第51军军部合并，在武汉成立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刘震任司令员，吴富善任副政治委员，黄炜华任参谋长，王建中任政治部主任。

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22日，在重庆成立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余非任处长，夏屏西任政治委员。1950年9月22日，航空处扩大为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傅传作任司令员，余非任政治委员，欧阳挺任参谋长，陈浩任政治部主任。

各军区空军司令部成立后，接受军委空军和大军区的双重领导。1952年3月29日，中央军委对各军区空军的领导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各战略区的空军部队，各大军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军委空军主要为建制关系与领导关系。

军委空军和各大军区空军领导机构成立后，首先解决空军建军方针和明确所担负的任务。1949年10月，刘亚楼在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要搞好党委制，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技术干部和非技术干部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要向陆军学习。在1950年3、4月召开的空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上，探讨了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朱德总司令在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空军，要完成怎样的任务呢？首先，要配合

其他军种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初步取得制空权。然后，逐渐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这支空军，要在我们所有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①4月15日，毛泽东在给《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②这一题词，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空军的任务。11月，刘亚楼在对空军建设方针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以陆军来的干部为骨干建设空军。12月召开的空军机务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1951年2月召开的空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其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的方针原则、制度和优良传统为基础，贯彻党委制，坚持集体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在航空业务方面，以苏联空军为榜样，努力学习技术，尽快掌握飞行技术和其他技术。

根据空军的建军方针和任务，空军领导机关即着手制定建设空军的计划。1949年11月，为了准备参加夺取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中央军委要求空军在6个月内，组建2个歼击机团和1个轰炸机团。1950年2月，鉴于国民党空军不断对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对上海、福州、广州等大城市进行轰炸袭扰，中央军委又要求空军担负起要地防空的任务。为此，空军第二次拟制了组建7个歼击机团、4个轰炸机团的计划。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组织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空军再次调整了组建航空兵的计划。8月，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空军拟制了《建设人民空军的四年（1950年—1953年）计划大纲》。

组建航空兵部队，首要的是要解决空、地勤人员，飞机装备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74页。

^② 《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8页。

以及师团各级领导机构。为此，早在军委航空局成立后，即着手抽调干部组成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接收缴获的国民党空军的航空器材和收容原国民党空军航空技术人员。这些接收人员在各军区航空处的协助和各野战军的帮助下，接管和收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厂、航空配件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通信器材厂等32个；收容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使得人民空军初建时拥有航空技术人员2938人，飞机159架。

军委空军利用上述人员和飞机器材，并陆续从苏联购买了400余架飞机，从原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和从各野战军、各大军区选调了一批师政治委员，于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组建了7所航校，从各野战军、各大军区选调一批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年龄18至24岁的连排干部和战士，到航校学习飞行和地勤。后来又相继组建了第8、第9、第10、第11航校。这些航校的组建，为一批又一批地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条件。

为了解决组建航空兵部队所需的师、团领导机构，空军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中央军委采纳了空军的建议。1950年4月10日，中央军委电示各野战军：组建空军所需的7个师部、15个团部的机构，由各野战军选调步兵师部及团部的现成机构，再由空军配以技术干部组成。并规定了各野战军选调师、团机构的数量和到空军报到的时间。同年5月，全军参谋会议重新确定：除即将调到空军的2个师部、4个团部外，其余机构不再由各野战军抽调，改由华北、东北军区抽调独立师的机构组成。11月，中央军委又决定从华东、中南军区选调5个步兵师部、18个团部作为组建航空兵师、团领导机构，以适应大批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

从1950年至1951年，陆军先后抽调了成建制的师部12个，

团部 49 个，作为建立航空兵部队的师、团领导机构。

为了解决航空兵部队所需的飞机装备，毛泽东、周恩来于 1949 年末和 1950 年初曾先后向苏联斯大林、布尔加宁等领导人发电报、信件 32 次，商请购买飞机装备之事。1950 年 1 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 586 架。2 月，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巴基斯基中将率空军来华到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担任该地区的防空任务。10 月，中国空军接收了这些飞机装备，计有各型飞机 119 架。后来又相继接收了担负东北地区防空的苏联飞机 138 架；担负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地区防空的苏联空军 12 个师的装备。这些飞机装备成为组建中国航空兵的主要来源。

解决了人员和飞机装备后，空军即着手组建航空兵部队。1950 年 6 月 19 日，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 4 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王志增、刘善本任副旅长。旅部机关由第三野战军第 30 军第 90 师师部改编组成。下辖装备歼击机的第 10、第 11 团，装备轰炸机的第 12 团和装备强击机的第 13 团。10 月，第 4 混成旅改编为歼击机第 4 师。接着又组建了歼击机第 2、第 3 师。后来又相继组建 15 个歼击机师，4 个强击机师，5 个轰炸机师及 1 个独立团，1 个运输机师及 1 个独立团，3 个侦察机独立团

人民空军的航空兵成立后，即担负了中国各主要城市的防空任务。当时，台湾国民党空军飞机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及上海、杭州、南京、徐州、广州等主要城市进行轰炸破坏。为对付国民党空军的破坏，中国政府曾商请苏联政府派空军部队来华担任主要城市的防空任务。苏联空军回国后，组建的中国空军航空兵即先后接替了各要地的防空任务。1950 年 10 月，空军第 4 混成旅首先接替了上海地区的防空任务。随后，其他航空兵部队先后担负了东北、北京、天津、青岛、广州地区的防空任务。

1950 年空军还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4 月 17 日，

中央军委电示各军区、各野战军，要求从各陆军部队抽调一批战斗英雄或模范的班、排干部组建空军陆战部队。后又规定其中不足之数可从政治可靠、身体健康、作战勇敢、表现较好的优秀战士中补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空军在4个野战军及山东、华东、东北军区等40余个军以上单位，选调了5000余名官兵，并抽调第30军第89师师部为基础组建旅部。7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的番号，9月16日，空军陆战第1旅在开封召开成立大会。第1旅下辖狙击、坦克、迫击炮、战防炮等7个营和高射机枪、工兵、运输、通信、侦察、警卫、汽车等7个连及1个教导队。12月，空军陆战第1旅改编为空军陆战第1师，后来又改称伞兵师、空降师。

在组建飞行、空降部队的同时，还相继组建了一大批雷达情报、通信导航、气象、领航等战斗勤务保障分队和运输、医疗卫生等后勤保障部队。

第二节 加强特种兵和院校建设

人民解放军在着手创建海空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陆军的建设，除了继续加强步兵建设外，着重加强了特种兵和院校的建设，不断提高陆军的合成程度和官兵的文化素质，开始由单一的步兵兵种向多兵种合成军队迈进。

一、加强特种兵建设

中央军委历来十分重视特种兵的建设，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曾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野战军要加强特种兵的建设。经过各战略区的努力，到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前，特种兵的建设已有一定的规模，第二、第三野战军均成立了特种兵纵队，第四野战军成立了特种兵司令部。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2月3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各

野战军加强特种兵建设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和加强特种兵的建设。为了使特种兵建设进一步正规化。中央军委于4月18日颁布了《对全国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对各野战军现有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按全军统一的番号命名，并明确规定了野战军所属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的番号。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全军的努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种兵建设有了更加进一步的发展。

（一）炮兵建设

在解放战争中，炮兵是特种兵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兵种，到1949年1月，全军的预备炮兵和队属炮兵近50个团，拥有各型火炮2万余门。2、3月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全军整编过程中，按抽强补弱，抽多补少的原则，对现有火炮和人员在全军范围内进行了适当调整，从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抽调了一批炮兵技术人员充实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从平津战役缴获的火炮中调拨给第一野战军90门，调拨给第二野战军18门，调拨给华北军区21门。在此基础上，各野战军对炮兵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第一野战军扩建了炮兵教导团，各军亦组建了炮工团或炮兵团。第二野战军成立了特种兵纵队，李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孔从周任副司令员，张立雄任副政治委员，并组建了榴炮团、工兵团及战车大队，第3、第4、第5兵团组建了炮兵团。第三野战军对特种兵纵队进行了扩编，由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刘述周任副政治委员，叶超任参谋长，喻新华任政治部主任，以炮兵第1、第2、第3团及原山东兵团炮兵团为基础，抽调各军的野榴炮连，整编成归特种兵纵队建制的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团，所属16个军组建和扩建了15个山炮团、1个山炮营。第四野战军将第1、第2炮兵指挥所改为炮兵第1、第2师，并将迫击炮团改装为野榴炮团。整编后，第1师辖第1、第2、第3团，第2师辖第4、第5、第6、第7团。所属各军炮兵整编为9个甲种炮兵团，每团下辖3个营，3个乙种炮兵团，每团下辖2个营，

高射炮兵第1、第2、第3团番号不变。华北军区将充实后的炮兵第1、第2旅改称第3、第4师。5月，炮3师师部及第1团拨归第二野战军建制，第2团编入第18兵团。以炮4师为基础，成立了特种兵司令部，高存信任司令员，李呈瑞任政治委员，并先后组建了机动炮团、高射炮团、战车团和铁甲列车纵队。

渡江战役后，根据中央军委4月18日的规定，重新命名了各野战军炮兵团的番号，并根据南方作战的特点和各野战军炮兵部队的情况，在全军范围内再次作了调整。第二野战军在南京接收了榴弹炮39门、防坦克炮和高射炮80余门，将特纵榴炮团由4个连扩编为9个连，名命为炮兵第4团，新建了防坦克炮团和高射炮第7团。同时，将第3、第4、第5兵团的炮兵团名命为炮兵第6、第7、第8团。第三野战军将在战役中缴获的火炮充实到特纵所属各炮兵团，使每团由原辖2个营扩大为3个营，并将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团改称为炮兵第11、第14、第15、第16、第17、第12团，组建了第13团和高射炮第8团。同时，将第14、第16、第17团调归第10、第9、第7兵团建制，将第15团调归第二野战军建制。第四野战军将炮兵第1、第2师所辖各团改番号为第25、第26、第27、第28、第29、第30、第31团，将第41军炮兵团整编为第9团，调归第二野战军建制，将其余11个军属炮兵团整编为第42、第43、第44、第45、第46、第47、第48团，并将第45、第46、第47、第48团分别拨归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建制。以第42、第43、第44团组建炮兵第5师，组建了高射炮兵第9团。

1950年初，为了加速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保卫国防，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加快炮兵部队的建设。1月，以第11、第12、第13团组建炮兵第3师；4月以第45、第46、第48团组建炮兵第8师；5月，组建炮兵第7师，下辖第19、第20团。与此同时，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从1949年秋开始，加速建设高射炮兵部队。1950年3月，组建高炮第1师，下辖第1、第2、第3、

第9团；5月组建高炮第3师，下辖第4、第10、第11、第12团，并组建了7个高射炮兵团。至1950年6月，全军预备炮兵已有6个地面炮兵师又14个炮兵团，2个高射炮兵师又7个高射炮兵团。队属炮兵也有了新的发展，各军均建立了炮兵团或炮兵营，师建立了炮兵营，团建立了炮兵连。炮兵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兵种。

为了加强对炮兵部队的领导，中央军委于1950年3月调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副司令员苏进等筹建军委炮兵领导机关。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陈锡联任司令员，万毅、苏进任副司令员，彭嘉庆、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炮兵领导机关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统帅预备炮兵的战备工作，炮兵的组织建设、装备计划，制定炮兵部队、学校的编制及训练大纲，编译各种炮兵教材，管理统帅预备炮兵及学校的干部工作，以及军械工作的业务领导。1950年底至1951年上半年，华东、华北、西南军区的特种兵司令部先后改为炮兵司令部，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大部调归东北军区，组成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中南军区司令部内设立炮兵办公室，西北军区也建立了炮兵司令部。军委、各军区炮兵领导机构的建立，使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装甲兵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人民自治军以修复的日军坦克为基础，于1945年12月1日在沈阳组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支坦克队——东北坦克大队，全队30余人，1辆坦克。解放战争开始后，人民解放军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坦克，先后在晋冀鲁豫、华东、晋察冀军区组建了坦克队或坦克区队。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发

展，人民解放军缴获的国民党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也不断增多，至1949年1月，全军已拥有1个装甲兵指挥所，1个战车团、1个装甲团、1个教导团及2个坦克队。在全军整编过程中，各野战军利用在淮海、平津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组建、扩编

装甲兵部队。第二野战军成立了战车大队，下辖2个中队，共180人，拥有坦克15辆，装甲车6辆。第三野战军以原坦克大队为基础，接收了一批淮海战役中缴获的坦克、汽车和被解放的国民党军技术人员，扩编成战车团，下辖2个战车营及修理连、警卫连，共1100余人，拥有坦克45辆，装甲车10辆。第四野战军以装甲兵指挥所为基础，与大连汽车学校合编为战车师师部，以曾克林任师长，杨永松任政治委员，下辖战车团、装甲团及教导团，共5500余人，拥有坦克120辆，装甲车143辆，各型汽车、工程车370辆。战车团下辖2个战车营，1个汽车营，以及警卫、通信、运输、高炮连和修理工厂。装甲团下辖3个装甲营，以及警通、运输、保养连。教导团下辖2个营，以及警卫连和修理工厂。华北军区以原坦克队及第四野战军装甲团的2个连为基础，接收起义、俘获的部分坦克、装甲车，组成战车团，全团1073人，拥有坦克45辆，装甲车32辆。

5月，第二野战军战车大队与原华东军区后备兵团第3师第9团合编为战车团，下辖3个营及警卫连共3500余人。第四野战军战车师奉命转隶总参谋部建制领导，并改称战车第1师，原辖的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改称第4、第5、第6团，后又改称第1、第2、第3团。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结束后，以特纵警卫营为基础，接收了在战役中缴获的坦克、装甲车，组建了战车第3营，后又相继组建了水陆坦克营、装甲营、教导大队和搜索连。1949年11月，第三野战军战车团扩编为战车师，由特纵副司令员肖锋兼任师长，特纵副政治委员廖成美兼任政治委员，下辖战车团、水陆战车团、装甲团，以及教导大队、修理营、汽车营、搜索连和警卫连。全师共3135人，拥有坦克179辆、装甲车95辆、汽车162辆。1950年1月1日，第三野战军战车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2师，原战车团、水陆战车团、装甲团分别改称第4、第5、第6团。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部队已发展到2个师又2个

团，初步成为一个新的兵种。但这些坦克部队是在战争中分散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编制体制，装备也不一致。为了把人民解放军建成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尽快实现由单一兵种向合成军队的转变，中央军委于12月决定组建装甲兵领导机构，并责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具体负责这项工作。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许光达于1950年1月即开始筹建工作。6月，中央军委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并确定以第2兵团机关为基础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关。9月1日，装甲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许光达任司令员，聂鹤亭任副司令员，向仲华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

随后，各军区也开始建立装甲兵领导机关。1950年11月17日，以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坦克第2师及华东军区部分干部组成华东军区装甲兵，由何克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锋任副司令员，刘毓标任副政治委员，谢锐任参谋长；12月31日，以东北军区司令部、军政学校及装甲兵部队的部分人员组成东北军区装甲兵，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军区副政治委员周桓兼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钟人仿任副政治委员，石敬平任参谋长，余孝礼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又以华北军区、总部装甲兵、第20兵团及坦克第26师等单位的机关和人员组成华北军区装甲兵，由黄鹤显任司令员，王英高任副政治委员，马骥任参谋长。

各级装甲兵领导机关的成立，为进一步加速装甲兵部队的建设，从而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工兵建设

在解放战争中，各战略区都十分重视工兵的建设，至1949年1月，全军已建立了1个工兵指挥所，5个工兵团和大部分纵队、师的工兵营、连。在全军整编过程中，各野战军均扩编了工兵部队，第一野战军将第2军工兵营扩编为工兵团，其余5个军组建

了工兵营。第二野战军将原辖5个连不足千人的工兵团扩编为3个工兵营、1个机械营约2000人的工兵团；所辖9个军均组建了工兵营。第三野战军工兵团装备了大卡车20辆、操舟机50部、橡皮舟百余只和一些机械器材；所属16个军组建了工兵营。第四野战军在原有2个工兵团的基础上，又组建了1个工兵团；并在已建的12个军工兵营中增编运输排。华北军区将军政大学的工兵大队由2个队扩编为7个队，第18兵团所辖各军组建了师属工兵连，第19、第20兵团所辖各军组建或扩编了工兵营。

5月，遵照中央军委4月18日的规定，全军6个工兵团统一了番号。第一野战军第2军工兵团为第1团，第二野战军工兵团为第2团，第三野战军工兵团为第3团，第四野战军3个工兵团为第4、第5、第6团。

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利用缴获的工兵器材，将工兵第3团扩编为筑城营、渡河营、架桥修路营、重机械营和汽车营。7月，第二野战军为进军西南作准备，在南京将渤海军区独立第3师改编为工兵第7团。8月，第四野战军为适应南方作战的需要，抽调工兵第5、第6团及第40、第45、第46军工兵营各一部，在长沙组建工兵第5团，原工兵第5团改番号为第8团。同时，将第5、第6、第8团分别拨归第12、第13、第15兵团建制，第4团直属野战军司令部。

四川解放后，为修筑进军西藏的公路，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8兵团各军工兵营与起义的国民党军的2个工兵营、1个步兵营合编为第18兵团工兵师，1950年2月5日，工兵师在四川新津正式成立，廖述云任师长，下辖第10、第11、第12团。

随着工兵部队的不断发展，为了统一和进一步加强工兵建设，逐步将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各级工兵领导机关。1950年2月3日，中南军区将第四野战军工兵指挥所与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师部合并，组成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由唐明哲任司令员，李福尧

任政治委员。3月14日，西南军区以工兵第2、第7团及第18兵团工兵师组成工兵纵队。4月16日，工兵纵队领导机关改为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由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2月15日，华东军区以工兵第3团与特科学校工兵大队为基础，组成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兼工兵学校，由谢忠良任主任兼校长。在各军区工兵领导机构成立的基础上，1950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李希迎任副司令员，后来，又由陈士榘任司令员，黄志勇任副政治委员。各级工兵领导机关的成立，使人民解放军的工兵建设走上了集中统一和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加强军队院校建设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各战略区十分重视军队院校的建设，相继开办了各类军事院校和技术院校。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后，为了进一步培养大批人才，加速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加速了各类军事院校和技术院校的建设，调整、充实、扩建和组建了一大批院校。据统计，1949年至1950年，全军共扩建、改建和新建各类院校96所，其中军委直辖院校29所；总参谋部所辖6所；总后勤部所辖21所；海军院校6所；空军院校12所；炮兵院校5所；装甲兵院校1所；工程兵院校2所；铁道兵院校1所；通信兵院校6所；防化兵院校1所。其主要情况是：

西北军区军政大学于1949年3月招收了第2期学员计900余人，并开办了艺术学校，同时成立了绥蒙分校，由贺龙兼校长，曹振之任教育长，龙舒林任政治部主任；陕西分校，贺龙兼校长，方仲如任副校长，胡光任政治部主任。5月，军政大学扩大为3个学院，即：军政学院，直属6个大队；财经学院，下辖9个队；艺术学院，下辖4个部和1个剧团。1950年1月，军政大学大部随贺龙进军西南，后来，军大俄文队组建四川外语学院，财经学院组建四川财经学院，艺术学院组建四川音乐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大学留在西北的人员分别编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高

级步兵学校和西北人民艺术学院。

中原军区军政大学于1949年5月在南京改称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下辖5个总队和女子大队。随野战军进军西南后，改称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并相继组建了川东分校，王近山兼校长，谢富治兼政治委员；川南分校，杜义德兼校长，李大章兼政治委员；川西分校，张祖谅兼校长，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分校，韦杰兼校长，胡耀邦兼政治委员；云南分校，陈赓兼校长，宋任穷兼政治委员；贵州分校，杨勇兼校长，苏振华兼政治委员。1950年，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高级步兵学校。

华东军政大学与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于1949年7月在南京合并为新的华东军政大学。第8兵团部大部改编为军政大学校部，陈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兼副政治委员，聂凤智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随后，又相继创办了山东、浙江、福建分校。1950年12月，军政大学一部并入军事学院，大部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高级步兵学校。

东北军政大学于1949年7月迁至武汉，改称华中军政大学，由林彪兼校长，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兼政治委员，倪志亮任副校长，刘其人任副政治委员，解方任教育长，王逸群任政治部主任。并先后成立6个分校，即：河南分校，陈再道兼校长，张玺兼政治委员；湖北分校，王树声兼校长，李先念兼政治委员；江西分校，陈奇涵兼校长，陈正人兼政治委员；湖南分校，陈伯钧兼校长和政治委员；广东分校，邓华兼校长，赖传珠兼政治委员；广西分校，李天佑兼校长，莫文骅兼政治委员。1950年1月，华中军政大学改称中南军政大学。后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高级步兵学校。

华北军政大学在平津战役结束后，相继以原第5、第2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第1总队、第3总队，以补训兵团第2旅成立第2总队，分别训练从平津地区招收的青年和原傅作义部起义的军官，和天津、太原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另以第1大队为基础成立校

直属大队，以第3、第4、第6、第7、第8大队组成干部总队。此外，扩建了高干队、上干队和妇女学校等。原校直步兵学校调出一批干部，组成第18兵团随营学校。1950年底，军政大学一部与华东军政大学一部组建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陈士渠任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任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长，刘忠为院务部部长。华北军大其余部分改为第6高级步兵学校。

在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改建、扩建为军事学院和高级步兵学校的同时，在1950年还改建和组建了一大批归军委直辖的步兵学校。在西安王曲以古北军官学校改建为第1步兵学校；在乌鲁木齐以新疆军政干校改建为第2步兵学校；在昆明以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改建为第5步兵学校；在四川南温泉以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改建为第6步兵学校；在四川自贡以西南军政大学川南分校改建为第7步兵学校；在四川新都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改建为第8步兵学校；在四川阆中以西南军政大学川北分校改建为第9步兵学校；在贵州修文以西南军政大学贵州分校改建为第10步兵学校；在四川大邑以第18兵团军政干校改建为第11步兵学校；在山东济南以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分校改建为第12步兵学校；在浙江金华以华东军政大学浙江分校改建为第13步兵学校；在福州以华东军政大学福州分校改建为第14步兵学校；在江苏扬州以苏北军区军政干校改建为第15步兵学校；在合肥以皖北军区军政干校改建为第16步兵学校；在河南商丘以中南军政大学河南分校改建为第20步兵学校；在河南信阳以中南军政大学湖北分校改建为第21步兵学校；在长沙以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改建为第22步兵学校；在南昌以中南军政大学江西分校改建为第23步兵学校；在桂林以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改建为第24步兵学校；在广州以中南军政大学广东分校改建为第25步兵学校；在齐齐哈尔以东北军区军政干校改建为第27步兵学校；在石家庄以华北军区军官学校一部扩建为第30步兵学校；在山西祁县以第66军一部、河

北军区教导大队组建第 31 步兵学校；在石家庄以第 67 军一部、平原军区教导大队组建第 32 步兵学校。

总参谋部于 1950 年以东北军区测绘学校改建为军委测会学校；在南京以华东测绘大队为基础组建华东测绘学校；在四川广安以西南军区测绘大队为基础组建西南测绘学校；在武昌以中南军区测绘大队为基础组建中南测绘学校。此外，还建立了张家口工程学校，北京气象学校。

总后勤部于 1950 年在北京、甘肃兰州、江苏镇江、湖北汉口、北京通县等地创办了高级后勤学校、西北军区后勤学校、华东后勤干部学校、中南军区军需学校、华北军区供给学校、第 2 后勤学校。在通县创办了总后军械学校，在西北军区建立了汽车学校，在上海建立了华东军事交通学校，在湖北武昌建立了中南军区汽车学校，在黑龙江佳木斯建立了东北汽车学校，在山西大同建立了第 6 汽车学校。在沈阳建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在石家庄建立了华北军区医科大学，在上海建立了华东军区医学院，在长春建立了东北军区医科大学，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军区医学院，在南京建立了第 3 军医学院，在南昌建立了中南军区医学院，在重庆建立了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在长春建立兽医大学。此外，在兰州、重庆、昆明、济南、南京、苏州、南昌、开封、齐齐哈尔、天津、北京还先后建立了 15 所军医中学。

各兵种还改建、扩建和组建了一批技术院校。1949 年 9 月，以第四野战军高射炮兵指挥所、特种兵司令部后勤部办事处和辽西军区独立第 17 团为基础，成立东北军区高射炮兵学校，11 月改称防空学校。同时，在沈阳将原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改建为高级炮兵学校，1950 年改为军委炮兵学校。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军区炮兵学校。在重庆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特科支队扩建为西南军区炮兵学校。在南京建立了华东军区特科学学校。1950 年，以第四野战军战车第 1 师为基础，创办了战车学校。1949 年，以原东北军区工兵学校为基础组建中南军区工兵学校。在南京以华东特科学学校一

部为基础，组建了华东工兵学校。在西安组建西北军区通信学校。在重庆以第二野战军电信专科学校为基础，组建西南军区通信学校。在南京组建华东军区通信学校。在汉口以第四野战军通信学校为基础，扩建为中南军区通信学校。在宣化组建华北军区通信学校。在抚顺组建东北军区通信学校。在北京昌平组建化学兵学校。在北京组建了铁道兵学校。

1949年和1950年还相继组建了一批海空军院校。1949年5月，以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重庆”、“灵甫”号军舰人员为基础，组建了安东海军学校，11月扩建为大连海军学校；8月，在南京以第30、第35军直属机关、部队的部分人员和华东军区海军训练团为基础，组建华东军区海军学校，1950年12月扩建为海军联合学校；1950年8月，在青岛以安东海军学校干部训练队为基础，组建海军快艇学校；以东北军区炮兵第6师、第四野战军后勤第2分部第4兵站、西南军区炮兵第10团等为基础，在青岛组建海军炮兵学校；10月以第四野战军后勤第2分部政治部、第6兵站和华北军政大学部分人员、华东军区山东航空办事处为基础，组建海军航空学校，后扩建为第1、第2海军航空学校。

1949年12月，空军在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牡丹江等地组建了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航空学校。1950年1月至7月，分别在长春、杭州笕桥、成都等地成立了航空预科总队。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华北、中南、杭州和西安航空预科总队。这些航空预科总队，主要担负空、地勤学员的预科教育。

大批军事院校和技术院校的建立和发展，为部队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整体素质，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第三节 调整、组建地方武装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追击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建设。首先，对老解放区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和调整。长江以北地区全部解放后，中共中央重新调整了各战略区的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省、地（市）、县人民政府，为了与行政区域求得一致，理顺地方与军队的关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略区撤销了原有的二级、三级军区，成立了各省的省军区，并对原来的军分区和部队进行了适当调整。其次，组建了南方和西北、西南地区新解放各省的地方武装。对这件事，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要求各战略区应在老解放区地方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和部队随主力南下，并在野战部队中抽调一部分部队和干部作为组建新区地方武装的骨干。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前，即从老解放区所属的军区、军分区和野战部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和骨干，作为组建新区地方武装的干部和骨干。如苏南军区的机关和部队是从苏北军区机关和 3 个警备旅抽调组建的；浙江军区的大部分军分区的领导机关，是由山东鲁中南、渤海军区整套抽调的南下干部为基础组成的，并从第 7 兵团直属队和各军中抽调了 9 个警备团和 69 个县大队的全套排以上干部，共 2344 人，作为建设浙江军区地方武装的领导骨干。西北军区新组建的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大部从原有军分区中抽调的。同时，各野战军还将一部分野战部队转为地方部队，或兼军区、军分区武装，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均以一些兵团、军、师的领导机关兼新组建的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机关。中南军区除以南方各游击纵队作为所属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外，还从第四野战军各军中相继各抽出 1 个师作为军分区的部队。各地区调整、组建各省军区、军分区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东北地区

东北全部解放，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后，东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48年12月对所属军区进行了调整整编。撤销了冀察热辽军区，将嫩江、合江、龙江、松江、吉林等军区改为军事部。1949年1月，将冀东、冀热察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成立了锦州军区。5月，将龙江、嫩江军事部合并为龙江军事部，将松江、合江军事部合并为松江军事部；将辽宁、安东军区合并为辽东军区；辽北、锦州军区合并为辽西军区。调整后，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参谋长，周桓任政治部主任，段苏权任副参谋长，朱治理任后勤部部长，下辖以下部队和军事单位：

龙江军事部，部长于天放。

吉林军事部，部长邱会魁。

松江军事部，部长季铁中。

辽东军区，司令员边伍章，政治委员洛甫，下辖第169、第171师。

辽西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郭峰，下辖第170师。

热河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下辖第168师。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下辖骑兵第1、第2、第3师。

东北军区直辖保安旅、警卫师及第163、第164、第166师。

二、华北地区

1949年5月，原西北军区所辖之绥蒙军区与第8军合并，组成绥远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第8军番号撤销，原所辖之第22、第23师合并组成新的第22师。同月，第69军番号撤销，所辖第206师与第207师一部组成独立第205师，第205师与第207师一部组成独立第206师。将第46军第160师改称为独立第207师。将东北军区第165师改称为独立第208师。以冀中、察哈尔军区部队分别整编为独立第209、第210师。8月，以冀中、冀东、冀南、太行、察哈尔军区各一部组成河北军区；以冀鲁豫军区为

主及太行、太岳、冀南军区各一部组成平原军区；以晋中、太行、太岳军区合并组成山西军区。同月，独立第 207 师改建为公安部队。9 月，第 70 军番号撤销，部队缩编为独立第 207 师。12 月该师改编为高炮部队。1950 年 1 月，以原绥远军区与绥远起义部队合编组成新的绥远军区。调整后，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唐延杰任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张南生、张致祥任副主任，下辖以下部队和军区：

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杨耕田，辖雁北、察南、察北军分区和骑兵第 3 师。

河北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唐山军分区，由原冀东军区第 12、第 15 军分区合并组成；通县军分区，由原冀东军区第 14 军分区改称；天津军分区，由原冀中军区平南军分区改称；沧县军分区，由原冀中军区津南军分区改称；邯郸军分区，由原冀南军区临清、邯郸军分区合并组成；衡水军分区，由原冀南军区夏津、衡水军分区合并组成；保定军分区，由原察哈尔军区易水军分区为主组成；石门军分区，由原冀中军区石东军分区改称；邢台军分区，由原冀南军区南宫军分区与原太行军区邢台军分区合并组成；定县军分区，由原冀中军区保定军分区改称。

平原军区，司令员刘志远，政治委员潘复生，辖聊城、安阳、新乡、菏泽、湖西、濮阳军分区。

山西军区，司令员肖文玖，政治委员赖若愚，辖长治军分区，由原太行军区第 3 军分区与太岳军区第 1、第 4 军分区合并组成；运城军分区，由原太岳军区警备团及第 2 军分区一部组成；以及临汾、忻县、汾阳、榆次、运城、兴县军分区。

绥远军区，司令员傅作义，政治委员薄一波（兼），辖第 22 师，骑兵第 1、第 4 师，骑兵旅；第 36 军，军长刘万春，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 106、第 107、第 108 师，暂编骑兵旅；第 37 军，军长张杨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 109、第 110、第 111 师，暂编骑兵旅；包头、归绥警备司令部；伊盟军分区，由内蒙骑兵第 5 师

兼；乌盟军分区，由内蒙骑兵第4师兼；以及陕坝、萨县、集宁军分区。

华北军区直辖独立第205、第206、第208、第209、第210师。

三、西北地区

1949年11月，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由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韩练成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黎化南任后勤部长，黄静波任后勤部政治委员，下辖以下部队和军区：

独立第1军，由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甘肃省保安部队组成，军长周祥初，政治委员张希英。

独立第2军，由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81军改编，军长马惇靖，政治委员甄华。

独立第3军，由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119军改编，军长蒋云台，政治委员黄忠学。

第5军，由新疆民族军改编，军长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政治委员顿星云。

独立第2师，由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22军第86师改编；骑兵第2师。

陕西军区，12月组建，由第19兵团兼，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马明方、李志民，辖大荔军分区，由原黄龙军分区抽调干部组成；彬县军分区，由原西府军分区改称；三原军分区，由原关中军分区改称；以及渭南、宝鸡、咸阳军分区。

陕北军区，5月组建，司令员吴岱峰，政治委李合邦，辖榆林、黄龙、三边军分区。

陕南军区，5月由中原军区划归，由第19军兼，司令员刘金轩，政治委员张邦英、汪锋，辖两郿军分区，由第4军分区改称；商雒军分区，由第2军分区改称；安康军分区，由第4军分区一

部组建；汉中军分区。

甘肃军区，10月组建，由第2兵团兼，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下辖天水军分区，由西北军政大学、三原、大荔、陇东军分区抽调干部和部队组成；平凉军分区，由陇东军分区抽调干部和部队组成；庆阳军分区，由陇东军分区改称；武都军分区，由晋绥军区军政干校、陇东军分区抽调干部和部队组成；武威军分区，由晋绥军区抽调人员组成；酒泉军分区，由第3军抽调人员组建；张掖军分区，由第4军抽调人员组建；临夏军分区，由晋绥军区抽调人员组建；定西军分区，由晋绥军区抽调人员组建；岷县军分区，由西北军区抽调干部组建。

宁夏军区，10月由原三边军分区抽调干部和部队组建，司令员王道邦，政治委员潘自力，辖独立第1师。

青海军区，10月组建，由第1军兼，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

新疆军区，12月组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德怀（兼），辖迪化军区，由第6军兼，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辖迪化军分区，由第17师兼；哈密军分区，由第16师兼；焉耆军分区，由第6师兼。伊宁军区，由第5军兼，司令员列斯肯，政治委员顿星云。喀什军区，由第2军兼，司令员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辖喀什军分区，由第4师兼；阿克苏军分区，由第5师兼。

四、华东地区

1949年6月，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合并，称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粟裕、张云逸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周骏鸣任副参谋长，唐亮、张凯、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邝任农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以下军区和部队：

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政治委员肖望东，辖泰州、盐城、淮阴、南通、扬州军分区和警备第9旅。

苏南军区，3月由苏北军区机关大部组成，司令员管文蔚，政

治委员陈丕显，下辖常州、苏州、镇江军分区，分别由原警备第6、第8、第7旅改称，淞江军分区和无锡警备司令部。

山东军区，3月组建，司令员张云逸，政治委员康生，辖昌潍特区、济南警备区兼警备第1旅、徐州警备区兼警备第2旅。胶东军区，下辖青岛警备旅、海防警备旅，东海、南海、北海、滨北军分区。渤海军区，下辖沧南、涿北、清河、垦利军分区，分别由原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改称。鲁中南军区，下辖泰山、沂蒙、沂山、尼山、滨海、泰西军分区，分别由原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军分区改称。

皖北军区，2月由原江淮军区和原中原军区所属皖西军区及豫皖苏军区一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希圣，下辖警备第1、第2旅，滁县、宿县、巢湖、安庆、六安、阜阳军分区。

皖南军区，5月组建，司令员刘飞，政治委员牛树才，下辖池州、宣城、芜当、徽州军分区。

淞沪警备区，由第33军军部于5月组建，司令员宋时轮兼、郭化若（后），政治委员郭化若，下辖第97、第98、第99、第100师及第30军3个师。

南京警备区，4月组建，由第34军军部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袁仲贤，下辖教导师、第101、第102师。

浙江军区，5月组建，由第7兵团兼，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震林、谭启龙、姬鹏飞，下辖警备第1旅，由浙江游击队一部组成；杭州警备区，由第105师兼；宁波军分区，以浙东游击纵队为基础组成；衢州军分区，由第103师兼；温州军分区，由浙江游击队一部组成；绍兴军分区，由第104师兼；以及吴兴、建德、临海、云和、金华、临安等军分区。

福建军区，8月组建，由第10兵团兼，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张鼎丞，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军分区。

五、中南地区

1949年12月，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改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邓子恢任政治委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萧克、赵尔陆任参谋长，陶铸任政治部主任，聂鹤亭、李聚奎任副参谋长，周纯全任后勤部长，陈沂任后勤部政治委员，下辖以下军区和部队：

河南军区，3月由原中原军区豫西军区全部与豫皖苏、鄂豫、桐柏军区各一部组成，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李雪峰、张玺（后），辖南阳军分区，由桐柏军区第1、第2军分区与豫西军区第6军分区各一部组成；确山军分区，由原豫皖苏军区第8军分区为基础组成；许昌军分区，由原豫西军区第2、第5军分区各一部组成；潢川军分区，由原鄂豫军区第2军分区全部与第1军分区一部组成；淮阳军分区，由原豫皖苏军区第4、第5、第7军分区各一部组成；陈留军分区，由原豫皖苏军区第1、第5军分区各一部组成；商丘军分区，由原豫皖苏军区第1、第3军分区各一部组成；郑州军分区，由原豫西军区第4军分区一部组成；洛阳军分区，由原豫西军区第1、第3军分区各一部组成；陕州军分区，由原豫西军区第1、第2、第7军分区各一部组成；警备第2旅，由河南军区第72团与许昌军分区2个独立团组成；以及第173、第174师。

湖北军区，5月由原中原军区之江汉军区全部和鄂豫、桐柏军区各一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先念，辖黄冈军分区，由原鄂豫军区第4、第5军分区合并组成；孝感军分区，由原鄂豫军区第3军分区和原江汉军区洪山、鄂中军分区各一部组成；襄阳军分区，由原桐柏军区江南指挥部与原江汉军区洪山军分区一部组成；荆州军分区，由原江汉军区鄂中军分区改称；沔阳军分区，由原江汉军区襄南军分区改称；宜昌军分区，由原江汉军区襄西军分区与原鄂豫军区第1军分区一部组成；大冶军分区，由原江汉军区鄂中军分区与洪山军分区各一部组成；以及独立第1、第2、第3、第4师，分别由原江汉军区独立第1、第2旅、原鄂豫军区独立师及第172师改称。

江西军区，5月，第二野战军解放赣东北后，由第16、第18军各1个团和第17军3个营和皖浙赣边游击队2个营组成赣东北军区，下辖浮梁、鄱阳、上饶、贵溪军分区。6月，成立江西军区，由整训第5师师直为基础组成，司令员陈奇涵，政治委员陈正人，下辖南昌军分区，由第43军第156师师直大部及2个团组成；九江军分区，由第156师师直一部及1个团组成；袁州军分区，由第44军第157师师直一部及1个团组成；抚州军分区，由第48军第161师师直一部及1个团组成；赣州军分区，由第161师师直一部及2个团组成；吉安军分区，由第157师师直及2个团组成。9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后，赣东北军区撤销，成立赣西南军区，并对军分区作了适当调整。调整后，江西军区直辖浮梁军分区，由原浮梁军分区与鄱阳军分区及原赣州军分区部队合并组成；上饶军分区，由原吉安军分区与原上饶、贵溪军分区部队合并组成，以及南昌、九江、抚州、袁州军分区。赣西南军区由第48军兼，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杨尚奎、陈仁麒，下辖吉安、赣州、宁都军分区，分别由第142、第143、第144师兼。

湖南军区，8月组建，由第12兵团兼，司令员萧劲光（前），黄克诚（后），政治委员黄克诚兼，下辖长沙军分区，由第46军第159师师直大部及2个团组成；益阳军分区，由第159师师直一部和1个团及湘中游击队组成；常德军分区，由第47军第160师师直大部和2个团及湘西游击队一部组成。9月，抽调东北军区补训第1、第2、第6师，分别作为上述3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10月，成立湘西军区和衡阳、邵阳、郴州、零陵军分区。湘西军区，由第47军兼，司令员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武光，辖沅陵军分区，由第139师兼；会同军分区，由第140师兼；永顺军分区，第141师兼。衡阳军分区，由第49军第162师师直一部和2个团组成；郴州军分区，由第165师师直大部和2个团、第162师师直一部及湘南游击队组成；邵阳军分区，由第160师师直一部和1个团组成；零陵军分区，由第162师师直大部和1个团组

成。

广东军区，11月组建，由第15兵团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随后相继组建了潮汕军分区，由闽粤赣边纵队直属团及第2、第3、第4支队组成；兴梅军分区，由闽粤赣边纵队主力与粤赣湘边纵队江南支队一部组成；东江军分区，由粤赣湘边纵队江南、江北支队各一部及9连支队组成；北江军分区，由粤赣湘边纵队连江、五岭支队组成；西江军分区，由粤中纵队三罗支队与绥贺支队组成；珠江军分区，由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第4支队组成；台山军分区，由粤中纵队组建；南路军分区，由粤桂边纵队组建；以及琼崖纵队。

广西军区，12月组建，由第13兵团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云逸，下辖龙州军分区，由第38军第151师兼；梧州军分区，由第41军第154师兼；南宁军分区，由第39军第152师兼；平乐军分区，由第49军第145师兼；柳州军分区，由第146师兼；桂林军分区，由第147师兼。同时，以由随主力南下的两广工作团干部和第13兵团补训师分别组建了宜山、玉林、百色、武鸣等4个军分区领导机构，并抽调第151、第152、第154师各1个团，作为百色、武鸣、玉林军分区的基干武装。1950年1月，将原活动于广西地区的游击队编入各军分区，其中桂中支队编入梧州军分区，桂北总队编入桂林军分区，桂东游击队编入平乐军分区，柳北总队编入柳州军分区，都宜忻游击总队编入宜山军分区，左江支队编入龙州军分区，桂西指挥部所属部队编入百色、武鸣军分区，粤桂边纵队第8支队大部编入南宁军分区，小部和贵县游击队编入玉林军分区。并以这些游击队整编为独立团或独立营。

六、西南地区

1950年2月，西南军区正式成立，由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李达（兼）、张经武任参谋长，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王新亭任副主任，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下辖以下军区和部队：

川东军区，1月组建，由第3兵团兼，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谢富治，辖万县军分区，由第11军第33师兼；大竹军分区，由第32师兼；酉阳军分区，由补训师兼；重庆警备司令部，由第12军第34师兼；璧山军分区，由第35师兼；涪陵军分区，由第36师兼。

川南军区，1月组建，由第10军兼，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大章、彭涛、王维纲，辖宜宾军分区，由第28师兼；内江军分区，由第29师兼；乐山军分区，由第30师兼；泸州军分区，由第16军第48师兼。

川西军区，1月组建，由第60军兼，司令员张祖谅，政治委员李井泉，辖绵阳军分区，由第178师兼；茂县军分区，由第179师兼；眉山军分区，由第180师兼；温江军分区，由第18兵团补训团和第180师一部组成。

川北军区，1月组建，由第61军兼，司令员韦杰，政治委员胡耀邦，辖遂宁军分区，由第181师兼；剑阁军分区，由第182师兼；达县军分区，由第183师兼；南充军分区，由第61军抽调干部和部队组成。

西康军区，1月组建，由第62军兼，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辖西昌军分区，由第184师兼；雅安军分区，由第185师兼；康定军分区，由第186师兼。

贵州军区，1月组建，由第5兵团兼，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辖贵阳军分区，由第5兵团抽调干部和部队组成；遵义军分区，由第16军兼；铜仁军分区，由第46师兼；毕节军分区，由第47师兼；安顺军分区，由第17军兼；兴仁军分区，由第49师兼；镇远军分区，由第50师兼；独山军分区，由第51师兼。

云南军区，3月组建，由第4兵团兼，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辖滇南卫戍区，由第13军兼；滇西卫戍区，由第14军兼；文山边防区，由第13军直属队与桂滇黔边纵队第4支队组成；

蒙自边防区，由第 38 师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10 支队组成；思茅边防区，由第 39 师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9 支队组成；保山边防区，由第 41 师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7 支队 1 个团组成；玉溪军分区，由第 37 师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8 支队组成；大理军分区，由第 40 师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7 支队 1 个团组成；曲靖军分区，由第 15 军直属队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6 支队 2 个团组成；丽江军分区，由第 42 师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7 支队 1 个团组成；昭通军分区，由第 43 师与桂滇黔边纵队第 6 支队 1 个团组成；武定军分区，由桂滇黔边纵队第 1 支队 2 个团与滇北独立团组成；宜良军分区，由桂滇黔边纵队第 2 支队与第 3 支队 3 个团组成；楚雄军分区，由滇中独立团组成。

在调整、组建各军区、军分区机关和部队过程中，还健全、组建了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做到县有大队，区有中队。同时，针对野战部队的一部分指战员不愿转为地方部队，和另一部分人认为野战部队艰苦，要求转到地方部队工作的两种倾向，普遍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深入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向广大指战员反复说明在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人民立新功。由于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调整、组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对由南方游击队和收编的游杂武装组成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在组建的地方武装中，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武装是由游击部队和收编的游杂武装组成的。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与优势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经受了考验。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向全国进军后，这些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收编了一些成批的和零星的游杂武装和人员，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特务、土匪分子也趁机混入，致使相当一部分游击队成分复杂，思想混乱。这些游击队和游杂武装组成军分区及县区地方武装后，相继出现了

逃亡，违反政策纪律，叛变投敌，破坏暗杀等现象。根据这种情况，各地区在各大军区、各中央局的统一部署和各级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与各军区、军分区首长亲自主持下，集中机关干部和部队骨干，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宁缺勿滥的方针，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肃清了国民党特务和土匪以及地痞流氓分子，动员老弱病残人员回地方工作；抽调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干部和优秀战士充实到地方武装，动员贫雇农出身的青年入伍，从而保证了人民武装组织上的纯洁性。在此基础上，对广大指战员进行阶级教育、人民军队宗旨教育、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制度，以及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发展成分好、经过战斗考验的优秀积极分子入党，在组织上保证了党的领导。经过整顿，提高了这些部队的政治质量，从而为担负维护治安，剿灭土匪，保卫各级地方人民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节 改造起义、投诚部队

一、改造起义、投诚国民党军的方针和政策

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遵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解决残存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大批国民党军纷纷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据统计，从1949年2月至1950年5月，共有126万国民党军官兵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其中，成建制的有1个军政长官公署、3个绥靖公署、2个警备总部、8个兵团部、31个军部、126个整师。还有飞机15架、海军舰艇75艘。

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加速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覆灭，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1949

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领时，曾指出：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但这些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的部队，成分复杂，大致有以下4种类型：一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部分人数最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时间长，中毒深，对蒋介石集团抱有一定的幻想。二是地方实力派的部队或国民党内除嫡系以外的其他派系，如西北系、四川系、青宁马家军等。这部分军队长期受国民党嫡系的歧视和排挤，与蒋介石集团有矛盾，但他们带有浓重的地方封建势力色彩。三是一部分官僚政客乘国民党政府混乱之际收编的游杂部队，如四川的王缙绪、范绍曾等人的部队，这部分成分最为复杂。四是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上述部队，有一部分是真正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而起义的，但他们必竟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的部队，人员复杂，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由于这些部队中的大部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压境或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在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以前，大多数部队没有共产党的工作和起义的思想准备。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后，虽然脱离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但多数人的立场、思想、作风仍然是国民党的一套。因此，在起义后，他们中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分子制造、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打枪打炮，制造混乱；有的部队还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有着浓重的正统观念，甚至留恋过去的腐朽生活，怕清算斗争，怕今后生活无着，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甚至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土匪恶霸，封建帮会头子相勾结，发动叛乱。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地区起义部队在起义后的半年时间中，共有27个大小单位共3万余人叛变，杀害西南军区派出人员

100 余人；新疆起义部队先后发生 20 余起共 4000 余人的武装叛乱；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第 36、第 37 军和骑兵第 4 师后，仅第 36 军和骑兵第 4 师就发生叛变事件 56 起，人数达 3200 余人。因此，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那样，用北平、绥远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①。人民解放军的各级领导都应该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

上述情况表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彻底肃清这些旧军队内的反革命影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对起义的高级将领和部队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和亲切的关怀，每当收到起义的高级将领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都亲自去电嘉勉，表示欢迎，勉励他们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认真学习和遵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加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对起义的国民党军海、空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更是寄予厚望，勉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空军技术，为建设新中国的海、空军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空军建设的先锋。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还在百忙中接见一些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起义的高级将领，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

为了尽快将投诚、起义部队改造为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425～1426 页。

中央军委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起义部队、起义将领必须首先做到公开通电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与蒋介石集团划清界限，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此前提下，一方面坚持对起义部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另一方面在改造步骤、生活待遇、使用上给予适当照顾。

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致各战略区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了对原国民党军军官的处理方针：要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靠拢者，应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人民解放军建设上所必需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才，只要政治上不反动，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须集中经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再分配工作；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政治上可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靠拢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先经政治训练后给予适宜的工作出路；反动和腐化的军官，应由人民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加以监视，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

8月5日，中共中央在得悉程潜、陈明仁部起义后，致电华中局和湖南省委：在人民解放军接管长沙后，应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中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予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在程潜放心、愿意的条件下，应争取程潜及其军政机关留在长沙，以便商量改编、接收等项问题。如程要求留下一部分亲信军队为守卫之用，应予同意，并告诫人民解放军以礼貌对待他们。同日，毛泽东在给程潜、陈明仁的电报中说：为对抗广州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

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10月5日，中央军委就陈明仁部整编问题致电华中局：根据陈明仁、程潜目前的表现，军委决定将该部编为1个兵团。应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适当时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如该兵团表现好，一年后可考虑再编1个军加入该兵团，对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应注意与陈明仁等搞好团结。

9月13日，中共中央在致驻新疆联络员邓力群的电报中指出，新疆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整编。19日，中共中央在致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西北局的电报中又指出，新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并获得和平解放后，中央准备考虑成立新疆军政委员会，统辖军政财经各方面工作。除中共方面的人外，拟请张治中、陶峙岳、鲍尔汉等人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

10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省军区司令员姚喆和政治部主任裴周玉时指出：绥远成立军政委员会，傅作义任主席，乌兰夫任副主席，这是统一战线。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先进行思想改造，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我们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因为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是不会罢休的。凡愿意与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很好与他们合作；那些坚决反对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派去绥远的政工人员要进行教育，要他们研究新的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要做好工作，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有前途；国民党的1000万军政人员，我们都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29日，毛泽东在致薄一波的电报中指出：“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

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商酌。”^①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略区都把改造投诚、起义部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下发了文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第一野战军把改造起义部队作为保证新疆和平解放胜利的头等重要任务，1949年10月7日，彭德怀在甘肃酒泉会见了新疆起义将领陶峙岳，向他详细阐明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对改编中官兵安置、教育改造等问题的设想。随后，王震与陶峙岳具体商定了改编方案。10日，王震在第2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对改造起义部队工作作了详细阐述。他指出：我们进军新疆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中国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团结大旗，必须对起义军队的官兵采取诚恳热忱的欢迎态度。在有步骤地坚持彻底改造原则下运用灵活的方式方法，对起义部队官兵有计划的正确的进行关于人民政协会议、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文献、八项和平声明、国内和平协定、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教育。要选派坚强而有较高政治文化水平的政治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去工作，在4个月至半年时间内，使起义部队官兵中产生积极分子，并普遍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有了初步认识后，再进行诉苦教育，将其改编为吴化文、曾泽生式的人民解放军。他还强调指出：必须深刻认识一个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国民党军队，要转变成为人民解放军，不经过艰苦的思想教育和群众路线与民主方法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革命政治工作，不但团结士兵，而且是争取其大部军官的改造，少数淘汰（仍给以生活出路），慎重的镇压个别死心塌地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02页。

反革命破坏。在2个月内，一切采取原封不动。我们对于解放新疆，彻底改造起义军队，改造旧政权，不是简单撤换与洗刷他们，而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改造他们，使之站在人民祖国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人民服务，与我们团结合作，参加新疆的伟大建设事业。

西南地区在全国属最晚解放的地区，也是国民党军投诚、起义部队最多、情况也最复杂的一个地区。为此，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将改造投诚、起义部队作为1950年上半年的中心工作，并根据西南地区投诚、起义部队的情况，提出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其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改造、处理方针。1950年1月10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出了《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指出：数量巨大的国民党军投诚、起义部队，“不仅增加了我们极大的财政负担，而且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因为西南的大部分封建代表人物及不少反动分子，都集中在这些部队中。我们在城乡的各项革命设施都与他们有极密切的关系，甚至成为直接的斗争对象。他们手上还拿着武装，还会利用其起义的政治地位去威胁群众，企图尽可能地保护其固有特权。所以消化与改造这几十万人的工作，是与其他工作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不能粗枝大叶、感情用事。在原则上，我们必须坚持彻底改造的方针，但在方法上必须有策略，有步骤，细心耐烦，分别不同对象，分别先后缓急，以免由于我们处理不慎，迫使他们流为土匪，反会阻碍群众发动，损坏群众利益，增加我们极大的麻烦。”指示详细规定了改造、处理的政策、方法和步骤。对于国民党嫡系部队，总的方针是，逐渐做到彻底混编。在方法上，第一步按原番号不改名义、不换符号军帽，分别由有关军区或军负责集中整训。第二步按其实有人数，编成军或师，并应酌情照顾其高级将领，给以适当名义，对其中表现较好者，亦可分配以军师

的主官职位。多余军官组成专门训练机构，集中学习。第三步在政治条件成熟后，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实行彻底混编。对于地方实力派的部队，应在政治上给予适当照顾。在军事上可允其保留原有部队，但需调离国防边境，按实际人数实行整编，给以番号，干部可以以原有者为主，由西南军区派少数得力干部去帮助其改造。对于由官僚政客乘机收编的部队，第一步应严禁其扩大，并限期开离原地，到指定地点集中整编。第二步将老弱及劳动农民遣散回家，其余分编于人民解放军中逐渐改造，其干部除录用一部外，均集中学校训练改造。对于地方保安团队及游杂武装，应以分区为单位，限期另地集中整编。整编中，应将其中的劳动者另行集中，进行短期阶级教育后，大部遣散回家参加生产；少数最好的分子，可分配至县区武装任战士；无业游民编入正规部队改造；军官送各军分区举办的训练班学习改造。

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对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他说：对起义部队的改造，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他们。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民主。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要召开大会、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要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并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间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制度。

中南军区提出了“既往不咎，准许审辩，不污辱人格”的改造原则，和“酝酿、准备，展开，巩固”的工作步骤。华北军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也制定了改造董其武部的方针、步骤。

二、改造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述方针和处理办法和各地区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

编部队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主动在 frontline 起义和按照“绥远方式”起义，对加速战争进程起较大作用和较有影响的部队，在进行初步的教育后，授予番号，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如对张轸、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等部，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教育改造，使其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对其他被迫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部队及杂色部队，如对西南地区的起义部队，则首先派出工作团，对其进行整训，提高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然后拆散原建制，分散编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战略区选调了大批干部和优秀战士到投诚、起义部队工作。第 1 兵团根据西北军区关于抽调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入疆的人民解放军的 1 个师抽调配备起义部队 1 个师的政治干部，并具体分工：第 2 军第 4 师负责骑兵第 8 师；第 5 师负责第 27 师；第 6 师负责第 25 师；第 6 军第 16 师负责第 26 师；第 17 师负责骑兵第 7 师。按照这一决定，第 1 兵团共抽调干部 1070 名、战士 153 名和参军学生 600 余名到陶峙岳部工作。第 19 兵团抽调 429 名干部、战士到起义的第 81 军工作。华北军区先后选调近 2000 名政治干部到绥远董其武部工作。中南军区选调 4000 余名干部到陈明仁部工作。西南军区组成 4 个军事工作团，分赴起义的第 16、第 7 兵团和第 24、第 95 军工作。其他起义部队则由各军区派工作团实施改造，并规定川东军区负责原第 18 兵团及第 235 师；川南军区负责原第 72 军；贵州军区负责原第 89 军；云南军区负责卢汉起义部队。西南军区还于 1950 年 2 月 20 日发出了《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要求各工作团到达各起义部队后，应即在兵团部或独立军的军部，吸收有关主管人员，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该部队的改造工作，并分别委派干部到军、师、团、营、连部为军事代表。规定了军事代表的职权与任务：在部队中推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实行经济、政治、军事三大民主，改善官兵关系，改造官兵思想，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善军民关系，使之迅速符合于人民军队的标准，以便及

早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改造过程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的职权，凡部队对上报告、对下命令以及其他的正式公文函件等，各军事代表均得签署，方能视为有效，以示负责；负责沟通与就近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团体之关系，解决部队中的困难。工作团到达后，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不得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以取缔。贺龙司令员还专门接见了工作团的部分人员，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派赴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进行工作的干部，在出发前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学习有关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必要的制度和纪律。这些工作团和政治干部到达各部队后，首先了解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联络感情，稳定部队官兵的思想情绪。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部队，人员复杂，思想混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长期接受反共教育，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了解，成见很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和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不少军官在思想上仍然怀念、留恋过去的的生活，怕参加解放军后生活艰苦，家庭生活下降；怕士兵在民主运动中揭发批判；怕改编后无依靠，生活无着。在士兵中，虽然大部分出身劳动人民，比较容易接近，工作比较好做，但大多数人思家心切，盼望早日退伍回家；也有一部分因为反动军官和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存在着一些对立情绪和种种疑虑，以至出现大量逃亡。因此，稳定思想情绪，消除各种思想顾虑，就成为团结、改造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的一项首要工作。为此，各工作团和政治工作干部根据不同部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稳定官兵的思想情绪。

华北军区的干部到达起义部队后，成立了由起义部队的军、师

高级军官和政治干部参加的高级研究班，统一对改造工作的认识，共同研究讨论整编部队、改造部队、建立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其他各种制度等问题。在研究讨论中，华北军区的派出干部坚持以理服人、以斗争求团结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稳定了起义部队中高级军官的思想，在许多问题上与他们取得了共识。西南军区的工作团到达起义部队后，向部队上层传达了西南军区关于改造的命令、指示，与他们共同研究改造的方法、步骤，制定改造方案。使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诚意，消除了思想顾虑。西北军区为了稳定起义军官的思想，专门请爱国将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军到新疆视察工作。张治中到新疆后，向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和机关干部作了题为《怎样改造》、《再谈怎样改造》的长篇讲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黑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张治中将军情真意切的话语，稳定了大部分起义军官的思想情绪，对改造起义部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各工作团和派出干部都吸收原部队中的爱国将领和进步分子，在团以上领导机关组成军政委员会，在营连组成军政小组，共同领导部队的改造整编工作。采取召开各级军官大会、全体官兵大会和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等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着重指出，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号召，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走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道路，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义举，是光荣的。阐述中国共产党对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团结改造的方针，和爱国一家，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使广大官兵消除了怀疑、顾虑和抵触情绪；将部队中的原政工人员和电讯人员调出原单位，组织学习，并收缴电台；取缔、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和一切特务组织，禁止各种非法活动；公开揭露和打击极少数特务、反动分子的破坏、抵制和捣乱活动；在军事上坚决剿灭叛乱的小股部队。并

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依法逮捕法办以至公开镇压作恶多端的叛军头目，耐心教育争取大多数胁从者，并发动他们对叛军头目进行揭发批判，帮助他们辨明是非，划清界线，提高觉悟。

在初步稳定思想情绪的基础上，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广大官兵过去的反动立场、观点、思想和军阀作风，派到上述部队的工作团和干部，充分运用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相继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及两种社会、两种政府、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和民主运动。在教育中，首先组织广大官兵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通过印发有关材料、讲课、读报、参观访问等各种方式，介绍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使广大官兵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解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作风、纪律和新型的官兵关系。然后通过典型引路，召开诉苦大会，发动广大士兵群众控诉在旧社会、旧军队中个人和家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并通过算账追根，使他们明白了穷苦的总根源是万恶的剥削制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剥削制度，才能彻底翻身解放，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结合上述教育，各部队广泛开展了民主运动，建立连队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民主组织，提倡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制度，召开民主生活会，引导官兵自觉坦白和揭发本人及别人在旧军队、旧社会所参加的反动组织和做过的坏事，以求与反动组织和反动思想决裂，进而从思想上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通过上述教育，使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的广大官兵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划清了敌我界线，初步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和观点，认识到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军队的本质区别，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纷纷表示，要永远跟党走，革命到底，那些暂时还未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的起义、投诚部队的官兵，要求早日编入人民解放军。如起义的原

国民党军第7兵团有士兵1.02万人，经教育后有9515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决心书，其中有752人还写了血书，4546人在决心书上盖了血指印或用鲜血签了名。

改造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关键是改造这些部队的军官。为此，各战略区都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下很大的功夫去做这项工作，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训练班等，对这些军官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工作。西北军区按照“统一包下，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用改造”的原则，除组织起义军官参加部队的民主诉苦运动外，着重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集训起义军官。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1950年集训了1774名起义军官。西南军区按照“团结、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从起义、投诚部队中抽调了7万余名军官，分别送军政大学总校和分校学习训练。华北军区在绥远军区成立了学习团，轮流训练各级起义军官，前后共训练连以上军官4500余人；各军、师还举办了教导队，训练班、排长2000余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对那些作用较大的起义、接受改编的部队，如湖南陈明仁、绥远董其武、新疆陶峙岳等部，及时给予番号、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并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对部队的人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对这些部队的起义军官，基本按原职使用，有职有权，放手大胆使用，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教育和提高；对编余军官，则按情况转业到地方工作。与此同时，在这些部队中建立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制度，选派有政治工作经验的优秀政工干部到这些部队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教导员、指导员；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出身成分好，经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快，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人民军队的宗旨有较深刻认识，在各方面都表现非常突出，又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优秀积极分子加入党团组织，使整个部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执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各种条例、条令。如西北军区，于1950

年在第 22 兵团发展党员 2728 名、团员 1395 名，建立党支部 182 个，基本做到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

其他起义、接受改编和投诚部队，则拆散原建制，分别补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如西南地区的起义部队，经教育改造后，原国民党军第 18 兵团补入西南军区所属川东军区部队及第 12 军，原第 72 军及第 44 军 1 个师补入川南军区，原第 127 军补入川北军区，原第 20、第 95 军等部补入川西军区，原第 19 兵团等部编入贵州军区，原卢汉起义部队补入云南军区，原第 24 军等部编入西康军区。第 7、第 15、第 16、第 20 兵团则调离西南，由西北、华东、中南军区进行进一步的改造，然后补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上述部队的军官，则视不同情况，进行分别处理，对率部起义且有影响的高级将领，给以适当的安置；对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安排到院校执教；对年龄较轻，罪恶不大且有文化、有技术的下级军官则留在部队；对留之无用，放之无害的，则进行复员或资遣回乡；对老弱残疾而又无家可归者，则教育留养；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恶霸及其他坏分子，进行管训或依法处理。

由于各战略区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对起义、接受改编和投诚部队的政策，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成功地将 120 万余国民党军起义、接受改编和投诚部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些部队和人员，在后来的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卷结语

从1949年2月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即战略追击阶段。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以渡江战役为起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残存在中国大陆及近海岛屿的国民党军展开猛烈追歼，至1950年5月大规模作战即告结束，先后消灭了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集团及阎锡山集团残部。

在1949年2月至1950年6月的17个月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进行较大的战役、战斗3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非正规军3个军政长官公署，8个绥靖公署，2个警备总部，1个长官司令部，1个省保安司令部，20个兵团部，98个军部，368个整师，14个师部，298个整团，198个整营及营以下共计311万余人。其中，俘160.5万人，毙伤24万余人，起义71.2万余人，接受改编4.3万余人，投诚50.8万余人；毙俘国民党军师以上军官676名；缴获各种枪151.8万余枝，各种炮1.7185万门，掷弹筒9397具，枪榴筒6596个，火焰喷射器65具，飞机86架（包括起义的6架），舰艇110艘（包括起义的33艘，投诚的6艘），坦克109辆，装甲车100辆，火车头159个，汽车1万余辆，骡马7.6万余匹，各种子弹1659.6万余发，各种炮弹293.6万余发，炸药24.9万余斤，电台1468部，报话机516部，电话机1.1492万部；击落、击毁飞机24架，击毁军舰9艘、坦克16辆；解放了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共16个省，争取了绥远、新疆、云南、

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1951年5月，又和平解放了西藏，统一了中国大陆。至此，中国领土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香港、澳门、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外，均告解放。在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1949年10月1日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在进军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还认真执行了工作队的任务，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参加城市接管；调大批部队参加剿匪作战，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了工农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作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及“持久作战”、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图谋，结束了其在中国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使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它标志着1个多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几千年以来封建主义和20多年以来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中国人民历史的终结，中国从此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并以崭新的面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大大鼓舞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全军进行了整编，统一了部队的编制体制；制定颁发了各种条令条例；改善更新了武器装备；组建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领导机关和部队，成立了大批军事、政治、后勤各类院校；改造了大批起义部队。为进一步加强人民解放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保卫国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战略追击阶段，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建设，与前几个战略阶段相比，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主要是：第一，总的情况是

我强敌弱，人民解放军占绝对优势，敌退我追，敌被动我主动。然而，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歼，但残余数量仍然不少，有些还有相当战斗力，在个别局部地区依然是敌强我弱。有的退守边远地区，有的盘踞海岛。热带亚热带山地作战特别是岛屿作战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新课题。第二，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在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作战，面临着战斗队和工作队的双重任务。第三，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人民解放军面临着前线作战和后方大规模剿匪的双重任务。第四，随着全国大部地区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民解放军面临着作战和保卫国防的双重任务。第五，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追击可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战略追击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是中央军委实行战略指导的前提，也是制定新的战略方针的主要依据。人民解放军在1年多的时间里，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并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

（一）在全体指战员中，坚持不懈地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决战之后的国内外形势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全党全军必须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才能保证这一战略任务的完成。在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形势发展迅速，部队思想异常活跃，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有碍于将革命进行到底战略目标的实现。战略决战之后，随着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被歼，在蒋介石又玩弄和平阴谋的新形势下，部分人员产生了幻想和平、轻敌麻痹、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右倾保命等错误思想，认为“蒋介石被打痛了，真的要和平了”，希望“回家过安生日子”；有的则乡土观念严重，不愿离开家乡到江南去。渡江战役前夕，部分人员的思想又有反复，有的惧怕江水，夸大江南生活的困难；少数甚至怕帝国主义出兵干涉。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

部署加速向全国进军，胜利指日可待。但部分人员中松懈轻敌、保命离队等错误思想又有所滋长，认为“敌人只剩下几个残兵败将，慢慢收拾就行了，没有必要把部队搞得太紧张”；有的则担心将来“大老粗没有用了，不如早转业找个饭碗”；有的对渡海作战存有恐惧心理，认为用木帆船渡海作战“九死一生，有去无回”，“这回可革命到底（海底）啦！”等等。

针对不同时期部分人员中暴露出来的各种思想问题，各野战军适时进行了政治教育。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后的整训中，深入学习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认真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反对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组织学习新华社五评白皮书等有关文章，正确认识美帝国主义，在全军广大指战员中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蔑视帝国主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渡江战役前夕，第二、第三野战军江畔厉兵，激励指战员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进军过程中，各野战军还利用战役间隙，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及时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部队还结合渡江、渡海作战遇到的具体困难，群策群力，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坚定广大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信心。此外，还针对南方的气候和地理特点，开展“兵强马壮”、“人强马壮”运动和团结互助教育；各部队还进行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教育，进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进行与南方各游击队团结会师教育；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进行民族宗教政策等方面的教育。由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卓有成效地保证了全军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以锐不可当之势，突破江防，长驱直入，斩关夺隘，猛追穷寇，迅速消灭了国民党军残余，解放了中国大陆和大部分近海岛屿，顺利地接管了新解放的城市，剿灭了乡村土匪，从而粉碎蒋介石依托江南半壁河山和边远省份负隅顽抗、重整军备、卷土重来的迷梦。实践证明，战争越接近胜利，就越要抓好以形势与任务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要求去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

不断解决部队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才能使战争的
最后胜利具有可靠的保证。

(二) 在大进军的同时，做好应付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
涉的准备，使其有所畏而不敢出兵

在战略追击阶段，帝国主义为阻止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
胜利，有的蠢蠢欲动。如何应付和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
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对此，中共中央指
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
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
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
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
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
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①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任务并尽量减少革命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对帝国主义采取
“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的斗争方针。沪宁杭地区是国民党的
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为对付
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
三野战军协力经营苏浙皖闽，联合发起渡江战役，并准备与美帝
国主义直接较量。同时，以华北军区直属部队与第四野战军特种
兵主力拱卫平津，防止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袭扰后方。紫石英号事
件，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态度，迫使英美军舰
于上海战役前夕撤出吴淞口。沪宁杭地区大部解放后，帝国主义
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相对减小。为此，中央军委改变了第二野战军
两年之内留在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的原议，于1949年5月23日就
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重新作出部署，使进军范围由9个省扩大到
16个省，即尽速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力量并占领沿海各主要
城市，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丧失藉以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助力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73页。

量和沿海登陆条件。28日，中央军委又作出预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对策和部署：“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① 据此，在部署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奋勇向全国进军的同时，为防止美蒋袭扰后方，中央军委以第20兵团于太原战役后开赴平津地区驻防；以第四野战军第42军留在河南，担任平时剿匪有事增援华北的任务；第19兵团于宁夏战役后位于西安、宝鸡地区，准备随时增援华北；第三野战军主力则位于沪宁杭地区。由于中央军委的正确部署与预筹，随着16个省区和沿海城市的解放，帝国主义势力亦被驱逐出中国大陆。历史证明，中国革命越接近胜利，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正确地分析判断形势，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预有准备，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才能使帝国主义有所畏而不敢出兵，进而保证革命的航船顺利抵达胜利的彼岸。

（三）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和长距离追击、穷追猛打的不同的作战方针

战略决战特别是渡江战役后，国民党被迫采取“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即不再固守城市和地方，力避与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牺牲空间，支持时间，保存实力，企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在这一方针下，国民党军以西南诸省、海南岛和台湾等地为战略退路，利用各种地形迟滞和消耗人民解放军，但见势不妙即大踏步后撤和逃跑。因此，用什么方法尽速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即成为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追击阶段的主要课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变化，并针对各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0页。

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在华东战场上，针对国民党军企图依靠长江防线固守江南的情况，中央军委采取了全线渡江和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的作战方针，使汤恩伯等部处于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穷追猛打、骤不及防而被各个歼灭的境地。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虽然在兰州战役前数量上还占有一定优势，但其背靠荒漠高原没有回旋余地，中央军委对其采取了近距离迂回包围与穷追猛打相结合、一口一口吃掉的作战方针，首先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创，然后分路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迫使马步芳在兰州与第一野战军决战。兰州战役后，第一野战军又分路猛追，使马家军迅速归于消灭。在中南战场上，根据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既力避与解放军主力决战、又善于集中主力进攻解放军之一路的作战特点，中央军委对其实行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第四野战军不为白崇禧的当面部署所左右，而以主力大胆地从白崇禧集团的两翼迂回到其深远后方，断其逃往国外或海南岛的道路，从而使骄狂的白崇禧一筹莫展，使桂系部队全军覆没。在西南战场上，根据胡宗南主力位于秦岭地区而川黔方面兵力空虚的态势，以及国民党军随时准备外逃的情况，中央军委对西南地区之国民党军同样采取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第二野战军主力由湘西直插成都以南，断其经贵州、云南逃往国外的道路。同时，第18兵团由秦岭地区跟踪南下，使胡宗南等部数十万国民党军几乎没有什么抵抗而被兜歼于成都地区。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国民党军在完全被动和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或被歼，或溃散，或起义，或投诚。实践证明，大迂回大包围、长距离追击、穷追猛打并辅以近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适应了解放战争战略追击作战的新特点，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追击阶段的应用和发展。

（四）根据形势和作战任务的需要，及时调整战区领导机构和兵力组成，实行各野战军、各兵团的战略战役协同，必要时打破野战军建制，灵活用兵，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①。在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3个兵团全面出动，战线广阔深远，情况复杂多变，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军事干涉。这就要求解放军必须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指挥、明确的目标和整齐的步伐。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除明确划分各野战军的经营地区、协调各野战军的进军步骤和战役顺序外，还根据形势与作战任务的需要，及时组织或调整战区领导机构和兵力组成，同时加强对各部队间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必要时打破野战军建制，灵活用兵。为确保渡江战役的胜利，除成立渡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外，中央军委还将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以牵制白崇禧部不能移兵向东。第四野战军渡江之前，由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之后又根据渡江战役后的战略态势，将第二野战军的第4兵团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使之成为求歼白崇禧主力的东路军和南路军。广东战役前夕，成立隶属华中局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协调野战军与地方游击武装之间的关系，组织指挥了广东和海南岛战役。为攻克太原，组成了太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第18、第19、第20兵团。太原战役后，第18、第19兵团和第19军改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向西北进军。为经营西南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统一领导西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并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划归第二野战军指挥，以第四野战军之第42、第47、第50军暂归第二野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6页。

军指挥。为进军云南，又以位于桂西的第四野战军第38军一部暂归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指挥。如此等等。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作战任务的需要，及时组织调整了战区领导机构和兵力组成，注意抓好部队间的战略战役协同，并能因势而宜，灵活用兵，从而充分发挥了解放军的整体优势和效能，大大缩短了作战时间，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五) 在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退却和全面崩溃的条件下，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运用政治攻势瓦解国民党军

瓦解敌军是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到战略追击阶段，它已具有大规模解决国民党军的战略意义。战略决战之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其内部四分五裂，众叛亲离。对大批国民党军包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内，实施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减少部队伤亡，避免城市遭受破坏以利将来经济建设，也必须充分利用解放军的声威，对国民党军残余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实施政治瓦解。为此，毛泽东发展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瓦解敌军的基本原则，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余的“三种方式”。解放军在进军的过程中，正确运用了这“三种方式”，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一面不断加强军事压力，随时做好以战斗方式解决国民党军的准备，坚决消灭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军；一面利用国民党军营垒内部的慌乱和各派系之间的矛盾，通过公开宣布各项优待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的政策，派遣各种有关人员，深入国民党军内部做策反工作等各种方式，展开政治攻势，大力瓦解国民党军。在1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共争取126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占这一阶段歼灭国民党军总数的1/3强，兵不血刃地解放了长沙、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地。成都战役，国民党军共有6个兵团，其中5个兵团在军事压力下，通过政治争取，实行战场起义。连国民党军的战史

也不得不承认：“成都一役，因受整个西南军政弊害之积累，与大陆颓势汇聚之影响；益以叛异峰起，变生肘腋；战场隔离，兵力残破；处处陷于孤绝，危局无可挽回，良深痛惜。”^①

（六）继续贯彻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先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后取广大农村

战略决战之后，国民党仅靠汤恩伯、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等几个重兵集团支撑残局。解放军打掉国民党军一个重兵集团，其防御大厦顿时坍塌一大片，并且根本无法修补。因此，解放军只有继续贯彻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军的抵抗，加快战争胜利的步伐。同时，国民党军由于兵力有限，只能以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为基点布防和苟延残喘，靠铁路、公路、水路增援或逃命，根本无法顾及广大农村。解放军要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就必须全力摧毁国民党军以城市为中心的作战防线，夺取这些城市，控制交通要道，使其无穴可钻，无路可遁。此外，由于战争临近结束，和平建设即将开始，占领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有利于增强解放军的物资供应能力和作战机动能力，推进胜利的早日到来，而且有利于将来的经济建设。为此，毛泽东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先城市后乡村的新的方针。他说：“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②

人民解放军本此原则，实施战略追击作战。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直指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沪宁杭地区，迅速占领南京、杭州、上海等一大批城市，控制了沪杭、浙赣铁路。第三野战军在进军福建中径取福州、厦门。第四野战军在进军中南时，直下武汉、长沙、衡阳、广州、桂林、柳州、南宁，打通并控制了粤汉铁路。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占领西安、兰州，控制陇海路西段。第二野战军先取贵阳、重庆，封锁长江上游，继

^① 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2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7页。

取成都。解放军在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同时，注意对大城市和交通命脉的夺取，然后腾出手来，再收拾溃散在乡村僻野的国民党军和土匪。人民解放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强大的声威，迫使国民党军或来不及破坏城市而逃跑，或在逃跑途中被歼，或起义投诚。但也有像太原、上海、兰州等一些城市，是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才解放的。解放军在组织攻城时，注意了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以利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

(七) 建立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系统，切实保证大兵团远距离行军作战的需要

向全国进军，四大野战军全部出动，实施远距离的连续行军作战，所需粮食和各种作战物资之巨是空前的。这就大大增加了后勤保障的艰巨性、急迫性和复杂性。原以各大战区为单位自行组织自行解决的后勤保障方式，已不完全适应战略追击阶段作战的需要。只有在继续发挥各战区后勤保障功能的同时，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才能确保向全国进军任务的完成。为此，中央军委将后勤工作由各战区独立自主、分散经营的方针，转变为全军统一领导、分区负责的方针。在统一领导方面，属于全军的后勤工作，由中央军委后勤部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调度、统一供应标准；健全和充实全军后勤系统的编制，各野战军统一编设后勤分部、兵站、医院、辎重部队、汽车部队等专业部队；战略后方的军火生产，前线所需的重要物资，由中央军委后勤部统一安排和调拨。例如，经中央军委后勤部申请，中央财经委员会拨出银元 2355 万元，供各野战军在新区使用，对部队克服困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分区负责方面，由各战区和各野战军组织各自的兵站、运输线，自筹大部粮食、被服和作战物资；动员组织民工、民兵支前，自行组织战勤支援和随军保障等。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华北的大部物资支援第一野战军，东北及中原的物资支援第四野战军，华东、华北及东北的一部物资支援第二、第三

野战军，第一、第二野战军向新疆、西藏进军前后，华东、华北、东北地区支援了一批运输工具和大量物资。各种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前线，有力保证了作战进军任务的完成。西北军区后勤部在1949年后勤工作的报告中写道：我们之所以能够使前方的供应不断、保证了历次战役的胜利，首先在于中央对后勤工作的统一与统筹供应；否则，我们要达到不断保证前方的需要是很困难的。中央军委加强对后勤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不仅保证了战略追击作战的胜利，也为以后解放军后勤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八）在革命战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军队应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的双重任务

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来就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的。它不仅是消灭敌人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一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改造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是人民解放军固有的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实保证。遵照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解放军在战略追击阶段在执行战斗队任务的同时，派出成建制的部队，在中共地方党委的领导下，接管城市，建立政权，剿灭土匪，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为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涌现出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大批英雄群体，受到党和人民的称赞。

在执行工作队任务的过程中，全军各部队首先抓好思想教育，提高全军指战员对工作队战略意义的认识，切实纠正“剿匪不是野战军的任务”、“野战军做地方工作是降价，没出息”等糊涂认识，使工作队思想深入军心。其次抓好政策与纪律教育，使广大指战员真正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打击敌人、团结群众、建立政权、稳定社会的有力武器，进而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各项

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入城守则》、《入城纪律》、《城市生活注意事项》等纪律规定，要求指战员切实遵守，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其三是，正确处理战斗队与工作队任务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在部署执行工作队或战斗队任务的同时，十分关注战斗队或工作队任务的执行情况。决不能因执行工作队任务而影响战斗队任务的完成，也不能片面强调执行战斗队任务而忽视工作队任务。

后 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是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部长林登泉，副部长曾庆洋、支绍曾及第一研究室原主任刘国语，主任陈伙成领导下编写的。

参加本卷撰写的人员及分工是：华国富第1、第2、第3、第9章，第8章第1节；温瑞茂第4、第6、第7章和本卷结语；赵焕明第5章，第8章第2节。

初稿几经修改后，在林登泉部长的主持下，邀请沈宗洪、姚杰、毕建忠、唐义路、黎连荣等专家进行了评审。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对全书再次作了修改。

全书由华国富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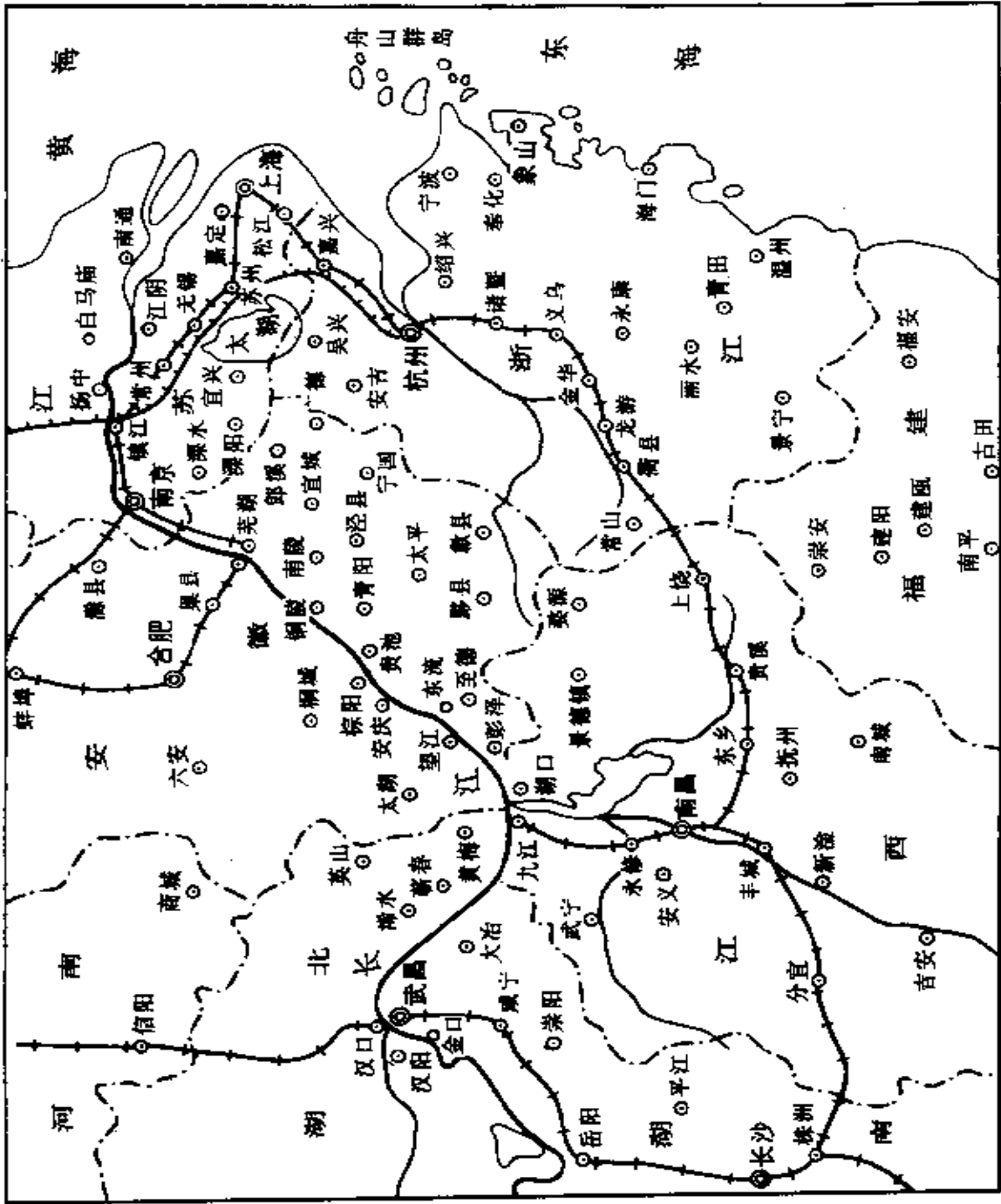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广泛吸收了近年来史学界有关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使用了南方各游击纵队史，当代中国海、空军卷，军队院校发展史等有关史书中的一些资料。同时，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等单位为本书提供了资料。在此谨向有关编者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诚恳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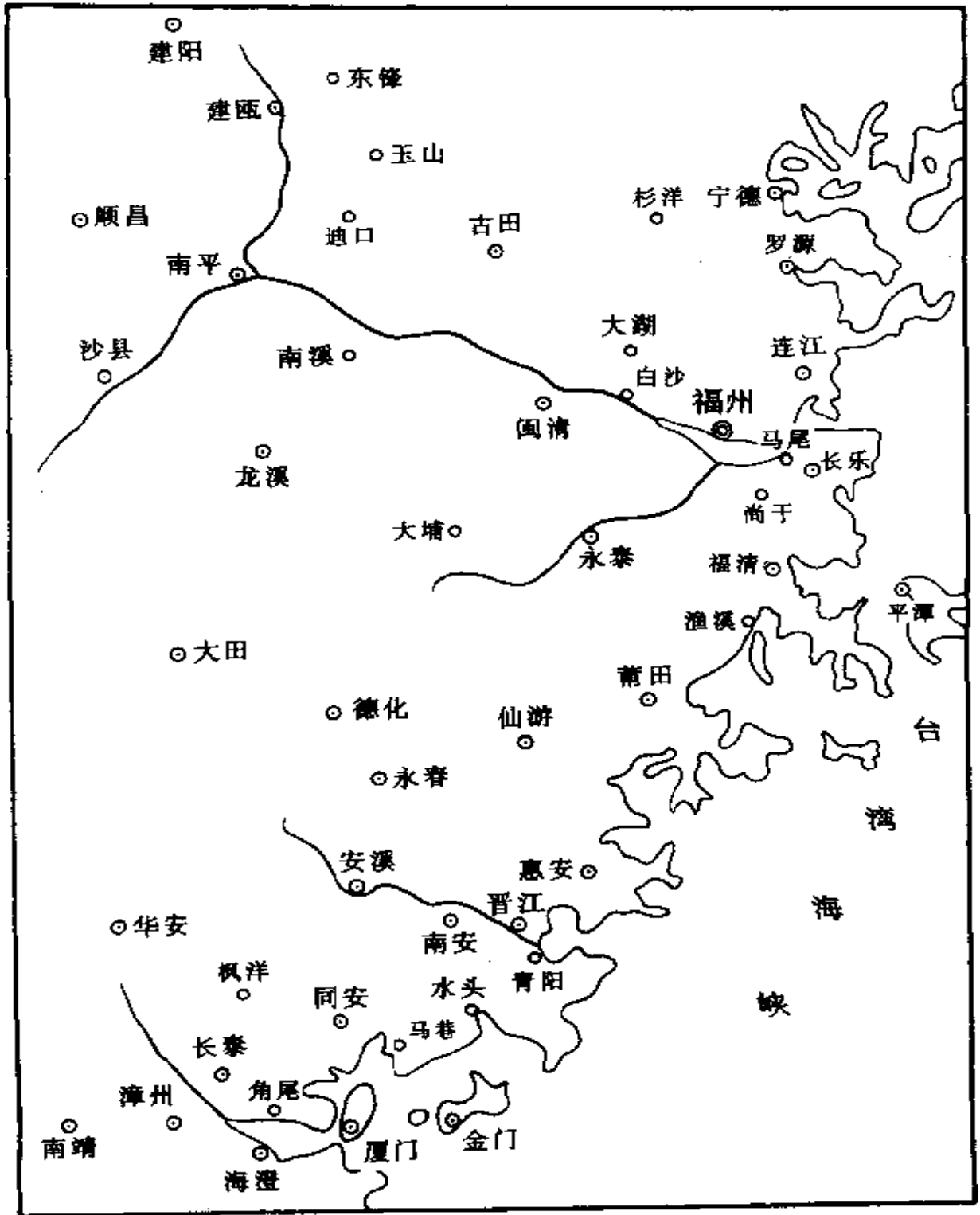
编著者

1997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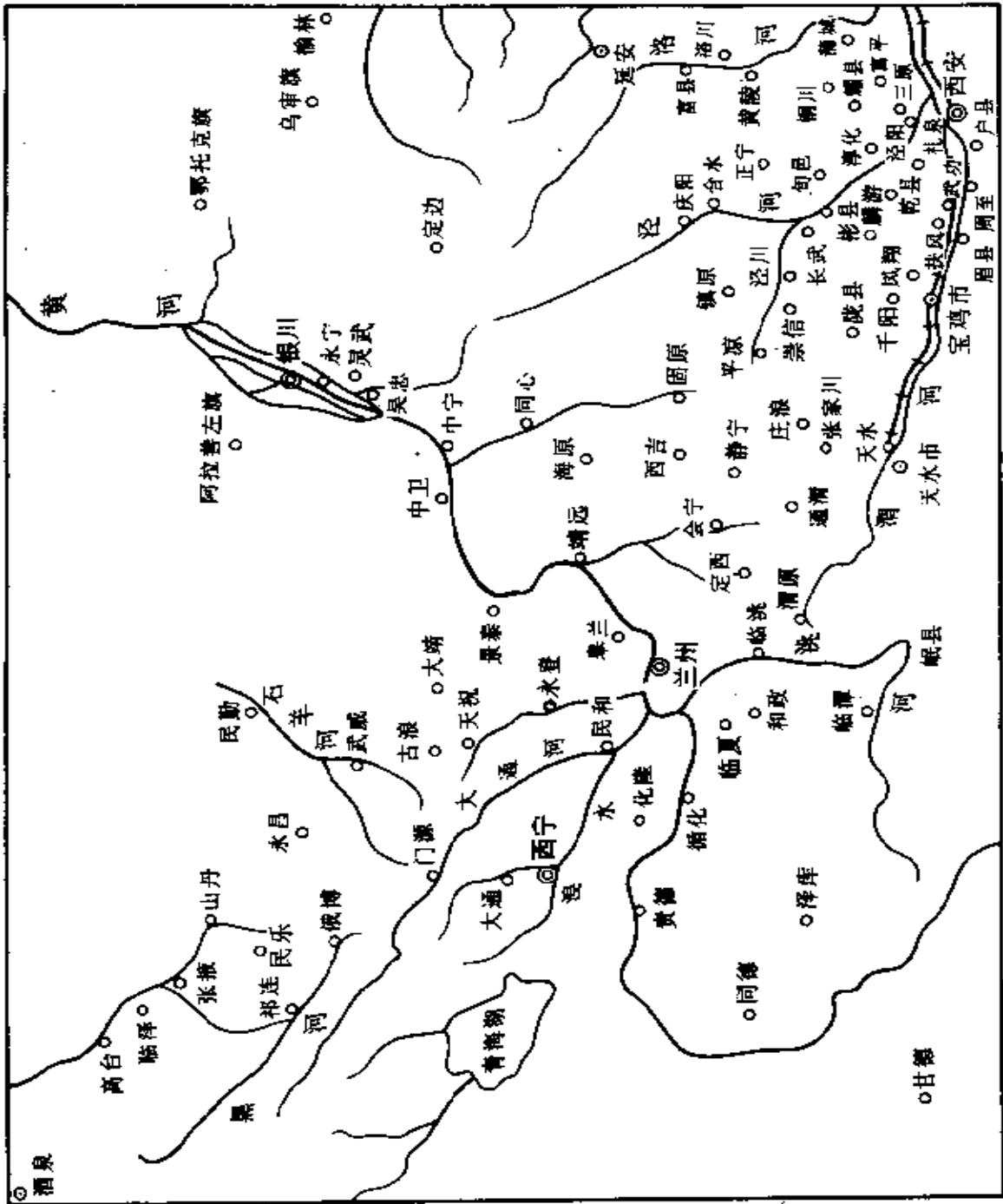
渡江战役地理要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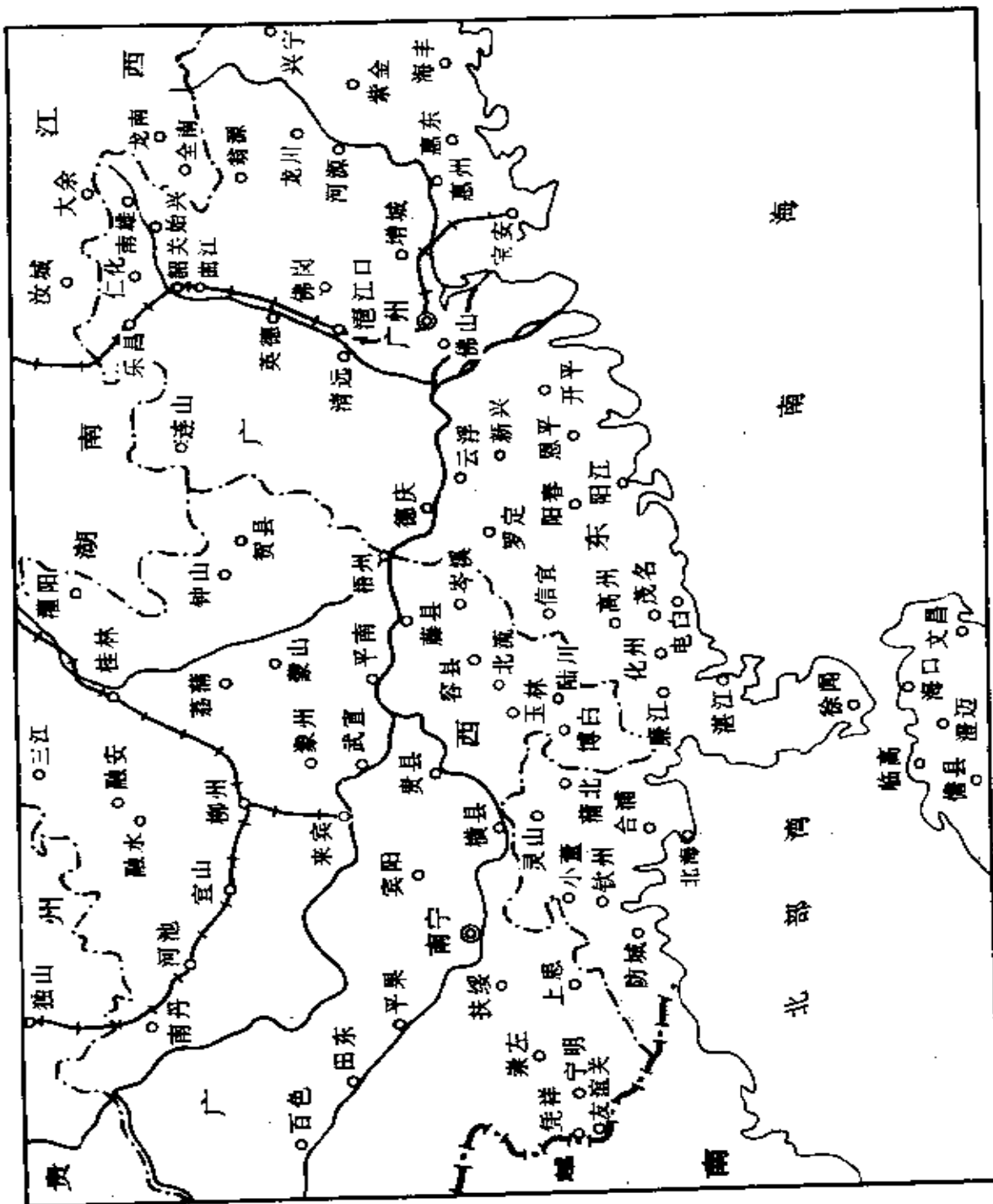
进军福建作战地理要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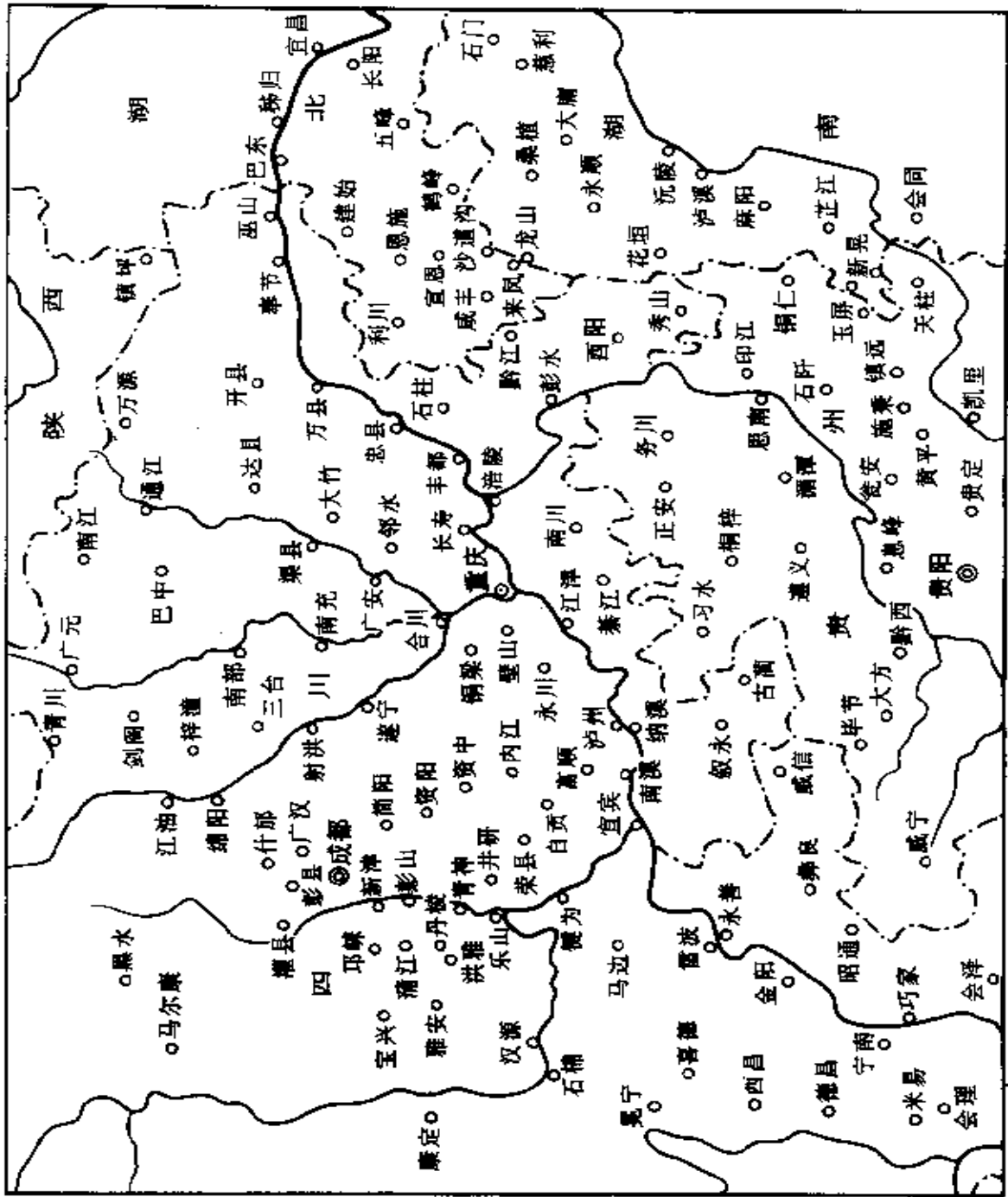
进军甘宁青地理要素图



进军广东、广西地理要素图



进军川黔及成都战役地理要素图



0101466

E297.4
36:5



201014669

DH69/15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国解放战争史

第五卷

主 编 华国富
编写人员 华国富 温瑞茂
赵焕明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国解放战争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第五卷

(1949.2-1950.6)

军事科学出版社

ISBN 7-80137-094-5



(京)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 787801 370945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 第5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8

ISBN 7—80137—094—5

ISBN 7—80137—095—3

I. 中… II. 军… III.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IV. E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364 号

责任编辑: 吴振水 封面设计: 姜萍

出版者: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 100091)

印刷者: 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

发行者: 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处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37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平) 500 册(精)

书 号: ISBN 7—80137—094—5/E·053(精)

ISBN 7—80137—095—3/E·054(平)

定 价: 35.00 元(平) 41.00 元(精)

(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